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人文与社会译丛

大萧条的孩子们

G. H. Elder

[美国] G. H. 埃尔德 著 田禾 马春华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大萧条的孩子们

本书展示的内容极有意义和价值，是对生命历程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

——约翰·克劳森

作者通过引人注目的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

——尤里·布朗芬伯伦纳
雅各布·G. 舒尔曼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封面设计 胡 苑



ISBN 7-80657-383-6
I·302 定价:27.30元

人文与社会译丛

大萧条的孩子们

[美国]G.H.埃尔德 著　田禾　马春华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萧条的孩子们/(美)埃尔德(Elder, G. H.)著;田禾,马春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4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SBN 7-80657-383-6

Ⅰ.大… Ⅱ.①埃… ②田… ③马… Ⅲ.衰退(经济)-社会影响-研究-美国 Ⅳ.D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9293号

Copyright © 1970 by Glen H. Elder, J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len H. Elder, Jr. through
Arts&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040号

书　　名	大萧条的孩子们
作　　者	[美国]格伦·H.埃尔德
译　　者	田禾　马春华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原文出版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383千
版　　次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383-6/I·302
定　　价	27.3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萧条、战争和极端的社会骚乱常常会引发重大的社会转变。对个人经历和传记的研究充分表明，这些危机时刻也会重新建构个人的生命历程。有些人生命短暂或者遭遇重重挫折，而另一些人则找到以前无法想像的获得成功的目标和机会。在危机时期，机会因素似乎在影响生活后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如果脱离危机的直接影响，我们将无法详细地说明预期的生命历程。想通过描绘碰撞、反应和最终影响的不同模式来勾勒"纯粹的后果"(net effect)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有关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详尽的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完成这种分析。而这正是格伦·埃尔德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因此这项成就很值得评述。

这本书很快就会证明长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的价值，证明40多年前奠定奥克兰成长研究(Oakland Growth Study)的学者的献身精神和预见性，也证明格伦·埃尔德杰出的独创性和非凡的毅力，他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收集数据，重新对它们加以定义，并把这些数据用来解释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奥克兰成长研究是由赫伯特·斯托尔兹(Herbert Stolz)和哈罗德·E.琼斯(Harold E. Jones)在1931—1932年间进行的，他们把它作为检验青春期转变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一种手段。因此，它最初的名称是青春期成长研究(Adolescent Growth Study)。从研究对象进入初中(平均年龄11或12岁)到六年后他们高中毕

业，研究者在上百个不同的场合中对他们进行了观察、询问、度量和测试。他们运用了许多当时所能掌握的最好技术，但现在看来这些技术似乎已经相当原始了。但至少，他们仔细地——也许可以说是非常小心翼翼地——运用它们。对于早期群体的主导研究方向是儿童心理学。这些研究者在生理、认知和社交等方面广泛地考察了孩子们的个体发展，但相对而言却不太注意社会化经历的概念化和量化。然而，他们当然也认识到父母的行为和生活环境会使儿童的发展出现差异。哈罗德·琼斯对美国社会科学中与社会阶级测量相关的新成果特别感兴趣。他尽力收集了关于家庭的性质、父亲的职业以及生活水平的其他方面的详细数据。

1960 年，我非常荣幸能接替哈罗德·琼斯出任个人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Development)所长。作为一个来自不同学科的初来乍到者，我发现这里数据档案的规模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重要跟踪研究在研究对象年近 40 岁时已临近结束。新数据的编码和评分进展顺利，但分析框架尚未成型。两位设计了这项跟踪研究的人——埃尔斯·弗兰克尔—布伦斯威克(Else Frenkel-Brunswik)和哈罗德·琼斯的相继去世，使得项目失去了高级主持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项目几近于混乱无序

1962 年，格伦·埃尔德来到了所里，他刚刚结束了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并且已经进行过有关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大规模研究。他看起来求知欲惊人，精力充沛，不仅为这个项目带来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扎实知识，而且还带来了关于青少年发展的理论。在用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跟踪数据上，他是我的理想工作伙伴。我们最初的计划是合作写一篇关于研究对象家庭关系和职业发展的专题论文，但由于我本人疲于应

付行政事务，以至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它。对我的同事来说，这肯定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但是通过对职业发展和婚姻史进行一系列分析，他最终度过了这一时期，并对知识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后，他考虑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数据，设计了可以明确检验大萧条改变家庭生活和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们发展的各种方式。

本书在这里展示的内容本身就极有意义和价值，它是对生命历程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life course）的开创性贡献。我们知道"生活机会"（life chance）取决于历史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但是，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说明时空中各种特殊经历之间的联系之本质及其对这些经历的适应性反应和长期后果。实际上，对社会化影响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仅仅是一种假设，即关系、引导或者行为的特殊模式都将影响到后来的结果。研究者很难从对象的儿童时代开始，经过青少年时代，最后到成人时期一直进行跟踪研究。如果人们试图考察早期经历和后来的个性特征或职业道路之间的特殊关联，通常需要从通过使用回顾报告而对结果和工作进行透彻的了解而开始。但是，由于在回顾性重建中，人们难免会用现有的眼光修正过去的经历，因此论据是脆弱的。只有纵向研究或保存了很长时间的个人档案，才能作为追踪生命历程中导致变化出现的关联的充分基础。只有用这些数据人们才能够阐明一系列事件、关系和被研究者对自己境遇的解释，它们是个体认同职业、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基础。

然而，即使是在纵向研究中，个人知识难免也会显得不足。一个人不可能检验或评论所有凸显的个体经历，即使他知道如何询问所有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早期调查者收集的数据越丰富越多样化，后继者在解释以前未曾说明的问题时可能

越感觉到得心应手。不过，整理数据的工作同样也更加复杂和费时。

如果说已有的纵向数据奠定了这种特殊研究的基础，那么这里采用的出生组分析(cohort analysis)这一明晰的框架就极大地超越了大多数纵向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出生组分析的方法是人口研究中的一种颇受称道的技术，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则用得较少，在社会心理学调查中就更难见踪影。在出生组分析中，调查者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在历史的情境中观察个人的行为。理想的情况是比较不同出生组的经历，而这就是格伦·埃尔德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本书只考察了一个单一出生组的经历，但是通过对次群体(subgroup)的创造性分析，研究者能够证明历史时代怎样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冲击着各个家庭。

本书是作者呕心沥血近十年的作品，与此同时他还从事许多更具体的研究，并发表了许多成果。对我来说，目睹这项研究结出丰硕成果仍然是一种受益匪浅的体验，而且我相信回过头来重温他们所研究的奥克兰出生组发展过程的读者将会深有同感。

约翰·A.克劳森

1998 年版前言

在这本书中，格伦·埃尔德将给我们展示两项经典性研究。他通过把与他工作关系密切可初次出版日期却相隔甚远的两项研究融为一体来实现这个目标，今天这两项研究在推进个人发展研究和解决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方面高度相关。他的早期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在 25 年后再版，作者在书中通过引人注目的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的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这对当时盛行的关注年龄和生命阶段的个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研究项目提出了挑战

但是格伦·埃尔德已经更进一步了。自从他的书在 1974 年出版后，在根据对连续追踪调查所做出的分析写出的具有挑战性的最后一章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在有关个人发展方面具有破坏性的趋势突然逆转方面的证据："出人意料的是，大萧条的这些孩子到中年的时候遵循的是一条具有恢复能力的生活轨迹。他们所做的比人们从其社会出身的角度估计的更好。"随后对恢复能力和应对行为的出现做出了最大贡献的生命历程的研究结果如下所示：利用新创造的机会去获得高等教育；在刚刚成年的时候，把婚姻作为支持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到部队服役对其生活的影响。这些经历所带来的良好影响不仅仅是附加性的，而且它们能够彼此强化。比如，服役"常常能为婚姻和高等教育提供

新的机会。这些男性通过总动员参军入伍后，可能会碰上潜在的配偶，而且又拥有了获得技能训练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把这些个人发展经历联系在一起的是由GI高等教育津贴提供的教育机会……比如，加州的老兵中几乎有一半提到曾经因为GI高等教育津贴完成某种程度的教育”。另外，这些经历所带来的益处还对他们在差异最大的方面造成了特殊的影响。比如，“对于过去曾有过失但很年轻就入伍的老兵来说，无论他们童年的差异和中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怎样，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巩固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工作的稳定性和经济上的收益。”正如埃尔德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战争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他一再谈到GI高等教育津贴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行动发出警告和号召方面达到了峰顶。“但是即使拥有杰出的才华而且非常勤奋，如果没有机会，也无法确保自己的生活能够克服逆境的不利影响而获得成功。”

尤里·布朗芬伯伦纳
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

致　谢

40年前，哈罗德·E.琼斯和赫伯特·R.斯托尔兹率先提出这个课题的设想，当时他们分别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该所现在的名称为个人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所长和行政所长。1932年,他们以奥克兰东南部地区11岁的孩子为样本，启动和领导了追踪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纵向研究项目,稍后他们又将这项研究扩展到研究样本儿童的整个生命跨度(life span)上。在缺乏今天已变得习以为常的财政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在30年代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一个有关数据收集的庞大项目。这个项目以及对成人进行的定期追踪调查,为研究作为"大萧条的孩子"的奥克兰儿童提供了合适的资料。我非常感谢他们和研究所的其他工作人员,是他们长时期的辛勤劳动发展了这个记录个人发展的珍贵的数据档案库(由L.S.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UHPHS Grant MH 06238资助)，我也衷心感谢奥克兰的孩子们,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变迁,我才有这样的研究机会。

数据准备和分析的初始部分是我在个人发展研究所任社会学研究人员时(1962—1967)完成的。1967年我到北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学系任职后,在查珀尔希尔[1]继续进行此项研究。在

---

[1] 查珀尔希尔是北卡罗莱纳大学所在地,字面意思是"教堂山"。——译注

国家科学基金第GS—35253号项目的资助下，手稿的最后修订稿是在我个人发展研究所的一个休假年（1972—1973）完成的。从初始到手稿最终完成的对经济萧条经历进行研究的所有阶段，约翰·克劳森（John Clausen）热情的鼓励、敏锐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都让我受益匪浅。正是因为在研究所里参与他的项目，我才有机会进行有关生命历程的纵向研究，而且正是在这个研究项目的赞助下（Grant MH 05300 NIMH），我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关于家庭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如果说这种影响，或者更广泛地说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可以追溯到W.I.托马斯）对我的读者来说就像对我一样明显，我将为之非常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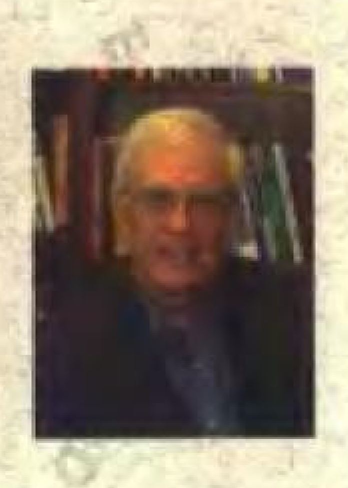
我还应该特别感谢个人发展研究所以及查珀尔希尔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数据准备和分析方面给予我的支持：感谢埃拉·巴尼（Ella Barney）、克里斯丁·戈德（Christine Godet）、娜塔丽·鲁彻斯（Natalie Luchese）、琳达·安德森（Linda Anderson）和帕特里西亚·桑福德（Patricia Sanford）在我准备草稿时在专业上对我的帮助。M.布鲁斯特·史密斯（M. Brewster Smith）、玛丽·琼斯（Mary Jones）和约翰·克劳森对我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批评和建议。纳尔·史迈尔瑟（Neil Smelser）、鲁宾·希尔（Reuben Hill）、约翰·克劳森、玛丽·琼斯、多萝西·埃里科恩（Dorothy Erichorn）和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Jackson）阅读和批评了扩充后的手稿。所有这些评论和讨论对修订本书都极有意义。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根据以奥克兰成长研究的样本为基础的三篇论文的材料写成的：《职业流动中的智力和成就动机》，载《个人关系社会学》，第31期（1968年12月），第327—354页；《外貌和教育对于婚姻流动的影响》，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4期（1969年8月），第519—533页；《成年时期的角色取向、婚

龄和生活模式》,载《梅里尔—帕尔默季刊》,第18期(1972年1月),第3—24页。受出版者的许可,我引用了以下资料,在此表示感谢:罗伯特·S.林德(Robert S. Lynd)和海伦·梅里特·林德(Helen Merritt Lynd):《变迁中的中镇:文化冲突研究》;Harcourt,Brace,1937;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艰难时世》,Random House,1970;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像》,Oxford,1959;约瑟夫·阿德尔森(Joseph Adelson):《妇女的解放是一种短命的时尚吗?》,载《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3月19日;米拉·卡马诺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蓝领婚姻》,Random House,1962;海伦娜·Z.洛帕塔(Helena Z. Lopata):《职业:家庭主妇》,Oxford,1971;鲁宾·希尔:《三代人中的家庭发展》,Schenkkman,1970。

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无论是进展顺利还是遇到挫折,我的妻子凯伦(Karen)都始终不渝地理解和支持我。她绝佳的幽默感和富有活力的见解是对一个全神贯注的丈夫最大的帮助。在这里我特别将本书献给她,以感激她的支持。

格伦·埃尔德



G.H.埃尔德（1934—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霍华德·W.奥登杰出教授和心理学研究教授，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会会员，埃尔德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儿童发展研究学会会长、社会学研究协会会长。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埃尔德以其提出的关于个人发展的生命历程理论而享誉美国社会学界，其主要著述有：《大萧条的孩子们》、《生命历程动力学》、《时空中的孩子们》、《艰难时世中的家庭》、《发展科学》、《生命历程研究方法》、《大地之子》等。埃尔德先后获得二十余项杰出贡献奖、杰出成就奖等。

本书责任编委　刘金源

30年代的"大萧条"是20世纪美国人最为难忘的痛苦经历之一。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埃尔德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跟踪研究对象，对于大萧条经历对这些研究对象生命历程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纵向研究。埃尔德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特征。在该书中，埃尔德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恰当地评估了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受损经历对于其研究对象生命及其后代历程的深远影响。就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对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而言，埃尔德无疑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对于社会科学诸领域的学者而言，这部著作无疑有着较强的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部分　危机与适应：导言

第二部分　大萧条年代的到来

第三部分　成年时期

第四部分 大萧条经历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表格目录

图表目录

第一部分
危机与适应:导言

一场大灾难撼动这个城市达六年之久,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它还影响了他们的生存。与大多数人为制造出来的灾难不同,在这场灾难中,社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逃避被抛向下层的命运;经济萧条的利刃无情地斩向所有的人,不仅割裂了有钱人的生活和希望,而且也粉碎了穷人的生活和希望。在城市史上,这种经历比近代以来任何一种情感经历更为普遍;它所震撼的根基,几乎已接近于生与死的基本体验。

中镇本身有理由认为,许多家庭聚集在一起,并且"发现"自己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但同样肯定真实的是,在另外一些家庭中,经济萧条引起了对幻灭和苦难的永久记忆,这一点部分地可以从离婚率迅速重新攀升到1935年的水平中看出来。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平衡点何在,至今尚没有人知道。

[报纸社论] 这次经济萧条也有它的益处。伟大的精神价值产生于萧条之中……许多家庭失去了汽车,但是却找回了灵魂……从而勇气倍增。躯体安享了更多的平静,尽管精美食品依然匮乏,但消化力却增强了……教堂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因为一些曾经是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的人再也承担不起享乐所需付出的代价了。

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M.林德:《变迁中的中镇》

第一章
大萧条的经历

它曾是最好的时光，
它曾是最糟的时刻，
它曾是智慧的时代，
它曾是疑惑的年代，
它曾是光明的季节，
它曾是黑暗的隧道，
它曾是希望的初春，
它曾是绝望的寒冬。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在目睹个人生活和社会制度为大萧条付出的代价以后，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能够让我们回忆起大萧条的“威力”。但是另一方面，它还向我们揭示了让人受益匪浅的另外一面，即大萧条也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人们因此培养了新的社会适应性。研究者在探索社会变迁和危机时早已注意到这两个极端的情况(Sorokin，1942)。尽管如此，现有的理论和研究还是倾向于忽略历史事件的对立因素及其后果。例如，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大萧条是美国社会变革的一道分水岭，而其他人却强调从1929年后的制度变化到19世纪末期直至20世纪的社会改革之间的连续程度。(对“断裂性”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参见Kirkendall，1964。)无论是哪一种专门性分析，人们都很少从适应性变化的潜力和病理学方面观察危机境遇(crisis situation)。

从某种程度上说，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是由于受到历史事

件冲击的程度不同(在30年代,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曾承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或失业所带来的痛苦),另外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个人背景造成对他们所处境遇的不同解释。全国所有的行业都遭遇着经济停滞和困苦的生活,1933年失业人数达到了劳动力人数的1/3,工作时间缩短和收入减少的人数的比例就更高,但是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居住地的人所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①] 一位经济学家收集的证据显示,至少有半数人口在这个时期经济上损失不大。[②] 极度的物质匮乏和贫困主要集中在城乡的下层阶级中,在中产阶级中更为常见的是地位和名誉的丧失以及因此出现的一些焦虑。由于存在着这些差异以及30年代作者们不同的背景,人们对大萧条中美国人的形象有许多迥然不同的解释就不足为奇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背景和偏好的新闻记者、长短篇小说家自然容易在观察中得出互相矛盾的印象;同一位作者的论点有时也经常自相矛盾。"[③]

自然,这些互相矛盾的报告是否有效便成了问题,但是那些仅仅依靠个人回忆的报告或者相对而言更多地取材于最近出版的有关那段历史时期的报告,在这方面就更成问题(参见

---

① 米切尔:《萧条十年》(1947);斯滕谢尔:《对家庭的打击》(1970),第20—21页;亨廷顿:《失业救济和失业者》(1939),第6页。

② E.斯莫伦斯基:《适应萧条和战争,1930—1945》(旧金山,1964),第7页。收入分配不均是大萧条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30年代这种状况加剧了。"根据美国的标准,1929年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均,收入处于顶层的人获得的更多,而收入处于底层的获得的更少。在大萧条期间,由于低收入家庭失业的情况最为严重,这种情况更加恶化。直到二战爆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中低收入家庭的状况才有所好转。"T.C.科克伦:《大萧条和二战》(旧金山,1968),第2页。也可以参见诺思:《美国过去的发展和福利》(恩格利伍德-克利夫斯,1966),第174—180页。

③ H.斯瓦多斯编:《美国作家和大萧条》(印第安那,1966),第xii页。

Terkel,1970)。重建过去经常是为了适应现在。“过去的好时光”是一个令人惬意的话题,谈到过去时人们总是加以美化,人们常常不愿提及“倒霉的时候”,除非这段时光对一个人目前的境遇和成功的奋斗史意义重大。在这两种情况下,回忆描绘出的大萧条时的生活经历都是一幅模糊的画面。一位作者注意到许多经历了大萧条的美国人都避而不谈他们的经历,他发现时间的流逝对痛苦和不愉快的经历有一种麻醉作用。“也许这是保持个人情感稳定的一种自然方式,但这对历史的真实性是无益的——我们只回忆自己愿意回忆的东西。”[④] 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真奇怪,每一个描写30年代的人都在为自己辩护。”[⑤]

有关大萧条中社会现实和生活经历的知识的可靠性,有赖于档案数据的有效性。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即使是这样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无法深入发掘。人们不可能收集其他的信息来填补数据的空白,而且非常不幸的是这些空白也实在太多了。例如,在大萧条的许多阶段,国家没有全国失业率的准确统计数据。来自官方文件的档案数据,除了能够提供一些人们的主观境遇(subjective situation)、家庭和个人经历等非常有限的信息,特别是提供一些有关下层社会的经历外,对于社区研究来说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源泉。

从30年代以来,我们所能得到的有关大萧条期间家庭生活的可靠信息为数甚少,而有关孩子们处于经济困窘中的不同条件下的真实经历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至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

---

④ M.梅尔策:《兄弟,你能节省一枚硬币吗? 大萧条,1929—1933》(纽约,1969),第3页。有关探索个人如何重构过去以适应现在的研究,参阅F.戴维斯:《走过危机》(印第安那,1961)。

⑤ T.拉斯克:《30年代的表面状况——对A.哈尔珀的〈再见,工会广场〉的评论》,载《纽约时报》,1970年11月5日。

兴趣并值得思考的问题——大萧条对于在30年代长大成人的孩子心理上的影响，我们也缺乏相关资料。对这方面有所想法的一个例子就是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假设，他认为莱维敦人(Levittowner)“不易冲动”，原因就在于他们童年时的大萧条经历：“冲动被认为与冲突、危机和受损相关。大多数在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莱维敦人，对童年时期的艰苦岁月记忆犹新，他们希望使自己和孩子们远离生活的压力。”[⑥] 其他关于成长过程的解释同样也似是而非。

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出生于1920—1921年的某些美国人及其父母生活中的大萧条经历，但是也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对于家庭变迁和代际关系的影响。我们从30年代早期，到整个二战时期、战后的40—50年代，再到60年代初，一直跟踪研究这些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萧条的孩子们。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奥克兰个人成长研究机构(个人发展研究所)的档案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惟一的机会来考察大萧条前出生者家庭生活中的经济变动及其后果。该项目于1931年启动、从1932年开始收集数据，研究的是男孩和女孩的生理、智力和社会性的发展。在1932—1939年间详尽研究的167个孩子，最初是从加州奥克兰地区东北部5所小学中的五六年级中挑选出来的。从注册学生的家庭背景来看，有两所学校的孩子主要来自于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家庭，一所学校的孩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下层(lower-middle class)家庭，其他两所学校的孩子则来

⑥ H.A.甘斯：《莱维敦人》(纽约，1967)，第201页。

自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家庭。

这些孩子虽然仅仅代表了曾经历过大萧条的一个年龄组,但是作为二战兵员、战后的"婴儿潮"以及人们对所推测的代沟的主要来源,1916—1925年的这个出生组具有历史的重要意义(Cain,1970;Easterlin,1961)。除了极个别人以外,他们中的男性在战争期间平均服役时间为三年,而在"家庭主义"盛行的战后时代,他们中的女性则忙于抚养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男性和女性都在战争期间结了婚,随后在相对富裕的时候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他们的孩子许多是在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进入大学的。

实际上,大萧条的孩子们和他们自己的孩子有着迥然不同的童年,前者成长于物质匮乏时期,而后者则生活在物质充裕时期。我们的这些调查对象及其父母的童年时代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父辈们出生于世纪之交,在30多将近40岁的盛年时期经历了大萧条。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父亲,大多属于"老中产阶级"中自雇(self employed)的零售商和专业人员。通过婚姻或职业上的成就,他们的子女大多数都奠定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些职业与由大萧条时期演变来的组织化社会(organizational society)中的各种官僚机构相关。

我从各个家庭所承受的不同的经济损失(economic loss)入手,来调查其社会和心理影响;我不太关心那些造成养家糊口者在经济损失和失业方面变化的因素。本书的前半部分关注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和劳动阶级家庭在经济受损方面的差异,比如表现在家庭结构、社会经验和孩子们人格上的差异;在后半部分的章节中,则追溯它们对于孩子们成年过程中的事业、价值观和心理功能的影响。本项研究以社会经济变迁为关注的焦点,必然要得出有关生命跨度的不同结论,例如我从概念上区分了家庭

组织和生活境遇(life situation)的影响，追踪它们对于孩子成人后经历的作用。因此，这种分析很像一个漏斗，在初始阶段狭窄、集中，在成年时期则变得逐渐开阔。特别提到这个特点很重要，因为这种分析的必要条件与那种仅仅关注单一结果或者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研究(例如，“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得以形成的条件是什么？”)明显不同。[7]

在我们对一个因变量变化的基本来源深感兴趣时，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适于分析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根据某种理论)解释这种变化的可靠来源。例如，什么样的社会因素能够解释妇女在平等主义的性别角色取向(egalitarian sex-role orientation)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如何解释婚姻权力平衡的差异？研究这些问题时，在各种量中，可以解释差异的量是评估理论和结果的一个合理标准，但是当分析者关注的是一个自变量或者先决因素的影响时，它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在今天的研究中随处可见。在理论和历史的基础上，我选择了经济受损(economic deprivation)[8]这个变量来研究，而不是按照它在预测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上可能具有的效率来选择。就此

---

⑦ R.A.尼斯比特与关于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兴起的问题的论述，是一个有关社会变迁的更为普遍的阶级问题的一个特例：“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或者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历史中，真正的社会变迁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社会变迁和历史》(1969)，第275-277页。

⑧ economic deprivation、deprived family等是埃尔德这本书中的核心概念，deprive这个词，可以有“剥夺”、“损失”等译法。“剥夺”在中文习惯中含有“用强制方法夺去”或者“依照法律取消”的意思，这和埃尔德在本书中所指的情况不太相符；“损失”也不妥，因为埃尔德同时运用了economic deprivation和economic loss，后者译为“经济损失”更为贴切；deprive如果译为“损失惨重”也可以，但是埃尔德还使用了heavy economic loss这个词。现在把deprive译为“受损”，一方面也含有被动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它不仅可以指经济上的损失，也可以指机会、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损失。——译注

而言，在我们涉及经济受损对生命历程的影响时，以下两种结论值得关注：经济受损是否会影响到成人经历的某个特定方面？这种影响和其他相关变量（如家庭、社会阶级）的影响相比如何？——这是个相对影响的问题；还有这种影响是怎样与成人生活这方面发生关联的？——这是个重在解释的问题。

研究家庭变迁的方法

在社会变迁的领域中，同抽象的社会系统和结构的分析相比较，本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具体环境中真实的家庭和个人。关注家庭（父母和子女齐全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变迁，因为这是调查代际变迁的动力、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代际连续（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方面变化的策略要点。如果家庭对变迁的适应是由习惯的行动方式与新境遇的特点及其所察觉到的要求和选择所建构的，那么我们就会期待某种儿童世界的重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家庭内和家庭外的环境（extrafamilial settings）中所要完成的任务中重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父母对家庭境遇的改变所做出的回应行动，不可避免地塑造或者改变着他们对孩子的养育方式。在大萧条中求职的母亲，也许目的确实是补贴家用，但是她们的行动可能会给成长中的女儿们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例如，职业母亲（working mother）将为她的女儿树立一种行为模式，并且可能对家庭事务产生影响，因此女儿也将会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这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对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都有影响。

这种方法能使分析家们深入地了解变迁产生的过程，这为许多有关社会变迁的著名宏观理论——如阶级冲突理论和社会

文化进化理论所忽视。[9] 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只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了家庭和代际变迁?"或者"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包括"这些变迁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当30年代尚是孩子的男性和女性成年后的职业生涯和经济变迁在概念上的联系是什么?显然,这里所提到的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要点要归功于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的早期著作,特别是他的经典著作(与F.兹纳涅茨基合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0] 托马斯将他的分析目光集中于社会结构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上,并为研究个人和环境之间的断裂(discontinuity)或者不协调(incongruence)之处确定了令人信服的案例,这在他有关危机境遇的理论以及对新环境适应的理论中都可以看到。身在本项研究的更为有利的位置上,我们仍非常赞赏托马斯对生活经历这一发展性概念(developmental concept)的重视,赞赏他对生活记录(life record)和生活史(life history)的运用。

处于变迁这一具体境遇下的家庭研究,与家庭变迁中历史事件研究的分析需求巧妙地啮合在一起。本世纪主要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大规模的移民(从欧洲流向美国,从农村流向城

---

⑨ 这种研究方法和"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与"从最基本而开始"的历史也是一致的。参见S.塞恩斯特龙的《贫困和进步》(1964)和《另外一种波士顿市民》(1973);P.格雷文的《四代人》(1970);R.森尼特的《对抗城市的家庭》(1970)。至于对社会史发展的批判性的回顾,可以参阅霍布斯鲍姆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1971)。

⑩ 根据托马斯的观点,社会科学"必须触及在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a)的正式组织之下构成全面的、生动的和活跃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真实的个人经历和态度。对于社会制度,我们只有不局限于对其正式组织的抽象研究,分析它在群体不同成员的个人经历上的表现方式,并且追踪它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时,才能对它获得充分的了解,"沃克哈特编:《社会行为及人格》(1951),第146页。也可以参阅赫伯特·布鲁默对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深刻批评,见《对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论》(1939)。

市)、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至少暂时将父亲和儿子送上了前线,将母亲吸收到劳动大军之中)和大萧条——直接影响到了数百万个家庭单位,但是这类事件却很少用来解释家庭变迁。根据典型的美国家庭制度,人们将无法理解这些事件—建构(event-structured)的各种条件对于家庭的组织、适应性和变迁的意义。人们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一些相关研究,包括从对危机中家庭的研究到对家庭单位的追踪研究,但是这些发现在理解家庭和代际变迁方面并不能带来多少进展(Good,1968)。根据所使用的档案来源,目前的这项研究被严格地界定为有关家庭变迁的研究。通过追踪社会经济变化对家庭和生命历程的影响,它在这一研究方向中是具有开创性的。

分析框架中的概念

本研究主要依赖于五个概念:经济受损、危机或困境(crisis or problem situation)、适应性(adaptation)、关联(linkage)和出生组(cohort)。我们将在对经济受损的影响进行评估和解释的时候,运用危机、适应性和关联这几个概念来对出生组(在奥克兰研究中主要是父母和孩子)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社会变迁对年龄各异的个人具有不同的影响,这意味着年龄的差异和境遇的不同意义、适应潜力的差异和可供选择的多少有关,也与事件和生命历程不同的关联有关。我们假设,孩子们最初是通过家庭对新境遇的适应性——比如消费和生产活动的变化——而感受到经济受损的影响。

作为变化不断减缓的经济受损。经济受损指的是经济变化不断减缓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长期失业、公共援助或贫困所造成的持久损失。由于不断减缓的变化,我们认为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出现在1929—1933年期间,而在1933年大多数经

济指标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低点也并不稳定。由于30年代后半期经济状况的好转,全国又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家庭的经济状况也相应地总体有所改善。

无论剧烈程度如何,暂时的经济衰退远远不只是造成了一种长期的经济损失状态,它对于家庭和孩子也具有不同的意义。60年代,经济受损的概念主要运用于下层阶级人口的孩子身上,研究者几乎全部倾向于把经济受损的社会和经济形式同人格发展的病态结果联系起来。如果下层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条件是经济受损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那么它们对孩子的发展一定会产生负面影响(U. S. Dept. of HEW, 1968)。这些环境因素和心理伤害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受损最终可能使人变得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并且具有成熟的责任感。在变化不断减缓的情况下,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仅限于这种家庭:父母和孩子常常缺乏能提高其适应能力的文化、教育、智力等资源。如果调查的范围包括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当这些家庭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错位(structural dislocation)(用以防备养家糊口的人能力不足)时,这项有关适应潜力的研究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工厂倒闭、大公司部门缩减,技术人员受雇机会的总体减少,向下流动的趋势从50年代起就开始了,但是下降趋势最为剧烈的例子还是出现在大萧条中。特别是对中产阶级来说,经济受损的状况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它要求人们在经济状况、家庭组织和孩子的社会化方面寻求一种新的适应模式。这项研究包括大量在艰难岁月来临之前属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受损的家庭。

危机和适应性。乍一看来,危机境遇似乎不需要进行细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清楚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社会错位(social dislocation)、社会瓦解(social disruption)和社会紧张

(social strain)等。对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而言，危机是想像力经久不衰的源泉，这是合乎情理的；它们揭示了群体生活的内部运作方式、其毋庸置疑的前提、成问题的特征以及它唤起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中的适应能力。正如纳斯比特(Nesbit)所观察到的那样，"只有在导致危机的事件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行为方式的结构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1970，第328页)。对于美国人的生活而言，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是极为严重的危机。考察这种危机，就能探究适应和变迁的早期进程。[1]但是引发危机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在本项研究中，"危机"指的是处于某种境遇中的家庭之要求及其对后果的控制之间颇成问题的不一致性(problematic disparity)，更确切地说，指的是社会经济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2]当需求远远高于控制潜力和现实情况时，或境遇的变化明显地使人们控制后果的能力降低时，危机就因此而产生了。前一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在经济增长和富裕时期，后者则更有可能产生于经济萧条时代。假设人们的期望值最初是稳定的，那么养家糊口者收入的减少，将会在经济需求增加的

---

[1] 这是有关孩子如何对危机做出回应的一份意义重大的文献。有关的重要研究包括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的《战争和儿童》(1943)；M. 沃尔芬斯坦和 G. 克利曼的《儿童和一位总统的死亡》(纽约，1965)；科尔斯的《危机中的孩子们》(1967)。

[2] 在社会变迁和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理论中，危机现象一般都包含在社会紧张的概念中。参见 N. J. 斯梅尔塞：《集体行为理论》(纽约，1963)。本文接下去，将使用 W. I. 托马斯的有关危机境遇和适应性的理论。相关的论文大多可以在沃克哈特编辑的《社会行为和人格》(1951)中找到。这种扩展的视角，可以参阅米切尼克：《医学社会学》(1968)，第9章。托马斯的有关适应过程的观点，来源于达尔文的有关适者生存过程的理论。后者被运用于文化—个性的关系研究，可以参阅 R. A. 莱文：《文化、行为和人格》(芝加哥，1973)。

同时减少家庭可以控制的选择。

危机境遇对研究变迁十分有利，因为它们对现实习惯性的解释提出了挑战，又破坏了既定的惯例。常规生活方式(habitual ways of life)的崩溃产生了新的刺激，这种刺激引起了自我和他人的注意，也激发了对自我和他人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self and others)。当旧的方式无法应付社会需求和满足基本的需求或标准时，人们就难以控制事件的发展。当一个群体或个人这样解释或定义所处的境遇时，它就进入了危机阶段，这样就提出了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和适应方式的问题。对于生活在收入和地位突然恶化的家庭的孩子来说，适应可能包括对自我和他人的重新定位、目标的重建或者澄清，以及对新的地位或者角色的假设。

危机不是或依附于个人或存在于境遇之中，而是在个体与特定境遇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它们产生于个体和社会境遇、群体与其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交汇处。因此一种危机境遇指的是个人或群体与环境之间关系上的不同时性(asynchrony)。对危机境遇的适应指的是处理资源和选择的方式，这些方式被用来实现对环境或生活境遇的控制，并解决因需求和结果控制之间的不一致性所造成的问题。对经济受损的家庭来说，适应的方法包括：减少物质产品的消费，在获取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多地依赖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方式，母亲和家中较大的孩子外出就业。

正如危机产生于个人或群体与境遇的相互作用之中一样，适应方法也是如此。就个人而言，需求和控制之间难以解决的不一致性在构建新的适应方式时，就会使意识、注意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运而生。通过社会(预想的和客观的)选择、适应性需求或者境遇要求，以及来自共享资源和社会援助中其他方面的支持，环境因素影响着整个适应过程。在适应过程中，选择或

者做决定的程度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行为者才会在各种行为方式中选择某个特定的方式？在第二章我们将用较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有两类个人特征影响着适应的过程：对结果的要求或期望，适应潜力的模式。对本项研究中的父母和孩子而言，这种潜力主要是指资源、流动性和协调性。若干年以前，托马斯就注意到，心智（mind）通过知识发挥作用，而知识则建立在"记忆和能力之上，这种能力是指将现在的境遇和过去类似的境遇相比较的能力，以及根据过去的经验修正我们的判断和行动的能力"（Volkhart，1951，第218页）。根据托马斯的分析框架，就像个人职业所展现的一样，生活组织（life organization）代表所有用智力控制现实的方法。当处于"新经验在实践中不能被原有经验同化"（Volkhart，1951，第157页）这种危机关头时，人们就在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过程中建构和重构生活组织。在现代心理学中，这些控制方法包括一系列的应付机制，比如专心致志、模棱两可的宽容、移情、保持客观等等。[13]

在我们考虑造成个体在应付生活中不寻常的难题和挫折时的能力迥然不同的个人属性时，脑海中浮现的是恢复能力和机智。根据发展的观点，我们能够在以往战胜困难的经历中瞥见这些属性的踪影。此类经历是为了满足困境的需求所做准备中的一种主要因素，而且不同的研究都将这种准备（preparedness）同有效的适应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类经验中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是以失败为标志，还是以通过成功的管理而实现的发展为标

[13] 这方面理论上的创造性贡献，可以参阅N.哈安：《自我作用的建议模式：关于IQ变化的应对和保护机制》，载《心理学专论》，第77期（1963），总第571期。另外有价值的贡献，可以参阅D.R.米勒和G.F.斯旺森的《内在的冲突和保护》（纽约，1960）。

志(参见 Levine and Scotch,1970,特别是第 10 章)。应付不同境遇的成功经验,培养出了一整套适应性行为、一系列激发机敏和灵活性的技巧。恢复能力意味着一种有能力的自我(competent self)的意象,由个人价值、自信、内在的安全感和自我控制构成(Smith,见 Clausen,1968)。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考察父母和孩子的智识能力和阶级地位,它们是家庭变迁境遇中考察人们适应潜力的两个普遍性指标。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感兴趣的是:个体和群体二者对大萧条中社会经济变迁的反应;一方面是父母和孩子的适应性,另一方面是家庭单位的适应性。长期以来,这项研究都界定了危机境遇中家庭适应潜力的两个基本维度:适应和整合。罗伯特·安吉尔(Robert Angell)对大萧条中的中产阶级家庭研究(1936)便是一例[1],鲁宾·希尔的开创性著作《处于张力中的家庭》(*Families under Stress*,1949)中勾画的有关家庭适应能力的精华部分,与我们在个体的层面上详细说明的适应潜力的组成要素大致相符。它们包括:约定物质生活标准的伸缩性,角色关系的灵活性,以及应付此前危机的成功性。当我们注意到有孩子的核心家庭由三个单元或三个子系统组成(配偶、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时,这幅画面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这三个单元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但它们的需求各有不同,这表明在同一个家庭内,这些子系统适应经济困难的有效性方面差异悬殊。正如希尔指出的那样:"人们并不能保证婚姻关系美满的夫妻就一定能承担起

---

[1] 其他有关大萧条中家庭的研究,包括卡万和兰克的《家庭和大萧条》(1938)、卡马诺夫斯基的《失业的男性及其家庭》(1940)和巴基的《没有工作的市民》(1940)。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赞助了一系列有关大萧条之社会影响的研究,其中包括一项著名的有关家庭的研究,即斯托弗和拉扎斯菲尔德的《有关大萧条中家庭的研究备忘录》(1937)。

作为父母的责任，因为要作为父母必须面临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麻烦和疾病、猜疑和竞争以及沉重的义务”(Hill，1949，第321页)。我们应当对婚姻以及亲子关系间的适应性给予特别关注。

当我们谈到适应的后果时，我们指的是按照某一个群体或个人的福祉标准做出估量的结果。由于任何一种行动都会侵犯到行为者和不同的他人的福祉，这些估量框架就可能导致对后果的千差万别的评价。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母亲就业的影响。这种行动对于家庭的经济福祉、婚姻的和谐或稳定、孩子的培养和母亲本人的心理健康方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在一种并不赞赏母亲就业的价值情境下，挣钱的好处完全可能被更为严重的婚姻危机和失业丈夫日益恶劣的情绪所抵消。获得经济收益可以看做是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后果(intended consequences)。她找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家庭的需要，而不是想对婚姻或家庭事务有更大的影响力，或者贬抑丈夫作为养家糊口者的地位

在经济生存的迫切需求下，适应性的基本理论在范围和时间上都容易受到严格限制。[⑮] 范围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考虑问题的广泛性，比如对于来自亲戚救助和公共援助的影响的一种狭义理解。一种危急的境遇意味着，就家庭或者个人未来的福利而言，目光短浅的考虑超过了对行为的潜在后果的考虑。这种适应变迁的性质(它把“预期后果”仅仅限定在当前的范围内)拓宽了未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出现的领域，并且反对如下这种有关社会变迁对于儿童社会化影响的著名阐释：在变迁的各个时刻，儿童的社会化随着父母对自己后代的可

⑮ 有关极端损失后果的经典研究，可以参阅约霍达、拉扎斯菲尔德和蔡塞尔的《马林塔尔》(1970)，这是30年前德国出版的一本书的英文译著。

预期未来所做的适应而不断变化。

英克尔斯(Inkeles)认为:"经历过急剧社会变迁的父母,都会寻求用与本人成长迥然不同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在抚养孩子的实践中有目的地进行调整,以训练孩子更好地适应父母眼中变化着的世界的能力。"⑯ 这种观点假定了父母行为中的未来意识、理性和选择,因此看来最适用于家庭的生存不成问题的这种境遇。在寻求生存的情境中,家庭对直接需求的反应所带来的未预期后果对建构一个孩子的经历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生存的角度看,劳动分工和权威模式(authority pattern)的变化,可能会使处于大萧条中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更能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同时它最终也阻碍了孩子对生活的期望。在危机境遇中,适应社会单位(social unit)的东西也许并不适用于个体成员的生活。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30年代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的境遇中,社会化环境和父母对孩子的反应更为关心生存需求的急迫性,而不是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把社会经济变迁与生活经历、人格联系起来。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系统地阐述一种分析模式,它将详细地阐明大萧条中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它在生命历程中产生的心理—社会影响(pscho social effect)之间的关联。在理论层面上,这些关联回答了为什么经济变迁具有特殊影响的问题;它们对这种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说明了社会变迁影响人们的人格和行为的过程或

---

⑯ 英克尔斯:《社会变迁和社会性格》(1955),尤其是第14—15页。在更近期发表的论文中,英克尔斯细致地验证了社会变迁给儿童社会化所带来的未预期后果。参见《社会、社会结构和儿童社会化》,载Clausen,1968,第75—93页,也可以参阅某文:《文化、行为和人格》,尤其是第7章。

者机制。[37]

为了明晰这些理论关联的构架，让我们假设一个家庭单位在大萧条中经济受损和女儿的婚姻取向之间存在着联系。我们假定：经济受损使女孩相对较早地对婚姻产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通过家庭内部紧张的人际关系及家庭的社会化而产生的。这个分析模式提出了两个问题：家庭在经济上的损失对婚姻取向具有这样的影响吗？这种影响是否因为特定的中介变量而减小了？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前面所提到的两种关联的相对重要性：经济受损对婚姻兴趣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家庭内的紧张气氛而产生的呢，还是由于家庭对每个成员的影响而产生的？为了辨析婚姻取向的全盘构想的特殊关联，我们将对每一项都作出更加详细而具体的说明。家庭紧张（family strain）又分为婚姻冲突以及和父亲在情感上的疏远；家庭内的社会化指的是母亲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女儿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父母不支持女儿接受高等教育等。在利用现存的理论并试图超越它们时，我们将在分析中反复使用相关步骤来说明前置变量（antecedent variable）和结果变量（consequence variable）之间的概念关联。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去体现个人生活中这些被概念化了的大萧条经历之间的关联。就 30 年代家庭的经济受损和儿童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假设关联而言，我们还面临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和怎样进行理论分析与经验测试？为了解释这种关系，我们需要具体说明和调查这些中介关联（intervening linkage），这毫无疑问也包括成人经历的各个方面。将男人的工作价值同

37　参阅 D. R. 米勒：《作为一种系统的人格》，载 R. 纳罗尔和 R. 科恩编：《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指南》（纽约，1970），第 509—526 页。这是一篇在方法上系统阐述社会结构和人格关联的非常优秀的论文。相关的论述也可以参阅埃尔德：《把社会结构和人格联系起来》（1973）

其在大萧条中的早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假设，这方面的缺憾就特别普遍。[13] 这种"理论"的倡导者也许会说，由于面对父母所处的困境和社区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受损现象，经济困窘和失业使工作的价值和职业的保障性在男孩的心目中越来越重要。即使30年代的数据表明了这个年龄组中价值观的差异，我们就能够假定当他们长大成人后还会持有这种价值观吗？如果一些曾处于经济受损群体中的男孩进入了广领阶层，而另外一些却一直从事体力劳动，那么这些职业生活(worklife)的差异是否会保证家庭背景和成人后的价值观之间不会出现差别呢？

我们已经按照多阶段的研究途径组织分析。就家庭的适应性而言，首先估量经济受损的最直接影响，然后总结大萧条的经历给孩子成人带来的后果及其与经济变迁的联系。在我们转向分析成人期时，第一部分分析的结论就成为模式中的潜在联系。

最为常见的分析模式是将家庭适应性和条件定义为经济受损和孩子之间的关联。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充分讨论的这些关联包括：劳动分工的变化——维持经济状况的新形式的必要性，改变了家庭成员的家庭角色和经济角色，责任落到了母亲和家庭中较大的孩子身上；家庭关系的变化——父亲经济地位的丧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家庭生计维持的适应性，增加了母亲的相对权力，降低了父母控制的程度和有效性，并且减少了曾作为偶像的父亲的魅力；家庭内部的社会压力——各种资源的减少，失去父母或父母受到的伤害，以及家庭及其成员地位的变化导致这样的结果：地位的模糊化，冲突不断，情感挫折。

在我们勾勒出社会经济变迁对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家

---

[13] 在G.格雷尔的推论性论文《英国究竟怎么了?》中，讨论了英国体力劳动者在"大萧条中所受的创伤"和工作取向之间的关系。

庭生活以外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时，这种研究方法将产生出各种复杂的网络，各种分析路径向不同方向延伸出去。我们要考虑到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母亲外出求职，女儿就在家中承担了主要的角色，而大儿子得到非全日制工作。所有这些应急行为都对父母、孩子和作为整体的家庭单位有着许多影响。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其他家庭成员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婚姻中权力的平衡和父母的角色榜样都具有潜在的影响。为了理清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将关系的网络分割成供分析的各个部分，并且采用多变量的分析方法

在本项研究的过程中，关联这个概念提醒我们，T_1 和 T_2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研究过程的一个出发点，但我们仍然必须说明这种关系。由于数据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可选择的解释可能没有经过经验的检验。换言之，数据只能粗略地显示各种中介条件。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着一种把概念上的和经验上的构架联系在一起的原则，它能使我们转向研究任务的基本范畴

出生组和次群体的比较。我们在估量经济变迁对于家庭适应性和生活后果(life outcome)的影响时考虑了三个群体特征：出生组(cohort)、某一特定出生组中有地位的群体(status group)及其所在的经济部门(economic sector)。出生组及其组成部分与特殊的生活经历、机会和资源有关，而这些又有赖于个体在大萧条中的受损经历。[19]

作为同一家庭单位的成员，奥克兰样本中的父母和孩子在

---

[19] 有关年龄组比较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赖利、约翰逊和福纳的《成熟和社会》(1970)第3卷(尤其是第2章)和海曼的《对样本调查的二手分析》(1970)(尤其是第274—290页)中有令人信服的讨论。

大萧条中显然会共同经历许多境遇，尽管由于在30年代其童年环境、职业生涯和生命阶段都有同代间的差异而导致其观点并不完全相同。由于不同时间段上历史逻辑与共同成长经历的不同，也由于各个生活阶段的互相关联的活动、资源与义务的不同，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特别是急剧变迁的时期，每个人都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history world)——由他们的出生日期决定的——中获取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处世哲学，这种观点是对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相互依赖的生命个体的反映。

在剧烈变迁的时代，一个出生组所处的历史职业阶段，形成了境遇性解释和适应的各种方式。当每一个出生组遭遇到某个历史事件——无论是萧条还是繁荣，都会"因所处的职业阶段而与其他出生组迥然有别"(Ryder，1965，第846页)。奥克兰的父母要直接承担责任，并为家庭的困窘感到羞愧，而他们的孩子此时都太年幼，不可能经历经济方面的个人挫折，也无法在这一领域承担主要义务。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所具有的适应性选择和受到家庭损失之伤害的轻重，都因他们的年龄、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在30年代初最为困苦的时期，随着孩子们智力的成熟和情感的发展，奥克兰的孩子们走出了早期童年时期的依赖阶段。而在全国为了二战进行总动员、机会也增多了的时候，他们达到了法定年龄。比奥克兰的孩子早出生十年的人，本应在经济崩溃最为严重的时候加入劳动力大军，而1929年出生的这个出生组的福祉则本应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家庭状况。这些差异清楚地表明了要跨越出生组去总结大萧条的经历会冒多大的风险。

在出生组分析中，人们普遍承认，在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某一特殊的刺激性条件可能对不同的年龄组子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子群体是按照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划分的。卡尔·曼

海姆(Karl Mannheim)把这些子群体称之为代际单位(generation unit)(Karl Mannheim,1952,第276—322页)。关于阶级差异,我们知道从未经历过磨难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心理上特别容易受到失业和财产损失的伤害。他们最有可能将失业和收入的损失看做是压力,而且会"过高地估计这些磨难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孩子们的抱负所造成的威胁"(Hansen and Hill,1964,第803页)。但是人们不能假定,即便是对于某个具有特殊地位的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某种特殊的刺激有着同样的强度和持久性。从我们可以看到的资料来说,大萧条时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都曾有过经济受损的经历,即使是在男性失业的家庭中也是这样。由于行为是群体或个人与境遇双方都拥有的一种功能,所以它们的种种特点就一定也包括在对经济受损的适应所作的任何估量之中。

与传统的出生组内模式(intercohort model)形成对照的是,本项研究关心的是群体之间的差异,关注的是在某个特定出生组的阶级群体(class group)内家庭和个人受损的类别(deprivational category)。我们的分析围绕着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四个群体展开,这四个群体是根据1929年的社会阶级和1929—1933年相对的收入损失来划分的。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我们将比较成长于相对未受损家庭和受损家庭之中成长者的生活经历和人格。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收入平均损失将近20%,这与到1932年为止生活开支减少的幅度大致相同。在两个社会阶级中,大多数受损家庭承受的损失超过了他们1929年收入的一半。

我们研究所选择的那些孩子都出生在20年代的头两年,在大萧条十年中他们还处于少年期和青少年期,二战前才刚从高中毕业。我们的研究对象全是白种人,大多数是新教徒,大约有

3/5 来自中产阶级家庭。非体力劳动的家庭几乎全是劳动阶级(相对于更低的阶级而言)。这些家庭中有 3/4 在大萧条结束后还保持完整，由出生在本地的父母当家作主。根据 1933 年和 1938 年斯坦福—比奈(Stanford Binet)智力测验所获得的平均分数，这些孩子智商的中位数接近 113。

在选择研究对象和他们的家庭时，父母自愿合作和他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打算留在本城是最主要的标准。由于这种选择程序可能会导致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偏重，所以我们将奥克兰成长研究的样本与研究对象所属的初中和高中的孩子的横剖面样本(cross-section sample)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这样做在百分比上并没出现显著差异(参见表格 A－33；注意所有带有 A 字头数目的表格都可以在附录 A 中查到)。这些学校中大约 53%—63%的孩子来自中产阶级。所有的孩子都上同样的初中，而且除了少数例外，他们也都上同样的高中。在 30 年代初，初中的在校生大约有 1,000 人，教员有 38 位。大约有 1,900 名学生和 92 位教员的规模较大的高中，主要是配合大学的预科教育。

在 30 年代，孩子的数据来源于教师的观察和社会及情感行为的评分，来源于自填自答的问卷(self-report questionnaire)和与母亲的访谈。[20] 145 个青少年样本在成年后至少接受过我们三次后续研究(follow-up)中的一次。第一次后续研究(1953—1954)包括一系列的访谈、人格调查(personality inventory)以及精神病学上的诊断。第二次后续研究(1957—1958)主要是一系列长时间的访谈，访谈的平均时间为 12 小时。第三次后续研究

⑳ 30 年代所使用的工具和数据收集方法，基本来源于 H. E. 琼斯：《青少年成长研究的过程》，载《咨询心理学杂志》，第 3 期(1939)，第 177—180 页。有关成人时期相应资料来源，见 J. A. 克劳森：《奥克兰成长研究中的人格测量》，见 J. E. 比伦编：《发展和成熟的关系》(斯普林菲尔德，1969)，第 165—175 页。

(1964)包括访谈和通过邮寄问卷的方式。通过这些数据，每个研究对象截止到1958年的生活史概况就被勾勒出来了。在智商、1929年家庭所处的社会阶级、种族和家庭结构方面，青少年和成人样本之间不存在区别。人们可以在附录中看到对样本更全面的说明和数据的主要来源。

奥克兰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分析中，我们作出的解释必须考虑到，奥克兰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其他城市中心和地区相仿。尽管奥克兰研究中的孩子们与学校的同学们的家庭特点十分接近，如果奥克兰和旧金山海湾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其他城市相比好得多，那么分析所获得的结果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由于经济具有系统性特征，主要产业的经济衰退相互影响并且跨过了州界就没什么令人奇怪的了。因此我们发现纽约和加利福尼亚都属于高失业率的州。不过和东北部的各州相比，加州感受到经济萧条的全面冲击晚了将近6个月(Hunzinton，1939，第7页)。

奥克兰坐落在旧金山海湾的东岸，北部是伯克利人口稠密地区的一部分，南部有许多较小的社区。1929年，该城迅速发展成一个拥有28.4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成为连接海湾和西部主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流通中心。市民中的劳动力在服务业、物资流通业和加工业三个产业中平均分配。1929年，这个城市总共有126家企业，根据工资名册显示总共有4.8万个雇员。他们大多数在造船、公用事业、铁路和航空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中工作。在大萧条以前，本市的美国信托公司副总裁就曾注意到："从工业上说，奥克兰已跻身于国内三个发展最快的城市。"这幅

经济健康发展的图景在大萧条中发生了急剧变化。

就国民经济的大多数指标而言，1933年的头几个月是30年代前期经济的最低点，无论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奥克兰都不例外。随后在就业、商业和工业活动中都出现了稳定的增长，一直到1937—1938年突然出现并不持久的衰退为止。就全国范围而言，到1933年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下降到1926年的55%，加州是1926年的54%（Huntinton，1939）。

根据现有的这些失业人数的数据，加州大学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小组发起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那些通常都能找到工作的人大约有接近1/3在1933年失业了。到1934年的后半期，这个失业的群体仍然约有1/4的人还没有找到工作。失业的类型包括那些有工作能力但却失业并在机会降临之前一直在寻找工作的人，也包括那些临时失去工作的人。在加州和奥克兰，有近30%通常都能找到工作的人在1932年失去工作。而且在1928—1933年之间，阿拉梅达县（Alameda）接受公共基金援助的家庭的平均数增加了7倍，而奥克兰正是该县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也能见到。

我们用三个能够显示某个城市经济状况的指标，把奥克兰和另外一些我们挑选出来的都市中心进行对比，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奥克兰在大萧条中的相对状况。这三个指标包括：已发放的建楼许可证，这是衡量建筑活动的一种尺度；零售业中的净销售额，这是衡量商业活动的一种指数；就职于零售业的人数。参与比较的6个城市是旧金山、洛杉矶、底特律、克利夫兰、亚特兰大和费城。就这三个指数而言，奥克兰在1929—1933年之间出现的经济衰退与其他城市平均衰退程度差不多（参见表A－1）。1933年，奥克兰已发放的建楼许可证只有1929年的40%。而底特律、克利夫兰和费城的情况更为糟糕，但是所有参与比较的

城市的平均损失程度与奥克兰的数据非常接近(42%)。

1933—1937年间,奥克兰的建筑行业增长比其他城市更为显著,而零售业发展和就业方面的情况与其他城市并无二样。1933年,这6个参与比较的城市的零售业净销售额平均为1929年的50%,而奥克兰则为51%。参与比较的城市中就职于零售业的人数跌至1929年的70%,而与奥克兰的情况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从总体上说,在这几个经济指标上奥克兰位居中间。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的经济衰退情况更为严重,旧金山和亚特兰大情况则稍好一些。

无论是比较奥克兰还是全国的家庭经济损失状况,在纵向研究中最为适宜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如前所述,奥克兰研究中的经济受损是用1929—1933年间(各种经济指标都降到最低点)被访者所提供的家庭收入的相对损失(relative loss)来衡量的。1929年,样本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3,179美元,1933年则为1,911美元,减少了差不多40%。我们难以找到奥克兰家庭收入的数据,1935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准确数据也找不到。根据粗略估计,1929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为2,300美元,1933年为1,500美元,几乎下降了近40%。比较1929年和1933年未经审计的纳税人上交的所得税推导出的全国性收入数据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下降,尽管每一年的平均数(3,156美元和1,989美元)实际上因为排除那些声称这些年没有净收入(net income)的人而被夸大了。[20] 如果这些数据所显示的收入损失的百分比是可靠的话,那么奥克兰样本家庭中出现的经济

[20] 这些估算来自于C.菲利普斯的《从冲突到闪电战,1929—1939》(纽约,1969)中的数据和资料,第34页。关于纳税人所得回报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统计摘要》(1935,第182页;1939,第183页)。

衰退与全国范围内家庭的平均损失程度就是吻合的。

通过人们写给地方报纸的信件所表达的更加普遍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找到奥克兰市民对这个城市经济状况的态度及反应的证据。在这类观点中的一种认为，这个城市的雇员应该大幅度削减工资和薪水，这样他们才能与当地普通市民一般的经济状况一致；许多公务员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共基金生活，教师的薪水太高，消防队员和警察应该自动减少工资。但是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市政当局为节俭开支而减少学校和公共服务的经费的做法使它常常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

就这些状况而言，令人奇怪的是市政当局的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和解释却完全不一样。关于1933年奥克兰这个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健康这个问题，该市市长就认为"奥克兰是少数几个在这个经济状况动荡不定的时期完全有偿付能力的美国城市之一"。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的是奥克兰大萧条期间的地方史，它对该市各种社会经济状况的看法比加州和联邦机构所收集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更为乐观。[2] 即使这个城市的官员为繁荣的社区和乐观的将来投资，他们有选择性地使用一些观察和统计数据去构造这种幻想也不令人感到惊奇。在大萧条早期，否认经济关系的现状和人们所承受的痛苦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性反应。林德夫妇在他们有关中西部某个社区的经典研究《变迁中的中镇》(1937)中，描述了商人和政治领导人坚持认为未来是令人乐观的，而对居民的物质需求和因惨重的经济损失而忍受的痛苦麻木不仁。尽管缺乏大萧条中的奥克兰和其他城市的统计资料，而且许多数据并不令人满意，但同样没有证据说明奥

---

② 参阅 E.J.欣克尔和 W.E.麦科恩编:《奥克兰，1858—1938》(奥克兰，1939)。

克兰的经济状况与其他主要城市相比有什么不同。

研究过去:一个谨慎的注释

建立在档案数据之上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理想模式(ideal model)和研究过程中的可能性之间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或某种程度的张力。已确立的问题界定了合适的数据和研究设计所需具备的一系列特征,但是调查者的选择受到过去的决定和行为的限制。一般来说,研究者又不怎么喜欢已有的档案数据。可以确信的是,只要"人们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并且留下适当的记录"[②],历史和纵向研究肯定就能更加充分或者更加准确,尽管适当性本身也要受到历史的限制。标准与所使用的方法论一道,随着知识周期和社会问题的变化而变化。鉴于这些情况,为研究留下广阔空间的数据收集则具有优点。

奥克兰发展研究的设计,并不明确地针对研究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后果,尽管研究成员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后果对于父母和他们的后代的影响。就现有的研究而言,数据档案最关键和最有价值的是我们可以使用其中包含的1929年和1933年这两年的社会经济信息。在大萧条所包括的所有年份中,就对经济变迁进行比较评估(comparative assessment)来说,这两年最为重要。

从这点来看,奥克兰研究更关心个人发展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而不是社会文化现象,可是这些文件还包含了关于家庭生活、学校和社会经历的重要信息和30年代的大环境。直到

② F.林亚特:《心理学家看历史》,载《社会问题杂志》,第17期(1961),第66—77页。

1962年，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还没有进一步编码或加工，以便用来做统计学的分析。站在大萧条中家庭生活的立场来看，这些档案材料的主要不足是缺少关于父亲的信息。30年代的行为科学家并不把他们看成是孩子社会化中的主要角色，而在现在的研究中，他们也只是被当做其他家庭成员所感觉到的"那个人"，没有任何直接关于他们的数据。

总之，信息的基本来源包括研究小组中的观察者、研究对象本身、他们的母亲、同学和教师。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研究中的调查提供了那时有关"艺术状况"的历史写照。调查的对象不是从可能的抽样框中抽取的，而且样本规模以中等为最好，人们很少注意抽样与具有普遍化意义的结论之间的关系。从上面来看，反复地使用同一种工具，有可能建构一种对大萧条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中许多关键性变量的相对稳定的量度。这些工具在附录B中有详细描述，同时还对错误的来源和统计分析的模式做出了评价。

其他的抽样问题是长期纵向研究的设计本身所固有的。它们包括样本的损耗(sample attrition)、调查参与的影响等等。我们注意到，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之间样本的损耗，并没有导致这两个时间点上的研究样本在家庭特征、智力上出现什么差异。可是研究者的持续参与有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某种影响，而且评估这种影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方式。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在大萧条期间的孩子以及他们成年后的生活方面，奥克兰研究还是比其他数据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选择。

初步看来，以下这一点是难以找到答案的：纵向研究的数据档案中遗失的信息，为什么不能通过长大成人的研究对象的回顾或者现在的报告得到呢？不过由于许多重要原因，人们经常无法做出这种选择。诸如奥克兰研究这类长期跟踪研究项目的

参与者，也没有特权在他需要时去收集到他所需要的数据，除非在数据收集方面，他的个人设计与总体设计相一致。如果对数据的收集毫无控制，那么将完全破坏数据的有序收集，耗尽调查对象的善意。作为个体的研究者的兴趣应当和项目的长期兴趣一致。下面兴趣冲突的例子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种限制的必要性。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有关研究对象后代提供适当的数据，所以对大萧条的孩子和战后各代人的比较分析有了可能。不过这种接触却与在不久的将来所安排的追踪发生了冲突。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 20 年代，并且根据现在的知识和智力设计对家庭和孩子的调查，我们在抽样和小组设计上，就可能采用能纵贯大萧条前的年代、30 年代，并能追踪这些孩子们进入他们的成人时期的设计。小组设计使测量大萧条前后的各种条件成为可能，因此促进了对由经济受损引起的家庭和个人变化的随机分析。尽管人们努力改善对大萧条期间的家庭和孩子的研究设计，最有名的研究都是小规模的，并且都在 1929 年后启动，用的都是精心挑选的不典型的样本。从大萧条时期开始的研究没有一个完全满足上述这些条件，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所能得到的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人口数据也是不够的。虽然如此，为了研究的目的，不管有多少限制，对这个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个人生活和经历的调查，只能为适应现有的记录去灵活而小心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料，别无其他令人满意的选择。二手分析的道德标准是“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料”（Hyman，1972，第 281 页）。[24]

---

[24] 在这方面，伊斯特林有关经济序列分析的警告和我们的研究经历极为相似：“一个对于某段较长历史时期的量化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对于数据资料和统计方法会有强烈的成见。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因数据的支离破碎及概念和统计的相容性问题而陷入绝望之中。他在成为消化吸收某一系列历史序列的同时，必须准备面

一般说来，对个人适应危机境遇的历史性解释最突出的就是，它们或者强调按照事件和行为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描述，或者强调在某个概念框架中进行分析。这两种策略都对理解过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每一种都能产生对对方来说弥足珍贵的知识或数据，虽然在一项工作中很难满足双重目标。例如，当作者退回去"清理"（思绪），然后重新开始叙述时，"事件流"（the flow of events）就被中断了。实际上，其不足在于，任何一种目的都有可能得不到充分满足。在下面的解释中，我们将首先对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相对未受损和受损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进行比较分析，特别是要说明把他们的社会经历、个性、生命历程同30年代的经济受损、阶级出身联系起来的各种条件。但是，我们也计划把分析放在历史情境和奥克兰出生组生命历程中的一系列事件模式中。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将告诉人们大萧条的经历怎样改变了这些美国人的生活。

在大量的调查中，我们研究了人们对危机境遇的适应，这些调查提出了与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生活境遇直接相关的一些假设（参见第二章）。但是我们更关心结果的总体模式及其方向、规模、连贯性和总体外貌，而不是对这些重要假设的检验。在小的纵向样本中，结果的意义特别依赖于这种总体看法。数据检验将用来估量差异和关系，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仅仅作为一种标准。甚至在小样本中重要性并不明确的发现也可能对将来的研究提出思路和问题。

且应该成为它的创造者。"伊斯特林：《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发展的趋势》（1968），第7页。K.埃里克森发现："处理历史资料需要一种能够中和疑虑性及不确定性的数据的方法。"《社会学……》（1970），第335页。

我们至少可以从两种有利的方面来评价本项研究的价值：一种是对我们理解社会变迁所做的贡献，这种变迁总体上通过家庭变迁和代际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另一种是对家庭生活、个体在大萧条中的适应性以及曾经历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的适应性对它们生活影响的深刻见解。如果所有的可能都变成了现实，我们将会在两个领域内对知识做出贡献。只要我们对大萧条经历中的这些影响有着某种理解，那么即使不能发现经济受损给个人所带来后果的新的原因也无关紧要。在从3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意义深远的变迁中，大萧条的一代成了变迁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在30年代的不同经历还几乎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任何研究把这些经历和他们人格的形成(personality formation)和成年后的职业生涯联系起来。父母和他们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在家庭关系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持续性和对立性，可能是理解当代代际关系和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为普遍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有关经济惨重损失的心理影响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下层阶级人口的横断面抽样的基础上。由于关注极端的、持久的萧条及其与能力匮乏之间的关系，我们忽略了上层阶级的人向下流动时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不管这种问题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目前这种大萧条中关于不断减少的变迁的研究，包括研究相当数量的那些在萧条前还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这种研究关注经济受损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中的适应性资源，这是用阶级地位和智力去衡量的。在当代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地位较高的家庭经历了向下流动、失业和经济受损，这些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中也成

了某些领域中的严重问题。[24] 甚至出现在高技术人群中自愿性的职业变化，偶尔也会导致实际上的经济受损和过分的节俭。本项纵向调查的结果，对拓宽有关父母职业变化对孩子的心理影响的有关知识，以及对童年时代和成人时期的具体损失之影响（不管它们是灾难性的还是促进孩子发展的）有关的各种条件的知识，都很有价值。[25]

任何有价值的研究结论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对相对未知的领域中的研究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卡森（Kassen）所注意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境中，纵向课题成了假设的一种宝贵来源，而且特别适合拓宽新的视野和在富有成果的研究中开创新的领域。这些结论可能是当前的研究对理解个人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贡献的最合适尺度。[27]

㉕ 比如，最近几年有关大萧条的研究，已经指出了工厂倒闭的社会心理影响。阿利克、费尔曼和谢泼德：《经济受挫、疏离和极端主义》（1968）；斯洛特：《终止》（1969）。全面回顾大萧条中有关失业心理影响的研究，可以参阅扎瓦兹基和拉扎斯菲尔德：《失业的心理后果》（1935）。

㉖ 经济上的急剧衰退除了对家庭环境有着影响外，还完全改变了上层阶级许多孩子社会交往的世界。"经济萧条状况下的20年代反正统文化的衰落，表明人们必须放弃有关社会变迁的单线理论。当前文化上的反叛，预示着经济的稳定、繁荣和运行状况，这些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情况下也不能当做是理所当然的。"M.曼科夫、R.弗拉克斯：《美国学生运动中变化着的社会基础》，见P.G.阿尔特巴赫、R.劳费尔编：《新的朝圣者：变化中的年轻人抗议》（纽约，1972），第56—57页。

㉗ W.卡森：《发展问题研究中调查设计》，见Mussen编，1960，第36—70页。因为进行追踪研究的人了解他们所获得的数据的独特价值和局限性，所以都倾向于在调查中融入W.卡森提出的这种精神。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W.卡森和莫斯指出："我们基本上把这份研究报告看做新假设的来源，而不是作为事实的结论。这促使我们的同事根据他们各自的兴趣选择看法，然后提出更加严格的检验，以验证这次研究中没有包括的更富启发性的设想。"《从出生到成年》（1962），第19页。和奥克兰研究有关的著作，参阅J.布洛克的《随着时间流逝的生活》，这是个人发展研究所中奥克兰样本和指导研究样本中有关人格变迁的研究。

第二章
对经济受损的适应

危机之所以会成为危机，准确地说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够有效地共同行动起来……一些应急性行动是急需的。

保罗·古德曼：《即兴新闻》

大萧条中的经济变迁给许多家庭造成了一种危机，导致了广泛的适应性反应。根据现有的记录，经济受损的家庭一般都遵循这样一种自我调整的过程：从经历危机到不知所措或家庭的解体，然后通过新的行为模式又开始了部分的恢复，直至最终的稳定（参见 Bakke，1940；Hansen and Hill，1964）。父母所采用的适应方式也相应影响到他们的孩子的经历。

作为本项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将首先考察关注家庭对于萧条和受损的适应性的其他研究中的理论与发现。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维持家庭经济状况中的劳动分工、婚姻权力和亲子关系，以及它们对孩子在家庭中的经历的含义。本章的后半部分将把地位的变化与人格和成就联系起来，探索适应潜力在削弱经济艰难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时的作用。

家庭中的受损与适应

经济受损容易对三个领域中的变化造成压力：家庭生计的

维持、家庭在想像中所处的地位或位置、以及维持家庭生计者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大萧条中，维持家庭生计的经历可以用三个方面的适应方式(mode of adaptation)来描述：家庭需求或要求，消费(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经济资源(收入、存款、财产、经济援助等等)。经济受损导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与家庭需求以及通常的消费水平之间的不一致。在有些家庭中，尽管维持家庭生计者没有收入了，但是依靠存款、借贷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新收入仍然能够维持家庭原有的经济地位。但是当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时，使需求和消费与现在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吻合的压力就增大了。这种适应性调节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家庭经济转向劳动密集型，通过家庭成员的劳动(种植家庭菜园、储藏食品、制衣、洗烫等)来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当经济状况变得愈加艰难时，消费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逐渐就要从属于家庭的实际物质需要了。有人发现，在新英格兰的一个社区中，失业工人和他们家庭的调适，与他们对于现实的定位有关，也与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现实可能性之间日益缩小的可比性有关（Bakke，1940，第7章)。在失业之初，这些家庭总是在回顾过去，并根据过去来确定自己现在的境遇。人们只是削减不太重要的娱乐方面的开支和奢侈性的支出。当额外收入和其他来源的收入不再能充分满足家庭的需要时，过去才在迫切的现实面前逐渐隐退。于是，人们重新定位自己的基本需求，并相应地重新组织自己的消费。

在经济萧条之前地位越高的家庭，在决定资源的分配方面对地位的考虑就越多：一个家庭“爬得越高”，就越不能接受地位丧失这个现实。研究也表明：即使在蓝领家庭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并认为自己属于‘上等的家庭，会坚持与此地位相符合的标准、规则和责任’，并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

从这种地位跌下来"（Bakke，1940，第237页）。[1]
人们试图通过诸如不打听来自朋友和邻居的信息，以及维持社会地位方面的必要开支（如粉刷房屋，购买百叶窗，朋友可能会来时加热所有的房间）等等，来部分地实现这一目标。

社会性防御（social defense）是"迷恋事情的旧日面貌"的症状。一味同过去的满足感和标准相比，只能增强经济受损家庭对现实的不满，使重新调整的过程变得更困难和更漫长。当人们将目前的可能性同过去的一切相比较时，劳动家庭的重新调整过程就会面临"真正的挫折"。当眼前问题的紧迫性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今天的机会而不是过去的成就"时，不满就逐渐变得不那么让人敏感了（Bakke，1940，第175页）。

收入和职业的变化导致了家庭地位前后不一致的不同形式。在关系到家庭尊严的三个主要因素——丈夫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中，只有教育水平（还有妻子的教育水平）在大萧条中没有向下流动。因而，收入的减少和职位的丧失共同导致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矛盾，并且使他们现在的收入、职位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吻合。[2]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迫从事大大低于

---

① 主观损失（subjective deprivation）指的是感觉到的期望和实际获得之间的差异，它所导致的不满，一般被看做是导致社会运动出现的主导因素。H. 德雷珀据此提出：30年代的学生运动部分地是中产阶级家庭在社会和经济上衰败的结果。"美国中产阶级中的这一群体正被抛弃，学生运动部分是这种非阶级化（ce-classment）作用的结果。"《30年代的学生运动：一部政治史》，见Simons编，1967，第156页。与这种非阶级化有关的众多不满，在人们的政党偏好从1928年的共和党急剧转向1932年的民主党之中也可以看到。对于本项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父母的不满和政党偏好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政治社会化的。在第九章的结束语中，我们会利用有限的数据简要地涉及这个问题。

② G. 伦斯基在他的论文《地位的具体化：社会地位的非垂直分层》［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9期（1954），第405—413页］中，提出了地位的不一致

他们的教育水平的职业以供养家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如果收入和职业被看成是对接受教育所需要的投资的回报，那么，当那些男性所获得的回报大大低于人们的一般期望时，我们能够想像得到他们的愤怒程度和挫折感。不过，30年代普遍出现的经济受损，有可能降低人们以及他们家庭的期望值，因为他们意识到无数的家庭都碰到了这种不幸，于是他们会把这种状况的原因归于外部环境。

家庭地位前后不一致的另一种含义是家庭在社会中所处地位模糊不清。教育、收入和职业都给这个家庭打上了区别于其他家庭的不同的地位印记．他们的邻居可能用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幸遭遇来评价这个家庭的地位，而不是用父亲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而这恰恰是这个家庭成员自我评估的依据。由于中产阶级在维持地位方面的投资相对更多，因此，在这个阶层中的不满和挫折感与经济受损的联系比在劳动阶级中更密切(参见第二章)。

尽管家庭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前后不一致代表了工业社会中一个常见的结构特征（structural feature)，但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它对于家庭生活的含义。近期的经验研究把当代美国社会中这种地位的不一致性看成有关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中相对“微不足道”的东西，认为除了地位因素本身的主要影响之外，这种不一致性不能说明什么。[③]假如这种判断适用于当今这个时代，那么它肯定就不适合诸如大萧条时期之类剧烈变

性（status incongruence）问题，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关地位不一致性的影响，可以参阅马拉维斯基的《地位不一致性的程度及其后果》（1966）。也可以参阅T. F. 佩蒂格鲁的《社会评估理论：趋同性和应用性》，见D. 莱文编的《关于动机的内布拉斯加讨论会》（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7）。

③ M. S. 奥尔森和J. C. 塔利：《社会经济—种族地位的不一致与对于政治变迁的偏好》，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7期（1972），第560—574页。

动的时期。地位的不一致性是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变迁的性质有可能使这种状态变成人们能够意识到的事情。突然的错位往往增强了这种意识，它们可能成为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地位的不一致性使家庭生活出现差异，那么当它被视作一个问题时，就成为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受损和相关的父亲地位的变化，对于大萧条时期家庭生活的两个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在维持家庭生计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二是包括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相对权力和亲子关系的家庭关系。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增加了对可以替代原有家庭谋生方式的依赖，而且强化了家庭经济中劳动密集型的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导致母亲和孩子更多地卷入经济活动和家务活动中。

家庭谋生中的劳动分工

丈夫和父亲角色的失败，使家庭的经济责任转到了其他家庭成员的肩上。在30年代经济条件恶化时，妇女就业显著增加，而且对于她们的丈夫来说也变得更能接受，尽管社区中还有不满的情绪（Bakke，1940，第184页）。[1] 在劳动阶级中，除非家中的经济状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且这种状况是由于家中的男性生计维持者长期失业造成的，妇女的社会位置总是在家庭里。当家中的存款花费殆尽，而信用贷款又超出了可以接纳的限制时，辛苦劳作的妻子只能外出寻找工作，不过家中孩

[1] 尽管家庭状况使女性不得不就业，但是失业的男性仍对"骗取其职业"的这些女性怨气冲天。E. C. 刘易斯：《挖掘妇女的潜力》（埃姆斯，1968），第151页。

子还太小的妇女很少这样做。

如果家中的经济条件导致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并因此减少了家庭原本可以获得的各种有偿服务，那么除了利用家庭之外的丰富经济资源外，他们也会鼓励孩子参与承担家庭角色。我们的假设是，对家庭福祉的贡献是按照性别角色划分的，即男孩主要参与经济活动，女孩则在家中从事琐碎的家务劳动。现有的论据显示，在大萧条中年龄较大的孩子接受了这些富有挑战性的要求，而且他们也经常表现出非凡的努力和能力。根据对危机境遇的调查，我们发现，有时候父母角色的变化会使参与维持家庭生计的孩子的角色出现补偿性变化（参见 Perry 等，1956）。孩子们承担了主要的家庭责任，而这些责任过去是由一位无能或是倒退回到了童年状态的父母承担的。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比较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未受损家庭和受损家庭的经济活动中孩子们的角色。

大萧条中的各种条件迫使孩子承担了本应由成人履行的职责，从而使这些孩子应该受到保护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期成为不可能。正如阿尔伯特·科恩（Albert Cohen）所回忆的那样，在大萧条中已经“没有十几岁的孩子了”。[5] 在更加富裕的时代，青春期容易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侵犯的伤害，也就是说，童年的顺从和依赖向后延伸到包括青春期在内的成人时期。作为消费主导型（consumption-oriented）社会中的剩余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成人前依赖状态的延长而被排除在生产角色之

---

⑤ 见 A. K. 科恩为 F. 马斯格雷夫的《年轻人与社会秩序》（布鲁明顿，1965）所写的前言，第 ix 页。有关的论述可以见 R. 林顿的论述，他认为社会会用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去拒绝正式认同青春期：“儿童时期的服从和依赖状态可能向后延长到青春期，成人承担多种社会义务的状况也可能向前延伸到青春期。”《年龄和性别类型》（1942）。

外。成人期和童年期的延长都要人们付出代价，但是在前一种状况下青少年至少能够承担着有报酬的工作，因此他们也有了超越自身的目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是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因素，他们在劳动和现金收入上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大萧条期间的青少年犯罪不仅不普遍，而且同后来更富裕的年代相比可以说很少见（参见 Glaser and Rice，1959）。至少就某些方面而言，下面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富裕与贫困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摧垮孩子们。"[6]

孩子们的家务劳动和工作经历，除了是对家庭福祉所做出的贡献外，也对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和态度（包括智慧、责任心和自立等）很有价值。把家庭责任分派给孩子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他们从这种经历中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勤劳和守秩序的习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观点，使自己的行动服从家庭的整体利益，等等。"[7] 在有关培养孩子的科学文献中，参与家务劳动都被描述为责任感的训练，而一般的理论倾向于把懒惰同劳动的美德（自立、理财的实践和社会责任感）相比较。[8] 不过支持这些劳动有益可靠的经验论据极其匮乏，[9] 部分原因在于劳动经历不断变化的特性。如果勤劳和责任感是必要的和富有意义的工作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假

---

⑥ C. S. 史密斯：《青春期》（伦敦，1968），第7页。

⑦ J. 杜威：《儿童和课程》（芝加哥，1956），第35页。

⑧ 参阅B. 怀廷编：《六种文化：对孩子抚养的研究》（纽约，1963）。

⑨ 也可参阅C.T. 拉根莱特：《652位成功就业的已婚女性家务操持者所碰上的问题研究》（1934）；E.E. 普雷斯：《有关家庭训练孩子如何使用金钱的实践的定量研究》，载《教育心理学杂志》，第36卷（1945），第411—428页；D.B. 哈里斯：《工作及向成熟的转变》，载《师范大学记录》，第63卷（1961），第146—153页；M.A. 斯特劳斯：《农场、城乡结合部和镇上男孩社会化过程中的工作角色和经济责任》（1962）

设，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中，这些品质应当相当普遍。此外，家庭之外的工作经历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父母的控制

夫妇间的决策和家庭关系

无论是在正常时期还是在危机时刻，男性在职业上的成功一般都与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相关。在下层阶级中，因为男人的经济地位不稳定又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妻子在家庭中普遍具有支配地位，这种现象在大萧条中极为常见（例如可以参见 Scanzoni，1970）。当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主要来自于文化传统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时，经济挫折就有可能被战胜。唯一的一项系统探索失业的短期后果的研究发现，妻子的态度是丈夫地位变化中的决定因素（Komarovsky，1940）。[10] 纽约地区 49 个家庭抽样中，男人建立在感情和传统基础上的权威，与由经济生产和（功利主义的）畏惧支撑的权威明显不同。如果权威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则丈夫的影响是通过个人品德与和谐的关系来维持的。以传统为基础的权威，则指的是妻子相信家庭的领导权是丈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在那些大萧条前妻子就持功利主义态度的家庭中，失业才成为丈夫丧失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结果与下层阶级家庭中两个少数种族群体中男性权威的差异一致。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庭中的男性权威由文化传统所支撑，行使权威是丈夫和父亲的权利。在黑人的下层阶级家庭中，男性权威缺乏传统规范的支持，所以非常容

---

[10] 就像大多数其他有关大萧条中的家庭生活的研究一样，卡马诺夫斯基的研究也没有获得有关萧条前或者经济危机前的家庭数据。不过，卡马诺夫斯基运用了大量技巧试图重建家庭生活。

易受到经济状况的侵害。[11]

由于家庭角色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夫妻关系的变化相应地会影响亲子之间的互动。有关大萧条中家庭的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便可证明这一点（Komarovsky，1940；Bakke，1940）。[12] 这两项研究都说明，父亲在婚姻关系中失去权力和地位，在与孩子的关系方面也有相应的损失。在妻子居于支配地位的家庭中，父亲在孩子面前几乎没有权威。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母亲地位的上升通常明显地增强了其对孩子的态度的影响。

为了后面的分析，我们先考察家庭适应的两种主要方式。我们已经强调这些调适在缓解经济状况对于奥克兰研究中的孩子们影响方面的潜在作用。我们将女孩从事家务劳动和男孩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同经济受损家庭的谋生需求联系起来，再同这些孩子的个人特征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特征影响着他们的工作经历。同样，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一方面与维持家庭的各种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亲子关系有关。

在经济受损和孩子们的经历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普遍的关联，这种关联既是由家庭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紧张构成的，又是由与经济损失和地位调整有关的资源成本（resource cost）、前后不一致性和冲突构成的。社会变迁改变了确定和界定自我的日常关系，并使互动和社会纽带（social bonds）都出了问题。

---

⑪ 在城市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家长制的理念已经转变为平等的信念。参阅 J. W. 摩尔：《墨西哥裔美国人》（恩格利伍德—克利夫斯，1970），第6章。

⑫ 这种关系也表现在 C. E. 鲍尔曼和 G. H. 埃尔德最近的一项研究中：《青少年感觉到的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9期（1964），第551—567页。

人格与成就中的地位变迁

既然孩子们被安排在家庭中的各个位置上，那么其位置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他们相对于同龄人和成年人的地位和认同。除了成就和未来的前景，家庭地位显然是决定孩子们的生活境遇和所获报酬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导致那些决定家庭在社会结构之中位置的因素之间出现了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又与常规性期望（normative expectation）不一致。

这种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下面三种差异上：经济受损前后的经济地位，父亲的收入和职业地位，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这种状况至少通过三种途径伤害了孩子：它导致家庭间和家庭内地位的模糊和紧张，它导致父母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沮丧或者不满，它使父母作为角色榜样的相对吸引力出现变化。在同龄人的世界中，由于用于服装和娱乐方面的开支的减少，经济衰退对孩子们过去和现在的地位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冲击。

通过对结构互动和自我定位的期望和评估的削弱，地位的不一致性培育出了有关自我和他人的意识。在出现冲突的情境（这些情境激发了自我中对于他人的态度）下，人们的行为变得具有自我意识了。[1] 为了理解地位前后不一致给协同行动(coordinated action)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最好从只占单一地位的

---

[1] G. H. 米德：《思想、自我和社会》（芝加哥，1934），第162页。在大量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都能发现社会冲突能够增加行为意识这一假设，其中包括乔治·齐美尔、乔治·赫伯特·米德和卡尔·马克思。用帕克和伯吉斯的话来说，"只有存在冲突的地方，才会有行为意识和自我意识。"参阅 R.E. 帕克、E. W. 伯吉斯：《有关社会的科学的简介》（芝加哥，1921），第578页。

人开始探讨。行为者所处的位置建构了其他人对他所抱有的期望、他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以及其他人对他采取适当行为的期望。一个没有因地位冲突而复杂化了的相对稳定的位置，确定了可以预期的一般境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成问题的，自我认同则反映了与环境的整合与协调。

只要多重地位没有出现相互矛盾，它们就不会对期望中的各种角色功能产生负面作用；但是如果变迁使个体处于地位相互冲突的位置上，那么他对他人和自身都会有矛盾性的表现。在这种情境下角色互补失败了，“而以紧张、焦虑或敌对等形式反馈到参与者的理解和自我意识之中”（Speigel，1960，第 365 页；同时参见 Zollschan，1964，第 258—280 页）。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家庭中，这种角色互补的失败是处于重新调整周期中的夫妻之间误解、失望和冲突的常见根源。在各种家庭事务中以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和其同龄人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失败和对社会参与的恐惧并不鲜见。[24]

对父母、配偶和家庭生计维持者这些角色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的期望，使父母和孩子都处于一种无法预期的情境中。卡塞尔和科布认为，父母地位不一致所导致

---

[24] 最好的惟一的来源是巴克的《没有工作的市民》（1940）。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大萧条中的状况只是增加了地位的模糊程度，这是以成就取向为中心的流动社会的一般特征。E. 拉腊比说：“我们对地位感到焦虑，因为这非常成问题，这是系统无法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我们不再为出身或者金钱决定的位置所束缚，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存在着逃避这些位置的机会，尽管并没有这种需求。在这种完全失序的一片混乱中，要发现一个人是谁十分困难。”《自我意识的社会》（花园城，1960），第 44 页。同样，C. W. 米尔斯宣称美国是一个特权不稳定且模糊不清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有着确定和稳定特权系统的社会。当“个人的要求一般不是由他人授予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就造成了“误解的迷津、突然的沮丧和突然放纵的迷乱；个人由于自尊的波动不定而处于紧张和极度焦虑之中。”C. W. 米尔斯：《白领》（1951），第 240 页。

的压力，表现为一种不稳定的自我意象、挫折、令人不满的婚姻、亲子关系以及专制性的父母权威(Kasl and Cobb,1967)。这些条件给孩子们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待自我的态度前后不一致、不合时宜，缺乏对父母的认同，以及有被排斥的感觉。这些对待自我的态度，也可能来自于地位变化对于儿童及其同龄人关系的影响，比如衣着质量的下降等等。

自我意识和意象角色的扮演，代表了对令人恐惧的、新鲜的或者易变的情境的适应，在这种情境中，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是未知的，或无法预测的。与不确定性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紧张感，"增强了人们感觉是'内在的'刺激和他们感觉是'外在的'刺激之间的区别。在自我的刺激和他人的期望并不一致时，它就逐渐成了自身的一个客体，因此它所得到的回应与它自己的期望也不完全一致。当自我不再完全按照他人的看法来看待自己时，自我就在自我意识之中成熟起来了"(Gouldner and Peterson,1961,第43页)。

因此，在经济受损家庭中的孩子身上出现的自我意识，会使他们对于情感压力(emotional stress)和父母及他人的态度非常敏感。自我意识指的就是对社会暗示(social cues)的一种极其敏感的状态。由于社会敏感性的不断增强，家庭中的危机情境可能通过它对个人变迁暗含的意义而扩大那些重要他人的影响，并促进对自我的评价。为此，我们认为，自我意识、情感和不安全感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的主要特征(参见第六章)。这里所提到的经济受损的影响，与对处于社会和文化边缘状态的个人的客观描述非常一致。根据这些经典描述，处在不同场合边缘的人，都会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

极度神经过敏、极度的喜怒无常和紧张。[14]

人们向来认为，严重限制了选择和资源的各种经济状况，培育了冷漠、有限的需求和目标以及认同的排斥性(identity foreclosure)。[15] 这也许能说明奥克兰样本中的一些劳动阶级的孩子的生活境遇和适应性，但是用来描述30年代后期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中产阶级的孩子状况却不是很恰当。一般来说，在艰难时期，这些家庭可能还依旧充满着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或者至少在30年代末的时候，会因经济条件的改善而重新对未来抱有希望。在这种情境中，家庭的艰难有可能增加未来成就的重要性，而对青年人来说这种成就是地位和自我定位(self-definition)的基础。这种观点来源于下述假设：地位的不一致是认知紧张(cognitive strain)和情感压力的一个来源；个体会努力使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而使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尽可能高的位置；年轻人在家庭之外去寻求获取他们期望的由潜力和目标所界定的地位。当家庭地位不再从属于家长的变化时，人们就能够照此调整所期待的地位，而且这种预期的地位可能会因为家庭受损而成为自我定位的基础，从而变得重要了。

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人而言，如果经济受损增加了未来地位的重要性，它就使他们因为家庭资源的受损而在实现这

⑭ M.M.戈登：《融入美国生活》(纽约，1964)，第57页。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提到地位的不一致和情感上的压力有关，但是对于父母地位的不一致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却知之甚少。对于成年人的研究，参阅杰克逊：《地位的不一致和压力的症状》(1962)；杰克逊与伯克：《地位和压力的症状》(1965)；以及R.L.卡恩和R.P.弗兰奇的文献回顾：《地位和冲突》，见McGrath编，1970，第14章。

⑮ 参阅约翰达等人的《马林塔尔》(1970)，S.T.豪泽：《黑人和白人的认同形成》(纽约，1971)。豪泽认为："认同排斥的结构是由停滞(也就是说多重自我想像的所有方面的变化都显著减少)所界定的。自我想像这种天生的停滞状态是个人经验——意识——选择有限导致的。"(第109页)。

个目标上会碰到更多的困难,也让在他们自己为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而承担更多的责任。萧条"使工作似乎不仅显得宝贵,而且难以获得——也正是因为难以获得所以才显得宝贵"(Riesman,1950,第344页)。在家庭对于这些年轻人获取成就的支持减少了的情况下,个人才智在决定地位的前景和获得方面就变得更加重要。当一个目标十分重要,而它的实现又主要依赖于个人才智时,对于能干的年轻人来说,不论是目标还是手段都值得他们深思熟虑。经验研究表明,一个目标的重要性和个人可能实现它的期望,都会导致行动者对所采用的手段进行斟酌,导致他们对实现目标的相关环境因素产生兴趣,导致他们付诸行动(参见 Stotland ,1971,第17页)。

就奥克兰样本而言,与目标取向(goal orientation)相关的这些因素都说明,同那些生活在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年轻人相比较,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更早确定成年后他们想做什么事情,而且这种取向是那些个人能力较强和对目标期望值较高的男孩(也就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男孩)的主要特征。在这个假设中,我们认为,对未来的地位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的思考导致了目标取向的具体化(参见第七章)。人们也可能把这种取向看成是家庭地位不一致性的结果和减少地位的不确定性的需要。这种不确定性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确定既定目标来实现的。

奥克兰的孩子成人后实现其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机会。如果结构性的条件不能为这些孩子提供受教育和获得合适职业的机会,那么未来地位的重要性、具体化目标以及抱负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察觉到的机会同样也是希望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经济受损家庭逐渐增加的资金需求和地位变化,将限制它在地位确立(status placement)方面的作用,并且促使年轻人

在相对较小的年龄就开始从事全日制的工作。[17] 而且，较早地进入就业角色和完成婚姻，作为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源泉，也有着特别的价值。中产阶级的生活机会比劳动阶级要多，中产阶级的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他们获得一定的成就。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受损对来自劳动阶级的人（特别是对那些能力低下的人）的生活成就（life achievement）的负面作用最大。

生活成就，特别是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取决于与家庭经济受损相关的情感压力的程度和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自我的过度敏感（hyperconsciousness of self），可能是对困境需求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失眠和恐惧。对于某种特定的境遇或者情境，我们需要了解可能增加情感痛苦和心理失调（psychological disorder）的条件。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适应性潜力及其在决定大萧条中以及持续到成年以后经济受损的心理影响。本章的结尾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些问题。

适应潜力与人格

如果我们只是在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生活境遇的基础上建构对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评估，那么他们的健康水平会特别低。在30年代，这些评估是建立在认为个人的机体非常容易受到环

---

[17] 从对教育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来看，费里斯发现了证据以支持关于经济状况和上学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的假设：“当家庭在金钱上的需求增加了的时候，就如大萧条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学生就会被迫辍学就业”；同时，“当失业状况加剧、工作变得更不充分的时候，诸如注册学生（enrolled student）之类的边缘工人（marginal worker）就更可能留在学校，而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相反，当工作充分时，更多的边缘工人会被吸收进入就业大军，因此注册的学生也会辍学就业。”A. L. 费里斯：《美国教育趋势的指标》（纽约，1960），第25页

境压力和限制的伤害的假定基础上。对个人的这种意象在心理分析学理论中也有,这也表现在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在十年萧条早期的诊断中:恐惧、缺乏信心、持续的谦卑、狂暴和沮丧,被认为是孩子们受到了"父母身上道德崩溃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的影响。[18] 残酷的经济受损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重要病源,这些后果包括:对与身体安全、自我和社会的定位以及认知有关的奋斗精神的阻碍。[19] 但是这些条件和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还依赖于许多因素,包括个体在适应潜力方面的差异。

甚至在大萧条中受损惨重的记载里,比如在有关奥地利的马林塔尔的大萧条的经典研究中,家庭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无法充分解释孩子们的健康状况(Jahoda 等,1970)。马林塔尔是一个大约有 1,500 个居民的村庄,当它惟一雇主——一个大型纺织厂——倒闭时,它变成了一个失业的社区。除了 80 个人以外,整个村庄的人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工作。根据当时进行的社会现状记录(sociographic record),人们每天平均的生活费用是 5 分钱,在餐桌上的肉主要是马肉,晚餐上的常见食品是少量的面包和咖啡。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调查者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要求和愿望都减少了或者缩小了,因而降低了匮乏全面冲击的程度。随着家庭成员的就业,孩子们心理健康所受到的伤害减轻了,但是甚至在健康状况最为良好的家庭中,大多数家庭成员还是没有工作。为了解释健康状况的变化,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有关父母和孩子的适应性资源的信息。

为了弄清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地适应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环

⑱ B. 沃尔夫:《对大萧条的心理分析》,载《论坛》,1932 年 4 月,第 212 页。

⑲ A. H. 莱顿:《我的名字叫莱京》(纽约,1959)。

境，而另外的人却做不到，我们需要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动机的知识、需要知道家庭和更大的环境所提供的支持，[22] 以及事件和环境本身的性质。对一种危机境遇的深入了解包含这三种要素，因为它们共同决定一个人怎样界定事件并对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奥克兰样本中，当解决问题的技能、才智和熟练程度成为满足逆境下的需求的能力时，阶级地位将直接依赖于个人才智和环境对处理问题的支持程度。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把这些因素与适应潜力联系起来，探索经济受损对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的持久影响力。

按阶级与智力划分的适应潜力的变化

对个体适应的社会支持包括准备和强化(reinforcement)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到社会化和人们对生活境遇做准备的机制：积极的自我意象、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竞争意识，是在家庭内所做好这种准备的关键。强化包括促使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动机，同时包括赞成和反对在内的评价模式。强化不仅影响到"人们想做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们在应付特殊挑战时所使用的方法"(Mechanic，1968，第 310 页)。因此，通过准备和强化了的社会支持成为个人应变能力和动机的社会性补充(social complement)。

中产阶级家庭不可能直接经历下层阶级家庭中所经历的经济困难，并得到与后者相同的教训，但是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更多的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技巧，在情感上给了孩子们更多的

---

[22] 后面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借用梅卡尼克的压力—适应模式。参阅他的《医学社会学》(1968)，第 9 章，以及他的论文《培养适应紧张的社会心理学诸问题》，参见 McGrath，1970，第 104—123 页。

支持。[1] 与处于较低地位的父母比较起来，中产阶级的父母除了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之外，他们还更留心去了解自己社区的运作，对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更熟悉。

在促进对经济变迁作出适应性反应上，产生于下层社会的生活境遇中的现实概念降低了早期艰难经历的价值。下层阶级中的取向更是经常因不信任感和恐惧、僵硬、过于简单化的现实概念以及认为人的生活都屈从于外在力量的宿命论而显得与众不同。变化不定的环境、有限的工作经历和不完全的教育都通过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变化阻碍了人们处理问题的能力。[2]

适应性能力的类似差异，在孩子的社会阶级对比中同样也表现出来。中产阶级的孩子因其以前的经验，对经济困难和家庭紧张没有什么准备，但是资源和取向方面的优势，使他们能对变迁的复杂性和挑战作出更好的适应性反应(参见 Elder, 1971，尤其是第 29—113 页)。鉴于通过才能和努力以实施控制的理性前景，处事的动机就有可能来自与经济受损相关的地位变化。作为适应潜力的一种指标，我们认为阶级地位会使经济受损对于奥克兰样本中的成员的心理影响出现显著差异：经济受损对劳动阶级的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要比对中产阶级的更大。

在危机境遇中，如果一个人非常想采取某种行动，但又缺乏应对现实问题的技巧，他就有可能产生挫折感，会变得极度苦闷。根据人们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个体的适应随着动机、对关系的熟悉程度和对该做什么的了解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Bar-

---

① 参阅斯特劳斯：《三种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的沟通、创造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1968)。也可参阅 L. 罗格勒、A. B. 霍林黑德：《掉入陷阱：家庭和精神分裂症》(纽约，1965)；以及多伦温德：《社会地位和心理失调》(1969)。

② M. L. 科恩：《阶级、家庭和精神分裂症的再形成》，载《社会力量》，第 50 期(1972)，第 295—304 页。

ton,1969,第 68 页)。在动机强烈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最有可能表现出仓促举动和不适反应。在面临某种灾害时,那些缺乏有关的灾害经历(如军队经历、专业训练等等)的人身上最集中体现了情感压力和不适反应的影响。在诸如大萧条之类的持续性危机中,对于处于学习和适应过程中的父母和孩子来说,无力行动和情感影响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否则就会导致更为持久的畏缩和踯躅状况。后一种反应在经济受损极为严重和物质极度匮乏的境遇中更为普遍。

既然情感压力影响了处事能力,那么除了资源和动机外,对自己内部状态的控制就成了决定适应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强烈的防御性反应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对情境的错误或过于审慎的理解会导致不恰当的行动。有的时候,防御本身成了目的,通过积极规避而减少了在主动应对方面的动机投入(Mechanic,1968,第 308 页)。在大萧条中失业的男人中,酗酒和社会隔离状态,以及对他们工作能力持续的破坏性的影响,表明了这种反应和它所带来的结果。

个人的特点和家庭对于处事能力的支持程度都影响着一种境遇如何被确定,但是如果个体的反应能够具有社会效力,并成为进取心的组成部分,就必须对这一切进行整体的解释。通过观察和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互动,这些想法和感觉得到了验证和确认。因此,父母对危机境遇在情感上和行为上的反应就成为孩子们的潜在反应模式。[23] 通过把阶级地位当做奥克兰研究中的孩子们的适应潜力的一种指标,我们认为父母和孩子在应对

[23] 在 A. 弗洛伊德对于轰炸伦敦时期的儿童的分析中表明,破坏和死亡对于儿童的影响和父母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是一致的。参阅弗洛伊德、伯林厄姆:《战争和儿童》(1943)。

社会变迁和经济受损时,现实概念和处理问题的资源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童年经历与成人健康

在对地位的研究文献中,有着相当多的论述认为童年时承受压力的经历增加了成年时心理失调或患病的倾向(参见 Rahe,1969)。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挫折与不幸可能影响个人的成长发育,甚至还可能是影响它们的基本因素,正如它们也可能导致失调反应(maladjustive reaction)一样",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充满压力的境遇对于孩子们发展的影响。[24] 事实上,许多人只是关心失调这个结果,因此忽视了心理功能的整体状况。经验研究表明,心理健康不只是与积极或消极情绪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密切相关(参见 Bradburn,1969)。

在欣克尔(Hinkle)和沃尔夫(Wolff)进行的有关成人的一系列回顾性研究中,有着相当多的证据支持"关联倾向"(proneness)这一主题。[25] 人们发现生活的变化会引起精神病理学的反应,这种反应在许多疾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具有一定的作用。生活变化越剧烈或越令人费神,健康状况恶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许多容易患病的成年人都承认自己是在因父母离婚而破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些家庭的特点是父母争吵不休,对于子女持有敌意或者厌弃态度,孩子情感上受到剥夺以及对孩子提出过分要求和限制。健康的成年人中很少有人曾受

㉔ S.沃尔夫:《生活压力和疾病模式》,见 H.I.利夫、V.F.利夫、N.R.刘夫编:《医疗的心理学基础》(纽约,1963)。

㉕ 欣克尔、沃尔夫:《人类对其周围环境适应性的本质及其与疾病的关系》(1957),L.E.欣克尔等:《生活经历、人格特征和容易染病之间关系的调查》,载《精神治疗》,第 20 期(1958),第 278—295 页。

过这些情况之一的重要影响。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离婚、分居、婚姻冲突和薪水微薄的职业经历主要集中发生在那些容易患病的人群中。

卡塞尔和科布关于童年经历对成年时健康的回顾性研究（1967），得出了与上面相似的结论。那些来自于父母在职业地位和教育方面差距悬殊的家庭的成年人，更容易表现出精神萎靡、焦虑和虚弱等生理症状，并且自认为在精神上更抑郁、狂躁和缺乏自信心。在这些家庭中，父母的婚姻被描述为相对而言没有什么感情，同性的家长也没有提供具有魅力的角色榜样，而且那些儿孙回忆起的童年更是充满了不幸和不安全感。与任何一种回顾性研究一样，这些有关童年时代的报告的有效性必然被当作是不确定的。

在对纽约成年人所做的横向调查中，也可找到支持压力—病理学（stress-pathology）关系的证据，虽然这些结果因阶级出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Langner and Michael，1963）。那些被访者提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压力因素的数据表明，它们是这些人成年后精神健康状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导因素。他们在成人以前受到的损失越多，心理受到伤害的程度也就会越严重。可是，各种压力因素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心理功能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任何一种压力来说，下层阶级的成年人在精神健康方面比来自中产阶级的成年人承担的风险更大。在这项以及相关的研究中，童年时期的阶级地位是决定这些人适应潜力的重要因素。

格雷戈里（Gregory）的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童年时期的受损经历也许对孩子的发展十分有利。[26] 格雷戈里利用过去

---

[26] I.格雷戈里：《追踪父母在儿童时代损失的回顾性数据II：大学生的病理、表现和潜力》，载《普通心理学档案》，第13期（1965），第110—120页。

五年得到的所有在卡尔顿(Carlton)学院注册的学生数据,发现失去父母对孩子的成就或者健康并没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失去父母之一的每一种性别的学生,都按照失去父母的类型、失去父母的性别、失去父母的年龄以及留下来的家长是否又重新结婚进行分组。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对学生是否能够毕业和获得学术成就形成负面的影响,或者与去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或精神咨询有关。相反有证据表明,由于父母离婚或分居而失去某位父母实际上激励了一些聪明学生为取得成就而奋斗,并使他们的心理变得更为健康。

最后,家庭出现压力性事件时孩子的年龄与其心理影响之间会出现差异。虽然格雷戈里发现,孩子失去父母的年龄不会导致这种差异,但是其他研究普遍表明,在家庭压力的影响和孩子的年龄及成熟状态之间存在一种逆向关系(有关年龄影响的研究回顾,请参见 Wolff,1969)。在前面提及过的纽约调查表明,如果孩子是在6岁以前而不是在6岁以后经历家庭破裂,并且父母又分别重新组织了家庭,那么他成年时的心理健康所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在有效地处理冲动和外来冲突方面,那些在青少年时期遭遇过严重家庭冲突的人实际上比那些生长在更加平静、更能起支持作用的家庭的孩子更出色(Weinstock,1967)。但如果家庭冲突出现在孩子更为年幼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会出现。这些冲突与成年时退化的和失调的行为有关。这些发现对奥克兰样本相当重要,因为这些调查对象在30年代还处于前青春期。

虽然在那些依赖回顾性数据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但是有两个总体性的结论对奥克兰分析非常有帮助。首先,家庭的危机或压力一般会增加这些孩子成年后个性失调或者健康恶化的风险,虽然这种相关的程度并不确定。其他情况也同样,

危机与它对人提出的要求越极端或者越苛刻，风险也就越大。其次，变迁和充满压力的境遇所造成的心理影响随着个体的适应潜力——个人的才智和动机以及环境的支持——程度的不同而不同。适应挑战境遇的潜力越小，承受的精神健康风险就越大。那些认知水平超过平均值的年龄较大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这种适应性潜力相对要大一些。而那些智商较低和家庭地位较低的相对年幼的孩子，这种潜力就受到诸多限制。

第二部分
大萧条年代的到来

在大萧条年代，最常见的事情之一——它无疑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这种对你父亲失败的感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无法逃避罪责。可以肯定事情糟透了，但是为什么我应该是那个必须承担家庭不幸的（放一片硬纸壳在鞋底里去上学的）孩子？我并不憎恨我的父亲，仅仅是感到遗憾，因为他没能设法做得更好，没有抓住机会。同样，我也对父亲狂怒地对抗现存的事物感到不安。

在这个时期，他会接受他认为低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工作，这样就可能发生这些事了：与工头争吵，与老板发生争执。他是一个木匠，不可能对固定路基或者开出租车之类的事感到满足。

我的父亲生活艰辛；他喜欢喝酒。在大萧条期间，他喝的就更为厉害，因此家中冲突频频。许多父亲——我的、别人的——都有离家出走的习惯。他们去芝加哥找工作，去托皮卡找工作，把家眷留在家乡。这些人等待、期望从前的男人会带回什么来。

我认为大多数孩子都无法逃避这个命运。像我这样的长子——必须更早地离开家庭。这不是拒绝接纳自己家庭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剧变都要改变人们这些生存的模式。孩子开始怀疑他们的父母。因为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匮乏，他们过早地离开了家庭。他们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这与现在

这代人不同。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家里，情况有了好转。这是在大萧条以后，也是在战后了。对我来说，这几乎不是同一所房子了。我的父亲变成了天使。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正在创造财富。他们不再言辞尖刻、互相指责，不再有痛苦，而这都是我当孩子时曾经历过的感受。

劳工组织者，熟练手艺工人之子

斯塔兹·特克尔：《艰难时世》

第三章
经济受损和家庭地位

> 我们曾经非常富有，但是1929年大萧条降临以后，我们变得非常贫穷。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的父亲失去了经纪人的工作，也失去了收入。后来他去开货车，每周能挣15美元。
>
> 奥克兰出生组的成员

当经济在1933年跌到最低点的时候，对奥克兰的许多父母和孩子来说，经济上的极度困难成了摆在眼前的一个新的现实。在20年代末，我们取样的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略多于3,000美元。三年以后，这个数字跌到2,000美元以下。本章的目的在于说明家庭收入急剧变化的前提条件和后果，基本上我们强调的是家庭地位的变迁、维持生计的经济战略以及父母的心理反应。

在构建经济受损的适度方法时，还需要考虑许多选择和问题。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将讨论这些问题，说明衡量经济受损的指标，调查奥克兰父亲们的工作生活与家庭困苦的相关性。经济灾难的分布不均使我们采用了两种调查方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在经济上受损。30年代期间受损的父亲与那些未受损的父亲在大萧条前有什么区别吗？经济受损如何对家庭生活、父母和孩子产生影响？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与经济困难的情境有关，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条件所导致的后果。有两类影响（本章已涉及到此）对奥克兰孩子的生活境遇特别重要：

家庭在经济受损情况下的谋生方式；心理反应、适应性和感觉到的父母的地位。父母的适应性（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人们感觉到的）为经济变迁和我们研究的孩子的社会角色、对自我的态度和生活前景之间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联系。

经济受损和父亲的工作生活

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经济受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损失或者变化的程度，以及它发生的情境。损失程度常常被错误地直接当做衡量经济受损的客观尺度。按照标准的测量规则，受损百分比的确定至少要对经济受损进行定序测量（ordinal measure），但是人们对此不能做出更多的说明。从心理—生理上或者社会财富（social property）的角度来说，10％的受损和20％的受损之间的差异不可能与更高层次的受损中同一百分比的差异相提并论。[1] 事实上，为了使一个连续谱系中的任何一端的同一变化显得更为重要，人们可能都会找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通常我们更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什么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受损百分比。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意义的

① 为了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所进展，人们了解的就必须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构建评价的参考框架更多。在有关地位心理学的开创性研究中，H.H. 海曼发现仅仅收入本身很难说明对经济地位的满意程度。表示不满的人的收入在336—4,000美元，表示满意的收入在900—6,100美元。一年仅赚336美元的人宣称他比年收入900美元的人“快乐”。反之，一个年薪将近4,000美元的人渴望收入能够达到25,000美元。参见《地位心理学》（1942）。有关地位变化在心理—生理上的意义，可以参阅H. 赫尔森：《适应层次理论》（纽约，1964）。特权和经济状况的参考框架是根据所处的阶级地位构建的，我们也可以用1929年的社会阶级作为衡量经济受损发生情境的指标。

百分比是要到 10%、15% 还是 20%？或者还是要根据最初的地位来确定？就其对维持家庭生计的资源的影响而言，家庭收入减少 1/5 对下层家庭的影响会比对上层家庭的影响严重得多，但是后者一般都对威胁到他们名誉和形象的变化更为敏感（Hansen and Hill，1964，第 803 页[②]）。这类经济变迁只在下层中才有意义的假设可能受到的挑战是：中产阶级家庭对失业和经济衰退的主观反应更加强烈。

如果经济变迁是在特定的情境内发生的，不同受损程度的影响对于分析来说就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经济受损对不同阶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根据这种预测，我们将用 1929 年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来定义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并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变化。[③] 收入与教育和职业二者都只是适度相关，而阶级地位则详细地说明了样本中的家庭在大萧条前相对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那时奥克兰大约有 3/5 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有 1/4 的家庭属于中上层阶级（霍林斯黑德指标中的第 I、II 两个层次），36% 的家庭属于中下层阶级（第 III 个层次），有大致相同百分比的家庭属于劳动阶级（第 IV 个层次）。样本中只有极少数家庭是在大萧条之前在经济上就已经严重受损。只有

② 也可以参阅 J. D. 古德柴尔德和 E. E. 史密斯：《受到社会地位中和的事业的影响》，载《社会人际学》，第 26 期（1963），第 287—293 页。

③ 社会阶级（1929）是以建立在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基础上的霍林斯黑德指标（Hollingshead index）来衡量的。无论是父亲的职业还是教育，分数都是从 7 分（没有技能，接受过某种程度的小学教育）到 1 分（高级行政人员，受过专业训练）。职业的级别以 7 这个因素加权，教育用 4 加权。全部的分数被分为五种地位类型。这项研究中主要是区分中产阶级（I、II、III）和工人阶级（IV、V）家庭。在相关分析中，我们为了使高分就等同于高地位，把职业、教育和社会阶级的分数倒过来使用。

5%的家庭属于下层阶级。[4] 就居住区域而言，大多数中产阶级居住在或靠近城市西北角响当当的奥克兰山(Oakland Hill)地区，而劳动阶级家庭一般都住在"公寓"里面，他们的邻居来自不同的地域，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比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大得多。

可以通过计算家庭在1929年至1933年之间的收入损失比例来测算经济受损的程度。根据1932年和1934年访谈中得到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定性资料，家庭破裂或者被迫非常频繁地处置财产只有在收入损失超过40%时才会出现。这一论据以及生活成本的变化都表明，家庭收入损失达到35%才是在经济上相对未受损和受损的家庭间有意义的分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估计显示，1929年到1932年期间，奥克兰地区的生活成本降低了18%。[5] 这种下降的趋势持续到1933年3月，因此在经济上大大降低了未受损家庭的购买力。

在下面的分析中，经济上未受损的家庭指的是1929年至1933年间收入减少不到35%的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来看，这些家庭资产的损失并不严重。经济受损的类型包含那些在经济上损失惨重的家庭。在分析的不同点上，我们将根据是否家庭受损伴随着父亲的失业来细分这种类别。表1列出1929年和1933年每一社会阶层中经济受损和未受损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以及每一群体受损的比例。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中产阶级平均受损的数额较大，但是在两个阶级中经济受损的家庭相对变化程度却是可以比较的。

---

④ 米勒描述下层社会的生活"总像处于危机中一样、一直在设法摆脱命运的绳索。"S. M. 米勒：《美国的下层阶级：类型学研究途径》，见 Reissman 等编，1964，第147页。

⑤ E. J. 汉纳等编：《加州失业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旧金山，1932)，第171页。

表1　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和收入的变化(1929—1933)

(按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划分)

社会阶级(1929)和经济受损	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和收入的变化			
	1929年的收入	1933年的收入	1929—1933年收入的损失	1929—1933年相对收入的变化
中产阶级				
未受损(N=40)	$4,068.00	$5,198.00	$850.00	20%
受损(N=49)	$3,600.00	$1,478.00	$2,220.00	−64%
劳动阶级				
未受损(N=21)	$2,400.00	$2,040.00	$3.60.00	−15%
受损(N=46)	$2,780.00	$1,118.00	$1.560.00	−58%

从经济受损的百分比来说,经济受损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程度是经济未受损家庭的三到四倍。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数目都超过了经济未受损家庭,尤其是在劳动阶级中。1933年,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社会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实际上并不存在。1933年,中产阶级经济受损的家庭在经济上的地位,实际上低于两个阶级中经济上未受损的家庭。无论采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经济受损家庭的经济变化都是巨大的,对维持家庭生计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家庭地位前后不一致的程度也是对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方

面的描述。一般说来，在1929年，家庭相应的经济身份(economic standing)通常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这正如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状况所显示的那样(tau_c = .43)。到1933年，对阶级地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测量，发现在经济受损的群体中，他们所提及的家庭收入和阶级地位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09)。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在整个大萧条期间保持不变，所以无法预测经济受损的家庭在1933年的收入(.06)。这也是1929—1933年间父亲的职业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断削弱(从.60下降到.45)的惟一的家庭群体。这些相关系数(Kendall's tau_c，对定序变量进行测量)表明了顺序一致的变量值(如较高的社会阶级、较高的收入)对数超过了顺序相反(如高阶层、低收入)的变量值对数的程度。变量的取值从-1.0到+1.0。在后面的分析中，无论是为分析需要或者频率分布需要，我们都会把皮尔逊的r相关系数作为衡量相关的(定距变量的)一种指标。

奥克兰家庭中的收入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通常与萧条的经济环境有关：工资的削减、年薪的下降或销路不畅；工作时间的减少导致的失业；短期或长期停业引起的完全失业；以及失去父亲。由于在30年代没有收集工作生活史和适当的数据，故在抽样中看不见关于这些条件和其分布的完整记录。不过根据1934年家庭访谈的信息，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家庭的父亲在1929年到1934年之间是否曾经失业。在中产阶级中，失业几乎只出现在经济受损的家庭群体中(52%对9%)。由于在劳动阶级的受损和未受损的群体中，父亲失去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在那段日子的某些时刻，劳动阶级中的父亲们失业的百分比较高(59%对33%)。在1929年到1934年期间，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曾有某种失业经历的父亲们最有可能失去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status)，在这个时期有1/3的失业父

亲的职业声望下降了一个或更多的层次，而这样的有工作的父亲的比例只有 7%。

除了受大萧条影响的奥克兰的经济状况已变得最为糟糕的 1933 年以外，我们没有关于样本中的家庭收入的数据。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勾画出经济受损的家庭相对其 1929 年的经济地位而言复苏或者超越的程度。可是，还是需要对它做某些分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样本中的孩子们，特别是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孩子们的发展和未来前途。这类家庭最明显之处就是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为了确定经济变迁的长期影响，我们收集了所有能得到的有关 30 年代末家庭社会阶级地位的论据。我们得到了样本中 105 个家庭在 1941 年的社会阶级的足够数据，它们可以与 1929 年的指标进行对比。这两种测量社会阶级的方法都建立在霍林斯黑德指标的五级层次基础上。

这种对比显示了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高度稳定性。在 1929 年和 1941 年，大多数经济受损和未受损的家庭都位于相同的地位层次上：前者为 67%，后者为 76%。这两类群体中都只有 8% 的家庭下降了一个或者更多的层次，其余的家庭则至少上升了一个层次。在中产阶级中，向下流动的家庭被逐渐稳定在 1929 年的最低水平上。这种衰退我们可以从一个中下阶层家庭的案例中看出来。这个家庭在父亲失去工作以后降到了阶级结构的最底层，并且在整个 1941 年都停留在这个位置上。20 年代这位父亲曾是一位小型家具公司的推销员，在大萧条的第一年就失业了，随后三年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到了 1934 年，他部分时间去开一辆送货卡车；后来他成了看门人，接着又受雇于一个加油站。奥克兰样本中的这种急剧变化不多，1929 年到 1941 年之间地位有微弱降低的情况也很罕见。一般来说，经济受损的家庭在十年大萧条末期才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地位。

经济变迁中的社会因素

在奥克兰的样本中，家庭经济受损的变化程度引起人们对一个普遍流传的假设的怀疑。这个假设认为，大萧条中的经济拮据是一种普遍经历，这种经历使美国所有的家庭都处于共同的境遇中，分享着彼此的不幸。当大多数奥克兰家庭处于经济受损的境遇之中时，有些家庭并没有体会失业所带来的额外负担，而且有足够的"富裕"家庭在不那么幸运的时候增加了对经济受损的感受。这种经济受损的差异必然要引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条件和因素使严重受损家庭与未受损家庭之间出现分化？在此，我们将考察奥克兰父亲们的四个特性，它们与经济保障和被雇佣能力(employability)有关：1929年的职业地位和工作类别，出生地点，年龄和受教育程度。[13]

我们发现，总的来说工作状况(work status)和父亲的出生地点对经济受损和失业的影响，比父亲的年龄或教育程度的影响要大。在中产阶级自雇的人中，经济受损的情况最为相似，而劳动阶级中许多经济受损的父亲都具有外国血统。前者表明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小生意(small business)面临的风险较大，而后者则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种族地位享受的不同待遇。

在大萧条中，专业人员在收入上的损失和失业方面差异最小，而在非技术群体中差异最大，比如自雇者在金钱上有所损

---

⑬ 父亲的年龄也许是他失业后能够成功地重新获得一份工作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参阅艾肯等编：《经济上的失败、疏离和极端倾向》(1968)，第36页。有关根据行业和职业的类型划分的全国在失业上的差异，可以参阅B.米切尔：《大萧条十年：从新时代到新政，1929—1941》(纽约，1947)，尤其是第98页。

失，却并没有失去工作。④ 4/5 自雇的父亲在经济上受损，而其他人员经济受损的比例分别是：没有什么技术的人占 2/3，白领和技术人员占 1/2，专业人员占 1/3。在失业方面，无技术工人和白领居首位（40%），其后是自雇者和技术人员（30%），再后则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14%）。从这些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失业的论据明显低估了经济困难的程度，尤其是低估了中产阶级经济困难的程度。这一点有助于人们根据一般的趋势运用失业数据去评估 30 年代的经济受损。

在萧条状况下，自雇者占有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虽然他们的境遇缺乏保障，但这些"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的代表仍然具有灵活自主地解决他们自身经济问题的优势。通过削减日常开支、用家庭雇员取代非家庭雇员以及延长营业时间等方法，他们可以使摇晃不止的经济小船得以继续漂流。延长工作日和工作周是那些能在大萧条中拯救自己生意的社会群体的显著特点。

出生在国外的父亲在经济上受损的可能性更大。这种状况在劳动阶级中最为常见（25% 对 14%），而且也主要是在这个阶层中和经济困难有关系。在劳动阶级中，出生在国外的父亲有 4/5 经济受损，而在国内出生的父亲只有 3/5 的人有这种经历。对中产阶级进行相同的比较可以看出，出生不同的人经济受损的差异只有 8%。总而言之，在所有的职业种类中，出生在国外的人在经济受损方面位居前列。与此相对应，他们在 30 年代的

---

⑦ 在那些有关部分成关于大萧条年代的成年人的回顾性研究中，可以发现在"老中产阶级"的企业家的家庭中，经济窘迫的情况也很普遍。他们被问及这个问题："在你长大成人的日子里，你的父母是否曾经有入不敷出的时候？"没有什么技术的父亲的后代最常提到艰难的日子，其次是小企业主和地位较低的商人。兰纳、米切尔：《生活压力和精神健康》（1963），第 231—232 页。

工作生活都不稳定，这从他们失业的时间和职业地位的波动中可以看出来。这种模式也许反映了由经济制度和雇主所造就的区别，虽然我们的样本家庭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直接证据。

除了这些区别外，我们预计，同土生土长的父亲相比，出生在国外的父亲如果年龄较大又没有什么技术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在职业生活方面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在失业群体中，年轻人比年龄较大的人对雇主的吸引力更大。不过年龄并不是决定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受损的一个因素，这种状况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年龄更大或者更小的父亲中并不是更为普遍的。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一般说来，移民到美国的父亲比出生于本地的父亲受的教育少，但是这种区别还不足以说明存在于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的和未受损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种族差异。在这个阶级的经济未受损的人中，受过8年级以上正规教育的比例只是略微高一些(38%对28%)。在中产阶级中，在经济上未受损的父亲有半数至少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而经济受损的父亲受过此类教育的人为41%。在这种差异中，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雇者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从历史上来看，这类职业生活为那些缺乏从事地位较高职业所必需的教育准备的人开辟了取得经济成就的途径。在前述所有处于半技术性职业类别以上的职业种类中，大萧条期间稳定的就业和收入的可能性与正规教育的相关程度也很低。

父亲的工作状况、教育程度和出生地点解释了家庭经济受损的社会情境。在后面分析的适当地方，它们本身也会被考虑在内。作为标志家庭社会等级的因素(1929)，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界定了家庭经济艰难的两种社会经济情境——中产阶级的和劳动阶级的。家长的国籍也将作为衡量家庭角色的价值指标进入我们的分析。可是我们主要关心的还是经济受损

的影响。因此，经济受损的差异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出发点，而不仅仅是需要解释的一种事实。

经济谋生中的家庭适应性

经济受损的家庭试图在经济上寻求解决谋生问题的方法时，一般来说有两种适应方法：减少开支和开辟可选择的或补充性的收入来源。而对长期的经济受损，有必要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亲戚资助或出租房屋，最后是公共援助。正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在样本里的劳动阶级家庭中，每一种资助类型都很普遍。但是即便是在这个群体中，也只有经济受损的人群在努力寻求更多的收入来源。[8]

家庭在经济资助上的选择

与公共援助形成对照的是，这些选择指的是来自家庭劳动力和亲属资源的资助，指的是来自母亲就业和来自亲戚或房客的收入。在1934年对母亲所作的访谈中，人们得到了有关她们当时工作状况的信息，了解到这个家庭是否在1929年到1934年期间曾收到过亲属或者房客的什么钱。人们不了解母亲的工作时间和状况，也不清楚来自于这方面的收入究竟有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数据的确对两种维持家庭生计的重要选择提供了

---

⑧ 我们没有得到有关奥克兰家庭支出调整的系统记录。不过，有关休闲模式的数据的确表现出了休闲的商业形式和经济受损的负相关。比如，在两个社会阶层中，每个月看电影至少两次的父母的比例和经济受损都是负相关，在中产阶级的父亲中是从49%到24%，在工人阶级的父亲中是从38%到13%。对于母亲来说也有着相似的差异。由于这些数据的横断面性质，没有办法确定经济受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用于商业休闲支出的削减。

一般性的解释。

在经济低迷的奥克兰地区，舆论不鼓励那些感觉到自己有必要为家庭赚取额外收入或赚钱养家的妇女外出工作。"据说她们从那些需要赡养家庭的失业男人那里抢走了工作。"在有些时候，尽管妇女还是能够找到工作（一般是一些低工资、计时的工作），而且在许多家庭中经济需求比反对这样做的情绪更有市场，但是就业政策却将已婚妇女排除在外（本地的学校区域）。在样本里的劳动阶级家庭中，29%的母亲有工作，而中产阶级家庭中外出就业的母亲只有19%。在两个阶级中，收取房租和得到亲戚资助的人数更少（分别为16%、21%）。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两个社会阶级中，每一种资助类型都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受损的群体中。

为了确定经济需求的程度，我们根据经济受损和父亲失业状况把所有的家庭分成三类：经济未受损的家庭、经济受损但父亲仍有工作的家庭、经济受损且父亲失业的家庭。如表A－2所显示的那样，经济受损是两类家庭选择出现差异的主要来源。父亲的工作状况对此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中产阶级的父亲除外。在中产阶级中，从亲戚或者房客那里接受某种资助的家庭的百分比和经济受损的程度直接相关；但是在经济受损而且父亲失业的家庭中，母亲就业的情况最为常见。在自雇者对于经济状况的适应中，可以发现对这种结果的基本解释。虽然这些人的收入损失惨重，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能够避免破产或生意倒闭，这部分在于他们能够通过雇佣家人而削减成本。自雇者的妻子有40%投入工作，而在没有什么技术或技术人员中只有25%的妻子这样做。

在经济未受损的群体中，就业妇女的数量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如调查中所估计那样，相对的经济受损揭示了家庭收

入总量变化的程度，因此它也包括妇女的收入。妇女的收入很可能是经济受损家庭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我们并不知它的数量有多少。在某些个案中，这些收入也会使经济受损和未受损的家庭之间出现差异。在家庭适应经济变化的所有方式中，我们在测量经济受损的时候只考虑了母亲的就业。当我们转入社会适应的领域时——家长对变化境遇的解释、社会卷入和退缩(social involvement and withdrawal)、家庭的角色和关系，家庭收入总量的减少是衡量经济变化的最合适方法。

公共援助

对于工作着的母亲来说，缺乏社区的支持与对待公共援助或意味着"某个不能养家糊口的男人出了什么事"的"救济"的态度相似。在奥克兰，1929 年申请救济的家庭陡然上升了 6 倍，并且逐渐与失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依然顽固地坚持家庭依赖救济只能说明个人能力欠缺的看法。

1929 年到 1941 年期间，奥克兰样本中有 1/3 的家庭向一些公共机构申请过资助。这些数据来源于该县的一个慈善委员会，该委员会同时也是该城市公共援助的统筹机构。这个城市的救济补助一般不会超过每月 45 美元，远远低于当时一个带孩子的工人的最低生活费。[⑨]

1929 年到 1941 年期间同各种机构联系的 108 户人家中，寻求直接经济援助的为 38%，寻求医疗援助的为 44%，为较大的孩子寻求津贴的占 14%。大多数申请过一次的家庭得到了直接的经济援助，而多次申请的家庭一般得到了包括经济援助

⑨　在 1929 年，奥克兰地区带 3 个孩子的劳动力的最低生活费是每个月 118 美元。即使我们减去生活费下降的部分，每个月的数目也远远超过 45 美元。

和其他类型的资助。有 20 个家庭向公共机构提出了三次或更多的申请，主要是劳动阶级家庭。表 A－3 显示了两个时间段内经济受损（父母失业或未失业）与接受公共援助之间的关系：联邦基金在城市中大规模发放之前的 1929—1933 年和 1934—1941 年。在这两个时期，求助于公共机构成为父亲失业家庭的"最后求助手段"。

同劳动阶级的家庭相比较，中产阶级的家庭很少接受公共援助，而且 1934 年以后这种差别还更大。福利是这两个阶级中男人失去工作的家庭获取经济资助的主要来源，而且在 1933 年以后申请的人数大大增加了，这部分是因为在奥克兰申请联邦基金的可能性变大了，家庭资源也逐渐耗竭。在 1929 年到 1933 年期间，有 23 个家庭至少申请过一次救济；而在以后的数年中，这个数字翻了一倍。有 16 个家庭在上述两个时期都接受过援助。在整个 30 年代，受损程度较轻的家庭更愿意利用家庭选择，而不是求助于公共援助。正是在这些家庭中，人们可以最清楚地了解可供选择的经济支持模式。母亲就业和亲戚的资助明显地降低了这些家庭依赖社会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劳动阶级中，持续依赖公共援助说明这些家庭极端贫困而且一片混乱。有一个家庭曾六次申请公共援助，父亲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孩子成了其发泄失败和挫折感的目标，他们受到责骂、嘲弄和密切监视。无论孩子们做什么都不能讨得父亲的欢心。无休止的争执经常成为夫妻之间吵闹的导火线和威胁。其他经济受损的父母对他们的境遇则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在一例个案中，在访谈者面前父亲似乎显得过分"轻松自在"，而母亲则"对什么也用不着担心"。

简而言之，维持家庭生计的补充形式和接受公共援助，都经常被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的经济受损的家庭所采用。然而，

对劳动阶级的家庭来说，无论他们的经济受损程度如何，经济谋生的问题都显得更加严酷。在经济上未受损的家庭中，劳动阶级的家庭更常见的是接受亲戚的帮助、母亲就业和公共援助。1933年，这种家庭有4/5收入低于2,500美元，而中产阶级中只有1/3的家庭处于这个水平。在所有的样本中，1933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的家庭，劳动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两倍。在大萧条中，经济困难是大多数劳动阶级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特别是失业与经济受损接踵而至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发现，正是在这种境遇中人们才极度依赖于救济发放。

地位丧失对于父母的某些影响

大萧条中的地位丧失包括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两方面的变化。在家庭承受收入损失和失业的痛苦时，人们在20年代确定的期望比起自己达到的成就就显得过高了，期望获得的回报也显得过多了。大萧条之前爬得越高的人，在此之前在这上面投资越多的人，向下流动时的挫折感就越强烈。如果说从百分比来看类似的收入损失给那些刚好处在生存标准线以上的家庭带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那么它给地位高的家庭带来的最明显后果则是它们社会地位的丧失。

为了避免或减少"在社交场合跌份"的代价，这些家庭试图硬充门面来掩盖贫困和艰难的事实——"华丽的社交门面是当地家庭在邻居面前维持体面所必须做的"(Lynd and Lynd，1937，第145页)。在奥克兰和其他地方，社会工作者有时极难劝说中产阶级的服务对象把金钱花在基本需求上，而不是花在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重要的地位象征上。"老百姓看不见你吃的什么，"一位服务对象反对说，"但是他们知道你住在哪里"

(Bird,1965,第276页)。在奥克兰样本中,一位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儿回忆到,她的父亲在给她的母亲购买食品和衣服方面极端吝啬,然而却花费了在当时来说似乎是一笔巨款的钱来粉刷房屋,因为"粉刷一新的房屋大家都能看见"。

与地位丧失形成惩罚性对照的是,中产阶级父母在社会地位方面的投资,以及对别人的不幸加以嘲讽的态度,预示着中产阶级中遭受经济受损的父母将承受巨大的情感压力。对生活条件和地位的不满、压抑的情感以及怀疑个人价值等都可能与中产阶级父母所遭受的经济灾难有关系。尽管这种声望的受损不能与劳动阶级遇到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他们每天都会遇到的经济生存问题相提并论,下层人民相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还是处于一种不利地位,由此产生的社会对比还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许多调查都发现,处于底层的人更容易有闷闷不乐、不满以及其他烦躁不安的表现。[10] 这些观点使得经济受损和失业对劳动阶级的心理影响变得不确定了。

下面,我们将使用对母亲的采访和孩子的报告两方面的数据来确定经济受损对父母的影响。与这种影响有关的问题,还有保护自我以免受到负面评价和不利经历的伤害。社交门面(social front)和避开他人不参与社交活动,正是人们在地位确认中避免出现"无人赞誉"局面时自我保护努力的例证。在下面的分析中,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和酗酒也被认为是减少负面社会刺激的策略。根据现有的数据,大多数分析都集中于母亲身上。

---

⑩ 参阅N.M.布拉德伯恩、D.卡普洛维兹的《关于快乐的报告:与精神健康有关的开拓性行为研究》(芝加哥,1965)。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见布拉德伯恩的《心理健康的结构》(1970)。

对母亲情感状态的感受

在1932、1934和1936年的家访后，访谈者根据七级评分量表来评估母亲的情感状态和作用。为了增加这些测量的可靠性，根据每一评分量表评估的分数都是这三年访谈的平均值。一种五级评分量表专门用来作为预测萧条心理影响的适宜指标。下面这些标题描绘了每一评分量表中什么样的情况给予高分：(1)对很多都不满——家庭的各种条件不能满足其期望；(2)无能的感觉——感觉低人一等，惶恐不安；(3)疲乏——疲倦的外表，衣着不整，缺乏安定感；(4)安全感——心情轻松，没有烦恼，无忧无虑；(5)不洁的外表——衣着和鞋子不合适，并且破损不堪，仪表邋遢。作为判断，这些评分也许与样本中母亲真正的看法大相径庭。没有得到有关母亲对经济受损主观反应的自我描述。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把经济未受损的群体同经济受损而且父亲有时失业的群体加以比较。

一般来说，劳动阶级的母亲身上更多地表现出情感上的忧伤，而且在这个次群体中经济受损的程度对这种症状影响不大(表A－4)。即便那些来自收入最低并且最为依赖救济会的经济损失极为惨重的家庭的母亲，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那些经济上未受损家庭的母亲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只是有少许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

不过，中产阶级中的这两个群体出现了实质性的差异，它们主要与失业和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地位丧失这种后果有关。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向下流动主要与失业有关。那些来自丈夫失业的家庭的母亲更不满、更疲劳、更有无力感和不安全感。她们在外表上也比那些家庭受损程度较轻的母亲更加邋遢。在这些母亲中，其情感忧伤程度的证据，同对劳动阶级中蒙受各种程度经济受损的母亲的描述极为类似。更广泛

地来说，中产阶级中的这个次群体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萧条研究发现的主要体现者，它表明了中产阶级和地位较低群体在不满这个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①]

虽然和中产阶级的父母相比较，我们并不认为地位的丧失对劳动阶级父母的情感状态有强烈的影响，但事实上缺乏任何可辨别的后果，无法说明遭受不同损失的家庭在客观生活境遇上的实际差异。有助于说明这个结果的一个因素是，访谈者对劳动阶级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差异的感觉相对迟钝。中产阶级的标准使他们的判断存有偏见。由于孩子对父母的介绍并不带有外在观察者的文化偏见，而且更加了解家庭压力的实际状况，所以我们将把它们与访谈者给予"诸多不满"这一项的评分做比较。下面的陈述说明了孩子们的感受："我希望我的妈妈更快乐"，这是从列出了孩子们的一系列希望并在孩子上中学时进行调查的问卷中得到的。孩子们被引导着只去注意那些能够反映自己真实感受的愿望。

在所有的样本中，对母亲的两种评估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对那些声称希望"母亲更快乐"的男孩和女孩来说，在"诸多不满"一项上，他们的母亲可能被访谈者排在平均值以上（tau_c = .36），而在中产阶级中这种关系更为密切。然而，劳动阶级孩子的感受的确受经济受损状况的影响更大，而不是访谈者的评分。希望妈妈更加快乐的比例，从在经济未受损的劳动阶级家庭的49%上升到经济受损家庭的68%，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中这种差异就更大（38%对70%）。尽管劳动阶级的母亲的个性化存在差别，但访谈者和孩子的感受一般都与我们最初的想法一致，也

① 参阅H. 科恩豪泽：《经济群体的态度》，载《公共观点季刊》，第2期（1938），第260—268页。

就是说中产阶级所受到的心理影响更强烈。

我们认为，中产阶级为经济受损所付出的心理代价更多地来源于声望的下降，而不是经济上的损失，劳动阶级则可能恰好相反。因为这些人在经济萧条之前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更关心的是基本的需求而不是社会地位。检验这一假设的差别的一个办法，就是比较两个社会阶层中影响声望的因素和有关母亲态度的经济因素。我们选择邻居们在1934年的地位作为衡量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指标。在奥克兰，一个家庭邻居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其社会地位极为明显的象征。在城市中，“山上(Hill)”、“商业区”和“公寓区”指的是地位悬殊的地区，但是住在奥克兰山上和住在公寓中的中低收入的邻居之间的声望差异更为显著。就经济受损导致通过改变居住地点来降低声望的程度来说，象征社会地位较低的居住环境是使中产阶级心存不满的一个潜在因素。

家庭的经济需求和压力部分地与家中孩子的数目有关。家庭规模越大，经济需求就越大，每个孩子能享受的家庭收入的份额就越少。家庭规模提供了衡量经济压力的客观指标，这种压力与对地位的看法基本无关。家中孩子的数目既不是收入相对减少的原因，也不是其后果，把它看成是传递经济受损影响的情境更为恰当。一般来说，劳动阶级家庭比中产阶级家庭有更多的孩子要吃饭、穿衣和住宿，因此这个特点可能部分地说明了地位低下的母亲为什么不满情绪非常普遍。

为了分析两个阶级中邻居的地位(1934)和家庭规模对母亲不满情绪的影响，我们按中位数把前一个指标对分，把家庭规模也分成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和有三个孩子的家庭两部分。通过调整经济受损和就业变异的多元分类分析(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我们评估了这些因素对于心怀不满的母亲(评分在均

值以上)人数的百分比的主要影响。[12] 数据显示,只有在中产阶级中邻居的地位才使母亲的不满出现差异(住在地位较低地区的母亲有51%感到不满,而住在地位较高地区的只有26%感到不满),而有二个或更多的孩子只是在劳动阶级中增强了母亲的不满情绪(从56%上升到80%)。

在谈到居住地区的地位低下对中产阶级母亲的影响时,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代表了家庭因经济受损和失业之故声望明显下降了。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经济受损和居住在地位低下的区域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tau_c = .24$),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经济受损真的导致了居住区域的向下流动,从而它又引发了母亲的不满情绪。关于住所变化的确切数据无法完全得到。不过有两种观点使这种解释变得令人可信。首先,在劳动阶级中,邻居的地位和经济受损之间并没有关系,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影响到地位低下的母亲的不满程度。其次,居住地位的变化主要是使那些家庭收入损失相当大的中产阶级母亲的态度出现差异。居住地区地位低下,如果同时又可能是经济受损导致的后果,它才会成为挫折的主要源泉。处于这种境遇中的母亲比那些居住在高尚住宅区的经济受损的母亲更加愤愤不平,而居住在高尚住宅区的经济未受损的母亲不满情绪最小($\overline{X}s = 4.5$ 对 3.8, $p < .05$;居住在高尚住宅区的经济未受损的母亲的平均值为3.0)。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母亲在婚后所处的阶级和家庭境遇这些情境下的态度。这种分析框架忽略了两类同样影响着

⑫ 多元分类分析允许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定类自变量(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s),比如邻居的地位;并可以通过根据所有变量的共同影响在统计上矫正的次阶级群体的百分比,来同时控制所有的检测因素(test factors)。我们不需要有关每个因素线形影响的假设,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这些因素交互影响的估计。参阅J. W. 摩根等:《美国的收入和福利》(纽约,1962),附录A。

这种态度的经历——与同龄人(兄弟姐妹、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关系。从分散的定性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了一些表明祖父母辈人对奥克兰的父母和孩子的生活,尤其是在萧条的境遇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富有启发性证据。他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同住一个屋檐下,为作为评价者和标准承载者的祖辈形象的真实性增添了几分说服力。

很不幸的是,虽然祖父母是经济受损家庭生活境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却被人们忽略了。除了他们的出生地点和日期外,没有任何来自于他们本身或者间接来自他们孩子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估计大多数祖父母出生于1855年到1870年之间,是来自欧洲或美国东部的移民。这个出生组共同经历了全美国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特别阶段——城乡间的迁移和西部的开拓,急剧的工业化,由于萧条和战争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错位。祖父母辈的这种经历在大萧条中通过对家庭地位和抚养孩子的方式的影响,至少以三种方式与父母的境遇发生了关系。作为未来研究的假设,我们认为父母对于境遇的解释与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的反应,都受到了源于家庭对孩子的抚养方式的社会经济期望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使他们为适应经济跌荡和艰辛做好准备的早期经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代际间比较的影响(例如,妻子有把丈夫的业绩同自己父亲的成就相比较的倾向)。

孩子眼中的父亲

在这项研究中,现成的有关奥克兰父亲的观点只有一种:在子女眼中他们的性格特点。我们没有询问这些父亲与父母、姻亲或妻子的关系,对于母亲也没有询问她们对丈夫行为的态度。这方面资料的缺乏也说明在30年代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

父亲对孩子抚养的整个过程相对不重要。不过，奥克兰的孩子们在30年代初期年龄已足够大了，所以他们能够注意到更大社区中的经济状况。而在这种状况使家庭受到伤害时，父母的解释部分地构成了这种环境的含义。（如果要了解10岁和11岁孩子对贫困的了解，可以参见Estvan，1952。）

在一份对高中学生进行调查的问卷中，我们要求孩子们提供他们所了解的父亲的道德情操和在社区中社会地位的信息。那些希望自己的父亲更加快乐的孩子，提及父亲没有什么道德感，而且原先更加轻松、乐观的态度突然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可能比情绪稳定更能引人注意。有关对父亲期望的陈述与对母亲的相类似，都被包含在一份表明孩子的愿望或希望的清单中。孩子们不太可能放弃对父亲的希望，对母亲则有可能如此（只有20%的孩子对母亲抱有希望），也许是因为他们与母亲接触更多的缘故。这些孩子中有90%以上来自经济受损的家庭。那些父亲承受失业和惨重经济损失等极端痛苦的孩子，大多数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快乐的父亲，而且这种愿望并不因为孩子所处的社会阶级或者所属性别而有什么不同。

与我们有关中产阶级声望下降的假设相吻合，经济受损使这个阶层中的孩子对于父亲社会声望的感觉出现最大的差异。在中产阶级中，迁移到邻近地位低下的地区和失业是中产阶级地位下降较为明显的标志。这种变化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失业的中产阶级父亲最终找了一份蓝领工作，具备了与职业和服装样式相关的劳动阶级特征。有关父亲"是否是社区中受人尊敬的人"的感觉的九级量表，被用作衡量被感觉到的父亲社会地位的指标。有关这一量表的分数是几个评分的平均值，它把三个评判人通过阅读对研究对象进入高中时的调查所获得的自我报告和观察的资料所获得的评分加以平均得出。

除了发生在萧条时期的地位变化外，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劳动阶级的孩子更看重自己父亲在社区中的地位($p<.01$)，而男孩和女孩的这种看法没有差别。在中产阶级中，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感觉到父亲的地位比受损家庭的孩子感觉到的高很多($\overline{X}s=6.8$ 对 5.6，$p<.01$)。甚至这两个群体的父亲在 1929 年的职业和教育地位都很接近时，这种差别依然存在。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数据显示存在一种贬低失业父亲的不太明显的倾向。再看看劳动阶级的情况，我们发现经济受损对孩子们的感受没有多大的影响。同经济受损的父亲相比，经济未受损的父亲在地位上并没有让人感觉明显地高出一头。尽管这两个阶级中经济受损的家庭在 1933 年的经济地位都相当类似，但是中产阶级父亲明显较高的地位却体现了他们在家庭背景、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p<.05$) 在所有的对比中，1929 年家庭地位对孩子们感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孩子们对父亲的评价受到母亲对父亲态度的影响。在这方面，如果母亲公开指责地位下降完全是因为丈夫无能，那么孩子明显地会对父亲的失败更为敏感。人们从母亲那里不能了解到这样的态度，但是通过访谈得到的定性资料表明，母亲对父亲的责备影响到了孩子们的态度。有这样一例个案，一位商人在 1931 年失去了商店和用于投资的资本，从此祸不单行，他后来找到的工作大多数社会地位都非常低——比如门警、夜间看门人等。他的儿子长大成人后，回忆起他的母亲完全被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压垮了。他的母亲通过语言、表情和行为对父亲的工作和地位大加责备。“对一个曾经总是拥有一定财产的母亲来说，必须屈尊去古德威尔为孩子买衣物实在是太困难了。”最终，儿子也学会了这样对待父亲。他还能回忆起，当在学校有人出于礼貌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时候，他只得去问母亲

父亲是"做什么的"。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他都试图回避需要介绍父亲的地位和家庭社会地位的境遇。"这样做当然过分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这个家庭不能代表1930年属于中产阶级可后来又严重受损的家庭，因为只有极少家庭最终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不过，这例个案的确证明了母亲在创造情感氛围中所处的重要位置，而孩子们正是在这个氛围中形成了自己的态度。

作为对地位丧失的防御性反应的退缩

当人们似乎已被各种事件或者条件击溃或者一切问题似乎都无法解决的时候，从这种令人紧张的境遇中退出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远离这些负面刺激是不参与社会活动和酗酒的一种功能，而这两种状况都与男人在经济方面所受到的挫折有关。[13]减少参与协会活动的次数和同家庭以外的联系，是失业付出的代价之一，但这种行为开始并不带有防御性。可是随着萧条时期的延长，与社会隔离就带有了避免他人不利议论的深一层含义。根据巴基(Bakke)的研究，这似乎是某些家庭从邻居那里"无法获得称赞"的一种反应。酗酒通过短暂地缓解内在的不适(压抑的感受等)，延伸了社会隔离的这种功能，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敏感性(social sensitivity)。

在奥克兰样本的父母中，限制家庭的对外交往和酗酒这两种情况都主要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失业相关。在1934年的访谈中，根据家访和协会成员的定性资料，人们把父母与外界的交往

[13] 巴基的《没有工作的市民》(1940)和安杰尔的《家庭遭遇大萧条》(1936)中所做的个案研究是有关这种关系的丰富的定性数据。有关社会参与的更新资料，可参见H.波普：《"中产阶级"工人群体中的经济受损和社会阶级参与》，载《社会问题》，第11期(1964)，尤其是第297页。

分成了三类(交往广泛、一般、交往很少)。整个家庭的参与和非家庭的参与之间也不可能区分开来。中产阶级父母中有60%属于一般性地参与外界活动,15%的父母属于社交广泛一类。劳动阶级家庭中没有社交广泛一类,有44%的家庭属于一般性地参与外界活动。

在中产阶级中,失业会使父母的参与出现显著差异。在失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有半数的父母被划定为只是一般性地参与外界活动;而在无人失业的家庭中,至少有85%的父母是一般性地与外界交往。除了失业之外,经济受损并不影响社会参与。在参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的劳动阶级父母中,经济受损和失业对参与都没有影响,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社交面局限于亲属范围的缘故。这些数据不能确定因果关系,而中产阶级中失业的显著影响与这个阶层地位下降的心理影响一致。

那些让孩子们感觉到有"酗酒问题"的父亲,在大萧条中至少曾失业过一次:2/5的失业父亲被如此描述,而其他家庭的父亲只有8%。在失业的劳动阶级父亲中,酗酒人数所占比例还要略高一些。因为这些数据来自孩子们在1964年的回溯性报告,因此它们的有效性还不能确定。不过,30年代的访谈资料提供了大量既是失业的原因又是失业的后果的酗酒个案。那些丢掉工作的父亲增加了酒的消费量,但这又增加了他们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即使是在经济条件改善以后仍是如此。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两个阶级中,酗酒的父亲多多少少代表了不能恢复在大萧条中失去地位的家庭。

评 论

30年代遭到破坏的经济环境对奥克兰样本中家庭的影响，既不完全一致也不是完全随意的。1929年到1934年期间，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平均损失在50%以上，而且一些受损家庭减少的收入已经略微超过生活费用的下降。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两个阶级中，父亲的失业都是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中产阶级中，开办企业的父亲最有可能失去的是收入，而白领阶层常常失去的是工作。在劳动阶级中，失去经济收入的厄运大多降临在出生在国外的父亲身上。在这两个社会阶层中，没有失业的人的受教育程度比失业人员略高一些，但在年龄上他们与其他人并没有区别。

我们在1929年所划定的社会阶级的情境中，按照1929年到1934年间相对的收入损失来定义经济受损。这些家庭在1929年的阶级地位，显示了适应经济变迁的两类资源，并勾勒出定义这种变迁的参考框架。把有关家庭经济调整和生活费用变化的定性信息作为指导，我们把收入损失分成两类：相对经济未受损的（低于35%）和相对经济受损的（损失惨重）。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损失百分比的平均值比未受损的家庭高三到四倍。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的人最多，但是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这一类家庭受损百分比的平均数很相近。

经济受损和失业使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家庭氛围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30年代家庭不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向下流动，主要与失业和经济受损有关。由于奥克兰的大多数家庭在1941年的阶级地位与1929年相同，那些最终无法恢复原有地位的一般都是由一个有着失业史的父亲当家。这些父亲的酗酒使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地位、名誉、邻居的档次的最明显

标志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一些家庭成了经济灾难的受害者。

父母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既依靠家庭收入也依靠来自公共资源的收入。在两个社会阶级中，母亲的就业、亲戚的资助和房租以及对公共援助的依赖都与家庭受损有关，但是在劳动阶级家庭中这种现象最为普遍。公共援助是处于无休无止的失业家庭"最后的求助手段"。经济上捉襟见肘和父母面临这些难题的适应性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劳动密集型活动的增加，这使孩子们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母亲的就业，可能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在后面的章节中，有关孩子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和他们与经济状况的关系，完善了我们有关家庭在维持生计方面的内容。

经济受损和失业的意义，部分依赖于声望下降和经济压力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这些代价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家庭中，但是声望上的考虑似乎在中产阶级父母的不满和可感觉到的地位中更为突出。在访谈者的评分中，对中产阶级的母亲来说，经济受损与失业同不满、缺乏安全感及身心疲惫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当遭受经济受损的同时还伴随着迁移到邻近地位低下的地区时，那么它就会引起强烈的不满，还有些研究发现居住地的向下流动是挫折感产生的根源。作为与孩子相关的问题，父母的不幸增强了孩子对父母经济受损状况的认识。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不同，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也感觉自己父亲的声望较低。父亲在家庭以外的活动受到限制和酗酒，都表明了丧失地位所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这也是在经济受损家庭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劳动阶级家庭中，经济受损并没有强烈地影响到孩子对父母的看法。劳动阶级的地位下降不那么明显，以及同中产阶级的社会对比，也许可以解释劳动阶级家庭在经济上的迫切需

求。无论如何，母亲不满情绪的评分更多地与家庭规模而不是与经济受损、失业或邻居地位低下有关。在中产阶级中，父母的不幸对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来说更成问题。但是在这个次群体中，经济状况对孩子的影响要比对家庭地位较高孩子的影响小。此外，家庭经济受损的状况不会使孩子对父亲在社区中社会地位的感觉出现显著差异。基于这些阶级差异，有人认为经济受损和失业对中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影响更为深远。正如人们所知，男孩感觉到的父亲在社区中的声望，决定着他赶上和超过父亲的愿望。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地位丧失所带来的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后果。

前面对家庭变迁和适应的总结提供了一个经验性研究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经济受损和未受损孩子的估计的假设一致。很明显，对于孩子在家庭谋生中的角色来说，对于家庭中的夫妻和亲子关系来说，对于孩子的自我想像和社会活动而言，与经济受损和失业有关的地位的实际变化程度对以上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数据也使人们对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的生活成就和心理健康产生某种怀疑。

第四章
家庭经济中的孩子们

> 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生活……但是孩子们已能从事有价值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这也给人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
> 马戈特·亨托夫：《纽约书评》①

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参与经济活动，是两种适应策略的组成部分。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提到的那样，经济受损的家庭一方面削减开支，另一方面也开辟多种收入来源。前一种策略使家庭经济变成劳动密集型，通过这些劳动换取那些从前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下厨房、做衣服、家庭修理等等。这些活动和收入的特殊来源，例如出租房屋等，一般都会更多地利用孩子们的劳动。由于大多数家务活传统上都是家庭主妇操持的范围，女孩在这方面承担的工作就特别多。

家庭努力增加收入的活动包括让孩子们通过参与社区工作

---

① 见 M. 亨托夫对于 L. I. 怀尔德的《小小家庭丛书》的评论：《孩子们，穿上你们的袜子：对于儿童书籍的评论》，载《纽约书评》，第 20 期（1972 年 4 月），第 15 页。怀尔德的故事，开始于她在一个非常开明的家庭中的幼年时代（大约是 1860 年代），不过这段时期的经历和城市孩子在大萧条时期的经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从社会角色来说，经济上蒙受惨重损失的孩子和怀尔德（而不是和现在富裕家庭中的孩子）更为相似，这一点在亨托夫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发问中有所提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使这些年轻人重新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吗？"

赚钱。除了父母的要求和鼓励外，这些活动也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和了解家庭需求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对奥克兰的孩子们来说，经济活动的范围有限。在大萧条初期，他们仍然在上学，而且年龄还太小，不允许从事全日制工作。虽然30年代打零工的工资很低，但是他们仍然乐此不疲。这包括送报纸、照看孩子、充当门卫助手、商店职员和送货员。根据文化传统，男孩比女孩更可能承担经济角色。

孩子们卷入家庭经济事务之中，不单单是尽快融入成人世界的一个标志，尽管它意味着成人在大萧条时已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向下传递给了孩子。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实际活动，和年轻人的工作取向更加一致，而和年轻人文化中"不负责任"的主题——30年代以后出现的普遍现象——更加不一致。[②]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比较来自经济未受损和经济受损家庭孩子们的行为方式，这些方式反映了对成人生活现实的一种取向，它表现在30年代男女两性彼此不同的世界中：支配金钱的成熟判断力、可靠性、男孩的社会独立性、女孩对家务的关心程度、对于成人伴侣的兴趣以及取得成人地位的渴望。[③]

孩子们的经济角色和家庭角色

在1936年的访谈中，我们对被采访的母亲提出了一系列问

② 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年龄和性别》，见C. 克拉克洪和H. A. 默里编：《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第二版（纽约，1953），第269—281页。

③ 在有关工作角色的研究中，一种长期以来被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就是工作塑造行为。不过，有关这个问题的经验研究的知识依旧是非常初步的。这个领域中更有启发性的研究，可以参见布里尔和洛克：《作为态度来源的工作经历》（1965）。

题,用以探讨孩子们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这时经济上最为窘迫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经济受损的各种条件仍然笼罩着30年代后半期。访谈的时间恰好可以涉及到孩子对维持家庭生计做出重要贡献的能力。30年代中期,他们的年龄已经使其能够离开家庭和脱离父母的监督独自应付要求苛刻的工作。

根据母亲的陈述,有2/5的孩子在打零工。男孩中半数以上至少从事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而女孩中这样的人数只有1/4。为了衡量孩子们在家务劳动中的表现,在访谈中还提及经过挑选的家务杂事和难题,以测试他们的反应。与能影响孩子品质的就业不同,孩子们对家庭的帮助程度不一定要通过安排孩子所做的家务杂事体现出来。不过在数据中,因为孩子提供的帮助和其反应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对它们的测量都包含在一个指数中。我们提了五个问题:三个问题涉及家务杂事的处理(收拾房间、下厨房、帮做其他家务),另外两个问题表明了孩子的反应(不需提醒便提供家庭帮助、怨言不断)。母亲们对上面五个问题中至少三题的肯定回答,被界定为衡量卷入家务劳动的方法。尽管样本中的大多数孩子都参与了家务劳动,但是这种活动模式在女孩中尤其普遍(82%对男孩的56%)。

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就业和做家务都与经济受损有关,但是男孩倾向于前者,而女孩则倾向于后者。由于阶级差异忽略不计,表2就只列出了经济受损和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社会阶级使这些结果出现差异的观点,特别适用于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里就业的女孩(44%,样本中其他的女孩仅为16%)。由经济状况所导致的从事某项具体工作的差异,在男孩中最为常见。有40%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从事的是有薪水的职业,而不承担家务。相反,大多数工作的女孩也要做家务

活，90%以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都对家庭经济有所贡献——她们或是从事家务劳动，或是参与经济活动，或者干脆就是双肩挑。另外一个极端则是，许多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不认为自己有操持家务或者外出就业的责任。有42%的女孩既不操持家务也不外出就业。

表2　孩子们的经济角色和家庭角色

（按孩子的性别、经济受损和父亲的职业地位划分）

经济受损与父亲的职业地位	就业和做家务的男孩和女孩的比例[a]			
	就　业		做家务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经济未受损	42(37)	16(26)	69(37)	56(26)
经济受损				
被雇佣数	57(21)	19(20)	46(21)	92(20)
未被雇佣数	72(25)	43(27)	43(25)	89(27)

注：在多元分类分析中，为了避免社会阶级(1929)的影响，可以对百分比进行统计上的调整。在对相关性的参数和非参数测量中，就业和干家务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系数都不到0.08(r，Kendall's tau_c)。对每一种性别和工作群体中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人群的比较，得出了如下结果：工作角色——男孩(x^2=5.0，1df <.05)和女孩(x^2=1.5 n.s.)；家务杂事——男孩(x^2=5.3，1df.<.05)和女孩(x^2=12.4，1 df.<.01)。

a　每个百分比旁括号中的数字代表个案数，百分比正是根据其统计出来的。

家庭地位降低和资源减少的后果之一是增强了孩子们对父母所做的投入的意识，要在从前，他们会认为父母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投入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投入既包括为整个家庭提供收

人的努力和技术，也包括投入到家庭建设和照料孩子的劳动。经济短缺揭示了消费互惠互利的一个方面，它让人们学会了彼此负责。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经济受损逐渐改变了父母们放纵孩子的欲望的单方面依赖格局，使孩子们在照顾自己和满足家庭需求方面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从有关奥克兰家庭的定性数据来看，我们发现，父母在角色方面的典型变化是把责任转交给孩子。父母专心致志地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和开辟收入来源，父亲因失业而离开家庭到社区外去寻找工作，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的情绪压力导致父母疾病缠身，以及父母不能为孩子交学费、买衣服和参与社交活动提供经费等情况，都是这种变化的例子。这种状况经常使孩子在家庭中处于承担责任的位置，面临着担负维持家庭生计重担的挑战。

大多数参与工作的孩子都只有一份工作，但也有一些孩子同时兼做两份或更多的工作。比如，有一个负担沉重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一边送报纸，一边还在街上叫卖自己制作的烟灰缸，在父亲去洛杉矶找工作时还帮助母亲做家务。另外一个更加年幼的孩子，既在学校的餐厅洗碟子，又在放学后指挥六个孩子递送货物。奥克兰孩子中有6个在帮助父亲干活的同时，还偶尔在社区从事有薪水的工作。女孩通常的工作模式是为邻居照看孩子和在本地商店中当售货员。[④] 尤其是在经济受损惨重的家庭中，孩子的收入也有一部分用于家庭的基本开支。

我们已经解释了孩子的行为和经济受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劳动和经济需求所导致的后果。家庭需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母亲是否有工作。母亲就业有可能

---

④　有关工作种类、时间和工资的系统资料不是来自于奥克兰的孩子或者他们的父母。因此，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一段中提及的例子是否普遍。

增加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和需求。[5] 因为职业母亲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极为普遍，这种适应性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在这些家庭中是女孩们在操持家务。事实上，如果母亲就业，那么无论家庭中的男孩还是女孩都可能比其他年轻人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在控制经济受损这个变量的情况下，平均百分比差为13）。尽管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更愿意工作而不是做家务，但在母亲就业的家庭中有工作的男孩不一定更多。作为收入的补充性来源，母亲就业减弱了孩子寻找工作的动力。无论如何，数据显示母亲的就业对男孩和女孩的工作状况没有正面影响。

经济受损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而不同的情境对孩子们的角色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家庭文化，有的可能鼓励孩子去承担责任，而有的则反对这样做。有关孩子角色的两种立场，从自谋职业的父亲的企业家伦理（entrepreneurial ethic）与出生在国外的父亲的传统家庭信仰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新教伦理的倡导者、处于创业阶段的父亲会非常乐意让自己的孩子艰苦奋斗和参与经济活动。这种价值取向的其他方面还包括个人的责任、节俭和自我抑制。在传统的家庭文化中，工作经验和家务劳动一般被认为是对孩子有益的活动，但这是根据孩子的性别分配的——男孩外出闯荡，家务琐事则留给女孩去做。

同家庭的其他社会属性相比较，孩子的数量对家庭的劳务和经济需求的直接影响更大。随着孩子的增多，家庭管理的范围也必须扩大，对孩子的照料和关心的要求也增加了，但实际上每个孩子能够得到的照料和关心却减少了，每个家庭成员能享

---

[5] 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明特恩和兰伯特发现如果母亲对于家庭经济做出贡献的话，孩子会感到必须肩负某种责任的巨大压力。《六种文化中的母亲》(1964)，第271页。也可参阅P.罗伊：《青春期的角色：城乡间的差异》，见Nye and Hoffman, 1963，第165—181页。

有的经济资源也相应地减少了。在大家庭中，较大的孩子分担着成人的责任，而在小家庭中这些责任都是由父母承担的。[①]因此，大家庭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与经济受损家庭的经济相似。孩子在经济受损的大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显然比在规模较小的经济未受损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企业主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年轻人更有可能认同按照性别分类的角色，但是这种影响完全由这些家庭中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父母的血统和家庭的规模对孩子扮演的角色具有某种独立于经济之外的影响，而且这两种因素都与经济受损状况有关。不过，它们都不能解释经济受损对孩子行为的影响。

在对出生在国外的母亲进行访谈时，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孩子被迫分担家庭责任。在一个母亲出生于瑞典的家庭中，尽管条件十分恶劣，孩子们还是"尽其所能地分担着家庭职责"。这位母亲还特别强调，甚至只有5岁的最小的孩子也帮助干点儿什么。一位来自西欧的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也谈到了同样的看法。她有四个孩子，每个在家都做些事，而且他们互相帮助。一般来说，这种看法与父母出生在国外的家庭中女孩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即使不考虑经济受损这一变量，这些女孩也会比那些父母出生在本地的女孩更多地分担家庭责任（差异为14%）。除了这种影响之外，父母的外国血统对女孩工作地位的负相关程度较弱，只是与男孩在经济上和家庭中的角色略为相关。

家庭规模最显著的影响可以在男孩的工作角色中看出来。2/3的有三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男孩有工作；而在较小的家庭

---

① J.H.S.博萨德：《父母和孩子》（费城，1953），第6章。承担责任的压力和家庭规模的关系，可以参阅明特恩和兰伯特前引书，第271页。

中，只有44%的男孩有工作。在家庭中承担一定家务的女孩的比例也是大家庭高，小家庭低，但是差异没有那么大(17%)。无论是社会阶级或经济受损状况都对这些结果没有明显的影响，虽然在经济受损的大家庭和经济未受损小家庭的孩子的活动之间具有天壤之别。在前一群体中，有3/4以上的男孩就业，而后者就业的比例只有1/4。这两个群体中女孩承担家务的对比同样鲜明(88%对47%)。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我们没有发现年长的孩子比年幼的孩子更可能外出挣钱或者在家里帮忙。而且在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中，这种结果也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已有证据表明，最年长的孩子通常在家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事实上，有些母亲明确表示，她们希望长女在做家务和对弟妹的照料方面担负起管理的职责。其中一位有三个弟弟的女孩，其母亲称她在料理家务方面分担了许多工作。在只有一个孩子的特殊情况下，年龄较小的孩子在承担责任方面的差异最为明显。甚至在经济受损最为惨重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也很少像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那样外出就业和做家务。

有两个条件特别值得注意，是它们决定了孩子在家务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受损和大家庭。经济受损引起了劳动和经济上的需求，这使女孩介入家庭事务，男孩外出就业，而且引导了父母的适应性(如母亲外出工作)，这种适应性增加了孩子在家庭经济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的价值。由于母亲就业不是孩子承担家庭角色的潜在原因($r=.12$)，所以它引起的这种活动和经济受损之间的相关性也相对微弱，但是它作为家庭中相互依赖的例子在理论上很重要。母亲角色的转换引起孩子的家庭角色转换。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可以得到1934年母亲就业地位的数据，而随后两年的数据则欠缺，因为这时注重的是收集孩子

角色的资料。因为1934年的数据可能使我们对1936年母亲的就业做出一个合理的估计，任何错误都必然会降低这种适应对家庭运作和孩子在其中所承担的责任的影响。

家庭是否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孩子，在预测男孩和女孩的性别分工方面，是仅次于经济受损的最重要的晴雨表。就男孩的工作经验来说，家庭受损的主要影响大于家庭规模的影响（$\beta=.29$ 和 .22），对女孩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影响也更深远（$\beta=.32$ 和 .13）。[⑦] 在经济受损的环境中，大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和需求似乎处于最大状态，然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证明这种变化的资料。在经济受损的状况中，孩子的数量对孩子的角色没有明显的影响，而经济受损对大家庭中孩子的行为也没有更强的影响。

在整个分析中，我们已将家庭系统当做解释经济受损家庭孩子的经济角色的参考框架。根据这种观点，孩子寻找工作是为了满足家庭经济需求和缓解家庭所承受的压力。他们对家庭状况的了解程度与这种解释的关系无法验证，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说明客观的经济受损是否以及怎样在奥克兰孩子们的主观世界中有所表达。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家庭实际的困难程度。这种现实和认识之间的差距，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在一些经济受损程度最深的家庭中，许多男孩仍然没有外出工作。

我们估计在经济受损的情况下，个人的需求或孩子的欲望

⑦ 这种标准回归分析中的所有变量都是二分的：经济受损一项分为"经济上蒙受惨重损失"和"经济上未蒙受惨重损失"；家庭规模分为"家中的孩子不到3个"和"家中有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男孩的工作经历分为"有"和"无"；女孩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分为"分数0—2分"和"分数3—5分"。经济受损和家庭规模与男孩工作经历的相关系数为.33和.30，和女孩在家中承担角色的相关系数为.42和.16。

与他们对家庭环境的认识相关。对家庭困难的认识，包含在那些感到钱不够花并且渴望能够更好地控制其生活境遇的孩子对未来的展望中。尤其对男孩们来说，在经济困窘的境遇中，有薪水的工作是这些动机取向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出路，而且数据显示了家庭受损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简而言之，我们发现那些超过了其同龄人经济状况的花费金钱的愿望，在来自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受损家庭的男孩中极为普遍，而且在有份带薪水的工作的男孩与没有这类工作的男孩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他们是否来自经济受损的家庭。同样，那些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和那些有工作的男孩，在上中学时最可能被描述为在社会抱负（social aspiration）方面雄心勃勃。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认为他们最渴望通过建议、劝说和命令实现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控制。即便是在经济受损的人群中，这种抱负也是有工作的男孩的主要特征。[8]

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无法确定经济的或支配的欲望是否会导致孩子外出工作。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经济受损的意识诱发了就业，但是也有人会争辩说，挣钱的努力增加了经济上的欲望。这两种结果都是可能的。工作的发展过程也支持这种假设，也就是说工作既表现也增强了那些来自负担沉重家庭的男孩的支配欲望。

---

⑧ 这里提及的所有家庭经济受损和工作地位所导致的差异，从统计学上看，在.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经济上的欲望用高中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来衡量：是否他们在花钱上比同学更多（倾斜量表，分数从1分到5分）。对控制环境的渴望，我们根据那些阅读过样本中孩子高中阶段的观察材料和自我报告材料的评判者给分的平均值。量表上的取值是从1分到5分。对这个量表更加详细的描述和其他的动机量表，可以参阅附录3。

孩子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完成的任务

一种在民间流传很广的有关养育孩子的看法，把让孩子做家务和外出打工看成是为了成年人生活做准备的非常有价值的见习经历。这种经历所能够带来的预想的好处包括：良好的工作习惯、可靠性、判断力以及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条件下懂得他人的需要（参见第二章）。社区中的工作角色也需要独立于家庭，并且能够提供自我指导的经历。就像适用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那样，这种解释描述了养育孩子中的一种成人导向的抚养模式（adult-oriented form of upbringing）。这些活动的另一方面指的是孩子们的贡献所要付出的人际成本（interpersonal cost），它指的是社会经历的限制、玩耍闲暇和验证现代青少年一般特性的实验。除了这些社会成本外，工作带来的下列结果与人格和成人价值观的关系尤其密切：涉及金钱使用的判断和价值观、可靠性、勤奋以及社会独立性（特别是摆脱父母的控制）。

离开家庭找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常常能够使孩子们了解金钱的价值，学会理财的技巧。有证据表明，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并在外挣钱的孩子，可能在财务上更负责任。[9] 尽管参与管理家庭事务应该能增加孩子对于家庭困窘的了解，但是有关经济事务的判断可能更取决于花费的钱是怎样挣来的。孩子们做家务得到报酬还是根据需要向父母要钱？至少后者能使他们掌握一点理财的经验。

经济受损家庭的各种条件使孩子们面临着道德挑战，这种

---

⑨ E.F.普雷斯：《有关训练孩子理财的家庭实践的定量研究》，载《教育心理学杂志》，第36期（1945），第411—428页。

挑战要求他们努力奋斗、诚实可信并充满生气。尽管大多数关于繁荣时期孩子的研究，都没有发现家务劳动能够培养对孩子发展有利的价值，但是经济受损家庭中经济和劳动力短缺创造出了急迫、现实和影响深远的需求，这种需求无论如何都无法人为地创造出来。在这方面，经济受损家庭中的孩子和农户家庭中的孩子的角色之间有一种相似性，这对我们颇有启发。在家庭农场中，劳动力需求是非常现实和重要的，工作要求苛刻而且成人化，孩子们似乎也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职责。(有关农村和城市孩子角色的令人有启发的比较研究，参阅 Straus，1962。)在这两类家庭中，孩子的劳动力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都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大多数有薪水的工作都需要孩子面对离开家庭和自我指导的境遇，尽管家庭的责任使他们更多地融人家庭的圈子。在经济困境中，职业能够使人们获得解脱。这种作用在男孩中最为普遍，因为相对女孩子而言，有更多的男孩子外出打工，特别是有些工作还要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家务活动除了会使孩子们依赖家庭并受到父母的监督以外，它也是家庭抚养女孩的一种重要模式，是她们学习建设家庭的方式。同那些经济未受损的父母们的女孩相比，可以说家庭经济受损的女孩更为依赖家庭和对家务事更有兴趣。

下面是对这些关系的经验研究，我们将从理财上的判断力开始。

理财上的判断力

除了家庭需求和购买力外，花钱和省钱的智慧取决于理财方面的实践经验。当一个孩子自己有笔钱可供支配时，考虑不周的消费对他自己(特别是对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对全

家都有直接影响。个人金钱可以通过有报酬的工作获得，无论是家里的工作还是外面的工作，或者来源于一种定期的津贴。和这些金钱的来源不一样，根据需要给孩子金钱的习惯（由父母决定）会逐渐培育出孩子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就像下面所显示的那样，女孩比男孩的经济依赖性更强，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家庭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上的依赖性对理财上的判断力有着负面影响。

就样本总体而言，能在理财事务方面给予孩子们一定自主性的经济资助在男孩中比在女孩中更为普遍。这种分析使用了两种来源的数据：一种是1936年对母亲进行的访谈，一种是1937年完成自我报告的问卷调查。在访谈中，母亲被问道：是否给自己孩子零用钱？做家务时是否给他们报酬？问卷所调查的是：孩子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父母要钱？在男孩中46%得到过零用钱、20%在做家务时有报酬，25%可以根据需求要钱。而得到零用钱和做家务能获得报酬的女孩的比例要小得多（40%对10%），大多数女孩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向父母要钱（61%）。正如人们所估计的，中产阶级的父母比地位较低的父母更容易给自己孩子零花钱，二者之间的平均百分比相差16%。

父母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视孩子是否有工作而定，因此主要是在男孩中，经济上不同的受损程度导致这种资助产生变化。这种结果反映了促使孩子就业的一些条件：经济上的需求，以及父母无法或者不愿意给他们零花钱。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这两个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都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得到父母的资助少，比如零花钱、做家务时的报酬或者必需的开支，但是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其工作地位所造成的。那些有工作的男孩在津贴和经济资助上，就比没有就业的年轻人的需要少

(30%对66%;15%对39%)。大多数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都从事家务劳动,1/3略强的男孩做家务时还有报酬。[10]

如果说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限制了孩子理财的实践经验,那么这种缺陷在女孩对家庭经济所负责任中最为明显。女孩工作的比例很小,而且她们帮助父母做家务时也得不到什么劳动报酬。特别是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承担家务重担的女孩常常是在需要花钱的时候向父母索要,而不是从父母那里得到津贴,工作的女孩从父母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金钱。

根据1936年的访谈,母亲更愿让男孩而不是女孩肩负理财的责任。76%的男孩被描述为既能省钱、又会合理花钱的孩子,而只有64%的女孩能做到这一点。在男孩中,理财方面的良好判断力与经济受损的状况有关(在经济未受损和经济受损群体中的差异为21%);但是在女孩中,这种判断力无论是因阶级还是因经济受损状况都不会起什么变化(百分比差异小于7%)。阶级背景和经济受损,在决定母亲的判断力方面显然不像津贴和工作那样有影响。

为了评估津贴和工作经验的主要影响,我们把这些因素也纳入多元分类分析中,这种分析能在统计上控制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这两个变量。[11] 我们根据就业和家务劳动的模式构建了三个因素(为了表示其性质,1=出现,0=没有出现):就业、从事家务劳动、什么都不干。分析中把男孩和女孩放在一起,因为这些结果不会因为孩子的性别而出现什么变化。母亲总是认为获得津贴的孩子在经济上的责任感比其他的孩子强(82%对

---

⑩ 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获得的经济资助,和斯特劳斯研究(1962)中的城市男孩在这个方面相似。在这两个群体中,都有1/3以上的男孩因在家周围做些杂事而获得报酬。

⑪ 这种统计技术的描述,可以参阅第三章中的注释12。

60%)，但是这种影响却小于就业和家务劳动的影响。工作的男孩中有87%被认为具有理财能力，而那些缺乏责任感的孩子具有理财能力的比例只有38%。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那些只在家中承担责任的年轻人(66%)。

影响经济上判断力的这些变量，在我们所研究的孩子走过青春期后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对于他们作为成人的经济行为有影响吗？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能够预测这些影响在未来发挥作用的足够证据。所能得到的数据只限于节俭的实践。根据1958年访谈所获得的数据，我们能够确认储蓄的规律性变化。大约有70%的回答者定期存钱。阶级出身、家庭经济受损状况、1936年的雇佣情形以及母亲对孩子在经济上的判断力，都在控制成人地位这一变量的情况下，根据上面提及的衡量经济行为的指标加以分析。在女性中，这些因素无法预测；那些节俭的男人们则很可能是在经济受损家庭中长大的，他们曾经外出打工，也许曾在少年时代就知道该如何理财。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是就业。80%曾在30年代外出挣钱的男人提到了节俭的计划，而当时没有外出打工的人中只有54%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

不管提出的证据是多么不堪一击，许许多多的研究对象都坚信大萧条时期的困苦状况使他们未来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差异，他们都倾向于把大萧条当做自己行为的注解。用一位年轻的白领工人的话说，30年代的困苦使他意识到"挣钱并不总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使你在花钱时会保守一点，特别是在支出超出你自己的财产时尤其要小心谨慎。"这种解释对我们了解经济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们的确为这些孩子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而且作为一种客观的教训对年轻人也不无意义。在1965年秋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171名大学生进行

的调查表明，父母对大萧条影响的回忆经常作为一种道德教训传递给孩子们。[12]

可靠性和勤劳

孩子们在大萧条中从事的劳动可以被看做是他们自己要求的行为。有报酬的工作要求守时、有礼貌、考虑周全和服从长者。如果家庭中和工作场所中的事情能够使孩子养成做事可靠和勤劳的美德，那么，当他们处于其他境遇中时也依旧还能保持这些行为模式吗？家庭以外的其他成年人也能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孩子看做是相对而言可信赖的和富有朝气的吗？

在衡量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从1937年的境遇评分表(Situation Ratings)中选择了三个量表(参见附录B)。每一量表都是由儿童福利研究所研究人员评估分数的均值和标准化后的数据构成，这些人都曾观察过孩子们在社会活动和学校事务中的表现。按照其行为表现出的特征，这三个量表是：可靠性——"在了解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并可靠地履行这种责任"；反抗权威——"故意违反规定，拒绝服从负责人员的要求，反抗权威"；勤劳——"朝气蓬勃，行动中专心致志"。

男孩在家庭中或者工作中的角色，不是因为他们的可靠性或者反抗权威而显得与众不同，这些分数既和经济受损的状况无关，也和他们所属的阶级无关。然而，勤劳却常常是工作男孩所具有的品质，它和经济受损的状况有关($p<.01$)。经济受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和就业的关系，如果就业这个变量被

---

[12] 参阅G.H.埃尔德：《大萧条经历对于家庭关系和抚养模式的影响》，未发表的手稿，1966年春季。

控制了，那么经济受损的影响就变得不那么显著了。[43] 经济困难似乎是对朝气蓬勃行为的一种刺激，正如巴基对经济受损家庭孩子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参见第二章），而且勤劳也可能使人更容易找到工作。此外，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学校、家庭和朋友的日常要求，这都是朝气蓬勃的行为产生的原因。

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在可靠性和勤劳方面，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得分略微高一些，但是社会阶级的这种差异或者影响在统计上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用人们观察到的女孩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角色来解释这一现象。那些只能在家中帮忙的女孩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最为普遍，而且她们的行为与那些不承担什么责任的女孩的行为非常相似。和这些女孩产生对比的主要是那些承担着双重责任的女孩，也就是那些既做家务又在外面工作的女孩（表 A－5）。她们在可靠性和勤劳上的得分明显高出很多。

以工作为取向的生活方式，在既承担家务又外出打工的女孩的行为中最为明显。但是，她们的这些社会特征更多地是经济受损带来的后果，还是在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完成社会化的后果？外出就业的女孩主要来自经济受损家庭，有 2/3 外出打工的女孩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两个社会阶级中外出打工的女孩都既可靠又勤劳。

另外一种观察大萧条中工作经历对于行为的影响，是采纳被访谈者的观点。但问题在于，责任是否增强了可靠性和勤劳的重要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用有关这些孩子成人后行为偏好的数据。1964 年进行调查的一份问卷，就列出了

[43] 观察者对于勤劳行为的评分，最不可能受有关男孩工作状况的知识的影响。所有境遇评估都建立在观察者观察到的与学校有关的活动的基础上。

包括可靠性和勤劳在内的孩子行为的16种特征，要求被研究对象回答他们认为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最希望拥有的3种特征。结果和我们的预期一致，看重可靠性的人最可能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少年时都曾外出打工挣钱。甚至在家庭状况好转和成人后生活改善了的情况下，经济受损家庭中有52%的人仍然偏爱行为可靠的女孩和男孩，经济未受损家庭中有这种偏爱的只有26%。这种影响显然比大萧条期间就业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无论是经济受损还是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二者对妇女的行为都没有明显影响。

在对过去的回顾中，工作经历有选择性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这种前提，建立在对奥克兰研究对象的某些社会角色可能无效的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中涉及到家庭和工作环境各种任务的持久性和需求的特点，它们都不是能直接测量到的。例如，就职业角色而言，这些任务在孩子成人以前对其行为的影响，可能会直接因为这两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缺乏经验研究所获取的论据的支持，我们也曾把孩子在1936年的家务劳动和工作看做是他们在整个大萧条十年期间适应经济困难的行为特征。很明显，为了提供一种测量这些经历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手段，我们需要一种详细记载这些行为的史料。

社会独立性和家庭价值

作为对经济受损的一种的适应性反应，收入丰厚的工作和做家务会给社会独立性(social independence)带来明显不同的影响。有薪水的工作作为对经济受损的适应性反应，意味着孩子在家庭之外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对于男孩来说更是如此；而做家务作为对经济受损的适应性反应，对女孩来说则意味着使她们能够参与家庭活动并受到家庭的限制。

在前青春期和青春期，社会独立性有两种必须加以区别的层面：选择同性朋友、社交地点和时间的自由；同异性朋友交往的自由，比如与男孩或女孩约会、晚上相互来往、单独出席晚会，等等。由于男孩对异性的兴趣和发育都滞后于女孩，比较性别群体的社会独立性的最适当指标，因此并不局限于异性间互动的数据。在1936年对母亲的访谈中，这种独立形式是由对于是否参加学校夜间社交活动这个问题的回答来加以衡量的。异性交往活动中的独立程度，通过对于孩子是否在周末的傍晚与异性交往问题的回答来加以衡量。对每个问题的肯定答案被确定是社会独立性的表现。女孩最喜欢在周末的傍晚与成群结队的男孩女孩交往，而男孩则更多地参与学校的夜间活动。

如表A－6显示，无论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在劳动阶级中，男孩的社会独立性都与家庭在经济上是否受损有关。这种关系在学校的夜间活动方面表现最为强烈，这部分是就业和它所起的让孩子摆脱束缚的影响的作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可能有一份工作（$r=.33$），而家庭经济受损又有一份工作的孩子同样也会参与家庭之外的学校夜间活动（$r=.21$）。在回归分析中（将经济受损状况和家庭地位看做是既定的），经济受损状况的直接影响显然比失业引起的间接影响强（betas＝.20对.15）。即使是那些地位较低的父母对孩子的监督，通常也远远不如中产阶级的父母那么严密，阶级背景不会使男孩在获得社会自由（social liberty）方面出现什么差异。

就影响的范围和持续程度而言，经济受损状况对女孩社会独立性的影响较小。在中产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在晚上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与同龄人交往，但是有意义的区别只出现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这种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孩子在经济或者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作用，而且

对于劳动阶级的女孩来说，这种结果会因经济受损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在劳动阶级中，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最具有社会独立性，尤其是那些既没有做家务的责任也没有外出工作义务的女孩。那些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女孩大约有一半参与学校的夜间活动，而在那些协助父母做家务或者外出赚钱的女孩中只有1/4。这种能够解释经济受损影响的差异的程度，最可能反映那些在经济和家庭中扮演角色的女孩所承受的负担。

根据母亲的描述(1936)，劳动阶级中的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女孩的闲暇时间和社交经验上。和样本中其他的群体——经济未受损的劳动阶级家庭群体和中产阶级中经济受损群体——相比较，来自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甚至于男孩，闲暇时间更少，社交经验更缺乏。大多数孩子都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社会交往和培养嗜好，可这种时间对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来说却是最少的(68%对86%)。在访谈者对于自由时间或玩耍时间、朋友的多样性和适当性的评分上，也存在着这种差别。这些变化至少与劳动阶级中大部分经济受损家庭生活中的限制和压力相一致，但是在研究人员对处于这种社会境遇中研究对象的观察中却没有表现出来。经济困难或责任都没有使男孩女孩在社交中受欢迎的程度出现什么不同。这些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假设：家庭的经济受损和孩子所承担的责任极大地限制了孩子的社交活动，但是我们准备在第六章中仔细地考察被接纳和受欢迎的根源，如打扮和服饰，并探索它们与经济困难的关系。

就这一观点而言，我们把就业作为家庭困难和男孩们的社会独立性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不过还是存在着另外一种没有被排除的解释的可能性：作为家庭经济负担的一种副产品，社会独立性的获得可能先于就业，并增加了就业的可能性。根据这

种解释，有工作的男孩比其他男孩更加独立，更加摆脱了传统家庭的束缚。那么，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独立性的差异是在他们初次被雇佣之前还是之后出现的？如果我们假设它发生的时间不早于孩子七年级或八年级时，那么我们就能用在初中和高中做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来检验这个问题。

在每一个时段，我们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回答者是否必须得到父母允许才能在夜间晚一点回家？或是否能够不经父母同意就出去？能否被允许在缺少成人监督的情况下结交朋友？由于各个项目是彼此相关的，五级量表（从“低”到“高”分成五级）的得分累加起来，作为每一个时段的惟一指标。正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样本中男孩的独立程度在两个时段中急剧增强（$\overline{X}s = 6.8$ 对 11.4）。虽然女孩比男孩在社会交往方面更不自由，但是在这个时期她们也得到了更多的自由（$\overline{X}s = 5.8$ 对 10.1）。

在初中阶段，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社交自由都没有因为经济受损状况出现显著差异，也没有证据表明较晚找到工作的男孩这个时候比其他年轻人更能摆脱父母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相反，前一个群体比后一个群体独立意识稍弱。女孩中也存在相似的结果（平均差异为.53）。不过在高中阶段，最为自由的男孩一般都来自经济受损的家庭，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工作。就这两个因素而言，就业对独立程度的影响最大，并能够说明经济受损的影响。一般来说，通过工作挣钱的男孩更为独立（$p < .05$），而且同那些没有工作的男孩相比，他们从青春期早期开始在这方面就更加不稳定。稳定性的差异以及它和工作经历的关系，表现在测量就业和未就业孩子的社会独立性的两种方法的相互关系中（$r = .25$ 对.52）。那些有工作的男孩最为自由。

在高中阶段，认为自己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女孩不会因为经济受损状况和阶级地位而被区别开来。如表 A－6 表显示的那样，经济受损对劳动阶级女孩的独立性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与父母的限制和做家务有关。不过，这些变化太小了，在统计学上是不可靠的。

在这一点上，关于社会独立性的数据主要是与我们对大萧条中的男孩的估计一致。所有的论据都表明，经济受损和工作角色有助于男孩从父母控制的传统束缚下解脱出来。由于大多数女孩都是通过承担家务对家庭的困难做出反应，因此这种适应性对于她们对家庭的依赖或父母的控制没有什么影响，也许只有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女孩例外。但是除了父母控制这个问题以外，参与家庭运作的行为有助于这些女孩学会持家。这包括帮助女孩熟悉家庭模式和价值观。那么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相比，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对家务更感兴趣、更能持家吗？

为了调查这个问题，我们运用了对家务兴趣的测量方法，这一方法建立在对高中学生所做的职业问卷调查的基础之上。从职业兴趣强烈程度量表中，我们获得了测量对家务兴趣的两种方法：一是用一个单独的问题去询问被访者是只看重婚姻和持家的角色，还是只看重职业，或者两种行为都看重；二是根据职业表的要旨，对于家务兴趣或者职业兴趣进行现场判断。[19] 由于很少有女孩以职业取向为主，所以我们主要在那些偏好家庭活动的人和那些对家庭和职业都有兴趣的人之间进行对比。

对家务的兴趣与经济受损和家庭责任有关，但是这种情况

---

⑲ 这种分类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咨询中心主任 B.柯克博士提出的。一共有四种类别：对家务极感兴趣，对家务有些兴趣，既对家务感兴趣又对职业感兴趣，对职业感兴趣。前两类被界定为对家务角色感兴趣。

只发生在中产阶级的女孩中，因为这个次群体在性别角色的行为上比劳动阶级的女孩更为开放。有关角色偏好的两种指数都证明了这种结果。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每三个中就有两个对家务更感兴趣，而不是对职业更感兴趣（惟一的选择），这种偏好的程度远远高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38%）。在这个群体中，偏好家庭角色的女孩比其他的女孩更有可能参与家庭运作，但是这种差别（21%）尚不足以说明经济受损的影响。在劳动阶级中，无论家庭在经济上受损还是未受损，都有78%的女孩对家务的兴趣超过对职业的兴趣，家庭义务对这种偏好出现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

正如这些发现所表明的那样，经济状况影响女孩价值观和社交自由性的情境，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阶级界定的。和地位较低的家庭相比，中产阶级家庭更不看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困难所产生的不断增强的影响，仅仅发生在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女孩中。经济受损，有助于增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女孩在对于家务兴趣看法上的相似性。如果劳动阶级女孩的责任比中产阶级女孩的更加重大，花费的时间又更多，这对解释社会独立性所带来的结果会有所帮助。经济困难和家务劳动仅仅限制了劳动阶级女孩的社交自由。

类似成人经历的向下延伸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经济中的角色扮演，不仅是加速进入成人世界的表现，而且在大萧条中，这种角色扮演在让年轻人担负非同寻常职责的不同性别的情境中展开。早期脱离家庭的束缚，对可靠性的偏好，能够熟练地理财，这些至少与对男孩受大萧条影响的这种解释相吻合，也和有关女孩的可靠性和对家务

偏好的解释相一致。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倾向于成人生活导向的直接证据，例如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可能更愿意外出打工，更喜欢与成人交往，也更想尽快长大。从传统上来看，成为学徒的年轻人才会表现出这种社会发展模式，而在大萧条时期孩子的生活境遇中，我们识别出了学徒身份所要具备的基本元素。

如果童年时代和成人时期之间的岁月是做准备的时间，那么它就代表了个人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经历对后来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年轻人从实践中学习，如投身于职业和感受成人生活的压力。对奥克兰的孩子而言，30 年代的经济受损常常使更多的母亲和女儿共同卷入家务劳动中，同时鼓励男孩参与经济活动，这又常常增强了他们对非家庭成员雇主的责任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一起参与对彼此都很重要的共同活动。从成人取向的立场出发，社区中的经济角色作为面对非家庭成员的一种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从依赖父母转向和非家庭成员成人的接触，代表了走向成人世界、远离家庭和亲属而组成的多彩世界的一个步骤。

在对成人取向进行一般测量的时候，我们运用了研究人员对于在与学校有关的境遇中成人取向行为的评分(来自于 1937 年的境遇评分，参见附录 B)：寻求成人陪伴——"在一个群体中寻找喜欢孩子的成年人。经常围绕在成年人的周围，目的是引起成年人的注意。加入到成年人的行列令他们兴奋不已。"在进行行为观察的不同环境中，成年人包括教师、运动场的管理人、来访者和观察者。

人们认为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和劳动阶级的孩子最有可能具有成人取向，就像那些有工作的孩子那样。但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和其他孩子相比，那些就业的男孩女

孩都对成人的生活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中花更多的时间与成年人待在一起($p<.01$)。[15] 甚至在经济受损的群体中，有工作的年轻人也比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与成年人的关系更为密切。那些在家中担负重任的孩子同样也对成人生活颇感兴趣。

除了共同参与的一些活动之外，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孩子寻求家庭之外成年人的陪伴和注意。这些因素包括需要一个父母的替代品(由家庭混乱、遗弃所引起的)，以及做一个被人承认的成年人的愿望。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愿望是那些希望大人陪伴的年轻人的特征——数据中也的确存在着表明这种关系的某些证据。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女孩最可能盼望尽快长大成人。[16] 这种愿望和低下的家庭地位有关，但是它在每个社会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也是最普遍的。在这些数据中，长大成人的目标至少可以被看做是家庭困难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家庭的经济越困难，这种目标就越突出。

根据我们的分析，孩子在经济受损的家庭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劳动分工中传统的性别差异相同，他们倾向于按成人方式给自己定位。经济困难和职业增强了他们与成人交往的愿望，也增强了他们"长大"成人的愿望。这种成人取向与家庭经济中各种角色的相关行为是一致的，这些行为包括：负责地理财(母亲的感觉)，朝气蓬勃的或勤劳的行为，可靠性和女孩专心于

[15] 就两种性别而言，就业的孩子成人取向的平均分数为52.4，没有就业的孩子成人取向的平均分数为46.1。

[16] 在初中的问卷中有一个问题被用来衡量对长大成人的渴望："你是否想长大，变成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大部分孩子给予肯定的回答(67%)，随着家庭困难程度的增加这个百分比也在增加。就百分比的差异而言，阶级和经济受损的影响是一样的(14%)。

家务，以及男孩的社会独立性。

如果经济困难加速了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那么这种发展路程是否过早地限制了人格的发展和对角色的选择？如果是，那么在他们进入成人初期和中年时代时，他们儿童时期类似成人的经历又以什么方式使他们做出选择、形成决定和选择生活道路？另外两种对大萧条的适应性也和这些问题有关：家庭关系的调整，它包括决策中的角色、孩子对家庭变迁的心理反应、地位的暧昧性以及家庭中的紧张气氛；经济受损需要相关家庭的父母和孩子在谋生方面有新的对策。这些适应性对策是怎样影响到父亲的相对权威和情感状态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分析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数据，确定影响奥克兰研究中孩子情感状态的各种条件。

第五章
家 庭 关 系

母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爱她，因为她付出了这么多，因为她工作得如此辛苦——我们对她都有义务。

奥克兰出生组中女儿的观点

经济受损和家庭谋生的新模式，促成了父亲在家中的地位被迫做出一系列调整。本章对三个领域中的调整特别感兴趣：父母间在权力和情感支持方面的交换；亲子关系中的情感纽带和控制；婚姻和亲子互动之间的一致程度。我们的出发点是家庭领导权，因为它既是衡量危机境遇中适应性和压力的一个敏感的晴雨表，也是决定家庭内部关系的关键因素。在他们后代的眼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济受损才能增加母亲的权力和重要性呢？

危机政治学（politics of crisis）中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理论假设：要想长期掌握领导权，领导者必须在成功地解决重要问题或自如地应付冲突方面能够做到有目共睹；在危机境遇中，无法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领导人有可能被集体领导所取代。互惠关系是这种领导权适应性观点的全部特点。在民主的群体中，接受管束变成了对领导人的期望，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行动必须有效地满足群体成员的需要。如果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会导致他们彼此的关系失衡，从而使人们转而寻求另外的选择。在领导权的稳定方面，各色各样的群体中都存在着解决危

机的实际事例，从政治领域(例如，从胡佛转向罗斯福)到核心家庭都有这样的群体。[①]

大萧条中的经济状况是对适应技巧的检验，它为丈夫和妻子调整相对的权力关系(已经得到证明了的控制或领导他人的能力)提供了空间。新的适应性反应，必须满足在家庭收入急剧减少和长期失业的情况下维持生活的急迫需求，比如把责任移交给妇女、孩子和家庭外部的机构。在奥克兰的样本中，这种适应出现在各种社会地位的经济受损家庭中，它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妻子占支配地位的境遇。对失业人员的研究表明，家庭领导权的结构和经济谋生之间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前面我们曾提到巴基的研究，这项研究指出父亲失业和他在家中的权力之间是负相关的。金伯格在他的研究(Ginburg，1942)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妻子处于支配地位而父亲失权，是持续性贫困家庭的一个更为常见的结构特点。[②]

关于领导权的适应性观点包含社会交换的假设，并适用于

---

① 在一项有关家庭对不同困境的反应的研究中，库斯发现在那些父亲无法满足危机境遇的要求的家庭中，父母的权威丧失殆尽，而且这种情况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参阅E.L.库斯：《危机中的家庭》(1946)。有两项经验研究表明了危机境遇中领导权丧失的相应影响，参见D.汉布林：《领导权和危机》(1958)；巴尔和罗林斯：《危机和夫妇权力》(1971)。与领导权的这种观点相关的是肖特和斯特罗特贝克提出的"地位威胁"假设，这一假设是用来解释一群男孩在违法活动中不同的卷入程度。J.F.肖特和F.L.斯特罗特贝克的《群体的运作过程和团伙违法》(芝加哥，1955)，第254页。

② 参阅布拉德和沃尔夫：《丈夫和妻子》(1960)；L.雷恩沃特：《犹太人居住区围墙的后面》(芝加哥，1970)。婚姻权力绝不是社会经济因素和教育因素简单作用的结果，参见卡马诺夫斯基：《蓝领婚姻》(1962)，第10章；斯坎佐尼：《机会和家庭》(1970)，第6章。在这方面，还可以参考H.罗德曼：《法国、希腊、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婚姻权力》，载《婚姻和家庭杂志》，第30期(1967)，第320—324页。有关这种分析的其他因素，在本文下面的讨论中将会提到。

那些权力产生于赞同而不是胁迫的境遇。一些研究家庭的理论和经验著作认为,如果在前危机阶段的权力关系带有极端的单方面支配性和身体胁迫特征,那么在无法控制危机之时最不可能引起角色转换。[3] 在更加自主的情况下,如果父亲对婚姻交易的主要贡献局限于金钱,那么在危机持续下去的情况下,父亲丧失权力的可能性最大(参见 Komarovsky,1940,第 3 章;Heer,1963)。下层阶级中的金钱交换和性交换的婚姻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由成功的生活和富裕孕育出的爱情、理解和对婚姻关系的尊重(参见 Scanzoni,1970,第 2 章,第 2—4 页),维护了身处经济逆境中的丈夫的地位。有事实表明,当爱情和理解在婚姻关系中占据支配位置时,大萧条中失业的工人在家庭成员中依旧维持着自己的权力和尊严(Komarovsky,1940,第 3 章)。由于社会阶级的不同增加了丈夫的权力来源,在牺牲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与妻子在家中占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婚姻关系中另外两类资源也支持这个假说:具有可比性的工作状况和教育程度。在经济困难情况下,奥克兰样本中的母亲,特别是劳动阶级中的母亲最有可能外出就业。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就业的妻子在决策方面比没有就业的妻子影响力更大。[4] 教育作为地位和拥有一技之长的象征,是婚姻关系中最珍贵的一种资源。夫妇中教育程度高的一方参与家庭决策方面

---

[3] R. 希尔和 D. A. 汉森:《灾难中的家庭》,见 Baker and Chapman,1962;巴尔和罗林斯:《危机和夫妇权力》(1971)。

[4] D. M. 希尔:《支配地位和工作的妻子》,载《社会力量》,第 36 期(1958),第 347 页;布拉德和沃尔夫:《丈夫和妻子》(1960),第 42 页。

更有力，能够施加的影响也更大。[5] 在奥克兰样本中，劳动阶级的男人最不可能拥有这种优势。如果正处于经济困难的境遇中，那些妻子有工作而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家庭最可能由妻子占据支配地位。

经济受损对于家庭权力关系的影响，也依赖于人们对于男人气概和男性在家中权利的文化上的界定。根据传统的观念，男性在家中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威天然地来自于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地位，而不管他在困境中的表现怎样或者有什么样的个人才智，这种权利不仅仅取决于被证明了的满足家庭需要的能力。在大萧条中，权威受到这些信念支持的失业男人比其他男人更不容易受到地位下降的伤害。[6]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我们将以是否出生在国外作为衡量这些信念的指标。

与传统观念对男人支配地位的支持相对应的，是那种根据男人的工作和家庭情形来评估他的功利主义前提。与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结构性根源相反，人们一般都认为，只要男人愿意，他就能够找到工作并且支撑起他的家庭。根据这种逻辑和评价框架，失业被看做是道德上的污点，而且失业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接受了对于他们自己的这种定义。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 1932 年冬天所观察到的那样："大萧条所带来的最不幸后果就是：如果一个男人失去了工作，人们就可能指责他是一个失败者。"在经济艰难时期，"这个阶段为我们所有最残忍和琐碎的行为提供了场所——一个人惩罚另外一个人只是为了重塑他

⑤ 提到这种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布拉德和沃尔夫前引书，第 42 页、第 37—38 页；还有卡马诺夫斯基的《蓝领婚姻》(1962)，第 229 页。

⑥ 卡马诺夫斯基：《失业男人和他的家庭》(1940)，第 3 章。有关男性在权力关系中占据支配意识的开创性研究，可以参阅 L. W. 霍夫曼：《母亲就业对于父母权力关系和家务分工的影响》，载《婚姻和家庭谋生》，第 22 期(1960)，第 27—35 页。

的性格。"[①] 羞愧、嘲笑和敌意的爆发都是这种婚姻戏剧的组成部分。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经济困难和有关的婚姻结构对于家中的冲突和敌意、对于作为情感和价值观源泉的父母的相对地位，都有着潜在的影响。经济问题甚至在富裕时期也是婚姻中争吵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失业和经济受损家庭的通病（参见 Komarovsky，1962，第 290—291 页）。而在妻子占支配地位的家庭中的冲突一般比有着其他权力结构的家庭更为普遍。[②] 这种冲突的普遍性，部分是对妻子居支配地位这种困境的反应，因为几乎没有丈夫和妻子认为这种格局是令人向往的或者合法的。尽管共享权威是当代社会最受欢迎的一种理想形式，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认为："丈夫应该是一家之主"（Scanzoni，1970，第 152 页）。经济困难也经常处于一种累积、循环的动态过程，这减少了彼此间爱慕、分担和尊重等情感的表达，进而降低了夫妇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效率和彼此之间的和谐。当夫妇情感上的距离增加后，敌意便接踵而至，这又导致夫妇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家庭地位的降低和妻子占支配地位象征着家庭中两种相关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孩子们对待父母的态度。母亲在家庭事务中地位日显重要，而父亲的权力则日渐衰微。正如第三章所表明的那样，来自中产阶级的孩子认为经济未受损的父亲比经济受损的父亲具有更高的社会威望。然而，母亲在社区中的地位并未受到经济受损的影响。这些差异是否反映在孩子与每位父母亲近感和感受他们魅力的情感中？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经

① J. 亚当斯：《商业萧条所导致的社会后果》，见 F. 莫利：《萧条的各个方面》（芝加哥，1932），第 13 页。

② 参阅 M. A. 斯特劳斯：《夫妇权力结构和青少年的人格》，载《婚姻和家庭生活》，第 24 期（1962），第 17—25 页。

济受损和妻子占支配地位增加了母亲的向心力，但是，在孩子特别是女儿的情感和价值偏好中她也占据相似的位置吗？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众所周知，权力是父母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女儿通常与母亲而不是与父亲更亲密。父亲的敌意和退缩行为、家庭急迫的需求和领导权的真空状态，都将增加母亲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的合法性。

最后，经济受损家庭的家庭结构对男孩女孩的社会独立性的影响，与他们在家庭经济中角色的作用相一致。如果说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模式一般是根据孩子的性别而定，那么父母控制的形式则取决于家庭的权力结构。[9] 当父亲在婚姻中的影响力增加时，他对男孩的控制也随之增强，而在母亲处于支配地位的家庭中则加强了对女儿的传统限制。例如，在大萧条中，那些忍受婚姻权力减弱之痛苦的失业父亲，在对其后代的感情中常常有相似的经历（Komarovsky，1940，第 114 页）。尤其是，经济上的困难使父母无法与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在顺从与否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在与教育和职业相关的事情上尤其如此。同女孩相比较，经济困难和地位的丧失使男孩接受传统成人角色的过程更容易被中断，从而变得更加困难。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验证经济受损对婚姻权力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与妻子占支配地位相关的条件，例如，长时期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相对的教育程度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着手了解经济受损和婚姻权力假设会带来的后果，也就是家庭冲突、对每位父母不同的偏好和父母的控制权。因为我们只关注大萧条时代，所以无法

---

⑨ C. E. 鲍尔曼、G. H. 埃尔德：《青少年对于家庭权力结构理解的差异》，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29 期（1964），第 551—567 页。

确定这些家庭模式持续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为了更加广泛地讨论这些论点，我们将比较奥克兰被访者生命周期中的两个阶段：30年代的青少年时期以及中年时期。这些论点包括对父母的评价，对每一位父母相对的亲密程度和亲属在情感上的重要性。那些对受损家庭中的孩子而言曾是"重要人物"的母亲和父亲，在长大成人的孩子心目中是否仍然保留着这一形象？在奥克兰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父母在经济困难的境遇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否与在大萧条时期一样可以让他们接受？

经济受损和婚姻权力

大萧条中的经济难题掩盖了其他家庭问题，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更是如此，而且它们在大部分婚姻互动的领域中也多浮了表面。这种普遍深入的关注反复出现在对奥克兰母亲的访谈之中。许多与子女、亲属、朋友和社区角色有关的问题，总是有意地被归结为金钱的匮乏及其负面影响。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有可能假设，大萧条中婚姻权力可以令人满意地由财政事务上的决策权来测量。但是如果沿着这条途径走下去，我们就有可能忽视整个家庭中各种难题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各自的相对重要性。对这些差异的敏感性植根于家庭结构的"一般性问题"中，它要求被调查者说明在重大问题面前或者出现争议时，通常是谁做决定或者有最终发言权。这种方法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它在特定的决策领域中排除了家庭间的比较。丈夫和妻子在家庭财务问题上的相对权力与在其他领域中的权力不一定完全相同。

在当前的分析中，我们用一个一般性问题和有关家庭协议的定性数据，来衡量婚姻的权力结构，那些数据是根据30年代

对母亲的访谈和对家庭的观察而拟成的。由于我们无法从大萧条的父母或者孩子那里直接得到有关婚姻权力的资料，因此在我们对研究对象成年时所做的调查中，问了如下的问题："在你少年时，父母哪一方决定那些对家庭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适用于完整家庭的答案分为三种：父亲占支配地位，双方平等，母亲处于支配地位。[10] 我们不能系统地得到所有关于家庭结构的定性资料，因此它主要被用来验证前面的观点。根据这些数据，故意失真和错误记忆似乎不是通过被访者的回溯资料来衡量某个变量中误差的重要来源。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执掌领导权，这两组数据都表明了权力方向的高度一致性。在支配结构和平等关系之间一般很少存在不一致。在考察孩子眼中父母间的婚姻权力时，我们采用的视角基本上与我们对经济受损的心理影响的关注一致。正如经济困难不可能对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含义一样，婚姻权力的真实性对孩子而言，主要是他们如何去感受它。这种感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父母的态度。

尽管大萧条中的经济水平有利于妻子和母亲的支配地位，但是奥克兰样本中的儿子和女儿却认为，这种家庭领导模式少于父亲占支配地位（28%对39%）和双方共同决策的模式（33%）。不过，占支配地位的母亲主要是经济地位低下的产物。正如孩子们所观察到的，大萧条前家庭声望越低（1933年比起1929年来），家庭相对的经济地位越低，母亲在家中掌握领导权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经济受损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因素。在儿子和女儿的眼中，经济受损与母亲的相对权力，而不是与家

⑩ 我们是在1964年通过邮寄问卷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的。有关权力的题目包括四个答案："父亲完全占支配地位"、"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占支配地位"和"母亲完全占支配地位"。在所有的相关分析中用的都是四级量表。

庭地位具有更紧密的联系(r = .39 比 − .12)。[1]

因社会阶级导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父亲的支配地位上,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经常提到的一种角色模式(45%对27%)。在劳动阶级家庭中,平等关系和母亲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模式略多一些(平均差为8%)。与我们最初的设想相反,在劳动阶级家庭中,母亲的相对权力与经济受损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在两个社会阶层中,随着经济受损程度的改变,这种结构增加的比例是相同的(大约30%),而且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这种结构比其他任何角色模式都更加盛行。

因为阶级出身不会改变经济受损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将这种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并且在经济受损的三个层次上比较婚姻权力的形式:经济未受损家庭,父亲就业的经济受损家庭,父亲失业的经济受损家庭。在这三个层次上,母亲在家中居支配地位的情况明显有所增加,从未受损群体的12%增加到受损群体的33%,而在受损最为惨重的群体中,这种情况竟然高居49%。这种趋势直接伴随着那些父亲被描述为拥有最高决策权的家庭比例的减少,超过半数的经济未受损家庭的一家之主是父亲,而在经济损失惨重的家庭中,只有16%的家庭中父亲有决策权。在每一种受损程度的家庭中,大约有1/3的家庭父母之间是平等的。

母亲独断专行的最极端例子存在于父亲失业的经济受损家庭中。一些妇女在决定财政、家庭重要事务和实施这些决策时,不咨询甚至也不通知丈夫一声。有一例异乎寻常的个案:父亲

---

① 家庭地位的高分(5分)等同于高地位。为了保持一致,要把初始的分数倒过来。

在傍晚回到家发现所有的家具都不翼而飞时，才知道妻子决定另外租一所房屋。在其他的一些个案中，妻子总是在如何处置财产和消费的争执中占绝对优势。一位访谈者对其中一个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所做的总结性评论，一般来说也适用于其他的失业家庭："事无巨细，都由母亲全权负责。"根据访谈获得的数据，甚至在经济状况好转和她们的丈夫能够重新赡养家庭以后，这些妇女中有些人仍然控制着决策权。

在考察了有关领导权的适应性观点之后，我们认为收入损失和失业促使家庭的生计陷入危机之中，从而摧毁了父亲权力发挥作用的基础(instrumental base)。如果无法解除这种危机，即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结构性条件所决定的，也会导致角色的变化，从而扩大母亲对家庭事务的影响。尽管数据显示了这种关系，因果顺序仍然无法确定。在哪些方面，那些家庭里妻子说了算的男人，比其他丈夫更容易受到经济受损和失业的伤害？一个答案可能是，妻子在大萧条前的支配地位和艰难时期的经济受损，都可以由诸如同妻子相比文化程度较低、酗酒等等一系列因素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这两种条件都削弱了男人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增加了在大萧条中被解雇和长期失业的可能，而且说明了经济受损与妻子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后一种关系就是非因果性的、虚假的。

对大萧条中经济受损和妻子或母亲的支配地位之间因果关系的最令人满意的检验，是对经济危机前后家庭结构的比较。婚姻权力的变化直接与1929年到1933年之间经济受损的差异有关。这种研究设计会使妇女最有可能取得家庭决策权的各种条件保持一致。到目前为止，包括奥克兰研究在内的对大萧条家庭的研究，都缺少对大萧条前后家庭权力结构的测量，虽然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为一个可行性研究。不过，没有证据说明，诸

如父母的相对教育程度之类大萧条前的一些特征,能够解释经济受损和母亲的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

根据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前面的研究,有理由认为下列的社会因素制约了大萧条中的家庭经济地位和婚姻权力:父亲的教育程度及母亲的教育水平、丈夫的年龄和外国血统。从第三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受损群体中父亲的教育程度略低于处于未受损群体中的男人,经济受损与父母的相对教育程度、父亲的年龄无关,在劳动阶级中与父母的外国血统有关。以上这些因素都不能说明经济受损总量为多少时才是有意义的,而且在和母亲居支配地位的方向上,它们也不可能保持同样的相关性。再来看看出生地点。作为衡量传统意识的一种指标,出生在国外对母亲在家庭决策中占支配地位具有负面作用。而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出生于国外的父母占绝大多数。就相对教育程度而言,和其他的研究结果一样,妻子的教育优势可能是决策权力的一种来源,但是它与经济受损并不相干。

从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出生在国外的父亲并不比出生在本地的父亲显得更有权力,无论哪个社会阶层都是这样。不过,外国血统的确使经济受损家庭的权力平衡出现了一些差异。同父母出生在本地的家庭相比,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在父母有外国血统的家庭中,父亲与母亲地位平等或父亲地位高于母亲的结构更为常见,但是只有在劳动阶级家庭中,这种差异才值得关注(13%)。

尽管父亲的年龄和相对教育地位与经济受损并不相干,但是这两种因素都会使婚姻权力结构出现一定的差异。在中产阶级中,母亲占支配地位的可能性与父亲的年龄和教育劣势中度相关(平均 $r=.16$)。也就是说,年龄较大的和教育程度低于妻子的父亲,最可能被认为没有母亲权力大。这些结果与从资源角度对婚姻权力所做的理解一致:随着年龄的增加(年龄较大的妇女在家

庭和养育孩子方面责任较轻），并且当受教育程度等同于或高于丈夫时，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也随之降低（参见 Heer，1963）。

在劳动阶级中，父亲的年龄并不影响孩子们对婚姻权力的理解，而且父亲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与他在家庭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尽一致。相反，越有权威的父亲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低，甚至低于自己的妻子（$r=-.32$ 和 $-.23$）。支持下层阶级男性支配地位的个人因素，也许能对这种相反的趋势给予说明。这些因素包括身体强壮的程度和在婚姻冲突、决策和主动行为中运用这种优势的意愿。正如某项研究所总结的那样，在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丈夫"可能更擅长于使用个人才智优势以施加影响"；而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优势也大大地缩小了（Komarovsky，1962，第 114 页）。从表 A－7 中可以看出，年龄和教育影响方面相似的阶级差别同样也体现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该表比较了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中，三组因素对婚姻权力的相对影响：测量父母能力和才智指数的指标（相对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年龄），测量传统价值观的指标（外国血统），测量角色表现的指标（向下流动、不稳定的工作生活和母亲就业）。就测量处理危机境遇的有效性来说，对表现的衡量（performance measures）是一个比教育程度和年龄更加直接的指标，而且一般说来它更能预测母亲的支配地位。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们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这同大萧条时期家庭经济地位的衰落之间关系极为密切。据说，其他的纵向研究也发现了在向下流动的家庭中表现出母亲掌握权力的相应证据。[12] 家庭地位的衰落包括找不到工作，也包括从事地位低下

[12] 参阅 W.T. 斯迈尔泽：《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史功能的少年时代和成年时期的职业选择》，载《社会关系计量学》，第 26 期（1963），第 393—409 页。

的职业，它更预示着母亲的支配地位而不仅仅是父亲的失业（r = .29）。对地位低下的家庭而言，向下流动不是他们的主要选择，而且不像紊乱的工作生活那样更能预示母亲的权力。

那些反映了父亲在大萧条中对维持令人满意的生活标准无能为力的种种条件，比教育、年龄或工作地位等等之类母亲本身的特点更能预示她的领导权。在婚姻的决策上，职业母亲比全职家庭主妇更占支配地位，但是工作地位的影响却相对微弱。妇女的其他特性和对就业更为恰当的测量手段，可能会改变这幅画面的某些细节，但是却不能改变经济受损家庭中角色失败这一基本现实。

赚钱能力和工作的丧失，如果导致了种种不良反应——冷漠、沮丧、自怜自艾、各种形式的社会逃避和退缩，比如酗酒等，就会变成对家庭关系最具破坏性的因素。这是经济受损和失业的潜在原因和后果。酗酒者由于无序和无效的工作习惯而容易被解雇和免职，而且他们一旦丢掉工作，就会逐渐变得更加不可雇佣。酒精暂时蒙蔽了严酷的经济困难，阻碍了他们采取有效的行为。大多数有"酗酒问题"的父亲都来自经济受损的家庭（参见第三章），而且他们的子女也认为他们处理家庭事务时相对软弱无力。

经济困难与家庭冲突

失业和收入的突然丧失破坏了婚姻中原有的互惠关系，包括相对的贡献和配偶间的期望，使得在严格受限的消费中作出艰难的抉择成为必要。这些为中伤性的批评、无休止的争吵和敌意的出现留出了空间。甚至在那些更加体贴和更富同情心的妻子中，经济受损和家庭贡献方面令人疲惫不堪的失衡，都容易使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丈夫的缺点。最近对低收入家庭的一项

研究更加清晰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在丈夫能给整个家庭提供良好生活时，他的缺点是可以容忍的，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时，丈夫的缺点就可能成为他失败的原因。对丈夫错误的极度敏感，很不幸地融入了另一种典型的趋势之中：发现错误是容易的，因为经济挫折可能使这些缺点更加彰目。无法维持家庭生存的人本身就感到失意和忧虑不安。没有多少男人能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控制这些破坏性的情绪，比如酗酒，使用暴力，烦躁不安，对批评过于敏感，以及退缩……（此外），无法维持家庭生计的人为自己妻子提供的武器太明显了，所以她们不得不用它们来平息满腔的怒火。因而，当一位妻子强迫她的孩子吃掉自己盘中的食物时，她的丈夫站在了女儿一边，并且说他同情女儿，因为她讨厌这种特殊的食品却不得不吃掉。"她站在桌子旁对我大喊大叫，说如果我能挣更多的钱，她就能买她们喜欢的食品"（Komarovsky，1962，第 291 页）。

经济困难需要付出牺牲，消费上的选择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谁应该做出牺牲或应该放弃什么样的消费？婚姻和家庭生活因此成了争夺稀缺资源的场所，这样的议题也变得令人"痛苦不堪"而无法继续讨论下去。因为婚姻中的交流有限，所以就很难知道大家都同意优先做什么。在低收入的家庭中，围绕把钱先花在什么上面的一点细小分歧都会引起争吵。"帐单支付的顺序——先付牛奶钱，这样孩子们的营养就能够有保证——或者先付电费，免得经受停电之苦。他们为少数几个保留下来的需要自由决定的消费内容而争吵不休——啤酒、香烟或衣服"（Komarovsky，1962，第 291 页）。

经济困难和冲突是低收入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它们在大萧条时向下流动的家庭中是否很普遍呢？在这里，我们把持续性的经济受损（persistent deprivation）和不断减缓的经济受

损之间作一比较。在奥克兰的样本中，经济受损常常意味着家庭收入的急剧减少，减少的数量是1929年收入的一半以上。这种变化导致原有的生活标准和实际生活经历之间发生冲突，但这种不一致性并不比具有同等收入水平的长期贫困潦倒的家庭更大。对高标准生活的留恋，不仅阻碍着消费中的适应性变化，而且也容易使人产生挫折感。经济受损导致的这些或那些相关性，容易诱发家庭冲突。

在考察婚姻权力时，我们将从孩子的眼光来观察家庭中的争议或纠纷。根据30年代的访谈和被访者自述的数据（高中时期），三位评判人把奥克兰样本中的每一位有关家庭冲突的看法加以评分（参见附录B）。从无冲突（1分）到激烈冲突（9分）分为九级。我们没有对人际间冲突的相关情境做出区分。也就是说，冲突的潜在来源既包括父母间的互动也包括亲子间的互动。从孩子的家庭经历来看，他们和父母关系所具有的突出地位，使我们必须把他们对冲突的解释与对于婚姻关系的实质更加敏感和了解的父母的感觉区分开来。

无论对于哪个阶级的孩子来说，在他们的家庭经历中，冲突关系一般都是随着经济受损程度的加剧而趋于严重，但是只有在女孩中经济受损的影响才是显著的。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比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经历了更多的家庭冲突（$p < .05$）。在经济受损的各种水平上，我们没有发现阶级的差别。[13]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与女孩一样可能经历家庭冲突，但是在经济未受损的家庭中，男孩比女孩感受到了

---

[13] 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的平均分数是4.1，经济受损群体是5.2；劳动阶级中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的平均分数是3.7，经济受损群体是5.2。在两个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的平均分数分别为4.9和5.5。

更多的冲突，这些差异的平均值为 4.9 和 3.9。

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男孩和女孩之间对比鲜明的角色。经济困难鼓励男孩走出家庭去开辟更广泛的活动空间，而女孩则更多地承担起家庭的义务，劳动阶级的女孩尤其如此。所以，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面临最多的可能是独立性方面的冲突，结果可能会掩盖了夫妇间争吵和经济受损之间的任何联系，对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那些其母亲在婚姻权力中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的男孩，最可能提及冲突关系，而冲突却直接扩大了母亲对女孩的支配权力。[19]后一种相关性预示着我们下面分析亲子关系时的一个持续主题：经济受损家庭中父女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冷漠和冲突。

根据 30 年代对父母的访谈和观察以及 1958 年访谈中对家庭关系的回溯性描述，我们获得了有关引起婚姻纠纷的一些经济受损因素。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消费上的冲突、对丈夫不能养家糊口的指责以及更具权威的父母强力贯彻自己意志的企图，是大多数争斗最常见的原因。在母亲占支配地位的家庭中，对父亲的轻视表现得最为明显。来自这些家庭的成年人回忆起往事时，父亲的酗酒状态，长时间的“默默不语”，母亲的唠唠叨叨、诽谤和嘲笑仍然历历在目：“父亲在母亲指责他的时候总是一声不吭”；“他们不论什么事都要争吵一番，母亲总是胜利的一方”；“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在互相呵斥——我永远都记得这些咆哮、恐惧和争吵的声音。”

在父亲能控制局势的冲突家庭中，纷争和敌意的产生往往是因为父亲在决定家庭收入如何消费上的权威受到挑战。在有

[19] 对于男孩而言，感觉到的冲突和母亲权力的关系系数为 -.20；对于女孩而言是 -.09。

些家庭，冲突是因母亲不和丈夫商量独自管理家庭财务而促成的。另一种情况则是，父亲对"不理智"消费的批评挑起了对他的人身攻击，攻击他作为丈夫、父亲和养家糊口者的能力。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因为父亲不愿意把他的收入拿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以购买食品和衣物，从而导致了大声的争执。一位做女儿的回忆到，她的父亲"十分小气吝啬，对他手中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他不会给母亲买新裙子，除非母亲的衣服确实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是在购买那些维持"体面"的东西方面，父亲似乎并不吝惜金钱

通过关注经济困难对社会冲突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所有阶级的经济受损群体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家庭远离了纷争，至少根据我们的数据判断是如此。从孩子的眼光来看，至少有半数的受损家庭中不存在敌对的婚姻关系，孩子和父母的冲突也不甚严重。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中有 2/5 的人谈到，如果家中成员有摩擦的话也并不多，这些女孩提及的冲突比例略高于男孩。因此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和谐和冲突是两种对比鲜明的家庭模式。这种差异的根源何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条件，使得在经济受损群体中有些家庭关系融洽，而有些家庭冲突不断？这些重要问题对于理解大萧条中家庭适应性直接相关。但由于缺乏 30 年代前家庭如何发挥作用的数据，要研究这些问题显得极其困难。要进行适宜的分析，我们就必须掌握比现在更为充足的有关婚姻关系的数据。不过，通过把研究范围从家庭结构扩大到亲子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取得一定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分析经济受损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还限制在婚姻互动上。这是家庭生活的一个主要范畴，但是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其基本意义在于它对亲子关系间依恋、偏爱和控制的影

响。经济困难也许直接、或者通过婚姻权力模式间接影响到这些关系。大萧条中经济状况是否削弱了亲子间的依恋？是否把对某位父母的爱转到了另一位身上？或者这两种结果兼而有之？在哪些领域内，婚姻权力的模式伤害了亲子关系？余下的章节将会讨论这些问题及相关的问题，从讨论觉察到的大萧条中的关系出发，以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对家庭和父母的评价为终点。

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

在孩子的感情中，父母的重要性不仅是其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也不是仅仅通过了解家庭的内部结构就能对其给予适当解释的。家庭的这些要素彼此都是有联系的，它们共同构建了情感的纽带、互动和判断。受损家庭既失去了曾拥有的资源，也失去了曾经在社区中拥有的地位，而且具有“反常的”家庭结构特征——妻子或母亲执掌家庭大权。在社区和家庭这两个领域，父亲的地位都相对较低。这种状况怎样影响着孩子对父母双方、其他成年人和同龄人的重要性以及父母控制的态度？

在各类研究文献中，有关地位下降对于父子关系产生影响的资料汗牛充栋，特别是有关儿子方面的资料。父亲作为孩子的榜样和价值观的来源，他的魅力与他的职业地位有关：地位越高，吸引力就越大。[①] 尽管母亲的社会声望也部分来源于家庭

① 参阅 M. 戈尔德：《地位对于违法男孩的影响》（安阿伯：社会研究所，1963）；G. H. 埃尔德：《在孩子养育过程中家庭结构与价值观和信念的转变》，博士论文，北卡大学，1961，第 10 章；T. 赫希尔：《违法的原因》（伯克利，1969），第 6 章和第 8 章；还有 A. 斯杜拉：《关于认同过程的社会研究理论》，见 Goslin，1969，第 241 页。

地位，但是孩子们认为这种关联并不那么密切。这些关系表明了经济受损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带来的两个主要后果：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父亲相比较，孩子们对经济受损的父亲评价不高，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认为这种父亲的地位低于母亲。

根据示范理论(modeling theory)[10]，婚姻权力的差异对于孩子对父母评价的影响是相似的，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受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的父亲，在家庭事务的处理上权力小于母亲，而且任何一种状况——社会声望低下或者没什么权力——都无法使孩子把父亲当成他们长大成人后学习的榜样，尤其在充满敌意或者生活动荡的情境中更是如此。

然而，在危机境遇中这种因果顺序并不明确。由于有效地解决问题有助于加强领导者得到尊重和支持的基础，所以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那些因为某位父母未能履行职责或因为传统因素而主宰家庭事务的父母，很容易成为责难和敌视的目标。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父亲丧失职责是母亲居于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大萧条中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婚姻结构比男性占支配地位更能让人接受。如果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的尊重和感情中，母亲是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物，那么这种地位可能更多地是来自父亲优势的弱化，而不是来自于母亲的权力和个人品质。

在孩子的情感中，经济受损的父亲所处的困境，使得同龄人对孩子在感情上和道德上的意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孩子在

---

[10] 这里参考的是得到认同的社会权力和资源理论：孩子们选择效法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控制自己报酬的人所提供的。参阅 Bandura，见 Goslin，1969，第 229—230 页。

情感上的需求在家庭内部得不到满足时，这种意义相对于父母的偏好来说就会增加。从父母那里得不到什么感情上的支持、鼓励和指导的孩子，一般会转向同龄人那里寻求满足；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地会更倾向于从朋友而不是父母那里寻求感情上的支持和引导。[12] 相反，对父母和同龄人持有平等和积极的态度，是那些来自家境良好和民主气氛浓郁家庭的孩子的重要特征。

从这几点来看，这又使人回想起那些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比来自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更倾向于寻求家庭外成年人的支持，特别是那些男孩，他们更多地和朋友一起参与社会活动。但是母亲、父亲和同龄人的相对地位是什么？在提供友谊和忠告方面，朋友比父亲更重要吗？当他们需要的时刻，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是否可能比来自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更依赖家庭外的重要他人（同龄人、教师和其他成人等）？最后，婚姻结构是怎样影响男孩和女孩的相对独立性？在母亲具有决策权的家庭中，是否男孩得到解脱而女孩却受到家庭环境的更多束缚？

陪伴与引导

陪伴（companionship）与引导（guidance）描述了孩子生活中社会对象（social referent）或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两种功能。从孩子的立场来看，如果其他人可以陪伴自己或者可以在道德和价值观上为自己提供引导，那么这些人就是重要他人。就前者而言，孩子可能寻求或更喜欢同龄人的陪伴，而不愿与父

---

[12] 参阅C. E. 鲍尔曼和J. W. 金奇：《四年级到十年级孩子中的家庭变迁和选择同龄伙伴》，载《社会力量》，第37期（1959），第206—211页。有关该文献的评论，是W. W. 哈塔普在《同龄人互动和社会组织》中提供的，见Mussen，1970，第429—436页。

亲或者母亲待在一起，这是孩子开始走向成熟的初始发展阶段。假使家庭变迁和经济受损有关系，这种取向就会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一般说来，随着年龄的增加，从自己的同龄人那里学习价值观的偏好会越来越明显。但是与有关陪伴偏好的转变相比，这种从父母转移到同龄人身上的过程更为渐进，更加具有选择性。因此，价值观的偏好可能是更能区分父亲、母亲和同龄人相对地位的方法。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交往偏好(associational preferences)开始，首先考察孩子在大萧条早期对父母和同龄人的评价。以下部分是高中的孩子对父亲和母亲相对地位的评价。

在经济状况跌到大萧条的谷底后不久，奥克兰的孩子完成了一份有关家庭关系和社会经历的问卷(1933—1934)。其中一个题目为他们假设了一种境遇：如果要去看当地马戏团的表演，那么他们被问及是愿意由父亲、母亲、一群朋友还是最好的某个朋友陪他一起去。每一个对象都有三个选项：第一选择、第二选择和第三选择。这种活动明显地表现出对同龄人的偏好，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选择朋友的比例都很高。男孩最喜欢和父亲一起，其次是最好的朋友、母亲和同龄群体。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女孩对与父亲为伍的兴趣不大，她们略微偏向于选择母亲。总而言之，同男孩的偏好相比，女孩选择的偏向性不明显，她们选择朋友的比例相对高于选择父母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比较经济受损的不同程度对每一种社会对象的平均偏好水平的影响，然后再比较社会阶级的影响。在男孩中，经济受损对偏好的影响一直要大于阶级地位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 A－8)。在劳动阶级中，偏好父亲的孩子相对较少，而对父亲偏好最少的是每一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孩子。只有 30％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之首选是父亲，而未受损家庭的孩子首选父

亲的比例几乎占50%。受损家庭的孩子对待母亲地位的态度并不能弥补父亲相对无足轻重的状况，但是在未受损的孩子中，选择母亲的比例稍高一些。如果把同龄人群体和最好的朋友放在一起考虑，那么同龄人的吸引力则是经济困难对孩子最重要的影响。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受损家庭的男孩对朋友的偏好都最强，女孩也是这样。

来自受损家庭的年轻人对同龄人的兴趣，更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抱负和需求，而不仅仅是社会卷入(social involvement)。事实上，根据经济受损的两个群体中孩子自己的描述，他们都有关系密切的朋友(表中没有显示)，略超过半数的人声称他们曾经有过许多亲密朋友。渴望结交许多朋友而不是几个朋友，在这两个社会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更为普遍，平均差仅为13%。

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女孩的愿望和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之间的差距最为明显：有89%的女孩期望有许多朋友，而只有52%的女孩声称已实现了这个愿望。其他次群体的这种差距都没有这么大。例如在男孩中，只有15%的人的抱负高于现实。经济受损家庭女孩的社会愿望和她们本能地喜欢许多同龄人陪伴的偏好一致，而与希望有一个密友的情况完全相反。有证据显示，爱好集体生活甚于一个好朋友陪伴的孩子，对同龄人更为依赖，更缺乏安全感，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Hartup，in Mussen，1970，第434页)。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生活弥补了孩子在情感方面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通过付出努力后所获成就和家庭经历来获得满足。

除了对同龄人的普遍兴趣外，孩子在对于父母陪伴的偏好方面也极为相似。当经济好转改善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受损的状况时，父亲的声望就会上升，而母亲的声望就会下降。在孩子对

待每位父母的态度方面，这些细微的差别与经济因素的预期影响是吻合的。

交往偏好指认同那些被看成是知己、顾问或者能解决问题的人，尽管他们的相对重要性有些差异。当要求这些孩子列出在危急时刻可以信赖的人（可以是多个人）时，他们大多数把母亲放在首位，其他的人还包括父亲、兄弟姐妹、教师和同龄人。孩子们可以选择一个以上。正如人们估计的那样，女儿比儿子更倾向于信赖母亲（82%对65%），而男孩则更多地求助于父亲（49%对36%）。从个人角度考虑，兄弟姐妹、教师和朋友在重要他人的名单上排序很靠后，提到各项的比例都不超过18%。不过如果把它们放到一起考虑，也是除了父母之外孩子主要可以信赖的人。大约有半数的男孩至少提到了这三个社会对象中的一个，女孩中则为39%。

与社会偏好相一致的是，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来说，作为引导孩子的人，母亲比父亲重要得多（表A－9）。在每个社会阶级中，也常常是这类家庭的成员更多地选择兄弟姐妹、教师和好友。

就陪伴和引导而言，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使孩子的对象取向（reference orientation）发生了两个普遍性变化。随着这两个社会阶级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无论是作为陪伴者还是作为危急时可以信赖的人，母亲的重要性都超过了父亲。尽管母亲的中心地位在女孩的心目中更明显，但是男孩也受到了母亲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困境的加强，父亲的地位总体而言绝对下降了，而母亲的地位则上升了。综合来看，这些不太明显的差异揭示了父母双方相对地位的变化。

第二种变化是，如果从重要他人（即父母以外被孩子看做关系密切的人和遇到困难时的咨询者）的排列顺序来看，这种转变

也具有额外的意义。最好的朋友和较大的社交圈子，只是在父母之外重要他人的一种类型，而且可能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类型，从长远来看更是如此。哥哥姐姐和家庭以外的成年人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代替父母的人，尤其是经济状况损害了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支持、抚育和社会置位(social placement)时，这种情况最可能出现。不管是通过客观上的物质匮乏还是通过日益削弱的心理反应，这种伤害都在经济受损家庭的父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它不仅仅限于对儿子的社会影响。在更广泛的研究文献中，有证据表明，如果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对孩子来说父母之外的社会对象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有研究表明，在关于自己未来方面更依赖同龄人忠告的情况，在地位低下和丧父家庭的男孩中最为明显。[13] 在那些试图向上爬以摆脱其低贱阶级出身的年轻人的生活史中，母亲、教师和其他有文化的成年人是反复出现的重要他人。大萧条中的经济状况，总体而言使这类人受到孩子的青睐。

青春期中期父母的魅力

如果我们把分析的范围扩大到大萧条十年的后半期，这时奥克兰样本中的孩子正在上高中，那么就有两个问题跃然纸上。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对父母评价的连续性和变化。在大萧条整个十年中，在经济受损父母的后代眼中，母亲是否一直保持着更为突出的地位？一方面，孩子们在大萧条早期对父母的感情可能经历过一种循环和增强的过程，这激发了对父亲的否定或者

---

⑬ 这项发现来自作者所主持的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有关家庭以外的人对于来自下层阶级有进取心的年轻人的重要性，可以参阅 R.A.埃利斯和 W.C.莱恩：《对向上流动的结构性支持》，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28 期(1971)，第 743—756 页；埃尔德：《青少年的社会化与人格的发展》(1971)，第 91—94 页。

矛盾态度，这种态度又和使亲子关系进一步两极分化的感情相似。另一方面，人们预计，也许随着经济的复苏，父亲的相对地位会有一定改善。

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母亲占支配地位对于孩子和每位父母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婚姻互动中的权力平衡是怎样影响这些关系的？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母亲居于支配地位，是否至少部分是因为她在家庭事务中占支配地位？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不是一种备受欢迎或者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家庭格局，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也同样如此。然而，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标新立异或者反常的适应策略，在危机境遇中往往被视为正当的或合法的。

对父母的情感和价值方面的取向，由相对地位和绝对地位的九级量表来测量。每一个量表代表了三个评判人评分的平均值，这些人都曾看过有关大萧条后半期奥克兰孩子的观察材料和这些孩子的自述材料（参见附录 B）。有关相对地位的量表，测量了孩子更亲近母亲、而不是父亲的程度。低于 5 分说明对父亲的感情更深厚，而高于 5 分说明对母亲有更深厚的感情。在不同的情感层面上，对父母的偏爱也不同。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即使对父母双方的感情都不怎么样，但是他仍然有可能感觉和母亲更接近一些。为了解情感态度的浓厚程度，我们选择了两个九级量表，以测量孩子在多大程度上把母亲和父亲看做是有魅力的人。在这些量表中，富有魅力的父母构成了一个潜在的榜样或模范，同样也构成了孩子感情的源泉。对于父母来说，魅力的意思大概和术语“自觉认同”（conscious identification）的一般含义相类似。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发现，大萧条的初期，在经济受损家庭和劳动阶级家庭中父亲的魅力降到了最低点。父亲的这种

地位也是家庭境遇的产物，在这种境遇中，如表 A－10所表现的那样，母亲被看做是对家庭决策最有影响力的人。就父母双方的相对地位而言，经济受损和母亲的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比起把父母一方看成是具有魅力的成人形象的看法关系要更为密切。

在形成对父母评价的过程中，女孩似乎对家庭关系最为敏感，而男孩的态度则受家庭地位的影响更为强烈。自述家庭有过严重冲突的女孩，对父亲的评价相对较低，而家庭地位与这种评价几乎没有什么关系。[19] 对男孩态度形成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家庭冲突的激烈程度。在女孩眼中，母亲的魅力随着家庭冲突的水平上升而略有下降，但是在男孩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这些性别差异与两种性别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别是一致的。与男孩相比，女孩对人际关系特别敏感，而且因为参与家庭管理活动，她们亲眼看到了更多的家庭混乱。

经济受损和母亲的支配地位更多地增加了对母亲的肯定评价，而不是削弱了孩子们感受到的父亲的魅力。不论父亲是否在家庭中拥有控制权，对他们的否定评价都与经济受损或者孩子感觉到的母亲权力没什么显著的相关性。不过，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这两种条件——尤其是在女孩中——都明显降低了父亲相对于母亲的地位，阶级地位的不同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母亲在情感上的中心地位，部分是孩子们感觉到的她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结果。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而言，他们中大约有1/3的人认为经济受损对于其与母亲亲密程度的影响，是通过母亲在家庭中的权力而产生的。[20]

---

⑲ 在女孩中，父亲的魅力和感觉到的冲突的相关系数为－.25，和家庭地位的相关系数为.14。在男孩中，相同分析产生的 r 相关系数分别为－.08和.49。

⑳ 如果母亲占支配地位的影响被排除在外，经济受损和孩子感觉到与母亲的亲密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就下降到.27。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母亲的有利地位也表现在，当家庭发生冲突时，孩子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根据后来在这些孩子成人后调查所得到的回溯性数据(1964)，我们发现儿子和女儿都更容易与母亲结成统一战线(51%)，这种比例高于对父母双方谁都不帮的比例(40%)，更高于站在父亲一边的比例(9%)。在大萧条中，只有极少数的家庭模式具有偏爱父亲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在儿女和母亲结成联盟的经济受损家庭中，这种情况就更为罕见。有56%成长于受损家庭的孩子声称，当父母的意见出现分歧时，他们通常站在母亲一边；相反，未受损父母的后代中只有1/3这样做。无论是孩子的性别还是家庭地位，都不能改变这种结果。如前面的分析曾提到的那样，与母亲结盟部分是孩子感觉到母亲在家中掌权的结果。母亲的权力越大，她在冲突境遇中所处的位置就越有利。[④]

总而言之，父母的相对地位(不是他们的个人地位)最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变迁的伤害。一般说来，和母亲相比，父亲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是经济困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却微不足道。假定这种状况与家庭经济受损以及受损的父亲在社区中可感觉到的地位有关，那么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并未因自己对于孩子重要性的丧失而感到痛苦。当然，我们确实不能对所有基于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之上的关系和意义做出评价。为了保护他们生存的社会空间，有些母亲会在孩子面前虚构或否认家庭的真实状况。在其他情况下，困境有可能增强孩子们的这种趋势：把自己的父亲理想化，夸大他们成功的业绩，对他们的败绩却视而不见。尽管其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

④　在受损和未受损的群体中，我们比较了母亲占支配地位的家庭和父亲至少和母亲平分权力的家庭。在两个社会阶层中，平均差异为17%。

关在家庭生活中制造神话和理想化的例证，但我们却找不到关于这种倾向的可靠评估。

第二个主要发现是在高中学生中经济受损和对家庭之外他人的偏好之间的关系（也可参见第四章）。根据母亲的描述(1936)，与未受损的家庭相比较，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孩子，更愿意与朋友而不是与家人一起外出，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们更是如此。我们同样发现经济困境和对非家庭成人的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在混乱的社会境遇中，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更经常寻求成人的注意和陪伴，并且对长大成人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对于这种取向，也许可以用在受损家庭中父亲的地位相对较低以及这对于孩子的情感和发展需求的影响来解释，另外孩子在经济受损的境遇中所承担的角色可能也是一种解释。正如第四章所揭示的那样，有工作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加认同家庭以外的成年人，而不是认同其他孩子。我们由此提出一个假设：家庭的经济受损增加了孩子对于家庭以外成年人关注或者支持的需要，增强了他们对获得朋友接受的渴望；与此同时，通过在社区中作为学徒身份的实践经历，就业增强了孩子对长大成人的兴趣。[22]

家庭结构与社会独立性

如前面的章节所显示的那样，经济受损对男孩和女孩社会独立性的影响明显不同。男孩大多通过经济受损和工作经历赋予的自主性去获取独立，而受损家庭的女孩比未受损家庭的女

---

[22] 正如第四章提到的那样，一方面，青少年追求独立并不与渴望成人的理解和接纳不相容，另外一方面也不和同龄人的卷入相抵触。参见C.M.卢卡奇和E.霍罗克斯：《分析青少年需求实验方法》，载《儿童发展》，第31期(1960)，第479—487页。

孩更不自由，在劳动阶级中更是如此。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困难都增加了男孩对父母权威的叛逆，也增强了他们要求独立的决心，而受损家庭的女孩却最容易接受父母的安排。[22] 这些差别至少部分是母亲居于支配地位及其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实施控制所带来的结果吗？在家庭中母亲影响力的上升是否会由于父亲地位的衰退而削弱了父母对儿子的控制，却又增强了母亲对女儿生活的影响？

根据对这些孩子成人后所进行的调查(1964)，父母之间的权力结构与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有关，但是他们对儿子和女儿控制方式却有所不同。从这些回溯性的数据中，人们可以了解大萧条期间父母双方对孩子相对的严厉程度，以及与其他父母的态度相比较的情况。随着母亲权力的增加，女儿更有可能认为母亲比父亲更严厉。[23]相反，对家庭中的男孩而言，不管父母谁掌权，都不会在任何一位父母对他是否严厉问题上出现什么差异。尽管据大多数儿子们回忆，在母亲居于支配地位的家庭中，他们受到的控制相对较弱。随着父亲在家中权力的弱化，同其他家庭相比，父母控制的严厉程度也随之降低。但在女儿的看法中没有发现这类差异。

---

[22] 运用1936年和母亲访谈所得到的报告，我们发现，从未受损的家庭到受损的家庭，对父母的判断产生疑问的比例，在中产阶级的男孩中从8%上升到23%，而在劳动阶级的男孩中从25%上升到46%。未受损家庭的女孩更不愿意接受父母的权威，在中产阶级中的比例从25%下降到19%，在劳动阶级中从38%下降到29%。

[23] 我们把1964年问卷中的两个问题用于分析之中："爸爸和妈妈谁对你要求更严？"；"与你认识的孩子的父母相比较，你认为自己的父母是更加严厉，还是更不严厉？"第一个问题中，五个选项从"总是父亲"(1分)到"总是母亲"(5分)；第二个问题中，五个选项从"父母更不严厉"到"父母更加严厉"。用五级量表衡量母亲权力所得到的结果，和女孩认为母亲相对严厉程度的相关系数为.36，在男孩中为.02(都是tau系数)。母亲的权力和父母的严厉程度只有在男孩中才是负相关(-.16对女孩的.02)。

随着母亲权力的增加，男孩更有可能享有社交自由，比如参加学校夜间的社交活动、与成群结队的孩子们一块儿聚会，而女孩在母亲居支配的家庭中比在其他类型的家庭中受到的限制更多。母亲在1936年的访谈中曾经提及的有关独立形式的信息，在第四章曾被用来测量孩子的自主性问题。45%的来自母亲居支配地位家庭的男孩参与了一般的社会功能性活动和与异性之间的交往活动，而那些父亲在家中更有权威的男孩参加这两类活动的只占1/3。在父亲掌权的家庭中，女孩比在由母亲当家的家庭中更加独立，两者的差异为14%。[㉗] 无论是在哪个性别群体中，母亲居支配地位的影响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受损对自主性的影响，虽然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这种影响都是一致的。甚至在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中，家庭的领导权也使他们的社会独立性出现了差异。

家庭控制的相对减弱和长大成人的渴望，有助于孩子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和较早认同成人地位，这在与异性交往的领域中作用更为明显。在缺少家庭约束的情况下，孩子初次约会时年龄可能很小，随之而来的是经常的约会、亲密的行为、山盟海誓、最后导致孩子在相对年幼的时候结婚。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这种发展历程更多的是与男孩而不是女孩的生活境遇一致，我们已有的数据从总体上显示出了这种差异。

到了高中的后几年，样本中的女孩在与异性交往方面比男孩子更为活跃，而经济受损只是增加了男孩参与这些活动的机会。[㉘]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在高中以前就开始约会、开始与异

㉗ 在母亲占支配地位的家庭中，30%的女儿参与了学校夜间的活动，和一群男孩女孩来来往往，而父亲更有影响力的家庭中女孩参与这些活动的比例为44%。

㉘ 有两类数据被用来衡量孩子与异性交往的经历。在1936年的访谈中，我们询问被访的母亲她们的儿子或女儿是否给异性打过电话。对这个问题回答的

性交往以及约会次数的增加，都在受损家庭的男孩中最为常见。对女孩而言，特别是在控制阶级变量时，这些行为与经济受损没有多大关系，尽管对于经济受损家庭中的女孩而言，约会似乎并不常见。

如大量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婚前性经验是早期异性交往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相关（参见 Moss，1964）。在奥克兰样本中，在劳动阶级家庭中长大的男性和女性提到婚前性行为的最多，在两个阶层有受损背景的人提到这种经历的较少。[27] 很明显，家庭地位的影响掩盖了经济受损更为微弱的影响。众所周知，和异性交往的发展过程以及婚前性关系影响了孩子结婚的时机，为此在第八章讨论成人职业生涯的形成过程时，我们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与阶级和经济受损的关系。

补充性资料来源于 1958 年访谈中有关孩子与异性交往的材料。两种衡量约会的方法，是根据一些开放式问题的回答构建的（1958）：第一次约会或者参与和异性有关的事务的年龄（高中或高中以后，或者初中）；约会的次数（很少或从不约会，到约会次数一般和次数频繁）。女孩更喜欢和异性通电话（42% 对 22%），尤其是在经济受损的群体中。在男孩中，这种交往的形式随着经济受损状况的恶化而增加，在中产阶级中从 13% 上升到 26%，在劳动阶级中从 12% 上升到 38%。这些差异在女孩那里反了过来：在中产阶级那里从 64% 下降到 50%，在劳动阶级那里从 40% 下降到 28%。只有在男孩中，初次约会年龄较小和约会次数相当多和经济受损有关（tau_c .36 和 .16）。对于女孩来说相应的值接近于 0。无论是在男孩中还是女孩中，这些指标和家庭地位间的关系不会因为其所处的境遇不同而有所不同。

㉗ 有关性行为的信息是从 1958 年的访谈中获得的。尽管这种回忆的有效性令人置疑，但是承认婚前性行为的关联仍然和以前的研究一致。无论是在男孩中还是在女孩中，自述的婚前性行为和低贱的家庭地位有关（$tau_c = -.37$）。如果控制阶级变量，婚前性行为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只比未受损的家庭稍微普遍一些（对男孩女孩来说，这种差异都不到 10%）。

大萧条中的父母和他人：全面回顾

大萧条的孩子们心目中的重要他人，纪实性地描述了一个人们熟悉的主题：在复杂的工业社会中家庭与职业体系之间的相互信赖；男性的工作地位和收入对于他在家庭中的社会与情感地位的影响。不论在中产阶级还是劳动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最可能认为父亲在权力、赡养家庭和魅力等方面远逊于母亲。但是这种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父亲，甚至不适用于所有受损的父亲（尽管这种结果主要集中于受损最为惨重的家庭群体中），因为还存在着角色支撑和男子当家的其他根基。

经济困难和父亲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未经验证的解释过程。男人、其他家庭成员和更大的社区是怎样用来解释经济受损或失业的呢？如果一个价值体系推崇的是个人责任和自我满足的话，那么大萧条中的男性受害者因为对逆境没有或者很少设法加以控制而经常受到责备，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了。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而无法赡养家庭的丈夫和父亲，也普遍接受了这种实用主义的自我评价。根据记录显示，那些失业或处于困境中的劳动者，不是把自己的境遇归因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萧条，或是归因于超越个体行动者及其理解能力的一种力量，他们由于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后果而惩罚自己，因而习惯于将敌意与沮丧发泄到自己身上。[23]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奥克兰样本中的父

---

[23] 有关美国人在大萧条中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的有用的资料来源，是由R.F. 卡罗尔的论文提供的，参见《大萧条对于美国人对待成功态度的影响：有关N. 文森特、皮尔.D. 卡内基、J. 奥康纳项目的研究》，博士论文，1968。大萧条中失业的研究文献是有关男性谴责自己的趋势的信息的另外一种来源。参阅扎瓦兹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失业的心理后果》（1935）。

亲们是怎样解释自己在经济上的失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诸如挥之不去的罪孽感和防御性反应（社会退缩、酗酒等）之类的自我惩罚，都将增加他们失去地位的可能性。

在家庭内部，我们根据母亲的权力或才智，来解释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她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优势，因为相对的权力和魅力是相互关联的。这种观点中依旧还未考察的是，地位低下对所有家庭成员的含义，尤其是父亲对此的反应。在大萧条中，父亲居于舵手的位置并拥有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威，是最为广泛接受的一种家庭生活结构。这种标准是对于男子汉气概、个人价值和重要性等实用主义标准在传统上的对照物。在传统的理念中，家庭中的男性角色和从属于妻子是不和谐或者不一致的，它们在结构上是互相矛盾的，也是彼此产生敌意的根源。

由于关于奥克兰父亲们的数据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对这类矛盾如何做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还是个谜。虽说如此，父亲在社交上和情感上退出一些家庭活动，在家庭采访的众多案例中还是有充分记录的。除了其他的退缩形式之外，酗酒、孤立和独善其身，暂时减小或淡化了父亲面对自己不再是一家之主的严酷现实。对妻子支配地位的有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些适应在情感上导致的后果。一项研究表明，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父亲对他们的热情和情感上的支持随着他在家庭事务上相对权力的增加而增加，孩子们认为由母亲当家的家庭中父亲比处于领导地位的父亲要冷漠得多（Bowerman and Elder，1964，第 563 页）。在奥克兰样本中，父亲对孩子在情感上保持距离或者漠不关心，有可能是造成经济受损家庭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母亲在情感上地位突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是不太愿意去鼓励或支持他人的，也不太愿意与他人分享什么或者交流

什么。[29]

正如我们曾注意到的，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母亲在孩子心目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同时孩子在家庭之外还有一大批可以咨询的人物，这个延伸开的范围是对家庭内不断减少的变化的补充性调整。对这两个社会阶级的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来说，成年人对他们越是重要，他们就越是要寻求这些人的陪伴和支持，对于好朋友和同龄人也是这样。虽然对成年人的兴趣经常与对朋友的交往并不一致，但二者都足以把年轻人从父母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并为孩子获取等级制的与平等的成人关系提供补充性的社会经验。

在受损家庭的男孩中，以同龄人和异性朋友为取向与他们因工作经历而强化的社会独立性以及母亲居于支配地位的家庭中不断削弱的对儿子的控制相类似。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男孩的社会独立性随着经济受损程度的加深而增强，他们与异性交往的经验也是如此。对于同龄人陪伴的偏好在受损家庭的女孩中也同样明显，但是她们没有男孩那样的社会自由，劳动阶级家庭中的女孩尤其如此，她们（来自受损群体）也不可能像男孩那样去约会。强烈的交往欲望或需求与相应经验之间的差异，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大萧条中家庭生活面临的更重要问题之一，是在什么样的

---

[29] 如果男性把男人的支配地位作为自我评价的基础，那么主观上的受损感可能是屈从于妻子的一个结果。这个标准可能代表了男性大萧条前在家中的地位，对于大萧条中依旧维持着在家庭中统治地位的男性，也是这样。有关困境中的相对损失及其社会后果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可以参阅巴顿对于利他主义社区（altruistic community）的分析，见《灾难中的社区》（1969），第5章。

条件下家庭的凝聚力会随着经济受损和失业而得到加强或削弱。[30] 由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变化对家庭关系的有选择的影响(selecterd effects)上,所以我们把父亲依旧保持着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和对儿女来说依旧重要的受损家庭的重要意义最小化了。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明显发现在为数众多的经济受损家庭中仍然是父亲说了算,他们对孩子的情感依旧有着重要影响。要对大萧条做任何社会分析,这些家庭叙述的故事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据此做出下列论断将是不明智的,即认为与那些母亲获得影响力是以牺牲父亲为代价,并且孩子们成为家庭经济生产性成员的家庭相比,这些家庭能够更加有效地适应经济上的困境。适应是个体或群体与社会境遇相互作用的一种功能,在对其做出任何判断之前,我们都需要获得所有有关这种相互作用、它的可替代物及它带来的后果等方面更多的信息。

奥克兰家庭在大萧条前的阶级地位成为理解我们分析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样本中的非体力劳动家庭(nonmanual family)是稳定的劳动阶级的主要成员。只有少数家庭属于下层阶级,它们组成了在大萧条中受损最为惨重的次群体。无论是在经济短缺时代还是在富裕时代,处于社会下层的父母和孩子们日复一日地为生存而战,从未停息。与其他对有关大萧条中家庭的调查不一样,目前的研究对理解这个次群体面临的危机和适应方面没有什么帮助。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考察了在大萧条中经济状况的相关情境下的家庭关系。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这些关系建立在对

---

[30] 对于婚姻整合(martial integration)的研究和理论的卓越综合分析,可以参阅来文杰:《婚姻的整合和分裂》(1965)。

于孩子的成熟和社会化进程来说相对独特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对于年长和年幼的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以下三个年龄组的简要比较可以说明这些选择性差异(selected variation)，三个年龄组按照出生时间来划分：1910—1911年、1920—1921年(奥克兰样本)、1928—1929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家庭解体、母亲居于支配地位和父亲的“缺场”对他的伤害逐渐减小了。孩子的年龄越大，家庭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迁对其产生负面心理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应地，那些在大萧条初期还处在依赖父母阶段的最为年幼的出生组中的孩子，他们发展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模式、认知发展和社交能力可能受到家庭危机的负面影响。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年龄最大的出生组，他们在1932—1933年期间达到了法定年龄，这个群体在构建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更容易受到经济受损因素的伤害，而不是受到危机中家庭内部世界的影响。处于这些群体之间的就是奥克兰的孩子们，他们已经不再依赖父母了，但是他们仍然年幼，不足以承受缺乏就业和教育机会的全方位冲击。当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年龄已经足以使他们能在受损家庭的经济中一显身手，但是他们在情感状态上、未来取向和成就方面也受到了经济受损的影响。

大萧条中家庭生活的另外一份遗产，表现在成年后的孩子对待他们父母的态度中。这些态度将会更多地告诉我们30年代的童年对于这些孩子现在的意义、父母在危机中的角色和有效应付危机的意义。当奥克兰样本中的成员离开家庭时，他们对父母双方持宽恕还是否定的态度？在事件的内幕被揭露时，他们采取的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还是更加吹毛求疵的批评态度？为了总结我们对大萧条中家庭关系的分析，我们将测试孩子们对父母的不同看法，探讨它们对代际关系的意义。

孩子成年后对家庭和父母的看法

家庭和父母对成年孩子的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审视。首先，我们比较经济受损、家庭结构和阶级出身对于家庭一方或者双方亲属和亲戚的相对影响。这里的重点是家庭纽带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随后我们将考察孩子成人后对作为家长的父母的态度，他们与大萧条中家庭状况的关系，以及30年代孩子们对父母的态度在他们成年后的表现。在1958年访谈中，我们用一系列开放式问题衡量了孩子成年后对家庭和父母的取向。

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亲属关系（kin relationship）和聚会（gathering）的现实意义。由于对家庭中的丈夫或妻子的态度没有作系统的划分，我们构建了单一的方法来衡量孩子对于亲属的总体情感。回答可以在三种答案中选择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密切"、"重要，但不是非常密切"和"家庭意义不大或不重要"。一般说来，妇女在家庭和亲属活动中是更为中心的角色，而"男人只是代际间家庭的声望、名誉和家庭本身在时间上延续的象征性载体"。[30] 这种功能性差异反映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成年人的感情中。女性更有可能认为家庭纽带非常重要：70%的女性选择了两种肯定回答中的一种，而男人则只有43%选择肯定的答案。

作为一种价值观，女性对于家庭纽带的看法，既不会受经济受损的影响，也不会受阶级背景的影响。事实上，与那些未受损家庭的子女相比，受损家庭的女儿更倾向于把亲戚看成是重要

---

[30] A.S.罗西：《给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命名》，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0期（1965），第503页。

他人，这两个群体中的均差为15%(1929)。家庭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种区别，并且使人回忆起女性之间的纽带在家庭深陷贫困泥沼之时所显示出来的强大力量。在母亲居于支配地位家庭的女儿中，78%认为密切的家庭联系非常重要，而那些生长在父亲掌握大权的家庭中的女儿，只有66%这么认为。然而，由于受损和母亲权力的影响相对较小，从经济受损到母亲占支配地位，再到家庭纽带，这一系列因果顺序只是启发性的。

男性的态度同样与经济受损和权力模式有关，但是这种相关性却是反向的。来自不是由母亲居支配地位的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人，最经常提到密切的家庭关系，而且阶级背景不会使这个结果出现差异。奥克兰样本中只有1/4的男人选择亲属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未受损父母的儿子更多地持这种态度(43%对受损的13%)。同样，在母亲居于支配地位的家庭中，只有11%的儿子声称亲属关系"非常重要"，而在父亲权力更大的家庭中的儿子如此认为的有41%。作为一种中介变量，孩子所感觉到的母亲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说明的是经济受损对于和亲属主观联系(subjective tie)的影响。[30] 如果控制支配模式这个变量，那么原来30%的差异大约会减少2/3以上。那么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而言，家庭纽带的重要性取决于同性父母的相对权力。在异性父母一方更有影响力时，在心理上疏远亲属的现象更为突出。

这些性别的差异，似乎是来自于那些父亲或母亲掌权的家庭所确立的亲属关系的种类。由于父亲在家庭中支配地位的丧

---

[30] 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与男性对亲属依赖的削弱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用不同的代际流动解释的。向上流动或者向下流动都无法解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态度。

失,由女性领导的家庭专门和亲属网络中其他家庭的女性交往,因此逐渐发展出主要对女儿有吸引力的关系。这假定了在亲属互动的领域中,走出第一步的是占支配地位的父母,而母亲最可能喜欢和女性亲属联系。即使在经济和社会地位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孩子和家庭的兴趣也为亲属群体中女性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共同的基础。[33]

有一种文化认为,父亲是家庭法定的领导者,并且按照他个人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他的地位,这样,地位不平等和不协调必然会使男性在与亲属交往时存在心理障碍,这是大萧条时妻子掌权家庭中丈夫所处的一种特点鲜明的境遇。例如,众所周知,地位差异对兄弟之间的感情有负面影响。[34] 假设男性亲戚对男孩的影响特别突出,那么在父亲在大萧条中因其经济和家庭角色而保持了权力地位的家庭中,儿子们与亲属之间一种社会化的友谊则表现得最为普遍,数据也证实了这种联系。由于缺乏有关亲属关系的信息,在奥克兰样本中这种解释的可靠性无法得到证实,而且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探讨过婚姻权力和子女们的亲属纽带之间的关系。[35]

虽然大多数受损父母的女儿成年后都感觉与亲属的关系密切,而且曾在大萧条期间和母亲结盟,但是仍有很大比例的人不记得"好"家长是母亲还是父亲。在1958年的访谈中,孩子成年后对待父母的态度被用作两种评估的手段。一种指数衡量的是在30年代还是孩子的被访者对于父母对自己的理解程度:"非常满意"、"满意"、"根本不满意或不怎么满意。"第二个指数测量

---

[33] 参见B. 亚当斯:《城市环境中的亲属关系》(芝加哥,1968)。

[34] 同上书,第4章。

[35] 有关代际关系的文献的全面回顾,见M. B. 萨斯曼:《美国社会中成年后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见Shanas and Streib,1965。

的是被访者对曾是家长的父母的评价；对于每位父母的印象被分成"非常亲切"、"亲切"、"否定的或复杂的感情"以及"激烈地否定"。前两类被界定为总体来说还是积极的或者满意的印象。如表A-11所示，大多数女性对父母的评价都是良好的，但是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给予父母良好评价却极为少见。

在对待母亲的态度方面，引起争议的不是她的同情心或善解人意的态度，而是她作为一位家长的地位。样本中的妇女大多数都认为母亲在她们少年时期能够理解自己，无论是经济受损还是阶级背景都不能使这种评价有什么改变。在孩子的心目中，受损家庭的母亲作为父母的水平，远远不及未受损家庭的母亲，而受损家庭中的父亲在善解人意和作为父母的品质上得到负面评价的比例最高。大体上来说，从大萧条到50年代后期，父亲们在女儿感情中的地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受损群体的女儿在30年代对母亲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尽管到了50年代，这中间有40%以上的人认为母亲至少在某些方面对自己的影响是最令人不愉快的。

正如对亲属的感情一样，女儿对母亲和父亲作为父母的行为的评价，是决定家庭权力结构的一个关键因素。据女儿回忆，随着母亲影响力的增强，母亲和父亲为人父母的水平都下降了。在大萧条中，母亲的权力似乎是一种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应付经济困难的形式，至少在青少年的眼中是如此，但它显然也是孩子成年后对父母所持否定性情绪的一种主要来源。在母亲处于支配地位家庭的女儿中，只有44%的人对作为家长的母亲持肯定态度，而在决策过程中父母地位平等或父亲地位高于母亲的家庭中，有86%的女性对母亲的印象较好。在这几类家庭结构中，对父亲评价的差异也是相类似的（50%对77%）。

作为经济受损和孩子成人后对父母评价的一种关联，母亲

的权力成为影响链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环节。事实上，经济受损的主要影响是通过母亲的权力以及它在50年代对女儿的负面意义实现的。对那些成长于父亲当家或者父母地位平等家庭的女儿来说，经济受损对她们成年后对父亲和母亲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当然，婚姻权力这种居中的位置不能说明，为什么经历多年以后女儿对专制母亲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在我们对此加以探讨以前，先看一看男人的态度中是否也有相似的变化。

从总体上说，在对父母双方的评价方面，男人和女人都极为相似，男人对于父母不可能有比女人具有更为消极或更为积极的印象。然而，男人在父母理解自己这一项上给予的评价更为肯定，尤其是对母亲的肯定方面这种差异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多数男人都认为母亲更加善解人意，而女人中持有这种看法只有不到3/5(男人89%对女人59%)。父亲在对孩子的理解上得到儿子的肯定评价，而女儿给予父亲肯定评价的相对较少(儿子67%对女儿53%)。

和经济受损相比较，阶级背景对男人态度的形成，特别是在如何看待父亲方面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男人对父亲的善解人意和善为人父方面的态度，与他们经历过的经济困难没什么关系，除了阶级出身之外。令人惊讶的是，同来自中产阶级的男人相比较，劳动阶级的男人对父亲的回忆显得更为积极肯定，尽管绝对受损的严酷现实带给这两个阶级的差异是完全相反的。就父母的善解人意和作为家长的水平两方面而言，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男人中大约有4/5对父亲持肯定评价，而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男人中只有56%的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对母亲的态度则不受阶级背景和受损状况的影响。

对父亲的评价，似乎应该把情有可原的环境(extenuating

circumstance)考虑在内，如大萧条时养家糊口的重担。在有些访谈中，来自受损家庭的男人通过指出诸如他"已经尽了全力"、他表现得非常"勇敢"等等，来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积极评价。在每个社会阶级中，这种评价一般都是针对处于经济受损境遇中的父亲的。

那些在青少年时期与母亲而非父亲关系更密切的成人中，男人似乎比女人对作为家长的父亲的态度更为宽容(表 A－12)；但是这种早期的偏好不是一个准确衡量他们现在怎样看待父母双方的指标。在女性中，对父母的感情显得更加稳定，对父亲的负面评价更是如此，尽管这种感情的基调并不稳定。即使我们把分析延伸到每一位父母对青春期子女的魅力的特定评分上，这些结果仍然与表 A－12 中列出的模式极为相似。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30 年代的经济困难对妇女自述的家庭纽带的影响比起对于父母的善解人意和作为父母能力的评价的影响，无疑要小得多；但在男人的态度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模式。家庭的不幸与他们如何看待父母关系不大，虽然它常常会削弱他们与家庭和亲属的关系。他们和家庭关系的不断被削弱，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母亲的显著地位。如果这些男人认为他们的母亲大权在握，那么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家庭纽带会在自己的社交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把这个结果诠释成这样一种证据：家庭依附的意义取决于同性父母的相对权力，而亲属一般对父亲居支配地位的儿子们来说才更有意义。有些男人在情感上可能也会依赖自己的母亲，尽管这种依赖是怎样影响到他在亲属网络中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仍然不甚明了。

女性对父母的挑剔与她们所处的受损地位密不可分，也与她们在家中感觉到的母亲影响力有关。她们感觉到的母亲权力越大，对母亲的负面评价就越多。在此，我们对这样一种趋势尤

为关注：在从少女时代过渡到成人时代的过程中，女儿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母亲的批评更加严厉。母亲的支配地位或受损家庭的哪一方面能够解释这种趋势呢？比如，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她们对父亲的看法有明显的变化，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为一个群体，父亲依旧是最没有魅力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去分析一些对母亲产生不良印象的原因。母亲行为中有什么过失被揪住不放？从对一些定性材料的总结来看，我们确定了最经常出现在苛刻评价中的普遍抱怨：对母亲的亏欠和义务。

根据典型的对于母亲特点的描述，母亲有意识地把自己为家庭付出的劳动或努力看成是极大的牺牲，看成是一种只有孩子牺牲他们的独立和诚实才能加以补偿的贡献。实际上，有的母亲尽力避免所有类似的全面回报，以使孩子对其始终感到亏欠，这种感觉常常在年轻人离开家以及成年后还保留着。亏欠、义务感以及依赖，都指的是亲子交换之间的不平等性。放弃对父母的义务，目的在于使这种关系恢复平衡。但父母却以不同的方式鼓励孩子去承担义务："本来我用不着这么辛苦地工作，本不需要为了你的教育存更多的钱，但是我这样做了"；"别忘了，为了你能够穿好吃好我都放弃了什么"；"想想我为你做的一切，你至少也应该这样对待我"。

牺牲性投人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他人的爱慕、感激和称赞——感到人们需要自己，自己不仅重要而且颇受人尊敬。这些反应代表了接受别人的牺牲所要付出的代价，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接受。当子女长大成人以后，父母牺料性的投人，将会迫使孩子在进行重要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在什么地方居住？找什么样的工作？到哪里去休假和过节？当受惠者这样解释这些牺牲的时候，那么牺牲就成了权利和义务的来源，但是至

少这种反应是颇成问题的。如果过度强调孩子应有的亏欠，并把它作为控制孩子的一种工具时，亏欠就孕育成腐蚀义务感的仇恨。

对一个有着占有欲或者控制欲的家长所肩负的义务，从根本上就与孩子独立的需求、特别是与成人生活的需求不一致。在奥克兰样本中，孩子长大成人后的岁月一般都有这样的显著特征：母亲的"牺牲情结"和对母亲亏欠所产生的压力，成了孩子必须自觉去面对的问题。这个时刻，孩子也对居支配地位母亲的控制策略越来越感到气愤。用一位被访者的话来说："母亲非常老练地扮演着牺牲者的形象！实际上她是非常自私的。我记得她是一个有着非凡勇气的坚强的人。但是我很少想到她。"

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境遇，正好适于让母亲扮演长期受苦和作出牺牲的角色。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使得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较大的社区中更是如此，而且主持家务的母亲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不管家庭是否变得更为团结，这种情况都提高了孩子们回应和感激的补偿性价值。在女儿们的记忆中，那些具有牺牲情结的母亲忍受着低人一等和缺乏安全感的痛苦，她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和虐待。她们不断地制造不幸和困难，以夸大自己眼前所处的困境。她们有时对家庭成员支持性的建议还会加以贬低和批评，好像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弥补她们付出的牺牲。

母亲"使我们感到愧对于她"，恰当地总结了女儿的感情。有一位被访者回忆起母亲"希望每一个人都爱她，因为她做了这么多，因为她工作得如此艰辛，我们都欠了她。"另外一位妇女痛苦地回忆道：当"母亲给我们什么时"，便期望着有什么回报。"接下去，你就会希望自己没有从她那得到任何东西，因为她总是指责你不为得到的一切对她心怀感激。"她补充说道："母亲总

是让我们感到问心有愧，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她用一只手给予，却用另一只手打击别人。你需要这种感情，但是却害怕接踵而至的东西。"[35] 在这种家庭境遇中，妇女最常见的顾虑之一，是母亲令人讨厌的影响，她们感到母亲一直在干预自己的生活。一位妇女说，"我担心，母亲和她的影响是笼罩在我和孩子头上的一片阴影。你认为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但是每一个生命都影响着后面的生命，每一代人都影响着下一代人。"

经济变迁对于家庭经历的影响：总结性的观点

对于大萧条中的家庭经历我们不以为然。由于缺乏必要性，我们规避了一些重要的论题：亲属网络成员中的交流模式，家庭在繁荣和困难时期的扩大和缩小，居住在一起的两代或两代以上之间的人际关系，等等。由于父母的描述有限，父母的领域中还有许多东西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只是非常简单地抓住了他们生活的一些内在和外在轮廓，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去探索。不过，这里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普遍性主题，它们包括：家庭生活中的互相依赖，1930 年以前家庭地位的最小影响，大萧条经历中的性别差异，以及经济变迁和奥克兰孩子们之间的家庭关联。

显然，家庭生活的每一领域都不是孤立存在或完全独立于其他领域的。某个领域中发生的变化，经常会蔓延到其他领域

[35] 这种交换让人想起了 M. 莫斯才气纵横的作品《礼物》(伦敦，1954)，运用有关古代社会的资料，M. 莫斯验证了礼物或者赠品的社会重要性："它在理论上是自愿的，不带利害关系的和自觉的，但实际上却是义务性的和带有利害关系的。礼物总是采取慷慨给予的形式，但是伴随的行为却是故意伪装的一种社会性欺骗(social deception)，而处理它们却是基于义务和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第 1 页)。

中去。30年代经济生存和社会适应的模式继续运行下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家庭关系和文化而建构的。仅仅举一个例子，母亲的就业和父亲在经济上的无能为力，使孩子在家庭经济中承担了部分责任，并且提高了母亲在家庭事务中的地位。不了解家庭困难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孩子与父母交往的各种经历。

在大萧条危机中家庭的相互依赖和反应，可以通过三个普遍性的反馈过程来考察：控制、调整和适应。失去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复苏措施的渴求，都是危机的典型特征。在有些家庭中，人们拒绝承认这一点的真实性，或者保持沉默，不按照现在的情况去行动，仍按照常规行事。而在另外的一些家庭中（根据文献），面对紧急关头立刻采取一致行动，增加社会性协调和相互依赖，共同努力去应付面对的一切。对于家庭收入和需求之间实际差异的感受，经常会促使他们在分配消费品和资源时，不得不调整优先或价值的顺序：普遍降低消费水平，优先考虑食品、居住和安全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最后，由于意识到父亲一直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所以不得不在家庭成员中重新分派活动、责任和权力。随着经济受损的来临和延续，家庭退而求助于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体系，这种体系更重视母亲和子女的作用，增加了孩子们的成人化经历，并增加了非家庭成员对年轻人的重要性。在这个变迁过程中，这些不幸往往开始于父亲地位的日渐削弱，接下去可能就是在促使孩子走上令人向往的成人之路方面家庭优势的丧失。

在奥克兰样本中，即使不考虑1930年以前的家庭地位，经济受损也使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家庭遭遇大萧条时，其阶级地位就影响到了父母对经济受损的解释以及主观上的反应，同样也影响到孩子对父亲社会声望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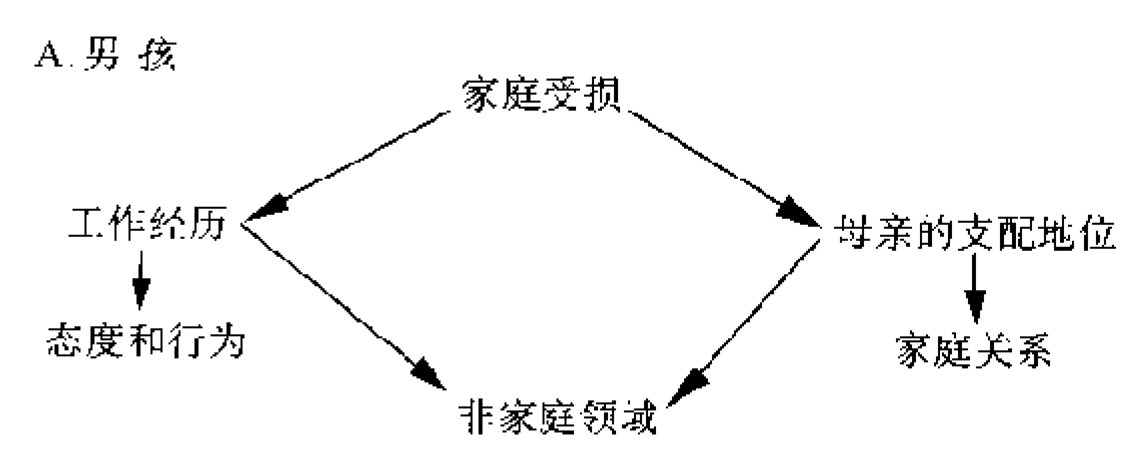
但是它对处于受损境遇中的孩子承担的家庭或经济角色影响甚微(对男孩的影响比对女孩要小一些),对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也影响不大。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都使孩子们更深地卷入家庭事务,强化了母亲在家庭事务和孩子们感情上的中心地位,而且即使不是在行动上,至少也是在其内心渴望上扩大了孩子们家庭之外的社交世界。经济状况通过其社会需求,增加了家庭单元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减少了孩子们为满足物质和社会需求所需的资源。处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既承担家庭中的角色,又倾向于和家庭之外的人交往。即使阶级地位不会使这些结果出现什么差异,但是它对孩子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比如对劳动阶级女孩的家庭观和她们在家庭中传统生活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在我们考察奥克兰样本中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第八章)和成年时期的心理适应时,阶级背景对于孩子发展的意义将更加突出。

通过追踪经济受损对于孩子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和母亲在家庭中支配地位产生的影响,我们对于家庭受损对奥克兰孩子生活的影响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联系远远不构成我们应该研究的全部内容。没有一种因素能够对经济受损的影响做出全面的阐释,但是它们大致勾勒了经济变迁通过相关的家庭条件影响到孩子的程度。图1列出了由于家庭适应性而被削弱的经济受损的三种普遍影响:态度和行为,非家庭世界的各个方面和家庭关系。图表舍去了分析性描述和细节,为的是从总体上认识男孩和女孩在生活境遇和态度上的重要差异。为了简化这个图表,我只用箭头来表示经济受损的间接影响,而经济受损的直接影响已经表现在大多数个案之中,不需要额外地加以强调了。

家庭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变迁,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有

关孩子社会化和家庭结构的两个普遍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按年龄划分的期望/行为与年龄顺序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未成年人会拥有成人似的期望和经历？或者说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孩子的期望在年龄阶梯中会向上延伸？依赖父母阶段的延长，与社会的复杂性、结构的差异性、角色的专业化和不断升级的技术要求密切相关。但是即便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来自社会下层的孩子的社会依赖时间也是最短的，他们比有钱有势家庭的孩子更早跨入成人行列。我们在大萧条曾经历过家庭不幸的孩子中，找到了一种可比较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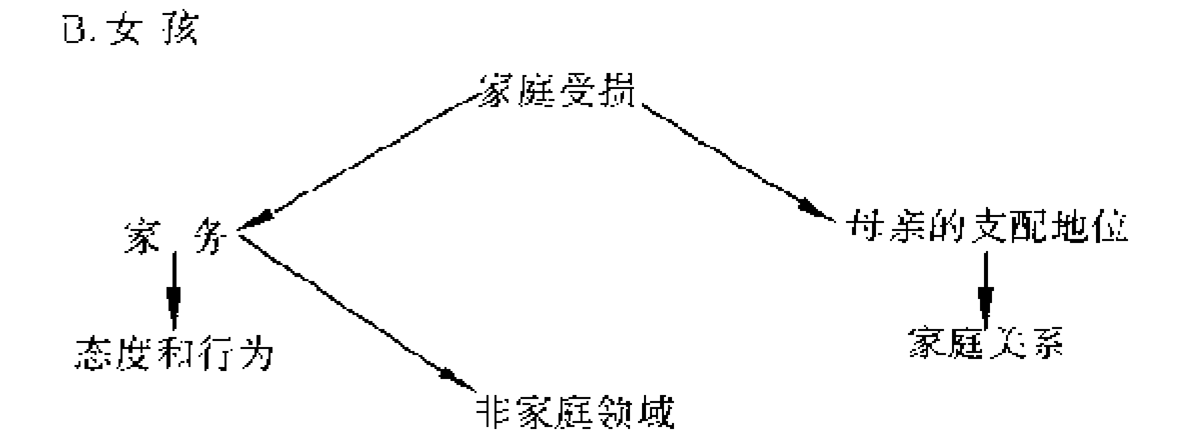
A. 男 孩



长大成人的兴趣
渴望控制环境
勤 奋
经济上的责任
存钱（作为成人）

社会独立性
受限的娱乐（劳动阶级）
对非家庭成员的兴趣
男孩女孩和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

母亲的中心地位（相对于父亲）：关联，价值源泉，吸引程度在父母冲突中站在母亲一边
控制不严
家庭纽带脆弱（作为成人）



长大成人的兴趣 家庭利益（中产阶级） 勤奋 经济上的责任	对非家庭成员的兴趣 寻求非家庭成员陪伴 受限的娱乐（劳动阶级）	母亲的中心地位（相对于父亲）：关联，价值源泉和吸引程度 认为家庭充满冲突 父母冲突中站在母亲一边 母亲比父亲严厉 强大的家庭压力（劳动阶级） （作为成人）：对父母的批评印象；比30年代更加普遍的对母亲的批评

图1　家庭受损和孩子性格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家庭结构，尤其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经济周期、战争、大规模移民等事件变动的特殊原因。如果不对这些事件做出评估，那么对20世纪家庭变迁的描述将不可能是全面的。与更加个人化的不幸相对照，奥克兰样本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母亲占支配地位的意义，来自于30年代家庭经济受损的结构性基础，来自于这种家庭模式对于孩子社会化、人格和代际之间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经济受损是大萧条中普遍存

在的一种状况，无数美国家庭的孩子都曾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过一段时间。

有关家庭的观点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目前面临问题的重要方面，但是它们也可能使我们看不见这些问题的其他性质或特征。对大萧条中家庭的两种看法可以说明这一点：作为大萧条状况的被动牺牲品，或者是主动解决难题的单元。与前者单向地受制于环境的倾向不同的是，后者在一个相互作用的框架(transactional framework)中看待家庭和环境，而且把注意力放在家庭作出防御和适应性反应的过程上。有关经济困难的系统性原因方面的知识，还不能充分解释家庭适应的多样性和模式。

牺牲品的观点，强调了经济受损的病原性影响和危机境遇的负面症状——情感上的压力和酒精中毒、公共救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耻辱、紧张和冲突。在30年代的美国文献中，存在着一种相似的家庭生活的景象：家庭成了极端困难的牺牲品，而这种困难又是由效率低下、掠夺成性和浪费人力的经济制度导致的。[57] 更何况，人们倾向于把这种对极端境遇的回应说成是社会的病态反应，而不是去探究在这种情境中的适应性价值(adaptive value)。人们也许可以认为经济受损和失业使家庭脱离了原有的轨道，扭曲了家庭的传统形式，比如奥克兰样本的家庭中妻子处于支配地位，家庭之外的社会对象对处于受损境遇中的孩子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从解决问题的途径来看，这些结果又成了对削弱父亲作为家庭赡养者、丈夫和家长的能力这种环境的潜在适应性反应。这种境遇除了形成对传统家庭规范的对抗性看法外，还赋予大萧条中母亲权力以独特的意义甚至合法性。作为参照对象，权

---

[57] 参阅 J. A. 彭罗德：《美国文学和大萧条》，博士论文，宾州大学，1954。

力大于父亲的母亲对孩子(特别是对女儿)的影响也更大,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变化,她们的地位也在逐渐降低。在有些个案中,父母因为社会退缩(酗酒等)使自己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应对策略:职业生活、儿童在家庭经济中的生产性角色等。因为缺乏适当的数据,我们无法考察大萧条前这些反应模式的前置因素,也无法探究它们的长期影响。要了解从1929年到整个大萧条十年详细的家庭状况,我们需要对家庭与危机境遇、决定因素、过程、集体和个人在这个异常危机中的适应后果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彻底的考察

第六章
地位变迁与人格

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三个人：他自己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别人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认为别人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

弗兰克·琼斯[1]

家庭地位的丧失，需要适当调整孩子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他人对孩子们的态度以及孩子们自己对他人这些态度的看法。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孩子对母亲、父亲和朋友的反应，这些反应又因社会经济变迁和婚姻权力的变化而改变，这些都证明了孩子对待他人态度的调整。在本章中，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地位变迁对蒙受损失家庭孩子的心理影响，如自我取向（self-orientation）、与同龄伙伴的关系以及为地位而奋斗等表现。[2] 我们会特别关注因家庭地位丧失导致的社会断裂性和模糊性（social discontinuity and ambiguity）。由于孩子们的名声部分地来自于

---

① 弗兰克·琼斯关于当代画家M.格莱希尔的评论。选自H.格思和C.W.米尔斯的《人格与社会结构》(1953)，第91页。

② 自我取向和动机趋势（motivational tendency）之间的关系是宫本在《自我、动机和符号互动论》(1970)中提出来的。宫本假定："喜欢看到自己受到他人赞赏的需要，一般来说是自我取向中最为人所诟病的"；而当"某个人处于社会关系或者某种适宜行为方式中的位置成问题时"，动机趋势关注的是自我定义的主导地位；当人们认为情感状态"能够比评价和认知为孩子的行动提供更好的引导时"，那么自我感情（self-feeling）就居于突出的地位(第280—284页)。大萧条中的地位丧失，在自我取向的所有三个主要领域中，都制造了种种问题、激发了种种动机趋势。

他们家庭的社会地位，所以这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他们相对于成人和同龄人的认同感。

孩子意象中的自我和他人

在一个稳定、同质的环境中，孩子们对自我的想像一般都与重要他人对其的想像一致。家庭所处的位置建构了他人对这个家庭后代的期望、孩子对自己的期望以及孩子对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做出的适当反应。因此，社会的互动是毫无问题的，而且孩子的人格反映了环境的整合和持续性。如果这个彼此关系密切的世界在大萧条以前实际上就存在了，那么它几乎不可能因为严重的经济受损而形成社会错位。如果把大萧条前后家庭的位置（收入、教育和职业）进行比较，把个人对于这个家庭的意象和公众的意象进行对比，那我们就能从中发现社会的不一致性。[③] 在这种境遇中，孩子们有可能表现出对自己和他人的冲突性刺激，并因此伤害到社会关系的互补性。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对孩子们来说，地位的模糊性最有可能来源于有关自我的社会化概念与所感觉到的或者不确定的他人看待自己的观点之间的冲突。这种差异应该表现在孩子们对待自我和他人的取向中，特别是在对同龄人的取向中，以及他们在动机上对于贬低的地位（他们相信，这种地位的贬低是别人硬塞给自己的）的回应中。社会地位的模糊和冲突，特别有助于自我意识的形成或者让孩子变得神经过敏。当自我不完全按照他

③ 赫伯特·布鲁默的概念“群体地位感”（sense of group position），在研究家庭地位变迁时特别有用。尽管他刚开始在论文中提出的是群体间的关系和偏见（intergroup relation and prejudice），但似乎对于理解家庭成员在急剧变迁时代的行为也同样有用。参见《种族偏见和群体地位感》（1958）。

人的看法看待自己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具有自我意识了。如果和他人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颇成问题的时候，比如在“不适、怀疑和紧张”等情绪中反映出来的那样，那么孩子对他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家庭地位的下降，使孩子们对任何表明他们怀疑自己公众形象不佳的迹象都极端敏感。有证据表明，年纪稍大的孩子在大萧条中，常常通过避免向同龄人和成人提及有关家庭困难的信息来维持自己的地位。[④] 同样，父母有时也通过维持孩子的衣着外表，甚至以牺牲一些更为基本的需求为代价，来维持其“社会脸面”。

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名声已经跌落到自己渴望获得的目标之下时，就会感到不幸、闷闷不乐和愤怒。正像库利曾经注意到的那样，重要他人对某个人的印象和评价所引起的自豪感或者羞愧感，取决于这些印象和评价与自我偏好的印象之间的关系。[⑤] 与经济受损有关的各种条件，有助于满足喜欢轻视他人的公众的愿望。不管一个人的实际地位如何，这种愿望都将确定他所处的社会境遇，这种境遇将给他的情感反应和行为带来真正的影响。相应地，我们认为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女孩中闷闷不乐和多愁善感最为普遍。

一般来说，沮丧感、害羞和焦虑都和社交能力匮乏、学业无

---

④ J.普兰特从自己对有关大萧条时新泽西的研究中发现，教师常常难以从他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家庭境遇。“是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有这一段艰苦的岁月，但是他们从来对此不会说些什么。我们从来无法让他们承认家里有任何困难。”《人格和文化模式》(1937)，第207页。

⑤ 在著名的有关自我的“镜中我”模式中，库利观察到社会对象(social reference)总是采用这样的形式：一个人的自我怎样呈现在他人明确的印象中，以及在自我的想像中这种印象对于他人的影响。这种取向中有三个不同的因素：“我们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想像；对于他人对这种形象评价的想像；还有诸如自豪或者羞辱之类的自我感情”。参阅库利：《人性与社会秩序》(1922)，第183—184页。

成和在青少年中得不到尊重等密切相关(参见 Rosenberg, 1965)。但是这些关系并没有考虑到和人格缺陷无关的境遇差异。社会变迁和社会紧张是影响经济受损家庭孩子社交世界的主要因素,而且对孩子情感状态而言,它们可能比人际间的或者工具性的心理缺陷(psychological deficits of an interpersonal or instrumental nature)的影响更大。事实上,害羞可以被看做对变迁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以及孩子调整自己和有效地处理面临问题的敏感性。如果受损家庭的孩子在人际交往上的困难主要是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他们自身造成的,那么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这些困难也应该会相应减少。相反,个人的缺陷是未受损家庭孩子不快乐和情绪波动的最重要来源,因为他们经历的境遇变迁更少。

与经济受损有关的社会断裂,有利于以牺牲亲戚关系为代价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特别是在孩子与家庭圈子之外成员的关系中的个性化,而且使孩子产生对同龄人评价的依赖。青少年中出现这种依赖模式是对急剧生态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但是它也在大萧条时期家庭受损的孩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可能最喜欢朋友陪在身边,最喜欢听取朋友的建议。相对于父母经济未受损的男孩来说,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与同龄人交往更为广泛。由于这些活动并没有清楚地显示出孩子对朋友的社会依赖,为此有些理论认为促使亲戚关系破裂的条件使得孩子更加心甘情愿地使自我利益从属于群体利益。(弗罗姆在 1941 年研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重要的问题在于,和经济未受损的年轻人相比较,在经济受损的年轻人的社会奋斗中,是自我取向还是群体取向更为突出。

作为对地位模糊的一种反应,依赖同龄人与我们在本章中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有关:孩子对地位下降在情感上的适应

性。服从群体的利益可能表现为被动地顺从社会评价(social judgement),或者积极地寻求群体的认同和称赞。[⑥] 后一种反应与我们这种推测是一致的:在孩子既自豪又具备能力的情况下,地位下降和错位对动机产生的影响。就奥克兰的孩子来说,这种假设把感觉到的同龄人中过去的或期望的地位和现在地位之间的不一致性,界定为促使孩子去奋斗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又使建立在家庭不幸基础上的相反判断变得不可置信。因此,依靠家庭出身确定的地位屈从于建立在成就之上的地位。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特别关注那些导致对地位下降作出积极和消极反应的各种条件。例如,地位下降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也最有可能激起那些拥有诸如领导艺术和高智商之类为同龄人所称道优点的年轻人的勃勃雄心。

自我取向和社会地位

我们分析的出发点是孩子的自我取向和在同龄人中的地位,这些都与经济受损和社会阶级有关。自我取向指的是自我定义、自我评价和自我感觉,这是根据母亲对家庭内的描述、青少年的自述以及成年观察者和同龄人的认识来进行评估的。它们共同描述了孩子的自我意象和重要他人所持意象的特性,使我们能够在受损家庭和未受损家庭的孩子之间比较这两种意象的关系。分析的结论部分,关注的是对地位下降所造成的情感上的适应性,关注的是这些孩子上高中时的社会奋斗及其在领

⑥ 这些对于经济受损的适应,是帕森斯和霍尼提出的更加复杂模式的简化。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格兰科,1951),第259页;K. 霍尼:《我们所处时代的神经质人格》(纽约,1937),第167—187页。

导才能中的表现。

来自家庭的看法

我们在奥克兰的母亲家中访谈她们的时候，问到了大萧条中三个时期孩子们的情感状况：经济衰退早期阶段过后不久的1932年、大萧条两年以后和1936年。虽然较早的报告对经济受损和地位丧失的持续性影响作了一定的说明，但是后面的访谈才是最重要的。根据母亲及其子女提供的信息，我们发现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孩子们对家庭经济受损在情感上的反应比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都要强烈得多。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境遇因素是影响自我定义和感觉的主要来源。

第一次访谈时，话题主要局限于心理紧张在行为上的表现。然而不幸的是，从母亲那里无法了解到她们如何认识孩子的自我态度（self-attitude）。我们询问了这些母亲三个领域内的一系列问题：睡眠行为——噩梦发生的频率和对黑夜的恐惧，整夜不安，对噪音非常敏感；情绪——非常高兴，情绪波动不定，热情，充满活力；和食品有关的习惯——食欲，对食品的态度，饮食习惯，与食品有关的问题。这些行为类型是自我调节以适应家庭变迁的几个步骤，而且它们也不会因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出现什么差异。在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中，这些条件并没有使男孩女孩的睡眠行为、饮食习惯或情绪上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差异。就大萧条中的这一点来看，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家庭受损对孩子的心理有负面影响。

可是，在大约两年以后对那些母亲就家庭境遇进行的访谈中，我们确实发现了这种影响的一些迹象。有将近55%的受损家庭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家庭生活条件和地位变化的影响，而且她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强调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后

果，比如孩子在情感上对家庭困难和紧张气氛的反应，以及父母的穷困、退缩使孩子感到不安。比较而言，人们很少提到生活在更加幸运环境中的孩子也受到这样的负面影响。只有略多于1/5的经济未受损的母亲提到了这样的影响。平均来说，中产阶级的母亲比那些地位较低的母亲更容易体会到经济受损对自己孩子行为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使上面提到的差异有什么改变，在每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

这种有关心理影响的一般观点，并没有详细说明孩子是怎样对家庭资源和地位的丧失做出反应，或者说明孩子怎样对情感压力做出反应。处于经济受损境遇中的母亲，是否更多地提到自己的孩子具有害羞、社会敏感性（social sensitivity）和情绪化特征？从1936年访谈中的一系列封闭性的问题中，可以获得与这些特征相关的有用信息。例如，每一位母亲都要回答：是否她们的孩子看起来很害羞？是否她们的孩子在感情上容易受到伤害？答案为“是”（有时回答“是”的情况更多一些）或“否”。从母亲的角度来看，两个问题关注的都是对他人态度和行为的敏感性，并且假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心理意识（psychological awareness）。

我们曾讨论过，因为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变得不确定和受到威胁，而使孩子变得更加敏感。有关自我和他人的知识，在受到新问题、地位变化和冲突质疑之前，孩子们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正确的。经济受损造就了这种境遇，摧毁了相当数量经济受损家庭孩子自我稳定的基点。如表3显示，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母亲更多地认为男孩和女孩容易害羞和变得过于敏感，这都与两个社会阶级中的经济受损有关。情感上的敏感性比害羞更能反映地位下降的变化，这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虽然人们一般都认为，更关注他人看法的是女孩，但是这种趋势随着孩子所处的成熟阶段和所处境遇中各种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事实上，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家庭境遇中，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儿子比女儿更害羞。这种差异极大地掩盖了经济受损对中产阶级男孩的影响，这也无疑是中产阶级男孩成长速度通常较为缓慢的结果，特别是那些地位较高家庭的男孩更是如此。迅速的成长能够解释他们在社交上的笨拙和过于敏感。样本中的男孩在1935年时大约14岁左右，这个年纪一般说来是身体发育最快的时期。通常女孩发育的时间要比男孩子早两年左右，不过发育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参见Elder，1971，第29—37页）

表3 母亲对孩子社会敏感性的描述（1936）

（按经济受损、社会阶级和孩子的性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根据社会阶级划分的经济受损	害羞感		感觉容易受到伤害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ND）	36（28）	7（16）	46（26）	47（16）
经济受损（D）	44（27）	40（21）	62（24）	81（21）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ND）	22（9）	0（9）	39（8）	22（9）
经济受损（D）	65（17）	20（24）	88（17）	62（26）
对比				
经济受损	不显著	ND＜D*	ND＜D*	ND＜D*
阶级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 $p<.05$（$\chi2$检验，1个自由度）

数据显示，对他人的敏感性，更多的是地位下降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绝对损失的产物。在经济未受损的群体中，劳动阶级的家庭在大萧条期间的绝对收入大大低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但是后者的子女却更多地表现出害羞和情感上过于敏感等特点。同样，在父母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孩子和父母经济未受损的劳动阶级孩子之间，心理状况的差异更加明显，比根据收入水平预测的差异还要大。同时用两种方法去测量社会敏感性，我们都发现经济地位下降导致的变化比阶级出身的影响更大。

如果对他人的敏感性主要是地位下降的自然产物，那么大萧条期间实际上它在向下流动家庭的孩子中最为普遍；那些父亲失业后重新找的工作比原来工作地位更低的家庭就是如此。当经济受损被当作是这个家庭“衰弱”——如转而寻找地位较低的职业——的公开标志时，它就成了社会意象(social image)的最大威胁。这种影响生动地体现在有关亲子关系的定性材料中，这些材料描绘了有些孩子在父亲最终找到的工作远比以前的差时，会感到羞愧和尴尬(参见第三章)。

为了验证这种预测，我们把男孩女孩分成三个组，比较他们情感上的敏感性(“感觉容易受到伤害”)。第一组由经济未受损的孩子组成；第二组则是由那些家庭经济受损、但是父亲的职业地位稳定或者得到改善的孩子组成；第三组则由家庭既经济受损而父亲的地位又向下流动的孩子组成。情感上敏感性的比例，从第一组的 40% 上升到第二组的 63% 和第三组的 78%。尽管向下流动的确能够确定情感上最易受到伤害的一组，但是基本的影响显然在于经济受损及其对地位下降的影响。

一个感情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会产生对他人的善意、友谊和支持的依赖，因此容易受因境遇、个人和行为的变化而产生情

绪波动。社会敏感性也预示着情绪激动和反应的低起点，所以经历也可能导致感情上的激烈反应，这种反应从愠怒、自我谴责到自我陶醉。大体来看，根据母亲的描述，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都很情绪化，或者非常容易感到失望、沮丧或者感觉自己容易受到伤害。他们常常非常焦虑，非常喜欢哭，而且很容易生气（表4）。尤其是，经济受损使情感反应的性别差异扩大，男孩子可能更容易愤怒，女孩则终日忧心忡忡。虽然经济受损家庭的年轻人一般更为情绪化，但是经济受损导致的差异还是太小，在统计学上不可靠。

表 4　母亲对孩子情绪化的描述(1936)

（按经济受损、社会阶级和孩子的性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根据阶级划分	忧虑[a]		容易哭泣[a]		容易生气[a]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38(26)	33(12)	23(26)	16(13)	28(25)	42(12)
经济受损	31(23)	52(21)	28(25)	33(21)	50(24)	43(21)
差异的百分比	7	-19	-5	-17	-22	-1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20(10)	27(11)	22(9)	27(11)	30(10)	45(11)
经济受损	45(18)	48(25)	35(17)	34(26)	50(18)	56(25)
差异的百分比	-25	-21	13	-7	-20	-11

[a] 经济受损和社会阶级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母亲的这些叙述，对他人极其敏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情感脆弱的影响，代表了经济受损尤其是地位下降给孩子心理上带来的主要影响。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害羞或者在情感上非常敏感，而且在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不过，经济受损和地位下降显然增加了这些心理状态出现的可能性，而且远远超过了阶级出身的影响。在情感敏感性方面，性别差异不如情绪上对痛苦经历的反应表现得那样明显。

这些数据描述了奥克兰孩子们的意象，这种意象建立在相对私人的家庭领域中不同互动经历的基础之上。这种内在的观点对理解在地位下降的情境中自我—他人之间的关系有特殊意义，因为地位的下降使家庭之外的社会意象和社会接纳变得极为不确定。从大萧条期间所进行的研究来看，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显然更希望他们能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被外人对待。要在日常密切接触的家庭生活中维持这种社会体面的确不容易，而且如果社会威胁主要来自外在关系的话，在这种情境中更不容易保持这种体面。

这些母亲作为自己孩子的观察者，她们毫无疑问会因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给访谈者提供一些积极的描述，但这很可能——尤其是当真相对她们自己的品质和整个家庭不利的时候——是歪曲事实。这种偏差在有关儿子或女儿道德行为的问题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孩子对待父母和家庭声望的态度上这种偏差就小一些，回答表3和表4中列出的问题时这种偏差就更小了。这些问题并不涉及家庭或者父母的缺点，也没有提到大萧条中家庭的困难。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对访谈者的调查处于一个不带任何威胁的不断发展的情境中。

孩子对自我和他人的描述

和母亲的访谈，并没有详细说明害羞或者情绪敏感的关系情境(relational context)。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状态是否主要是孩子和父母、其他成人或同龄人的关系所带来的后果。不过，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证据表明，家庭地位的下降增加了同其他孩子和同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和矛盾性。在态度和行为上，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更为认同自己的同龄人。地位的下降把孩子们置入一个陌生的境遇之中，这种境遇在某些方面使他们面对熟人的时候也形同陌路。

在1934—1935年和1937—1938年发放的问卷中(参见附录B)，有些问题涉及到奥克兰孩子们与同龄人的关系。有个问题是，他们是否也像有些同龄人那样，"很多时候都很不开心，因为(你)认为人们都不喜欢(你)自己"。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像有的同龄人那样"拥有很多快乐"。把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反过来评分，然后和第二个问题的分值累加起来，共同来衡量社交表现(social well-being)。①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反映了孩子所感觉到的距离和拒斥在情感上对于与同龄人关系的影响。此外，两次发放问卷的时间段，使得我们可以评估境遇因素对于社交表现的影响。如果孩子感觉到的拒斥主要是家庭经济受损的结果，那么在1938年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之后，这种状况就会有所改变。

还有另外一组自我描述在分析中被用作测量更为严重的心理烦恼(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一种尺度。在初中和高中进行

---

① 每一个题目都用五级量表来衡量，分数从1分到5分(最不具有这个特点到最具有这个特点)。有关社会拒斥(social rejection)的答案反过来评分，是为了构建一个用高分来表示具有更好社交表现的指标。

问卷调查中15个题目的总得分,衡量了孩子情绪化的程度。这些问题包括:"你经常感到沮丧吗?""有时候你感到非常高兴突然又感到非常悲伤,却不知道为什么吗?""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神经质的人吗?"与测量社交表现的方法不同,这种方法没有明确地提及社会关系,而且衡量的似乎是对境遇变化加以反抗的情感状态。

尽管大萧条中的经济状况使母亲对孩子的看法不同,但是在孩子的自我描述中这种差别却不太明显。在30年代初期,平均来看,同父母经济受损的男孩相比较,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既不认为社会更加接纳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心理烦恼的症状更少。如表A—13所示,在任何一个阶级中,经济受损都没有引起一致的差异。同男孩相比,在与感觉到的同龄人的关系中,女孩受到家庭状况的负面影响更大,但是这也是她们的自我描述中惟一受到经济困难影响的方面。运用有关男孩和女孩的情感状态指数(emotional index),我们发现,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拒斥而产生的沮丧之情,受到1929年家庭地位的影响,比起大萧条前后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更大。

当我们在分析中纳入有关地位下降的更加明确的指标时,比如父亲的失业和向下流动,那么经济受损对女孩主观地位(subjective status)的影响就会稍大一些。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那些父亲或者失业或者向下流动家庭的成员,对自己在社交表现方面的评价比那些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子女要低一些,但是只有在女孩中这些差别在统计上才是显著的(平均差异均值在2.1左右,$p<.01$)。另一方面,在失业或地位下降的条件下,孩子的情绪化状态也没有明显的增强。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家庭经济受损对孩子情感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女孩与同龄群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紧张

关系。这种结论反映了人际关系对女孩的自我意象具有的特殊意义，这也与"适当的"家庭背景对她们进入高级社交圈的意义是一致的。按照这些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受损对于男孩在同龄人中的地位影响会小得多，而它对于女孩在服装限制方面却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男孩可能也不愿暴露内在的情感。例如，男孩在情感症状上的得分在某些方面明显低于女孩。

如果与同龄人的紧张关系主要是因为地位下降和家庭经济受损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在这些女孩上高中的时候就会不那么常见了，因为此时奥克兰的经济状况普遍好转。在两个时期(初中和高中)对社交表现和情绪化进行相同的测量，并把这两个分数加以比较，我们发现样本中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没有明显的变化，虽然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的确有些相对的改善，她们变得和父母经济未受损的女儿更加相似。对正在上高中的男孩女孩来说，经济受损对其社交表现的影响微不足道。在这些孩子更加年幼的时候，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也不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更情绪化。[8]

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在社交表现方面的上升趋势，既反映在应对手段的提高上，也反映在家庭条件的改善上。她们可能学会了不要那么敏感，或者不要那么容易被来自同学的社会拒斥所困扰。从这一方面来说，对社会拒斥的了解与个人的情感更不密切。为了区分感觉到的拒斥和情感上的反应，我们选用了另外一组题目，这也包含在对高中学生进行调查所用的问卷中。当地的高中学生陈述了五条理由，表明了对社会拒斥或者优越感的批判性立场："有的同学是势利眼，而且高高在上"；"那

---

⑧　劳动阶级的孩子的确比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加情绪化，但是这种差异只有在女孩的统计中才是可靠的($\overline{X}=3.6$ 对 4.8, $p<.05$)。

些计划玩游戏或参加远足或晚会的同学,却又不愿意让其他人和自己一起玩耍";"做每一件事的都是那么几个学生";"你喜欢的同学变得非常高傲,他们只愿意和有些学生玩";以及"一些群体或团伙不愿意与这个群体之外的学生打交道。"每一位应答者在那些描述和学校有关的他们不喜欢的事情陈述前打"√",在那些描述了他们最不喜欢的事情陈述前打"√√"。因为这些题目的答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把它们放在一个单一指标中。[③]

在当地的高中学校中,这些精英行为(elitist behavior)的迹象,是对学生当中平等主义思潮的直接挑战,正如学生干部和教师提倡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所有人的帮助获得进步的。"在许多场合下,这种现象受到学生报纸社论的严厉批评。这种意见,仅从一篇题为《小集团中的学生并没真正地享受生活:你是其中的一员吗?》的抨击文章(发表于1940年左右)中就可以看出来。

> 玛丽是一个小集团的成员。你明白小集团指的是什么。有些规矩你是不能打破的,除非你有特别的"衣着"或者"家庭声望"或者"个性",或者住在"镇上的高级住宅区",或者有个能幸运地随时为你提供零用钱的父亲,或者(如果你没有其他任何品质的话)你的态度高高在上。玛丽不是一个具有独到见解的人,她不敢做任何周围的人不赞同的事情……她同一个并不喜欢的男孩外出,只因为他认识她想认识的人。经过任何一个不属于"精英"集团的人的身边时,她的眼神中总爱流露出空虚的神情……对那些穿着与

③ 没有"√"的陈述分数是0分,一个"√"的是1分,两个"√"的是2分。先把各个陈述的分值累加起来,然后再加以标准化。

> 她不同的男孩或女孩，或者如果那些孩子的父亲是拿周薪的（而不是拿年薪的）人，她甚至懒得看他们一眼……玛丽的大多数朋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他们相互来往只是想表明他们的归属。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忠诚和理解，不管他是否有一个有权势的父亲、一栋大房子或者一个戴着平顶卷边圆帽的男朋友。玛丽认为她是一个举止优雅的美国人——她为 R.A.F. 编织——但是她并不信奉独立宣言中的下述条款："人人生而平等。"……什么时候玛丽才会觉悟呢？[10]

这篇社论代表了许多女孩共有的感情。尤其是和那些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女儿相比较，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对她们同学所表现出来的精英行为持更为严厉的批判态度，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表 A－14）。这种倾向在男孩中同样也有，只不过这种差异太小了，在统计学上是不可靠的。正如人们估计的那样，来自劳动阶级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比中产阶级的孩子持有更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social criticism）。

就像前面曾提到过的那样，这些数据中有证据表明，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相比，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对于同龄人排斥的批评，比对因她们和同学的关系而感到沮丧或者不快乐的批评更为严厉。例如，从社会批评和社交表现这两种感情之间的

---

[10] 这个例子摘自 R. E. 布朗利：《构建大学预备学校的核心课程》，载《大学预备学校学刊》，第 19 期（1940），第 48 页。有关奥克兰孩子注册的学校的全面回顾，见 J. 盖耶的报告：《30 年代克莱尔蒙特的初中和大学预备学校》（未出版的工作论文，人类发展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1964）。这些学校都深受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在基本方法和实践上，都和 J. 杜威最早在芝加哥建立的实验学校相似。对这个学校最近的描述，参阅 K. C. 梅林和 A. C. 爱德华兹：《杜威学校》（纽约，1966）。

相关性中，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中，社交表现和同学批评的负相关性比在那些来自更加幸运的家庭的女孩小些，尽管这些差异小得在统计上不可靠。

在这一点上，经济困难对于孩子的心理影响，主要局限于女孩感觉到的自己与同学的关系上。虽然大多数经济受损家庭的母亲都认为她们的孩子情感上非常敏感，但是在她们提到的男孩与同龄人的关系中，这种倾向并不明显。什么样的社会经历能够解释这种性别差异呢？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有两种因素——经济受损家庭的经历和社交外表上（衣着、鞋、修饰等等）的劣势——特别引人注意。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条件对于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而且它们在大萧条初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在第四章曾指出的那样，女孩比男孩更多地卷入家庭事务，而且她们的社会化可能有利于培养她们在人际交往时的敏感性，这与传统上有关女性行为的概念是一致的。对他人的感觉非常敏感，自然使孩子容易受到家庭气氛和紧张状况的影响，同样也促使女儿在利益和行动上和母亲保持一致。[①] 在前面的章节中，困难重重的家庭经历，诸如母亲的不快乐和家庭冲突之类等，对女孩的影响特别明显。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和初中男孩相比，这两种经历更预示着初中女孩在社交生活中的不快乐。

在第三章中曾经讨论到，对母亲感情的感觉是用对"我希望母亲更快乐"这个陈述的回答来衡量的（打"√"或者没打"√"）。这个陈述既包括对母亲情感状态的了解，也包括希望改善这种

① 施罗尔和他的同事在分析有关曼哈顿居民的调查数据时，他们的结论是那些妻子"比丈夫更容易受到彼此关系中冲突的伤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就能够假设婚姻压力对于妇女比对于男性更加潜在地不平衡。"施罗尔等：《大都市中的精神健康》(1962)，第177页。

状态的欲望。对家庭冲突的感知是用九级量表衡量的(参见第五章)。在初中阶段,两种感知和女孩社交表现的负相关程度大于两种感知和男孩自述感情的负相关程度(女孩的平均 $r=.31$,男孩为.14)。家庭压力的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共同表明在理论上经济受损和女孩的自我感情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它们还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关系。

在大萧条中,孩子的穿着越来越差标志着家庭地位的下降,这对女孩的社交经历有着特殊的意义,[12] 特别表现在对购买衣物鞋帽方面的限制上。有的时候,这种限制扩展到卫生习惯上,比如洗衣的次数、洗澡时的肥皂和洗浴热水的供应情况等等。根据我们已有的信息,在奥克兰的样本中经济受损家庭在服装上的限制是不同的,这导致了适应的多样性,适应范围从更加广泛地由穿大孩子留下来的旧衣服和自己缝制的衣服到使用粗糙的代用品(例如,用硬纸壳来补鞋上的窟窿)。

经济困难最值得一提的影响,可以从1929年时还是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外表上看出来。到1934年,许多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父母在经济资源方面,与劳动阶级的赤贫家庭相差无几,这种惊人的不幸可以在当时他们孩子的外表上看出来。在观察研

---

⑫ 女孩比男孩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表,而且有着很好的理由:这是女性地位和获得进入重要群体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有关青少年的全国性样本中,61%的女孩最担心她们的外表:衣服、外观等,而男孩如此关心的只有11%。数据来自《有关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的研究》(安阿伯:调查研究中心、社会研究所,1960),第152、155、164和167页,还有E. 杜旺的《一项有关少女的研究》(同上,1957)。在J. 科尔曼有关青少年的研究中,质地良好的服装是女孩进入最主要人群最经常被提及的必须具备的因素,而男孩把这个因素几乎放在和地位有关的资产的最后一项。参阅J. 科尔曼:《青少年团体》(纽约,1961),第31页。在G. 斯通的论文《外表和自我》(见A. 罗斯:《人类行为和社会过程》,波士顿,1962)中,探索了服装对于自我意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意义。

究所内游乐场上的孩子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有关成人"外表修饰良好"的评分表，我们发现，在初中阶段，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在外表上的得分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员要低（这两个群体在身体魅力的测量上是同一的）。不过，只有在中产阶级中才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在中产阶级的女孩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表A－15）。这些结果总体来说都和同龄人对于其外表的看法相似。[13] 在中产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在社交外表上的相对不利，有助于解释她们在社交生活中被排斥和郁郁寡欢的感觉。同男孩相比，社交表现和一个有魅力的外表之间的关系在女孩中更为密切。[14] 无论是要出名还是要成为领导者，都不需要男孩有一个精心修饰的外表。

经济受损造成的可以观察到的这种外表上的差异，并不是在孩子整个中学阶段都存在。 种成年人对孩子外表的评分——与初中时期使用的测量手段一样——表明，经济受损对两个阶级中男孩女孩造成的差异不尽相同。[15] 经济上对穿着的

---

[13] 这些测量方法是从一组有关"猜猜是谁"的同龄人提名的工具中选择出来的。每一个孩子都要把有关陈述（比如"他是一个衣着讲究的学生"）和某个真实的同学搭配起来。在这些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每年进行一次评分。在修饰整洁的外表这项上，1934年同龄人中的名声和男孩中对教师或者成人的评分中度相关（r = .58），女孩中也有类似的关系。有关"猜猜是谁"技术的详细描述，可以参阅C. M. 特赖恩：《青少年对青少年人格的评价》，载《儿童发展研究会论文集》，第4期（1939）。

[14] 在这些孩子上初中的时候，社交表现和成人对于精心修饰外表的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男孩中为.26，在女孩中为.38。在下面的关联中，我们能看到富有魅力的外表对于女孩具备女性吸引力的重要意义：精心修饰的外表和成人对于女性吸引力的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60，但是和成人对于男性吸引力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29。衡量两种性别的吸引力的量表，来自Free-Play系列量表。

[15] 在修饰和外在的吸引力上，阶级差异在中学女生中更为突出，其作用超过经济受损的影响。中产阶级父母的女儿在外表的两个方面，明显都比来自劳动阶级的女孩得分高。参阅埃尔德：《外貌和教育对于婚姻流动的影响》（1969）。

限制给孩子社交生活带来的不利，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地中学有关着装的规定抵消了。例如，所有的女孩都必须穿标准的学生制服：裙子和儿童水手式服装

这种从孩子视角进行的分析，阐明了下述的经济或者地位下降对于自我态度和可感觉到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结论。首先，家庭受损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最为明显，这个时期大体上正好是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在大萧条的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年龄已经足以使他们了解家庭经济受损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中学后几年中经济受损影响的减弱，一般来说正好与该时期奥克兰在经济生活上的普遍改善相一致。其次，正如根据母亲的报告衡量的那样，心理影响表现在害羞和情感的敏感性上，也表现在女孩在社交中的不快乐和对社会拒斥的感受中。在社会拒斥或者不快乐方面，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并不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更为明显。这种性别的差异，部分是因为家庭压力和相对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外表对于女孩的自我感情的影响更大。

在社会情境中观察到的地位

害羞和社交中的不快乐，代表着以社会地位不稳定和巨大压力为标志的境遇中人际关系的一个更为普遍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也就是关于制定新的行动方法、寻找为大家所认可的定义以及相互协作的团体等方面的问题。对他人的害羞性的敏感，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象和他人可能所持意象之间存在差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是否其他的成人和同龄人对奥克兰孩子的看法与这些孩子的自我定义和评价相一致。

正在变动着的境遇所带来的模糊性，可能会使孩子们对自

己的社会声誉、对自己在家庭以外其他人眼中地位的判断出现偏差，但是这种偏差是什么样的呢？在他人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那种无法由真实地位这一社会事实验证的个人感情，可能也源自于他人。例如，女孩感受到的拒斥可能更多地根植于痛苦的家庭经历，而不是根植于和同龄人的真实关系。苏力文观察到，“一个人只能从他人那里发现自身本就存在的东西”，这也许最适用于对他人的反应和态度不确定的境遇（Sullivan，1947，第22页）。

尽管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更不快乐，而且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她们与经济未受损家庭女孩的社会竞争力令人吃惊地不分上下。根据成年人的观察，不管她们的家庭地位如何，她们在社交中的领导才能和受欢迎程度并不明显低于其他女孩、男孩的情况也是如此（参见表A－16）。在这些观察中，既没有表现出家庭困难和修饰上的不利之处，也没有反映出被排斥的感觉。在中学阶段，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更爱批评社会精英论和同学中媚上傲下的现象，但是她们在受欢迎的程度和在社交中的领导才能方面也毫不逊色。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女孩都具有这样两大特征（用以测量的量表和在初中时使用的量表相同）。

一个成年人对青少年地位的判断，当然不如同龄人根据使社会接纳出现差异的细致标准作出的评价更为准确，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同龄人的评价与成年人的评估密切相关，而且结论也相同。根据1934年同龄人对孩子受欢迎程度和领导才能的评分，我们对两个阶级中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员进行了比较，发现用任何一种量表测量出来的差异在统计学上都是不可靠的。

如果考虑到家庭困难和情感压力所带来的限制，那么，来自

经济受损程度不同家庭的孩子在社交生活中的这种平等性，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此外，被排斥的感觉经常会导致行动上的疏远。例如，那些自我评价比较低的孩子对同学的反应，一般总是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恐惧和遭到排斥的感觉。他们总是拒绝人家善意的建议，并且抱着敌意和不信任的态度，同时还拒绝改变一切(Rosenberg，1965)。虽然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在社交中更不快乐，在情感上也更为敏感，但她们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比其他的女孩低，这一事实说明她们经历的是一种不同的适应过程。在样本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大都具有外出取向(outgoing orientation)，那么是什么因素鼓励孩子们采纳这种取向呢(参见第四章和第五章)？作为对社交排斥的一种反应，又是什么导致他们和外界交往更多，而不是退入一个私人的幻想空间呢？大多数孩子并没有被剥夺在社交上的选择权，外部条件使他们感知到的社会问题起到重要的作用。关键因素可能是家庭困难的外在化，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条件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培育出了一种自责的心态。

一般认为，在经济受损的境遇中，需求是通过幻想获得满足的。当一个人感到不被人喜欢的时候，就幻想自己受到欢迎；而当一个人没有权力的时候，就想像大权在握时的感觉。但是尽管想像可作为对令人沮丧现实的一种补偿，它们也可以作为行动和成就的引导，比如对未来的期望等。就后者而言，感觉到的社会剥夺会增加孩子幻想中的社会抱负，也会使孩子更加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对行动的指导，社交幻想(social fantasy)与对新境遇中的现实应对相一致，而且通过确立和维持友谊的努力，将在相应的行为中找到表现自己的适当方法。相反，补偿性的社交幻想与社交活动和地位呈负相关。因此，有两个问题对于探讨孩子对社交不稳定性和感觉到的受损的适应性

反应方面颇有意义。无论家庭的境遇如何，这些差异在社交幻想中也是这么大吗？这种幻想的益处，是否对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更有指导作用？

在对初中和高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被调查人要回答两个有关他们对想像世界的兴趣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像有些年轻人那样，有一个"比真实世界更加美好的虚幻世界和一些幻想存在的朋友？"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如这样的男孩或女孩一样，"喜欢独自幻想，而且认为这比做游戏更加有趣？"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根据五级自我评分的量表进行衡量："不"等于1分，"是"等于5分。由于两个问题的分值是相互关联的($r = .40$)，所以把它们累加起来，形成一个衡量两个时期这一因素的指标。

除了在社会交往中碰到的困难以外，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相比较，父亲在大萧条中严重受损的青少年并未对幻想世界表现出更多的兴趣。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他们在这种取向上都对自己的评价较低，不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都是这样。在经济困窘的初期，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女孩，在社交幻想方面的得分明显低于未受损家庭的子女，而且这种差别也不受阶级背景的影响。[15] 从这个时期到中学阶段，经济受损所导致的差异仅仅表现在男孩的选择中。

从一种适应性观点来看，经济受损和社交幻想之间的关系，不如幻想的心理作用那么重要，无论这种作用是替代性的还是

---

⑮ 在初中时代社交幻想的平均分方面，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是2.42，女孩是2.93，$p < .05$。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中，分数稍高一些。在高中时代的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未受损的男孩比经济受损的男孩社交幻想的倾向强一些（平均 $\overline{X}s = 3.63$ 对 2.78，$p < .05$）。女孩的平均分数（$\overline{X} = 2.76$）不会因经济受损或者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出现什么差异。

补偿性的，或者是对社交行为指导作用的表现。后一种作用，可由经济受损家庭的青少年可以观察到的受欢迎程度来证实，也可由他们对于同龄人陪伴的兴趣来证明。大萧条中的地位变化，为把人际交往中的问题归因于更大的环境，而不是归因于导致进行补偿性调整的个人缺陷提供了基础。作为与同龄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替代品，社交幻想与社交中受欢迎的程度呈负相关，这也是我们在经济未受损家庭成员中的发现（表 A－17）。幻想的社交兴趣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在经济受损家庭成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这方面的经验支持相对还弱一些。在初中时期的两个受损群体中，尤其是在男孩中，社交幻想都与社交表现负相关。但是在经济未受损群体中，它与情感上的困扰和令人不快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阶级背景中的差异也不能改变这些结果。

这些数据中有一些有关社会奋斗的依据，被用来作为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孩子的地位下降和自我定位与他们在同龄人中被接纳或受欢迎程度之间的关联点。不过，这些努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孩子在社会交往中被接纳，就像企图通过发出刺耳的声音去引起人们的注意，结果得到的却是敌意和拒斥那样。这样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典型例子，也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追求自我利益的典型例子，它与经济受损家庭青少年多以集体或群体利益为重的情形正好完全相反。人们认为，当社会大变动或者解体的时候，就会强化人们把自己的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以实现社会整合的愿望，而且根据成人的观察，这种情形在经济受损家庭年轻人的行为中表现最为明显。[17]

---

[17] 这里用作比较的方法是境遇评分量表中的群体利益和自我利益，它建立在对这些孩子中学时代表现的观察的基础上（完整的描述参阅附录 B）。高分标志着

由于大萧条中的地位变化使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处于急剧的境遇变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因素成了影响其情感状态的主要源泉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萧条初期经济受损对孩子在情感上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到大萧条十年的后半期。这种趋势可以解释为个人和境遇之间适应性关系的一种变化，但是它并没有排除对孩子的动机倾向、认知取向和心理健康产生更为持久影响的可能，这也是本章余下部分和后面的章节里将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在未受损父母的子女中，个人缺陷是导致关系问题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社交幻想更多地是一种逃避令人不满的社会关系的方式，而不是对孩子行动的一种指导。在下面有关地位奋斗的部分，我们将发现这些年轻人比经济受损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责怪自己，或者更容易在身处困境时依赖他人。

社会地位和奋斗

处于经济受损境遇中的孩子，能够有效处理家庭经济受损给他们在社交中带来的不利地位，这一点从他们受欢迎的程度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他们和家境更加宽裕的同学相处时如何维护自我的位置，却只能由他们解决问题的努力的现实取向来说明。这种反应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这些问题放入更广阔的环境之中，而不是仅局限于自身，当然也还存在适应潜力和社交机会的问题。适应潜力部分指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智

与他人合作的取向，愿意把个人利益融入集体之中。在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在群体利益上的分数，明显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后代高（全面的差异，$p<.05$）。就标准分数来说，男孩中的差异最明显，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群体为46，经济受损群体为55（$p<.01$）；劳动阶级中经济未受损群体为45，经济受损群体为51（$p<.05$）。

力、社交技巧和解决问题的动机——以及相应的对所处境遇的界定。不过，如果社交机会极其有限，也就不用谈什么能力了。对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受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影响，虽然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中可以看到社交机会有限的某些迹象。

对经济受损群体在社交中成就的理解，既需要了解有关社会支持的知识，也需要了解有关社交机会的知识。在研究之初，我们曾经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即为什么有的孩子成功地战胜了境遇的挑战而其他的孩子却失败了，其原因应该在他们拥有的能力和动机中去寻找，应该在家庭和更大的环境对他们的支持中去寻找，在面对的事件和所处境遇的特点中去寻找。尽管阶级背景直接影响着家庭对个人解决困难的支持和个人拥有的能力，诸如智识技巧等，但是在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相对社交表现有任何显著的阶级差异。经济受损对孩子情感状态的影响，经常是在劳动阶级的孩子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这种差异在同学和成年观察者的眼中却消失了。虽然如此，这些结论与奥克兰孩子就读的当地学校的进取哲学和课外规定极为一致，也许前者还受到后者的影响。

正式的规章制度有助于来自各个社会和经济群体的学生的社会参与。对学生和教师实施的那些规则确定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家庭背景不应该成为决定同学关系、对课外活动的参与和参与竞选领导位置中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在中学，学生会强制执行着装规则，不鼓励举行奢华的社交活动。学校的顾问试图为那些需要钱应付紧急开支的学生提供在全国青年部（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在当地的中学，85％以上的学生都参与了课外活动（参见 Jones，1958）。学校的记录也表明，学生干部中也有劳动阶级出身的学生，但是中产阶级

出身的孩子占的比例更大。毫无疑问，这种差异反映了社交主动性、才能、经验和机会不平等的阶级差异。初中和高中的教师提到，在学生活动和交往中，因孩子的家庭背景而对其采取公开歧视行为的情况相对较少。正如人们预计的那样，这种说法夸大了两种环境中机会平等的程度，尽管根据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观察，它确实准确地反映了对于平等主义观点合乎规范的支持程度。这些学校都异乎寻常地鼓励那些缺乏一定经济优势和家庭声望的学生在社交活动中超越他人。

在这种支持和机会构成的框架内，与知识技能或表现相比较，社会抱负成为经济受损家庭年轻人获取成就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来源。事实上，与经济受损相关的各种条件，使人们对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在智力上的表现期望值较低，尤其在学校这种情境中。一些研究表明，低下的经济地位和孩子的学业成就之间是负相关，但是低下的经济地位一般都与父母类似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关，在奥克兰样本中的经济受损家庭里这两者间很少存在着一致性。通过比较，至少有两种条件有助于用社会抱负去解释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在社交中获得的酬赏：社会声誉的下降和地位奋斗的家庭来源。

据说社会声誉的下降或受到尊重的减少，会激励人们去努力奋斗以恢复原有的地位，去检验和证明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在他们以前很受尊重、而现在的损失是被迫的而不是应有的时候，更是如此。在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中，作为社会认同和评价的偏好的依据，智力和社交优势可能取代了家庭地位。其次，有些研究认为，经济困难造就了培养儿子们强烈成就需求的条件：摆脱父亲的干预和独断专权，培养自己独立的品质，满足特别是由母亲提出的成就要求，在一种感情上得到支持的情境中表现出较高的成就标准（对这些研究的回顾，参阅 Elder，1971，第84—

87 页)。在奥克兰样本的家庭里,我们没有发现有关成就训练、标准和要求的特定模式。饱尝经济受损之苦的父亲,也无法为儿子树立一个富有魅力的榜样,而且经济受损家庭一般在对孩子情感上的支持和整合方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子仍然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获得了自我引导的经验,并且把母亲看成是最能给予自己支持的家长。有的时候,处于困境家庭中的母亲也会为了一种替代性的成就感,转而依靠儿子的成功。

在比较来自经济受损家庭青少年的社交成就的要素——智力和抱负——之时,我们采用了两种策略。首先,把整个样本根据经济受损和社会阶级界定为几个次群体,并比较他们的适应潜力在每一层次上的各种指标;然后,把分析严格限制在那些被他们的同学当作学生干部的青少年身上。如果说获得承认的强烈欲望是经济受损的年轻人获得社交成就的一个要素,那么,它也应该是来自这个群体的学生干部的典型特征。

智力和抱负

人们是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和教师对孩子学术水平的评价来测定智力的。在 1933 年,我们对样本中的成员进行了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1938 年又重复了一次。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信度,我们把两次智力测验的得分加以平均。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来自劳动阶级家庭,她们的平均智商相对较低(大约是 110 对 116)。三位非常了解这些孩子的中学教师,用有关学术兴趣和学业表现的七级量表来给他们评分。把两个量表上的得分加以平均,构成衡量学术水平的单一指标。这种方法准确地预言了青少年在中学时的平均分数($r = .70$)。

处于经济受损境遇中的青少年的智力水平,一般来说都有

利于维持他们在同龄人中的地位，因为他们的智力或学术水平并不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员低。惟一例外的是中产阶级的女孩（表A－18）。主要的差异源自于阶级出身，而不是经济受损。甚至经济未受损的孩子与父亲失业和向下流动的孩子相比较时，男孩的智力差异也微乎其微。同样，与劳动阶级中经济未受损家庭相比，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水平相当低，但是这种差别并没有反映在这两个群体中孩子的智力上或者在学校中的地位上。这些家庭之间的重要差异，可以从父母相对的智力水平上看出来。访谈者认为，无论经济受损的状况如何，在能言善辩和智识技巧方面，中产阶级母亲的得分要明显高于劳动阶级的母亲（参见 Elder，1968 and 1969a）。同样，经济受损既没有影响到父母的教育程度，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接受更多教育的兴趣。然而，可能是由于学校的影响，教师的评分中并没有提到这种教育的优势。在中学的中产阶级氛围中，置身于学术模式和充满雄心壮志的学生之中，可能会极大地提高来自地位低下家庭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和抱负。

由于这些数据只涉及某个时点的智力水平，它们不能回答孩子在智力测验中表现的变化及它们与经济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比如在大萧条中最黑暗的阶段——1931年到1935年间孩子行为的差异。在这个时期，孩子变化无常的性格也许会暂时地向下滑动，尽管家庭经济受损对于智力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933）。

对这些结果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把孩子对大萧条产生适应性反应时的年龄考虑在内。奥克兰样本中的成员都已经度过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孩子在认知发展上最容易受到家庭困难负面影响的伤害。从其他对于出生于大萧条前不久的孩子的研究来判断，年龄就突显出来，成为决定经济受损影响的一个潜在的重

要因素。特别是更加年幼男孩的智力水平，受到了30年代的经济受损和向下流动的负面影响。[18]

在行为层面上，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在大萧条中背景各异的年轻人，在学术和社交上异乎寻常地相似。根据教师、同学和成年观察者的感知，就学校的身份和社交生活中的地位而言，每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员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存在于每一群体成就之下的动机趋势有差别吗？例如，同一水平的地位，当然能够经由不同的路线获得：能够通过付出的巨大努力获得，或者也可以借助特殊的才能获得。这种差异的例子，可以从来自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男性向上流动的各种因素比较中看出来。对于来自社会低层的人而言，职业成就更多地取决于强烈的成就动机；而对于中产阶级男性的社会流动而言，教育却起着重要的作用(Elder,1968)。在一个诸如下层阶级的经济受损群体中，人们的精力和努力需要全部放在克服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很少会遇到的障碍上。对于那些来自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得到同学认同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倾向也是他们的一大特性。

通过一系列心理动力评分量表的使用，我们的分析中包括了两类由任务和社交取向界定的成就动机。这些五级量表，是由在埃尔斯·弗兰克尔—布伦斯威克监督下三位评判者对孩子上高中时行为的细致观察记录构建的(参见附录B)。尽管这些评判者们试图通过一个复杂的推理过程，并利用细微的间接线

[18] 参阅W.T.斯迈尔泽有关指导研究(Guidance Study)——那项研究也是以伯克利个人发展研究所为基础的——中纵向样本里的男孩的报告：《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史功能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职业选择》，载《社会人际学》，第26期(1963)，第393—409页。

索和行为的总特征，来构建一个潜在动机趋势的参考框架，但是每一个评分最终还是建立在观察到的行为之上。评分的心理意义表现为一组内在地凝聚在一起的现象，虽然它们外在的表现常常有很大的不同。完成任务的欲望，被定义为“达到高标准客观成就的一种愿望，通过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才能和选择艰难的目标来提高自我的声望，以及具有远大的志向。”在衡量对地位和权力的渴望时，我们用了两种相互关联的评分量表：承认——“获得赞美和表扬的欲望，需要尊敬、社会认同和声望、荣誉和名气的欲望”；控制——通过建议、劝说或命令来控制自己所处环境的欲望。”[19] 在这些测量时间确定的情况下，那么作为经济受损和获取地位之间中介变量的成就动机就是不确定的。它既源自与同学社会交往的成功，同时也为这种成功提供了解释。

对社会认可和控制的需求，最直接地表现在那些在大萧条中处于经济受损境遇的孩子们身上。一方面，经济受损使这些孩子与家境较富裕的同龄人的交往特别成问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难以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测量方法都显示了对于获得高标准成就的渴望，这些在有关完成任务需求的评分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在进行社交过程和地位差异的对比时，我们使用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参考框架。对于男孩而言，这些动机评分由他们感兴趣的职业声望来补充，这是用有关职业层次的

---

[19] 其他的五种需求评分量表包括：1. 攻击：“通过轻视、攻击、嘲笑、藐视等方式侮辱他人的欲望”；2. 求助的心态：“渴望获得外在的支持”；3. 逃离：“逃离所有令人不快的境遇以回避责备、艰难的趋势”；4. 贬低：“藐视自我、谴责自我、轻视自我或者被动地屈从于外在力量的趋势”；5. 社会关系：“渴望加入社会群体，喜欢和大家生活在一起，遵从习俗”。

"强烈职业兴趣量表"来测量的。[30]

就像人们所估计的那样，那些在大萧条中家庭受损的男孩对于地位和权力的欲望最为强烈(表 A－19)。这种差别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都有所体现，而且远远超出社会阶级的影响。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地位下降的幅度最大，因此他们在为地位而奋斗方面得分也最高。不过，这种抱负仅限于权力和地位关系这些社会领域内。它并没有延伸至成就取向中更多地以任务为取向的形式，或者延伸至对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其阶级背景的有声望职业的兴趣。在经济受损的家庭类型中，家庭的向下流动和父亲的失业只是使孩子在社交方面的抱负略有增加。

尽管女孩对家庭经济受损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特别敏感，但是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它与表现在权力、地位或成就动机中的一种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肯定形式有关。在每一个社会阶级中，这三个评分没有因经济受损的不同而出现明显的差异，家庭背景不同造成的差异也不明显。至于反应，在考察动机的适应性时，人们显然没有考虑到抚养孩子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含义。例如，对地位丧失的肯定反应(assertive response)与男孩所处的各种状况最为一致。这些男孩无论是为成就而奋斗，还是努力去获得社会赞誉和突出地位，都是根据传统对男性的要求所做出的反应一致。相比之下，对社会接纳、安慰和保护的

---

[30] 用这一量表测量出来的分数，被解释为衡量孩子有多大志向的指标，尽管这方面的有效性还没有得到确证。顺着这个思路，达利认为量表的分数标志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背景使他准备好去追求声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这全源自于他的高收入、专业人员的地位、认同或者在社区中的领袖地位。"参阅 J. A. 达利：《强烈职业兴趣量表的实践和解释》(纽约，1941)，第 60 页。为了我们分析的目的，我们将把这些分数解释为衡量研究对象职业兴趣的声望水平的指标。

兴趣，与文化上所定义的女性角色更为一致。就经济受损家庭女儿的培养和兴趣而言，这种性别差异对她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成就还是权力目标，对于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女孩来说，可能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对经济受损家庭女孩的动机趋势进行更广泛的调查，也无法真正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在分析中还采用了另外两种评分：社会关系（"渴望加入社会群体，喜欢和大家生活在一起，遵从习俗"）和求助心态（"渴望获得外在的支持"）。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对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的女孩进行比较。经济受损或父亲失业，都没有使结果出现相应的或有意义的差异。

与经济受损有关的动机，并没有指出它们在适应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果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通过解决困难中的应对策略在同学中赢得了好评和领导地位的话，那么这种反应也应表现在对地位丧失以及社交中不快乐情感上的相同动机适应性中。例如，以男孩为例，人们期望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在社交中具有积极进取的抱负，而不是自怨自艾，或者寻求社会援助。为了探讨这种适应性，我们在由性别和经济受损定义的各个群体内，把初中的社交表现指标与所有的动机评分联系起来考察。

经济受损家庭的子女，并没有表现出和社交不快乐有关的自我责备和依赖性，这也是对我们适应性解释的直接支持。在自我贬低和寻求社会支持这两个方面，最引人注意的结果出现在经济未受损的群体中。男孩自述的社交表现与自我贬低呈负相关；在女孩中和她们的依赖性呈负相关，正如有关求助的指标所显示的那样（$r = -.46$ 和 $-.41$）。一般来说，这些结果与那些在大萧条中并未遭遇严重困难家庭中不快乐的孩子的其他特

点是一致的，而且在这方面与经济受损群体中同社交表现有关的动机存在明显的差异（两种评分的平均值仅相差－.06）。比较而言，只有在那些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并且在社交中感觉不快乐的孩子身上，才会有些积极进取的迹象。[①]这些男孩尤其符合贾弗（Jaffe）和桑德勒（Sandler）的观察，也就是说大多数不快乐的男孩"并没有屈服，而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和愤恨，他们的进取性反应是更为直接的证明。"[②]

除了家庭受损的刺激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男孩地位奋斗的家庭因素呢？一般说来，由于父亲在经济受损的环境下对儿子的影响不如母亲大，因此这些家庭在对孩子的成就训练方面的影响，即使有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母亲的角色、态度和行为。在同时期的研究中，母亲一般都被描绘成对来自较低地位家庭的儿子的生活成功最有影响的家长。而且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30年代经济受损家庭中母亲对于男孩有着相似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人们也许想了解在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母亲是否对儿子的成就持有较高的标准，以及她们是怎样把这一切付诸实现的。我们都知道，处于这种境遇中的母亲一般被看成是对子女最愿意支持的家长，她们不如那些把最后决策权交给丈夫的女性那样对孩子约束那么多，但是在她们对孩子的标准和要求方面，我们没有获取更多的东西。就这些未知因素而言，母亲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儿子的获取认同或者在社交中居于

① 这些趋势指的是认同、控制和攻击的得分。对于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的群体而言，经济受损群体中男孩的攻击需求和社交表现的相关系数是－.19，而经济未受损群体是.01。另外两种分数也显示出可以比较的差异，但是没有一种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在这个分析中高分等同于强烈的需求）。

② 参阅S. G. 贾弗和J. 桑德勒：《有关痛苦、沮丧和个人主义的评论》，载《儿童心理分析研究》，第20期（纽约，1965），第396页。

支配地位的需求没有显著的联系，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

那些在理论上与儿子奋斗有关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她们通过在社交中运用攻击方式发泄不满来对经济困难做出回应的程度。那些把挫折归罪于社会秩序而不是责备自己的极度不满的母亲，通过言传身教，就可能激励儿子去获得更大的成就。这些挫折在经济受损家庭的母亲中，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中是司空见惯的(参见第三章)，但是我们除了知道"空虚的感觉"和"厌烦的情绪"在这个群体中表现最为明显之外，还是不清楚：这种不满究竟是承认失败还是宣告胜利。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与相对满足的母亲相比，那些不满的母亲——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母亲——的儿子在社交方面可能更加雄心勃勃。[23]

为了详细说明直接指向社会秩序的对不满做出的攻击性反应，我们把至少对自己所处境遇(7分量表中得4分或4分以上的)有一定程度不满的母亲分成了两个组，总体按照访谈者对她们批评事物的程度的评价来划分：不苛求的和苛求的。苛求态度的分数是5到7分。这样，这些母亲被划分成了这样几组：没有感到不满的母亲，感到不满但不苛求的母亲，既不满意又苛求的母亲。在这几个群体中，儿子对认同和控制的渴望或支配权方面的分数都有明显的增加，远远超过了与不满本身的关系。用两种动机分数累加形成的指标，我们发现地位奋斗与母亲态度的定类指标(categorical index)中度相关(tau_c = .28)。这些态度大体上解释了经济受损和儿子们的抱负之间的关系。对那些母亲既不满又苛求的男孩来说，经济状况对他们的交往动机

[23] 就整个样本中的男孩而言，不满和两种动机分数之间的系数是.15；就中产阶级的男孩而言是.23(强烈的动机=高分)。

一般没有什么影响。[24]

社交抱负和在中学里的精英地位

对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来说，通往社交表现的道路主要是由他们对于地位的兴趣或者欲望而彼此区别开来的，但是因果顺序并不明确。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对于孩子的抱负和在同学中可感知的地位测量，建立在他们高中时期研究人员收集的观察记录的基础上。因此把社交中的抱负解释成社交成就的前提和结果都是可能的。不过，后一种解释的有效性因为下述这一事实而减小了：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男孩有着相似的地位。这种相似性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具有更强烈的社交动机。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学生对认同和控制的需求与他所处的地位相关。

如果达到社会声誉顶峰的男孩的确是通过艰苦劳作或努力来实现这一切的，那么，这应该是那些家庭压力沉重的男孩特别真实的写照，因为他们的地位更不稳固。甚至在挑选出来的学生干部中，人们也会期望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的男孩能够证明，他们作为个人比家庭更富裕、更稳定的成员更有价值和更为成功。同龄人的赞美改变不了家庭不幸的现实及其对社会评价的潜在意义。为了评估与社会需求相关的地位，我们用这些孩子在中学校报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作为衡量他们在交往中支配地位和精英地位的一种指标。

24　如果控制母亲的不满和苛求这两个变量，那么认同和控制需求分数就不会因经济受损的不同而有差异了。不过，无论用什么方法测量这些男孩在社交上的抱负，与母亲更为满足的情况相比，那些母亲既不满又苛求的儿子的分数显然要高得多，无论家庭是否经济受损都是如此。这些差异在统计上都是不可靠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次群体规模太小。

为了勾勒样本中的五个主要领域——学生干部、运动、高智商、戏剧艺术和音乐及兴趣俱乐部——和在其他不同情境中被提到的青少年的频数分布，我们阅读了报上覆盖了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540个问题。[25] 每个学生被提及的总次数从0次到122次。由于认同的社会重要性随着新闻栏目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这些学生每被提及一次，就根据熟知30年代学校状况的教师的平均判断，在声望层次上加权。[26] 在最杰出的群体中，也就是地位最高的20%的学生中，确定了三种社交类型：有正式领导职位的学生，在体育、戏剧或其他自我表现类型方面有天分的人，以及各种委员会中恪尽职守的人员。在教师的眼中，学生干部态度果断，精力旺盛，富有责任心。善于表现自我的人拥有各种各样才能，这在学生社区中是有目共睹并极具价值的。在委员会中最为活跃的学生，因他们的勤劳、可信赖和能力突出而显得与众不同。

对这些孩子获得社会名声(social prominence)而言，才能和远大抱负所起的作用比家庭背景更为重要。事实上，那些年轻人无论是来自劳动阶级还是中产阶级，经济受损都不会使他们在获得社会名声方面有什么显著差异。在最优秀的群体(在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占总数1/5的人)中，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女孩的数量相同。除非这个学校具有中产阶级倾向，低下的家庭地位不会使男孩获得社交成就的前景黯淡，对女

---

[25] 这个指标是由M.C.琼斯构建的。最初的分析，参阅《中学层次的社会化模式研究》(1958)。

[26] 在每一类别中，加权最重的是下面这些新闻栏目：学生干部——学生会主席加15分；运动——全州范围认可的体育明星，加10分；智力上的认同——日报的编辑加6分；艺术和戏剧——获得工艺美术学院夏季奖学金的加5分；兴趣俱乐部——俱乐部的干部加2分；其他领域——被选为"嘉年华会主席"的加10分。

孩也只稍微有些不利影响。不过，精英群体的成员具有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所注重的品质，他们因对认同和权力的强烈愿望而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运用以同龄人中的名声、成年教师的评分和动机的分数作为衡量手段，来比较青少年中最优秀群体和在整个中学三年中都没有在报纸上露过面的18人。正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同龄人推荐的备受欢迎、具有领导才能和对人友好的人，多是那些在社交中较为突出的人，而且在个人魅力方面，成年观察者给予他们的评分也相当高。在对于认同和权力的需求方面，处于活跃群体中的男孩也比处于不活跃群体中的男孩得分要高($p<.02$)。在社交抱负方面，女孩中也存在着相似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没有这么大($p<.10$)。

在享有声望的群体中，社交欲望在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中表现更为明显吗？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的领导人，对认同和权力有着更为强烈的欲望吗？为了比较根据经济受损状况划分的次群体，我们对于社会名声的定义有必要扩大，使之包括依据该指标确定的占总数2/5的最有地位的青少年。因此，24个男孩和24个女孩被分成经济受损类型和经济未受损类型：13个男孩对11个男孩，14个女孩对9个女孩（有一个女孩的家庭经济受损情况不清楚）。我们在比较中采用了三种指标：孩子上高中时的社交表现，特别是高中问卷调查题目中建构的社交欲望量度[22]以及动机评分。衡量社交欲望指标的高分，描述的是那些对于

---

[22] 这些青少年要回答，他们是否像一位学生干部["女孩(男孩)都按照她(他)的要求去做"]，是否像"学校最出名的女孩(男孩)"。在回答这些问题后，他们还要回答他们是否"想成为这类年轻人。"5分="是"，"不"=1分。两道有关感知地位的题目的分数累加起来，形成一种成就量表，构建有关渴望拥有地位的指标时用了相同的程序。衡量社交欲望的方法，是用前一个指标减去后一个指标。

领导地位和受欢迎程度方面的抱负，大大地超过了他对自己在这些领域中的自我估价。

那些在社交中获得突出地位的年轻人尽管家境贫寒，但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社交领袖相比，受到的激励更大。根据前者的自述，他们只是感到有一点不愉快，同龄人也接受了他们，但是他们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社交欲望。他们更可能提到超越他们高中时可感知到的成就的社交愿望（p<.01，男孩女孩合在一起）。[28] 在渴求社交认同方面，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活跃男孩也比家境优越的男孩分数略高一些，而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并擅长交际的女孩，比家境更加富裕的伙伴更加关注社会的接纳（p<.01）。所有其他的动机评分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

尤其是对男孩而言，出众的才华、抱负和机会结合在一起，克服了家庭困难给他们带来的限制。例如，保罗在中学的时候，通过他在唱歌和戏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同。根据提名的总次数来排序，他在样本的男孩中排名第五。由于他在表演方面的才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知道他，市民俱乐部也认识他，最后还雇他参加了演出。在大萧条的早期，作为一名蓝领技术工人，他父亲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以上，最后不得不接受亲戚的资助。家庭很难接受这种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些亲戚运气不错。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保罗从来就不接受这种变化对于他参与社交的含义。在一次展现自我的描述中，他对自己在社交中的抱负作了如下的评论："要成为一名领导人，你必须要有个性——能够与人们交谈，施展你的才华，除非你是无可争议的杰出人物……你必须要有抱负，如果你正好没有能力和个性，你就必须努力工作。"

---

[28] 这段中所有的概率值都建立在单尾 t 检验的基础上。

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并且在中学比保罗还优秀的男孩，只有他的朋友比尔、卡尔（学生会主席）和罗伯特。只有卡尔出身于劳动阶级家庭。根据他们的自述和相关文章，这些男孩对能让自己出名的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正面举止而受人注目的比尔，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任何有着奋勇向前的意志和努力的男孩都注定要成功。"在中学阶段，作为一个运动员他闻名遐迩，交友广泛，在两性中都大受青睐。学生的领导工作和参加运动是卡尔的主要活动。富有魅力和精力旺盛的罗伯特，在学校花样百出的社交活动中都很活跃。在他母亲的眼中，他有着"层出不穷的兴趣爱好，它们通常都是注重实际的。"

与对男孩所做分析形成对照的是，在解释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社交成就方面，我们做得相对不太成功。虽然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相比，她们在情感上的困扰更多，在社交中受到拒斥的感觉更强烈，再加上许多其他不利于与他人交往的因素，但是在同学们和成年观察者的眼中，这些女孩在受欢迎的程度上和社交中的领导才能方面得分并不低，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在社交抱负方面存在什么差异。有关她们在社交成就方面的惟一线索，表现在她们对不满和不快乐的适应中。同男孩的情况一样，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相比，出身于经济受损家庭的不快乐的女孩，不太倾向于通过幻想的友谊或寻求一种可以依靠、保护自己的关系来逃避现实。考虑到和家庭困难相关的情感因素，这种差异作为一种决定性因素显得特别重要。

地位变迁和自我：结论性注释

我们曾经推测，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通过解释其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使自身成了一个社会交往的

对象。正如我们在本章所注意到的，这些解释通常与其他人的实际看法有差异，而且和已经建立的自我观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在境遇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种类型的任何变化，都会改变自我赖立确立的意义框架，这导致自我意象与新境遇中对社会判断或评价的解释之间出现差异，因为前者是在前危机时稳定关系基础上获得的。

在分析中，我们必然会受到关于孩子自我取向的已有信息的限制，而测量方法也不能充分满足我们采用的理论途径或偏爱的方法论标准。[24] 相应地，我们需要在其他结果构成的情境中，考察用单一指标或者测量方法对具体的次群体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这些结果怎样相互一致或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采用这些标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庭受损主要影响了孩子们解释他们在同龄人中的名声或地位的方式，也连带影响了孩子对自我和他人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到同龄人真实的看法或评价。这个结论中特别提到三个问题：在孩子的主观现实中经济受损的影响；他们在为社会地位而奋斗时对所处境遇的定义；学校环境中的平等主义状况。

家庭受损对主观现实的影响

家庭地位的丧失，使孩子对他人的反应极为敏感，特别是使女孩低估她们在同学评价中的地位。按照母亲的描述，害羞和

---

[24] 甚至当某项研究是专门为验证某个理论而设计时，指标常常也和它们要测量的概念没什么关系。对自我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正如 M. 施瓦茨、S. 斯特赖克提到的那样："社会心理学家在处理有关自我的理论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测量个人把自己当作客体的属性的意义。社会学家没有充分处理意义这个问题及其维度。"M. 施瓦茨、S. 斯特赖克的《偏差、自我和他人》，社会学玫瑰系列专著，No. 1(华盛顿：美国社会学学会，1971)，第 36 页。

过于敏感是经济受损家庭男孩女孩共有的特征，但是家庭的经济受损对孩子感情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女孩身上，这部分是因为家庭压力对她们的自我感受影响更强烈，而且使她们因服饰和打扮的受限而在社交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更为经常地描述自己在社交生活中是如何不快乐，并且严厉地批评同学中的精英主义行为。虽然如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同学，都没提到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和未受损家庭的孩子在社交中的领导地位上和受欢迎程度上存在着任何可靠的差异。

主观现实对社会奋斗的影响

奥克兰的孩子们想像中的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其他人的实际看法之间的差距，使人们注意到他们的解释的实质。如果一个行动者在某种境遇中的行为是他定义这种境遇的一种功能，那么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这些定义就是说明他们在社交中受欢迎程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我们把外在因果属性界定为这些男孩女孩在社交中成功的一种合理的因素。他们所感觉到的在社交中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与父母的不幸和经济状况有关，而不是和个人的缺陷有关。这种有关个人获得认同和接纳能力的观点和看法，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感知到的社会拒斥并没有引起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作出相似的反应。

更为普遍的是，在父母对经济受损做出的模式化反应（如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与奥克兰样本中经济受损的孩子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差异。许多父亲对经济受损的反应是埋怨自己，在内部寻找受挫的原因，而不是对这种制度的缺陷表示不满，而且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直接导致了家庭受损。经济受损把苦难强加到孩子身上，

并不考虑他们自身的品质，而且在年龄较大的年轻人中，大多数在接受自己的地位或价值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毫无疑问，有些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在自己身上寻找挫折的原因，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这种反应在奥克兰样本中——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中——也不是模式化的适应形式。总的来说，经济困境激励了这些男孩和女孩为家庭经济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更加努力地建立和同龄人的关系。

平等的学校环境？公立学校的客观现实

对大萧条中背景迥然不同的孩子来说，什么样的学校环境能够使他们在本项研究的观察中，在受欢迎程度方面和获得领导地位方面达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考虑到经济受损家庭的各种限制和面临的各种困难，人们可能会在学校的环境中发现有关的社会无能(social disability)。即使家庭受损促进孩子们加倍努力去争取同学们的接纳和认可，但是如果学校增强了学生在社会经济方面不平等的话，这种努力将无济于事。在没有合适机会的情况下，获取社交经验的潜力可能也没有表现的余地。

在美国公立学校中，有关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证据并不罕见。不过，现有的证据表明，清除这些不平等正是奥克兰孩子们所上的初中和高中的教师和学生干部最关心的事情，因为两类学校都受到了进步教育运动(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的深刻影响。在本章的不同地方，我都列举了这方面的有关证据，比如学生社论的观点和学校关于统一着装的规定等。在一份由中学当局出版的杂志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无论学生的背景如何，扩大所有学生社会交往机会的争论和策略。这种氛围是否有效还不知道，但我们的数据的确表明，学校对孩子有一种相对平等的影响。

第三部分
成 年 时 期

大萧条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影响着人们。大部分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从此以后就认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为自己赚钱，并为子孙积累财富，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中还有一小部分认为，整个制度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你不得不设法去改变这种状况。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们，也想去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使一切走上正轨。

来自亚拉巴马古老家族的一位女性改良主义者

斯塔兹·特克尔：《艰难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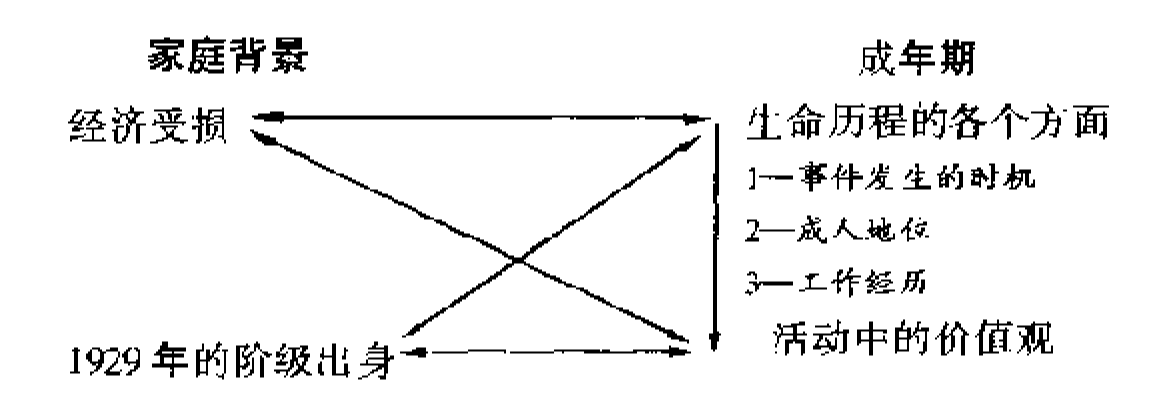
"大萧条经历"已经成为成年人行为的民间解释中一个人们熟悉的主题。无数出生在1929年之前的美国人事后回想起来，都确认大萧条经历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同龄人的生活。他们的孩子（现在正处于上大学或稍大一些的年龄段）如果认为父母物质匮乏的童年能够解释他们父母如今显得过时的行为和偏好，那么实际上也同意上面这种关于大萧条经历与后来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人们在用大萧条经历去解释一切的时候过于简单化，并且过分夸大了它的普遍性，所以一直忽略了这段历史时期中人们生活境遇之间的巨大差异，忽略了人们在面对艰难时所占有资源的不同。从我们现有的证据来看，对于30年代的父母和孩子而言，"大萧条"并非对他们所有人都是生命历程中"最糟糕的时期"，尽管也没什么人说这是他们"最好的时期"。就像许多严重的危机一样，30年代的状况也可能产生许多极端的甚至矛盾的结果。就此而言，我们认为，经济拮据和相关的经历对于劳动阶级后代的成人性格和生活模式（life pattern）的负面作用最大。

在以下的三章中，我们的目标是追寻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如何通过相关的经历和适应性，影响到这些大萧条的孩子们成年后的生活模式和心理健康。生活模式的定义，包含以下内容：重要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ition）——正规教育的完成、成为劳动力、结婚、成为父母——的时机（timing），部分通过教育获得的职业地位和工作经历，对于家庭、工作、休闲和社区活动等方面的社会偏好。生命历程中的各类事件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同的含义和影响。在奥克兰出生组所处的历史环境

中，人们期望男性通过个人在教育和事业上的成就来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而婚姻则是女性塑造自己生命历程的最重要选择和最富有宿命意味的行为。大多数奥克兰女孩最终会结婚，并通过丈夫的成就获得她们成人后的地位，她们生命历程中重要的历史特征就呈现在奥克兰男性的生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职业结构的改变。因此，我们的分析首先从男性开始，其后是女性，然后在评价男性和女性心理健康的时候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追踪奥克兰男孩和女孩直到他们进入成年期时，采用的是一种常见的分析策略。这里的图解勾勒了三类关系：用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来衡量的家庭背景和生命历程各个方面的关系，家庭背景和价值观的关系，家庭背景和表现在生命历程各个方面的价值观的关系。为了简化图解，我们没有专门提到青少年对于家庭困苦的适应性，以及它们作为经济受损和成人行为之间关联的假设性位置。对于这些男孩而言，适应性包括早期的工作经历、职业设想和抱负；对于女孩而言，适应性包括在家庭内部的经历和兴趣。



我们的分析围绕着三项基本的任务展开：回顾青春期后期到中年的生命历程，评估家庭困苦对于生命历程各个方面的影

响，明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孩子成年后的价值观与经济受损有关。这种全面的回顾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描述奥克兰出生组，二是比较这个年龄组和其他出生组。经济状况对于30年代的人的长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出生组那时所处的特定生命阶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关注奥克兰的青少年（尤其是他们1938—1939年离开中学时）是如何开始承担成人角色的。那个时候奥克兰地区的失业率有明显的下降，经济开始复苏，并且很快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由于已经走过了经济上最为匮乏的阶段，生活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年轻人有理由对自己的未来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那时，美国离正式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两年了，而二战对于大萧条十年的结束有着积极的影响，对于样本中的男性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奥克兰的青少年所拥有的生活机会，比那些年长他们5岁至10岁的美国青年都更多。

第二项任务关注的是对生命历程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对于奥克兰男性成年后的生活而言，我们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地位获得的过程，经济受损相对于阶级出身的影响，把家庭背景和职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一般来说，在大萧条中没有经历过家庭困苦的男性是否更容易获得职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解释这种结果？工作中的能力匮乏是否和经济受损有关？或者与通过教育途径获得带薪职业时遇到的障碍有关？对于奥克兰的女性，我们将调查她们生命历程中相继发生的两件事及其与家庭困苦背景的关系：她们什么时候结婚？嫁给什么样的男性？如果已婚女性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她丈夫的职业成就，那么她们结婚的时机构建了她们面临的社会选择（social option），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父母的身份、职业）的先后顺序。

到此为止，本项分析建立起这样一种情境，并且在这种情境

中提出和评估有关孩子成人后的价值观与大萧条中家庭经济拮据之间的关系。假设这些孩子在大萧条中的经历使他们成年后的偏好或选择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是否有根据？大部分证据都表明，人们的价值观更多源于他们当前的生活境遇，而不是他们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因此，我们在探求家庭受损对于大部分奥克兰成年人的长期影响时，必须把这些境遇考虑在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孩子成年后的某种价值观与家庭在30年代的受损有关？

第七章
谋生：奥克兰男子的成人生活

他的抱负、动力和活力大部分都来源于大萧条……

一个富裕商人的儿子①

我的意思是，大萧条决定了这里的状况。我就是所谓的"寻求安全的猫"。我没有胆量寻求改变，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

清洁工②

对于那些能够感受到大萧条影响的男孩来说，在大萧条中成长意味着他们在谋生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寻找被雇佣的机会，排队领取公共救济，参与罢工，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和其他事件，都使寻求生存与谋生的斗争变得戏剧化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经历使这些男孩在工作中变成了保守的或小心谨慎的人，他们宁愿守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愿因换工作而冒风险，并把感情放在更加持久的家庭关系上。也有人会认为，艰难时世培养了他们的工作意识和对各种抱负的认同，并坚定了获得更多物质和社会利益的决心，因为这些能使他们克服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如教育程度的限制）。尽管这些解释看起来彼此冲突，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与植根于童年时

① 斯塔兹·特克尔：《艰难时世》（1970），第345页。

② 斯塔兹·特克尔：《艰难时世》，第35页。

代成年人生活不同方面的关系，在于它们与各种活动的意义或相对价值以及地位获得过程之间的关系。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以下两个问题：在奥克兰人的生活中，这些成年人的经历是否和他们在大萧条中的（由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来衡量的）家庭背景有关？这种关系又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试图考察这些男子的价值观与其大萧条经历的关系，就必须把他们成年时的境遇考虑在内，因为这决定了他们如何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合适的或适宜的价值观。即使大萧条的男孩们对工作保障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那些事业上最为成功的人来说，工作保障不可能是他们最重视的东西。那些超越了父辈地位的人对工作更加投入，也更少参与家庭活动或休闲活动（参见 Elder，1969b）。相应地，我们估计家庭经济受损和成人价值观（比如工作的保障性等）之间的关联，随着那些人在大萧条和成年生活之间的社会连续性（social continuity）的增强而增强。考察这些孩子地位获得的过程，就是确定他们那些得之于大萧条的倾向在其成年后所处情境的第一步。

在 30 年代末期，那些中学毕业后并不继续接受教育的男孩们，获得了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虽然接受高等教育是获得体面工作的最佳途径，但是这极容易受到家庭经济受损所带来的各种局限的伤害。[③] 这些局限主要集中于奥克兰出生组中来自劳

---

③ 在一位男性的职业生涯中，正规教育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在 1962 年全国男性抽样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布劳、邓肯系统地比较了四个年龄组教育程度和职业成就的关系：55 岁到 64 岁（1913—1922 年时 16 岁的少年）、45 岁到 54 岁（1923—1932 年时 16 岁的少年）、35 岁到 44 岁（1933—1942 年时 16 岁的少年，包括奥克兰样本中相同年龄的研究对象）、25 岁到 34 岁（1943—1952 年时 16 岁的少年）。虽然在四个年龄组中都可以看到阶级出身对职业成就的影响，但是对于后面的年龄组来说，这种关系越来越受到他们教育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最终的职业成就上，而不是早期的工作经历。布劳、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1967），第 5 章。也

动阶级的孩子。对于这个社会阶层的男孩而言，教育程度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在支持这些孩子接受教育方面家庭资源的差异，是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间惟一实质性的差异。无论来自于哪一个社会阶级，他们在能力、(在工作上)渴望超越同伴和职业目标这些方面都是相似的。

要想估计样本中的男孩受教育的机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大萧条时家庭困苦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刚好在二战爆发进行全国总动员之前离开家。实际上，经济的逐渐复苏始于1939年9月，这也是欧洲爆发战争的日子，那时这些少年离开中学才3个月。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市场和工业，为年轻人提供了机会和受教育的选择。这种情景，"就像看见血液全部涌入已经十分虚弱之人苍白的脸颊一样"。[②]不久以后，1915—1925年出生组的大部分男子都参军了，他们中间部分人最终通过GI法案[③]的高等教育津贴继续完成了教育。[④]

可以参考A.J.贾菲、W.亚当斯：《美国年轻人的大学教育：父母和儿童的态度》，载《美国经济和社会杂志》，第269—284页。

② B.米切尔：《大萧条十年：从新时期到新政，1929—1941》(纽约，1947)，第371页。到1941年1月，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已达到62亿美元。到这年年底，国防开支的年增长率翻了三番。在1930年到1939年期间，工业生产指数的平均值为87，而到1942年早期就急剧升至174。参阅米切尔前引书，第371—377页。

③ GI法案，即《军人修正条例》，亦更为人熟知的《GI权利法案》，于1944年6月在美国国会通过，用以帮助二战退伍军人重返平民生活。该法案授权政府建立政府贷款系统，用以帮助退伍军人购买房屋、农场和从事商业活动或入学。在1946年至1957年间，有3,800万美元的贷款发放，总数760万的退伍军人(大约相当于战时服役人数的一半)由此贷款获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译注

④ 据估计，在1933—1942年中，年龄达到16岁的男孩有3/4参军了。参阅布劳、邓肯前引书，第197页。尽管出现了种种相反的猜测，但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有着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男性在教育方面能平等地从GI法案中获益(参阅布劳、邓肯前引书，第179页)。查尔斯·南估计大约有7.5%的男性因GI法案而在1940年到1955年期间完成了第一年的大学学业。参阅《GI法案对于男性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1964)。

当研究者在1938年末对这些奥克兰男孩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30年代后期社会发展使他们普遍抱有一种乐观情绪。我们抽取的样本中只有一半参与了调查，而且其中只有一部分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但那时他们一般看起来至少是充满信心的。无论他们的家庭是否曾十分拮据，有将近3/4的男孩感到他们曾经历过的大萧条已经结束了。和更加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经济受损父母的孩子对未来并不更缺乏信心，但是他们看起来更加了解生活中可能会存在令人失望的地方。虽然面对家庭经济的拮据和社区的苦难，他们却没有动摇对于政府民主制度的信念，也没有阻碍他们努力工作，或者减少他们不断进取的聪明才智。相反，和家庭相对富裕的年轻人相比，这些男孩更加认同这些信条。

接下来的分析围绕着经济受损和生活成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资源的差异和价值观。在第一部分，我们将回顾奥克兰男子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由婚姻、第一份职业、为人父母的时机、教育和职业等构成，然后依据家庭出身和经济受损进行比较。随后，我们将对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男子的不同职业成就的三种潜在资源进行评估：表现在工作模式中的职业化和认同，希望获取成就的抱负和能力的运用，还有教育。如果家庭的经济受损使某些男孩减少了受教育的期望，那么它也会在孩子们相对年幼的时候就培养他们的习惯、态度和责任感，而这些都已被证明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有利。这些孩子较早参与生产活动，又无法依赖经济受损的父母，因此能更加专注于经济支持(economic support)和职业角色，更为关心目标的实现和技能的运用。在确定了地位获取中的这些因素后，我们将转而分析成年人的价值观及其与大萧条经历之间的关系。我们尤其强调工作角色和家庭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意义，因为它们是大萧条

中人们主要关注的两个方面。

我们用来分析的样本包括 69 个男孩，他们在 1941 年至 1965 年间作为成人至少接受了三次系统跟踪调查中的一次。[⑦] 由于我们在第一章和附录 B 中已经提到数据收集的情况（1953—1954 年、1958 年和 1964 年），所以这里仅提及应该注意的两点。第一，在这个时间跨度（time span）中，样本的减少与阶级出身、家庭结构、种族、30 年代的经济受损或者智力无关。第二，在对成人的跟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是根据职业和 1958 年的婚姻史整理的。奥克兰的男孩们在 1958 年的年龄和他们的父辈在 1929 年的年龄相似，因此代际间的比较是以这两年他们的地位比较为基础的。

奥克兰出生组生命历程中的成人地位

在大萧条十年之后，有一种新情况在奥克兰男孩们职业生涯的开端和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的普及、大规模组织和在大公司中带薪职位的增加。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大部分男孩都穿上了军服，90％以上的男青年最终获得了某种军职。战时经济和战后组织化程度的增长，在这些男孩随后的职业生涯模式和地位获得中得到证明。

我们分析的第一步是要考察这些新情况，以便确定作为一个整体的出生组的平均时机、顺序和地位获得的层次。这种全面的考察将建立这样一种情境，人们可以在这种情境下，评价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对于 40 年代早期发生的事件和孩子在中年

⑦ 青少年样本包括的所有男孩都完成了中学教育，因此代表了一个挑选出来的学生次群体，即在大萧条中进入奥克兰学校体系中的中等学校的那批学生。

时地位获得的相对影响。

许多关键性的转变，常常发生在生命历程中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中：教育的完成、开始全日制工作、结婚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和这些多重的常常中断的转变相提并论。就奥克兰出生组而言，我们还必须在这些事件中加入应征入伍这件事。从许多方面来看，最重要的一年是 1942 年，因为绝大部分男孩都是在这一年进入成年阶段：40%的男孩在年底应征入伍，在这个时候结婚的男孩只有 20%，大约 40%的男孩由于自己的选择或环境的原因不再接受教育，而且在战后也不会重返课堂。除了那些立刻参军的男孩外，其他的在接受完教育之后，就开始了全日制的工作。到了 1943 年中期，3/5 的男孩至少曾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全日制工作，出生组的全部成员都有业余时间工作的经历。这些就业的境遇和大萧条中年龄较大的年轻人所处境遇的对比值得一提。个人发展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回忆道："那时任何一个男孩只要活着就能找到适当的工作。"

男孩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参军的比例相同（参见图 2）。根据现有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样本中仅有 2 人因战争而死亡。我们很少了解他们在军队中的经历，比如如何克服对战争的恐惧、在前线服役的情况、由军衔和提拔决定的军旅生涯等。大多数男性从军时间为两三年，在 1945—1946 年复员，而这段日子和随后的"婴儿潮"有着特殊的重要关系。

尽管某些婚姻在大萧条中被耽误了，但美国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依旧保持相对稳定，这一点可以从每十年一次的普查中看到：1920 年为 24.6 岁，1940 年为 24.3 岁（Moss，1964）。然而，这个年龄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 1947 年下降到 23.7 岁，这个数字和奥克兰男性的婚姻史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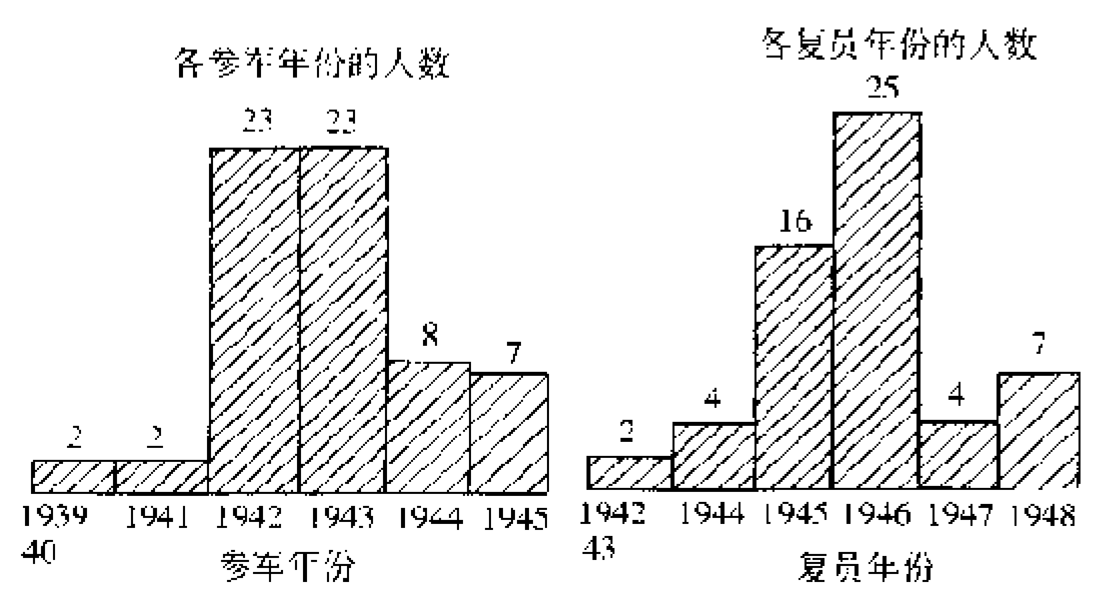


图2 奥克兰男性参军和复员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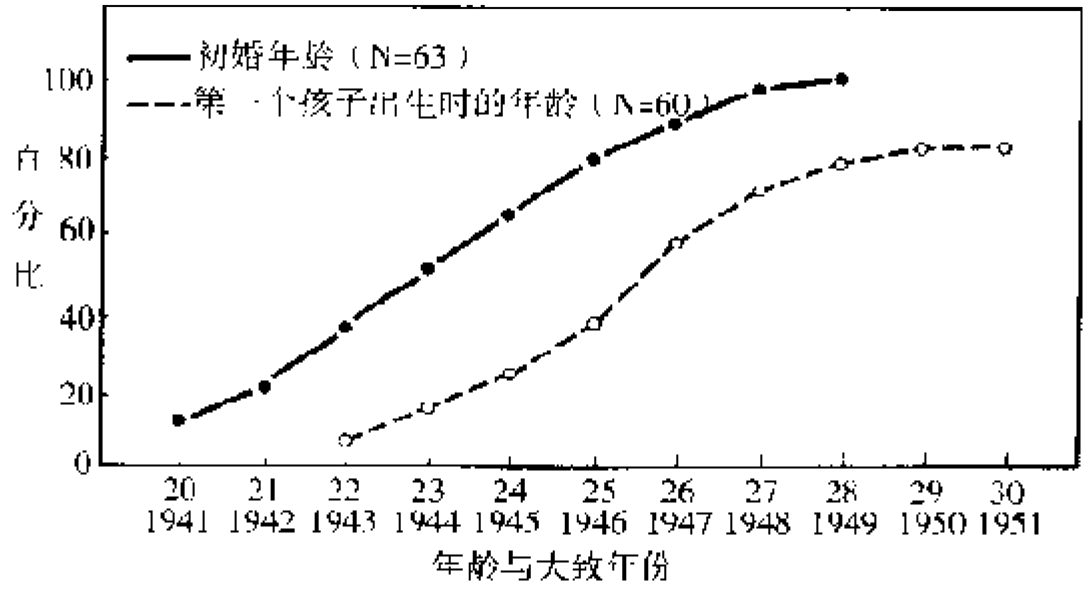


图3 曾经结婚的男性初婚年龄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年龄的百分比分布

致的。到1945—1946年，2/3曾经结婚的男性第一次结婚(年龄中位数为23.7岁)。图3显示了曾经结婚的男性的初婚年龄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年龄的分布。除了2个曾经结婚的人和4个从未结婚的人之外，我们获得了每个人婚龄的准确数据。

战争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小于其对成为父母时机的影响。几乎4/5的男性都在25岁之前结婚了，可是到这个年龄就成为父母的只有1/3。两年后，或者说1948年末的几个月中，这些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比例翻了一番。这个时期和"婴儿潮"的开始阶段相一致，而"婴儿潮"的出现，部分是因为不断好转的经济状况、初婚年龄的下降和历经大萧条和战争的克制之后的生育加速模式(Easterlin, 1961)。孩子的数目(1964年的中位数为2.8个)与过早结婚和成为父亲有着中度相关(平均相关系数r为$-.28$)。在战后的20年中，绝大部分人的初婚还保持完整(85%)，离婚有半数发生在1950年以前。

在加利福尼亚，大部分男性都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成为全日制工人，然后就留在了当地，这样就能从战后州府的"牛市"经济中获益。根据1941年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有60%的孩子在中学教育结束后还接受过某些形式的教育。根据现有的记录，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有1/3的男性从事全日制工作。在战争年代，出生组作为一个整体，教育程度也没怎么改变。到1943年底，57%的男性结束了受教育的过程，这个数字在随后的3年中只增长了6%。从这种平稳的状态可以看出，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教育给地位带来的益处而削弱了。总的来说，28%的男性最终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完成四年大学教育的比例大致也相同。在那些战后完成大学教育的男性中，有6人获得了GI法案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津贴。

从二战开始出现的美国社会中的组织结构变化——被有些

分析家描述为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变迁——反映在奥克兰出生组的职业生涯模式中。这种变化包括大规模组织或科层制组织的增多与高薪职位的增加(Blau and Duncan,1967,第106页)。"科层制的风格、语言、文化和个性,成了新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Bensman and Vidich,1971,第5页)。另外新出现的相关情况,是大部分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是由白领雇员、管理者、专家、初级行政人员和在地位较高的机构中(比如教育、娱乐、休闲、社会工作、精神治疗和其他机构)的服务人员组成的"(同上书,第5—6页)。与大萧条中(由小商人和独立的手工业者表现出来的)老中产阶级的企业家风格相比较,自我雇佣对于奥克兰样本中的男性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他们中间有70%的人到了43岁还没有过自雇的经历,只有不到1/5的人有一半工作生涯是在企业类的机构中度过的。

工作环境的变化,在追求更高的教育程度和就职于工程和商业一般领域的男孩职业生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到50年代末,在这两个领域中受雇的男性大约各有15%。尽管工程专业包罗万象,如市政、电子、航空等专业都属于这个领域,但是处于这个职业群体的男性一般来说工作境遇都相似,至少都能受到人们的尊重,都在大公司或工厂中承担管理的职责。比较而言,父母一辈的工程师很少有现在的地位,尤其是在雇员在10人以上的单位就更少。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成为会计师或经纪人的男孩的生命史中,这种断裂也很明显。这些男孩中除了一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在银行业、保险业、工业或房地产业中晋升到高级行政职位。他们的父辈有些也在相似的行业中工作,但是这些前辈或自雇或管理范围很小。

休面职业的普及和奥克兰男性令人惊异的成就是一致的。

运用霍林斯黑德衡量社会地位的二因素指标(职业和教育)来比较父亲在1929年的职位与儿子在1958年的职位时,能发现相当大幅度的向上流动。在1929年,还是少年的这些男性处于中产阶级最高层(层次I、II)的只有1/4,42%处在中产阶级的较低层(层次III);有1/3属于劳动阶级(层次IV、V)。差不多30年之后,几乎有一半年轻人处于中产阶级的最高层,用以比较的各层次的相应比例为49%、35%和16%。这些变化大部分源自于受教育机会的普及。作为一个群体,按照20世纪头25年孩子上大学的比例,父亲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多(有17%的人接受了大学教育),但是他们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则是他们的三倍以上。

尽管从相对富裕家庭到经济受损家庭,人们在大萧条中的经历会有差异,但二战中的不稳定性和对国家肩负的义务,使得即将开始生活的奥克兰男孩身上体现出相当的一致性。那些在大萧条中家庭背景不同的男孩,参军的时机和持续的时间没什么不同。如果劳动阶级家庭的儿子或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子有更多的理由在部队寻找工作,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与来自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他们这么做的时间更早,或是在部队呆的时间更长。出现这种一致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军队开始强制性征兵,"征兵草案"在1940年9月16日正式变成了法律。[8]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样本中男孩早期的成人生活和成就,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几乎没有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9]惟一的负

---

⑧ 二战结束后,每一个人服役的时间都被国会(在1941年12月13日)延长到6个月。

⑨ 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是用最早由A.霍林斯黑德设计的七级量表来衡量的。教育水平分为:专业训练、大学教育、接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中学毕业和商业学校教育、接受过某种程度的高中教育(大约10—11年的教育)、接受过7—9

面影响，表现在出身于劳动阶级的男性成人后的地位上，尤其是对他们的教育程度的负面影响。来自于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所获得的地位，首先可以从次群体的比较（表5）中看出来，然后可以从对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的相对影响的多项评估中看出来（表6）。

中产阶级孩子的早期成年生活中，没有表现出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经历的负面影响。平均来看，两个经济受损群体中的孩子们，在相同的时间里结婚、生育第一个孩子、完成正规教育和（离开学校之后）获得全日制工作。每一个群体的成员同样成功地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成就需要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的已婚男性在成为父母方面做出更多的牺牲。在两个群体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大约都是在婚后三年之内。

表5 奥克兰男性的成人地位

（按照1929年的经济受损状况和阶级出身划分[a]）

成人地位的指标[b]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未受损 N=23	受损 N=20	未受损 N=8	受损 N=14
初婚年龄	23.8	23.3	24.5	23.5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龄	26.5	26.2	26.0	26.3
完成教育的年龄	22.3	22.1	24.0	20.3
大学教育（%）	61	60	50	43

年的教育、接受教育的时间不满7年。职业地位分为：高级管理人员、大公司的老板和高级专业人员；商业管理人员、中等商业企业的老板和中级专业人员；行政人员、独立的小商人和初级专业人员；牧师和售货员、技师和小商人；技术工人；机械操作者和半熟练工人；无技术工人。

职业地位				
(平均分数:1=高,7=低)				
刚刚接受完教育的时候	3.3	3.0	4.2	3.9
1958年	2.5	2.2	2.8	3.1
1958年社会阶层(百分比分布)				
I	39	45	25	14
II & III	48	45	37	57
IV	13	10	38	29
	100	100	100	100

[a] 在成人的样本中,有65人在经济受损方面的资料可以使用。

[b] 这里平均年龄用中位值表示。在每一个这群体小组中,都有一半的人结婚了,有了第一个孩子,在他们自述的年龄之前就完成了教育。

尽管人们认为,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进程中曾不止一次出现延缓,但这种模式对于那些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更为典型,即使他们不再想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这些孩子中有40%直到战后也没有完成受教育的过程,而这种情况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只有1/4。这种比较有效地排除了这种看法:在经济受损家庭长大的孩子,是通过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获得财政上的资助,才获得如今的教育成就。实际上,那些在大学教育方面受益于GI法案的男性们,家庭背景模式并不一致。把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他们在职业上的地位稍高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他们全都是在完成正规教育之后和进入中年

以后才获得其职业地位的。[19]

这些生活模式中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孩子并没有因为经济受损的父母无力支持他们接受教育，而碰到任何实际的障碍。不过，贫困似乎是那些继续接受教育的男性更加依赖家庭之外的财政资助的原因。这种更大的依赖性，并不表现在通过 GI 法案获得教育资助或奖学金上，当然这种结果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数据不够充分。其他的可能性还包括通过打工自助或者妻子收入的资助。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在教育上的优势，体现出后一种资源的存在，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也支持了这一点：女性在结婚后就中止了受教育过程。和那些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相比，这些人更不愿意找上过大学的女性为妻子（41%对 17%），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受教育方面超过自己的妻子（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为 66%，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为 40%）。这些数据表明，丈夫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中，许多人为了把丈夫送入大学，牺牲了自己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有许多男性确实进入了大学，但是却在完成全部学业之前就离开了（经济受损群体为 40%，经济未受损群体为 18%）。

经济受损的确在那些来自于劳动阶级家庭男性的教育成就上打下了烙印，但是程度是有限的。和其他群体相比较，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更快，一般来说受过的教育也更少。尽管他们在教育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经历对他们的职业成就还是没有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

[19] 在随后的分析中，成人职业地位指的是 1958 年职业的社会声望。完成正规教育与第一份工作的地位的价值极其有限，部分是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影响，部分是因为早期工作史中工作类型编码的不可靠。

表6显示了阶级出身和家庭受损对于这些孩子成人后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主要影响，并且更加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背景的作用。

表6清楚地表明，家庭经济受损对于来自劳动阶级男性的成人地位有更不利的影响。家庭困苦的差异，并没有给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男性的教育成就带来什么影响，甚至对其职业地位还有些积极作用。对于出身低微的男性，大萧条通过对于他们教育水平的负面作用，更容易成为其职业生涯的障碍。这种限制与他们完成大学教育面临的经济障碍不同，它最可能反映阻碍或阻止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各种条件。在大萧条中，劳动阶级的年轻人在职业上的抱负和能力都相对较低，而且这一阶层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比样本中其他年轻人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群体中相对更为能干的男孩在未来可能处于边缘境遇，而那时这些孩子面对的不利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对于那些进入了大学不久后又结婚的男性而言，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中，妻子的支持是他们坚持完成学业的关键因素，虽然我们很难从现有资料中估计妻子支持的程度究竟如何。在来自劳动阶级的男性中，仅有3人娶了受过大学教育的妻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妻子。

表6　社会经济因素和教育程度对获得成人地位的影响

（标准形式的偏回归系数，相关系数）

社会经济来源和成人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职业地位(1958)	
	r	beta	r	beta
总样本(N=65)				
成人教育程度		−	.71	.70

经济受损	.09	－.04	.01	.10
社会阶级(1929)	.22	.19	.23	.12
中产阶级(N＝43)				
成人教育程度	－	－	.71	.71
经济受损	.01	01	.11	.11
劳动阶级(N＝22)				
成人教育程度			.69	.70
经济受损	.20	－.20	－.10	.04

注：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1929年家庭地位的分数都进行过修正，因此较高的分数表示较高的地位。教育程度的分数是从1(低)到7(高)，职业地位是从1到7，家庭地位是从1到5。经济受损是作为一个二分变量：1表示经济受损，0表示经济未受损。

简单地就大萧条中发生的事件而言，人们预计，在这些孩子进入中年之时，经济受损对于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强于职业地位的影响。地位获得对于以前发生事件的依赖性，依据这些事件在生命历程中的距离和分散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距离减少了，依赖性就增加了。对于我们所抽取的奥克兰样本而言，他们在1958年所获得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十多年前所达到的教育水平，但是这种联系并不足以把教育上的障碍完整地转移到职业领域。经济受损通过教育所产生的微弱的影响链条，无助于我们了解两个社会阶级中有着经济受损出身的男性在职业上所获得的成功，这种成功至少和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相同。

在大萧条中，奥克兰出生组所处职业生涯的独特阶段，多大

程度上能解释这个结果呢？生命周期理论和观察结果强化了我们的这种想法：社会变迁对于年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后果。在这方面，我曾提到奥克兰的男性出生在一个相对于大萧条来说有利的时间里，因为在经济状况最为糟糕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已经大得使他们不太容易受到家庭不幸的伤害，而相对于进入成人的婚姻和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又太小了。就这些孩子未来的前景而言，战争动员发生在对他们来说是关键的时刻，因为入伍毫无疑问会中和或者至少削弱大萧条对于那些有着贫困家庭背景的孩子开始生活时的负面影响。

比较而言，大萧条常常对于年龄较大的男性的工作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包括奥克兰男性的父亲中的一些人。比如，在斯蒂芬·特恩斯特罗姆对于五个出生组（1850—1859 年、1860—1879 年、1880—1889 年、1900—1909 年和 1930 年）波士顿人的历史分析中，也表现了这一点（Stephan Thernstrom，1973，第 4 章）。30 年代的这些限制条件在出生于 20 世纪头十年男性的工作中表现得最为清晰，因为这一组人刚好在经济崩溃前进入工作领域和家庭角色。和其他出生组比较，这一组人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到最后一份工作结束时，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较少。不过，大萧条的长期影响，也因这些人在萧条开始时的职业层次的不同而不同。白领工人和有技术的手艺人经历了经济受损，转向了地位较低的的非体力工作。这些人中还有的人失业了，但是这些逆转并没有明显减少他们在后来生活中获得职业晋升的机会。30 年代更加黑暗的一面，表现在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劳动者的生活中。如果把他们和其他出生组的第一份工作比较的话，在他们参加工作的年月中转入白领阶层的机会最小。在大萧条之前第一份工作是半技术性的男性中，有3/4以上的人在干最后一份工作时仍然属于这个阶层，而在年龄较大的出生

组中,这样的人还不到一半。

根据两项研究的发现,大萧条对于低阶层的影响与他们缺乏教育或技能有关。波士顿的年轻劳动力因为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又缺乏工作技能,所以在30年代初期急速契约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很容易失业。他们这种边缘化的生活境遇很可能影响到他们儿子的教育前景。在奥克兰的样本中,只有劳动阶级的孩子可能受到因家庭困苦而带来的教育上不利条件的影响。在30年代末,由于劳动阶级的男孩们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机会,所以家庭地位的暂时下降和资源的暂时减少,对于他们生命历程的不利影响小于持续经济受损和(用他们家庭的阶级地位来衡量的)文化上的局限的影响。

这两种形式的经济受损的(递减性的和持续性的)不同含义,表现在这些孩子的心理—社会经历中。递减的家庭变迁经历,可以使男孩们利用大萧条十年结束之时不断扩大的工作和教育选择机会,那么这种经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数据和研究都表明存在两个特别的因素:一是通过全日制就业初期的职业发展(vocational development),二是动机取向(motivation)。在那些能够巩固来自困境家庭男性职业生涯的职业发展中,存在着诸如加快职业重心和职业认同的因素吗?人们可以预计,就他们早期的工作历史而言,来自经济受损的男孩们会更早制定自己的职业计划。根据民间流传的看法,凡是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男性,都特别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职业或工作领域,民间的这种看法与下述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是一致的:他们的童年环境制约了他们的职业重心和职业认同。

与职业模式相关的是抱负和能力的运用。和富裕家庭的年轻人相比较,两个阶层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们,都有着更为远大的社会目标。但是由于他们在任务或目标上更不具有成

就取向(achievement-oriented),所以这种欲望怎样融入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活还不清楚。也许在把某些技巧运用于和具体职业目标一致的工作领域过程中,他们更加执着。在下面一部分,我们将要论及,职业发展的进程建立了一种适当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我们能够评价抱负和智力对大萧条年龄组的孩子成人后职业生涯的影响。

工作经历中的职业发展

在30年代末期,职业发展的任何途径,都必须对环境状况和个人才智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敏锐的感觉。职业选择既不是人格的简单表现,也不是社会结构的镜像(mirror image)。就奥克兰出生组而言,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家庭地位的递减性变化和相关经历如何影响孩子们对职业的考虑和认同。这里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职业认同(vocational identity),它是因与他人的关系发展形成的,也是因与他人的关系而变得有效的,所以职业认同由于境遇和关系的变化而改变。[1]

成年人承担的压力和责任的向下延伸,既表现在男孩们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上,也表现在他们渴望长大成人上,还表现在这些孩子更偏好成年人的陪伴上。经济上的困苦,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养活自己的现实。在中产阶级的经济受损家庭中,年轻人无法再想当然地利用家庭资源和特权去获得教育和工作机会。由此,我们认为,与那些来自于更加富裕家庭的年轻人相比,职业角色对于那些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男孩

[1] 参阅O.J.哈维、D.E.亨特和H.M.施罗德:《概念系统和人格的组织化》(纽约,1961),第11页。

们而言，更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对职业的思考加速了他们对于职业角色的认同。

如果说，经济受损增加了人们对职业问题的考虑，那么，这些孩子的未来就受到他们所能意识到的机会的影响。常识告诉人们，极度的困苦限制了人们的选择和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使他们感到绝望。但是，这些条件既不是30年代末期奥克兰孩子的特点，也不是研究中大部分下层阶级家庭的特点。有时候，孩子可能会因为适应家庭的局限性而降低目标，[12] 但是就现有的资料来说，这种调适并不是经济受损的结果，更多地是源自于他们出身的下层阶级。正如前面章节所提到的那样，较低的职业目标只和在大萧条之前较低的家庭地位有关。因此，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孩子早期职业发展的层面上，比如说具体的职业兴趣和职业认同，它们对孩子成年后的工作经历所带来的后果，职业生涯开始的时机和条理性，以及孩子们最终获得的职业成就。

早期的职业发展

这些男孩在职业具体化上的发展阶段，是对1938年和1941年填写的“强烈职业兴趣量表”中所表露的职业兴趣概况的评价来确定的。这些评价是由一位对调查有着多年经验的学

---

⑫ 这种调适，可以从家庭资源和地位之间以及对自我和未来的概念之间的不一致而引起不和谐问题的减少来解释。除了降低目标之外，因为这些孩子的未来从依靠家庭转向依靠个人才智，这种不一致性也会减少。因为经济受损并没有对成就动机或目标层次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后一种调适显得与数据更加一致。某种假设认为职业决策受到减少不一致性的需求的影响，这和我们对于经济受损和职业具体化之间关系的假设是一致的。对于不一致性解释的讨论，可以参阅 C. L. 希尔顿：《职业决策》，载《咨询心理学杂志》，第9期（1962），第291—298页。

者给出的。[43] 我们不需要了解特别的个案或年份，就能对每一类兴趣概况进行编码，然后把它们和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对应起来：转变阶段——职业兴趣尚未形成，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发展阶段——可能意识到了职业兴趣的方向，但是兴趣还没有真正成形；成熟阶段——充分发展起来的明确职业偏好或多种职业偏好。比较1938年和1941年的这些判断，我们发现有相当大的变化，正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些男孩的职业兴趣变得更加成熟，虽然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被划为成熟一类。在1938年，有27%属于转变类，62%属于发展类，只有7%被划为成熟类。三年后，这种分布向着成熟类移动，相应的比例依次为13%、45%和43%。用智商(IQ)来衡量的认知功能方面的成熟程度，仅仅与中学阶段职业上的成熟度相关。处于转变阶段的男孩，在智商上比另外两类更加成熟的男孩低很多($p<.05$)。当三年之后对他们进行再次验证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处于转变和发展阶段的男孩没有成熟阶段的男孩能干。

从有关家庭状况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对于这两个阶级中来自受损家庭的男孩而言，他们在职业上的成熟速度在两个时期之间最快。这些男孩上中学的时候，社会阶级或者经济受损都不会使他们的职业发展出现任何差异。然而到了1941年，处于经济受损群体的男孩大部分都被划为成熟类，而经济未受损群体的孩子被划为成熟类的还不到30%(59%对29%，$p<.05$)。把处于转变和发展阶段的群体组放在一起，职业成熟和经济受损之间的关系比与社会阶级的关系更为密切($r=.28$对$.04$)。而且，对于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的男孩而言，职业成

---

[43] 我非常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咨询中心主任B.柯克博士，感谢他对于我在现场分析方面慷慨的专业帮助

熟并不会因为它和经济受损的关系不同而有什么差异。

尽管很少有男孩在中学时就形成了持久不变的兴趣，但是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中，认同某种职业偏好非常普遍。在1938年的调查中，一个关于职业选择的问题就是为了弄清职业偏好的普遍类型，比如工程师、木匠和店员。只有2/3的男孩表明了自己的某种偏好，主要集中在白领、管理和专业等类别中。这些孩子最经常提到的选择是工程师、医生、律师、商人、会计师和技工职位。偏好工程师的人是最多的(16%)，选择其他各类的人数都不到10%。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这些孩子选择的层次随家庭地位的上升而增加，而选择的确定性仅仅因为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为了估计每一经济受损群体中职业认同的普遍性，我们把那些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的男孩，和那些或是不确信其选择或是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的男孩进行了比较。大约有一半的应答者可以被界定为具备职业认同，这种偏好在中产阶级经济受损群体中最为典型(经济受损为62%，经济未受损为40%)，而劳动阶级中两个群体间的差异更大(经济受损为50%，经济未受损为25%)。就兴趣和偏好的成熟程度来说，经济受损和职业发展的加速模式(accelerated pattern)相关。

对孩子的职业选择最有影响的人物，因他们在大萧条中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可以从家庭关系以及(对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来说)家庭以外成人的重要性中了解到。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年轻人比较，在经济受损家庭男孩的生活中，老师和母亲是更常提到的参照人(reference figure)；而且在30多年后，他们作为主要影响孩子们对当前职业选择的人物也更经常被提及(受损家庭男孩为23%，未受损家庭男孩为13%)。这些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们，也更可能选择任何人都没有影响他(15%对7%)。只有来自中产阶级的男孩们选择了父亲，

而且在两个经济受损群体中的比例都是一样的(20%)。在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中,所属职业领域中的朋友或者妻子之类成年人的影响更常被提及。

经济受损通过与更为劳动密集型家庭经济的关联产生的影响,对于中产阶级男孩的职业发展的作用,比它对于低层男孩的作用更容易理解。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前者生性聪颖而且才智突出,还很可能从他们那个阶层的传统抱负和勤于探索未来的态度中获益。在这种情境中,考虑到经济维持和自我供养,考虑到提早开始的职业思考、判断和活动,家庭受损可以被解释为一件突如其来的或具有激发作用的事件。非常明显,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中,从父母的关注点和孩子们的生产性角色来看,这些事务是他们最为关心的。比较而言,下等阶级的孩子更可能迟疑不决或回答"不知道或不关心",这是对贫困境遇和黯淡未来的模式化反应。在1960年对九年级男孩职业发展的研究中,证明了下面这一点:父母处于社会下层的男孩不太聪明,也不太了解他所需要进行的选择以及这种早期选择对以后时机的含义,更不懂得影响决策的因素或条件。[1]

这里有几种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劳动阶级受损家庭的男性中,职业考虑的特点很少有相似之处。首先,在奥克兰样本中,劳动阶级主要指的是体力劳动者的最上层,他们是下层中更为稳定、更有抱负的家庭。第二,来自这些家庭的男孩在智力上并没有明显的缺陷。无论他们的家庭在经济上是否受损,他们的绝对智力和成就动机并不是其主要局限所在。我们还要提到,这项研究中所有劳动阶级的男孩上中学的时候,大多进的是

---

① D.E.索亚和P.L.奥弗斯特里特:《九年级男孩的职业成熟程度》(纽约,1960),第63页。

二流的中产阶级学校。比起那些进入奥克兰劳动阶级学校的同龄人，这些孩子明显能够从学校的资源、咨询和职业模式中受益。总而言之，这些有利条件使奥克兰劳动阶级的生活机会最大化了，而且这样做也保证了各个社会阶层在职业发展的认知层面上，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成人职业生涯中的工作经历

通过对职业兴趣和认同的澄清，我们知道了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早期职业重心，这又为我们了解他们最终的地位成就提供了一条线索，虽然从青春期后期开始到1940年代（成人的工作形成年代），职业发展连续性的假设还没有得到验证。如果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那么职业生涯开始的方向会有利于尽快建立有序的工作状态，建立一种在功能上相关和层次上有序的工作转换序列。[35] 然而，这种方向性在给孩子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职业过早具体化的风险，比如孩子视野的广度会因此受到限制。虽然孩子在自己职业上长期的犹疑不决，会导致其地位的模糊不清，会使他们因生活开始得过晚而处于潜在的不利地位，但是如果职业选择到了孩子成年后还可以继续进行，那么这些这些负面影响将最小化。就合乎规范的定义和机会而言，工作的开始、结婚和孩子的出生都有合适的年龄。

就经济受损家庭男性所获得的职业地位而言，如果他们早期的职业发展是工具性的，那么它的意义将在他们的工作经历中得到证实，并将由以下因素来衡量：职业生涯建立的时机、工

---

[35] 这种序列指的是H.威伦斯基这样定义的职业生涯："根据声望层次安排的一系列相关的工作，这是通过个人在有序序列上的移动（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期的）实现的。"参阅他的《有序职业和社会参与》（1961）。

作不同阶段的雇主数和工作内容，工作的条理性，从早期职业偏好到20年后的职业之间的连续程度，中年时对于自己工作经历和成就的回顾。这种持续性的主题表明，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比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更早参加工作，更倾向于建立有序的职业生涯。因为职业生涯的条理化和孩子的教育程度有关，所以这上面的差异性在中产阶级男性中最为显著。

职业生涯建立的时机，是用进入工作系列的年份来定义的，这些工作在1940年至50年代末期中至少持续6年。工作系列(line of work)指的是依照权力框架安排的一系列相关工作。如表A－20所显示，早期职业生涯的形成和经济受损有关，而且这种联系在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男性中最为明显，这部分是因为经济未受损群体的教育进程更加缓慢。目标不确定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1948年后进入的职业生涯和职业的具体化程度负相关，1941年在现场进行的测量表明了这一点。[16]

职业上犹豫不决所带来的后果，在有关孩子生命史的报告中表现得最为清晰。比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孩，他在大萧条中既没有遇到特别的家庭困苦，也没有受到特殊的限制。儿童福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一个聪明、受人欢迎的小伙子，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的职业兴趣非常广泛，从授课、人事工作到工程师。他倾向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偏好中后面的领域，因为它们属于"男人的工作"，但是对于它们将来能提供的帮助和与他人共同工作的机会不太确定。在1941年有关职业成熟的现场测量中，他被划归为早熟的一类。从他

---

⑯ 在中产阶级的男性中，职业成熟(现场衡量)和1948年后进入职业生涯系列之间的相关系数r为－.22。在那些在战后完成教育的人中，进入职业生涯较晚的人当然较为普遍。

进入工程学校的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8年，相当程度的踌躇不决是他生活的显著特点。虽然他并不适合在车队的医疗领域服务，但还是在1942年退学了，并在当地的建筑工程队中谋得了一个职位。有了一年的实践经验后，他返回了学校，但是一个学期之后又退学了。这种不稳定性持续到1948年，直到他在一家大工厂中获得了一个技师职位。随后是结婚、生子、获得大学文凭。他很快得到了提升，而且最终为他提供了在其他工厂大展才华的机会。到了1958年，他已经成了一家小公司的合伙人，并把自己的才能运用于公共关系和工程技术上。尽管他在地位和收入方面都在稳步上升，但是无论是工程技术还是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都无法令他满意："如果……，情形就会有所好转。""假如我能够早做决定，那么我可能会从事如医疗之类的工作，从事一些能帮助他人的工作，我也可能会做一些比现在更为重要的事。"他感到如果他只要早点"依靠自己"，他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也会变得更有意义。然而，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从事一些更具有服务性的工作，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还无法确定我应做些什么。"

人们一般都认为，因为这些孩子在大萧条中曾面对经济受损和工作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不愿意变换工作，尤其是不愿意换老板。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这种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和稳定职业生涯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话），尽管许多雇主和工作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衡量工作条理化的可靠指标。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相同职业领域内的工作变换，或者在诸如从汽车推销商到精神病护理员之类没有功能上的联系的领域间变动工作。如果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在面对工作和雇主的变化时采取保守的立场，那么在他们的职业史中就不会留有这类痕迹。一般说来，在这20年中，与来自于中产阶

级和劳动阶级的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相比，他们更换工作和雇主的次数都更多（表A—21）。然而，这种差异基本上受到了从中学到战后这段漂泊不定日子的限制。

在战后的岁月中，从社会瓦解和心理紧张（psychological strain）的角度而言，工作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在没有联系的工作之间的转换。我们把详尽的工作史分为两个时间段：1946—1955年和1956—1964年，然后来看工作变化的类型。因经济受损而导致的职业发展差异，反映在战后最初那段岁月中的工作变化上，但是这仅仅表现在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男性身上。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中，有28%的人至少更换了一次工作类型，而在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中这样做的只有5%。只有两位出身于劳动阶级的男性，换了一种与以前毫无关系的工作。在1955年之后，从工作变换的角度来说，工作经验是比家庭受损更为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困苦并没有使职业中断的可能性出现什么差异。大多数更换工作的人，都出生于劳动阶级（劳动阶级为30%，中产阶级为10%）；而且就其和父亲职业的关系而言，则或者是稳定的或者是向下流动的。这些男性改变工作性质，一般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

对职业生涯连续性的另外一种检验，是把孩子们在中学毕业时的职业偏好和在1958年的职业进行比较。因为仅有2/3的男性回答了具体的偏好，所以这种比较基本上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后代。因为这些孩子的选择涉及面极广，所以需要一个确定这些选择之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粗略规定。比如孩子偏好的工程师职位，无论是市政、电子的，还是工业的或化工的，其职业偏好都归为工程师。和我们前面的发现一致，职业生涯的连续性或目标的达成，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中最为普遍（69%对29%）。但在劳动阶级的少数在30年代末就知道自己想要

干什么的儿子中,这种差异不太明显。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根据客观测量,回顾了从1940年到50年代末期的工作经历。这个时间段成了孩子在二战前"开始生活"的社会经济情境,也是工作本身的一个阶段,比如职业生涯开始的时机。在我们的分析中,缺少的是对于工作中的事件、成功和缺憾的主观回顾。为了把这一部分也包括在分析中,我们将回顾奥克兰男性在40年代早期到整个中年时期的工作经验,然后估量它们给职业成就所带来的后果。

在1958年进行的长时间访谈中,我们询问那些男性确定他们选择职业角色的年龄以及遵照这种选择的程度,还有他们对迄今为止工作经历的感受。对这些回溯性资料的总结,可以在下面对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男性的比较中看出来。而且无论何时,我们都会提到阶级差异。

大体说来,对过去的记忆与对于早期职业发展和工作经历的客观测量是一致的。和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相比较,经济受损群体的成员更常提及对现在职业的早期(在中学或者中学毕业后不久)选择(受损群体57%对未受损群体33%)。另外他们还提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准备比外在压力或工作机会更多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46%对33%),宣称他们更多地遵从自己最初的职业偏好(46%对33%)。尽管这些回答并没有因阶级背景而出现差异,但是的确影响了他们对过去事件的评价。在中产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中有更大比例的人确信他们做的比自己的最初期望要好(55%对31%),对他们的教育程度较为满意(26%对20%),即使有机会也没有兴趣改变过去发生的一切(61%对50%)。这些差异在劳动阶级的孩子们中却正好反了过来,从总体上反映了经济受损群体面临的更加困难的生活境遇。尤其是后面的应答者,也更少有人感到超过

了他们早期的目标(40%对60%)。在这些评价中,不充分或不适当的教育是一个突出因素。大部分男性都不满意他们自己为工作所做的准备。

工作角色与一个人的社会认同和尊严交织在一起,因此估计这些孩子在回顾其生命成就(life accomplishments)的时候,存在某种掩盖其失望和失败的趋势。[11]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大部分成员都表明了一种倾向:如果他们的职业生涯能够重新开始,他们依旧会选择现在的职业。例外的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只有43%的人还愿意选择现在的职业,而其他群体愿意这么做的都在70%以上。然而对于大多数人的过去而言,他们对于50年代后期的流动和工作声望的态度,并没有受到30年代经济受损直接或间接的可以意识到的影响。职业成就的层次和不同的流动,是对这些态度更加有影响的资源,二者都与大萧条时的经济状况没有明显的关系。这表现在对于提升的机会、管理者的责任和工作声望的满意程度上,也表现在1964年追踪调查中所运用的五级量表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尤其是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男性——的满意度要高些,但是这种差异太小了,在统计上不显著。更为重要的是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经历,无论相对于父亲的地位来说是向上、水平还是向下流动。不论与经济困苦有关的过去经历是什么,向上流动者对于流动的机会和工作声望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未流动者,而且这种差异在出身于劳动阶级家庭的男性中表现最为明显(参见Elder,1969b)。

---

[11] 在最近的几年中,回忆起的过去被创造性地作为有关生命历程及其意义的信息来源。参阅布尔特:《生命回顾》(1963),还有M. A. 利伯曼、J. M. 福尔克:《作为生命周期研究数据来源的回忆起的过去》,载《个人发展》,第14期(1971),第132—141页。

在分析之初，我们就把奥克兰出生组早期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与它给职业成就所带来的后果联系在一起。在较为年幼时就卷入生产性活动和相应的职业认同限制了这些孩子的生活前景，因为限制了他们的受教育机会，这种牺牲在劳动阶级父母的孩子们中较为明显。然而对于大部分男性来说，因为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机会的增加，所以这些代价最小化了。在这种情境中，与30年代早期的经济受损或失业相比，家庭地位的文化层面和孩子的不同能力，对其教育程度和职业目标有着更大的影响。无论在哪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相关经验，加快了职业具体化、职业认同和职业生涯确立的速度。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二战前在职业上更为成熟，也更为确定，在1948年前也更早地确立其职业生涯，其早期的职业偏好和中学毕业20多年后的职业之间的连续性也更强。

这些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职业生活，与当今把大萧条经历作为"一种受限生活"的印象不太一样，而且对于他们后代的看法也是有局限性的。不过，就这个方面来说有着许多普遍的看法，比如因对极度贫困和需求受损所带来动机后果的保护性适应，孩子的兴趣和欲望都减少了。一般说来，与经济充裕和稳定职业——食品、安全和接纳——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满足，在那些于大萧条中感到这些方面受损的男性的动机层次中，获得了更为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早期的愿望，在长大后迥然不同的环境中是否还能保持下去。[13]

在我们确定了职业成就中主要资源（智力、抱负、职业发展等等）的差异后，在确定了这些职业成就和30年代经济受损的

---

[13] 我们这里指的是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心理需求、安全感、归属感和爱、尊严和自我实现。马斯洛：《动机和人格》(1954)，尤其是第5章。

关系之后，这些问题会得到最清晰的阐释。从这些分析中，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描绘生命历程中价值观形成的情境。

职业成就对生命历程的影响

我们已经勾画出两条通往职业成就的一般道路，这两条道路受到经济受损的影响是不同的：间接的一条路是通过高等教育，以及由工作的取向、事件和成就界定的系列而达成的。如果仅就经济基础而言，我们认为家庭经济受损使孩子们在谋求职业成就时所需的教育处于不利的位置。现有的数据证明了这种影响，但是它仅仅表现于劳动阶级父母的孩子中，而且即使是在这一群体中，它对他们最终获得的职业地位也没什么影响。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忽略家庭受损所带来的无关紧要的影响，而去探求更加重要的关系，但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所要面对和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受损和教育与职业上的成人地位没有很强的负相关？我们曾经提出大量能够使经济受损导致的教育限制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因素，尤其是这些孩子在二战经济繁荣之前离开中学时所面临的有利条件。但是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相比，教育本身无法解释为什么中产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能够获得较高的职业成就。工作取向和技术能够解释这种差异吗？我们能否说，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们在职业上的成功，部分来自他们相对较早地确定职业重心和对职业的认同，部分来自于他们对权力和他人赏识的强烈渴望，或者来自于他们在谋求职业成就时技术的运用？

目标的澄清，将使孩子在经济方面而付出努力，或者说至少能有利于他们的才能持续地运用于某个领域，并对成就的获得有着积极的影响。对那些起点较低而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

而言，界定清晰的目标和符合规范的抱负，是他们都拥有的相似的有利条件，这能驱使他们坚定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并把身心全都用上。这正与一项研究中对那些来自社会底层或者劳动阶级家庭的成功商人生活模式的描述一样（Warrar and Abegglen, 1963）。在对研究做总的回顾时，麦克莱兰总结道："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样的推论：具有较高成就需求的男孩在社会中更可能向上流动，尤其当他们从一个相当低的社会经济水平起步的时候更是如此"（McClelland, 1961，第 322 页）。作为一项假设，我们认为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获得的职业成就稍大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职业认同、抱负和技术运用等有利于他们职业生涯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也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来自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成就。

作为评价这些假设的第一步，我们将把地位获得当做阶级出身、个人获得成就的能力（影响任务完成的才智和成就动机）[13] 和教育程度作用的一般结果。家庭地位和达成目标的能力被定义为决定教育程度的先决因素，而教育程度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在中年时的职业地位。男性在他们工作中所获得的地位，被假定为家庭地位、智力和成就动机的差异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这些因素又通过对教育程度的影响而间接地作用于男性地位的获得。在检验这些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将引入经济受损这个因素，系统地追寻它如何通过教育程度、职业发展和抱负来从多方面影响成人地位。

我们将运用路径技术，来分析直接和间接影响 1958 年所获

---

[13] 对成就动机的这种测量，表明了对在完成艰苦任务中表现突出的渴望，而且会因其对于认同和权力渴望的分数而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也已发现这些因素和经济受损有着显著相关（第六章）。在抱负和能力运用组成的更加广阔的情境中，我们将验证社会奋斗和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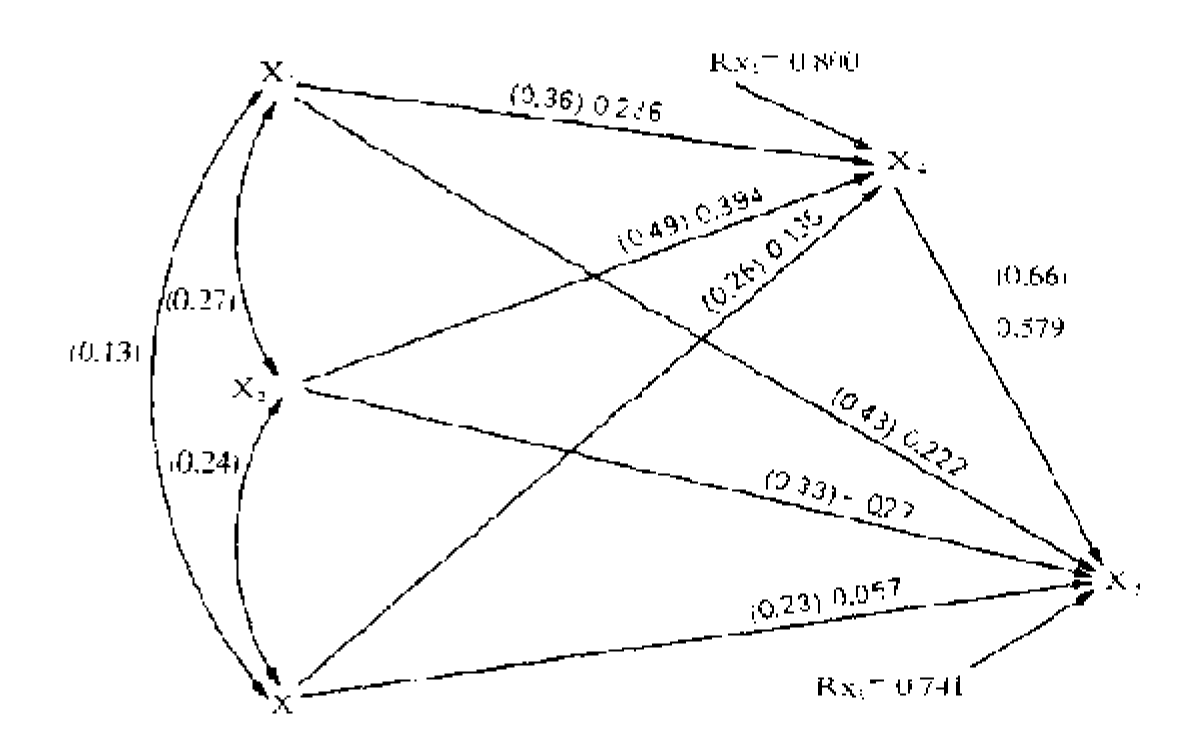
得职业地位的因素。这种方法是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一种变异，它假设变量间的关系是线性的、累加性的和不对称的。[20] 一幅路径图是一种有用的表述模式，因为它提出了假设，又描述了这些变量的先后顺序和他们的间接影响。在路径图中，连接两个有着非对称和线性关系变量的路径，是用单箭头和 β 系数描述的。双箭头的曲线，一般用来描述两个已给定变量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描述两个关系无法解释的变量。在下面的分析中，家庭地位、智商和成就动机被当做已知的。路径分析要求每一个因变量完全由系统中的变量决定，剩余因素（residual factors）——假定和前置变量或其他剩余因素无关——必须用于说明无法解释的变异。图 4 标注了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与任务相关的成就动机、智商和 1929 年家庭地位间的路径系数。为了方便读者，每一种关系的相关系数都在括号中标明。

那些在工作中获得较高地位的人，在智力和家庭地位上都高于那些更不成功的人，但是他们的成就更多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这为找到有声望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排除通过教育产生的间接影响，智力和家庭地位对于孩子获得较高地位的影响不值一提。这些发现的总体模式和其他研究结果十分吻合，包括最近对大学预科生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学术能力对职业成就的影响“全是在学校体系内实现的。”[21]

---

[20] 随着分析复杂性的显著增加，在路径模式中包含对称关系是可能的。有关回归模式（nonrecursive model）的更早些的资料，可以参阅 A. S. 戈德伯格：《计量经济学理论》（纽约，1964）。社会学方面的例子，可以参阅 K. C. 兰德：《重要他人、自我反思的行动和态度形成的过程：重新解释》，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36 期（1971），第 1085—1098 页。

[21] B. K. 埃克兰德：《学术能力、高等教育和职业流动》，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30 期（1955），第 744 页。



X_1 1929 年的家庭地位　　X_4 教育程度

X_2 智　商　　X_5 1958 年的职业地位

X_3 成就动机

图 4　孩子成年后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与成就动机、智商和 1929 年的阶级出身之间的路径关系

正如人们估计的那样，超越他人的渴望通过教育对职业成就产生的限制，要远远小于智商的限制，而且与智力或家庭地位相比，这种渴望对职业成就所施加的直接影响更大。就主要影响而言，阶级出身没有智商或成就动机对成人地位影响大，尽管它和智商、成就动机都有关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不同阶级地位衡量的社会情境的差异，以及它们对于职业成功所需资源的含义。路径模式是根据阶级出身（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而构建的，值得一提的差异出现在智商和抱负的相对影响中。由于这些模型只有在公开出版时才可以应用（参阅 Elder, 1968），而

且仅仅与我们关于经济受损对于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兴趣有关，所以在此我们将简短总结一下与我们分析有关的方面。

对于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男性的职业成就来说，智力和动机的作用，一般反映了他们生活境遇、机会和职业成就层次的差异。高等教育的作用对于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男性的职业成就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在这方面，智力比渴望超越他人对获取较高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后者是那些出身于低层的男性获得职业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出身于劳动阶级又更加能干的男性，也常常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打通他们攀登职业阶梯的道路，虽然他们更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的人数也相对较少。结果是，1958 年出身低微的男性中只有 22％的人身为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而出身高贵的男性中有 41％属于这种情况。他们获取地位层次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中，教育程度上的不利对他们获取的地位没有什么不利影响，也可以解释他们的成就动机对于社会流动的重要性。从中等层次的工作向上流动，更少地依赖于文凭，更多地依赖于成就动机和聪明才智。

就智力和渴望超越他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能力的运用对于身处地位低微环境中男性的生活前景，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一个男孩想要有所成就以及在职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的才智。一般说来，无论对于哪个社会阶层的孩子，智力都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有薪工作的途径，但对于那些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孩子来说，智力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刺激因素（social stimulus）。中产阶级的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中表现良好，甚至可以不顾这些孩子的能力差异。当然父母和老师总喜欢更多地关注劳动阶级的聪明男孩，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孩子比他所处环境中的其他孩子更具竞争力。就像

我们曾提到的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那样,卑微的家庭地位和激烈的竞争之间的不一致,也是成就动机产生的另外一种潜在资源。所有的这些看法,都导致了这种预期:劳动阶级中更具竞争能力的男性,比那些出身高贵的男性具有更强的超越他人的动机,数据也证明了这种差异。前一群体的智力和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也比后一群体更为密切(r = .40 对 .17)。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都比那些来自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具有更为强烈的成就动机?

从前面的分析和我们所发现的家庭受损所带来的后果中,我们还无法预测经济受损能否明显改变图 4 所显示的地位获得模式。智商和对某项事业的成就动机,都不会因经济受损而出现什么差异。惟一值得一提的改变是,经济受损对于劳动阶级男性的教育程度有着负面影响。不过,这种模式中不包括工作发展的各个方面,而我们却发现这在那些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男性的职业生活中是最为独特的,尤其集中在职业兴趣和目标上。这种职业取向能够巩固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所获得的职业成就吗?是否有证据表明,对于来自经济受损的劳动阶级家庭的男孩而言,较早确定其职业目标和在最合适的年龄开始职业生涯,至少能部分抵消他们在教育上的欠缺所带来的局限性?

图 4 的模式也无法确定孩子所处情境对于个人才智和成人地位之间关系的影响,比如是否会影响成就动机和智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用 1929 年的阶级出身来确定具体的情境,我们发现和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劳动阶级的孩子在职业成就上相对更多地依赖于成就动机,而不是智商。如果我们假定在社会经济受损所构成的情境中,孩子在职业上的成就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才智;那么在每个社会阶级之中,动机的作用也会随着家庭经济

受损程度的加深而增加。在下面两个部分中，对于经济受损和成人地位之间以及有关职业具体化的动机/能力之间的关联，我们将进行实证性的检测。

作为一种间接影响的职业具体化

在这项分析中，我们运用了对职业具体化的现场测量(1941)，而且把处于转变和形成阶段的职业发展放在一起，表示职业发展尚未成熟的类型(0分表示不成熟，1分表示职业发展已经成熟)。数据显示，那些在成年之前就有着明确职业兴趣的男孩，更多地来自于经济受损的家庭($r=.28$)，而且在50年代末更可能获得有声望的职业($r=.30$)，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在中学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当职业成熟(X_2)的作用在偏相关中被控制时，它作为经济受损(X_1)和职业成就(X_3)之间的正向关联的重要性就变得更为清楚了。这种统计测量表明，X_1和X_3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和职业成熟有着关系而导致的。结果表明，经济受损对职业地位的负面影响有适度的增长，相关系数从$r_{13}=.01$到$r_{13.2}=-.08$。

由于对出身于劳动阶级的男性而言，经济受损是地位获得的一个不利条件，为此我们在按照阶级出身定义的群体中重复了上面的分析。如图5所示，这些结果表明了在这两个阶级中通往较高地位的职业途径，虽然这在来自劳动阶级的男性中表现得稍为明显一些。来自于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所处的地位优势，部分来自于他们的职业目标确定较早。而当这个因素被控制时，X_1和X_3的关系强度就会减弱，从而也表明了这一点。即使再控制孩子的教育程度，也不会改变这种结果。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中，职业途径和教育途径对于职业成就的显著影响，在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最为明显。如不考虑职业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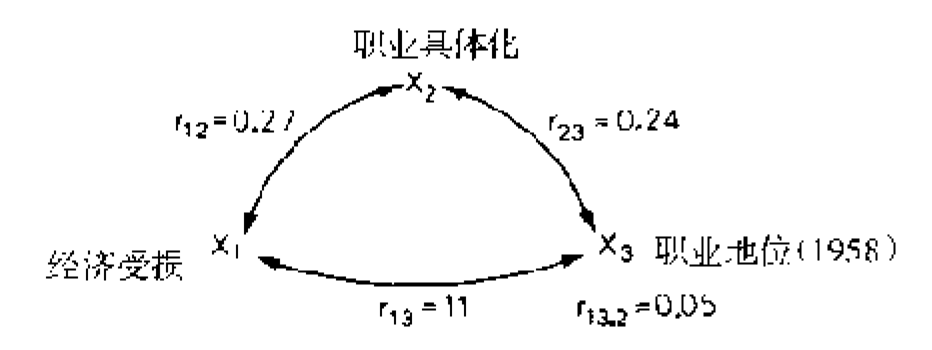
化的相关模式，经济受损对于成人地位获得的阻碍作用十分强烈。事实上，如果我们排除经济困难对于教育的不利影响，家庭经济受损和职业地位之间只有轻度的正相关（$r=.06$）。

职业发展对职业成就中的许多东西还不能解释，但是和更加传统的背景因素相比，它的解释效果已经很好了。比如，家庭地位难以预测孩子未来的职业地位，而劳动阶级男孩的智力和成就动机更是如此了。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男孩的成就而言，智力和成就动机比职业具体化的作用更为重要（平均 $r=.43$ 对 .24）；对于来自劳动阶级男孩所获得的地位而言，成就动机和具体的职业兴趣都比智商的影响更大（顺序同上，$r=.38$、.34、.07）。从研究文献来看，来自于这个阶级的成功男性在这些特征上，与那些从蓝领家庭向上流动的男性十分相似。也就是说，他们的精力和兴趣都集中于职业的提升上。

作为间接影响因素的抱负和智力

在生命历程中，抱负和智力常常被当做家庭背景和成人地位之间的因果关联（causal link），家庭的影响可以通过后代获取成就的能力来追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于确定家庭背景在社会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对职业成就的影响来说，这种中介模式（mediational model）的价值有限。我们确信，来自地位较高家庭的男性比出身低微的男性更可能获得有声望的职业，他们做到这一点，部分是通过他们更强的能力和更高的目标实现的，但是这些因素给成人后的孩子所带来的后果，因社会经济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子们而言，智商比成就动机更能预测他们长大成人后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更多。而在有着劳动阶级背景的男性的生活中，这种影响正好相反。





劳动阶级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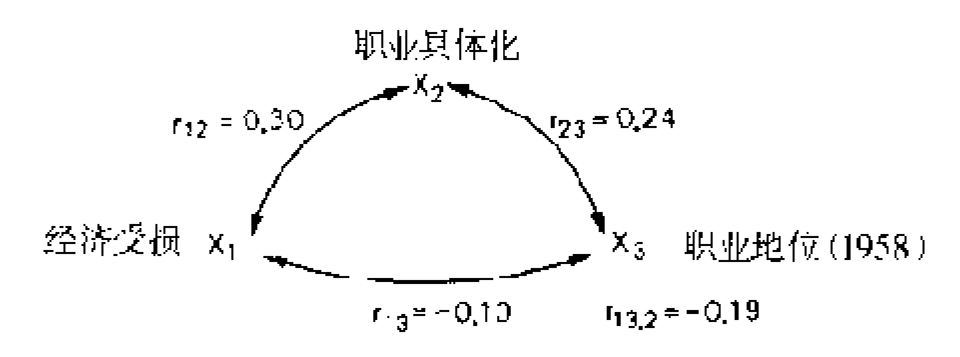


图 5　经济受损、职业具体化和职业地位间的零相关和偏相关系数

为了明确说明在孩子的生命历程中，经济受损和获取成就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孩子所处的情境同样重要。每一个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并不比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在成就动机上更弱，或在智商上更低。但是有能力的人最可能也是志向远大的人，而为实现志向的种种努力对于他们的职业成就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尽管与来自低层家庭的男孩相比，中产阶级男孩超越他人的渴望和他们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无论哪个阶级中经济受损父母的聪明孩子，都比来自富裕家庭年轻人的成就取向更强（全部样本，r = .25 对 .01）。中产阶级男孩中相应群体的取值为 .26 和 .10。

根据这些数据，动机和能力的关系无论是根据阶级出身或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来衡量，都会随着家庭地位的下降和资源的减少而增强。我们假设，一个人即使才华横溢，但是如果无法从家庭声望或者支持中获益，要获得一定的成就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这种动力似乎是对个人能力和低下家庭地位之间可感觉到的不一致的回应，这是通过运用个人能力和潜力这些更为有利的条件来表现自我，并以此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企图。

有经济受损背景却超越其父亲职业地位的男孩们，在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因其远大志向而显得与众不同，但是他们同时也比那些等同于或低于其父亲职业地位的男孩更加聪明。[22]如表A-22所示，对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而且向上流动的男性来说，这种差异就倒了过来。由于劳动阶级男孩的个案数较少，所以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比较。

如果像智商和职业成就之类的两个前置因素是相关的，那么想确定和比较两者的主要影响就非常成问题。就某个假设而言，共有的变异(shared variance)可能来源于智力或者成就动机。为了在经济受损群体中估计它们对于职业成就的相对影响，我们假定家庭地位依时间顺序应置于智力之前，而这两个因

---

[22] 职业的流动，是用父亲在1929年的职业地位和研究对象在1958年的职业地位交互列表来衡量的，正如霍林斯黑德的七级量表已标明的那样，父亲和儿子在这两个时点的年龄是相似的——大约是38岁。在这个交互表的基础上，我们把所有的样本分成了三类职业流动模式：向上的、稳定的和向下的。对于7位来自于"专业人员"家庭而且在1958年依旧处于这个层次的男性来说，这种分类要做一定的修改。通过对有关工作史资料的详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男性在工作环境中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威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亲。比如有这样一例个案，一位中学教师的儿子上了工程专业的研究生，而且作为一个大航空公司的研究和发展部门的负责人，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还有一例个案，一位就职于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的儿子，成为注册公共会计师，并且还成为一个大银行的支行副行长。6个来自专业人员家庭的男性是向下流动的，而且除了一人以外其他的人都至少比他们父亲的职业地位低两级。

素又置于成就动机之前。对于中产阶级和全部样本中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孩所做回归分析的结果，都表现在表A-23中。

从所有的这些对比来看，对于那些有着经济未受损父母而又获得很高成就的男孩来说，智力显然是极为重要的资源，而智力的影响并不会因阶级出身的不同而有什么差异。对于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男性的命运来说，能力不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它的作用甚至无法超过成就动机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来自劳动阶级的男性尤其明显。即使在分析中包括教育程度，这种差异也不会改变。对于这两个经济受损的群体而言，智力和家庭地位对于其成人地位的基本影响被教育程度削弱了（和图4比较），而成就动机的作用均匀地分为通过高等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智力对于出身低微男性的职业成就没有太大的影响，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途径有限，但是这不能用来解释不同程度的经济受损对于智商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中。即使在出身低微的群体中，因为经济受损而导致教育程度的差异，也不足以解释智力和抱负相对影响的不同。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因素，是明确的职业目标或职业的具体化及其与抱负的关系。本项研究中所衡量的成就动机，表明了一种一般的或不具体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多个领域或者它和多重目标的关系中都有所体现。正如罗森（Rosen）曾经指出的那样，成就综合征（achievement syndrome）包括成就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指导趋势，以及超越他人的普遍愿望。[23] 不过在某些方

---

[23] 参阅B.C.罗森：《成就综合征：社会分层的心理文化维度》，见Atkinson，1958，第500—508页。

面，就孩子在少年时期的成就动机给其成年后所带来的后果而言，如果这种动机又没有明确的特定目标，孩子的抱负又缺乏指导和训练，那么职业的具体化就比其价值观更为重要。如果其他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那么较早地认同一个明确的目标，会强化孩子在青少年时代的抱负和成人后职业成就之间的连续性。

为了验证这种解释，我们依照职业具体化的程度划分了两个群体：弥散的兴趣（diffuse interest），这包括转变类和形成类中的所有个案；集中的或成熟的兴趣。对于每一个群体，我们都在统计上控制家庭地位的情况下，计算成就动机和职业地位（测量方法导致的差异在两个群体中都是相似的）的偏相关。有抱负的男孩比其他年轻人在职业具体化方面略进一步，而且如果他们的职业兴趣相当明确，也可能获得高声望的工作。从职业兴趣"弥散"的群体到职业兴趣"成熟"的群体，成就动机和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加强了（r_s = .26 对 .40）。即使控制经济受损，如果具有成就取向的孩子的职业兴趣在青春期晚期就很明确，那么他们更可能获得较高的地位。[29]

依照同样的逻辑，在职业具体化更为成熟的群体中，智力和职业成就之间最为一致。如果孩子的职业目标不确定，那么智力对于工作前景所应产生的累积效应将无法实现，但是数据不支持这种假设。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是智力和成人地位间的关系。智力的主要影响被教育程度削弱了，受过大学教育

---

[29] 考察职业具体化影响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排除它对于成就动机和职业成就之间关系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超越他人的渴望最能预测其成人地位的群体——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群体上。如果控制职业成熟这个变量，这种相关程度会减少1/4，相关系数 r 从.33下降到.25。如果同时控制智力这个变量，这种相关程度下降到.20，这一数值依旧比经济未受损群体中男性的相关程度强。

的人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差异不可能很大。不论这些男孩的家庭背景有什么不同，只要他们更有能力，就最可能去寻求高等教育，这又增加了他们获得有声望工作的机会。不过这条路并不会因职业的明确性或具体化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在某些个案中，教育进展的延迟和职业的不确定性有关，尽管它不会通过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习给职业成就带来持久的影响。第二个因素，可以从对职业成熟群体的更详尽研究中看出来。明确的职业目标，增强了不太能干的男性获得职业成就的机会，这样智商对于他们成人地位的负面影响就最小化了。

我们现有的关于奥克兰男性的数据，支持关于大萧条经历对于职业成就影响的两个普遍结论。第一，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为我们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和其家庭在30年代经历的经济困难使他们的工作进展遭到挫败提供了线索。但是要了解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职业成功(occupational success)，我们必须了解影响其工作经历的各种因素。大萧条强化了这些因素(职业重心的形成、早期职业生涯的确立、专心致志的努力等等)相对于正规教育的影响。更为普遍的是，这些影响也可能在大萧条的其他出生组中发现(经过某些修正)。对年轻人而言，家庭受损可能会通过其社会化的压力、矛盾性的要求、父母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支持的减少，来阻碍其正规教育的进展。对于年轻的劳动者而言，或者对于那些由于供需不平衡而寻找工作的人而言，经济萧条也使教育更不可能成为获得他们所渴望职业的途径。因此，职业的确立和晋升更多地依赖与其工作经历直接相关的个人因素。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勾画出了奥克兰男性生命历程中的主要事件，从大萧条十年开始，经过二战以及战后短暂的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在恰当的时候，我们比较了奥克兰出生组中这些

事件的时机和全部状况与其他年龄组类似的方面。这种全面的回顾,对于30年代的家庭经济受损对成人地位的长期影响提出了许多问题,构建了进行这种评判的情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影响是无足轻重的,仅仅对于劳动阶级的男性略有负面作用。这种结果甚至比预期的负面影响更需要解释,因为负面的影响与人们想像中的大萧条对成年人生活的影响一致。一般来说,我们试图就大萧条经历对孩子生命历程的破坏性、病原性影响进行考察。为什么家庭经济受损并没有对孩子成人后的职业成就产生更多的负面作用?

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答案。一是大萧条对不同出生组有不同影响。根据奥克兰男性在1930年所处的生命阶段,他们比其他出生组的男性占据着更为有利的位置。他们已经超越了完全依赖父母的关键发展阶段,而且直到30年代末期经济因战争而复苏之时才离开家庭和学校。比较而言,相当大比例的年轻蓝领工人从来没有克服大萧条给他们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特恩斯特罗姆对于波士顿男性的研究提及的那样。某些奥克兰男性的父亲也受到了相似的影响。第二个答案集中于工作经历中与经济受损相关的因素,还有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了由于家庭困难导致的教育障碍的负面作用。经济受损减少了劳动阶级后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它也通过职业发展和才能的积极运用提高了他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地位获得的模式以及它们与大萧条经济状况的关系,揭示了生命历程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得以形成的某种社会情境。当我们追寻1/4世纪之前的经济受损对于奥克兰男性成年后价值观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情境。

男性的价值观:大萧条的遗产?

很少有什么问题比大萧条对于男性价值观——他们的偏好或认可的价值标准——预想的影响能引起更多的思索了。工作的中心地位、不愿意变换工作和最为关注工作的保障性,这些更是常常被提到的那个时代的遗产。如果这些都适用于大萧条中的年轻人,那么这种解释表明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是在经济受损的环境中形成的,而且无论孩子的生命历程如何特殊,这些偏好都保持到成年后,并且表现在他们成人后的行为中。对这种假设更有说服力的陈述是,那些受大萧条哺育的男性们明显地在生活方式上以工作为中心,因为这些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工作和收入太珍贵了。

这是对于下面这种理论的经验支持:价值观是“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个人行为之间的桥梁。”[23] 但是这种看法并不认为,这个位置会自动地把某个时期的结构性影响和接下来那个时期中(尤其是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的相应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价值观是由生活境遇所塑造的,那么社会变迁和个人流动会削弱 T_1 和 T_2 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战后的职业流动更多是大萧条中的艰难经历导致的,而受工作价值观的影响更小。实际上,现有的资料表明,男性对工作的偏好和对孩子抚养的概念,可以更多地用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解释,而非用他们的家庭背景来说明。[24]

㉓ 参阅 M.L.科恩:《社会阶级和亲子关系:一种解释》,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8期(1963),第471页。

㉔ 科恩:《阶级和顺从》(1969)。

大萧条状况和成人价值观之间关联的另外一个弱点,在于忽略了在某种客观事物或者标准形成价值观的过程中个性特征(比如智力)的作用。处于某种境遇中的人有什么样的经历,部分在于他们能给这种境遇带来什么。在有关工作价值观的任何考虑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对于个人能力的了解,影响着我们对于职业要求和职业选择的解释。与我们对于问题境遇的看法一致,我们假定,某种替代品的意义取决于人们感觉到的境遇要求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关系,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对于报酬和代价的预期。

如果从适应性的角度来考察价值观的获取,能力就是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考察角度认为,特定的行为或个人品质在某种境遇中获得了价值,是因为它们适应这种境遇;也就是说,它们能使个人有效地应付其所面对的境遇。从另外一项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那项研究发现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所具有品质方面的差异。研究者指出:"两个社会阶级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所具备的价值观,似乎都最适合父母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对于中产阶级的孩子所拥有的职业,自我引导似乎更为可能,也更为必要。而劳动阶级的孩子所拥有的职业,更适合于服从规则和遵从他人的指导,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②]

行为的适应领域建立在有关个人满意度的假设基础上。和这方面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地位方面不断减少的变化对于有关客观事物价值观的影响。社会比较和强化理论(social comparison and reinforcement theories)提出,当剥夺某人对某种客观事

② L.I.贝尔林、M.L.科恩:《社会阶级、职业和父母的价值观:一项跨国研究》,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1期(1966),第466页。

物的拥有权时，它对有关这种事物价值观的形成就会有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份报酬在激发积极性方面的重要性，只有对那些在这方面受损的人才最为明显。当一个人的许多希望都受挫时，适应性就集中于许多基本需求的满足，比如住所、食物和稳定的家庭等等。[23] 在对大萧条文化遗产最为普遍的解释中，常见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有关经济受损主题的论述，认为大萧条哺育出来的男性，因他们对于金钱、稳定的工作、舒适的家庭和工作保障性的重视而显得与众不同，这是因为在他们还是孩子的30年代，在这些方面曾经失去过，或者说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有时候，适应性理论也可能导致相似的预测，但是它引导我们注意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境遇的改变对于活动适应性价值观的影响。那种使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行为获得适应性价值观的境遇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价值观持续的时间也越长。因此，对于那些发现自己现在的境遇和他们在经济受损家庭中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的人而言，稳定的工作和保障性就变得最有吸引力。社会持续性当然部分地是童年形成的价值观所导致行为的结果。职业的价值观，似乎对于高等教育中的学科选择也有着这种影响。

我们估计对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子们而言，工作与休闲有着特殊的含义。大萧条中的适应性，使孩子开始承担家庭经济的责任，而这又巩固了作为独立、保障和身份的一种来源的就业价值观（value of employment）。通过它们和家庭生活天然的关系，父亲的失业使男孩们敏锐地感觉到一个稳定的家庭对于自

---

[23] 有关受损作为动机强化因素的经典研究，参阅格维尔茨、贝尔：《作为有关动机社会强化因素的受损和充裕》（1958）。对于史为基本需求的满足的适应性机制的假设性调整，是根据马斯洛的理论立场："如果一个人的两种基本需求都被剥夺了，他就会需要这两种需求中更为基本的。"《动机和人格》（1954），第99页。对这种形式的适应最为清晰的证明，参阅约蒂达等：《马林塔尔》（1971）。

己情感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事业上的成功依赖于智力水平,越能干的人越喜欢自己的工作角色,宁愿冒风险去获得更多的报酬,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工作的保障性。另一方面,不太能干却成功了的男性,最善于吸取大萧条中有关工作保障性的教训。

正如通常的解释一样,工作和休闲的合法性因大萧条中的各种条件而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失业增加了用于业余爱好的时间时,它也减少了因为失业而休闲或娱乐的合法或文化上的认同。就像"为了吃饭人们必须工作"一样,根据一种匮乏文化(scarcity culture)规则,他们也必须赢得娱乐的权利。顺着这一思路,里斯曼(Riesman)发现,许多美国人"在娱乐中或多或少都无意识地感到一些不自在,因为根据文化的定义,娱乐的权利属于工作的人们。"[29] 这种不自在是否是大萧条所哺育的人们所具备的最明显特征?

如果我们询问人们工作、家庭生活和休闲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回答中,这三者的相对重要性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过从一个人的选择中以及对于三者重要性的优先顺序中,我们能看出其价值观的实质。这种有关重要性的问题并不是询问一个人是否看重他的工作,而是询问在他的心目中,工作是否比家庭生活和休闲有着更高的价值。

为了获得这种偏好的层次,我们要求样本中的人们(1964年的跟踪调查对象)对于工作、家庭、休闲和社区(市民的和社会的角色)四个领域选出他们的第一偏好和第二偏好,这种选择在

---

[29] 里斯曼:《孤独的人群》(1950),第345页。就大萧条对于许多曾经历这段历史时期的人对休闲意义的看法的影响来说,还有许多问题回答不了。韦克特总结道:"大萧条对于美国生活任何一个方面的影响,都没有它对于休闲的影响大。"D.韦克特:《大萧条时代》(1948;芝加哥,1971),第219页。经济富裕和休闲时间之间的关系,林德在他的《被折磨着的休闲阶级》(1970)中曾探究过。

三个层面上进行：他们最喜欢的活动，他们更愿意花时间的活动，最能够给予他们成就感的活动。第一、第二偏好和没有偏好的得分依次为2、1和0。因为这三个选项是高度相关的（平均 r = .52），所以把每一项选择的得分相加，作为衡量活动偏好的单一指标，取值从0到6。

我们在这些人工作的主要阶段（prime phase）询问他们这些问题，他们的偏好也反映了这一事实。工作的分值高于家庭活动（$\overline{X}_s$ = 3.8对2.5），而这两种偏好和休闲、社区角色有着相当距离（$\overline{X}_s$ = 1.8对0.7）。尽管大多数男性至少参加了一种志愿者协会，可是这些活动明显不如生活中的其他领域那么突出。

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而言，这些活动领域的价值不尽相同，但是与我们的预测不完全一样，工作是主要的例外。无论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并不比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更认同于其工作，而且这两个群体的人都认为工作的价值高于家庭生活、休闲或社区角色。对于男性而言，决定工作重要性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或家庭经济受损状况，而在于他的工作是否相对成功。和不太成功的男性相比，向上流动的和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男性，总是更加看重他们的职业角色，家庭背景的不同不会使这种偏好出现什么差异。[9]

尽管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对于工作角色的兴趣并不突出，但是正如人们想像的那样，他们更不喜欢休闲活动。和来自相对富裕家庭的男性相比，他们更以家庭为中心（表7）。在这两个方面，似乎都与经济受损家庭父亲的适应性有某种相似，这

---

⑨ 在1958年，孩子成人后所属的社会阶级和工作价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9，它和职业流动的相关度是相似的。

种相似性对我们有启发作用。尽管每一个家庭都有紧张和冲突，我们还是认为对于大萧条中失去工作和收入的男性而言，大多数家庭都成了处于充满敌意世界中的天堂或避难所。[⑥] 这是他们的私人领域，是一个能让他们逃避所面对社会窘境的地方。这些经验和大萧条哺育的男性价值观之间的代际连续，部分在于他们对家庭生活偏好的意义，这是我们很快就要详尽地谈到的和具体的工作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目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婚姻能提供人际间的互惠互利（理解、陪伴等），或者说家庭和孩子能够提供保障和满意，所以家庭可能是很重要的。家庭在社交和情感上给人们提供的保障，和家庭作为"避难所"的意象是一致的。

表 7 奥克兰男性的活动偏好（1964）

（按照经济受损和家庭出身划分，以平均分数表示）

按照阶级出身划分经济受损	工作	家庭	休闲	社区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ND)(N=19)	3.9	1.8	2.1	1.0
经济受损(D)(N=16)	4.0	3.2	1.5	0.6
		ND<D*		
全部样本				
经济未受损(ND)(N=22)	3.7	1.9	2.2	1.0

⑥ 家庭作为"情感的天堂"，是由 T. 帕森斯和 R. 福克斯在《疾病、治疗和现代美国都市家庭》(1952)中发展成为一种概念的。

经济受损(D)(N=24)	3.7	3.1	1.5	0.5
		ND<D*		

* <.05(双尾t检验)

就像我们注意到的对于工作角色的偏好那样,把成人价值观和经济困窘联系起来的任何尝试,最终都必须把孩子的能力和成人地位考虑在内。甚至在以工作为取向的地位较高的群体中,这种偏好也只是在更为能干的人中最为普遍。更为重要的是,成人地位的差异界定了具体说明大萧条经历适当性(appropriateness of Depression experience)的情境。比如,即使经济上的失败增加了家庭的价值,我们也不能认为这种价值观是来自经济受损家庭成功男性的特征。他们成年时的境遇与由经济受损和失业形成的童年经历完全不同,尽管这的确适用于地位低微且向下流动男性的生活境遇,尤其是那些在经济受损家庭中长大的男性。因此,经济受损的男性以家庭为中心的反应,只有在面临和他们30年代最为相似的境遇下最为强烈。与强化原则(reinforcement principles)一致,反应的稳定性取决于环境的稳定性。

在对样本中的男性做一系列回归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孩子们对工作、家庭和休闲的偏好首先与选中的前置因素(成人所处的社会阶级、青少年时的智商、家庭受损和阶级出身)有关,然后才与由向上流动和没有流动定义的两种职业情境发生联系。因为男性很少选择社区偏好,所以对它的测量不包括在内。经济受损和成人地位或智力无关,因此在分析中,它对于三种成人价值观的主要影响不会发生改变(表A-24)。以工作为中心的男性,在大萧条中其家庭可能是经济困窘的也可能是经济状况稳

定的，他们也没有因为青少年时期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而显得与众不同。总的来说，他们是样本中更有能力和更成功的人，尽管对工作角色感兴趣的男性并不局限于这一类人。经济困窘显然是导致家庭偏好的最重要因素，而具有家庭偏好的男性相对来说智力和社会地位较低。在生命历程中，智力的影响当然部分是通过职业成就来实现的。有休闲取向的人很少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尽管他们属于样本中最不能干的和职业上最不成功的群体。

职业背景会使这些结果有所不同吗？相对于职业上没有流动的男性（N＝20）而言，流动的男性（N＝26）在工作偏好上的分数较高，在家庭和休闲的兴趣上分数较低。两个群体中每一个指标的分数差异，一般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因这种相似性去比较每个群体中前置变量的相对影响。就工作偏好而言，我们发现具体情境并不能改变上述结果。在每一种流动类型中，以工作为重心和30年代的家庭受损并无关联。职业上的机会和能力是起作用的因素。

职业情境（occupational context）的确改变了经济受损与家庭和休闲偏好的关系，而且改变的程度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预测对家庭的偏好（表A－24），但是即使是这个因素，也只是在未流动群体中与这种价值观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β值为.63，而向上流动的群体的β值为.16）。在这两个群体中，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智力，都不能改变它们对于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对休闲活动的冷淡遵循着相似的模式（β系数为－.77，而向上流动群体的β值为－.09）。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出身低微的男性对休闲活动所持的价值观，这种影响直接起着负面作用。正如表A－24表明的那样，那些在成年时期智商和社会地位最低的男性最可能喜

欢休闲活动，对于未流动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些人在经济受损家庭中长大，他们最不可能喜欢休闲活动。如果我们假定，大萧条中的艰难使休闲最不可能被这些孩子所接受或喜欢，而且增强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性，那么，只有那些在成年后有类似生活境遇的人，才能发现这种价值观的连续性。

从社会作用（social implication）的角度来看颇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受损对于那些事业极为成功的人的价值观没什么影响。对于他们的职业成就，对于他们如何获得生活中现有的位置，以及这种位置为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所提供的某种洞察力而言，家庭的艰辛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在对工作的认同与对休闲的厌恶方面，这些男性与人们关于匮乏文化中男性特征的意象极为相似。然而对于向上流动的男性而言，这些价值取向和经济困窘没有任何明显的关联。

对于工作、家庭或休闲活动的偏好，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活动的性质，也不能告诉我们其最为人们所欣赏或讨厌的特征。一种有报酬的活动或角色，通常能给人们提供内在的满足感。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结果，而不仅仅是通向结果的一种简单手段。C.怀特·米尔斯列出了可用来测量工匠们内在满足感的标准：关注产品的质量，允许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工作环境，规划活动的自由，一种如此令人满意以至于模糊了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活动（C. Wright Mills，1951，第220—238页）。这些条件在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中最为普及，而从事这类工作的男性比蓝领工人更加重视工作的内在特征（工作是否和自己的兴趣一致等）。蓝领工人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那些很少能提供诸如金钱、休闲或者工作保障之类外在利益的现实。对于蓝领工人而言，家庭

的重要性部分在于疏远工作的意义。[②] 如果工作有意思，它可能就包括娱乐的因素——"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活动"。如果工作不具备这种价值，那么工作以外的活动就变得重要了。但是那些疏远工作的男性所喜欢家庭活动的种类可能存在着差异，而这些与他们在大萧条中学到的东西有关。这种东西是家庭的保障和舒适感吗？还是拥有孩子的机会（对老年人而言也是一种保障的源泉）？抑或是使这些男性能够获得妻子和孩子的陪伴和理解？为了更详细地了解男性在家庭和工作中所注重的东西，我们分析了对 1958 年和 1964 年跟踪调查中曾询问过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

工作的意义

这些男孩赋予工作角色的意义是由估价性的问题（"你对你工作的如下方面感觉如何？"）来衡量的，也是由必须在工作保障性和有风险但也可能获得更多报酬之间做出的选择来衡量的（1958 年访谈）。根据对于工作各个方面的态度（1964 年调查），我们在相关分析中组成了三个一般性的类群（cluster）：外在的——对于收入、工作计划和自由时间的满意程度；流动和声望的——对于晋升机会、接受他人监督和工作声望的满意程度；内在的——对工作和自己兴趣的一致性、技术的运用和发展自己

② 这并不是说婚后生活的质量不会影响对家庭活动的价值观。实际上，那些提及有关经济问题、孩子抚养、朋友和其他事务方面产生婚姻不和的男性，以及那些发现婚姻没有带给自己一点快乐的男性，最不可能看重家庭活动（平均 $r = -.28$）。不过，家庭不和不能解释 30 年代的受损状况和家庭偏好之间的关系。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同样可能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快乐的。

观点的自由的满意程度。[33]

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类似，经济从匮乏转向充裕，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工作的外在益处转向内在优点。在面临大量劳动力需求和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受过教育的工人可以讨价还价，而不仅仅把工作当做养家糊口的手段。在富裕社会中，是"工作紧急召唤工人"；而在匮乏的世界中，是工人寻求"任何卑贱的苦差"。[34] 如果对工作不满的任何模式都植根于大萧条的经历中，那么它可能涉及的是这些工作的外在益处，这些对于30年代的工人而言是极其难以获得的。

实际上，30年代的经济受损使男性们对于自己工作外在特征的满意度差异极大。当控制这些男性地位获得、智力和家庭地位三个变量时，经济受损与对工作的不满相关（$r = -.23$）。这些地位特征没有一个能像家庭困苦那样，能对于这些男孩对工作的不满做出预测。不过，经济受损的影响的确因职业经历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在工作中越得不到回报，经济受损和不满之间的关系就越为密切。这种差异同我们有关家庭偏好和休闲偏好的发现相似，可以从流动和未流动男性的比较中看出来。从流动的群体到未流动的群体，对工作的否定性感情和经济受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r 的值从 $-.11$ 到 $-.39$。在控制智力和家庭地位后，这种差异也没有缩小。在这些发现和以前的发现

---

[33] 对于工作每个方面的五类回答是按照下面的方式评分，然后累加形成一个指标："非常喜欢它"为3分，"有些喜欢它"为2分，"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为1分，"有些讨厌它"和"非常讨厌它"为0分。因为每一个类群都包括三个题目，所以分数的范围是从0分到9分。外在的、流动和声望的以及内在的指标平均分数分别为6.2分、6.4分和5.2分。

[34] 波特：《富裕之众》（1954），第205页。引言选自S. N. 帕滕：《文明的新基础》（纽约，1907），第87—88页。

中，成人生活中的经济受损似乎引起了这种反应，并与在社会性习得（social learning）方面与过去的经济受损联系在一起。

30年代停滞性经济造成的问题更多地与工作机会，而不是与工作的内在特征（比如工作和兴趣的和谐性）有关，但是这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身上表现并不是特别突出。对于工作的流动前景和声望的满意度与向上流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工作地位较高的男性，最可能欣赏他们工作的内在品质。人们可能会认为，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又流动的男性，会对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声望尤其感到满意，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看法。经济困窘的背景既不会影响流动者也不会影响不流动者对于工作内在特征的感情。

在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早期，工作的保障性还不是这些男性关注的焦点。如果说这不算一个和平时期的话，这也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年代，出身卑微的奥克兰男性大部分都进入了白领或专业人员阶层。当我们让被访者列出对他们的满意度有着最重要影响的工作的三个方面时，只有6个人提到工作的保障性。工作和兴趣的一致性最为突出（66%），其次是收入的多少（53%），技术和能力的运用（32%），自由地发展其想法和运用想像力（30%）。这种对工作优先性的排序并不会因家庭背景或经济受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工作的内在特征（比如工作与兴趣的和谐性）最为经常地被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但对经济生存方面考虑较少的男性提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工作计划、工作压力、对于家庭的便利和休闲次数的支持少于给予工作保障性的支持。

为了把作为一种潜在的选择工作的保障性放在其他选择之中，我们要求被访者必须在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与更不确定但可能获得更多报酬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一份工作常常会涉及

这方面的考虑，以便衡量它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报酬。任何选择都包含着比自己的当前工作更不稳定的工作，因此必须使它所带来的挑战和潜在的收益之间达到平衡。这种平衡及其意义，部分依赖于工人的年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个人能力和价值观。工作更换的风险，尤其是更换雇主的风险，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对于那些缺乏一技之长的人，这种风险更大。

我们要求被访的男性在下面两者中做出选择：收入合理且有保障性的工作，或者有风险但有可能获得更多报酬的新工作。尽管当时年龄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平均年龄为 38 岁），但还是有差不多一半的男性宁愿选择有保障的工作，而不愿选择一份更不稳定但可能有更多收入的工作。对变迁的抵制通过关注安全保障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并且在那些过去遭遇过有限选择和失业的不太能干的男性中表现最明显。如表 A－25 所示，经济受损背景和成人后社会地位的低微，都与研究对象对于工作保障性的偏好有关，尽管这两种因素对于这种价值观的预测作用都不强。在这种选择中，能力的缺乏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那些没能超越其父亲社会地位的男性中，由于在大萧条中碰上经济受损，他们的保障意识（security consciousness）增长得最为迅速。这个结果和有关价值观的其他发现相似，但是看重工作保障性又曾流动的群体规模太小了，以至于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

作为对工作选择的反应，具有保障性取向的男性，常常在大萧条的记忆情境中来解释他们现在的境遇，这反过来又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稳定的和有保障的工作。在这些男性中，有一个印刷商，他的父亲在 3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工作，他宣称他是由于母亲的鼓励才接受学徒训练的，因为母亲希望他有一份“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他现在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指出

的那样,是"一种只要你能好好干,就几乎不会失业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报酬不如其他许多工作。不过你不能干得太糟了。比如,木匠每年几乎都有三个月没活干,卡车司机常常罢工。"因为工作稳定的重要性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要求自己"要赶在别人之前完成这些工作",享受"当今任何工作都能提供的"保障性。有一个会计用类似的方式反映了他父亲的损失:"金钱、工作和一切",他还承认"我现在完全变得小心翼翼,而不是雄心勃勃。"大学毕业后不久,他进入了一家大公司的人事部门,这份工作很少有晋升的机会但却有保障性。公司如"家"的氛围让他感觉很舒服,他没有离开的欲望。"如果有足够的诱惑力,我可以冒险。但是理智地看,稳定的工作是最好的。"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有迹象表明这些男性对于工作保障性的兴趣是来源于过去的困窘,这导致人们选择相对没有什么风险、压力和挑战性的工作,而这种由此产生的工作境遇又反过来增强了这种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一种循环性强化关系(reinforcing relationship)的例子,一种在偏好的和真实的活动之间寻求自我满足的说辞。如果在职业问题上越是强调工作的保障性,并且拒绝做出选择,那么他们越能融入以工作的保障性为关注焦点的体系之中。

从家庭经济中的生产性角色到职业认同和职业生涯,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经历使他们把工作作为生活方式中的核心因素,并且超越了其他领域的活动。我们发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赋予工作的价值高于赋予家庭生活、休闲或社区角色的价值,但是有着相对良好背景的男性也是如此。这些男性的基本差异不在于价值观,而在于这些价值观的意义。这也基本上表现在那些没能超越其父亲社会地位的儿子们中。对于这些人来说,经历受损状况的男性与在受损经历中他们的父亲最为相似,

他们评价自己的工作是以大萧条中非常普遍的问题为基础。和经济未受损的男性相比较，他们一般更重视工作的保障性，而不看重冒险却有机会获得更多报酬的工作，也不会因不能得到足够利益而对工作横加批评。

从扩张经济及其新领域的兴盛时代来看，美国人的成功标准——一个男人是否能够超越自己父亲的地位——需要没有流动的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就像在30年代丢失了工作和收入的许多工人一样，和更加成功的人相比较，50年代其职业生涯没有流动的奥克兰男性感觉自己成了生活环境的牺牲品，感到生活没有意义（这方面更多的内容，参阅Elder，1969b）。就如在大萧条中曾失业的父辈一样，这些男性成年后也极有可能沉溺于酒精之中。尽管这些职业上未流动的男性在绝对受损方面远不如其父辈，但是在一个富裕的时代，相对受损是挫折感的潜在来源。

家庭、孩子和婚姻：家庭生活中有价值的方面

对于男性认为家庭生活中什么最有价值的了解，使我们能更加贴近地理解家庭取向和大萧条经历之间的关系。婚姻本身有内在的价值，比如最基本关系中的陪伴和互相了解；还有通过婚姻获得的外在利益，比如人们结婚才有机会生育和抚养孩子，才能有一个舒适的家，有给自己提供保障的地方。如果说家庭生活中这些方面的缺乏，反而会更增加其价值，那么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子们来说，家庭、孩子和婚姻就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家庭在大萧条时作为避难所的感觉，在一个富裕时代似乎陌生而又过时，但是对在谋生过程中遇到麻烦的男性可能就不这么看。

为了评估家庭、孩子和婚姻的相对重要性，我们要求男性

(1964年调查)把婚姻的六个方面从最有价值到最无价值进行排序。第一和第二选择的比例如表8所示。其他关于婚姻的研究中,发现和配偶的关系始终被排在第一位(参见 Blood and Wolfe,1960),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了这种优先性。对于大多数男性而言,陪伴和相互理解都是婚姻中有价值的方面,接下去的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以及一个家庭所能带来的好处。对于大萧条年龄组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少的人强调婚姻带来的物质方面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利益。

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最突出的价值观是他们对于孩子的取向,而不是家庭的保障性或婚姻带来的人际交往的好处,这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以婚姻关系为中心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5] 除了对两个群体来说都有着重要价值的相互理解之外,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认为伴侣关系和孩子是婚姻中有价值的东西,但对于来自经济未受损的男性而言这些相对都不重要。婚姻幸福(martial happiness)是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个潜在因素。当婚姻无法激发或提供情感上的满足时,孩子就可能成为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但是并不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根据样本中男性的回答,是现在的社会地位而不是过去的经济受损,导致了婚姻幸福的差异。社会地位越高,从婚姻中获得的满足就越多。

---

35 "家庭的保障性和舒适性"尽管在这些男性的选择中地位不突出,但是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中有更大的比例把它们放在第五位或第六位(比例为53%,而经济受损群体为33%)。比较而言,"生活水准"更常被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放在最后一位(81%对47%)。

表 8　男性认为婚姻中最有价值的方面

（按照经济受损和家庭出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婚姻诸方面	中产阶级出身		总样本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总数
	N=16	N=13	N=19	N=21	N=40
家庭					
生活水准——住房类别、服装等	6	8	5	10	8
家庭的舒适性和保障性	6	16	16	14	15
孩子					
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	13	46	10	48	30
和妻子的关系					
性关系	30	15	30	19	26
做事时的陪伴	71	46	70	50	59
相互了解对方的问题和感情	70	69	70	64	67

注：婚姻方面的这些数据，是在布拉德(Blood)和沃尔夫(Wolfe)对底特律的婚姻研究中有关类别描述的基础上经过修正和扩充而来：“一般来看，在下面卡片上的五件事中，你认为哪一件是过去婚姻中最有价值的？”对于妻子而言，包括生育和抚养孩子、生活标准、丈夫的理解、丈夫对爱的表达和伴侣关系。参阅布拉德和沃尔夫：《丈夫和妻子》（格兰科，1960），第283页。

我们要求回答者按照重要性对于六个方面进行排序，每个百分比代表每组中把该项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的人数。

那些不能超越其父亲社会地位的男性的婚姻价值观，和那些与家庭受损有关的价值观相似，尤其是在孩子的重要性方面。这同样也适用于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父母的儿子，但是在两个流动群体中，过去的经济受损强化了这种偏好。甚至对向上流动群体中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的男性而言，有1/3把孩子当做婚姻中最重要的方面，而父母富裕的男性只有8%这样认为，他们更为强调婚姻中的伴侣关系（66%对55%）。经济受损的经历对于价值观的累积效应，从孩子在三个群体的受欢迎程度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未受损却有流动经历的、经济受损并有流动经历的、经济受损却没有流动经历的孩子，在这三个群体中受欢迎的比例依次为8%、35%和70%。因此，如果儿童时代和成年时期经济受损的经历不断累积，孩子就变成了婚姻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职业报酬或成就与婚姻中孩子的价值负相关，这种关联与下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当婚姻关系和工作都没有回报的时候，孩子就变得更为重要。如果我们顺着这种解释，那么对于那些偏好家庭生活超过工作角色的男性而言，孩子将成为婚姻中的中心价值（central value），而且数据确实表现出了这种关系。就全部样本而言，这两种偏好是中度相关（$r = .31$）。尽管家庭价值观受到宗教偏好的影响，或更具体地说受到天主教的影响，但这个因素也无法解释成人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受损对于孩子在婚姻中优先地位的影响。在分析中即使剔除全部的天主教徒，这种结果也不会改变。教养院中孩子的数目，也不会使经济受损和婚姻中孩子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出现可以感觉到的差异。

如果奥克兰男性是因自己在大萧条中的经历而学会看重孩子，那么即使他们成年后并没有遇到父母经历过的经济窘迫，大多数人也会有这种偏好。而这些认为孩子是婚姻中最有价值方

面的人，也可能会有很多的孩子。通过1964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种价值观和孩子数目有着中度相关($r=.31$)，在向上流动的群体中这种相关程度有所加强。在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子们的家庭规模和经济受损之间的关联中，实现偏好的能力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经济未受损的群体平均有2.3个孩子，经济受损的群体平均有3.4个孩子。在劳动阶级出身的男性中，家庭规模并没因大萧条时经济受损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他们的家庭平均有2.7个孩子。

这种生育力方面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伊斯特林(Easterlin)关于战后出生组生育力的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 of cohort fertility)。[3] 这个理论关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变量是生命历程中的相对收入和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偏好(consumer preference for material goods)。新结婚的出生组生育力在不断增强的原因在于，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物质产品相对较低的消费嗜好，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隐性收入。伊斯特林把这种差异作为解释战后"婴儿潮"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出生组的消费嗜好都是在大萧条的30年代形成的，但在一个充分就业和富裕的时代进入家庭角色。比较而言，40年代的出生组是在一个更加富裕的情境中形成消费偏好的，但是在抚育孩子时更少受益于经济的繁荣，因为消费者需求的增长比相对经济状况的好转更为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按年龄分组的生育力应该是下降的。

除了效用模式的其他特征外，它是以哪种方式对奥克兰男性的生育力做出回应的呢？与其他阶级中经济受损群体相比

[3] 有关伊斯特林的效用理论的讨论和延伸，参见霍安恩：《生育力社会学》。我非常感谢R.希尔提出了伊斯特林理论对于奥克兰数据的某些含义。

较，从经济角度而言，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子从大萧条到中年时获取了相对最大量的财富，而且，就他们平均养育的孩子数目来看，他们在生育力方面也很突出。我们发现无论是哪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绝对收入(1933)差异都很小，然而与那些有着相对富裕家境的中产阶级男性相比，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子们在职业生活中一般都获得了更高地位。如果我们假设廉价的物质嗜好是在30年代经济受损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效用模式对来自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家庭男性有着较强的生育力，则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在这种解释中缺乏一个重要因素的信息——妻子的经济受损背景和她们的消费偏好。要对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生育力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些情况必须考虑在内。

相对收入和消费偏好，显然也无法让我们了解，对于奥克兰男性来说，孩子的重要性从何而来，即使这种偏好和生育力是中度相关的。正如效用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来说，孩子更为重要。但是和不太成功的人相比，那些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或向上流动的人，并不认为孩子是更重要的。职业地位的提升对生育力的影响很小(就孩子的平均数目而言，向上流动的群体稍多于没有流动的群体)，但它的确降低了孩子在婚姻中的相对重要性。与期望中的家庭规模不同，经济窘迫并没有限制他们看重婚姻中的孩子，至少在奥克兰的样本中是这样。实际上，这种价值观和他们在孩童时代和成年时期的相对受损状况有关。这种价值观，是否是孩子们在为家庭福利做出有价值贡献之时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于那些从大萧条到中年时期都对经济保障的失效印象深刻的男性们来说，孩子们(无论一个、两个或更多)可能被当做最持久的和回报

最高的投资。[35]

对于来自受损家庭的儿子们来说，家庭生活和孩子的价值至少和希望满足孩童时代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相一致。如果一些处于困境的家庭“齐心协力”，并且为年轻人提供一种可以模仿的感情稳定和有效的模式，那么大萧条时代一般都更强调没有的或稀缺的品质，比如安宁、保障、摆脱匮乏和恐惧。曾经匮乏的经历和财富成了大萧条后代所集中关注的东西，这可以从一个心理医生对战后那代年轻的成年人（young adult）的观察中看出来：

> 我们曾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在一次伟大的战争中，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因为要实施集体的意志，也因为短暂过去带来的心理崩溃，我们认为所有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需要补充，都需要休息。我们将获得我们父母生活中不曾获得的宁静和安祥。男性将在稳定的职业生涯中变得无忧无虑，女性将球于舒适的家中，他们将共同培养完美的孩子。时间将会停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称呼它——一个秘密、一个幻像、一个神话——它是某种理想主义，常常不用说出来，但人们却能因某种原因而深切地感受到，这就是时代精神。[36]

[35] 关于大家庭偏好保障性动机的讨论，可参见L.霍夫曼、F.怀亚特：《社会变迁和拥有更大家庭的动机：一些理论思考》，载《梅里尔—帕尔默季刊》，第6期(1960)，第235—244页。

[36] J.阿德尔森：《妇女的解放是一种短命的时尚吗?》，载《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3月19日。阿德尔森的结论——妇女解放是暂时的失常——至少对他那代人有关家庭生活和妇女角色的经验来说是可信的。

但是大萧条经历的确不只是简单地增强了人们在家庭生活、孩子以及其他一切方面获得更多回报的欲望，它还提供了在面临经济困境时，家庭作为适应性资源的一个例子，这种资源因女性和孩子与主寻地位的角色而显得与众不同。

婚姻中的价值观和影响力

对于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子们而言，孩子的重要性与他们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相一致，但是能否据此期望婚姻关系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代际连续（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呢？也就是说，出现从经济受损家庭中母亲占支配地位到妻子在家庭中颇具影响力的情况？[39] 假定有关婚姻角色的最初概念，是通过与父母的互动和对父母的观察形成的，那么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们就应该比其他男性更为习惯和接受妻子在家庭决策方面的影响力。当然，有人是男性在反映大萧条中父母的角色时，对占支配地位的母亲持批评态度，但是这种批评更多地集中于磨难的复杂性，而不是针对母亲权力或领导权的合法性。

限制代际间连续性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样本中父亲和儿子生活境遇之间变化的程度。在家庭受损境遇中形成的角色模式，对于孩子的经济社会表现来说是不匹配的模式：如果一个人"进入了模式形成时的那种境遇"，自我—他人的关系才最有可能保存下去。[40] 相应地，对于那些没能超越其父亲社会地

---

[39] 有关权威模式的代际传递，可以参阅英格索尔：《对家庭权威模式传递的研究》（1948）；还有莱斯利、约翰逊：《已经变换的对母亲角色的感觉》（1963）。在两代人之间，缺乏有关父母角色的重要传承，布朗森等人在《两代之间的权威模式和亲密感情》（1959）中曾提及这一点

[40] L. S. 科特雷尔：《人际互动和自我发展》，见 Goslin，1969，第 564 页。

位的男性，或者那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曾遇到经济受损的男性来说，妻子影响力的持续性应该是最为明显的。

在衡量婚姻中的影响力时，我们运用了 1964 年调查中曾询问过的一系列问题。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挑出了决策的两个领域：经济问题领域，这个领域中丈夫最可能做最后决策；孩子的抚育，这是属于妻子的传统领域。如果仅仅依靠丈夫的回答，我们预计会有倾向男性影响力的偏差。愿意承认妻子的影响力，可能有赖于他们意识到这种家庭模式是他们所想拥有的。[⑩]那些在这方面显得比较勉强的，可能是那些把男子汉气概等同于家庭领导者的男人，而且这种回答本身也反映了可能植根于大萧条时期稳定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态度。

在经济问题的决策上，的确出现了一些这类偏差：没有一位男性回答说妻子在怎样花钱或者挑选与购买一辆小汽车上更有影响力。40%的男性认为在这类问题上是共同决策，其余的人认为自己有更大的权力。这种模式在抚育孩子的问题上反了过来，大多数男性认为他们的妻子更有影响力，63%的人宣称他们的妻子在对"孩子怎样管束"、什么时候"孩子们能约会"和宗教信仰的培养方面具有更多的最后决策权。这三个问题都共同决定的模式只有 23%的男性认可，剩下的人认为自己承担的角色拥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决策的传统结构，可能和每一个案中妻子的感觉并不一致。妻子不能在经济事务上起主导作用，从而无法支持类似的婚姻权力在代际间延续的命题。然而这依旧是可能的：和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儿子比较，经济受损父母的儿

⑩ 有关丈夫和妻子报告的分歧的准确原因，在研究文献中依旧不清楚。参阅 D. H. 格兰博依斯、R. P. 威利特：《建立在丈夫和妻子数据基础上的家庭角色衡量的等价性》，载《婚姻与家庭杂志》，第 32 期(1970)，第 68—72 页。

子们更倾向于承认，在家庭决策中他们和妻子的关系至少是平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地位获得上两个群体相对类似，因此直接影响婚姻权力平衡的各种条件也是相似的。

由于两个决策领域中的题目是相关的，因此分数将被累加起来形成两个指标。每一项回答都是从丈夫经常做决定（1分）到妻子经常做决定（5分），因此每一项指标的分数越高，就表明妻子的影响力越大。[16] 通过对关联的定序测量（Kendall's tau_c），我们首先把全部样本中的经济受损、1929年的家庭地位和成人后的社会阶级与相关指标联系起来；然后再把指标和向上流动及不流动群体中的家庭受损建立关联。

与大萧条时的家庭关系相一致，妻子在经济事务上的影响力和丈夫所获致的阶级地位呈负相关（$tau_c = -.16$），但是丈夫在儿童时代的经济富裕对此也有着令人惊奇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考虑到二者之间已经有25年间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控制家庭地位和成人的阶级地位，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依旧比更为富裕父母的后代倾向于回答共同决策的分权模式（$tau_c = .24$）。这种关系是否会因为男性成年后足以担当养家糊口的责任而有所改变？如果妇女影响力的适宜度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在童年时代经历的不足有关，那么这种关联应在那些相对于父亲的职业地位来说自己的工作毫无长进的男性中表现最为明显。

数据确实显示出这种差异。和向上流动的群体相比，在没

---

[16] 另外三种回答类别是"丈夫比妻子决定得更多"、"一样"和"妻子比丈夫决定得更多"。尽管有关经济权力的分值是从2分到10分，应答者也仅仅分布在四类中，分数从3分到6分。有关对孩子抚育问题的影响力的分值是从3分到15分，而所有的个案都是处于7分到13分之间。经济权力的平均分数是5.1分，有关孩子抚育的平均分数是10.[illegible]分。

有流动的群体中，有关经济事务的共同决策分权模式更为普遍，这种模式与这些人家庭困苦的背景关系更为密切（tau_c = .35 对 .15）。对于没有流动的群体而言，对30年代母亲占支配地位的感觉，代表了他们经济受损的背景和报告的婚姻模式之间的密切关联。那些描述母亲是家庭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也倾向于报告在他们自己的婚姻中，在经济事务的决策方面也是分权模式（tau_c = .25）。在有关孩子抚育决策权的平衡上，也有相似的结果。

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无法把婚姻作为一种关系公正地加以评判，而仅仅是间接地通过数据，考虑妻子的感觉、情感和活动。工作和家庭的意义、婚姻满意度和权力都是从男性的立场去评判的；来自妻子的信息，对于就业领域和家庭决策的影响力方面是最有价值的。妇女可能在经济需要的情况下找工作，而就业地位又会增加她们特别是在经济事务上的影响力。这种顺序最适用于没有流动的男性的家庭境遇，但是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妻子的就业会改变我们所获得的结果。

另外我们无法知道，在与强调婚姻、家庭生活和工作不同方面的女性结婚后，男性的价值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可以想像有一些妻子是30年代经济受损父母的孩子，而另外一些可能受到相对富裕的家庭环境的保护，而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艰难和痛苦。择偶方面的社会同类婚原则，即"人总是和类似于自己的人结婚"，表明通过婚姻导致的价值观改变，更可能是采取汇合或者强化的形式，而不是其内涵的改变。样本中能证明同类婚的惟一直接证据，就是教育程度的相似性，但是根据其他研究我们能假定，奥克兰男性娶的是许多背景特征和价值观都和他们相似的女性。有关大萧条对家庭角色和价值观影响的更完整画面，将会在我们随后对奥克兰妇女的分析中展现出来，

但是那时我们会更多地依赖单一的视角——她们的观点，与她们丈夫的观点相比可能相似也可能相差很大。

小　　结

奥克兰男孩们离开中学的时间（1939），作为决定他们生活机会和成就的关键因素而显得突出。与以前的年份相比，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工作更加多种多样，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也更为有利。工作、婚姻生活和教育由于被征召服役而中断了，但是这种由于国家利益而导致的中断，带来的是成熟、丰富的经验和获得津贴的教育之类的好处。无论是否由于战争年代的收益，或是由于高等教育津贴或军队中的专门培训，或是由于妻子的支持，很显然，30年代的家庭困苦对于研究对象的教育前景几乎没有什么全面的影响。只是在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的确从相反的方向影响到这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也有相当比例的劳动阶级男孩接受了大学教育。从接受完正规教育后的第一份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受损的背景会成为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障碍，甚至在劳动阶级的男孩中也是这样。

在某一方面，家庭受损对于这些孩子地位获得的影响并不让人惊讶，因为这种影响与大萧条中的能力分布是相似的。除了家庭资源和结构性机会（structured opportunity）以外，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受损和孩子成年后的地位之间存在关联。在两个社会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并不比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儿子们更缺乏能力或者动力，但是我们不得不在这些事实之外解释他们所获成就的层次，即归因于他们早期的职业认同、更加具体化的职业兴趣和更大程度上的才智运用。在中产阶级和劳

动阶级中，和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相比，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们在青春期末期已培养出了更加确定的职业认同，也更可能被认为在职业兴趣上趋向成熟。成年以后，他们在相对较早的时候进入一种稳定的职业领域，发展出一种更为有序的职业生涯，更可能从事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所偏好的职业。具体兴趣上的职业成熟，在家庭受损和职业成就之间建立了积极的关联，至少部分抵消了受损背景所带来教育障碍的负面作用。对于两个社会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而言，在少年时代超越他人的渴望，已被证明是他们职业成就的一个最重要来源，并与智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抱负的框架和磨炼而言，职业认同一般能使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获得更高的职业成就。

人到中年后，大萧条对于样本中的男性而言已是一种遥远的回忆，但是它依旧影响着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对于那些成年后的生活境遇与 30 年代经济受损经历最为相似的男性来说，过去的受损与所具备的倾向性在当代的关联尤为显著。这种关联既包括中产阶级男性的向下流动，也包括中产阶级下层与劳动阶级男性地位的维持或稳定性。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并不比经济未受损的男性更多或更少地认同他们的工作角色，但是工作对于他们，尤其是对于没有流动的人来说，意义并不相同。经济受损的男性更倾向于工作的保障性，寻求一份合理的收入，而不是冒险追求可能更赚钱的职业，对于工作的外在因素——收入、工作计划等——更为不满。和经济未受损家庭儿子们的价值观相比，休闲活动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在排序的时候将其置于工作角色和家庭生活之后。对于有着受损背景的男性而言，婚姻的意义主要围绕着“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而父母更加富裕的儿子们惟一强调的是婚姻关系。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认为他们的妻子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些

以世俗标准来看是成功了的男性中，价值观和家庭关系方面出现了差异。但是在没有流动的群体中，这种差异会更为明显。

第八章
不确定性:奥克兰妇女的成人生活

> 大多数妇女依旧过着不确定的生活……她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宁愿为其他人工作,从其他人的成功中寻找快乐和补偿
>
> 洛林·普鲁厄特[1]

妇女的生活方式以婚姻和丈夫的职业生涯为基础,这些是妇女不确定生活(contingent life)的特点。由于依赖她所嫁的男性,一位年轻妇女对自己的职业计划和准备工作到头来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需要调整的,或者其最终实现是需要依靠他人支持的。由于这些方面事先都无法控制,并且其他事情又都要根据这些计划的实现程度而定,所以对于大部分年轻女性而言,在婚前的岁月中,甚至在婚姻中抚养孩子的阶段之后,还仍然不愿意"认真地对待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据此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Bernard,1971,第172页)[2]

职业生涯对于妇女来说,除了来自于家庭及其在经济上的

[1] L.普鲁厄特:《妇女为什么失败》,见S.D.施马尔豪森和V.R.卡尔弗顿:《妇女时代的来临》(纽约,1931),第252页。也可参阅普鲁厄特对于大萧条中妇女的分析,参见《大萧条中的女性劳动者》(1934)。

[2] 对于费泊"家庭是由一系列相互都不确定的职业生涯(mutually contingent careers)构成"的概念,我们还要加进一点,即这些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赖性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参阅《作为一系列相互都不确定的职业生涯的家庭》,见Foote,1961,第276—297页。

需要这一点外，在整个大萧条十年都是和公众意见相反的：公众意见认为妇女的位置在家庭里，而不是去和男性争夺为数不多的工作③。在战争年代，已婚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急剧上升，而且在70年代达到顶点，但是有关妇女角色的流行观念还是和30年代极为相似。在大萧条之后大约30年，一位社会学家总结道："有关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生命周期的最新观点，可以在那些极为缺乏灵活性的阶段中勾画出来。她的生活是用一系列按时序排列明确并不可逆转的状态所勾勒的。""这些妇女从出生到以家庭为中心的童年时代，然后上学，直到在学校的时间已足以令她找到一位丈夫。但是她不会浪费宝贵的青春去学习一些只是暂时有用的知识。""下一个合适的阶段是结婚前后的工作，生几个子女，抚育他们，照顾劳累的丈夫，寡居，最后是过世"（Lopata，1971，第363页）④。从大萧条的早期到中年以后，不确定的职业生涯是描绘奥克兰样本中妇女生命周期的一个基本起点。这些女性（除了3人以外）都遵循着已婚的成年人角色，而且大部分已婚妇女至少有两个孩子。

妇女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对于奥克兰女孩们成年后的职业生涯来说，妇女生活的三

③ "最近就像1936年一样，在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样本中，有72%的人认为，如果已婚妇女的丈夫能够供养整个家庭的话，她们就不应再外出工作。在1938年，男性样本中有90%认为已婚妇女不应该工作，88%的女性同意如果已婚妇女的丈夫要她们放弃工作，她们就应该这么做。"伯纳德：《妇女和公共利益》（1971），第149页。

④ 对于妇女生命历程中双重角色模式（two-role pattern）的杰出分析，是由A.米尔代尔和V.克莱因在《妇女的双重角色：家庭和工作》（伦敦，1956）中进行的。

个方面特别重要：她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角色偏好，她们结婚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机，她们所嫁的人。比如，对家庭的兴趣，使她们倾向于早婚和基本认同于家庭角色。她们的初婚年龄将决定她们获得高等教育的前景，限定有资格成为她们丈夫的人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资格成为她们丈夫的人越来越少，配偶选择方面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婚姻前景越来越黯淡。最终，她们的成就、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她们所嫁男性的个人品质和职业生涯。

妇女职业生涯的所有三个方面，都在奥克兰女孩们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这些女孩都属于经济受损家庭劳动密集型经济的一部分。从历史上来看，城市中的这些家庭培养了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意象（traditional image），而且我们也最常在经济受损家庭女孩们的价值取向中发现这种意象。她们最可能在以女性为取向（female-oriented）的家庭中走向成熟，这种家庭需要她们去准备食物、缝制衣服、清扫房间和照顾孩子。在这些家庭处于经济困境的时候，妇女的作用就增加了，她们的女儿也因此更深地卷入了家庭主妇的传统世界，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再考虑这些女孩对婚姻和家庭的取向，我们推断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孩更早结婚。这一点在中产阶级中表现尤其明显，而且这些女孩也更多地认同“妇女的位置在家庭里”的观念。

另外一种导致早婚趋势的因素，是与经济艰难（economic hardship）有关的情感需求。处于亲属关系遭到破坏的危机境遇之中的人，最需要他人，也最能意识到他人的重要性，她们甚至愿意牺牲自由以换取社会依赖（social dependence）所带来的保障。我们已经从她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意识中，在她们的多愁善感中，在她们对同龄人接纳的渴望中，看到了经济受损家庭的

女孩们这种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的证据。实际上，她们大多数人愿意为了同龄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更不容易和自己的父亲保持一种亲密的互相支持关系，这种关系恰恰能确定一种女人味、欲望和个人价值。这种情感上的剥夺，增加了过早追求异性的价值和紧迫性，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这种对异性的追求在早婚中表现得最明显。[⑤] 它们也唤起了许多罗曼蒂克式的幻想，而且在主观上削弱了女孩们在择偶中讨价还价的地位。无论在哪种关系中，处于上风的总是那些对于继续保持这种关系没什么兴趣的人。

这种对早婚的认同貌似有理的观念，因为30年代末期的经济状况和环境对于女孩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而强化了。过去，美国家庭根据传统性别角色的观点——男孩必须赚钱养家，而女孩仅仅需要成为家庭主妇——把儿子的教育置于首先的位置。（有关不平等的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分析，参阅 Rossi，1964。）当我们在这些孩子成年后，询问父母当年对他们的期望时，2/3以上的奥克兰男性宣称他们的母亲非常希望他们能接受高等教育，而这么认为的女性只有1/3。如果说家庭困难（由于其增加了对婚姻角色预期的满意度——家庭的兴趣和情感需求）提高了早婚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在没有能够替代婚姻的因素（如上大学）的情境下变为现实。

除了与婚龄的关系外，女孩的教育程度影响着她对于自己婚姻美满程度的预期。随着这些女孩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选择配偶的机会也增加了。大萧条中的经济艰难给这些女孩带

---

⑤ 参阅L.伯尚纳尔：《青春期角色的剥夺和中学婚姻》，载《婚姻和家庭谋生》，第21期（1959），第378—394页；F.马丁森：《作为婚姻因素之一的自我匮乏》，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0期（1955），第161—164页。

来的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任何障碍，都会减少她们通过婚姻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但是除了她的教育程度和她可挑选的丈夫的范围以外，女孩在择偶中是否处于有利地位，还取决于她本身的条件、穿戴、社交技巧和"个性"。在奥克兰样本中，家庭困难仅仅对穿戴打扮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奥克兰妇女中，这种近乎普遍的成婚模式，以及她们的生活道路(life ways)对于这种模式的依赖，必然会激发我们对于她们嫁与的男性和她们婚后职业生涯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与教育和职业经历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成就更为直接的影响相比，这种兴趣的扩展将增加分析的复杂性。尽管因教育和职业而获得的个人成就增加了女孩们择偶的范围，但是在这种成就转化为婚姻地位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错位。结婚之后，女性对其生活境遇的控制是有限的。为了防备丈夫职业上可能会有的失败，她可以工作，甚至可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她几乎不可能改变丈夫在婚姻中的地位。当我们追踪奥克兰的女性到其成年时，我们将看到家庭经济受损对于她们自己在婚姻、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将考虑她们和丈夫共同分享的生活境遇。

已婚妇女不确定的职业生涯，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调查她们丈夫的背景和工作生活。不过，这种研究方法所需要的资料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源，也超越了我们对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妇女成年后生活的基本兴趣。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丈夫们在30年代儿童经历的系统资料，因此无法追寻大萧条对于他们价值观和其后职业生涯的影响。不过，除了一点年龄上的差异外，这些样本中妇女的丈夫遇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奥克兰男性所经历的一样。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些妇女的丈夫所组成的出生组，也是在30年代末期中学毕业的，受惠于经济活动的

复苏,并得益于战时和战后的各种教育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也曾应召入伍。在这些方面,我们对于奥克兰男性从二战到中年时期的特性描述,给我们描绘已婚妇女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一个总体情境。

在1954年到1964年的三次追踪调查中,我们和大萧条样本中的76个人至少接触过一次。运用这些数据,成人样本中所有妇女的成人生活史(adult history)直到1958年才构建起来。比较青少年样本和成年样本,它们在家庭地位(1929)、种族、家庭结构、智商或经济受损方面并没有任何差异。为了比较代际间地位的变化,我们把1958年通过婚姻获得的地位和1929年的家庭地位进行比较。

当我们开始分析的时候,需要记住四点:(1)家庭背景、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2)成人的生命历程,这是用结婚和成为父母的时机、教育程度、工作生涯和通过婚姻获得的地位来界定的;(3)成人后的价值观和社会角色——家庭、工作、休闲和社区;(4)能够把家庭的艰辛和成年后的结果——比如家庭中的角色及与异性交往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青春期经历和适应性。在分析的第一部分,我们将对所有妇女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模式做一个总的回顾,重点将放在她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中。[①]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比较家庭受损和阶级出身对于妇女生命历程中三件重要事件的影响:结婚的时机,教育成就,婚姻选择及其导致的成人地位。那些有助于解释这些后果的关联,将被细化并进行验证。本章最后一个部分,将论及成人的价值观

① 奥克兰样本中妇女的生活模式,是由作者随后在论文《成年时期的角色取向、婚龄和生活模式》(1972)和论文《婚姻流动、成人后的角色和人格》(1970)中,用婚龄和婚姻流动(marriage mobility)来描述的。我们将在整章中使用这两篇论文。

和社会角色,论及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它们和家庭经济受损的关系,论及将经济受损和成年后的偏好联系在一起的青少年经历。这些女孩在经济受损家庭中的童年经历,和"家庭的"战后十年情况相当一致,它能使我们看到,奥克兰妇女的生活方式中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否是根植于这些条件中。

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和模式

在奥克兰女孩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婚姻提供了不同的回报:它满足了社会对于妇女的一种普遍期望;它使女孩拥有离开其出生的家庭在外居住的权利,这相应地满足了她独立于父母之外的要求;它提供了一种满足性关系、抚育孩子、地位和爱的需求的合法情境。同时,婚姻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是用放弃某些活动或者机会来界定的,是和某个男人建立一种基本契约关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这些代价或牺牲包括因生活期望和经历的相互依赖而导致的自主权丧失,还有对于独身妇女而言更为有利的机会的丧失,比如更高的教育水平、职业生涯和旅行。

从结婚到第一个孩子诞生,妇女的家庭角色主要是以丈夫为中心。如果根据收入和社会报偿来说丈夫是成功的,那么这种以丈夫为中心的倾向在生育孩子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可能依旧保持下去,尽管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妇女情感上的优先地位一般给予了孩子(参阅 Lopata,1971,第1章)。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婚姻中角色的分化和分离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因为丈夫在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时间,而妻子的精力常常放在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单调而受限的活动中。对于奥克兰样本中大多数女性而言,婚姻是和作为母亲的岁月共存的,而这代表了全面回顾她们从中学到中年生活的最合适时机。

在经济萧条的高峰时期,婚姻和家庭人口的增加常常被推迟了。在整个30年代,初婚年龄的中位数都从1930年的21.3岁逐渐上升,在1940年这个数字稍微高于1930年,达到21.5岁(Moss,1964)。当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时候,适婚的男性应召服兵役,战争动员使早婚变得更为必要和急迫。到1945年,通过估算我们看到,美国女孩的婚龄在这一年中有明显的下降,这种变化超越了前50年婚龄变化的趋势。奥克兰的女孩在1939年离开中学之后,很快就进入这种环境之中,她们的婚姻行为反映了作为这种年龄特征的压力。到了1942年深秋,大约有2/3的女孩都已有了初婚,其中1/5的人做了妈妈。到了整个50年代,我们抽取的样本中仅仅有3人保持独身。

当女孩们过入从依赖父母到完全长大成人之间的转变岁月时,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常常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对于样本中至少一半的人来说,开始全日制的工作,完成正规的教育和结婚,都发生在中学毕业后两年左右或差不多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女孩到了20岁时,1/3都结婚了,2/3离开了学校而且再也不回来了,大约有2/3正在从事和曾从事过全日制工作。因为一位妇女的生命历程依赖于她何时结婚和她嫁与何人,我们将依据婚龄和它对于丈夫地位的影响而把这些事件进行排序,然后把职业生涯模式的种类(一个角色、两个角色等)和获得的地位联系起来。

生活模式中的婚龄

奥克兰妇女的婚龄(20.4岁)和1945年全国的平均值(20.5岁)大致相同。我们样本中妇女的初婚年龄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分布,如图6所示。大约一半妇女在24岁的时候第一次成为母亲,这正是二战的最后一年。根据分析的需要,我

们依据这些妇女结婚时的相对年龄把她们分成几组，同时也遵循这种假设：女孩进入婚姻的预期值，是由规范和最佳的社会机会建构的。这些女孩所处的环境不同，她们在这种年龄结婚是按照社会时间表进行的，而那些明显偏离的人会处于不利地位或受到不公正对待。十几岁“对于婚姻来说太过于年轻了”，这要冒一定的社会风险，而且这种偏离又会给婚姻带来更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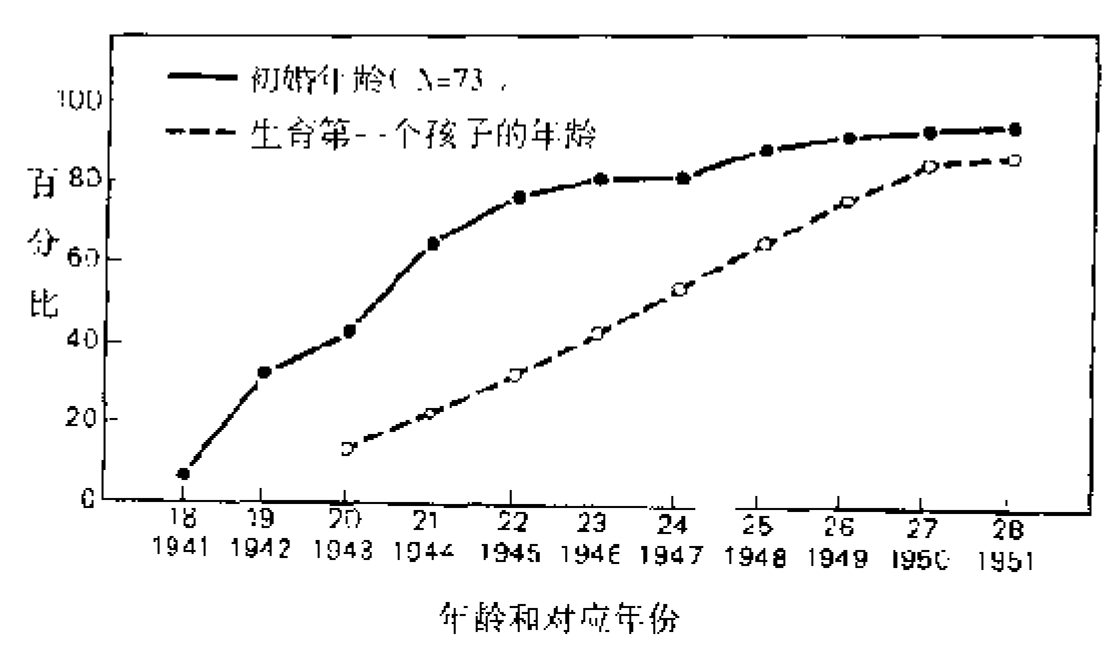


图6　已婚妇女的初婚年龄和生第一个孩子年龄的百分比分布

根据这些妇女在1940年代结婚的年龄或时间，我们把她们分成三组：早婚（20岁以前），比例为32%；正常年龄（从20岁到22岁），比例为45%；晚婚（22岁以后），比例为23%。22岁以后结婚的人数急剧下降，晚婚的人中也只有3人在24岁后举行婚礼。到了1964年，有3/4的初婚依旧保持完整，10起破裂的婚姻中有7起是因离婚或1940年代丈夫的死亡而造成的。有3位妇女的丈夫死于二战中，2位死于朝鲜战争中。

在20岁之前结婚的妇女，最不可能在二战中继续全日制工作和上大学。在这段时间内，这些人中有85%以上至少曾从事过一年的全日制工作。工作一至三年或更多年份的可能性就和婚龄直接相关（表9）。战后时期，继续就业在那些结婚相对较晚的妇女中最为普遍，这些妇女生育孩子也相对较晚。和其他妇女相比较，早婚妇女开始家庭生活更早，到中年的时候生育的孩子也更多。到1964年，这些妇女差不多43岁了，家庭规模已经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了。

表9 婚龄期与成年期妇女的生活模式

成人地位	婚龄		
	早婚	正常婚龄	晚婚
1946年前全日制工作的时间			
没有全日制工作	23%	6%	6%
1—2年	41%	33%	19%
3年或3年以上	36%	60%	75%
1946—1955年全日制工作的时间			
没有全日制工作	45%	70%	27%
1—2年	27%	10%	33%
3年或3年以上	28%	20%	40%
家庭模式			
生第一个孩子时年龄的中位值	22.3	24.1	27.9
孩子数目的中位值	3.4	2.8	2.6

教育			
大学（一年或一年以上）	13%	50%	69%
中学／职业培训	17%	29%	12%
仅上过中学	70%	21%	19%
到1964年为止的婚史			
初婚依旧完整	52%	75%	94%
第一任丈夫死亡	13%	9%	—
一次或一次以上的离婚	35%	15%	6%
婚姻组中个案数的最小值	22	30	15

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很少有女孩能进入大学并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11%)，尽管有相当数目的人至少能接受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教育程度与家庭地位相关($r=.37$)，也和婚龄有关。结婚的年龄越晚，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尽管大部分早婚者来自劳动阶级，然而在这个群体中，阶级出身的差异也和教育程度无关。在较晚结婚的妇女中，接受过某种程度大学教育的人在中产阶级中比在劳动阶级中更为普遍(88%对30%)。随着婚龄的增加，能干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也上升了。在智商超出平均水平的一组中，至少接受过某种程度大学教育的比例在早婚组中为39%，到了平均婚龄组中比例上升到62%，在晚婚组中上升到90%。对这些妇女的个人成就而言，智力的作用也取决于她们结婚的时间。

大多数早婚的女孩都无法享受到在大学校园择偶的优势，没能享受高等教育给她们本人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她们并不必

然被排除在可能结交受到良好教育又充满抱负的男性的环境之外。白领中的秘书工作就提供了这种机会。而且,晚婚也有潜在的风险:那些一心追寻大学教育而且直到接近30岁才关注婚姻的女性,要面临有资格成为她们丈夫的未婚男性急剧减少的风险。她们通过高等教育所获得的个人发展,却可能成为她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男性的障碍。在这方面,对于那些期望婚姻和教育的前景都尽可能美好的女孩而言,初婚的模式化年龄(modal age)可能是"最佳时机"或"最合适的时间"。在我们考虑早婚和晚婚的地位前景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代际间地位变化的程度。

教育和婚姻的代际变化

代际间的变化和持续性,在母亲和女儿的青春期后期或者青春期之后表现出来。在20世纪早期到二战之间,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了,这种变化也可以从奥克兰女孩们和母亲们的教育程度中看出来。但是关于婚姻作为女性谋生合适途径的这种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改变很少,或者说是没有任何改变。在战争年代,女性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寻找丈夫上。

婚姻和丈夫的职业生涯处于比女性自身的教育程度或职业兴趣更为优越的位置,然而这种位置是潜在的,而且是一个不会给奥克兰妇女的生活带来任何后果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在1920年代以前,她们的母亲中仅有18%上过大学,但其中大部分都获得了学位。比较而言,女儿们在大学注册的人数是母亲的两倍,但是仅有1/4留下来完成了学业。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比较中,婚姻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是女儿们缩短接受教育生涯的决定性因素。就整个群体的水平而言,从母亲到女儿在教育地位上惟一的进展,出现在普遍结婚的时间之前。从许多

类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女孩在上大学的时候结婚，那她受教育的道路一般来说就走到了尽头。因此，女儿们并不比她们的母亲更可能完成四年大学学业，尽管她们有更多的机会这样做。不过至少在两例个案中，女儿们的大学生涯因其父母不再支持而匆匆结束了（参阅表 A－26）。这种牺牲表明了婚姻交换中各种优先考虑的东西，这种交换假定，妻子的命运就是从丈夫的成就中获得满足感。比如，和他们的妻子相比，大多数上大学的丈夫都完成了他们的学业，还有一小部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对于这些男性来说，在高等教育上的某些延误是因为服兵役。

如果我们根据大学教育的状况进行代际间比较，惟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奥克兰妇女的父亲和丈夫之间。这些妇女比她们的母亲更倾向于嫁给接受更多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教育——的男性。在她们的母亲中，仅仅有 27％的教育程度低于她们的丈夫，而女儿中这样的情况达到 44％（这可以从三代间教育程度变化图中看出来，参阅 Hill，1970，第 35 页）。

正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在那些嫁与在职业生涯中获得较高地位男性的女孩中，这种教育差异尤其明显。大多数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女孩，尽管没有大学校园给其择偶带来的有利条件，也都通过婚姻获得了较高地位。在这些女孩中，有一半以上教育程度低于她们的丈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中仅仅有 14％的女孩嫁与了劳动阶级的男性。在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女孩中，高等教育更为普及，但是她们的丈夫接受了更高程度的教育。结果是，在向上流动的女性中，有 3/4 的教育程度低于她们的丈夫，而有不到一半的女孩在婚姻方面更不成功。

女孩们的父亲和丈夫在职业地位上的主要变化，体现在 1940 年代到 1950 年代明显扩大的类别中——专业性的和高薪

的管理群体。在这些女孩的父亲中，有22%处于这个类别(1929)，而30年后她们的丈夫有40%属于这个类别。两代间比较而言，做店员的上升了1/3，而自我雇佣的下降了1/5到1/4。根据霍林斯黑德的社会位置(soical position)指标，依据丈夫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到1958年为止，已婚女性有41%位于中产阶级的上层(I和II类)，29%位于中产阶级的低层(III类)，30%属于劳动阶级(除了1人外都属于IV类)。如果根据父亲的状况划分，相应阶层比例分别为14%、35%和41%。

那些嫁与成功男性的女孩们，事实上或可能常常是在大学遇到这些男性的。在全部样本中，女孩们的教育程度对于丈夫最终地位的影响大于她们对阶级出身的影响(r=.51对.27)，但是大学教育给婚姻带来的好处取决于她们何时结婚。晚婚者获得的教育成就最大，也最可能利用她们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有相当多的人在以她们的地位交换婚姻中类似地位时并不成功。实际上，她们最可能嫁与那些受教育不多的男性(40%)，而更为年轻的新娘这样做的只有15%。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中用以交换的有价值品质的缺乏，对婚姻前景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比如，在23岁之前结婚且没有接受完大学教育的妇女中，有1/3丈夫是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而晚婚且其教育程度也属于这类的女性，却没有一个人的丈夫是这类人员。和出身于劳动阶级的妇女相比较，结果也是相似的。没有进过大学的劳动阶级女孩，其婚姻前景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快变得黯淡了。对这种差异有一种解释：有资格成为其丈夫的男性(独身和地位较高)，随着女孩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少，这就增加了男性在择偶时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的择偶范围包括更年轻的女孩和与他们同年龄段的女性。无论是自己选择晚婚还是不得不推迟结婚，这些女孩都进入了一个更富竞争性的

择偶体系，这迫使她们的婚姻选择更依赖于个人的资质。

妇女的职业生涯和丈夫的地位

奥克兰妇女属于这样一个出生组：她们对于家庭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的评价可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活动。有一项研究发现，家庭角色的这种优先地位甚至在充分就业或从事公共事务的女性中也存在。大体来说，这些妇女的集体观念（collective opinion）肯定了这种看法："每位女性都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根据生命周期来看，在她完全卷入这些关系之前、之中和之后，只有家庭角色对她是最为重要的"（Lopata，1971，第49页）。即使家庭角色的这种优先地位和妇女实际上扮演的角色很不一致，它们也的确是奥克兰妇女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相对于丈夫的工作生涯来说有一定自主性和平等性的真正职业生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些妇女从中学毕业到中年，除了8%以外，其他的都至少有一年全日制工作经历。尽管她们中间只有不到15%在结婚和有孩子后，还保持着相对有序的职业生涯（relatively orderly career），其中仅有一些短暂的中断。后者既包括完成大学或专业学院学业的妇女——一位园林师、一位注册护士，也包括只接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一位IBM的操作员、一位保险推销员、一位制图员、一位商场的采购员。除了很少的例外，这些工作生涯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妇女的权威或地位在战后有明显的上升。[②]

② 妇女在1940年以后就业境遇（employment situation）的变化和女性就业的影响，在奈和霍夫曼编辑的《美国的就业母亲》（1963）中有所概括。

我们识别了生命史历程中的四种就业模式。[③] 有 1/4 的妇女遵循的是一种常见就业模式(conventional pattern of employment)：她们离开学校后就参加工作了，但是很快因为结婚或生育第一个孩子不再工作，并且再也没有重新就业。在样本中，有相当大比例(34%)的妇女建立了一种双轨式的(double-track)职业生涯模式。对于她们而言，就业只是暂时因生育孩子或持家而中断。职业序列的第三种类型可以用不稳定(20%)来描述，这和男性无序的工作生涯极为一致。这个群体中的妇女因为工作之外的一些原因，比如经济需要、健康、因丈夫工作变动而产生的居所变换，在就业和操持家务间不停地变换。第四组(8%)直到结婚和持家之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

一位妇女在有孩子之后是否继续工作，依赖于价值观之外的许多因素，尤其是她的经济境遇。在属于常见就业模式妇女的生命历程中，这一点再次得到证实。作为一个群体，有常见职业生涯的妇女，婚后尤其美满，因为她们培养了除家庭和工作之外的广泛兴趣。和有双轨式或不稳定职业生涯模式的妇女相比，她们更有可能接受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嫁与的男性也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并在 50 年代末期位于中产阶级的上层。这些人中有 70% 位于中产阶级上层，而结婚后继续工作(尽管有所中断)的女性这样的比例只有 1/3。在双轨式职业生涯和不稳定职业生涯的群体之间，这些方面并无差异。在 1964 年，婚后停止工作的奥克兰妇女，提及自己在家庭之外至少还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政治、艺术工作者、社区活动分子等)，其中

③ 这些模式取自 M.C. 麦克马维的《妇女职业生涯模式预期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1961)。对于妇女职业生涯模式更加详尽的论述，参见伯纳德：《妇女和公共利益》(1971)，第 3 章和第 9 章。

有4/5至少参加了两个地方或全国性协会的活动，而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这样做的只有1/3。值得一提的是，无论遵循何种职业生涯模式，总有一些妇女，在她们的孩子离开家和她所关心的一切改变了的时候，可能改变她们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在常见职业生涯模式群体中，1/3的人制订了一份在不远的将来谋求一份职业的计划（1964）

经济受损对生命历程的影响

从这些简短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在奥克兰妇女的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三个因素基本上都是择偶方面的，而且三个因素都容易受到大萧条中家庭环境的伤害：她们的婚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伴侣的选择以及伴侣随后在职业上的成就。对于这些妇女而言，重要的不是她们是否结婚了，而是什么时候结婚以及和谁结婚。因为除了三个人以外，所有的妇女最终都建立了一种取决于男性职业生涯的生活模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结婚的时机在构建生活经验时尤其重要。如果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婚姻中寻找感情上的满足，那么这将会阻碍她在完成中学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当然缺乏父母的支持也是一个原因，因此这就限制了她结交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的机会。为了把这些因素和30年代的经济受损联系在一起，我们首先比较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然后再确定家庭的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分析中只包括1958年结婚的妇女，而划分的依据是经济受损状况。我们分析的出发点是婚龄，因为它既影响教育程度也影响通过婚姻获取的地位。

家庭艰辛对于婚姻认同的影响

早婚(20岁之前)除了和劳动阶级的背景有关以外，还和家庭的经济受损有关。主要的对比出现在早婚者和正常年龄结婚者之间，而晚婚者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差异。中产阶级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有1/3结婚较早，而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女儿们只有8%是早婚的。对于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女儿们而言，家庭经济受损并没有使她们的婚龄出现明显的差异。这些女孩中几乎有一半在20岁之前结婚(46%)，这和她们父母的婚姻模式极为相似。

在某些个案中，客观的经济受损可能并不产生使早婚变得更有吸引力的心理紧张因素。虽然并不总是由心理因素去界定客观艰难(objective hardship)，但对所处境遇的界定是决定情感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因素。女孩们对艰难的真正了解程度，在大萧条中无法直接衡量，但是她们成年后曾被询问过这方面的经历。在1958年的访谈中，无论阶级出身如何，对艰难往事的回忆在早婚的妇女中间尤其普遍，而这种记忆又和在少女时代感觉母亲是个不快乐的人有关。在这些早婚的妇女中，有一半曾在回忆中提到一般性的和极度的艰难；而在样本中其他所有的妇女中，这样回忆的只有10%。

通过强化使早婚具有吸引力的各种条件，家庭经济受损使早婚的可能性增加了。对于来自中产阶级的女孩们来说，这些条件包括：(1)一种以情感淡漠以及与父母(尤其是父亲)之间的非支持性关系为特征的家庭环境，脱离父母的监视后有更多与男孩来往的自由；(2)相对较早的约会以及和异性亲密交往的经历；(3)对于社会接纳的强烈渴望，在情感上的敏感性；(4)缺乏父母支持而导致有限的教育前景，较差的学习成绩，以及对家庭角色的偏好。下面对于这些关联的总结，建立在对现有文献进

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参阅 Elder,1972)。

那些结婚相对较早的女孩们,最可能感到与父母的疏远。同在正常年龄结婚的群体相比,晚婚和早婚的女性都离父亲(与母亲比起来)更远。年轻的新娘尤其相信父母对她们并不关心。在中产阶级中,父母的冷漠和在情感上更偏向于母亲都和家庭的经济受损有关。

处于早婚和晚婚这两端的群体中的女孩们与父亲的疏远关系,也呈现在这些女孩成人后的感觉中。在早婚和晚婚这两个群体中(1964),仅仅有 11% 的女性说与父亲谈话更为轻松,而在正常年龄结婚的女性中有这种感觉的占 40%。从后代对父母的赞扬和关爱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之间存在的可比性差异。当直接问及她们对于父亲作为父母的印象时,早婚的妇女中仅有 1/3 表述了正面的看法,晚婚的妇女有 50% 这样认为,但在正常年龄结婚的妇女中,对父亲持有正面看法的却占 85%。尽管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儿们中,有一些在成年后也不欣赏她们的母亲作为父母的角色,但是早婚和晚婚女性与父亲的疏远关系却是明显的,可她们对母亲的印象并不因婚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中产阶级中,女孩们的社会独立倾向可能是因为她们来自经济受损的家庭,也可能是因为她们在较早的年龄结婚。这一婚姻群体中的女孩们(与晚婚群体中的女孩一样)常常用顶嘴或者批评去反抗父母的权威。与她们的社会独立性相一致的是,在与异性关系发展的早熟模式上,十几岁的新娘与其他女孩的模式不同:开始约会的时间早,频繁地与男孩交往,与男友的一对一关系较为稳定,日益增进的性亲密。在中学时代,婚龄越小,与男孩的电话联系、一起消磨的时间以及稳定约会的倾向就越明显。早婚群体和在正常年龄结婚的群体之间差异最大,婚

前性行为在早婚群体中也最常见。

多愁善感和对社会地位的渴望，在家庭经济受损和早婚之间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关联。从第六章中可以看到，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常常被她们的母亲描述为在情感上极为敏感或者害羞（感觉容易受伤害、容易叫嚷等），她们总是低估自己在同学中的声望。在这两种取向中，早婚的女孩不同于晚婚的女孩。比较而言，晚婚者又总是高估她们在社交中受欢迎的程度。

最后，大萧条时的经济状况减少了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可能性，从而使教育对于早婚者的限制降到最低限度。与在未受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比起来，在经济受损家庭（尤其是在中产阶级的受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更容易对家务产生兴趣，我们既能从这种价值观去预测她们的早婚，也能推定这些女孩的教育程度不会超过中学水平。在我们抽取的样本中，很少有女性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曾鼓励她们去接受大学教育，甚至在中产阶级中也是如此，虽然这种情况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最为普遍。缺乏这种鼓励正是她们早婚的原因之一。如果用智力来衡量，早婚的女性更不能干。

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来自中产阶级的女性而言，在家庭经济受损与她们的早婚之间，出现了四种值得一提的关联：(1)与父亲关系疏远；(2)具有社会独立性，并较早卷入与异性交往中；(3)多愁善感和自我贬低；(4)明显倾向于家庭角色而远离高等教育。这些关联支持一种关于早婚的"匮乏论"（dificiency theory）：自我的（或在自我一他人关系中的）社会关系或情感关系的匮乏，加速了女孩们关注和认同婚姻的进程。[①]女性的自我

---

① 这种解释在"自我匮乏"（ego dificiency）的因素中找到支持，这种因素是由马丁森界定的。我宁愿把这个因素置于自我一他人关系的框架中。参阅马丁森：

实现和满足通过假定婚姻中的情感保障和作为回报的依赖性而获得。情感上的损失,以及在年轻女孩的生活中有着最为显著的男性特征的父亲,都是决定这种异性取向(heterosexual orientation)的关键因素。

对于早婚的这种匮乏论解释,无法恰当地说明这些女孩们是如何通过家庭职业生涯进行社会学习(或者说进行社会化)并走向成熟的。无论来自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早婚者因其少女时代对于家务的兴趣而不同于他人,这种不同表现在:她们的社会独立性和较早卷入异性关系;她们除了中学教育之外受不到什么教育上的支持。情感损失并不一定能够解释这些因素给她们的婚姻带来预料之中的后果,尤其在劳动阶级中,更是如此,因为这个阶级中的父母更可能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们对于早婚的观念。至于早婚与大萧条中家庭艰辛的关系,中产阶级女孩们的家内或婚内社会化(marital socialization),在性别分类上是和男孩们的职业社会化一致的,和他们的职业观点和具体的职业前景也是一致的。

30年代的经济受损和低微的家庭地位,明显地与解释早婚的两种因素有关:情感损失,特别是与父亲的不正常关系;家内社会化。这些因素在生活境遇中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使它们不可能互不干扰。比如,社会独立性似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成熟,但它也可能反映了作为父母的冷漠或者对子女缺乏关心,并因此导致了某些女孩所感受到情感上的被排斥。实际上,与父亲关系的疏远,同女孩们的社交自由和异性之间的交往活动有关。如果我们了解社会独立性潜在的成熟过程,并且把这种自由与社会或感情成熟区分开来,那么,对于奥克兰妇女早

《作为婚姻因素之一的自我匮乏》,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0期(1955),第161—164页。

婚的心理匮乏（psychological-dificiency）解释和社会化解释之间就不一定会出现冲突。

就样本的总体而言，早婚妇女比其他妇女接受的教育更少，更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生育的孩子更多，更不可能有稳定的婚姻。就已看到的这么多社会事实来说，我们估计这种生活模式在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身上更为典型。事实上，和家庭更加富裕的女儿们相比，这些妇女更不可能上大学。但是其他方面的差异，与基于婚龄的预测并不相符。无论这些女性出身于哪个阶级，一般说来，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性相比，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平均晚了八个月，到了中年也没有生育更多的孩子，也更容易维持她们的第一次婚姻。[⑩] 为了理解这些结果，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妇女在婚姻成就（martial achievement）上的差异，以及它们和家庭背景的关系。

教育和婚姻成就

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婚姻成就比个人成就更大。仅仅有15%的已婚男性没有接受完整大学教育，而有一半没有上过大学（表A-27）。相比之下，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性在婚姻中就没有这么成功。她们接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但是她们丈夫的教育程度比起经济受损家庭女性的丈夫要低。人到中年之时，她们通过丈夫的工作只能获得较低的社会地位。在中产阶级中，家庭的经济受损减少了这些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却没有降低她们的婚姻成就。

---

⑩ 在中产阶级的后代中，经济未受损群体生育孩子的中位数为3.2，经济受损群体为2.7。在劳动阶级中，经济未受损的群体为2.0，经济受损的群体为2.3。

劳动阶级妇女受过的教育很少超过中学水平，而且她们嫁与的男性大部分的教育程度也属于这一类。不过，就和家庭经济受损的关系而言，她们的婚姻成就和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完全相当。一般来说，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们，的确比来自更加富裕家庭的女性通过婚姻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这种在中产阶级中尤其明显的未曾预测到的差异，表现出了婚姻的不确定性或矛盾性：教育本身无法保证一个女孩能嫁与一个有着相同或更高地位的男性。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地位的"下降"，在那些在婚姻中拥有许多社会和经济优势　　经济未受损的中产阶级背景——的女性中反而最为典型？比如，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她们的婚龄，或者更具体地说，也不是因为她们结婚相对较晚而面临的风险。她们并不比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更晚结婚。我们也不知道有着家庭艰辛背景的妇女取得婚姻成就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会发现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的这些妇女通过婚姻获得了巨大成就呢？

中产阶级家庭在婚姻上的有利条件，部分是通过上大学产生的，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家庭艰辛对婚姻成就的正面影响。[1]一些没上过大学的妇女，的确能在工作环境中遇到很有能力的男性，包括她们的丈夫，尽管我们还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接触对处于困境的家庭的女儿们有利。同样，来自经济未受损的不太富裕家庭的女性，在个人品质上是基本相同的，而个人品质又决定女性在男性眼中的吸引力，比如身体的魅力、服饰打扮

---

① 这来源于中产阶级研究对象所蒙受的经济受损程度和教育程度之间的负相关。对于整个样本来说，家庭的经济受损只能部分预测丈夫的职业地位低微（r = .23）。如果在回归方程式中，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的程度都是给定的，那么即使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增加进去，也不会使家庭经济受损的主要影响出现什么明显的差异。

等。

这些群体除了相似之处以外,为了引起中意男性的注意或认同,她们运用或展示个人才智的程度是有差异的,正如我们发现那些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能干男性存在动机差异一样。依据传统的教养,妇女们倾向于自我表现以便取悦于男性。典型地说,"人们期望妇女运用她的魅力去获得某种合法的结果,比如受到赏识、获得地位或丈夫。"[12] 在一位成功地嫁给地位较高男性的女性(一个新英格兰样本)生命史中,记录了这种策略。她们"为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流动,常常把社会活动和运用身体的吸引力、魅力和性联系起来……她们在中学和大学奉承和引诱老师。随后,她们对那些在工作中遇到的男性施以同样的技巧。"[13] 对奥克兰妇女来说,家庭的经济受损可能增加了这种社会技巧的价值,因为它使她们的未来更多地依赖于通过婚姻所能获得的一切,而这一切又通过运用包括迷人的身姿、漂亮的脸蛋之类可以让人接受的或有效的手段获得。为了考察上面提到的这些影响,我们必须首先决定外表和社会抱负是否确实使样本中女性的婚姻成就出现了显著差异。[14]

根据30年代的评分,那些体形和面貌最具吸引力的妇女可能会嫁与这样的男性:他们作为专业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生涯。[15]正如人们预期的那

---

[12] K.戴维斯:《人的社会》(纽约,1949),第104页。

[13] J.K.迈尔斯、B.N.罗伯兹:《在精神疾病中的家庭和阶级机制》(纽约,1959),第159页。

[14] 文中下面的分析,很多都引自作者早期的论文《外貌和教育对于婚姻流动的影响》(1969)。

[15] 关于外表的两种衡量方式,选自这些女孩上中学时对她们的观察评分:精心打扮的外表和富有魅力的身体。这些和其他的评分,都是研究人员在这些女孩每半年参观一次儿童福利研究所时,在她们在操场玩耍的时候进行的(参阅附录B中

样，对于那些接受大学教育途径有限的妇女（也就是劳动阶级的女儿们）来说，身体资本（physical asset）导致了最大的差异。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相比，这些妇女的吸引力和丈夫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多（r=.28对.46）。这个结果至少从含义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在各个阶级的经济受损家庭中，女性的外表和她们通过婚姻所能获取的地位密切相关。

除了劳动阶级妇女的情况例外，精心修饰的外表和身体的吸引力无法相比。大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在装扮上高于一般水平，而那些嫁得比较好的妇女，也不是因为她们的外表显得更为出色。不过，那些通过婚姻离开了劳动阶级的女性，在装扮和行为上似乎都打上了她们阶级的烙印。和那些嫁入劳动阶级的女性相比，她们在中学时代穿得更好，外表修饰更具有吸引力，更具有自信，更能被同龄群体所接纳，也更有领导能力。她们不大可能在中学时就和男孩们形成稳定的关系，而且她们对于社会友谊（social friendship）更加谨慎和挑剔。

上面这些关系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漂亮的女孩在社交方面都有野心，她们都习惯于通过身体的吸引力来为自己的前途

有关自由玩耍的评分）。参与活动的两三位研究人员，是这些女孩所熟悉的；而且因为他们既有趣又友好，她们也愿意和他们交往。经过这一系列观察后，再用评论的纸片和七级量表把结果记录下来（内在评分人的信度都在.80以上）。身体的吸引力代表了下面量表中的平均分数：富有吸引力的肤色、特征和体形；胖瘦程度；体形或者行为所蕴涵的女人味；令人愉快的表情和性吸引力。为了增加这些判断的稳定性，我们把中学时期用每个量表测量所得到的分数加以平均，对于样本中所有的妇女来说，首先把两个量表和婚姻流动联系在一起，然后在由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界定的群体内部，与高等教育对于婚姻成就的影响进行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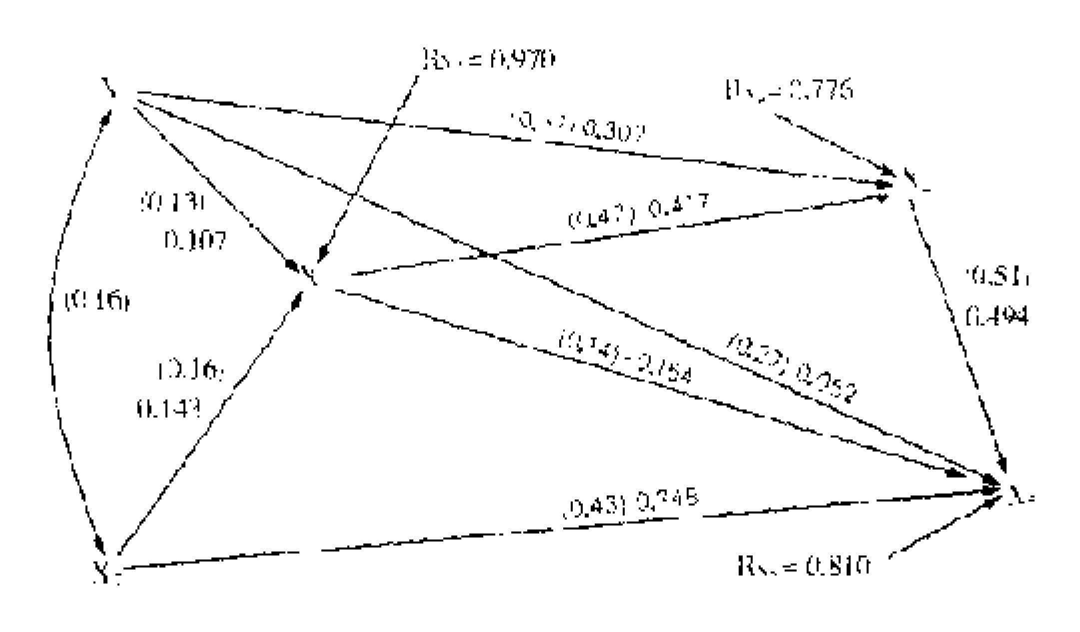
铺平道路。[13] 事实上，在中学时就具有吸引力的女孩子，都渴望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或控制他人($r = .32$)。但是她们成年后，并不更倾向于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不过在这两方面，这种野心表现在她们想嫁给那些获得了声望和权威的男性。结婚前，来自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女性对于社交所具有的野心是相似的，而且两者的这种取向都和她们的婚姻成就有关。对于所有已婚妇女而言，丈夫的地位和妇女身体外表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和妇女社会抱负的关系相对疏远(由两个指标测量，两者的 $r = .38$)。对于劳动阶级父母的女儿们来说，野心和外表都与婚姻成就关系极为密切。

在奥克兰妇女的婚姻成就中，身体吸引力相对独立于这些女孩的教育程度。甚至在那些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女性中，只要她们的身体具有吸引力，那么也更可能嫁与已经获得或有可能获得较高地位的男性。影响婚姻成就的这两种因素在图7的路径图中表述得最为清晰。学习天赋(academic aptitude)(由教师评定的七级量表)和研究对象的教育水平，一方面被界定为阶级出身和吸引力之间的中介变量，另外一方面又是阶级出身和丈夫地位之间的中介变量。在模型中，智商和学习天赋是可以互换的变量，它们导致的结果是相似的。由于来自劳动阶级的妇女很少在中学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所以如果用模型中包括的

---

[13] 同龄人中的社会奋斗，是用有关对社会权力渴望的九级量表来衡量的。这种渴望指的是"渴望通过建议、劝说或者命令来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于测量程序更加完整的描述，参阅附录B)。这种动机趋势代表了一种平均分数，这种分数是由三位评判者根据这些女孩在高中的观察资料给出的，然后加以平均。我们还常常根据细微的间接线索和行为外在的特征，去推断潜在的动机。有关非常渴望长大成人的九级指标，选自加州Q类整理(California Q set)(参阅附录B)，它提供了这些女孩上中学时的分数。这一指标代表了三位评判者给出分数的平均值。

教育程度来对每个阶级群体进行独立分析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方便读者，相关系数写在路径系数的括号中。



X_1 = 1920 年社会阶级

X_2 = 身体的吸引力　　X_4 = 教育程度

X_3 = 学习天赋　　X_5 = 丈夫的职业地位

图 7　妇女的教育程度、丈夫的职业地位与成年前的学习天赋、外表和阶级间的路径关系

与教育程度对婚姻成就的影响相似，身体外表的影响表明，来自劳动阶级和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在职业生涯上是相似的。在这两个群体中，对家务的兴趣加上有限的教育机会，强化了通过婚姻途径达到社会成就的方法，增加了早婚的吸引力。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妇女的婚姻，外表的作用是否也具有这种一致性？这些妇女和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相比，吸引力对婚姻成就的影响是否更大？最适当的验证是在由经济受损界定的群体内部，系统地比较吸引力和教育的相对作用。由于有经

济未受损背景的妇女数量很少，我们决定在每一社会阶级中，把经济受损的群体和全体女性进行比较。这种设计使我们能在不掩盖前面提到的生活选择中阶级差异的情况下，比较经济受损这种背景的影响

和因社会阶级而导致的差异不同，无论这些来自受损家庭的妇女出身于哪个阶级，外表都无法对她们的婚姻成就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相对于教育程度来说它的影响更大。和其他有着相似资质和阶级背景的女孩相比较，经济受损父母的富有魅力的女儿，嫁给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男士的可能性并不更大。我们有关外表和社会抱负之间关系的预测，也没有得到证实。在每一个社会阶级中，家庭的艰辛并没有使身体吸引力和社会抱负之间的关系出现什么差异。

在我们试图解释家庭经济受损带来的地位差异时，生命历程中的早期事件（比如婚龄和教育程度）比奥克兰妇女通过婚姻获得的地位引起的问题更少。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妇女的婚龄和教育程度，无助于我们对她们婚姻成就的理解，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吸引力的差异。不过，到此为止，我们的分析也无法提供一个辨别奥克兰妇女成年后的价值观和她们童年经历之间关联的情境。家庭对经济受损的适应性，直接影响着妇女对于家庭角色的态度。家庭的这种影响和奥克兰妇女在战后十年的家庭活动，同已婚妇女的生活在二战后更为普遍的发展是一致的。这被斯莱特称为"超家庭现象"(ultra-domestication)："当独身的中产阶级妇女正变得越来越自由时，已婚的中产阶级妇女却比以前更为信奉完整的家庭"(Slater，1970，第64页)。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在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们中发展得更为充分，就像它在奥克兰男性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中表现的那样？或者，它是否反映了出生于大萧条和战争中的人更加普遍地渴望平静的家

庭生活？斯莱特采纳了后一种立场，认为美国女性对于家庭生活的专心致志，是“在战后普遍隐退于世界之外的一部分”（同上书，第65页）。

“妇女的位置在家庭里”

除了有关女性角色的理念以外，30年代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和70年代中产阶级妇女相比，她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毫无相似之处。尽管妇女中接受高等教育、参与公众生活和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多，而家务所需的劳动力又不断减少，但现在的美国妇女依旧像那时一样，把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之类的家庭角色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上。[17] 从这些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形成之中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即社会生活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单位由于其变化的速度不同而出现的张力。[18]

在她们自己的生命跨度中，奥克兰样本中的大部分妇女都从属于家庭，这些家庭对操持家务者的劳动力需求差异很大，从强调传统性别角色的受损家庭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嫁人

[17] 除了洛帕塔的研究（《职业：家庭主妇》）以外，这种理念的持续性可以在许多论文中发现。见A. 西奥多编辑的《职业妇女》（剑桥，马萨诸塞，1971）。尤其可以参阅M. M. 波洛马、T. N. 加兰的论文：《平等家庭的秘密：家庭角色和职业妇女》，第741—776页。

[18] W. F. 奥格本为了证明他的概念“文化堕距”，常常运用家庭制度中不等速变迁的例子。家庭中的许多变迁“似乎源自这种经济因素：诸如纺纱、织布、制皂、晾晒羽毛等许多生产活动从家庭中转移出去，使这些都变成了工厂里的生产活动，这样就减少了妻子的责任。然而有关妻子位置的理念还保持着，即妇女的位置在家庭里。”奥格本：《作为理论的文化堕距》，载《社会学和社会研究》，第41期（1957），第169页。奥格本有关社会变迁的论文集，见《W. F. 奥格本论文化和社会变迁：选集》，O. D. 邓肯编辑并作序（芝加哥，1964）。

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的妇女的相对富裕家庭。她们生育孩子，是在面临严重经济受损情况下为了维持家庭需求所做的决定，而不是由妇女选择未来的想像所决定的。为此这对于下一代几乎没什么用，因为下一代很快会碰上在操持家务的技术方面的急剧变化。当她们在 40 年代结婚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庭”还是女性世界中未曾改变的中心。与从前相比，更多的女性在工作，但她们所占据的职位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更多的女性进入了大学学习，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获得了相应的职位（参阅 Knudsen，1969）。确实，在至少接受过一定程度大学教育的奥克兰妇女中，虽然已婚女性大多数人都卷入了家庭之外的活动，但很少有人能够学有所用。

有关这种家庭内环境（domestic climate）的大量证据，我们可以从《女士家庭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中找到，这本杂志迎合的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口味。[⑲] 根据内容分析，在 40 年代末期和 50 年代初期，婚姻被描绘为一种全日制工作，一种需要“训练、充分准备和技术”的工作。根据我们的假定，那些把岁月耗在琐碎的日常家务，而且除了家庭以外再没有其他社会发泄途径的女性，特别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和家庭幸福。“这些文章通过家庭主妇互相传阅，鼓励这种有点孤立但容易满足的家庭主妇精神：她们是社会的支柱，对于维持她们所确信的作为美国社会生活核心的稳定而幸福的家庭来说，她们是不可缺少的。”当家务方面的需求在 50 年代

⑲ M.J. 朱比：《变化中的道德概念：1948—1969》，载《社会力量》，第 50 期（1972），第 385—393 页。《女士家庭杂志》在这个妇女解放的时代，是最为传统的妇女杂志之一。根据最近的社论，它的读者大约占全美妇女的 1/5。这一段中的所有引文都来自朱比的文章。

和60年代减少的时候，"闲暇时间"作为一个问题便出现了。通过制作家庭手工艺品，参加志愿者工作和有薪工作的方式来让自己变得繁忙起来，无所事事的情况或厌烦情绪就消解了。根据我们的分析，战后出现了一种不太明显的趋势：到了60年代末期，妇女生活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意象，转变成了更加强烈的自我中心取向。

家庭生活在奥克兰妇女心目中的价值

就生活方式而言，奥克兰妇女在战后以家庭为中心的全盛时期，的确尽了她们的本分。到了1945年，只有不到1/5的妇女没有全日制工作，而这个比例在战后增加了两倍，这是一个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活跃时期。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调查优先性或者价值观，就会发现家庭和就业、休闲及社区角色之间并无冲突。然而在这个阶段之后，如果假定活动的优先地位能够反映活动的真实情况，那么这些偏好之间可能会更为平衡。一般来说，在我们最后一次进行追踪调查的时候(1964)，家中最大的孩子已经处于青春期或者是个年轻人了。无论这些妇女从早婚到中年时期的活动变化有多大，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变化依旧没有改变家庭角色的主导位置(图8)。和样本中的男性相比，她们的情感和满足更多地认同于生活中的单一领域。甚至把工作和休闲加起来作为成就感、快乐和兴趣源泉的时候，家庭活动的重要性仍然在它们之上。

尽管家庭之外角色的地位一直低于她们在家庭内角色的地位——这甚至对最活跃的妇女和对婚姻不满意的妻子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在家庭和工作领域的价值观和行为之间还是有着某种一致性。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不像其他妇女那样接受过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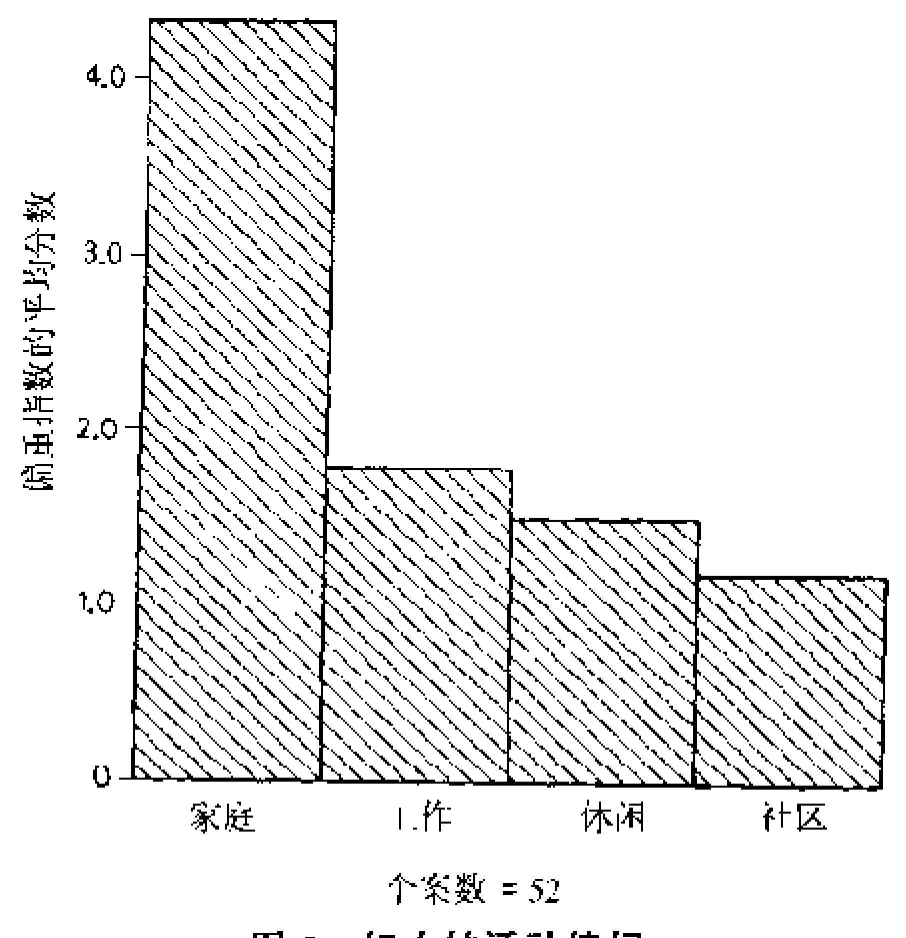


图 8　妇女的活动偏好

的教育，在战后十年或者 1964 年参加工作的可能性更小。[20] 不过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就业了或者正计划外出工作。在更偏重家庭角色的妇女中，生育的孩子相对更多，但是这种差异太小了，所以是不可靠的。那些最喜爱工作的妇女，有丰富的劳动力市场经验，所受的教育也略高于其他妇女。然而她们的家庭规模却并不比其他妇女的家庭规模小。虽

---

[20] 与家庭、工作偏好的关系如下所示：教育程度（$r = -.32$ 和 .17），1964 年的全日制工作（$r = -.26$ 和 .42），孩子的数目（$r = .15$ 和 .05），丈夫 1958 年的地位（$r = .11$ 和 $-.11$）。1964 年就业的妇女生育的孩子更少，嫁与的人也是地位较低的男性（平均约 $r = -.25$）。

然在带薪就业历史的妇女中，地位较低和家庭规模较小是最为普遍的，但丈夫的地位不是决定她偏重工作或家庭的重要因素。

这些境遇的影响，使我们对从大萧条到进入中年期间这些女性在家庭价值观方面的持续性产生了疑问。对家庭角色的这种认同，受过高等教育且有着良好职业的妇女并不乐意接受，而且这些经历还会削弱这种认同。但是这样一种假设也是合理的：对家庭角色的偏重，会逐渐导致一种排斥大学、排斥职业生涯甚至有薪职业的生命历程。事实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的确受到的教育较少，但是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相比，她们更可能嫁与令她们衣食无忧的男性。

从大萧条之后25年收集的数据来看，我们没有发现能表明经济受损对家庭角色的重要性不产生影响的证据。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而言，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超过了工作、休闲和社区活动加在一起的重要性，而且很明显，家庭在这些妇女眼中比在那些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眼中地位更高(表A-28)。在这些妇女的童年或成年时期，任何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力都无法与家庭艰辛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家庭价值观一般在较低的社会阶级中更为普遍，对于来自劳动阶级的妇女而言也是如此，但是阶级出身的影响没有超过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影响($r=$ .04对.46)。丈夫的职业地位、研究对象自己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以及家庭规模更多地不是对家庭偏好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经济受损导致的结果。

这些女性成人后所处的情境，也没有使经济受损和家庭生活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什么不同。在就业的女性和全职的家庭主妇之间，在接受中学教育的女性和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之间，在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和来自劳动阶级的妇女之间，这种关系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通过婚姻实现的流动，也没有使这

种关系出现什么变化。将接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进行比较，最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的持续性。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们更没有可能上大学，而上大学的女孩则更不可能把家庭活动置于其他活动之上，但是在教育程度不同的两个群体内，经济受损对这种价值观的影响还是可以比较的。在上过大学的群体中，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有 54％给家庭偏好以高分(5 分或 6 分)，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给家庭偏好以高分的只有 22％。在受教育较少的妇女群体中，这两种比例依次为 68％和 37％。

从奥克兰妇女在少女时代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经济受损和家庭活动的重要性之间一种貌似合理的关联。对于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员来说，这种环境中的三个因素有利于培养她们对于家庭的偏好：家内社会化，用卷入家庭责任的程度来衡量；母亲作为社交和情感的中心，用孩子所感知到的母亲在家庭事务中的影响力来衡量；社会对比(social contrast)，对于女孩们而言，社会对比会增加家庭角色的吸引力，使它的地位超过工作角色的地位(一种由女孩们的对家务的兴趣来衡量的偏好)。与经济受损境遇中男性不稳定的和有限的经济地位相比，妇女的活动、影响和责任感在经济困境中增加了。

在这些女性进入中年的时候，这三个因素——家庭的任务、感觉到的母亲影响力和对家务的兴趣——都与对家庭活动的偏好有关。那些在 30 年代承担了家庭义务的女性，那些感觉到母亲在家庭决策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那些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家庭角色有所偏好的女性，最可能把家庭生活置于工作、休闲和社区角色之上。在这些因素中，前两个因素界定了每一个社会阶级中经济受损和家庭偏好之间的相似关联，图 9 是对全部样本进行分析后所得到的结果。经济受损和家庭偏好之间的关系，

大约有 1/3 是源于这些因素和对母亲影响力的感觉、在家务中卷入程度两个因素的共同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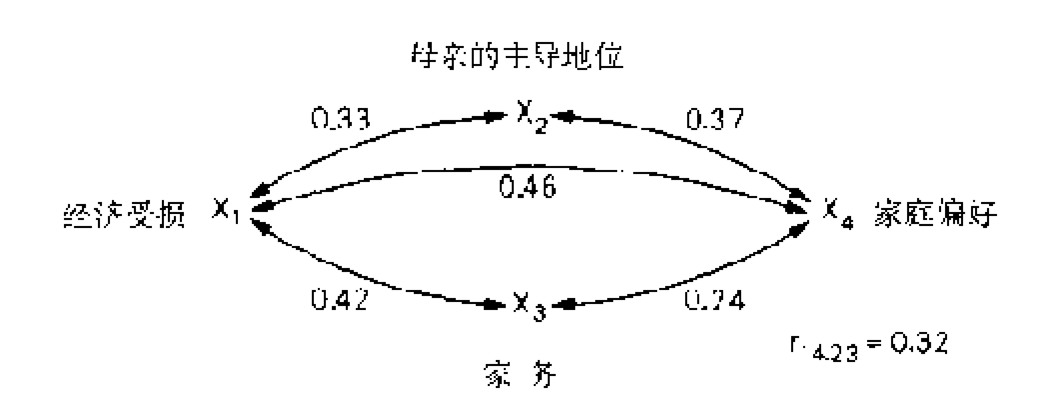


图 9 家庭偏好和母亲的支配地位、卷入家务劳动、经济受损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我们对奥克兰样本中男性和女性价值观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性结论：对于那些生长于大萧条中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年人来说，无论其阶级出身和目前的地位如何，家庭都是最重要的。在解释这种价值取向在强度上的差异时，30 年代或孩子成年后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因素更具解释力。对于男女两性而言，数据结果都与这种假设一致：因为孩子们曾处于难以获得有报酬的、有保障的关系因而显得匮乏的环境中，所以家庭才在他们心目中获得如此重要的价值。从适应性的角度看，家庭也是作为一种对付经济困窘的手段而变得有价值的：家庭是情感的天堂，是生产单位，也是经济支持替代形式的源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受损和家庭偏好之间的关系显然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更为普遍。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大萧条经历和女性家庭角色的普遍相关性。即使这些妇女的教育程度、工作地位和阶级地位不同，大部分妇女却仍然在婚姻、为

人父母或持家方面扮演着相似的角色。男性的基本角色是工作,而不是家庭,而且他们工作生涯的经历和大萧条时父亲的经历基本上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只有在这些成年人身处和大萧条非常相似的境遇时,我们才能发现经济受损和他们对家庭生活的偏好之间的重要关联。

到此为止,我们的注意力都局限于奥克兰妇女家庭取向的优势地位及其与大萧条经历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家庭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不重要的?如果一位妇女的其他活动都服从于她的家庭角色,那么她可能出于许多不同的理由才这么做,而并不仅仅因为她对家庭的责任感。在她的脑海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丈夫的陪伴、关爱和理解,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就感,操持家务所获得的回报,或者是这些方面的不同组合。在家庭生活周期的不同阶段,从结婚到有孩子再到"空巢",这些取向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但它们都是由研究对象的童年经历所塑造的。比如,操持家务和那些生长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的家庭经历关系极为密切,也和她们少女时代的兴趣一致。

除了家庭活动的意义之外,我们也曾探寻过妇女在家庭之外的职业角色和公民角色,还曾探寻过在生命历程中它们与家庭价值观和地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我们的样本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更不可能到家庭之外工作,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或曾经就业,或曾经参加过她们社区的组织活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除了这些妇女成年后的教育程度、丈夫的地位和家庭规模的影响外,参与家庭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与大萧条中她们的家庭背景和相关的价值观有关?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的话,有经济受损背景的妇女,是否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后代更少卷入家庭之外的角色?这些妇女不出去工作和围绕家庭需求安排就业的原因,将为我们洞察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所带来

的后果提供帮助，因为这种偏好和妇女仅仅工作到结婚或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持家的常见模式是一致的。

这样，我们围绕着奥克兰妇女的价值观和行动中"妇女的位置"的分析，提出了三个问题：对家庭基本认同的意义，家庭之外的社会角色及其与这种认同的关系，在生命历程中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安排。每个问题都会在本章余下的篇幅中论及。

三种社会角色：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

这些妇女对家庭角色的兴趣因生活境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众所周知，较低阶层家庭的妇女赋予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以较高的价值，而婚姻的满意度一般随着妻子的教育程度和丈夫地位的上升而上升（Lopata，1971，第1—4章）。奥克兰样本中也表现出了这些差异，尽管我们主要对满意度的一般来源更感兴趣。在那些表达了对家庭强烈兴趣的奥克兰男性中，孩子是家庭基本的吸引力，而这种男性也多是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子。那么，对于样本中的女性来说，对家庭的认同也有着相似的意义吗？

我们运用有关婚姻基本层面的一组问题（1964年调查），来评价妻子和母亲这两种角色的相对价值。我们要求每位至少有一个孩子的已婚妇女，把婚姻的六个方面从最有价值到最没有价值进行排序。这六个方面包括：婚姻关系中的"相互理解"、"陪伴"和"性关系"；"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衡量母亲角色的方式；婚姻生活的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它提供的"生活标准"和"家庭的保障性和舒适性"。因为家庭主妇的具体责任不包括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家庭主妇这种角色相对于妻子和母亲这两种角色的重要性。不过，我们通过询问每一位应答者对于照顾家庭（"不是照顾孩子，而是诸如烹饪、缝纫和做

清洁之类的活动"）的感觉来衡量她们对于持家的满意度

丈夫和孩子。婚姻所带来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益处和孩子，显然被所有妇女当做婚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有2/3的妇女把"相互理解"放在第一位或第二位，接下来的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54%），丈夫的陪伴（49%）和性关系（30%）。对于样本中的女性而言，婚姻的突出特点既不是婚姻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也不是家庭的保障性。对于男性而言也是这样，只有不到10%的人把这些放在第一位或第二位。这种价值观的等级体系在不同社会地位的成人中相对稳定。在按照教育程度、社会阶级、宗教和家庭规模划分的类别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排序。然而，对孩子的评价的确随着这些妇女成年后地位的下降而有所下降，并且还和家庭规模相关（$r = .14$）。有着较高地位的妇女普遍认可相互理解的价值。

那些把家庭置于工作和休闲之上的妇女，可能把孩子作为她们婚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r = .32$）。在以陪伴和相互理解（$r = .22$ 和 $.15$）为特征的婚姻关系中，这种价值取向较少居于中心位置。婚姻幸福与否，都不会减少妇女对家庭生活的偏好程度，也不会减少她们关心孩子的程度，但是的确会影响她们对与丈夫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中，陪伴和理解的价值随着她们回答的婚姻满意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妇女对家庭的偏好中，成为父母的突出地位显然与奥克兰男性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作为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子们，他们最可能珍视家庭生活，而这种价值观和他们生活中父亲身份的重要性密切相关。重视孩子的男性，大部分是经济受损父母的后代，这种价值观与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在童年时代承担的角色相似。但是，我们无法追溯这种价值取向的源头至家庭困窘，因为出身于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数目太少了。

除了孩子的作用之外，经济受损家庭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特征，它可能决定了人们对于妻子的角色期望：母亲在家庭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经济上的失败以及它给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并不能引导女孩们过一种能获得独立成就的生活，尽管它的确表达了依赖男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它对于家庭主妇角色的含义。除了这种经历之外，她们还能学会（尤其是在经济艰难的境遇中）控制她们婚姻中各种事务的方式。在男性样本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关系的某些证据：比起较为不成功的男性来，妻子在经济事务和孩子抚养上的影响力，和家庭经济受损以及所感知到的母亲影响力关系最为密切。

不过，我们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减少了妇女代际延续性的可能性。是丈夫的态度？还是关于家庭中妇女角色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婚姻模式依赖于这种理念和丈夫获得的地位。如果某位妻子的丈夫坚决反对这种安排，那么女性对于在婚姻中发挥自己影响力或实现婚姻平等的渴望，几乎就不可能实现，除非丈夫像大萧条中的一些父亲那样，对家庭事务不闻不问。

这种保留至少和数据是一致的。没有证据证明，妇女因为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长大从而就想在自己的婚姻中实施影响力。运用根据1964年调查的问题构建有关经济事务和抚养孩子方面的决策权指标，我们发现妇女在婚姻中的影响力和30年代的家庭经济受损之间没有可靠的关系。[24] 一般都认为，丈夫

---

[24] 这两项指标和第七章中构建的有关男性的指标是一样的。经济上的权力是用两个五类问题的累加得分来衡量的：金钱的支出以及选择和购买一辆小汽车。抚养孩子上的权力是用二道包含着五种回答的题目来决定的：孩子应该怎样培养，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约会，宗教信仰培养的实践。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从"总是丈夫做决定"（1分）到"总是妻子做决定"（5分）。这样分数越高，应答者感觉自己对于婚姻的影响力越大。经济上的权力和抚养孩子的权力的平均分数依次为4.6分和9.2分，标准差依次为1.2和1.4。

在经济事务上更有影响力，而妻子却拥有抚养孩子方面的最后决策权。但是婚姻模式并不因母亲的影响力或大萧条中的经济艰辛而出现什么变化。正如奥克兰男性的情况一样，代际间生活境遇的相似性，并不使得家庭受损和妻子影响力之间出现某种联系。

持家。在公众的脑海中，持家是妇女主要功能中最传统或最被贬低的事情。斯莱特有关女性的家务琐事"单调冗长并毫无意义"的观点，就反映了这种看法(Slater，1970，第67页)。虽然节省劳动力设备的使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持家对大部分奥克兰女性而言还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活动。实际上，即使我们专门把抚养孩子从中剔除出去，大部分妇女仍然不满足于这种传统角色。56%的妇女完全乐于照顾她们的家庭，拒绝那种把烹饪、缝纫和清扫仅仅看做是"不得不做"的观念。另外20%的人表达了从这个角色中获取的某些乐趣，而15%的人既没有正面的感觉也没有负面的感觉，只有10%的妇女可以被算作对家庭主妇的责任持有敌意。[22]

对操持家务持认同感的人所经历的生活境遇，强化了她们的家务取向。如果来自劳动阶级，她在中学毕业之后就结束了自己受教育的生涯，在相当年轻之时就走入婚姻殿堂并成为母亲，所嫁之人是依旧留在劳动阶级的男性。对持家的兴趣，在劳动阶级家庭的女儿们中最为常见。实际上这种兴趣是如此普

[22] 对于洛帕铬样本中的已婚女性来说，家庭主妇角色的全部重要性，和奥克兰妇女的态度十分相近。74%的妇女把母亲的角色当成最为重要的，其次是妻子和家庭主妇(61%和58%)。在这568位妇女中，有4/5的人(包括100位就业者)在回答开放式问题时，认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不足以让她们忘记这些责任。无论她们的年纪多大，或者她们实际上卷入家庭制度的程度有多深，她们都把妇女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之中"。参见《职业：家庭主妇》，第47—48页。

及，以至于她们在童年时代曾经历的经济受损对她们没有任何特殊的影响。这些人大部分在少女时代就对家务有所偏好，而且将近有90%的人中年时还在持家的角色中找到了满足。导致这种价值观出现差异的因素，既不是家庭在经济上的受损，也不是这些妇女成年后地位的变化。嫁入中产阶级的妇女，也和劳动阶级男性的妻子们一样喜爱操持家务。

经济受损的家庭对于这些女孩家庭倾向的培养，在那些生活在妇女角色的传统意象较为缺乏环境（包括中产阶级背景和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对于持家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比其他妇女更加喜欢操持家务（65%对36%，$tau_c = .35$），而且她们的态度和家庭经济受损有关，这一点是通过大萧条时社会角色和兴趣实现的：家务责任、母亲在家庭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少女时代对家庭角色的兴趣。这三个因素都和这些妇女成年后对于持家的兴趣有关（平均$tau_c = .24$）。从那些至少受过一定程度大学教育的妇女对于操持家务所持有感情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对于偏好家庭角色的妇女而言，持家和孩子的重要性对于孩子的抚育有着明显的含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妇女一般会比从工作的或从公众角色中去寻求满足的妇女生育更多的孩子。一个大家庭可能既是母亲身份或家庭价值观导致的后果，又可能是它们出现的原因，然而这两点在样本中的表现都不明显。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的确在少女时代或者中年时期更加认同家庭角色，但是一般来说，她们的家庭规模并不比其他妇女的更大。奥克兰妇女无论是否具有家庭取向，大部分都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在奥克兰的男性中，家庭价值观和生育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孩子

是这种价值观的原因还是结果。从现在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证据来看，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不是作为大萧条中经济受损和随后的生育之间的一种重要关联而出现的。

家庭之外的社会角色

对于奥克兰的妇女而言，工作、休闲和社区活动都不能和家庭的重要性相比，但是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曾深深卷入过这些活动中，大部分都在离开中学后甚至在婚后曾参与过社区活动。她们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妇女在参与工作，尽管这些妇女从事的主要是地位较低的工作。随着孩子的出生，外在的责任被无限期地搁置了。样本中的大部分妇女在战后都忙于抚养孩子和操持家务。

如果以家庭为中心的妇女主要是满足孩子和丈夫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将是解释她们卷入家庭之外活动的一个逻辑起点。她们会寻求就业以缓解经济压力，但是除此之外，她们就把操持家务作为自己的全日制工作。根据这条因果线索，那些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出去就业的最少，在战后尤其如此。她们没有更多的孩子，但是她们的价值观确认了这种活动的进程。而且从丈夫的地位来看，她们婚后的经济境遇比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更好。

就此而言，经济受损的背景并没有使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全日制工作出现什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这是很令人吃惊的（表 A－29）。这些差异显示了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妇女的就业水平更高，而不是更低。对就业影响更大的是生命周期的阶段和丈夫的地位。在战后抚养孩子的岁月中，这些妇女就业的比例急剧下降，尽管此时工作的妇女更可能是中产阶级低层或劳动阶级的妻子。根据丈夫的职业地位推断，与战后十年这些妇女就业

的关系相比，经济需求和家中孩子数目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23]

在1964年的调查中，妇女给出没有工作的理由中就包含着家庭的优先性，而且大部分妇女都属于这一类：中产阶级的妇女有3/4不工作，而劳动阶级父母的女儿有38%不工作，仅仅有1/4"失业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找到一份工作。除了工作地位和期望不会因童年时代的经济受损而发生变化之外，经济受损父母的后代更倾向于用家庭需求来解释她们为什么不工作，尽管如果客观地去衡量的话，她们面临的家庭需求并不比其他妇女更多。无论其阶级出身如何，有62%的妇女提到了诸如"家庭需要我"之类的原因，而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只有1/3提到了这类原因。后者更经常提到的是：缺乏兴趣或没有合适的工作、喜欢志愿者的工作或者没有能力找到工作。

除了对于家庭角色的突出兴趣外，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并不比其他妇女更常常满足家庭在经济上的需求，而这又是她们就业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否有这种需求，她们像其他妇女一样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寻求就业，尽管家庭福利还是她们在生活中考虑得更多的东西。比如，我们在1964年的调查中询问了每一位被访妇女以下的问题："如果你家没有经济方面的需求，而又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你会工作吗？"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妇女并不比其他应答者对工作更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她们认为这和孩子或丈夫的兴趣发生冲突，她们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了。我们没有问如果一位母亲的孩子在家需要照顾，她却外出从事全日制的工作时，她们感觉这样做是否具有合法性，

---

[23] 从1946年到1955年全日制工作时间与丈夫的职业地位(1958)、孩子的数目呈负相关($r=-.16$和$-.06$)。后面两个因素与1964年调查中的全日制工作的负相关度更强($r=-.26$和$-.24$)。

尽管数据支持这种推断：如果经济环境实际上并不需要妇女这样做，那么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的妇女最不可能接受这种安排。

在妇女工作到结婚或第一个孩子出生并且再也不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常见就业模式中，这种家庭态度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有1/4的妇女遵循这种职业生涯模式，但是其中除一人外全部都是在经济受损家庭中长大的，其中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和劳动阶级家庭的比例相同。在结婚大约20年之后，这些妇女在执着于家庭生活方面，在婚姻幸福方面，在参与社区有组织的活动方面，都变得引人注目。正是这个群体中的妇女，对有薪就业最没什么兴趣，或者说她们更加看重家务活动或操持家务。这种价值观既和她们在大萧条中的社会出身一致，也和她们从结婚到中年时的家庭境遇一致。

与作为整体的样本相比较，有常见职业生涯的妇女接受教育更多，也更可能嫁给受过大学教育并处于中产阶级上层的男性（到1964年为止）。孩子和母亲身份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些妇女成年生活的诸多情况：她们每个家庭至少有两个孩子，其中44%的家庭至少有三个孩子。但是，作为她们婚姻中最有价值的方面，孩子排在夫妻关系之后的第二位。所有个案中妇女的初婚都保持了完整性，这也是她们一直感到快乐的源泉。这些妇女都以丈夫为取向（husband-oriented），经济上有依赖性，对自己的生活也感到很满意。价值观、家庭境遇和经济需求，都不能成为“推动”她们充当劳动力的因素。

“不确定的生活”是对常见职业生涯的最好描述，而遵循这种生命历程的人，在大萧条中都学会了珍惜家庭生活给她们带来的益处，她们的丈夫通过在情感和经济上支持她们，而使她们从自己的这一选择中得到满足。人们可能会认为，只有成功的丈夫，才能使那些在童年时候就接受了“妇女的位置在家庭里”

的价值观的女性，能够真正选择在经济上依赖丈夫。从一般的标准来看，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并没有能够学有所用，也没有培养出该自立时就自立的能力。工作和家庭之间所作的性别分工，无法预示遵循这类职业生涯的妇女的婚姻所具有的持续生命力，尤其是在孩子离开家庭之后，尽管所有的人都积极参与了这样或那样的社区活动。[29]

仅仅就这些价值观本身而言，常见职业生涯可能是样本中大部分女性曾经期望过的生活方式。然而实际上，大部分人只是因为有了孩子或需要操持家务才暂时停止了工作（双轨式模式），而经济的压力和婚姻的破裂，则使另外一些妇女采取了和少女时代的抱负不相一致的角色和价值观（就业和持家的不稳定模式）。双轨式职业生涯模式在经济未受损的妇女中更为常见（表10），不过也仅仅局限于那些出身于劳动阶级的受损妇女。

表10 已婚妇女的职业生涯模式（到1964年止）

（按照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职业生涯模式[a]	已婚妇女的百分比				
	经济受损		阶级出身		合计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1. 固定的操持家务式生活，即：没有工作历史，在离开学校或短期失业后很快就结婚	9	7	9	6	8

[29] 随着丈夫和妻子活动分离程度的提高，对婚姻的失望也逐渐增强。参阅丁迪扎德：《家庭中的社会变迁》(1968)。

2. 常见就业模式：结婚、持家后再也不工作，即：离开学校后就业，但结婚或有第一个孩子后就不再工作	4	36	24	25	25
3. 双轨式：有孩子或持家时暂时不工作，然后又去工作	44	29	21	47	34
4. 不稳定式：因健康、经济需要或迁移等原因，在就业和持家之间不断转换	22	19	21	19	20
5. 延迟就业，结婚和持家后才第一次就业	13	5	12	3	8
6. 其　他	9	5	12	0	6
	101	101	99	100	101
	(23)	(42)	(33)	(32)	(65)

[1] 取自 M.C. 麦克马维：《妇女职业生涯模式预期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1。

用三种不同职业生涯模式——常见的、双轨式的和不稳定的——对妇女生命历程的概述，表明了这些妇女在实现其价值观时受到各种境遇的限制。除了完全没有工作经验外，职业生涯中的常见模式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最完美表述，但是对于许多在少女时代就偏好这种生活方式的妇女而言，对于那些不能因丈夫的收入和稳定婚姻而逃脱经济压力的妇女而言，这并不是一种可靠的替代性选择。正如我们在不稳定职业生涯模式的妇女身上看到的那样，那些对就业没有什么兴趣的

妇女，有大部分在结婚或孩子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停止工作。这些妇女并不比常见职业生涯模式的女性更不偏好家庭，也非阶级出身更低，但是她们倾向于在更年轻的时候结婚，平均来说通过婚姻获得的地位也较低，并且有着更为复杂的婚姻史。

与常见职业生涯模式的群体相比，经济压力也是双轨式职业生涯妇女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生长在劳动阶级家庭，嫁与处于中产阶级低层和或劳动阶级的男性，而且婚姻也不稳定。与常见职业生涯群体或不稳定职业生涯群体的妇女相比，这些妇女在少女时代对家庭活动更不感兴趣。在1964年的调查中，这个群体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回忆起曾"试图找一份工作"，这是样本中惟一表达了对职业强烈兴趣的妇女群体。根据比较，我们发现，与这些女性在大萧条中的家庭背景或相关价值观的影响相比，她们成年后的生命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更能影响她们的工作生涯。

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女性在社区中的相关角色。对于样本中的女性而言，成为社区组织成员的可能性，随着她们教育程度和阶级地位的提高而增加，这在有着较高社会地位和常见职业生涯模式的女性中最为普遍，而就业在地位较低的妇女中最为常见。如果我们把这些妇女成年后的地位和工作角色也考虑在内，家庭经济受损的背景根本不会使她们在参与社区活动方面出现什么差异。

下面是关于阶级和经济受损对于成年人生活影响的说明。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与来自劳动阶级的妇女相比，30年代的经济受损对来自中产阶级妇女的生命历程和价值观有着更为持续的影响。这些差异表现在婚龄、教育程度和对持家的满意度上。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女儿们相比，中产阶级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们在少女时代可能更重视家庭，在成年后更

看重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也倾向于早婚，在获得中学文凭后也更可能放弃正规教育。与家庭经济受损相关的这些因素，在来自劳动阶级的女性中更为普遍，它们并不会因经济受损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阶级差异反映了关于妇女角色的传统观念（对劳动阶级的）相应的影响，也反映了对家庭的艰辛和紧张（对中产阶级的）所带来的适应性结果。与更高阶层的妇女相比，早婚、有限的教育程度和更重视家庭，是劳动阶级妇女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中看到的，是在一般能够提供家庭生活之外其他选择的情境中，家庭的经济受损和适应性对于操持家务的意义。在这一群体中，大萧条的经历在许多女孩的生活中产生了传统式的后果，可是这些女孩在1930年前却不太可能生活在极为传统并且有着性别差异的文化之中。

早期家庭生活和成人职业生涯对婚姻成就的影响

无论是妻子把一切都贡献给了自己的家庭，还是良好的经济状况，都不能保证婚姻一定是成功的，但是我们更难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妇女的早期经历中找到能让她们保持乐观的东西。从结婚开始，这些妇女似乎就注定陷入了夫妻之间无休止的争执之中。极度的经济艰难绷紧了她们对于家庭的感情纤维，而且在经济就要崩溃的时候，她们所面临的命运是婚姻的不幸或婚姻的失败。与那些在经济未受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妇女相比，在这些妇女的家庭生活经历中，婚姻紧张和冲突、诸多不满、酗酒、感情饥渴和家庭破裂更为普遍。她们常常和父亲关系紧张，并在感情上保持距离。尽管她们在30年代对母亲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也有相当多的女性在回忆起母亲的时候持一种否定态度。在这些情况中，有一部分与早婚及其短暂性所带

来的高风险相关。

这些早期经历的重要性因为下面的假设而变得重要了：通过家庭生活的引导，女孩们在知识、动机和信念上都倾向于婚姻角色。无论父母的婚姻是否成功，或者是否对她们有吸引力，都成了这些女孩今后婚姻生活中夫妇角色的模仿对象，而且她们的童年生活就决定了她们的婚姻能否成功。假如把这些女孩的境遇差异考虑在内，这种观点就和代际传递的权威模式的假设相一致，而且也能在数据中寻求到支持："父母处理自己婚姻关系的能力能够传递给孩子，能使她们提高自己婚姻成功的可能性。"[25] 在回溯性研究中，有人曾提到父母的婚姻调适与后代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对这种传递过程的机制所知甚少。无论如何，研究表明有些女性非常了解父母对她们的影响，但并不认为这是她们想要的遗产。

这种理解并不是源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或男性婚姻生活的质量，因为这些人的婚姻也与样本中其他成员一样持久或幸福。实际上，他们的初婚更可能维持到 1960 年，尽管这种差异太小了因而并不那么可靠。根据 1958 年和 1964 年的报告，婚姻幸福并没有因家庭经济受损或阶级出身的差异而有什么不同，甚至就不同成人地位进行调整时，结果也一样。这些结果，尤其是在我们没有把配偶的早期经历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并没有排斥奥克兰样本儿童时代的经济受损和婚姻成功之间的关联，但是它们的确表明在纵向研究的设计中，需要对代际间的模式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

[25] R.希尔、J.奥尔德斯：《婚姻和父母身份的社会化》，见 Goslin，1969，第 893 页。他们在这里具体提到的一项有关婚姻调适的开创性研究，是 E.W.伯吉斯、L.S.科特雷尔的《预测婚姻的成功和失败》（纽约，1939）。

这是一种悖论：婚姻最为幸福的妇女，或者嫁与了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极大成功的男性，或者嫁与了处于较高管理职位或身为专业人员并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而根据我们对奥克兰男性的分析，正是这个群体中的男性，更可能把自己的职业兴趣放在其他考虑之上，对他们来说，陪伴妻子和孩子的责任、社区的义务都必须服从于他们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他们每个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都要参与和家庭成员不在一起的各种活动。对我们样本中的大部分男性而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愿的投入，他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不言而喻，这就意味着这些男性很少陪伴在妻子的身边，这本来是婚姻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从时间角度来考察婚姻生活，那么至少有一项纵向研究表明：丈夫在职业上和组织上的外部认同(external commitment)，与短暂婚姻、意见分歧和快乐减少的可能性直接相关(Dizard，1968)。尤其从妻子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迪扎德(Dizard)发现，如果妻子能够参加工作或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可以共享丈夫的某些经历和偏好，那么婚姻就更不可能解体。然而，从早婚到中年时期，婚姻幸福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对家庭之外的活动认同最少的夫妇。

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变化是否发生在那些嫁与成功男士的奥克兰女性中，因为我们缺乏这些妇女在40年代婚姻生活的资料。不过在1956年和1964年的追踪调查中，我们的确发现她们最可能以丈夫为中心，而且对婚姻表示满意，[22] 和地位较低的妇女相比较，她们对和丈夫的工作连在一起的收入和声望更

㉒ 从十分量表(1964)来看，报告的婚姻幸福程度随着社会阶级的上升而上升($r=.22$)。在样本的男性中，也有相似的关联。

为满意，她们也不特别挑剔工作的要求。[27] 在所有这些方面，丈夫成功所带来的回报，包括他自己的成就感在内，都超过了陪伴匮乏所需要的补偿。我们还要去看看这种满意程度是否会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持续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与那些兴趣在于自己职业的妇女相比，那些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妇女从家庭活动中得到了更多的东西。通过对这些女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成就感和身份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而且对于那些将会减少丈夫陪伴以及陪伴孩子时间的职业要求也更为敏感。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对于这种安排是相当合适的：这种安排把丈夫和妻子的活动截然分开，前者的角色是养家糊口者，后者的角色是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这种价值观通过使妇女的职业生涯或就业位置尽可能往后推，而使她们对丈夫的依赖性最大化，而且增加了她们丈夫投入职业生涯的合法性，尽管工作可能是很繁重的。这里，我们的兴趣是遵循常见职业生涯模式的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根据性别的分工，在那些刚结婚或婚后不久就不再工作的妇女的生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而且她们的婚姻依旧保持完整，并且感情上也得到满足。价值观和社区角色可能都是这幅婚姻图景的组成要素。尽管这些妇女把家庭中的妇女角色放在优先地位，但她

---

[27] 我们用妇女对于丈夫工作的三个相关方面——收入、社会声望和未来前景——的回答来构建一个由三道题组成的指标。对每道题的回答按照下面的标准评分，然后再累加："非常喜欢"(3 分)，"有点喜欢"(2 分)，"既不喜欢也不讨厌"(1 分)，"有点讨厌或者非常讨厌"(0 分)。分数的范围从 0 分到 9 分。对整个样本而言，这个指标和 1958 年的社会阶级有关($r = .28$)，也和经济受损有关($r = .14$)。后一种相关完全源自经济受损和婚姻成就之间的关系。有关婚姻流动及其态度相关性(attitudinal correlates)的更为详尽分析，见埃尔德：《婚姻流动、成人后的角色和人格》(1970)。

们还是卷入了一系列社区活动，并且常常和她们的丈夫分享对这些活动的兴趣。

大萧条经历对妇女角色的影响

战后，妇女对家庭的专注和“婴儿潮”是一致的，代表了30年代早期（在奥克兰样本中）经历了严重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们最为普遍的想法。她们对家庭角色的偏好，部分是家庭对经济受损的适应性所带来的未预期后果，部分是她们参与家务活动和母亲在家庭事务中的中心地位所带来的未预期后果。正如家庭的生存常常以母亲和女儿的贡献为基础一样，女儿常常把她们成年后的基本角色定义为服务于自己的家庭。对于这些“大萧条的孩子们”来说，家庭生活的中心地位，可能也表达了他们清除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精神上的沮丧”的希望。正如这一代人中有人提到的那样：“重新获取我们父母生活中曾失去的平静。”㉘

时代精神、神话和从现实世界的归隐——这些或其他令人敏感的概念，解释了战后年轻女性中的隐逸主义（privatism）和对家庭的挚爱，给人们留下了我们了解或解释这种现象的印象。其他有关战后趋势的“理论”论及了在战争中家庭分离所带来的创伤和愤怒之情，论及了退伍军人对于“传统”家庭生活补偿性的兴趣，甚至论及了斯波克（Spock）的《婴幼儿保健》中的原理。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在他的论文《斯波克的挑战》中，在论及优秀医生手册通过强调妇女的家庭角色和孩子抚育这种

㉘ J.阿德尔森：《妇女的解放是一种短命的时尚吗?》，载《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3月19日，第94页。

挑战性的任务,来鼓励美国(中产阶级)的女性关爱家庭时,进行了广泛的推理(Slater,1970,第64页。)这样,抚育孩子就耗费了那些本不需要用于家务的时间,这和有关妇女的帕金森法案(Parkinson's Law)一致:"增加工作以填补用于闲暇的时间。"[29]"尽管有许多条件和疑虑的限制,但大部分中产阶级中具有斯波克取向(Spock-oriented)的母亲内心都深深相信,如果她们的工作能够完成得足够好,那么她们的孩子将是富有创造性的、聪颖的、对人友善的、慷慨的、快乐的、勇敢的、自觉的和善良的。当然,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特殊道路"(Slater,1970,第64页)。

我们的数据表明,无论40年代的家庭氛围如何,那些接纳传统角色的妇女,大多成长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女性成员的经济受损家庭。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妇女相比,从青少年时期到30年代末再到中年时期,专注于家务更多地是这些妇女生活方式的特征。她们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对于家庭活动更感兴趣,如果她们属于中产阶级,还更可能早婚。在每个阶级(1929)中,如果与经济未受损的女性相比,她们进入大学的比例很小,但是嫁与中产阶级上层的比例却相当大。除了价值观之外,许多因素都影响着这些妇女寻找有薪职业的决策,而且她们总的工作经历没有因其在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背景而出现显著差异。然而,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儿们最可能在结婚时或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停止工作。如果这些女性来自中产阶级,那么她们将更喜欢操持家务。家庭偏好的意义首先集中于孩子的价值上,其次是婚姻给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好处。

在30年代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们与二战中丧父家庭的女

---

[29] H.L.威伦斯基:《闲暇的不平均分配:经济增长对于自由时间的影响》,载《社会问题》,第9期(1961),第53页。

孩们之间,在地位和学习经历上,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下,父亲都无法再维持家庭了,责任全都转到了家中的女性成员身上,而且强化了家庭中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就我们所知,女性参与战时工业,并没有削弱男性缺场对于女性家庭认同的影响。从我们对奥克兰样本的分析来看,有理由认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控制着家庭运行的妇女的传统抱负,与二战中丧父家庭中的女性童年经历有着某种联系。

第九章
人格对成年人经历的影响

个人的清醒理智，是对生活提出的问题做出反应的一个必备条件……这表现为现实主义、适应性以及建立在内心坚定不移原则基础上的责任感的形成。

弗兰克·巴伦[1]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召唤新型适应性的境遇常常和转变或变迁的时点联系在一起，比如结婚和为人父母、工作境遇的变化、配偶死亡或离婚、最小的孩子离开家庭。能够应付这些境遇却不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不应有伤害的能力，一般都被当做衡量心理健康或心智健全的一个指标。这令我们想起了奥克兰父亲在面对失业和贫困时的不同反应：有些人似乎为了维持全家的生存投入了自己的"全副身心"，而另外一些却推卸家庭责任，整日酗酒。出现这种鲜明对比的原因，除了外部支持(external supports)的不同和机会的变化不定之外，还可能有适应性资源(adaptive resources)的差异。

研究者对于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的兴趣，传统上都集中于疾病或伤害上，虽然大家都知道身体健康和正常的人不仅仅是没有患病症状。[2] 本章是有关奥克兰出生组分析

① 选自F.巴伦：《大学毕业生的个人才智》(伯克利，1954)。

② 在过去十年，对于心理功能的研究明显从强调精神疾病转向强调精神健康；比如，参阅布拉德伯恩的《心理健康的结构》(1969)；桑福德的《自我和社会》

的最后一章，我们将采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心理健康及其与家庭经济受损、成人境遇之间的关系。这种视野始于表明这些人受到伤害的证据，终于政治和观点上的问题取向（problem orientations）。疾病、有效的适应和心理发育，主要是根据1950年的临床诊断来评估的。在对父母身份带来的人格后果进行评价之时，我们将把研究对象对于健康、能力、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印象纳入分析之中。这种主观印象，对于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许多成年人来说，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在对婚姻生活以及对30年代以来生活经历进行回顾的过程中，这又成为一个潜在的危机点。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从健康这一具体层面转向政治和未来观中的问题的定义和取向。

童年经济受损对于成年后健康的影响

儿童时代的家庭紧张（family strains）和情感痛苦（emotional distress），增加了孩子们在以后生活中患病或受到伤害的风险。这一假设，在第二章中得到了部分的支持。这种持续性主题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成年后健康之间这种得到广泛认可的关联中。从大部分指标来看，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孩子们的生活中，大萧条中生活压力沉重的环境比较普遍，但是这种环境给孩子成年后的健康所带来的风险，还取决于许多因素，既包括那些能够影响家庭经济受损产生心理作用的因素，也包括那些影响从儿童时代开始健康状况保持持续性的因素。

(1966)。精神健康这个概念中所蕴涵的价值观，M. B. 史密斯在《重新思考"精神健康"：心理学中有关价值观问题的特殊案例》中曾讨论过，这篇文章见《美国心理学家》，第16期(1961)，第299—306页。

这两个方面的证据都令我们认为，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成年人的健康受到经济受损的负面影响最大。

在我们的文献回顾和分析过程中，确定了适应潜力的阶级差异，这种潜力把经济受损带来的更为持久的心理代价和低下的家庭地位联系在一起。对于奥克兰出生组的成员而言，这既包括劳动阶级中经济上的贫困更为严重，也包括这个阶层的父母和孩子所拥有的资源更为有限。客观的经济受损、失业的父亲、支离破碎的家庭和依赖公众援助，几乎都发生在劳动阶级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如果把这种经济受损看做是一个问题，那么这种阶级差异没有那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在中产阶级中它威胁着经济受损家庭的地位，尽管这些中产阶级家庭更可能把它界定为可能会遇上的或者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奥克兰父亲而言，无论是因为他们的机会、教育程度，还是因为他们的恢复能力，他们失业的持续时间都没有中产阶级的那么长。适应性潜力的阶级差异，还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来：无论是否蒙受经济损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都更为尊敬他们的父母，他们也更为聪明、更为同龄群体所接受以及更加自信。

无论是对于中产阶级还是劳动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这些阶级差异在适应方面的意义，与我们观察到的情感痛苦症状和经济受损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在这两个阶层中，神经过敏、不快乐、多愁善感与家庭经济受损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健康方面的阶级差异，还受到影响心理症状持续性的各种条件的作用（参阅 Dohrenwend and Dohrenwend，1969，尤其是第9—11 章）。如果这些孩子成年后又遇上了在大萧条中导致情感痛苦的境遇；如果对于家庭境遇的情感反应，因为可以获得支持、关心和爱护等而获得了另外一种价值；如果经济艰难导致他们在处理困境时存在心理匮乏，那么上述心理症状最可能持续

下去。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阶级的后代成年后比地位较高家庭的成员更可能蒙受经济损失，因为他们的职业和婚姻成就的平均水平相当低，他们中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依旧留在劳动阶级中。其次，由于从属价值观而持续下去的社会因素诱发的情感痛苦症状，在社会底层更为恶劣的环境中最为普遍。情感痛苦的症状由于从属价值观而持续下去的例子，可以看看那些过度自怜的母亲：她们在大萧条中扮演的是长期忍受痛苦的角色，孩子长大成人后她们依旧如此。在最后一种情况中，无论对于年轻人还是对于老人来说，有限的收入、教育程度和适应性技巧对于心理伤害造成的众所周知的影响，都会使来自劳动阶级压力沉重家庭的孩子在成年后面临最大的健康风险。[3]

如果用为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紧张所做的准备来评价成年前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成长于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们在健康风险上的重要差异，用境遇需求与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对这种差异进行最为简单的描述。严重的经济受损使孩子们所面临的境遇需求明显地增加了，这些需求有时多得令孩子们无法应付。无论他们从艰难中能够获得何种益处，这些为成年生活所做的准备，都取决于他们在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情况下怎样妥善地安排一切。作为对于艰难处境的反应，成功的适应长远来看总是不太明显。实际上，也许有人根据有关社会运动的文献辩解到：处于经济受损境遇中的不满，如果说不足以使人们确定所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具体行动，那么也是迫使人们这么做的关键时刻。不满和愤怒不是对于家庭收入锐

③ 兰纳和他的同事发现，“父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患精神病的概率，是父母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孩子的两倍。”T. S. 兰纳等编：《城市的孩子们：富裕、贫困和精神健康》，见 Allen，1970，第 10 章。就我们分析的目的来说，这种结果的重要性在于，经济状况对于父母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孩子的影响最为严重。

减(一些家庭的收入在1929年到1933年间减少了65%)的不恰当反应,或者说缺乏适应性的反应。当不满没有融入建设性的行动之中,而是导致不与他人来往,或者把不满本身作为最后的结果时,障碍就出现了。

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员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在于在无法检验或挑战其适应能力的生活境遇中,他们在被保护的童年中"一帆风顺",无法培养起今后生活所需要的适应性技能。桑福德在一篇对于心理健康的调适性进行解释的评论文章中提到这一点:"一个人如果非常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周围的环境,或者他所处的环境极为简单或对他有保护作用,那么他就不需要处理某些极度紧张的状况。他所处的环境,可能提供了他需要的全部健康,甚至可以提供任何可预期的未来中他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依旧相对缺乏处理不同的极度紧张状况的能力"(Sanford,1966,第30页)。在麦克法兰的纵向研究中,她对于成年前过着"信任所引导的生活"(confidence-inducing lives)的某些成年人地位的观察,也暗示着这个因果假设。"他们还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时候,不用面对极度紧张的情况;他们展现了非同寻常的能力和/或卓越的才华、在功课上表现突出、过分沉溺于成功的幻影之中……(但是)在他们年届30之时,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成了脆弱、不满和迷惘的成年人,他们巨大的潜力没有变为现实,至少在目前是如此"(Macfarlane,1964,第121—122页)。在奥克兰样本中,至于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相对富裕家庭的成年人,是否缺乏促进其发展的经历,我们还没有结论性的证据。然而,作为我们强调的家庭经济受损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的参照物,这种风险在此也值得一提。

这些孩子成年后的健康数据,基本上是在两次追踪调查中收集的:1953—1954年和1958年。第一次是通过全面的体检、

一系列访谈和人格调查获取的。一名叫路易斯·斯图尔特(Louis Stewart)的临床心理学家,根据众多的信息构建了一种精神病的分类(psychiatric classification),重点强调伤害或疾病的具体类别。[①] 我们给这种分类补充了更新的有关酗酒的资料。从建立在1958年访谈的文字资料基础上的这两类测量方法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心理作用的更为全面的观点:在已卸任的苏珊娜·理查德(Suzanue Richard)指导下的一组心理学家,对自我作用(ego functioning)进行了临床评分;[②] 杰克·布洛克(Jack Block)以Q类描述(Q-sort description)勾画出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人格种类。[③] 斯图尔特的健康群体、理查德的临床评分和布洛克的人格种类,代表了理论和方法论偏好上的明显差异;但是作为疾病或健康状况良好的指标而言,它们合起来是有价值的。我们在下面所要进行的分析中碰到的基本障碍就是:没有一种测量方法对于样本中所有的成年人都适用。因此,对我们所获得结果进行的任何解释,都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偏差。

斯图尔特的分类包括一个以相对没有症状而界定的群体和五种疾病类别。为了把样本中的成员归入适当的群体中,对那

---

① 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所运用程序的详细描绘是现成的,可以通过个人发展研究所(伯克利)获得。对于决定成人心理疾病先决因素的早期分析,可参见L.斯图尔特:《与成年期身心疾病发展相关的青春期的社会和情感调适》,载《遗传心理学专刊》,第65期(1962),第175—215页

② 对编码程序的描述,参见S.理查德:《动态的和认知的人格变量》,见《奥克兰发展研究备忘录》(伯克利:人类发展研究所,加州大学,1961)

③ 在布洛克的项目中,有三位训练有素的评判者总结每一位研究对象的访谈资料,然后把100个评语(比如"天生柔顺")分成九维,极端的一组包括最符合或者最不符合研究对象的评语。评判者对于每一位研究对象的评分都要加以平均,得出一个有关这个人的单一描述。然后把衡量Q类描述相似程度的Q相关进行分解,产生普遍的人格种类。有关评判过程的详细说明,参阅J.布洛克:《随着时间流逝的生活》(1971),第3章

些生理和心理上都有疾病特征的人，首先根据他们生理上的疾病归类，再根据主要的症状类型进行归类。对于那些既没有被归人行为失调群体又没有被划为身心失调群体的所有研究对象，要计算其疾病分数(illness score)：把他们健康记录上所记载的成年后患病的次数、患慢性病的种类和手术的次数累加起来。如果研究对象的指标属于较低的第三类，则属于无症状群体。焦虑和紧张状态指的是神经紧张、感情上的紧张和焦虑、忧郁导致的生理疾病；身心失调的疾病，指的是那些最经常被定义为身心失调的、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的生理失调，比如胃溃疡、原发性高血压、偏头痛、痉挛性结肠炎、哮喘等；精神错乱，包括所有有神经病史的对象；行为失常，所有的这种人都在一个或更多的重要生活领域中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比如精神病治疗史、酗酒、特别难以维持和异性的关系、由权威的冲突和经常性失业所表现出来的职业欠发展等；生理上的疾病，其中的个案包括那些有心脏病、癌症和动过大手术的人。在所有的样本中，将近有1/4的成年人总的来说非常健康，有类似数目的人被归为身心失调的群体，接下来是行为失常和生理上患有疾病的群体(每一类的人数约占个案总数的1/5)。除了身心失调外，这些类型在女性中稍微普遍些，但是个案的分布并不因性别而有什么差异。

我们先比较了每一类疾病中哪个阶级的人患病最多，然后再比较每一类疾病中患病的人是否会因家庭经济受损而出现差异。第一种比较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中产阶级在家庭生活和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方面处于有利的位置。和出身于劳动阶级的成年人相比，中产阶级的儿子和女儿们更可能属于无症状群体(15%对27%)。如果排除生理上的疾病这一项的话，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这种差异表明，我们可能会发现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尤其是在劳动阶级中)所带来类似差异；但是当

这种分析扩大到所有样本时，我们得不到这种结果。为了搞清楚这种结果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些研究对象的阶级出身考虑在内。在较低阶层中，疾病和家庭经济受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中产阶级中就不是这样。和其他所有群体相比较，有着经济受损中产阶级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在最为健康的成年人中的人数不成比例。他们中间大约有2/5的人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7] 因为家庭经济受损并不会因为研究对象的性别而出现什么差异，所以在表11中是把男性和女性的这些差异放在一起表示。

表11　男性和女性被确诊的疾病类别(1954)

(按照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健康状况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相对无症状	11	38	18	13
焦虑和紧张状态	11	7	27	21
身心失调	29	21	36	17
行为失常	26	7	9	25
生理疾病(严重)	20	19	9	17
精神错乱	3	7		8
	100	99	99	101
全部个案数	35	42	11	24

注：在最初分类的时候，表中删除了两个儿童时代的类别。

[7] 经济未受损群体和经济受损群体(中产阶级)之间在无症状人数的比例差异方面，在统计上是显著的($\chi2=7.2$，1个自由度，$p<.05$)。

经济困难在健康问题上导致的主要阶级差异，表现在行为失调这一类疾病中。这些孩子成年后生活中一个或多个领域中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在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中更为普遍，在出身于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们中也很普遍。到1964年为止，这种差异也表现在酗酒上。这些数据来自完成于1953—1954年的医疗记录，1958年访谈时被访者对某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还有1964年进行的入户访谈。我们把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分成五类：有极其严重问题的、有严重问题的、有中度问题的、有轻微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在这些成年人中，有稍多于1/3的人属于酒鬼或酗酒者。

酗酒者、酒鬼或不喝酒的人，在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的成年人中更为普遍(43%对24%)。这种差异在女性中稍微大一些。而在较低阶层中，这种比例反了过来(36%对45%)。生活上各种问题的出现，常常是因为无法自控或自律，而这又是酗酒者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奥克兰男性中，那些酒鬼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这些特征：过分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冲动，而且更为放纵自我，更持怀疑主义，更加桀骜不驯。[⑥] 这些特征和因不同原因集中出现于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和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中的各种条件有关，其中包括缺乏父母管束、自律和责任感。正如布洛克观察到的那样，那些接纳了生产性生活纪律(disciplines of productive life)的孩子们的父母，在作为父母、同事和工人的角色中都会展现这些品质。“父母们的贡献在于为孩子提供榜样和动机，引导孩子们把握特定的行为方式和

⑥ M.C 琼斯：《决定成年男性饮酒模式的人格相关因素和先决因素》，载《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学杂志》，第32期(1968)，第2—12页。

大萧条的孩子们

时机，使他们脱离那种未经塑造的和依靠直觉反应的'自然'状态"(Block，1971，第263页)。

人们可能会提出，导致这些研究对象健康状况不同的基本原因是他们成年后的境遇，而不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或经历。而观察到的成人健康状况和家庭出身(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获致地位(achieved status)的不同而产生的。实际上，大量的研究都提及了代际流动或者地位获致和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奥克兰样本，尽管这两者之间的因果顺序是颇成问题的(有关奥克兰研究对象的文献和数据的综述，参阅 Elder，1969b and 1970)。他们成年后的地位或者健康状况是基本的先决因素吗？或者最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相互作用的？无论如何，与那些和父亲地位一致的男性相比，那些在工作生活中获得了比自己父亲更高地位的奥克兰男性，更加能干，更具有责任感，道德观念更强，目的性也更强，而前者则常常被看做是脆弱的、容易感到沮丧的和自己打败自己的。女性样本中的地位差异，更不是来自于她们心理健康的不同。

无论是在由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定义的哪一种背景中，斯图尔特的分类中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可能性都和成人地位(adult status)相关，但是地位并不能解释我们关于中产阶级成年人的发现。尽管在男性中，家庭经济受损的不同使他们的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出现了差异，但是对他们的职业成就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在女性中，甚至和经济受损相关的婚姻成就，也无法解释为何来自经济受损家庭女性的健康状况更令人满意。

这种或那种持续的健康问题，一般都意味着这些研究对象在应对生活境遇上遇到了困难，但是它们并不能辨别和环境、挫

折或者成就相关的潜在模式(underlying pattern),或者控制内在的情感、冲动或需求方式。尽管失败常常会增强个人和环境互动中的恶性循环(regression tendency),但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会导致心理困境,导致希望的落空、信任的匮乏和适应性效果的不佳。当一个人的适应能力无法达到环境剥夺或匮乏的要求时,就会进入一种"社会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social causation)"中,碰上"使他不敢再次尝试的失败。对于他人是挑战的事物,对他却成了威胁。他全神贯注于保护他生命中的小小权利,但是却以牺牲投入建设性竞争中的精力为代价。他渐渐地在获取知识和技能方面落后于他的伙伴们,而这些知识和技能是他在尝试之时要获取成功所必备的"(Brewster Smith,见 Clausen,1968,第 277 页)。

通过成功地处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这些过程就反了过来。掌握全局能够增强一个人处理事务能力的信心,增强他对于自己的作用和获得所希望后果的信心,同时又使自己对于能够建设性地参与这一切感到满意。一般来说,"如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确实能够控制局面,那么此时有机体的状态已经比问题刚刚发生时的状态更好,这是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的:如果再次发生同样的问题,有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Scott and Howard,见 Lewine & Scotch,1970,第 272 页)。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困境中能力的适应性才能(adaptive capacity),反映了这种建设性的参与过程,反映了一种以环境为中心的积极应对策略;把个人的需要和他们的满意度与现实的需要协调起来;反映了一种即使面对阻碍之时,也能够继续努力和维持关系的才能;反映了从错误、挫折中吸取教训和成长的复原力和适应力;还反映了根据内在的既定原则筹划和利用资源的才能。无论怎样分类,健康问题的存在与否,似乎都无法让我们知道个人

对生活问题做出回应的这些特征，以及它们和大萧条经历的关系。

在下面对成年人的心理能力（psychological competence）的讨论中，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在自我与境遇的相互作用中的主要倾向：是积极地妥善处理问题的倾向，还是消极地以自我保护为中心的倾向。第二个是大萧条中的痛苦症状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如果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由困难境遇引发的情感紧张症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症状的消失反映了问题解决的潜在过程。如果我们关于中产阶级后代适应性潜力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在大萧条中所感受到的压力是最为短暂的，也最不可能预测这些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女们在成年时的相应状态。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后代从童年到成年时的持续性更为明显，而这种情况在有着劳动阶级背景的成年人中更为普遍。

当我们第一次收集有关成年人能力的数据时，我们从理查德对于心理功能的机制和认知方面的评估中，选择了一组五级量表。这些方面被描述为自我的效力（ego strength）、个人的整合（personal integration）、天赋的运用、发展的潜力与对冲动的接受和现实控制。所有的评分都是以 1958 年的访谈记录为基础的。对这些量表来说，评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inter-rater agreement）的平均值为.72。自我的效力指的是承担责任的能力，是在努力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持续性和恢复性，是为了内在的既定价值观而推迟享受短暂的快乐。这些能力通过生活境遇、用对挫折的忍耐性和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证明。个人的整合是用这些人的生活来证明的：他们能够根据内在和外在的环境变化灵活地调整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是持重和富有预见性；他们能够把洞察力和对冲动的现实控制、内在潜力的有效运

用联系在一起，并能把获得渴望的目标成就的努力协调起来。天赋的运用指的是他们童年时代的天资可能导致的结果与成年后所获得成就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他们的职业角色。在人的一生中，发展的潜力考察的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是克服个人和环境的障碍的能力，是完成生命中主要任务的能力。最后，对冲动的接受和现实控制，表明的是一种对需求的了解，是根据社会适宜性来表达、抑制或升华它们的灵活和审慎的能力。

总的来说，这些相互联系的特性描述了对生活境遇的一种有效回应。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成年后，就是采纳这种适应方式的例子，他们在心理能力和健康方面都比样本中其他任何群体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由于这些结果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相似的，因此如表 12 所示，我们在每一经济受损的阶级次群体中都是把男女放在一起的。

表 12　关于男性和女性心理功能的临床评分

（按照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划分，用平均分数表示）

临床评分 (Richard, 1958)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N=25)	经济受损 (N=30)	经济未受损 (N=11)	经济受损 (N=26)
自我的效力	3.24	3.82	3.32	3.06
个人的整合	2.84	3.43	2.86	2.36
天赋的运用	2.73	3.40	3.59	2.71
发展的潜力	2.54	3.27	2.50	2.40

对冲动的接受和现实控制	2.46	3.22	2.32	2.27

注：对于研究对象中的中产阶级来说，所有五级量表上群体间（经济受损的和经济未受损的）平均分数的差异，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p<.05$）。而在劳动阶级中，仅有"天赋的运用"一项因经济受损而差异显著。

在中产阶级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儿女在这些方面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儿女更加出色：克服困难和吸取经验的能力、为了最终成就带来的益处而暂时推迟享受快乐，运用自己的才智以获得最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这些适应策略中，天赋的运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中，越能干的人积极性也越高，这和假定的地位丧失对于动机的影响是一致的。人们一般认为艰难能够成为对抱负的一种刺激，这种解释在这些人的生活中得到了适当的支持，这些人的生活避开了较低地位的家庭和有限能力的双重阻碍。

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人格类型和家庭关系中，这两种人格类型是对成年人Q类数据图表（参阅注释⑥）进行单因素分析确定的。[9] 一种人格类型包括样本中1/4的研究

---

[9] 这些人格类型是在分析的早期阶段确定的。布洛克在最近出版的《随着时间流逝的生活》一书中，系统地比较了这些人格类型，它们是把研究对象在高中时代和中年时期（大约是1958年）的两组Q类描述结合起来进行因素分析获得的。这种分析过程产生了五种男性人格发展类型和六种女性人格发展类型。在布洛克的慷慨支持下，我们试图把这些人格类型与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联系在一起。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两项研究之间的差异实在大得无法克服，从那些结果中无法得出什么可靠的结论。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关注。布洛克的样本包括引导研究样本（也是个人发展研究所进行的）和奥克兰研究中的样本，因此每一种人格类型包含奥克兰研究对象的人数都很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布洛克的分析中，有大量的奥克兰研究对象无法归入他所区分出来的任何一种人格类型。比如，有28%的男性被归为其余样本。这些个案可能包括从青春期前期到中年时期人格特征有重大

对象，用“适应性差”或脆弱描述他们最为合适。这种样本中的男性基本上被看做是充满焦虑的和敌意的，他们关注的是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并且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不安，他们倾向于从不利的境遇中撤退，然后处于防御之势。在女性中，这些特性是和一直无法获得一再的保证、郁郁寡欢、过分自怜以及关注社会印象（social impression）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一种以健康的、适应力强为特征的人格类型，包括了样本中1/3的研究对象。这种男性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和责任感，他们的生活给人们的印象是富有成效的和兴致十足的，他们用一种过分自信的和适合自己性别的行为来表述自己。和其他具有任何一种人格类型的人相比，他们都更不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举动：可能无法满足境遇的要求，不愿意行动，自怜自惜，或者从不利的境遇中逃离。机敏、可信赖和生活富有意义是适应性强的女性的突出品质。她们被描述为热情的和生机勃勃的人，并且有着善解人意的性格。

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中，许多人不但适应性强而且富有才干，尤其是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女们（45%，经济未受损的为32%）。来自中产阶级的成年人，很少具有容易受伤害或脆弱的特征，但是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主要是经济受损父母的后代（25%对9%）。在来自劳动阶级的成年人中，从某个人的能力来看，能否控制局面，并不会因家庭受损而出现差异：其中43%被归为适应性差的人，16%被归为能够控制局面的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数据，我们可以根据成年人的健康区分出三类界限相对清晰的群体。从健康和能力来看由高至低

改变的研究对象，因为在两个时点对Q类描述同时进行因素分析，使得人格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最大化了。

依次是：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来自于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的成年人更为健康，这和他们在大萧条中的经历可能导致的结果背道而驰，或者说不同于认为他们承受着压力因而容易患病的传统看法。家庭经济受损的某些经历可能会促进这些成年人的发展，这可能源于他们的家庭资源和适应性潜力，但是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受损对于成年人的健康总的来说会有正面的影响。

考察这种影响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关注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相对富裕家庭（经济未受损）的成年人，以及他们和劳动阶级的后代在患病症状和适应性差方面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在大萧条中，他们是一个拥有特权的群体，进入成年人角色的年龄也相对较晚。为什么这些成年人不是奥克兰出生组中最为健康、最有能力的成员？看来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一直受到保护，因此在童年时代不曾面对生活的艰难，这使他们在危机中生活所需要的适应能力无法得到培养或者验证。处理和控制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中的真正（尽管不是过分的）问题，就等于参加了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准备状况（preparedness）多次被确定为决定人们在新境遇中适应性潜力和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比如，人们发现来自农村的工人的健康状况，因他们对这种工作所做的准备不同而出现差异。[10]

根据大多数指标来看，在劳动阶级中，成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受损是负相关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受损的劳动阶级面临的一系列导致压力的因素（stress factor）——破碎的家庭、酗酒、失业、缺乏公众的信任等等——时，那么这种负面关系

[10] J. 卡斯尔：《作为对压力反应的生理疾病》，见 Levine and Scotch，1970，第197页。

就令人惊讶地减弱了，并且变得不稳定。这个阶层的家庭平均收入比劳动阶级中经济未受损的家庭低很多。然而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除了这些差异和情感上的痛苦更为普遍之外，家庭经济受损程度的差异几乎没有给这些孩子成年后的健康带来什么可靠的差异。影响这些成年人健康的最为突出的因素，是他们的劳动阶级出身。在大萧条中，劳动阶级的孩子们拥有的资源——才智、抱负以及在与同龄群体的关系和学校中所获得的社会回报等——少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而这些资源能够增加他们在成年生活中适应的可能性。

我们观察到的这些健康状况表明，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孩子中，大萧条中表示其情感痛苦的各种指标主要是他们对困境做出的瞬时反应（transient response）。从自述和母亲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诸如神经过敏、多愁善感和愤怒等表示他们承受着压力的症状上，比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人严重得多，但是他们成年后的健康状况却更为良好。根据这种明显的逆转，我们回忆了30年代显示他们适应性差异的种种迹象：是积极地做出社会回应，还是消极地退缩；这些都是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孩子们成年后所表现出的症状（第六章）。那些感觉不快乐和在社交中被同学排斥在外的经济未受损的孩子们，倾向于构建一个由虚构的朋友组成的幻想世界。他们一般更愿选择虚幻的朋友，而不是同龄伙伴。根据实地观察，他们在样本中属于最不快乐、消极和不受欢迎的青少年。比较而言，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社交中的不快乐，不是用退缩或被动来表达的，而且这也不会减少他们对社交的兴趣和在同龄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

对于"瞬时反应"这个概念更为直接的检验，是比较来自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青春期和成年后心理状态之间

的关系。这种分析选择两个时期中的自述量表(self-report scale):如第六章所述,这些孩子在初中的青春期情感状态报告,用"多愁善感"或"社交中的不快乐"这两个指标来衡量;1953—1954年的追踪调查中采用的明尼苏达多重人格调查(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中的三种量表——罗森焦虑反应量表(Rosen's anxiety reaction scale)、爱荷华焦虑显示量表(Iowa manifest anxiety scale)和巴伦自我效力量表(scale of ego strength)。我们仅仅计算两组量表测量的中产阶级父母的后代所获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因为来自劳动阶级的成年人很少有完成调查的。

和经济受损父母的后代相比较,从青春期到中年时期心理状态的持续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在来自相对较为富裕家庭的成年人中更为明显。在前一个群体中,在30年代的情感紧张(比如"你是否担心发生大量你不喜欢的事")方面得分较高,表明他们在这20年来总是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同时他们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用巴伦的自我效力量表来测量)。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女们中,这些模式反了过来。也就是说,在青春期中更为多愁善感的人,成年以后在焦虑量表上的得分比经济未受损的孩子们反而低,在适应能力上比他们强。[①] 由于样本总量较小,加上我们对于这些孩子在青春期的健康测量不足,他们在"社交中的不快乐"上的差异和相应的结果仅仅具有参考

① 就整个群体来说,这些差异在男性中表现最为明显。比较这些孩子成年后的心理状态和多愁善感(初中时代)的相关性时,我们发现了经济未受损(N=18)和经济受损(N=26)家庭的男性存在下面这些差异:焦虑反应($r=-.38$ 对 .27);爱荷华焦虑显示($r=-.27$ 对 $-.20$);自我效力($r=-.44$ 对 .36)。在这些小的次群体比较中,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向的持续性。就青春期中的社交不快乐这个指标来说,这些比较中所获得的相关系数平均差为.34。

价值。不过，这些数据的确表明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年人许多是机敏而有能力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在青春期的情感困扰。

如果说经济受损的经历，是培养某些中产阶级孩子适应能力的有利因素，我们却对这种结果出现的过程或机制几乎一无所知，对大萧条中这种经历的种类或构成也一无所知，或者说也不了解生命历程中经济受损状况和适应技巧之间相互作用的细节。要了解这些情况，必须补充大萧条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家庭境遇以及父母和孩子们的详细资料。但是我们发现，更为普遍的是，这些关联在纵向研究中被忽略了，尤其在发展途径并不单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生命历程中心理模式的解释，使我们重新关注孩子们儿童时代能够预期他们成年后状态的因素，以及心理状态持续的模式。比如，安德森(Anderson)从纵向研究的数据分析中发现，有相当部分曾在家庭和学校遭遇过困境的青少年，刚刚成年时在"满足他们的义务和责任的要求"方面总是表现出出人意料的能力。他总结道："迫使他们依赖自己，能够培养出看来不同于他们早期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品质。但是要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长大了，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境遇真的改变了是非常困难的。"[12] 不过，这种事后的解释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结果是很清楚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人在

---

⑫ J.E.安德森：《对于随着时间流逝的调整的预测》，见I.伊斯科、H.W.斯蒂文森编：《儿童的人格发展》(奥斯汀，1960)，第28—72页，尤其是第68页。就安德森观察到的现象而言，莱文和斯托奇指出，对于压力毫无根据的观点还包括这种假设："令个体感到压力的事件，必然会导致破坏性的或者病态的结果。"莱文、斯托奇编：《社会压力》(1970)，第9页。对于长时间心理状态稳定性或者持续性的特别关注，可以参阅卡根和莫斯的《从出生到成熟》(1962)和布洛克的《随着时间流逝的生活》(1971)。

发展过程和生活境遇中，是如何不同于那些从青春期到成年期在处理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稳定性的人。

作为困境和成长经历的父母身份

当我们考虑某种可以检验适应能力的共同生活经历时，就立刻会想到成为父母这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甚至比结婚更意味着进入了负有责任的成年生活。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很少有别的事件能比它带来更大的变化，或者带来更多的新要求。对于劳动阶级的女性而言，这种变化尤其具有戏剧性，她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为因要照顾和哺育婴儿而必须承担的责任、面临的束缚和所需的调整做好准备。以下各个方面都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家庭之外的活动突然减少，养育孩子所带来的未意料到的要求，收入削减的限制，已经习惯了的伴侣关系和性生活的丧失。作为群体扩张（group expansion）的一种形式，父母身份检验了管理有限资源——时间、精力、知识和收入——的能力。如果认识到这些方面的匮乏，就会知道适应性需求从何而来。因此，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创造了一种新的境遇，而当习惯的模式和资源变得匮乏或者不合适的时候，这种新的境遇很快就变成了困境。[13]

在奥克兰出生组中，父母身份对经济受损的儿女们有着特

[13] 一系列研究都表明了把为人父母作为走入困境或者危机境遇的一个证据。参阅勒马斯特斯的《作为危机的父母身份》（1963）和D. 霍布斯的《作为危机的父母身份》（1965）。洛帕塔从她对于家庭主妇的深入调查中总结到："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人格出现最大断裂的是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重新开始全日制工作的时候。如果随之而来的是重新扮演以前的角色和恢复以前的关系，那么就不仅仅是一种'危机'，而且是使其生活道路完全改变的事件。"《职业：家庭主妇》（1971），第200—201页。

殊的重要性。和样本中的其他成员不同，他们从家庭活动中得到了更多的快乐，而且可能把孩子作为他们婚姻中最有价值的方面。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父母身份所带来的社会要求和限制与大萧条中经济受损家庭在经济上的社会要求和限制类似。孩子的诞生增加了消费需求，而经济受损却削减了用于满足家庭需求的供给，但是在这两种境遇中的适应性问题都导致了"根据供给削减需求"，也就是说培养管理和应用资源的新形式。这两种境遇都导致了家务劳动需求的增加，而且在奥克兰女性的生活中都带来相似的后果：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事务，同时以牺牲社区中的社交活动为代价。如果假定家庭责任一般包括儿童抚育，那么对初为人母活动的现实准备就成为在经济受损家庭长大的女性一种潜在的共同经历。从这些方面来说，大萧条经历可以被看做是为满足成为父母的适应性要求所做的准备。

除了和准备有关的事务之外，价值取向也是这些孩子如何处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的一个因素。当活动本身和某种有价值的目标或状态联系在一起时，牺牲就被假定为人们最能够接受的自我实现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的出生与在父母和社会一致期待的家庭中孩子的出生。但是我们无法假定对父母身份的接纳，是否和家庭经济受损有关。当我们在 1964 年的调查中询问家庭和孩子的重要性时，大多数成年人都谈到他们刚刚成为父母时碰到的问题，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解决。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曾承担过把孩子从婴儿培养成青少年所需要完成的全部任务。在这个阶段，孩子的价值可以被看做成功地抚养孩子所派生出来的结果。

我们首先询问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在什么年龄最令他们快乐或者最让他们感到麻烦，什么样的父母经历最令人感到满意或压力最大。为了确定这些父母经历的某些共性，我们把那

些在1964年还没有一个至少已经16岁的孩子的成年人排除在分析之外。第二组问题关注的是这些父母是否感觉自己的能力足以处理和父母身份有关的问题,重点在它与大萧条经历和生命历程的关系。一个人的生活是怎样因"有孩了"而改变的?我们从被访者的角度考察了父母经历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境遇、认为自己足以应付一切问题的感觉、个人的成长或发展。

父母们都更可能把他们孩子的某一特定年龄和麻烦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快乐联系在一起。大部分母亲无法确定孩子哪一个年龄段是最令人满意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让她们感到快乐"大概能描绘出她们的感情。根据这些父母提及孩了各个年龄段的次数来看,婴儿时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其次是中学时期(表A-30)。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快乐和麻烦的话,父母认为性成熟前期或小学阶段最令人满意,而青少年晚期,相当于从高中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时期,正如人们的一般想法那样,是最为麻烦的时期,尤其对父亲而言是这样。

最让父母感到麻烦的年龄,并不一定是最让他们不快乐的日子,尽管有1/3的父母在根据这两种标准选择时都提到了同样的一般年龄(general age)。正面和负面的极端经历同时发生的情况,从偏爱青春前期的成年人到那些表明对十几岁或青少年时期最为满意的成年人之间急速上升(从24%到48%)。

父母的满意度和感觉自己被人需要或有用武之地所带来的回报有关,和看着一个孩了长大、成熟、获取新技能等期望有关,和孩子从依赖他人到自我依赖再到独立控制一切的进步有关。当我们要求奥克兰的父母(用一种开放式问题)描述一段抚育孩子的某个时期使他们变得令人异常满意的经历时,他们经常提及这些经历,认为它们是令他们感到满意的原因。回答每一种原因的大约占1/3。正如人们预测的那样,提及父母作用(

parental usefulness)的随孩子年龄的增加而降低：有学龄前儿童或婴儿的父母提及这个原因的有75%，而孩子已上初中的父母只有22%提及，而且他们还没有提及最大的孩子。另一方面，从孩子年龄最小的到最大的父母群体，提及孩子自我依赖的人数的百分比增加了两倍多(20%到66%)。在那些认为处于性成熟前期或初中时孩子最令他们感到快乐的父母中，"成长的经历"是最经常提到的原因，比例大约是48%。

"性成熟前期"和其他任何年龄段都不一样，它给父母提供了多重满意，并且使极度依赖和极度独立之间的冲突最小化了。诸如孩子快速的成长、对父母的需要和尊重、没有同龄群体过分压力下适当的自我依赖这些或其他回报，都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和孩子上小学的年龄段联系在一起。学龄前或更年幼的孩子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他对父母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等(提及每一种资源的比例各为46%)的依赖——他的胆怯、不懂事、缺乏沟通或不能照顾自己等，以及对父母资源的需求。尽管上初中的孩子需求的种类更多：同龄群体的压力、参加不受监督的活动、上学问题、经济需求等等，而这对父母而言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父母在谈及年龄较大的孩子时，都很少提及第一类问题。在评价上中学的孩子们时，没有什么问题比独立性冲突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有3/4的父母提及这类困难。

无论是父母所面临的问题的种类，还是被定义为压力最大或最令人快乐的年龄段，都不是衡量作为母亲或父亲主观能力的可靠指标。和那些无论孩子多大都令他们感到快乐的父母(或者认为孩子十几岁时最令他们满意的父母)相比，那些感觉更年幼的孩子比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令人满意的父母，并不认为自己更无法胜任父母的角色。孩子的价值和家庭活动，也和父母对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一角色的评价无关。在这次分析中，我们用一个带

有四个选项的问题来衡量被访者做父母的能力：在1964年的调查中，我们问每一个成年人他们作为父母是否够格。除了三个被访者之外，所有的父母都承认他们曾感到自己不足以胜任父母这个角色，或者说至少在某些场合会有这种感觉：26%的人回答"大部分时间"，16%的人回答"相当经常"，55%的人回答"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将解释后面的回答，并把它作为对自己"父母身份的胜任性"(parental adequacy)的一种普遍感受。

我们通过儿童时代的四个变量寻找父母身份胜任性的源泉：阶级背景、家庭受损、家庭责任和家庭规模。作为父母身份胜任性的起因来说，父母案例、能力、家庭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技能等方面的阶级差异性，都有利于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为人父母经历的相似性，和他们的受损背景有关，和他们都曾承担过家务琐事有关，也和他们拥有众多的兄弟姐妹有关。比如，一个女孩照顾更加幼小的孩子的责任，可能随着家庭内部弟妹的增多而增强。然而，父母身份的胜任性除了和兄弟姐妹的数目有关外，数据并不支持它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在女性中，主观胜任和家庭规模直接相关，甚至在控制阶级出身和成人教育程度这两个变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和有两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女性相比，作为独生女的女性更不可能提到她们感到自己身为父母是够格的(33%对70%)。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家庭受损和他们做父母的能力无关，也和家务琐事没什么关系，而家庭地位的影响和我们的预期正好相反。那些感觉自己身为父母最为合格的，更可能是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而不是地位较高的孩子。换一句话说，感觉到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有缺憾的，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14]

---

[14] 父母身份胜任性和家庭地位(1929)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 $tau_c = -.18$。在女性中，家庭规模和父母身份胜任性的相关系数 $tau_c = .28$。

至少在表面上，父母身份的胜任性在不同阶级出身人群中的分布，与他们众所周知的人际交往能力的来源不一致，与我们关于心理健康的发现也存在着差异。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承认经常感到自己作为父母是不够格的，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于父母身份的多维复杂性（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ies）和局限性非常敏感。对于来自中产阶级并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而言，“身为父母”可能被看做一项更广泛的、更丰富多彩和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这项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满足孩子不断发展的需求。感觉自己作为父母不够格，可能会来自这些敏感性，或者因为他们给自己定下的高标准。在奥克兰样本中，成年人不胜任父母身份的相关因素，一般都和这种解释一致。在中产阶级上层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中，无论他们在大萧条中的境遇如何，或有多少个兄弟姐妹，他们都经常提及自己在做父母方面的不足之处。在他们当中（尤其是在女性中），教育程度和阶级地位都可以预测到他们扮演父母角色时为人熟知的局限性。[15] 如果把这种关系用做解释他们所表达的缺憾——无法使孩子们不犯错误或不受伤害，难于理解后代或者与后代沟通，面临激励、引导和约束孩子的问题——的有代表性的原因，其意义是明显的。这些原因绝大部分描述了和一种以孩子发展为中心的抚育模式相关的各种问题。

从这个方面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项有关美国家庭主妇的调查（Lopata，1971，第 4 章）中也有相似的发现。母亲身份成问

⑮ 对于女性来说，感觉自己作为父母够格和其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为 –.12，和她们在婚姻中的阶层位置为 –.29（tau_c 系数）。在男性中，这些关系稍弱一些。在把父母身份作为一种危机的研究中，问题的有效解决一般和婚姻的满意度有关，我们在奥克兰的父母中，也发现了 1964 年自述的婚姻满意度和感觉到自己父母身份的胜任性之间的相似关系（平均 tau_c = .07），尽管这种关系非常微弱。

题的方面，随着她们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多，虽然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母亲碰上的客观困难更多。那些受教育程度较少的母亲，常常认为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或者随随便便地提到一些"抚育孩子"的日常杂事。"这一部分人面临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而且并没有得到处理，甚至经常提都不要提。一个人要完成变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中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时，必然会面临不少问题，这就需要他至少对自己某些能力和广阔视野充满信心"（同上书，第212—213页）。抚育孩子这种活动似乎拥有无限的维度、伸缩性和扩展性，如果在上面投入过多的自我和时间，的确会给为人父母者带来心理上的风险。斯莱特在他关于中产阶级盲目迷信对于孩子的教养的笑话中，通过模仿嘲笑了这种趋势："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每一对中产阶级父母都注定要培养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们一边走一边对孩子谆谆教导，认为这样三岁的孩子就能学会看书，或者抱怨他们的孩子在幼儿园没有学到足够的东西，这一切都令人恶心"（Stater，1970，第66页）。

从预计要做父母到最小的孩子离开家，对身为父母者的需求和他们所要具备的技能都不同，关于父母身份胜任性的看法和经历也不可能保持不变。对父母身份的浪漫想像，倾向于强调孩子带来的回报：通过孩子充实自己和实现自我。这种想像和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互相冲突，导致了危机或问题的出现，因为身为父母就需要对自己的偏好和生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对于那些正在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调整自己的夫妇而言，这些现实和它们给个人带来的后果表现得最为明显（参阅注释⑬）。奥克兰样本中那些已届中年的父母们，在自我利益和责任问题上可能会持更加和谐的观点。

有关成年人有了孩子之后在生活或人格上最重要的变化，

我们用了一个开放式问题，这是为了避免预先设计答案。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回答按它们在概念上的同类性归类。有半数成年人除了提到额外的责任之外，还强调了个人在这方面的收获，比如说这培养了他们更强的洞察力、更大的忍耐性和更深的理解力；形成了令人鼓舞的有意义的价值观，而且有孩子之后感觉更年轻了；感受到了成就感、自我实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等。1/3的男性提到了他们的责任：引导、约束和塑造年轻生命等促进孩子发展的任务，促使这种影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或者是这项任务所带来的负担，这是根据它给个人造成的约束和限制——更多的关心、更少的自由等——来说的。提到这两方面的人数都一样。剩下的回答都太模糊、太笼统或太新奇，所以无法归类。

尽管男性比女性更经常提到成为父母后所肩负的责任，但是无论在哪一性别群体中，这种影响都和感觉自己做父母不够格联系在一起：2/5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感觉自己不够格，1/4的成年人承认仅仅是在"偶然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因此，对自己作为父母的缺憾的了解是和这种看法有关的：抚育孩子是一个需要身为父母的人付出很多的努力。根据一位有三个孩子经验丰富的父亲的看法，"有了孩子以后，你才会变得更加成熟。"

和成年后不同的地位和环境相比，大萧条的经历和对为人父母经历的评价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中产阶级上层的成年人比地位低的成年人更了解自己作为父母的不足之处，但是在解释孩子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上并无不同。强调父母责任是一种挑战或者负担，和家庭受损有关，而和成年人或家庭的地位没有关系。在那些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年人的童年经历中，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引人注目，他们也倾向于强调身为父母经历的这一方面。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后代更经常提到个人的满足感或充实感。提到这两种影响中任一种的成年人中，提到责任

的主要是经济受损群体(49%对经济未受损群体的20%)。在把身为父母当做负担或挑战方面,也有着类似的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家庭困难的持续影响最为明显。除了一人之外,所有根据增加的责任看待母亲身份的成年人,都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

人们可能倾向于把对父母经历的这些解释,看做人际交往能力的体现。在直觉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有两类人在心理上存在重要差异:一种成年人认为通过抚养孩子,他们会变得更富有理解力,更具有丰富的感情;另外一种人对为人父母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印象深刻。这个评判的重要缺陷在于,关于父母身份的这种观点至少能告诉我们,作为父母经历的意义与成人之前经历的意义是一样的。无论是否认识到和是否希望出现下面的结果,父母的童年都通过那些使他了解和建构自己行为的解释,影响着他现在抚育子女的所作所为。责任及其所带来的限制和挑战,都是经济受损家庭后代所具有的这个行动框架的一部分。30年代的状况增加了他们对于家庭所肩负的义务,而这种价值认同在他们成年后的价值观中得到表现。比如,那些因孩子依赖自己而感到自豪的男性,在30年代很可能生活于经济受损家庭中,而且要承担工作的角色(参阅第四章)。对于中产阶级经济未受损的孩子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的可能是自我,而他们成为父母后对个人发展的解释,一般也和这种背景一致。

回顾过去

关于大萧条经历的不同问题,是在对生命跨度的前瞻后顾之后才提出来的。到此为止,我们主要从研究30年代的状况开始,从研究家庭的经济受损、适应性和相关的意义开始,到它们

在这些孩子成年之后的人格和生活经验中的体现。考察大萧条中各种况状的另一种方式，是确定它们在成年人记忆中的意义。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记住或承认了？它们是如何被记住或承认的？下面这两种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时段有什么不同？一种人来自经济受损的家庭，而且记住了大萧条中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件；一种人没有回忆起什么特殊的艰难。如果他们承认生活曾十分艰难，是否表明他们认为30年代以来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满意？通过从已届中年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考察大萧条经历，我们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它们对于生命历程中情感满意度（emotional satisfaction）的影响。

在进行1958年的访谈之前，我们要求每个参与追踪调查的研究对象，在每一年运用十级量表来描绘他或她生活中的高峰或低谷。最为积极的评价以10分表明。为了增强这些评分的稳定性，我们把下面三个时段的分数进行平均：大萧条时期、1940—1949年和1950—1958年。关于大萧条经历的记忆，是通过一个访谈问题征集到的。所有收集到的记忆，都是根据家庭艰难对应答者的潜在影响编码的：[16] 受到极其严重影响的——家庭的处境十分艰难，而且给家庭成员带来深深的痛苦；受到一般影响的——提及某些艰难之处，尽管不是极其困难的；没有回忆起或提起负面影响的。在88个已编码的回答中，15%属于极端类别，17%属于一般类别。那些不曾谈及30年代生活曾受到经济状况负面影响的成年人，部分是因为无效的调查、被访者的防御性反应等等。在处于极端类别的成年人中，特别痛

---

[16] 两位编码者在对每一次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的时候，都运用这些分类，而且他们在稍多于4/5的个案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如果彼此间存在分歧就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妥协。

苦的经历是共同的：不得不穿用卡板纸做鞋底的鞋的屈辱，亲戚或邻居的高傲自大，靠政府救济或者看见父亲失业的羞耻，没有足够的煤使屋子变得温暖，不得不和祖父母同宿一室，父母道德沦丧和健康恶化。

对艰难岁月的记忆和客观的经济受损有关，也和生活自从大萧条起给与回报越来越多的感觉有关。在对大萧条的影响有着生动鲜明印象的成年人早期生活史中，惨重的经济受损、父亲的失业、依赖公众资助成为通常事件。处于"极端"群体中的所有成员，至少曾经历过这些状况中的一种，大部分至少经历过两种。有一位销售经理，是一位在大萧条中失去金店和大部分积蓄的人的儿子，他表达了这些被访者相对共通的印象："那时候大萧条的影响非常大，我想它使我父亲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他完全恢复过来是不可想像的。大萧条年份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年份，它好象使生活重新开始了，正如许多人失去了他们曾拥有的每一件东西。"对一般困难或压力的记忆，在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中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分裂局面。

作为评估随后生活经验的一种标准，大萧条的记忆似乎还起着某种作用。如果生活的低谷发生在30年代，那么评价今后生活变化的惟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看财富增加与否。实际上，那些记忆着极度艰难的男性和女性从30年代到中年，心理满意的感觉的确在增长，从大萧条十年的低谷爬上了后来的高峰($\overline{X}s=5.5$ 对 6.3)。在那些没有负面影响记忆的成年人中，呈现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中学时代比40年代和50年代的经历拥有更多的回报(从6.8到5.4)。成人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差异不能解释这些趋势变化的坡度，即使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变化趋势和代际间的流动模式关系很小。

记忆可以增加对过去经历的理解和接纳，那些经历——冲

突、耻辱、失去的机会等等——已经无法改变。对过去的思索，使人们"重新考虑从前的经历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而且常常伴随的是对记忆的修正或深入理解。这种对过去经历的重新组织，可以提供一幅更加生动的画面，给一个人的生活提供全新的和重要的意义"(Bulter，1963)。对生命的回顾，也可以产生对美好或成功的过去的防御性幻像，脑海中更多地被过去的幻想而非当前的现实所占据。这种幻像，无论是否定性的、选择性的回忆，还是理智上的其他花招，都暗含着记忆与大萧条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很难解释为什么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一些成年人容易表露过去的艰难，而其他人却不是这样。为了解释这种不一致性对于他们心理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临床证据和专业知识。

运用记忆来描述这些人在大萧条中感情上的满意度是存在着风险的，两位来自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1958 年，这两人就业于属于中产阶级低层的工作，都被训练有素的临床医师评价为具有高度的防御性。其中一个没有谈及或提及他在家中更为痛苦的经历，而这个家庭在 1934 年丧失了几乎 2/3 的收入。当问及大萧条怎样影响他的家庭时，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一位自雇的手工业者)做得相当好。他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所获取的财富必须足以应付基本需求，正如许多人所不得不做的那样。在他的记忆中，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十分"快乐"的时期。但是在 1934 年的访谈中，一个被访者认为他的父亲"相当灰心"，而且整个人都被这种情绪所充斥，总是长时间地独处于家庭成员之外。这个家庭刚刚失去了租赁的房子，并且被迫搬到一个亲戚狭窄的住房中。根据母亲的报告，这个男孩显得紧张、容易动怒，而且羞于带朋友回家。就积极的方面而言，这个男孩的同学十分喜欢他，而且在学生活动中表现突出、

在他成年后的记忆中，这些社会经历都是“美好的时光”。另外一个被访者对于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记忆，正如我们从30年代收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一样：收入大幅度减少，随后是母亲生病、父亲偶尔酗酒，男孩出去工作，社交生活有限。

大萧条的意象除了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外，对于传递这种经验给大萧条孩子的后代也有意义。那些无法回忆起在30年代童年时代艰难历程的成年人，与那些对艰难有着鲜明记忆的成年人相比，当然会告诉他们的孩子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奥克兰孩子成年后的家庭中，没有任何有关大萧条的道德和社会意义的记录：和孩子讨论大萧条的频率数，运用大萧条的例子去强调某种价值观，等等。然而，顺着这条线索，我们能从1965年有关加州大学学生的调查中获取一些有启发性的证据。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出生在40年代中期的171名加州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出生时间和奥克兰出生组生育孩子的时间一致。正如这些孩子的感觉那样，他们父母讨论大萧条经历的频率数和他们在大萧条中生活的艰难程度有关，而对于那些相信父母曾运用大萧条经历的某些方面来强调某种价值观的年轻人来说，这两个因素有预测作用。[17] 这些学生也最可能宣称，他们关于大萧条的知

---

[17] 父母对于历史经验的解释对孩子所产生道德伦理方面的影响，是社会化研究领域中最少涉及的问题之一。比如，注意A.古德曼的家庭经历中暗含的关联：他是一名大学生，是维护公民权益的活动家，在密西西比被白人谋杀。在他死后不久，他的母亲写道：“我和鲍勃多次谈到大萧条，难道只是想帮助我的孩子们了解他们从未看见或者经历过的痛苦吗？我们多次谈到纳粹的残酷，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和每个人都有关，甚至和无法记住这一切的我们的孩子有关吗？这些恐怖事件是我们这一代——鲍勃和我——的真实经历。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认为在密西西比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而斗争是他的事，是他们这一代的事，我会说：‘不，不，当我说一个人必须按照他的信念去行动的时候，我是在说谎吗？’”R.W.古德曼夫人与B.阿斯贝尔的谈话：《我的儿子不会白白牺牲》，载《持家有方》，第161期（1965年5月），第160页，

识大部分是从父母那学来的，而且他们本人已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突出的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包括：对社会问题有更多的想法，对当前的机会和有利条件有更清晰的意识、对经济保障需求更为重视。

在奥克兰样本中，一些成年人已经开始了解这些条件对相对较晚的生活的“真正含义”。但是很明显，他们却无法使孩子感受和理解30年代的经济受损。至少有两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父母，似乎不想让孩子们知道家庭变迁的意义。这些家庭中的一个儿子回忆到，尽管他的父亲失去了服装店，而母亲又精神崩溃了，但是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事情正在发生”。“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但是母亲再也无法承受的那一天却到来了，只是由于父亲的内在力量、决心和乐观主义使生活得以维持下去。”

在奥克兰成年人的经历中，他们的情感轨迹无论是向上或向下，都和大萧条的记忆有关。一般说来，生活处于蒸蒸日上的成年人，都把大萧条作为一次痛苦却令人难忘的经历记在心中，无论他们的家庭成就或职业角色有什么不同，他们在成年时的满意度都高于大萧条中的童年岁月。总体来说，这种向上的趋势是否和30年代经济受损状况的关系更为密切？和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年人相比，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年人是否更可能把大萧条看做生活的低谷？

为了比较生活满意度的趋势，我们根据生活曲线图（life chart）的评分，把所有的成年人分为三类：大萧条十年是低谷而成年后的生活是高峰（向上），从高到低呈现相反的模式（向下），混合或其余种类。60%的男性和42%的女性自述了向上的趋势，向下的群体包括1/4的男性和40%的女性。尽管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并不比来自经济未受损的男性获取的地位更

高,但他们最可能提到从大萧条到中年的生活满意度呈向上趋势(81%对47%)。同样,认为成年后的生活是她们生活高峰的女性,更多地来自于经济受损的家庭(54%对经济未受损的1/3)。无论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在劳动阶级的家庭中,都曾发现这种差异。

经济受损和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蕴含着一种中介概念,这种概念把家庭境遇作为一种让人感到很大压力的经历。尽管许多证据间接地描绘了对境遇的这种定义,但是我们没有充分询问奥克兰的孩子们在30年代对于家庭幸福的感觉,没有问他们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是勉强维持生计的。用来测量所感觉到的痛苦的最合适指标,是一个关于母亲情感状态的问题(例如在高中组的问卷中的"我希望母亲更加快乐")。大部分希望母亲更加快乐的孩子都来自经济受损家庭。而且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更不快乐,而且更不被同龄群体所接受(第六章)。女孩们比男孩们更易受母亲不快乐情绪的影响,而且在她们长大成人后评价自己的生活时确实更能反映这种压力。对于这些女性而言,生命中最糟糕的岁月是从初中到高中末期,因此她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分数在整个1950年代都呈上升趋势。有着忧伤母亲的女儿们,将近3/4表现出这种上升趋势;而在快乐母亲的女儿们中相反趋势更为明显,这种女性有一多半把大萧条看做生命的高峰。和这些差异形成对比的是,奥克兰男性没有因其对母亲的感觉差异而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表现出什么可靠的差异。

通过记忆和30年代的真实经历,大萧条中的艰难使奥克兰的成年人在描绘生活满意度的方式上出现了重大差异。这种观察到的差异和下面的理论是一致的:大萧条的经历建立了一个参考框架,可以依据它来确定某个生命时段是相对美好的还是

相对糟糕的。从相对的角度来看,那些牢记着在30年代曾一无所有的成年人,在更加富裕和有保障的40年代和50年代,才更可能体会到他们现在的生活境遇。

对政治和未来的透视

成年后的健康、父母身份的意义、对过去的回顾,全都指的是个体的经历。在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考察了看待和回应生活中问题的方式、它们和大萧条经历各个方面的关系以及给这些大萧条的孩子成年后的心理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就对问题的界定和回应来说,经济困难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个体的经验,成为30年代为大家所瞩目的焦点问题,而且更偏向于由政府对经济停滞做出回应。更有希望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在于集体认同,这在1932年的大选中得到体现,民主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大选胜利。

奥克兰出生组的生命跨度范围广阔,横跨了美国社会的几起重大事件:从20和30年代的孤立主义和关注于内政到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联合国的诞生,到战后欧洲的重建,到国际共产主义"幽灵"的出现和核战。奥克兰的成年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对社会的了解,都形成于30年代。当父母因事业和经济的惨重损失而感到痛苦的时候,家庭和经济问题就成了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危机中期,投票给罗斯福就表达了一种希望生活能有所好转的愿望。父母的投票和偏向民主党暗含着某种意思:"大萧条的孩子们"在政党倾向上一般都属于代际连续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都倾向于他们父母所看中的党派。⑬

---

⑬ 参阅H.H.海曼:《政治社会化》(格兰科,1959)。

这些考虑提出了这些孩子成年后对于可能和30年代经济困难相关事务的观点：偏好民主党，更加关注美国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全神贯注于国内的经济问题，对于当前年轻人所拥有的经济机会持乐观的看法。政治影响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在奥克兰成年人中，无论代际间地位如何变化，从青少年时代到中年的政党偏好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我们还从许多研究中了解到，在其他因素中，阶级地位也会导致政党偏好出现差异。比如就价值观来说，政治偏好的持续性可能要依赖于社交持续性的程度。这也适用于有关经济问题的敏感性。经济受损和对年轻人的乐观看法之间的联系，建立在大萧条经历和当前生活的对比基础之上。当他们考虑现在和未来的时候，有着家庭困难背景的成年人，会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孩子和一般的年轻人在经济方面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和机会。

我们曾提到奥克兰样本中经济受损和对民主党的偏好之间貌似真实的两条关联：父母在政治上的榜样或影响；在焦点问题和政治中，对经济状况与政治气候的敏感。这种影响超越了家庭，尤其适用于对政治开始了解的青少年晚期（也就是30年代后期）。不过，这些年份和这种年龄是不一致的。处于这种年龄的新一代最容易受政治变化的伤害，也最可能接受政治变化，这是肩负主要和全部公民责任的年龄。奥克兰的孩子们，是在40年代初而不是在大萧条中达到参加选举年龄的。不过，有关40年代和50年代的选举研究表明，民主党的纽带，更多地是由在大萧条十年或战争初期达到参加选举年龄的人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依赖于那些在相邻历史时期达到选举年龄的人。[19] 在奥克兰样本中，

[19] A.福纳：《政治组织》，见Riley编，1972，第140—144页。也可参阅A.坎贝尔等编：《美国的选民》（纽约，1960），第153—155页。

这种影响可能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中表现最为明显。

政治变迁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和样本的数目有特殊的关系，因为他们在整个30年代都是依赖父母的。如果假定经济受损的父母支持罗斯福，这就和政党选择的基础相矛盾了。比如，中产阶级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情况集中于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在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并且鼓吹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在奥克兰样本中，这些人包括自雇的商人、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从林德（Lynd）对中镇的研究（1937，第473页）中可以明显看到，在1936年的选举中，许多传统的共和党人转而支持罗斯福，即便仅仅是勉强的。[20]

为了确定父母在政党偏好的转换上对孩子的政治影响，理想的途径是测量30年代之前、之中和之后父母的政党偏好和问题取向，同时收集他们的后代在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政治态度和成年后政党偏好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惟一的选择是运用对这些成人的追踪调查（1958—1964）所获得的数据，因为我们没有收集到30年代政治方面合适的数据。这些追踪调查获得的回溯性报告，提供了有关大萧条中父亲政党偏好方面的信息。61%的父亲被描述为倾向于共和党人、30%被描述为倾向于民主党人，剩下的倾向于无党派或其他。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是有着天主教或出生于国外背景的男性。但是即使用宗教和阶级这两个变量来对数据进行调整，支持民主党这种倾向也随经济受损程度的增加而增强。中产阶级中有1/3经济受损的父亲被描

[20] 甚至顽固保守的奥伦治镇（加州）的居民，在1932年的选举中也多数投了罗斯福的票。在1936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参加登记的就比共和党人多。不过，这种变化没有改变乡镇的基本保守立场。“大萧条和它导致的政府角色的膨胀，一时间震动了这种信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它。”R. L. 普里查德：《大萧条30年代的奥伦治镇：对加州20世纪地方史的研究》，见Sternsher，1970，第247—264页。

述为倾向民主党(已用宗教和种族进行过调整),而经济未受损的只有13%。在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群体中倾向民主党人的比例是62%,经济未受损的为1/3。

对于父亲的民主党偏好来说,如果经济受损是一个带有因果关系的因素,那么它的作用会因对地位或生活条件的不满而削弱。在这里,我们假设不满与经济受损和对民主党的偏好两者都有关系。衡量不满的最有效指标,是访谈者关于母亲对自身诸多不满的评分。在中产阶级中,这个分数与经济受损有关系(参阅第三章),而且还可以因此预测父亲对于民主党的偏好。在那些母亲对其地位极为不满的家庭中,经济受损不会影响父亲的政治观点。政党偏好的最大差异,出现在用两种方式测量经济受损而得到的极端群体之间。在处于经济未受损地位和生活相对满意的条件下,父亲中声称自己倾向民主党的仅有5%,而在经济受损而且感到不满的群体中,这样做的有54%。从这些差异中,我们断定主观或客观形式的经济受损,是决定奥克兰样本中父亲民主党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两代人在政治观点上的持续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差异的重要性。有4/5的父亲和后代的政党偏好一致,而且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父亲的孩子大部分(80%稍多)是民主党支持者。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中,即使他们向上流动了,他们依旧普遍支持民主党。无论阶级地位高或低、无论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对民主党的偏好上,经济受父母的后代一直比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多(参阅表A-31)。

来自经济受损家庭成年人的政治观点支持我们的这种预期:他们十分关注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状况。在1958年的访谈中,每个被访者都要回答他们认为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为了确保和平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编码,

并且根据性质归类。尽管50年代存在着"冷战"氛围和相关的国际冲突，但仅有1/3的被访者提到这种或那种国际问题，包括全球战争。在他们列举出来的国内问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可以感觉到的生活中的道德沦丧，人们变得过分强调物质主义(36%)；接下来是经济问题——过度开支、税收、复苏的可能性或又一次萧条(32%)；种族动荡、冲突、歧视等(28%)。只有不及样本10%的人提到类似"麦卡锡主义"之类的问题，比如共产主义或颠覆分子对国内方面的影响。从二人的立场来看，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年份中，国内状况在逐渐好转，尽管时有起伏。仅有1/6的奥克兰成年人，表达了对全面复苏或严重萧条的关注。对这些话题的敏感性和过去大萧条中艰难的严重性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只有对国内状况(开支、税收)的关注会因大萧条经历的不同而不同，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不会有什么不同。对于两个阶级中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道德败坏、物质主义和相关的祸害，它们在所有国内问题的排序中占据了首位，而政府支出和税收等问题被放在了末位。几乎有一半成年人对物质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表现——"对金钱的贪婪"——进行了批判。尽管美国有一代人是被金钱和财富的吸引力所塑造的，他们关于物质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雷同于70年代中产阶级上层年轻人的看法。正如一位青年所说，我父母关心的是"金钱和保障"，而我倾向于给自己提供"自由和学习"，这并非大言不惭。[②] 尽管和来自经济未受损环境的人相比，来自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环境的成年人明显更不愿意强调物质主义有害的一面，因为经济受损的人中仅仅有1/4提到这类问题，但我们也

② 这些引文都出自对171名加州大学学生的调查(1965)。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金钱和财富只是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才是异常重要的。在经济领域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中有稍多于1/3的人关注(程度相同)政府的过度支出和税收的不公平,紧接其后的是种族问题和物质主义;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后代中关注这些的人仅有1/10。在他们提及的所有问题中,只有经济问题是两个政党都一直关注的。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们实在难以公正评价他们对于经济问题态度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与大萧条经历各个方面的关系。不过,因各自经济状况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着重点,也和人们一般的看法相似。

有关国家问题的"内向视角"(inward looking perspective),是萧条而孤立的30年代留下的遗产。然而,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的话,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经济受损经历的证据。我们的发现建立在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之上,并通过比较在1958年访谈中提到的寻求和平的三种一般途径而获得:孤立——巩固美国,孤立于世界网络之外;国际主义——对其他国家的物质援助,公民的国际交换,巩固联合国;既关注国内事务也关注国际事务。孤立主义是最不为人们所接受的策略(21%),其次是同时关注国内外事务(27%)和国际主义(35%)。对国际事务情感上的关注无论是否与国内的规划有关,都和大萧条的经历无关。然而,这些观点并没能显示出更有差别的优先序列。价值观是在所有选项中的一种选择,但访谈者并没有试图强迫人们去选择它。

当我们转而考察成年人对50年代后期年轻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在内)的看法时,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从问题转向了机遇。总而言之,至少根据经济福利来说,奥克兰出生组的男性和女性,过上了比他们所熟悉的大萧条生活更加美好的日子。根据他们的判断,40年代后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段美好时光,尽管这对于年轻人而言,开始新生活所获得的回报不如50年代后期

那样。在1958年的访谈中,3/4的被访者感觉现在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机会比他们这一代更多。这些机会或者比以前更好或者至少一样,很少有人说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机会变得更差了。

乐观主义是奥克兰样本中父母所持观点的特征,这是他们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始终不变的看法。不过,更为重要的和更可能导致某种重要后果的是,父母们渴望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实现自我。某种理论把这种愿望看做是父母自己的生活被剥夺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关联在1971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一些父母明确希望那些"积极活跃的"上大学的后代,"在重要的自我实现领域比他们更为成功,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参与'无休止的激烈竞争',或者过隐居生活"(Flacks, 1970,第374页)。这种理论也被许多人用在对于受大萧条哺育的父母行为的解释中。因此孩子们受到溺爱,是因为父母想为他们提供自己在童年时代曾失去的一切。父母的希望和大萧条中生活各个方面的困境有关系。顺着这条线索,估计"经济上的保障性"、"良好的教育"和"情感上的健康和快乐",可能会是那些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奥克兰成年人最为突出的愿望之一。然而,当问起(在1964的追踪调查中)他们最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什么时,被数次提到的仅仅是后面几种愿望。最为普遍的四个愿望是"情感上的健康和快乐"(82%)、"身体健康"(48%)、"职业和婚姻的成功"(46%)和"成熟、有责任感"(28%)。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成年人更常提到的愿望,是前面两个关于健康的目标。[22] 在匮乏年代和富裕年代,身体健康同样重要。但是只有在物质充裕的年代,感情上的快乐才被人们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

[22] 对于两大健康目标来说,由于家庭经济受损所导致差异的百分比均值为16%。

第四部分
大萧条经历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不参照这些男性和女性的日常生活环境得以形成的历史结构，那么就无法了解他们自身和他们成长的历史，了解他们或她们变成了何种人。历史的变革不仅给个人的生活方式赋予了意义，更给它的突出特性——个人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提供了意义。

C. W.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

第十章
大萧条的孩子们

我们跟踪一群孩子，从他们在大萧条早期的青春期前期到他们步入中年，一步一步追寻经济受损是怎样在这些孩子们的社会关系和职业生涯中、在生活方式和人格中留下痕迹的。为了收集那时有关具体影响的资料，我们不得不去整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支离破碎的反映生活经历不同方面的数据，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参与人员也要具备一定的素质。这些努力回答了许多问题，同时为今后的调查提出了至少一样多的问题。

我们在这一章将揭示经历过大萧条的个人和出生组发展历程中的主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在这里所采用研究方法的优越性和局限性，是以下把有关大萧条影响的结果普遍化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实施调查的时候，脑海中记着我们所选择的历史时机、地理位置和战略，那么将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检查我们的发现和引导分析的适应性框架之间吻合的程度。这种吻合的程度是本章第二部分关注的焦点。在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我们运用了远远超出现有研究的资料：婚姻和家庭、在家庭和社区中孩子的角色、年轻时的工作和成就、大萧条和战后一代的集体经历(collective experience)，通过这些资料确立始自大萧条起社会变迁的一般主题。社会变迁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们不能忽略大萧条给其他工业化国家带来的独特后果，因为这对于二战中奥克兰出生组的成员意义深远。纳粹运动的

兴起就是一个主要例子。美国经济不景气程度和持久性相对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情况而言如何？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些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所以将在附录C中进行简短的讨论。

研究途径与其他选择

在本项研究中，家庭的适应性被当做经济困窘和个体行为、人格和生命历程之间的基本关联。奥克兰出生组成员出生在20年代早期，父母是白人，有着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背景，在旧金山的海港城市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萧条中严重受损家庭的孩子，有相当比例来自于中产阶级。经济受损与具体阐明大萧条中可以形成对比的经历(职业、教育、种族)等社会因素有关，但是这些因素不能以足够的准确性分辨他们生活状况的差异。比如，奥克兰样本中有许多身为专业人员的父亲由于失业、经济衰退等而严重受损。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直接关注的是那些在1929年被划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家庭在经济困难(用1929年到1930年减少的收入来衡量)上的差异。

可以代替上述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是比较大萧条和战后时期繁荣对于孩子童年经历的影响。对照组(comparison group)由经济危机之后出生的成员组成。这种分析所面临的一个障碍是，除了那些和经济状况有关的因素之外，这两组成员的童年期还存在许多其他差异。把相对受损或繁荣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出来确实困难，尤其对于那些对时代而言独特的因素来说，更是如此。通过评估经济受损对于单一出生组的各种影响，我们考察了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影响。相同的出生年份，意味着样本中的成员在大约相同的年纪进入大萧条和开始生活。

把分析局限于单一出生组的优势，因其难以普及的局限性而被削弱了。至少需要有一组或大于或小于奥克兰出生组的对照组，我们才能把生活模式放入一定情境之中，才能获得对于我们发现普遍性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认为不同年龄组的大萧条经历和它带来的结果之间会有很大差异。我们知道，30 年代每年与每年之间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和机会都不同。而且，年龄差异也可以被看做年轻人在面对社会经济变迁和经济受损境遇时的适应性潜力(adaptive potential)的一个因素。学龄前儿童(大约以 1930 年为标准)因为依赖家庭，所以在面对经济困难所带来的病原性影响时，比奥克兰出生组成员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出生于 1914 年左右年龄更大的出生组成员，就有责任帮助父母为了生计而拼搏，但他们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机会则受到严格限制。正如一位"老兵"所说的那样："你出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实质就是，无论你自我调整得如何好，你依旧只能留在社会底层。在十年之中，我们中许多人依旧留在社会底层，或仅仅在底层上面。"①

在这些方面，那些更老的或更年轻的出生组所遇到的风险，在奥克兰孩子们所处的年龄组中明显地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在 30 年代早期，他们的年龄还不够进入养家糊口的全职角色，而在战争总动员和经济复苏的初始阶段就离开了家庭。当他们进入 30 年代时，智力发展和社会依赖的紧要阶段已经过去，他们已经能够了解他们家庭和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去承担自己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最佳年龄度过

① H. 麦克勒南：《如果你在 30 年代已经 20 多岁了会怎样?》，见 V. 霍尔编：《大萧条：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论文和回忆录》(多伦多，1969)，第 145 页。

大萧条十年，那么他所选择的年龄将和奥克兰样本的年龄差异不会太大。[2]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奥克兰父母所经受的无法逃避的痛苦。

在未来有关大萧条时期个人和家庭的研究中，我们将乐于选择一个既包括奥克兰的父母们又包括在本世纪头十年出生的更为年轻的成年人出生组。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无法公正地评判奥克兰父母们的生命历程，这是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数据。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访谈过他们的父亲，而仅在30年代前半期访谈过他们的母亲。我们无法恰当地描绘家庭从1929年到30年代末期再到战争岁月中的经济史，或者追寻它对于家庭建构、居住模式和家庭维持方式的影响，以及对于婚姻和亲子关系的影响。在拥有这种家庭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能着手描绘30年代经济变迁的模式、复苏的时机和性质以及它们对于家庭变迁的意义。

在了解到我们为奥克兰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识到，在他们成为父母后生活的各阶段将会出现更多意味深长的结果。在何种条件下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持续时间远远超出30年代的能力匮乏，导致了自卑感、健康状况持续不佳和对经济无保障的深深恐惧？对于一些奥克兰出生组的父亲而言，经济困难意味着绝望和无助、病弱和酗酒；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这意味着感情上的痛苦、屈辱和沉重的家庭负担。相对于他们在大萧条中的状况来说，他们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模式依旧是一个谜。

---

② 在与按照5年划分的出生组进行比较时，凯恩发现，在1921—1925年的出生组中，至少上过一年大学的人和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比例最高，这也是奥克兰成年人所属的出生组。L. D. 凯恩：《美国人中的1916—1925年出生组》(1970)。

这一段没有考察过的岁月和父母一代早期的生命历程正好吻合。为了解为什么在面对大萧条危机时父母们会有那样的反应,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标准、性别角色、价值观以及为经济困难的适应性要求而做的准备有所了解。循着这些线索的调查,将会把我们带回到祖父母一代的社会史中,带入来自欧洲的迁移、城乡间的转变和父母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中。

祖父母和父母一代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亲属关系网络上面。这是一个在大萧条家庭生活中几乎被忽略的方面,但实际上它在危机时的作用更为普遍。就核心家庭适应惨重的经济受损来说,亲属保持相对独立意味着什么?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和地位较低的家庭相比较时,这又意味着什么?经济援助和亲属的责任怎样影响了亲属体系内部的合作和疏离?要回答这些及相关问题,就必须考虑一个重要的理论题目:在城市—工业化环境中,核心家庭适应危机的能力是相对增强了还是相对削弱了。[③]

对于有关奥克兰出生组研究结果的任何解释,都必须考虑他们儿童时代的场景(settings)和社会构成(social composition)。正如我们曾提到的那样,30年代奥克兰经济变迁和美国其他大城市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但是我们没有把握运用客观的经济指标,对大萧条的影响和相关的经历进行有效的比较。同时还必须考虑社会政治条件和主观实际(subjective reality)。除地域

③ 运用芝加哥临近地区中产阶级家庭的数据(1870年代和1880年代),R.桑内特对于核心家庭在城市—工业化环境下适应性功能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他宣称在敌对的城市环境中,家庭更多地被当做感情的天堂,而不是一种适应性机制。R.桑内特:《家庭对抗城市》(1970)。最近有关家庭史的回顾,可以参阅T.K.哈里文:《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家庭史》(1971)。

因素之外，样本的社会特征就足以限制这些结果应用的范围。大体上来说，我们的样本既不包括1929年前非常富有的家庭也不包括特别贫困的家庭。大部分成年人来自于下层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在整个分析中，我们特别关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以及经济受损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并把他们与经济受损极为漫长、惨重的境遇中的孩子们进行对比。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的社会经历的变动范围，为我们评估经济受损对他们生命历程的影响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样本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种族构成(ethnic composition)。在1900年代早期，有相当数量来自南欧和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移民定居于奥克兰，我们的样本中也包括这些人。在这个城市中黑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萧条后才有的现象，这是南部黑人向战时工业区迁移的西进运动的结果。

另外两个重要的问题是样本规模和代表性。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愿意选择更大的样本以确保分析中的测量更加稳定，灵活性更大。不过，对长期研究(long-term studies)而言，我们使用的样本已经很大了。在纵向研究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建立的过程中，样本的代表性服从于居住的持久性。不过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奥克兰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学校同学在社会经济特征上极为相似。所有的考虑，再加上长期纵向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使我们一再强调此项研究的提示性或者启发性。其他的关于相似的或不同的群体——租佃农、农场主、少数种族群体等——的研究，都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大萧条各个方面对于个人意义的基础上。

30年代之前、之中或之后收集的数据已经无法改变了，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限制。回顾性资料在生命史研究中是有用的，而且对于填充不幸空白的数据常常是必要的，但是它们逐

渐变成同时代信息的拙劣替代品。任何巧妙的设计都无法补偿30年代美国不充分的失业统计资料，加拿大也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在探寻经济受损和失业对于奥克兰成年人的影响时，我们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就我们已经确定的收集回答预设问题的数据的理想而言，这种缺憾会导致对于不是最初课题组成员所设计的调查的某些疑虑。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的潜在可能来考察奥克兰档案时，我们认为相对于其他选择来说，这是运用这种资源的惟一机会。考虑到这些，再考虑到档案的局限性，我们的指导方针已经使我们最好地运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了。

大萧条经历对人格和生命历程的影响

急剧的变迁适应性反应，为我们把大萧条中家庭经济受损和人格及职业生涯联系起来的努力提供了焦点。当常规的适应性技能已被证明无法处理紧急问题的时候，一种不寻常的文化距距就出现了。从1929年到1933年，奥克兰样本中的家庭收入大约下降了40%，这一变化使家庭走向更具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满足自身需求的越来越多的物品和服务是由家庭成员提供的。与这种变迁一起发生的，是运用资源和技术去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尤其是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解决问题：母亲和孩子被扩大了的家庭角色，婚姻影响和儿童控制上的调适，以及产生于不稳定性、沮丧和不同步的变迁和经济受损所带来的适应性要求的社会紧张。正如已经提到过的经济受损与孩子们之间的关联那样，这些条件组合起来大体上分成三类：劳动分工的变化、家庭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紧张。

我们根据这三类条件考察奥克兰孩子们经济受损的境遇，并假定他们的经历、人格和生活期望都受伴随着经济受损出现

的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个视角和下面的观点是一致的：父母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状况来培养孩子的。但是这种状况的实质依旧是个问题。它们能够代表由以下几种因素所塑造的生活境遇吗？这些因素包括：由经济萧条导致的暂时压力，或者建立于匮乏和经济无保障（因此需要最为强化的经济保障形式）的大萧条现实基础之上的未来构想，或者是在更加富足生活中对更有吸引力的选择的期盼。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系列源自家庭适应性的未预期后果。家庭维持的模式——依赖公众资助、亲友的帮助、母亲的就业和孩子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构成了对家庭生存需求最为基本意义上的回应，但是它们也构成了互动的环境（interactional environment）和孩子们的学习经历。尽管在个案资料中的确存在第二种社会条件，但是我们手中相关的证据更少，它是根据现在（大萧条的现实）来（有意或无意地）描绘未来。比如，一些奥克兰的父母鼓励他们的儿子寻找经济上有保障的工作，这些劝告实际上更适合于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而不是繁荣的战后岁月。刻意的社会化（deliberate socialization）是和这种境遇一致的，也与对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世界的预期相一致。

大萧条时期经济受损逐渐导致了境遇和希望获得新的适应性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我们假设对经济受损境遇的反应，从自发、灵活地面对一切到防御和退缩，都取决于既与个人才智（智识、技巧等）又与家庭内部环境的支持相关的适应性潜力。在适应变化和逆境的能力上，中产阶级的孩子居于劳动阶级孩子之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适应性反应的支持，也随着阶级地位的提高而增加。中产阶级的孩子和父母拥有更多的智力资源。他们有关现实的概念能促使他们更为成功地应对变迁和不确定的境遇。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受损对于劳动阶级孩子们的心理

健康和生命历程有更多的负面影响。

在我们评估经济受损对于人格和生命历程的影响时，最后应提到的一个因素是：在何种环境中，大萧条经历的影响最可能持续到这些孩子成年以后。尽管很少有问题能比大萧条遗产引起我们更多的兴趣，但我们却最少注意到影响生命跨度中持续性的境遇和关联的因素。我们仅凭直觉或自我反思，就认为大萧条中的艰难岁月与下列现实相关：特别强烈的敬业精神，对保障的自觉渴望，在毫无愧疚感地参与消遣或娱乐方面缺乏能力。在有关抚育孩子的愿望的研究领域中，一般的理论都断定大萧条哺育的父母会尽力使他们的后代不再面对充满艰难和痛苦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已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如神经质般地疯狂追寻财富，这样我们的孩子就不用经历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1] 我们只要想到导致这种结果的条件，就会了解成年人生活中和境遇变化相关的复杂性。这些结果是否更多地是成年人的地位的后果，是作为上层中产阶级一员的后果，而不是早期大萧条经历所带来的后果？大部分关于大萧条影响的非正式论述都局限于阶级结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尽可能使大萧条的影响从大萧条持续到中年生命历程中各种条件的具体化。如果某个人不同时段的境遇相对类似，那么他在童年所获得的教训最可能在他成年以后得以运用。一般来说，奥克兰样本中男性的数据支持这个假设，经济受损对于价值观的主要影响发生在那些没能获得比其父亲更高地位的男性中。女性的地位差异给大萧条影响的持续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家庭角色和过去的联系最为密切。

---

① 霍尔前引书，第iv页

在我们对1929年到60年代中期奥克兰出生组的分析中，简要地确定了三个一般性因素：已提到的经济受损和个体之间的联系，它建构了30年代的境遇（劳动分工的变化、家庭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紧张）；适应性潜力的差异，它是对境遇变迁的回应及其心理影响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于30年代的经历来说，成年境遇（adult situations）是决定大萧条经历的心理状态持续性或者持久影响的一个因素。我们运用适应性潜力和生活境遇的模式，使那些让家庭经济受损最可能或最不可能对成年后的孩子产生某种影响的各种条件具体化。根据适应性资源和家庭地位的这一假设，我们认为经济困难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后代的成年人健康的病原性影响，小于对更低阶层成年人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成年境遇（由流动性界定等）导致家庭受损和男性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出现差异。这个一般模式的效用和局限性，通过追寻经济受损、人格和生命历程之间的关系最容易看到。为了这样做，我们从劳动分工中的适应性开始，依据三种关联把我们的发现组织起来。

尽管到了40年代初，绝大部分经济受损家庭都最终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的经济受损和父亲失业都与其职业地位的向下流动有关。失业常常意味着失去收入，但是许多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在没有失业之时已严重经济受损。当收入来源和储蓄都没有了的时候，家庭就会部分地通过劳动以满足消费需求来削减开支，同时发掘维持生计的替代形式。这些可供选择的替代形式包括母亲就业、亲属的救助和依赖公共资助，而依靠这些形式资助的家庭在劳动阶级中尤其普遍。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们最可能参与家庭经济：女孩们专于家务劳动，男孩们则专于经济角色，后者为了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求而外出寻找工作。

在家庭关系领域中，作为决策者和感情来源的母亲的支配地位是经济受损家庭的基本主题。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家庭中，儿女们都认为严重的经济受损增加了母亲在家庭事务中可以感知的权力，降低了父亲的社会声望、吸引力和在情感上的重要性。对孩子们而言，诸种条件削弱了父亲对于孩子们的控制和总体上父母控制的有效性，不过这在与儿子们的关系上表现尤其突出，并且鼓励人们依赖家庭之外的人。和其他孩子相比，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子们和女儿们更可能在家庭之外的人中寻求陪伴和忠告，尤其是在老师们和朋友们中。只有在职业选择方面，经济受损的父亲对于男孩们来说地位是特殊的，不过这种发现仅局限于中产阶级之中。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和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matricentric family）中的角色，增加了构建有利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环境和导致孩子加速成熟的力量。匮乏和劳动力密集型调适，都增加了这些尚处于童年时代的孩子承担成人似的责任的可能。女孩无论就业与否，都被迫参与由母亲控制的家务劳动，而且这种经历和高等教育上的局限，使她们未来对家务劳动也情有独钟。经济受损父母的女儿们最可能偏爱家务活动，并与成年人交友，在少女时代就趋于成熟。而且这些女孩如果身处中产阶级之中，就会比那些经济未受损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同龄人结婚更早。家庭经济受损减少了这些孩子获得中学之外教育的可能性。一般来说，这些女性到中年之时，她们是否拥有经济受损的背景会使她们对于家庭生活、父母身份和持家上的认同出现差异。这些价值观中的每一种，都是通过在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中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来和30年代家庭经济受损发生关联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和认为生活应肩负责任的观点（比如认为孩子们长大成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责任感的增加），成为考察生长于经

济受损家庭女性生活的主要视角。

家庭状况和经济受损，使男孩们摆脱了父母的控制，使他们对成年人的生活和如何过日子等成年人所关注的问题（包括谋生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还强调了他们在生活中所肩负的责任。经济困难通过这些方式解放了男孩们：通过培养男孩的自主性和他们在工作角色上的职责，通过父亲在家庭事务中的发言权小于母亲的家庭安排（household arrangement）。工作角色使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们在家庭之外获得了类似成人的经历，提高了他们的技能，使他们对于经济独立和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经历和家庭困窘的现实一起，加快了他们走向成人世界的步伐。对与成年人交友的兴趣、长大成人的渴望、对职业的思索和目标的具体化，都与经济受损有关。在这些孩子成年后的生活中，无论他们阶级出身如何，职业的具体化倾向都会使工作生活和地位获得中家庭经济受损所导致教育方面的不利因素减少到最小程度。在经济受损的群体中，具有优先地位的价值观包括：兼具职业风险和潜在利益的工作保障，在父母和孩子们眼中的责任感，以及从家庭生活世界中获得的满意度。然而，正如这些孩子对休闲活动的兴趣最小一样，他们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也和家庭经济受损有关，这主要表现在那些没能超越其父亲地位的男性中。

很明显，孩子们在经济受损境遇中的许多社会化特征，与父母在为孩子谋划未来时的意图没有明显的关联。这些特征更可能产生于对家庭需求的适应性之中。如果说大萧条的孩子大部分被教养的方式都不同于他们父母曾经历的那样，那么作为这种抚育方式差异的来源，父母的意图比结构变迁和以家庭需求为中心的适应性更不可靠。实际上，这种适应性在社会化中和父母对于孩子的计划或看法是相互交叉的。这也许表现在中产

阶级经济受损家庭培养女孩们对家务的兴趣这一事实中，她们对于婚姻的偏好超过了对高等教育或专业训练的兴趣。社会化的一些未预期后果被费伯对18世纪社会的研究所证实。费伯发现，“对那些有着极强的向上流动愿望的人来说，手艺人家庭对他们的社会化是有益的”（Faber，1972，第201页）。在这个层面上，获取成就的努力（achievement striving）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家庭和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把它们作为确保其生活和地位的一种手段。成就动机的这种未预期影响在大萧条经历中也很明显。在大萧条经历中，人们经历了地位丧失对于价值观的刺激，经历了种种压力，最后只能依赖个人才智去奋斗。

家庭经济受损和奥克兰孩子们之间在精神上的联系，源自于社会紧张和比较。通过家庭成员间（向女性占支配地位的转变）和不同家庭之间在家庭地位方面转变的不一致性，家庭受损使家庭成员的地位或身份变得不确定了。害羞、情感上的敏感性和多愁善感，都产生于模糊不清的境遇（ambiguous situation）之中，而且人们发现无论在哪个阶级中它们都与经济受损有关，尽管在女孩们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些情感状态（emotional state），把经济受损家庭的诸种生活条件和中产阶级家庭中女儿们相对早婚联系在一起。家庭受损增加了奥克兰孩子们对于自己在同龄人眼中地位的判断失误，他们认为自己获得的评价比实际情况相对更低。这种感觉无论是否正确，它与自我评价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后果却是真实的。它唤起了孩子们对于社会精英主义的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和敏感性，而且似乎促使男孩们产生了奋斗的意识。经济受损对于地位变迁动机的另外一种持续性影响，是能力和成就动机之间的联系，它被我们理解为衡量能力运用或者使用的指标。无论在中产阶级中还是在劳动阶

级中，成就动机和能力的关系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比在经济未受损家庭中更为密切。最后，这些孩子在30年代遭遇的艰难建立了一种心理框架或者对比经历，这使他们从童年到中年的生活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因为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在童年时期遇上艰苦的岁月，所以他们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感觉到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和令人满意。

最后应提到的是，经济受损与奥克兰出生组在生命成就和健康方面的适应性潜力之间的具体关系。与劳动阶级的子女相比，中产阶级的后代更为聪明，志向更为远大，在解决问题和获取成就上获得的支持更多。这些差异，与男性通过教育和工作或女性通过婚姻所达到的成人地位的阶级差异是相似的，而且它们部分地解释了经济受损对劳动阶级孩子们负面影响更大的原因。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和经济受损无关的个人素质（智力、女性的身体魅力等）对生命成就的影响，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这些孩子的家庭境遇和有限教育所带来的障碍。

阶级背景对于成年人生活的含义，在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方面更为明显。除了大萧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外，家庭经济受损对于中产阶级后代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而对于来自劳动阶级成年人的负面作用最为明显。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子女，比经济未受损家庭的子女更可能相对没有什么疾病症状。他们在自我效力、冲动和努力的整合、个人才智的运用和发展潜力上的水平更高，他们也被描绘为更具有复原能力、更为自信和对他人更少提防的人。另一方面，大多数出身于劳动阶级的成年人都表现出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经济未受损群体略多一些。

总 结

在此，我们总结了大萧条经历对奥克兰成年人持续性影响的三个方面：他们获得成人地位的途径，以及获得地位的层次；作为对生活问题回应方式的成年人的健康和偏好；以及价值观。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我们推断家庭受损使孩子的生命成就更加依赖于教育系统之外的努力和成效。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在教育程度上略高，而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工作资历更长，工作经验更丰富。同样地，家庭经济受损在教育方面给女性带来的障碍，被她们通过婚姻所获取的社会成就抵消了。与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人的生命历程相比，奥克兰出生组在30年代所处的有利职业阶段，应该被看做是决定在经济受损家庭中长大的成年人生命成就的关键因素。我们在第七章中曾引用的历史研究表明，年轻工人（出生于20世纪最初十年）的职业机会受大萧条中各种条件所限，尤其当他们几乎没有接受什么正规教育，也没有什么工作技能的时候，更是如此。

至于第二种主要影响，成年后的健康和经济困难负相关已经得到证实，正如30年代的一些分析所表现的那样，尽管它仅限于劳动阶级家庭的后代中。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中，这两者表现出相反的关系。经济困难的影响表现在对于家庭领域中经济事务的敏感性上，也表现在对它们做出反应的方式上。偏好民主党的人几乎全部是经济受损群体的成员，这也可以看做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关注焦点和偏好策略的粗略指标。

最后，大萧条中曾经历的经济艰难，对于看待生活中"什么事情更为重要"有着持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男性和女性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家庭的中心地位和婚姻中孩子的重要性。尽管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并没有把家庭置于工作之上，但他们以及那些有着相似背景的女性的偏好都证明了战后的家庭主义氛围

(familistic aura)。因为父母的家庭曾处于经济受损境遇中，无法提供孩子们可以竭力效仿的有吸引力的模式，但是它能通过社会化培养女孩对于家务劳动的兴趣，并培养他们在艰难岁月中所应具备的适应性意象(adaptive image)。

在奥克兰出生组中，大萧条哺育的男性所拥有的其他价值观也和经济困难有关。工作的保障性是最好的例子，尽管更为能干和成功的男性很少会优先考虑它。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更为关注工作的保障性，因为他们的才智和选择都有限，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伤害。经济困难使工作变得重要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放在如何获得一份工作上，并且尽可能鼓励就业的人努力工作。但是在我们的数据中，没有证据表明，相对于其他活动而言，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比其他男性对工作更加重视。在非常成功的男性中，工作优先于家庭和休闲活动这种价值观，更多地源自他们的成就，而非他们在大萧条中的背景。

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来自于大萧条经历的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s)，在我们的分析中并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这是不幸的，因为与其他任何影响相比，利用这种假定的30年代遗产作为证据进行推论的比例，可能要高得多。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受损增强了人们对于"金钱万能"的信念。较低阶层的家庭在抚养孩子的时候，通常用金钱作为酬赏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目前缺乏物质主义态度(materialistic attitude)和30年代经历之间关系的证据。在回溯性报告中，"大萧条"理性(rationale)对于当前经济习惯(economic habits)的影响，无法替代纵向分析所获得的结果。

我们一再强调经济受损对于人格和生命历程的作用，可是对于经济未受损群体的诸种生活条件及其持续性影响却知之甚少。我们只是把经济未受损群体当做对照群体，然而我们也不妨

强调一下大萧条中良好的经济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这些发现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我们在适时的地方也已经这么做了。在生活方式方面，任何比较所产生的差异，都没有中产阶级经济受损群体之间的比较产生的差异大。在经济上相对未受损的孩子们所生活的家庭大多由整个30年代还保持就业的父亲所领导，有一些家庭甚至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家庭的需求不需要通过母亲就业或者孩子们的替代性贡献来满足。从许多方面看，在一个普遍私有化的时代，家庭境遇和机会似乎确保了这些"生活充裕的孩子"生活机会最大化。不过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种希望在他们成年后的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至少和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们成年后的经历相比是这样。在对经济受损让人们付出的代价有了一般性了解之后（尤其是在较低阶层中），大萧条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人们在物质充裕时代的社会心理，这在美国人的经历中显得尤为重要。[5]当我们开始对来自大萧条经历的中心主题作一全面回顾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匮乏和充裕进行比较。

大萧条经历的中心主题

尽管艰难岁月一再重现，而且据我们所知还有数百万美国人处于贫困中，但大萧条经历的持续性主题对美国人的生活和心理来说依旧具备边缘化的特征。[6]这是对社会特征和制度的

---

[5] 与这里论述相关的是巴顿(Barton)有关相对受损的理论著作(1969)。

[6] 该段和下面的论述都要感谢波特的论文《富裕之众》(1954)。尽管有关充裕的研究看起来没什么前景，但是美国大萧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充裕的产物：生产力超过了消费需求或者购买力。而且，波特自己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匮乏时期，人们对充裕文化如何运作能够获得非常有价值的深入了解。普遍繁荣时期的

偏离，而后者是由一种经济所塑造的，这种经济带来物质充裕以及无限的资源、持续的增长、持久不衰的生机和机会的平等等意象，带来20年代的繁荣富裕时期或者"抚平创伤"的"新政"时期。[7]大萧条把匮乏体系和规则强加于一个习惯于"充裕政策"(policies of abundance)的社会头上，这种政策旨在增加财富以造福于所有人，而不是把数额固定的财富进行分割或者再分配。尽管这种政策产生了和匮乏经济(scarcity economy)中的生活境遇相似的某些条件，但其适应性策略(在国家层面上最为显著)依旧服从于充裕哲学。被波特(Potter)恰当地描述为"充裕的传道者"的罗斯福总统，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这表达了他对于造福于所有人(劳动者和管理者、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经济潜力的乐观信念。他不是让两个阶级彼此对立，而是在发展规划中引入新因素以增加经济福利基金，从而使他们的利益达到均衡。美国人用来处理社会改革问题的正是这种充裕政治学(politics of abundance)，或者用波特的话说，正是这种"拒绝接受既成事实的策略，这种利用自然之剩余和技术之窍门的策略"(Potter，1954，121页)。罗斯福总统在被一位新闻记者喻为"战时被围困的首都"的严峻氛围中就任，在他执政之初的"百日"之内，美国人民的希望和团结一致的精神被重新唤起，而其中"充裕政治学"所起的心理作用极为关键。[8]

贫困和大萧条之间的重要区别，可以参阅M.哈林顿的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有关战后繁荣时期贫困的文章《另一个美国》(1962)；也可以参阅美国儿童研究协会的报告：《贫困的儿童—富裕的儿童》(纽约，1967)。

⑦ "美国人已经不习惯于长期灾难了，他们遭遇大萧条所受到的打击比那些没有享受过20年代繁荣的国家所受到的打击更大。"W. E.洛伊希滕贝格：《大萧条》，见C. V.伍德沃德编：《通过比较方法研究美国历史》(纽约，1968)，第297页。

⑧ 这个比喻来自《纽约时报》记者A.克罗克。"罗斯福上台后采取的迅疾而具有决定性的行动改变了潮流，绝望变成了希望。当他上台后的百日行动结束之时，

除了经济匮乏和由充裕所塑造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外，人们能感觉到对来自大萧条经历的中心主题的探求和我们对复杂多样性——不同年龄、阶级、种族和居住种类——的关注之间的矛盾。经济受损及其社会经济情境（城市—工业化，阶级分层等）、文化传统和政治上的回应，共同构建了美国人30年代的生活方式。[⑨]匮乏本身对它产生于其中的情境能说的太少了。波特认为，与经济增长和充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在国家进入大萧条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比如，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走向自主、平等和友爱（极权统治的衰落）；妇女在教育、工作和政治等方面活动领域的扩大和机会的增加；由于公共教育的延伸（强制的或其他方式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限制和承担公共义务的延迟导致了年轻人（尤其在中产阶级中）依赖性阶段的延长。

根据奥克兰的数据，在这种情境下，严重经济受损产生了类似于匮乏经济中生活某些方面的条件，但是它们采取了对城市—工业化背景下的特殊限制和选择的回应形式。家庭经济变得越来越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越来越以服务为取向，而孩子

信任和信心都达到了顶峰。"C. 菲利普斯：《从大崩溃到闪电战，1929—1939》（纽约，1969），第128页。

⑨ 人类为大萧条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匮乏状况和在充裕文化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在一个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1820—1930），自然界提供充裕资源的潜力被挖掘了出来，有关不受法律妨碍或者地位限制的人人机会均等的信念，培养了所有人可以自由流动的理想，并认为低标准的生活是对不成功者的惩罚。因此，无法向上流动或者获得成就的责任就在于个人本身。在大萧条中，失业和经济受损总是表现出它们似乎已经排除了社会立法天然地为流动或者生存所设置的障碍，即使这种自由只有在拥有非常有利机会的情境下才有意义。实现经济福利的结构性障碍，并不能阻止男性因为自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而责备自己。参阅波特：《富裕之众》，第93页。

们也参与了按传统性别分工来说属于生产性的角色，包括承担某些成年人的义务。劳动力的剩余和工作的缺乏，鼓励人们延长上学的时间。如果说经济困难增加了尚处于童年的孩子所承担的成人似的责任，提高了他们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这也仅仅发生在有限的情况下，因为有关孩子依赖性的法律保护依旧完整——上学年限和童工法，成年的法定年龄等等。

就大萧条中的变迁来说，要调查从30年代到充裕的战后岁月中变迁和持续的模式，家庭是异乎寻常的理想领域。不过，任何这样做的努力都必须考虑每一个出生组的特殊成长历史，这些出生组是以在1933年之前的出生日期所界定的。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再到成年人的生活阶段，这些出生组遇到的特殊限制、选择和激励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代人的职业选择都取决于他们特殊的成长历史"(Hill，1970，第322页)。这些选择表现为：何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和成为父母的时机，孩子的数目和彼此的间隔，丈夫变换工作的次数和种类，妻子进入劳动大军的时机以及获得住所、耐用品、人寿保险和投资的顺序。为了确定为什么某种选择相对于其他而居于优先地位，我们需要历史性地考察这些孩子的童年经历和每一个出生组的社会化。

至于大萧条对婚姻和家庭的影响，我们首先应该根据证据或有根据的推断，考虑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说些什么。除了这个领域之外，富有启发性的主题是比较大萧条孩子们的早期生活经历和他们的后代在战后相对繁荣时期的生活经历。这种对比集中于孩子们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其范围包括从积极的贡献到在人力过多环境中的多余地位；集中于中产阶级孩子的职业成就，其范围包括从机会到激励的问题；集中于中产阶级中大萧条哺育的父母的集体经历和他们后代之间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在匮乏和战争中需要做出牺牲的生活和年轻人"不劳而

获"的富裕之间的比较所决定的。

婚姻和家庭

除了极少的例外，美国人生活中周期性的混乱或危机和家庭制度的世俗化变迁(secular change)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尽管有不少研究关注于战争或萧条导致的危机境遇中的家庭，但是研究者并没有设计一些相关问题，以便让被访者回答周期性的特殊事件对家庭生活的长期影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广阔画卷是进化式变迁(evolutionary change)：各种类型家庭生活的出现及其与进化式变迁的关系——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家庭生产功能的分离等等(参阅 Smelser，1967)。

在二战期间，伯吉斯和洛克写了一份描绘美国家庭主要变化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依旧有影响。1971 年论文重新发表之时，他们在文中指出："家庭正处于从传统家庭制度向伴侣式家庭制度(companionship family system)的转变中。传统家庭建立在家庭成员扮演传统角色的基础上，而伴侣式家庭则以相互的爱情、亲密的交流及劳动力分工和决策过程中的相互接纳为基础"(Burgess and Locke，1971)。伴侣式家庭的突出特点——爱情、平等和自主——体现在 70 年代更具有试验性质的家庭生活形式之中。米勒和斯旺森提到家庭变迁的原因中，特别强调社会从个体业主到福利—科层场景(welfare-bureaucratic settings)的组织化趋势并且将这种趋势和孩子抚育的模式在概念上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在福利—科层制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多地学会了宽容，学会了自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参与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更能找到自己的方向"(Miller and Swanson，1958，第 58 页)。我们把这种教养和崇尚自律、自觉及技能的高贵品质的企业家式家庭制度进行比较。

顺着组织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大萧条经历是新的家庭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就我们今天所知，它赋予了福利国家许多显著的特征。米勒和斯旺森没有发现这一关联，但它却是费伯解释家庭变迁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萧条通过增加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不满，鼓励人们和过去断绝关系，鼓励新的家庭模式出现(Faber, 1972)。老一代人社会经济保障的崩溃，导致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有组织的和公正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强调作为家庭关系基础的伴侣关系和感情。据费伯所言，这些关注的焦点根植于"家庭角色的概念之中，而家庭角色的概念又和现代都市社会所提供的福利国家、平等主义、文化多元性以及个人自由相关。这种新的家庭模式进一步得到推广，是因为30年代政府许诺给退休的和碰上危机的个人提供保障"(Faber, 1972，第208—209页)。费伯把他的分析延伸到大萧条一代的后代中，这一代人对由传统和大萧条共同塑造的流行家庭模式持批判态度。接着，费伯把这种态度和科层制让人们付出的代价(失去对个人命运的控制、成本—效益价值观、非人格化等)及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费伯在他所处的情境中，无法公正评判大萧条经历和家庭变迁的关系，或者说无法公正地评判30年代出现的新家庭形式得以出现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它们已经出现了。确实，在奥克兰出生组中找寻任何支持费伯论点的证据都很困难。在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中，家庭变迁的迹象一直是朝向保守的、传统的价值观和亲戚关系。女性对传统家庭的偏好，与她们童年时期家庭经济受损有关。对于出身于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和女性而言，对家庭生活的极度偏好是因为家庭"能够使他们拥有孩子"，而不是因为他们重视婚姻所带来的相互理解或友爱。对于大萧条的孩子们而言，教育程度不能解释这种价值取向，职业地位也不

能。人们可能会把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婚姻生活，看做是伴侣式婚姻模式的证明：由于他们成长于女性扮演主要角色的家庭中，他们最可能和妻子分享决策权。不过一般而言，他们的母亲在30年代的影响力超过他们的妻子在60年代的影响力。

从粗略的证据来看，导致伴侣式婚姻模式令人关注的变化发生的时间更早，即发生于30年代早期达到结婚年龄的一战出生组的孩子们身上。如果我们就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地区的三代人（划分为20世纪最初十年成婚、30年代早期成婚和在50年代早期成婚的三代）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出现了断裂（Hill，1970，第2章；见Hill and Aldous，载Goslin，1969）。这种关注婚姻表现和父母角色的惯常模式（normative models）的变化，因为以下几方面而显得与众不同：婚姻中夫妻间更多的平等和分担，女性对于母亲角色更为接纳、对孩子更少惩罚而更多支持，对于孩子的性游戏（sex play）和好奇心更为宽容，在要求孩子服从时也带有更多的灵活性，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允许孩子们自己做决定。这幅图景，通过对难以确定其有效性的回溯性数据的依赖而确立。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变迁的确切原因。为什么这种变迁发生于30年代的年轻夫妇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之间？因素之一就是中间一代的教育优势，这一代在教育水平上比祖父母一代高相当多，而在教育成就上和最为年轻的一代非常相似。

虽然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能确定大萧条的各种条件对家庭生命周期中事件发生时机的影响，或者用鲁宾·希尔（Reuben Hill）的话来说，对“生命周期管理策略”的影响，但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在30年代已达到婚龄的出生组，结婚、成为

父母和物质丰裕的时机都被延误了。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伴随着对希望拥有孩子数目的偏好或价值观的相应调整。[10] 消费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变化，并不像与获取时机(timing of acquisition)有关行为的变化那样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大萧条经历对家庭生活的这种影响相对比较普遍，因此这些结论在此值得一提。

30年代中期的人口锐减、二战后出生人数的急剧上升以及持续整个1957年的婴儿潮，都比以前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粗生育率变化的不充分性，而后者是一种衡量人口总体发展趋势的测量方法。婴儿潮促使人们去思考美国妇女中完全家庭规模(completed family size)的普遍扩大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变化：在战后十年结婚的妇女比20或30年代结婚的妇女渴望生更多的孩子吗？通过研究每年出生人数来寻求答案的危险在于，出生人数不仅反映了家庭形成和完成的时机，也反映了家庭规模可能的变化。为了确定在某种特殊的生育趋势中发生的情况——它是时机变化的一种作用？还是最终家庭规模的变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有必要在妇女出生组的累积生育率和不同的年出生率之间进行比较。通过对出生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结婚时机因大萧条中的各种条件而延误了，他们生育孩子的时机也因此推迟了，后者主要由较为年轻的女性出生组"构成"。在本世纪美国妇女的各个出生组中，结婚的时机地位突出，因为它是决定生育孩子时间表的最重要因素。推迟生育一般被认为是导致婴儿潮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还包括结婚和成为父母的年龄的下降。赖德(Ryder)提出的"先萧条后繁荣

[10] J.布莱克：《1960年代的家庭规模——一种令人迷惑的时尚?》，载《优生学季刊》，第14期(1967)，第60—74页。

的序列”,唤起了在生命周期中为应付新境遇而采用的类似于决策策略的反应:“最先被采用的策略是结婚时机的变化,其带来的后果最小;最后被采用的策略是孩子数目的变化,其带来的后果最大”(Ryder,1976,第18—19页)。

在大萧条对于美国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中,几乎没有哪种影响能超过它对婴儿潮的作用。当出生于婴儿潮中的孩子们在跨越年龄结构时,他们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层次上对教育设施和资源都会有额外的要求。缓解教学人员短缺所付出的努力,在这次婴儿潮过后导致人员过剩。到了1970年代,部分由于经济的衰退,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感觉到对工作的需求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有限的机会。婴儿潮所带来的后果,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不断扩大的家庭规模对于依赖性较强的孩子的社会经验和机会的影响。除非资源和机会增长的速度和孩子出生率的增长速度相同,否则额外出生的孩子将会减少每个孩子能够分享到的份额。出生在30年代中期或后期的孩子,可能会受到家庭困窘的妨碍,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中产阶级战后的群体。但是他们长大的时候,对于工人的需求超出了而不是等于他们相对较少的人数。

消费模式与建立家庭的时机、婚龄及生育孩子的时机有关,并以类似的方式对大萧条中的经济限制做出反应。在鲁宾·希尔对三代人家庭消费进行的对比研究中,代际间的变化和结婚时不同的历史情境有关,也与更加繁荣和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世俗化趋势有关(Hill,1970)。根据希尔的分析,一般说来祖父母在1907年结婚,父母在1931年结婚,第三代在1953年结婚。祖父母的职业生涯策略(career strategy),因其相对适中的目标、不断获得更多资源的谨慎方法以及对自己和孩子的有限期望而显得与众不同。“谨慎从事”一词恰当地描述了

父母一代所采用的策略，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和生育子女、物质和保障方面。预先谋划在那些于50年代成婚的一代中最为明显。这些夫妇获得保障性物品（人寿保险和退休）的速度更快，在购买住房方面最为超前，也最可能通过个人信用去获得汽车和其他耐用品。为了对生命周期中的这些差异勾勒出一幅更加完整的图画，让我们来看希尔富有说服力的总结：

> 祖父母结婚的时候年龄已经较大了，在计划生育的方法上缺乏知识和能力。和下一代相比，她们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以更小的间隔生育了更多的孩子。这一代人因为处于无计划的经济（unplanned economy）以及十分有限的职业机会的条件下，所以不会经常变换工作，而总是使自己身处蓝领阶层。只有在孩子离开家之后，他们才能获得自己的家和适当的生活福利设施。因为经济萧条，他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得不到人寿保险的保护，也无法在孩子离家后为退休储蓄一笔钱。这一代让他们的孩子结婚更晚，而且婚姻持续的时间也较长，还将较多的时间用在孩子的生产、养育和让孩子独立上。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是这几代中最低的，而他们的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大多都在他们期望之上。
>
> （父母一代）在大萧条期间结婚，这是一个对婚姻需要三思而行的年龄。他们所生育孩子的间隔最长，结束生育的时间较早，孩子的数目最少。（而且）通过利用战争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妻子较早就返回了劳动力市场以增加家庭收入。他们因为年龄和家庭责任而延期服兵役，负担家庭生计的人通过经常变换工作来提升其职业地位。在这几代人中，他们是成家最晚的，而孩子们离开家的时间却早9

年，这一代人因此才能在经济上对祖父母辈和子女辈都能有所帮助。

孩子一代的婚龄最小。他们结婚之时，有比其父母稍微合适一些的工作，但是妻子中有一半以上在工作，并且希望婚后继续留在劳动力大军之中。尽管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着最高的期望，但是生育孩子的间隔却是最小的，而且他们所期望的家庭规模比父母的更大……他们在家庭生活设施和耐用品的获取上，在职业的擢升上、在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上，一年又一年地走在这几代人的前列（第310—311页）。

与费伯的分析相一致的是，生命周期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表现在那些于大萧条早期成婚的夫妇身上，这与这个时代通过新政立法提供的保障性物品有关。然而亲情价值观与大萧条经历和福利一科层制的保障性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尤其对于那些感觉到严重受损所带来困窘的夫妇来说，更是如此。这些条件常导致一种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处于优先位置，而且使亲情关系极为紧张。确实，亲情和感情的丧失都是大萧条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如果确实有一些家庭因为共同面临的艰难而亲密和睦地走到了一起，那么更多的家庭却无疑因受到大萧条的伤害而濒临破裂，甚或已经破裂。从历史上看，个人选择、平等和互助等理念大多在社会的中产阶级阵营产生，而且传播迅速。

大萧条的各种经济条件，再加上随后的战争需要，使妇女活动出现了值得一提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发生在小家庭中，也发生在更大的社区中——行为发展（尤其在家庭影响、分享家务和有

新就业等方面)已远远超出了相应价值观变化的现有证据。[11] 这种文化堕距也表现在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奥克兰妇女的生活中。尽管她们因为乐于扮演女性的传统角色而有别于他人,但是她们的活动领域实际上更加宽泛,和出生组中其他妇女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但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已满法定年龄的她们的女儿,其性别角色概念又是怎样的呢?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整个1967年,她们在以婚姻、家庭生活和孩子为中心方面最像她们的母亲。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都表达了这种观点。[12] 鉴于超越传统性别角色束缚的知识女性不断增强的意识、骚动和反抗以及美国妇女总体上所处的少数派地位,代际间的差异将更可能表现在那些70年代没什么女儿上大学的家庭中。

家庭和社区中孩子的角色

自大萧条起,孩子与家庭、成年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运用一个不仅仅考虑金钱的更大框架,来看对于年轻人而言,生产性地位和非生产性地位与30年代和70年代相联系的时候各自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从奥克兰出生组的童年经历来看,30年代经济受损家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常常让年龄较大的孩子走人成人世界。这些孩子扮演着生产性角

---

⑪ 尽管有大量的女性进入了战时工业之中,但是战争前后的全国调查对比并没有显示出已婚女性外出就业有明显增长。见L.B.达尔的硕士论文:《二战对于有关对待劳动力市场中妇女态度的影响》(北卡大学,1971)。至于40年代和二战的影响,W.查菲总结道:"妇女的活动领域明显地扩大了,但是对于妇女的传统态度依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文化规范和日常行为之间的'堕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发生了(和没有发生)什么。"《美国妇女》(1972),第188—189页。

⑫ J.卡茨及助手:《对年轻人来说没有时间了》(旧金山,1968)。

色。但就更普遍的意义来说，他们被别人所需要，而由于被人们所需要，他们就有机会和责任为他人的幸福做出真正贡献。被他人需要会导致归属感的增强，导致一种被大于自我的某种东西所认同的感觉的增强。然而任务可能是繁重的，但只要不过分，只要不具有剥削的性质，接受一份真正任务的挑战能让人获得满足甚至促进个人的发展。在这里，我们没有论及许多大萧条孩子所处的毫无希望的境遇，他们的生活和梅休(Mayhew)研究的伦敦穷人孩子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孩子是19世纪中叶伦敦沿街推卖水果、蔬菜和鱼的小贩们的后代(Mayhew，1968)。对于大多数经济受损家庭的奥克兰孩子们而言，尤其对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而言，在家庭经济中承担生产性角色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教育，更不会因此而在与同龄人的社会交往方面受到明显的限制。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受损通过使孩子们参与能为他人幸福做出贡献的、被他人所需要的工作中，改变了孩子与家庭和成人世界的关系。与有薪就业相比，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为人民服务"性质的。在大量有关处于自然灾难中的家庭和社区的文献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变化，年轻人常常在劳动密集型的社会应急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从大萧条尤其是二战以后，各个方面的发展共同使孩子们远离了具有挑战性的境遇，但只有在那种境遇中，孩子们才能为家庭和社区的幸福创造出有价值的贡献。繁荣、人口集中、工业增长及其资本密集形式、教育事业的进步，都使孩子对家庭依赖的时间延长了，并增强了年轻人对成年人日常经历的隔离。在这种以消费为取向的社会中，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极少需要后代承担生产性角色，社区机构也不需要。"一间屋子的学校"(one room schoolhouse)已经过时了，这种机构的特点是人员不足，与为了把孩子教育成人而组建的现代学校明显不同。在这

种学校中，至少在形式上孩子们不太可能教授其同龄人，无论是年纪更小的或是年纪差不多的。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按照“孩子教孩子”的原则组建起来的试验学校（experimental schools）。[13] 从孩子们及其生产潜力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市化的、富裕的社会代表了一种人员过剩的环境。在这里，年轻人成了剩余人员中的成员，这一类人的生活主要就是和职业介绍所的人接触。罗杰·巴克（Roger Barker）对人员不足或人员过剩行为环境中的居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了这种境遇所蕴涵的一些重要含义。在人员不足的环境中，居民更为经常地参与那些困难但却重要的活动——他们“更忙碌，更有活力，更多才多艺，更喜欢其所居住的环境，也更加独立”（Barker，1968，第190页）。巴克注意到这种人员不足的环境在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少，他指出这种环境在历史上的显著特点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把人员不足的环境和某种生活方式——充裕的机会、富裕的人民和自由的边界——联系起来：“这里有太多的目标需要实现，太多的与居民有关的工作要做，而这些对于美国社会和人民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上书，第189页）。

这种充裕的社会能够也必须养活“相当数量不从事生产的人”，正如它现在所组织起来的那样，但是它应该容忍代价，尤其是年轻人付出的代价吗？这些代价包括不被需要的感觉，包括那种对共同努力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挑战和回报的拒绝。这个问题是在1970年的“白宫儿童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涉及年龄隔离（age segregation）的问题。这次会议意识到，把成年人

---

⑬ 有关加州一所这样的学校的报告，强调按这种组织原则改善教育过程所需付出的最小代价。R.J.马拉雷格诺丁 G.纽马克：《社区项目指南，第二年的报告，1969年7月—1970年8月》。

"带回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和把孩子带到成年人生活中的必要性，因此提出必须尽快找到让"孩子们和年轻人到成人世界中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方法。[14] 一些身为大萧条孩子的父母，从孩子孤立于社区的运作之外感觉到了这种问题，他们因当前赐予性的生活对孩子几乎没什么要求而感到不安。

机会和激励对于生活前景的影响

30年代美国年轻人缺乏的是机会，而不是志向或抱负。他们的生活前景依赖于接近稀有资源的机会，依赖于高等教育和一份好工作。大萧条十年后不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使人们想起了美国人对生活机会的看法所受到的另外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有关经济扩张(economic expansion)衰退的假说："美国的情况已经改变，那么我们依旧要求一个孩子达到他实际上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成功吗？……如果这样一种成就(对许多人而言)依赖于一种边界的存在和一种扩张的经济，那么，我们能创造一种成功的条件使儿子能够获得高于其父亲的位置吗？"[15] 这个问题和当代中产阶级上层年轻人获得成就的可能性有关，尤其是那些属于婴儿潮出生组的成员。不过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就可能不是一个机会的问题，而是一个激励的问题。对于这一点，用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话来说："这是特别放纵的一代……对于那些向来受出生之运气(时间、地位等)所宠爱的人来说，一种超越贪婪梦的生活看来是可以企及的了。"[16]

---

[14] 《给总统的报告》，白宫儿童会议(华盛顿：政府出版办公室，1970)，第248—249页。

[15] M. 米德：《脂粉已干》(纽约，1942)，第68—69页。

[16] E. 希尔斯：《允许和匮乏》，载《遭遇》，1954年5月，第44页。

一个充裕的童年能否削弱传统激励对职业生活的作用——比如经济收益的刺激，或者甚至是社会声望价值的刺激？这个结果可以由学习和动机给予回报的含义中看出来。根据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Staffan Linder)的说法，时间也是决定因获取某种物品而感到满意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如果我们获得的财富不断增多，那么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感就会不断减少；因为我们得到它们不需要什么思想或知识，也就不需要怎么花心思去努力维护它们，我们花在它们任何一方面的时间都太少，所以无法欣赏它们的任何价值(Linder，1970)。

鉴于这些考虑，我们估计成长于经济衰退的30年代的父母，比他们的成年后代更为重视经济和财富，尤其更为重视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经济收益。中产阶级几代人中的相关证据甚少，但它至少暗示了这种差异。[17] 一项有关进步的重要研究表明，除了代际间的变化之外，现在大学生择业对经济因素考虑得较少。[18] 大体来说，研究中所调查的学生都因为奖学金、贷款和父母的支持，而不需要面对经济问题。与过去尝遍艰辛的父母们不同，这些学生总认为一种合理的或者舒适的生活标准是理所当然的，赚钱和声望不是他们择业中优先考虑的东西，而工作的发展潜力和对于他人的贡献则是他们择业中的优先选择。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战后出生组的工作偏好如何(或是否)与父母一代的大萧条经历和价值观发生关联。不过，20年代以来的工作偏好的确呈现出变化的趋势。而且如果我们从

---

⑰ 弗拉克斯：《学生反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1970)。本特森和洛夫乔伊认为，在(由处于劳动阶级中的祖父界定的)较低的社会阶层中，南加州三代人的物质至上主义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本特森、洛夫乔伊：《价值观、人格和社会结构》(1973)。

⑱ D.戈特利布：《年轻人和工作》(未发表的手稿，宾州大学，1972)。

有关美国工人的研究来看，这种变化还是明显的。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都把一份有偿工作描述为提供了个人成长和获得成就的一种机遇，描述为表现良好和贡献于某种独特东西的机会。[19] 正如美好的时光能使工人和学生珍视这些因素一样，退回到不景气的时光（衰退或萧条）将又一次使“柴米油盐”（bread-and-butter）问题——这对于大萧条的男性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人们的考虑中占据优先地位（参阅第一章，注㉖）。

历史中的集体经历

有关始自30年代美国人生活的中心主题，我们已经运用婚姻和家庭的优势地位、社区和家庭中孩子的角色及生活前景，从大萧条和战后充裕历史时期的角度进行了探究。这些比较，使持续和变化的隐含脉络变得清晰起来，但是它们忽略了某些人可能会认为的更重要的比较，即反映生活在历史不同阶段彼此共存的生命的一般性视角和社会—政治经验之间的比较。

由于重大危机往往产生广泛分享的经历，大萧条和二战中这种相互依赖性就特别值得注意。当一个全国都处于危机状态下并且危机波及的范围会威胁共同生活方式时，如果在这样的框架中解释问题，集体经历就具备了解释力度。国家的生存为此超出了个人、团体、社会阶层和区域的特殊的分散利益。在两次危机中，美国人民为了生存而投入全国性的战斗，这成为他们身为公民的责任，他们个人的艰难历程成了国家经历的一部分。

根植于这种经历的是一种精神框架（psychic framework），

19 S.E.西肖尔、J.T.巴尔诺：《和“蓝领工人”相关的人口因素和职业因素》（未发表的手稿，社会发展研究所，1972）。

这种框架包含的是自我牺牲，以及在当前事件和发展中依旧能发现的以国家为名义获得的成功。在罗斯福总统第一次执政期间，大萧条中的牺牲精神因战争心理和全民总动员而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经济危机消退之时，特殊的阶级利益、冲突和政治就都汇集到眼前。二战并没有像大萧条一样给许多家庭带来经济困窘或灾难，倡导牺牲精神的呼声因为重新出现的繁荣而消逝了，但是两次危机的心理主题却惊人地相似：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服从于生存至上的目标，使个人和团体利益服从更高目标的呼吁所导致的全国团结一致，号召全民把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贡献给国家的全面动员，因参与集体的努力而且最终获胜而感到骄傲。[30]

大萧条和战争时代的突出问题和经历，可以在老左派（the Old Left）的意识形态取向中看出来，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根植于3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之中。与他们在新政时代的主张一脉相传，老左派一直在寻求通过既定制度和民主程序来改善社会经济和种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其反应是由国家框架尤其是国家利益来建构和赋予特征的（Mauss，1971）。在30年代早期和二战期间，“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而行动，呼吁各阶层把内在差异暂时放在一边而互相团结起来，去与共同的威胁或敌人作战。在老左派中，这种呼吁压倒了战时的根本改革（fundamental reform）——说是要保卫自由世界以免除极权主义统治

[30] 在大萧条中运用类似战争中的社会总动员，可以参阅洛伊希滕贝格的《新政和战争类似物》（1964）。索罗金观察到：“在所有测量新政的方法中，很少有发现它所采用的权宜之计的原型，这些权宜之计在不远的过去曾经用来处理这类似的紧急状况。”《大灾难中的人和社会》（1942），第134页。有关崇高目标和群体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参阅M.谢里夫：《崇高目标对于群体间张力减小的影响》，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53期（1958），第349—356页。

世界的威胁——而被置于更优先的地位，而在战争中的共同努力更加普遍地表达了这种呼吁。通过它的历史感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这次运动表明了对中央政府的深深信任，中央政府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之上，是社会、种族和经济改革的发动机。老左派还强烈主张消除种族隔离。

有些分析家认为，60年代出现于民权运动中的新左派（学生民主运动），在家庭社会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成为老左派的一种延续（Mauss，1971；试比较 Altbach and Peterson，1971）。这些研究发现：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有很大比例都是有着左派信仰父母的后代，尽管没有走极端，尤其是在采取共同策略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这种联系可以从老左派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批判，追踪到新左派对由于压迫和疏离而导致权力分配不均的攻击。无论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什么，他们的差异却更让我们感兴趣，因为其主题上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些主题代表了大萧条和二战生活的基本特征——以牺牲基层改革为代价的全国团结一致，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政府行动，以及政府权力的集中。在新左派中，我们发现一种对冷战思维和通过军事干涉和经济掠夺实现的美帝国主义的抗拒，他们支持社会的多元力量，攻击压迫行为和集中权力于官僚机构——政府、商业、军队、甚至是劳动者　　的反民主趋势。

对于那些出生于二战后的美国人而言，从1929年到1946年两次危机中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他们仅仅是读到过、看到过或听到过。但即便是知识渊博的人，了解和认同那个时代曾广为人知的“救国”（nation-saving）的优先地位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在当今代际关系所处的情境中，这些时代的文化证明了我们的调查结果。要想了解对那些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而发出呼吁所做出的适当回应，了解大萧条出生组成长历史中牺牲和成就的

含义，我们必须对美国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差异知道得更多一些。全国性的经济艰难增加了人们对物质产品和养育孩子的重视程度，而紧随其后经济的欣欣向荣使这些价值观得以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生命史是独特的。在一个生命跨度中，美国人从匮乏走向充裕，从牺牲走向由繁荣而可能带来的自由。

就其与个人天赋或个人努力的关系而言，生活境遇的改变与战争产生的繁荣和商业周期的关系更为密切。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点在过去（以及依旧正在）被如何理解，尤其是父母如何向孩子解释。大萧条出生组的经历，使其成员总是把他们的好运气解释为留给下一代的遗产或礼物。如果要进行对比，我们仅需要比较出生于战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不曾在童年面对贫困或艰难，所以他们最不可能把充裕的生活理解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代的幸福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作为大萧条中的一个突出因素，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均再一次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最可能包含于即将到来的数十年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主导性政治事件中。不平等的基本模式在美国并未缓解，至少从二战以来是这样，有些人说从一战末期就开始了。[21] 无论如何，穷人和富人间的绝对美元鸿沟（dollar gap）在过去十多年中变宽了，不同社会之间的经济鸿沟也变宽了。只有越来越了解地球生态系统对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可以预见的限制时，人们才会对这一领域需要进行的激烈变化重新变得敏感起来。尽管这种资源有限的意象与充裕文化不一致，与认为所有人的蛋糕都会不断增大的想法（这太容

---

[21] 最近的评估，可以参阅 L.厄普顿、N.莱昂斯：《基本事实：美国个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剑桥，马萨诸塞，1972）。

易忽视公平分享的观点)不一致,但它却与30年代大萧条的生活现实极为一致,与“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一切”的问题一致。对于大萧条的孩子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而言,一些在30年代曾得到实践的原则——节俭、稳重,诸如此类　　在未来的岁月中很可能成为更加必需的东西。

第十一章
在“大萧条的孩子们”背后①

“在一个生命跨度中，美国人从匮乏走向充裕，从牺牲走向自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繁荣才成为可能的。”

当我们对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惊讶的时候，就能看到变化着的时代正在我们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美国人曾经都是农民，而今天却只有不到2%的人口在从事着农业生产。这种重要趋势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加速了消费社会的生成。它是否也改变了身为美国人的我们呢？几十年来，观察家也曾就战争、和平时代和经济萧条的严峻现实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我1962年结束研究生学习阶段离开北卡罗莱纳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我的学术生涯之时，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本章将讲述我怎样开始研究大萧条和战争对于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以及这项研究对于采用新的方式思索个人生活和个人发展会有怎样的贡献。

---

① 本章经作者特许译自《大萧条的孩子们》25周年纪念版(1999)。——译注

感谢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支持(MH43270、MH51361、MH57549)，美国陆军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的合作，麦克阿瑟基金研究网络(MacArthur Foundation Research Network)对于处于高风险环境中成功青少年的研究给予的支持，以及研究科学家奖金(Research Scientist Award)(MH00567)的资助。本章介绍性的论文建立在过去30年发表文章的基础上，并且从尤里·布朗芬伯伦纳的明智建议中受益良多。有四篇论文非常有帮助，分别为Elder，1981；Elder and Hareven，1993；Elder，1997，1998。

当50年代末我毕业于北卡大学时,我碰到了一本有着激动人心题目的薄薄小书,它讲述了关于个人生活研究的某些重要性。在《社会学的想像》中,C.W.米尔斯(1959,第149页)提出了一个对行为科学有指导性的方向:"传记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对它们在社会结构中共同碰上的问题的研究"。对米尔斯来说,个人生活只能和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来研究。然而,那时他没有什么经验研究的例子来支持他的理论。个人生活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研究主题,尤其就它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情境来说更是这样。学术文献中还没有出现生命历程的概念,作为重要的研究生活动的讨论会也没有涉及它。我结束研究生学习生涯之时,对于作为一个理论、一个研究探索领域、或者一种方法来说的生命历程,还知之甚少。

"大萧条的孩子们"是在60年代中期形成的一个研究计划,那是一个变动特别多的时代。人们常常用父母和他们处于上大学年龄的孩子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来解释代际间的紧张和冲突(Elder,1980)。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新史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更加了解历史的力量对于个体生命的影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运用了一项纵向研究中的生命记录,开始探索研究和了解一个正在变动社会中的生命的方法。这种努力导致了生命历程理论的逐步形成。"生命历程"(Life Course)指的是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我在这里所使用的生命历程是通过问题的明确化和系统化、变量的选择和说明以及策略的设计和分析几个方面来实现的,并建立了一种共同的探索领域(Merton,1968)。

我的专业之旅,从一开始就和一系列在儿童福利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ld Welfare)(现在是个人发展研究所)开展了60

年以上开创性的纵向研究交织在一起。因此当我现在开始讲述这段旅程的时候,将从我由这些早期研究中学到什么,以及这些知识怎样使我开始进行导致《大萧条的孩子们》这本书诞生的工作起步。我首先回顾这项研究的早期想法,同时强调生命历程理论中相互关联的范式性主题(paradigmatic principles)——比如历史的时间与空间(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时机(timing)、相互关联的生活(linked lives)和个人主体性(human agency)。接下来我将告诉人们这些主题和它们的概念传统在生命历程理论中和《大萧条的孩子们》中是如何融为一体的。最后,我将涉及这些年轻人生活中最令人迷惑的事: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成功地消除了大萧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是怎样使自己的生活好转的?

这本《大萧条的孩子们》的再版时间,是在它1974年第一次出版之后大约25年。此时战后的繁荣已经结束,而且据预测将会出现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当经济状况衰退的时候,分析家就会发现对于评价收入减少和贫困对城乡家庭及其孩子们的影响,这种研究设计是很有用的(Duncan,1988;McLoyd,1990;Conger and Elder,1994)。最后,在诸如日本、中国和德国之类关心急剧社会变迁给个人所带来后果的社会科学家的书架上,这本书也许能有一席之地。[②] 今天,社会和技术的急剧变迁,对于所有的理解依旧是一种挑战,本书所提供的生命历程框

② 《大萧条的孩子们》已经翻译成了日文(1985),并将翻译成中文(2002),而以这项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已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Elder and Meier,1997)。《大萧条的孩子们》第一版得到了众多的评论,比如D.L.费瑟曼在《科学》(1975)上,J.莫德尔在《历史研究方法通讯》(1975)上,F.F.费斯滕伯格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75)上,R.科尔斯在《社会力量》(1975)上,H.E.弗里曼在《当代心理学》(1975)上,都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

架代表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研究途经。

早期的想法和范式性主题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加尼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了三项有关儿童的开创性研究：在哈罗德·E. 琼斯和赫伯特·斯托尔兹指导下的关于奥克兰儿童的成长研究（出生年份在1920—1921年），在麦克法兰指导下的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出生年份在1928—1929年），在南希·贝莱（Nancy Baylay）指导下的伯克利儿童成长研究（出生年份也是1928—1929年）。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想像对于正在出现的儿童发展研究领域来说，这种集体的努力意味着什么。除了伯克利研究所的这些研究以外，一直没有什么有关儿童的研究课题。这些适当的研究代表了在纵向研究巨大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它们关注的都是生命历程中的个人发展。[5]

这些调查者无法想像能够得到追踪他们的研究对象到成年时期的课题，更别提追踪他们到中年和晚年时期生活的课题了。成年人发展和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还需要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这并不妨碍有关研究持续到研究

---

⑤ 对人类发展研究所进行的这三项纵向研究的说明，可以参阅以下著作：Jones, Bayley, Macfarlane and Honzik, 1971; Eichorn, Clausen, Haan, Honzik and Mussen, 1981。在追踪奥克兰成长研究和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到他们成年后最重要的一本书，是J. 布洛克等著的《随着时间流逝的生活》(1971)。其他的重要书籍包括克劳森的《美国人的生活》(1993)和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1974)。下面一些书都涉及有关成长的纵向研究：Nesselroade and Baltes(1979), Elder(1985), Rutter(1988), Magnusson and Bergman(1990), Cairns, Elder and Costello(1996)以及Giele and Elder(1998)。Young, Savola and Phelps(1991)曾经把大量有关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纵向研究的调查汇编成册。

对象成年和人到中年之时。实际上,在 1960 年代早期到个人发展研究所参观的人,都会发现奥克兰儿童成长研究的对象在 1950 年代末还曾接受过访谈,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的研究对象也是这样。另外一次后续研究,从时间上来看是 1972—1973 年,它把研究对象、他们父母和他们后代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在一个代际框架中进行研究。接下去对最初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是在 1980 年代早期,这已经是这项纵向研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后了。

作为奥克兰儿童成长研究最初的领导人,哈罗德·E. 琼斯和赫伯特·斯托尔兹实际上对包括生理成熟在内的正常成长和发展模式颇有兴趣。尽管他们广泛收集了关于奥克兰家庭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各种数据,但他们的研究主题中既不包括 1930 年代的经济萧条和随后的世界战争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也不包括它们对于个人健康的影响。这些世界性的事件,共同构成了他们所研究的儿童在 15 年生命跨度中影响生活的主要因素。在 30 多年以后,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运用琼斯和斯托尔兹在玛丽·琼斯和其他研究小组成员的帮助下在 1930 年代到 1960 年代收集建立数据档案,并把这些历史性力量(historical forces)和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第一次发现奥克兰儿童成长研究是在 1962 年,那时我刚到儿童福利研究所,并和社会学家约翰·克劳森一起工作。那时,克劳森刚刚成为那个研究所新的领导人,这是因为他在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作为社会经济研究试验室(Laboratory of Socio-economic Studies)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出色表现。一年又一年的档案记录扩展了我对于生命的看法,也显示了在大萧条中经济状况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家庭极为不稳定。大量的研究对象都说他们曾经"相当富裕",

不久后就"相当贫困"。正像那些研究对象曾经历过的那样，生命史常常提到住所和工作的变动。在经济受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似乎"比他的生理年龄更显成熟"；而在家庭收入有所改善的时候，他们又重获青春。总而言之，那些成年后做得相当不错的大萧条的孩子，给我留下了许多令人迷惑之处。

对纵向研究数据的这种探索，鼓励我全面地思索在不断流逝的时间和不断变动的情境中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我不得不站在局外来观察在某个单一领域中的早期纵向研究的缺憾，比如问题行为(Jean Macfarlane, Allen & Honzik, 1945)，这种行为忽略了正在变动的社会世界对他们研究对象的影响。我的注意力全放在了思索社会变迁、生活轨迹和个人(诸如行为的持续性和变化的模式之类个人发展的方式)上。这些轨迹代表了最为明显的探索领域。就我看来，它们涉及了社会中个体和群体遵循的教育、工作和家庭之类的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生活的转变(比如进入一年级、孩子的出生等)总是社会轨迹的一部分，它们从中获得了明显的意义和形式。个体的多重轨迹和它们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是生命历程的基本要素，在研究中和理论中都被概念化了。

有关奥克兰研究对象的初步档案研究，使我看到了通过历史性力量理解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到中年时期生活的可能性。我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 年代的经济萧条，如何影响了当时身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孩子。他们出生于 1920 年代初，童年恰逢繁荣的十年，在青少年时期因其父母和亲戚的艰难历程而受到经济崩溃的影响。他们所处的历史位置使他们处于这种经济受损的风险之中。一些人因其家庭而面临极为艰难的岁月，而另一些则躲过了这一切。这种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群体相互对比的境遇，在经验层面上建立了一次"自然的试验"，这支持了

历史中的时间和空间这一主题。

1. 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

通过比较奥克兰出生组和或早或晚出生的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这一主题的全部重要性就变得很清楚了。比如，在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的样本中，在极为能干的年轻人中有大量的男性和女性出生于1908—1910年之间。他们在一战期间上小学，大部分在1920年代经历了相对繁荣的中产阶级生活。奥克兰的孩子们在经历过1920年代这一相对有保障的早期发展阶段后遇到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他们在1930年代最糟糕的时候因为教育、工作和家庭而离开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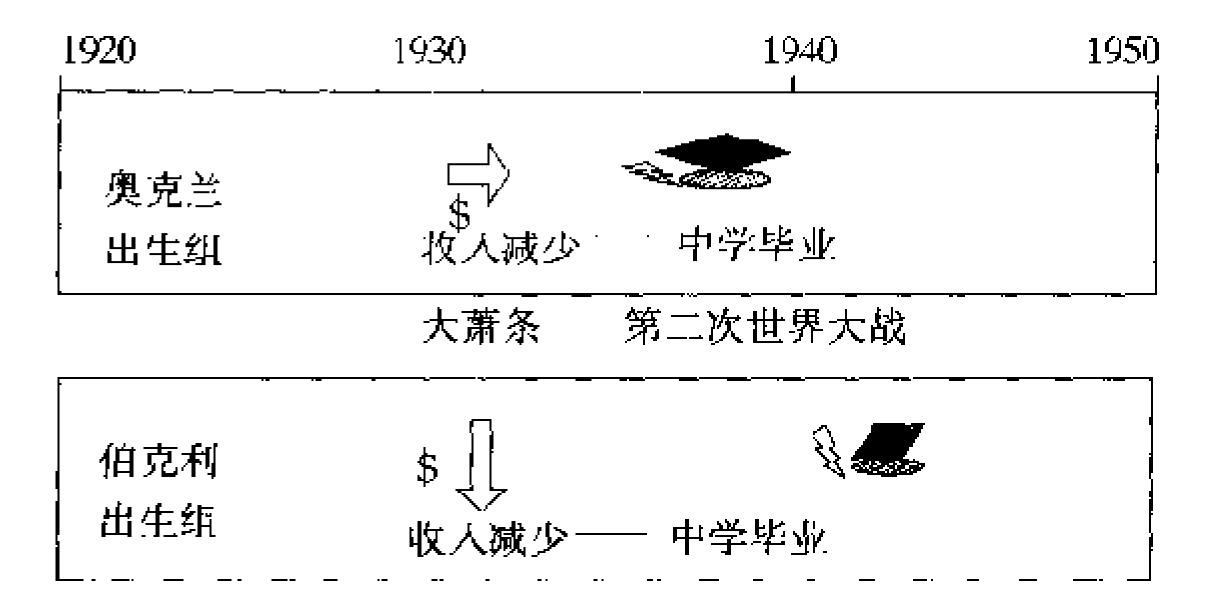


图10 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

[选自《作为发展理论的生命历程理论》，载G.H.埃尔德：《儿童发展》，1998，第4页。摘录得到了儿童发展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的许可。]

对于出生于1920年代末和大萧条时期的孩子来说，这种历史模式(historical pattern)会有显著的差异。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中的孩子们(出生于1928—1929年)年龄更小，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参照群体，他们在大萧条中最糟糕的时候度过了童年中最易受伤害的日子。这个时期他们承受着额外的压力，而且生活极不稳定(参阅图10)。[①] 他们的青春期是在"二战时空空荡荡的家庭"中度过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工厂中从日出一直工作到

① "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确属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个人发展研究所的两项不同的研究和出生组。奥克兰成长研究包括200位出生于1920—1921年而且在加州奥克兰东北部上学的儿童。他们的故事已经表述在《大萧条的孩子们》(Elder, 1974)中。引导研究(N=214)的研究对象是1928—1929年出生于伯克利的孩子，大萧条经历对他们成年后的影响，也曾在一系列出版物中提及，其中包括 Elder(1979,1981),Bennett and Elder(1979),Elder, Liker and Jaworski(1984),Elder, Liker and Cross(1984),以及 Elder, Downey and Cross(1986)。

奥克兰成长研究的样本在本书中已经描绘过了，还有测量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方法也已提到(参阅第一章)。伯克利引导研究中的出生组包括214名儿童(其中102名是男孩)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在整个30年代到二战结束的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属于研究对象。大部分孩子是白种人和清教徒，其中有2/3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家庭中有3/4是由本国出生的父母占支配地位的。以每年斯坦福—比奈特智力测验(6—15岁)所得分数的中位数作为平均值(IQ=118)。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数据资料包括历时17年的社会经济信息、每年的学业表现记录、教师的评分、对母亲、儿子的定期访谈以及心理评分。

1929年，伯克利样本家庭的平均收入为2,300美元，有相当一部分父亲还充分就业。3年之后，也就是在大萧条期间，家庭收入下降了30%，整个加州家庭的一般情况也是如此。在1929年和大萧条最高潮之间，经济状况跌到低谷(不到1,500美元)的伯克利家庭增加了两倍以上。相对奥克兰成长研究中的例子来说，伯克利引导研究中的成员都属于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相对经济未受损和经济受损的群体。对于那些没有收入记录的家庭，我们按照失业和公共救济的情况把他们分类。对于这两项研究的样本来说，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家庭的比例差不多；进行更加细致研究的家庭是拥有收入数据的，而不那么细致研究的是没有这些资料的(36%对57%)。

日落。

生长在大萧条的1930年代和生长在战争总动员的1940年代的孩子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青少年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年轻人认为谁对他而言是重要他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重要他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熟人。大萧条中的艰难岁月，通过这些孩子父母的经济受损和失业，也通过大萧条对于常常跟着他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祖父母的影响，对这些青少年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对于二战中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青春期的显著特征包括：父母在与战争有关的产业中就业，而且从早干到晚；哥哥服兵役和受到战争的伤害；为了保卫国家和战争需要，对学龄孩子进行总动员。为了解这些历史性力量的作用，就必须寻找一条以转变中的环境（transforming environment）为起点，而不是以个人或其他社会因素为起点的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大萧条的孩子们》中所提出的研究框架，本书追寻的是大萧条中经济衰败对于孩子们生活的影响。

奥克兰和伯克利的研究对象因其所处的出生组不同，碰上的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也不同。一些人不到20岁就结婚了，而有些人8年后也没有结婚。早婚可能会导致生活中不利条件的累积，这些不利因素包括从社会经济艰难到丧失受教育机会等。早育会带来相似的后果。在今后的生活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们在他们父母生活的不同时期离开了家庭。无论相对早或晚，生活转变的时机都会通过对随后转变的影响而带来长期后果。生活中的时机这一主题（principle of timing in lives）表明：

2. 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于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什么时候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

这些"时机"变量的影响，部分取决于它们如何和正在变迁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要素融为一体。因此，"十几岁的母亲"是在匮乏的1930年代还是在经济繁荣的二战时期就有不同的含义。而且，遭遇大萧条或二战的年轻人究竟会怎样，部分还取决于那时他或她有多大。生命阶段的概念集中描述的就是生命中历史事件发生的时机。

如果用相应的观点来看待大萧条中的艰难，我们认为对于年纪较大和年纪较小的孩子——比如奥克兰出生组和伯克利出生组——来说，它的意义和影响明显不同。年纪较小的伯克利孩子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我们还发现这些重要事件对男孩的生命历程特别容易产生负面的心理作用——受损的自尊、自我调节不足、缺乏自我引导和目标。伯克利的女孩由于和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所以得到了更多的保护，而且在艰难岁月中，她们生活在母亲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

生命阶段的重要性，与事件发生的情境和生活期望有关。年纪小和年纪大的孩子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史进入新的境遇，而且因此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社会变迁。在大萧条中，有些劳动阶级的父母生活艰难，又碰上了失业和收入的降低，而中产阶级的父母常常是第一次碰上这种损失。相对而言，后者会因为地位丧失而更感到沮丧，而且比劳动阶级家庭对于艰难岁月所做的准备要少。在经济复苏的时候，这些制约因素的负面影响，因其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拥有更为丰富的个人才智而被削弱了。在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的样本中(Elder, Liker and Jaworski, 1984)，大萧条艰难岁月的持续负面影响，对于男性的作用大于对于女性的；对劳动阶级女性的作用大于对中产阶级的。

通过家庭和家庭成员"相互关联着"的命运，历史性事件和

个人经历被联系在一起。一位家庭成员的不幸通过彼此间的关系而得到大家的共同分担。比如，大萧条中的生活艰难增加了脾气暴躁的父亲发怒的可能性。在经济压力下，他们变得更为暴躁，这对婚姻质量和为人父母(parenting)水平的负面作用更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和代际间，不稳定的人格(暴躁、脾气变化无常)和不稳定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有着相互强化的机制。[5] 通过个人人格的持续性和代际间的传递过程，这种机制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发现支持相互关联的生活这一主题。

3. 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

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包括四代人：祖父母(G1)，出生于1870年左右；大萧条孩子们的父母(G2)，出生于1890—1900年间；研究对象(G3)，代表了大萧条的孩子们，出生于1928—1929年；以及他们战后出生的的孩子(G4)。在儿子们和女儿们的眼中(G2)，情感上不稳定和易怒的祖父母(G1)一般婚姻都不和谐，而且对后代颇有敌意。这和第二代(G2)在大萧条中的经历极为相似。G3代在童年的坏脾气和问题行为，与同龄群体和父母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关。G3代成年之后，他们中坏脾气的成员(在童年时代和成年时代进行测量)可能被他们自己的孩子(G4)当做无法自制的和冷漠的人。

---

⑤ 有两篇论文探索了在四代人之间不稳定行为和关系的相互作用，参见 Elder, Caspi, & Downey, 1986; Caspi & Elder, 1988。这些研究还试图调查生命跨度中或者代际间行为的持续性。在这些论文中，两种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通过儿童社会化形成的行为模式，必定会持续到这些孩子刚刚进入成年的时候，进而会影响这一代为人父母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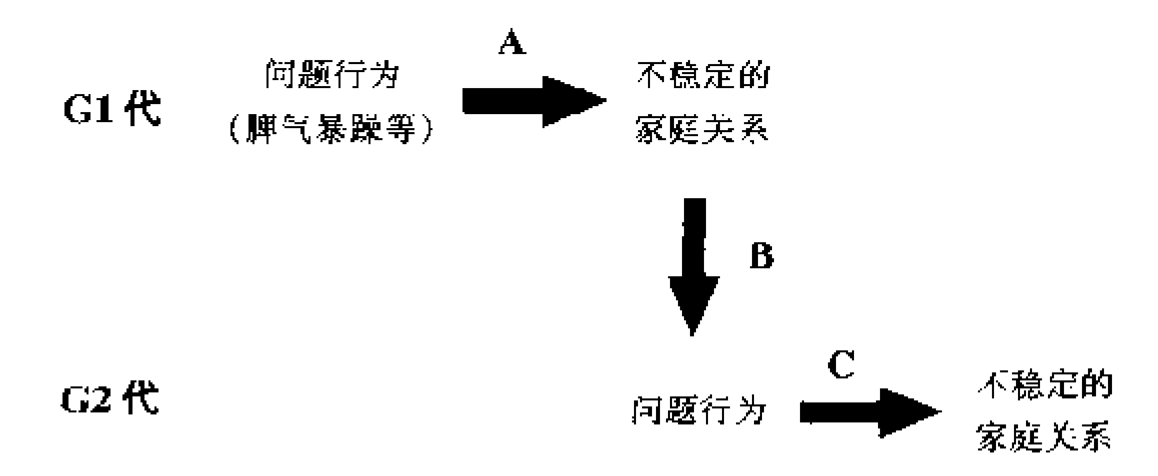


图 11 代际内和代际间问题行为和不稳定的家庭关系之间发生关联的过程

［选自 A.R. 索伦森、F.E. 韦纳特、L.R. 谢罗德编:《个人发展和生命历程:跨学科的视角》(希尔斯代尔, 1986),第 306 页。这里的摘录已经得到许可。］

这种令人厌恶的家庭模式在父母对于孩子们不稳定的影响之间起了中介作用,而且通过那些最无法维持和培养持久关系(图 11)的后代的成长,在下一代中再次出现。这些例子包括 G2 代和 G3 代中的这些成员: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历了父母婚姻的不和谐,而在他们自己的婚姻中这种情况又再次出现。尽管许多跨越时间的(cross-time)和代际间的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相关的,但是注意到大部分变异依旧需要解释,也非常重要。在代际循环(generational cycle)中,有许多转折点和突变处。比如,对于那些父亲在压力下相对平静而且才智突出的孩子来说,30 年代收入的急剧下降给他们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小得多。那些使大萧条家庭的孩子们免于受无情父母伤害的保护因素,包括一位能够教养孩子的母亲和孩子们外在的吸引力。

大萧条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失控的世界",我们在暴躁行为和不和谐关系的代际循环中提到了能够说明这一主题的证据。

但是这幅画面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许多家庭常常能够成功地适应困难的环境。父母和孩子们可以在有限的选择和制约因素中进行挑选，并采取有效的适应行为。我把这种活动作为衡量个人主体性的一个指标。因为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所以母亲们不得不在少得可怜的选择中寻找和发现工作，而她们的孩子们则承担了家庭和社区中的责任。当处于困境的父母们把住所迁到更加便宜的地方，并寻找其他形式的收入时，他们就卷入了一种"创立一个新生命历程"的过程。正如这类行为所表明的那样，个人主体性的主题指的是：

4. 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

研究观察者认为，那些因为自己的家庭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在 1930 年找到有薪工作的奥克兰男孩们，比没有工作的孩子更有能力，也更加生气勃勃。有薪工作对于勤奋的人来说是一种吸引力，也是加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这一信念的源泉，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一位工作着的男孩的母亲，把她的儿子描述为有着"一个接一个充满活力的兴趣，并常常付诸实践"(Elder，1974，第 145 页)。和其他男孩相比较，那些工作着的男孩作为社会的一员，在初中和高中时就变得更加独立，人们也认为他们对于母亲管理的财务肩负着更多的责任。除了家务琐事外，这些工作着的青少年承担了和成人责任类似的义务。从观察者非常仔细的追踪中，我们发现，他们在价值观、兴趣和活动等方面，的确比其他青少年更加成人化。

根据现有的知识，这些早期的经验观察资料已经证明了生命历程理论中的核心主题。正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历史的时间这一主题在今天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他们的新社会史对于生命历程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群

伙中尤其突出的是塔马拉·哈雷温(Tamara Hareven, 1978, 1982, 1996),他开创了对家庭和生活的历史性研究。在与他合作的关于曼彻斯特的新汉普郡人(New Hampshire man)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区域)导致了生活机会和成人职业生涯的不同(Elder and Hareven, 1993)。另外一个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莫德尔(Modell, 1989)关于20世纪美国有关青少年社会制度(比如约会、求婚)形成的研究。历史学家和个人发展学家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时空中的孩子们》一书中得到了证明(Elder, Modell and Parke, 1993),这也包括对于在历史脉络中研究孩子们的方法的深刻阐释(参阅 Cahan, Mechling, Sutton-Smith and White, 1993)。

时机的主题和50年代以来伯尼斯·诺嘎藤(Bernice Neugarten)关于成人发展的研究有关(参阅 Neugarten, 1968; Neugarten and Datan, 1973; Hagestad and Neugarten, 1985)。在60年代,对于年龄的社会学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于事件的时间模式对社会和个人含义的了解(参阅 Riley, Johnson and Foner, 1972)。生命事件的时机有计划地改变,是对个人主体性这一主题的一种表达。人们对于时机的选择构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Clausen, 1993)。对生命历程这一理论的思索中,个人主体性的基本地位得到了一系列发展的支持,这包括班杜拉(Bandura)关于自我效能(1997)的开创性研究,以及遗传对于环境选择的影响的知识更加丰富(Dunn and Plomin, 1990; Scarr and McCanney, 1983)。但是确定某个选择的可能性取决于所拥有的机会和历史的制约因素。

相互关联的生活这一主题,是对个人生命模式最早的社会学解释中的一个关键前提(参阅 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1920),而且因为它包含着角色序列和共时化(synchronization)

等概念，所以依旧是今天生命历程理论的一块基石。现在，相互关联的生活这一概念成了个人发展生态学中的核心(Bronfenbrenner,1979)，并且表现在研究个人网络的模型之中(Granovetter,1973)，表现在人们的朋友和家庭在流逝时间中的相互扶助中(Kahn and Antonucci,1980)。生活计划(life planning)和行动中的共时性，指的是生活的同舟共济，特别是指时机方面(Hareven, 1991)。家庭管理(family management)的概念(Furstenberg,1993;Sampson,1992)一般关注的是伴随着其他适应性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生活共时性的有效性。[⑥]

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力量塑造着家庭、学校和工作的发展轨迹，反过来它们又影响着行为和特殊的发展途径。人们能够选择他们所要走的路，但是他们的这些选择并不是在社会真空(social vacuum)中做出的。所有的生活选择都取决于社会的和文化的机会以及历史的制约因素。这种想法既促使我使用伯克利研究所中的生活记录去研究大萧条孩子们的方法的形成，也促使我以后数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对一系列生活和发展进行观察的方法的形成：二战和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代美国农村的不利地位和城市中的贫困。

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除了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主要历史事件的作用，尤其是二战和朝鲜战争。比如，奥克兰的男性在二战时的年龄都足以参战了，而更为年轻的伯克利男性一般都是在大后方全民总动员的生活中感受这场战争。这些孩子大多参加了朝鲜战争。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将总结对这

⑥ 对于这些主题更加完整的说明，参阅埃尔德：《生命历程和个人发展》，见W.戴蒙编：《儿童心理学手册》，第2卷；R. M.勒纳、威利编：《个人发展的理论模型》(1988)。也可以参阅Elder,1995,1996。

种经历的解释，就像我在一系列论文中曾谈及的那样。[7] 刘易斯·特尔曼的样本（出生在 1903—1920 年）中能干的男性和女性也都遇上了大萧条和二战，但那是在他们生命中较晚的时期。我的研究也显示，他们碰上这些历史事件的时间较晚，但这些事件对于他们的生活仍然有着持久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二战的影响。[8]

另外一次验证社会变迁影响的研究，是我们 1980 年代末在上海的研究，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对刚刚出生于天安门广场盛典之前的男性和女性生活之影响的生命史研究。这次调查是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和卡罗莱纳人口中心（Carolina Population Centre）合作进行的。我们运用回溯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在 1987—1988 年冬季调查了上海的 1,300 个成年人。[9] 尤其对于那些上山下乡的城市年轻人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和制约力导致了组建家庭的延迟，也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得常见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因为在发展中的社会里，没有现成

---

⑦ 有关服役对于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影响的研究，关注的是入伍年龄（Elder, 1986, 1987）和参加战斗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可以参阅 Clipp and Elder, 1996。

⑧ 刘易斯·特尔曼对于加州极为聪明的人的研究，是在 1922 年进行的，包括大约 1,500 位男性和女性，他们一般都出生于 1903—1920 年间。在 1928 年、1936 年、1940 年、1945 年、1950 年、1955 年、1969 年进行了后续研究，然后在 1972 年、1977 年、1982 年、1986 年和 1992 年再次进行了后续研究。霍拉汉、希尔斯在 1995 年出版的书中提供了到 1986 年男性和女性生活的总回顾。我们对于特尔曼数据的全部分析关注的都是男性，强调的是二战的影响。为了使数据更加适合有关战争总动员的影响，我们怎样处理数据的说明，可以参阅《处理数据资料：研究生活》（Elder, Pavalko and Hastings, 1993）。入伍年龄的影响，可以参阅 Elder, Pavalko and Hastings, 1991；Elder, Shanahan and Clipp, 1994。

⑨ 有关文化大革命对于生命历程影响的描述性解释，参见 Elder, Wu and Yuan, 1993。有关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的更加概括性的综述，参阅 Elder and Ge（出版中）。

的对于或近或远的过去预期性的纵向研究，所以这种研究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显示了回溯生命史的技术对于重新获得有关过去事件的持续影响的知识是有效的。

在1980年代，因为地价的暴跌，美国的农村地区又重新面临艰难岁月，这又触发了人们对于大萧条所引起的震动的回忆。这一事件导致了我们和爱荷华州州立大学的合作，我们对经济压力如何影响家庭关系和孩子们的生活经历进行重返性研究(panel study)。[10] 在爱荷华州北部中心地区有1/3的家庭从事农业，1/5的人口无论是在童年还是成年后都没有从事过农业。这项研究开始于1989年，利用"大萧条的孩子们"研究中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对451个家庭进行了研究，而且由于有关"关联"或者干预经历方面的资料更为丰富，所以这项研究也在各个方面扩展了上述的分析模式。

在大萧条研究中，家庭及其适应性被作为普遍的经济衰退和孩子们福祉之间的关联。债务、收入的减少和不稳定的工作，增加了孩子对于家庭所承受经济压力的感觉。他们提及的这种压力越大，父母感到沮丧和婚姻不和谐的风险就越大。这些过程逐渐使父母在做父母方面变得不够格，并增加了男孩和女孩

---

⑩ 爱荷华的年轻人和家庭项目(the Iowa Youth and Families Project)，是由爱荷华州埃姆斯家庭研究中心的R.康格指导进行的。这个课题开始于1989年，收集了这个州北部中心地区451户农村家庭的数据。这个样本包括451户完整家庭，这些家庭在1989年都有上七年级的孩子，孩子的数目也相似。我们通过调查、访谈和录影来收集资料，并用录影来说明家庭中的互动。在1992年、1994年(研究对象上高中了)、1995年和1997年对每年的资料进行收集。第一次调查的基本报告，在1992年3月提交给华盛顿的青少年研究协会(Elder，1992)。《困境中的家庭》是从第一次调查所得数据中获得的发现，将由阿尔德·德格鲁特出版社出版(Conger and Elder，1994)。第二次名为《离土而去：世纪末的农村年轻人》(Elder & Conger，出版中)的专题报告，在1999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项研究建立在1989年到1994年五次收集数据的基础之上。

在情感上受到困扰、学业出现问题和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在1980年代末，最为痛苦的年轻人和父母集中出现在那些在危机中失去农场的家庭中。流离失所的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的困扰最大，也对父母的冷漠和拒斥感受最深。他们的父母也最为痛苦。当我们追踪这些年轻人到高中时，流离失所的影响开始减弱了。实际上，我们发现流离失所的年轻人在上十年级的时候和其他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没有什么差异，这让我们十分惊讶。在这段时间内，农场家庭的总收入急剧下降，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自信和确立目标方面并没表现出收入减少的负面影响。

这种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家庭资源可能会削弱这种收入损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这个地区的年轻人创造通往更多机会的途径。从历史上来看，中西部和土地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在他们的社区——在教堂生活、学校和公民团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联系的强度在全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得到了最充分表述，但是这也适用于那些只是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适合那些不再务农的家庭，适合那些父母成长于农场但不再和农业有什么联系的家庭。我们把那些成长于农场但不再和农场有什么联系的父母作为参照群体。为了判断"和土地的纽带"的影响，我们把上面每一个群体和不务农的家庭进行比较。

完成了十二年级的学业并在学业上和社会上获得成功的年轻人，都与家庭和土地相关的丰富特征有关，同时也和父母的教育水平、收入和居住地的变化之类其他因素有关（参阅注释⑨）。和其他年轻人相比较，这些年轻人很少出现问题行为，而且在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上更为积极。这里尤其应该提到的是，这些结果是在农业家庭总收入损失惨重的时候获得的。除了这些条件之外，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的父母和社区机构（教堂、学校和公

民团体)的关系比其他家庭更为密切,这些父母的孩子也可能在学校、教堂和社区中更善长社交、更活跃。参与活动的这种形式,是最能预期年轻人成功和中学时心理健康的因素。

在爱荷华的研究中,当在我们北部大城市附近地区贫困率稳步上升的时候,城市内部的贫困也变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这种变化对于少数民族年轻人的特殊含义,我参加了一个开始关注费城市中心的家庭和少年的课题组。[11] 在附近地区的贫困率从10%上升到40%之时,这项研究调查了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成功途径的差异和面临的不同困难。

首先,我们提出了一个邻里间的友善关系(通过塑造家庭的互动和父母的行为)影响年轻人生活机会和发展的模式。我们假定,邻里间的友善关系为社会交往所提供的制度性资源(institutional resources),既能够使父母允许他们的孩子参与当地的娱乐活动和教育活动,也能够鼓励他们在抚育孩子的时候采用更为集体性的策略,也就是说让邻居和孩子们相互认识。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交方面处于更加有利地位的家庭,既更能使孩子们免受危险,又能通过和亲属居住在一起和上私立学校来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

不过,研究发现,所有能干的年轻人和抚养孩子的有效方式都出现在邻里关系友善的地区,即使是在那些因暴力和毒品而出名的地区,也是这样。此外,社会资源、父母实践的不同及其对处于青春期孩子的不同影响,在邻里关系友善地区"内部"也

---

11 W. 威尔逊的《真实的贫穷》中提到了大量有关城市内部贫困集中化(concentration of poverty)的资料,也可参阅Jargowsky,1997。受到高风险环境中成功青少年的麦克阿瑟网络资助,费城研究(Furstenberg, Cook, Eccles, Elder and Sameroff,出版中)在1991年访谈了487位年龄在11—14岁之间的青少年和照顾他们的人,并计划在1998年对这些青少年进行后续研究。

比地区"之间"明显得多。和邻里关系友善这个因素相比较，家庭的资源和策略对年轻人成功的影响更具有潜在性。这些发现和下面的假设明显冲突：邻里文化(neighborhood culture)对于学业上的成功和问题行为的出现都有极大的影响。但是这一假设也强调了在寻找摆脱社区不利地位影响的途径时家庭和年轻人的重要作用。

生命历程理论的出现

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有关儿童发展的开创性研究追踪他们的研究对象到了成年和中年的时候，发现人们对于个人发展方面的知识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以儿童为基础的发展观不适合成年人，家庭也不再足以作为行为持续性和变化的情境。特别是有三个方面的挑战加快了生命历程理论框架的出现。

(1) 用适应整个生命历程的发展和老龄化模式替代以孩子为基础、以成长为取向的发展观。

(2) 对于个人生活在社会交往中是怎样组织起来和怎样演化的思考。

(3) 把生活和永远在变动着的社会相联系，强调变动着的环境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

从1960年代以来，对这些挑战的回应促进和推动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形成。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家一步步建立了发展阶段、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迁之间的概念桥梁。个体生命历程及其与发展轨迹的关系，构建了发展科学和生命历程理论相融汇之处。

第一个挑战因素来自于生命跨度心理学(life span psycholo-

gy)这个在1969年才获命名的研究领域，它通过寻求整个生命跨度中有关个人发展和老龄化的更加令人满意的概念，对生命历程理论提出了挑战(Baltes and Baltes,1990)。这些概念包括选择机制、最优化和补偿等，这些因素使个人在发展中的获益最多，而付出代价最少。因此，年轻人选择那些他们有能力参与的活动，无论是体育活动、学术活动或者在街头流浪；同时，通过精力和时间之类资源的投入使他们获取的利益最大化。另外一个例子包括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累积的概念。有利条件可能带来更多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不平等不断累加的过程。同样，不利条件增加了新的不利条件出现的可能。最后，转型(状态的改变)、轨迹(连接状态和转变)和转折点(生命历程方向的改变)，这些概念贯穿了整个生命历程理论。

当伯克利研究持续到这些研究对象成年之后，他们更加关注这些人对于生活的"思考方式"，以及流逝的事件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些已被证明非常有用的概念差异。关系理论(relationship theory)根据社会关系的缔造者来看待生活组织，尤其是亲属关系和代际间的传递。比如，生命周期指的是为人父母过程中的一系列阶段，从孩子的出生、离开家到他们自己也开始生育。这个角色系列描绘了总是适用于某一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在代际传递的周期中，新生婴儿通过社会化而变得成熟，开始生育下一代，自己逐渐衰老、死亡。人类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这个周期，但是显然它并不是对所有的个体都适用，比如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

当我们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对"大萧条的孩子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对于社会演变过程有两种思考方式，但是没有一种是放在历史中的个体身上。生命周期是其中一个概念，职业生涯是另外一个。一般来说，职业生涯指的是不断变化着的工作生

活，这对于在同一时间扮演多重角色者的生活来说就过于简单化了。母亲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了一种有利于证实多重相互连锁轨迹（但在共时性上有所不同）这一新概念形成的环境。职业生涯这一视角，既不能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把按年龄划分的期望这些概念组合到一起，也无法指导我们分析不同世代生活的历史情境。

生命周期的概念能够有效地把所有生命阶段和世代连接起来。它提供了关于个体生活如何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深刻见解，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把发展着的个体和他们的职业生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过程。但是这个概念的焦点放在再生产和对孩子养育之上，这削弱了它作为看待考察生活方式的价值。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为它不适用于那些没有结婚的、没有孩子的和多次离婚的人。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这个概念也无法表现多重家庭和工作生涯。一般来说，每个人在同一时刻都要扮演多重角色，无论是夫妻和父母，还是夫妻和雇员。这些同时存在的角色也不是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所能包含的，因此它无法应用于对多重角色的研究。

作为父母养育孩子后承担的一系列角色，生命周期概念也无法反映社会时机和历史定位（historical location）。不同的角色并不是和年龄相关联的，因此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变发生了，是早了还是晚了。养育孩子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生在生命历程中从 15 岁到 45 岁这一广阔的生命跨度中。养育孩子的一系列模式，也不能较为准确地确定人类在历史中的定位。生命周期中包含世代（generation）这一概念，但后者同样对暂存的事物视而不见。相对于事件和长期趋势来说，祖先世代的成员在历史上的定位互不相同。比如，父母这一代可能拖到 30 或 30 多岁才生孩子，这个时间框架可能会包含大萧条、世界大战与和平

这些事件在内。

首先，在我们考虑大萧条是怎样通过在奥克兰成长研究中孩子的家庭来影响他们的时候，生命周期和职业生涯这两个概念间的差异是很有帮助的。这些研究对象出生在20年代早期，其青春期都处于大萧条的30年代，然后又都响应了二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N＝167)。记住上面提到的这些客观情况，生命周期和代际间的框架似乎完全适合调查大萧条的历史影响。我们按照经济受损(在1929年到1933年期间收入损失了35％以上)或者经济未受损、收入损失较小三种情况，对1929年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的所有家庭进行划分。在这一段时期内，生活支出减少了25％。在每一个社会阶级中，我们都假定经济困难通过改变三种家庭的进程，使孩子们的生活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图12)。这些进程中的每一种都代表了一种有关收入急剧减少和奥克兰孩子们的生活之间关系的宏观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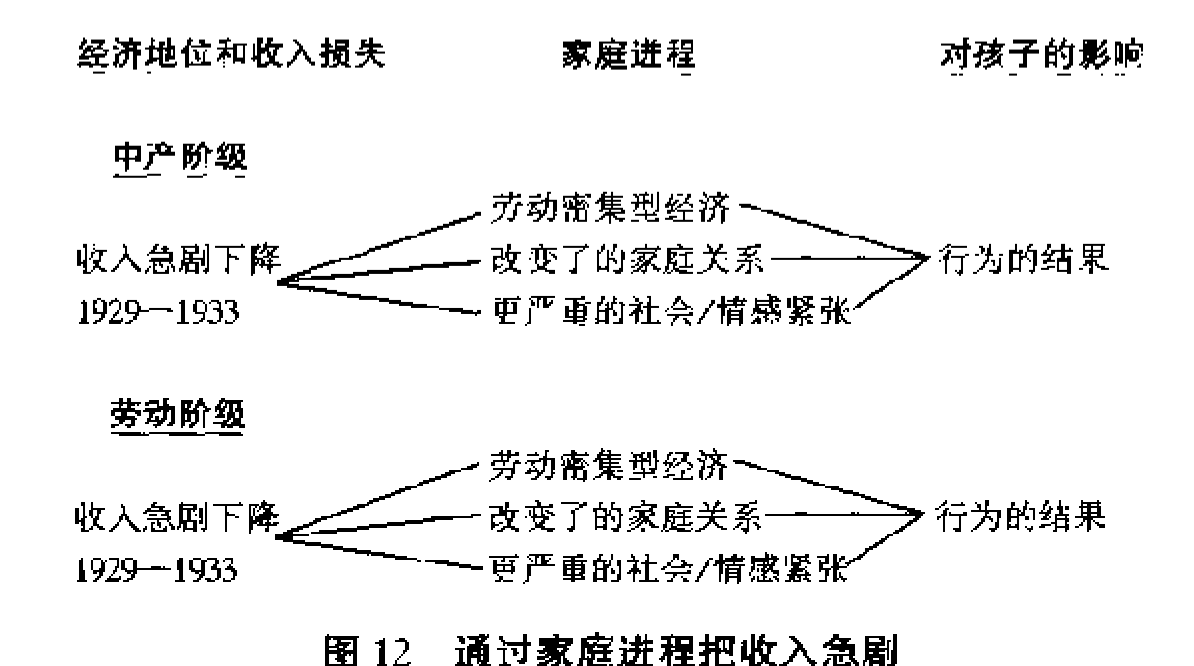


图12　通过家庭进程把收入急剧减少与孩子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1）家庭经济类型的改变：收入的减少使家庭经济更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这包括母亲和孩子进入生产领域，开始养家糊口；孩子们参与从准备食物到洗衣服等家务劳动；消费支出的减少。

（2）关系的改变：父亲收入的减少，以及因此导致的赡养家庭人员的改变，都增加了母亲的相对权力，减少了父母控制的程度和有效性，减少了作为偶像的父亲的魅力。在情感、权威和基本任务的完成方面，母亲成为家庭的核心。

（3）增加了家庭的紧张气氛：严重的经济受损增加了家庭不和、家庭瓦解和非道德化的可能性。家庭不和指的是家庭紧张、冲突甚至婚姻暴力和亲子暴力。家庭不和导致了家庭瓦解，导致家庭成员的行为失去控制，导致了古怪的、无法预期的行为，比如任意破坏纪律等。

从20年代到30年代末生活经历的这种急剧变迁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处理的。比如，这些变迁的影响取决于许多因素：家庭成员面临的经济损失和失业，孩子的发展阶段，父母的年龄。因此，经济和家庭环境的巨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要看父母和孩子的年龄。这些观察结果表明，彼此不同的以年龄为基础的概念——出生组、生命阶段和生活事件的时机——实际上关系十分密切。奥克兰父亲所处的出生组和生命阶段，是决定他们怎样对1930年代艰难岁月做出反应的重要因素。他们的反应之一就是改变特定生活事件发生的时机，比如从租房子到自己拥有房子的转变延迟了。

相邻的出生组在急剧变迁中的差异是最大的，说明正是社会变迁这一历史车轮导致了出生组之间产生差异。当不同的出生组碰上同一历史事件时，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所以

他们经历的变迁中就有了不同的内容。相应地，任何历史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依据出生组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而不同。赖德(Ryder)也再三强调这个“生命阶段的主题”。他指出每一个出生组碰上同一历史事件时，无论是萧条还是繁荣，它“都因其所处职业生涯的阶段不同而有明显的不同”(1965，第846页)。不过在面临相同历史变迁时，同一出生组的不同成员之间差异也很大。并不是奥克兰所有家庭都曾经历过经济受损。在某个单一出生组中，这项研究比较的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经济受损和经济未受损的家庭。

我们通过比较奥克兰成长研究和伯克利引导研究中的出生组，来验证生命阶段的主题。在经济崩溃的时候，奥克兰的孩子已经八、九岁了，他们告别了依赖家庭的日子，在经济开始复苏时已经进入了成年时期。比较而言，伯克利的孩子比奥克兰的孩子小七、八岁，在大萧条十年最糟糕的年份里，他们还要依赖家庭(表13)。出生组的差异表现在年龄的对比中，也表现在这些孩子从由儿童早期到成年这一段时间中经历艰难岁月和繁荣的不同次序中。这些差异表明了变迁是如何影响家庭成员的，而不是家庭如何适应他们在经济上的困难的。

表13　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成员在不同年龄段所遇到的历史事件

年份	事件	出生组成员的年龄	
		奥克兰	伯克利
1880—1900	奥克兰成长研究(OGS)中的孩子的父母出生		
1890—1910	伯克利引导研究(GS)中的孩子的父母出生		

1921—1922	萧 条		
1923	伯克利大火	2—3	
1923—1929	经济的普遍繁荣："借债生活模式"的增加，有关性观念文化的改变	1—9	
1929—1930	大萧条的开始	9—10	1—2
1932—1933	大萧条的深入发展	11—13	3—5
1933—1936	部分复苏，生活支出的增加，劳动者罢工	12—16	4—8
1937—1938	经济衰退	16—18	8—10
1939—1940	战争总动员的开始	18—20	10—12
1941—1943	战争产业（造船、军需工厂等）的主要发展时期，部队不断增兵的主要时期	20—23	12—15
1945	二战结束	24—25	16—17
1946—1949	战后经济的增长	25—29	17—21
1950—1953	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	30—33	22—25
1954—1959	公民权利时代的开端	34—39	26—31
1960—1973	民权运动：城市公民的冲突，越南战争	40—53	32—45
1974—	美国战后繁荣时代的结束，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加剧	54—	46—

奥克兰出生组：出生的年份为1920—1921年

伯克利出生组：出生的年份为1928—1929年

比如，收入的损失增加了债务，促进了低消费，导致更多地使用家庭劳动力以及花费母亲和孩子们赚的钱。它增加了母亲的相对权力，以及在男孩和女孩心目中母亲相对于父亲的地位。

它也使父母变得更为容易动怒，增加了婚姻冲突和酗酒的可能性。所有的这些差异都使年幼的伯克利男孩们处于极度的风险中。和更加年幼的伯克利女孩们及更年长的奥克兰出生组成员相比，他们受到大萧条经历的负面影响越大。他们变得更加不抱希望，更加缺乏自主性，对未来也更没有信心。

和更加年幼的伯克利男孩们相比，来自承受着沉重压力家庭的奥克兰男孩更可能参与家庭经济中属于成年人的工作，更渴望获得成年人地位，也较早承担起婚姻和工作中的成年人角色。在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象问题（自我意识、情感脆弱、渴望得到社会接纳）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来自经济受损的年轻人中尤其普遍，不过这种差异在这些研究对象进入中年之后就消失了。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孩们到了成年以后，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更加具体的设想。尽管他们在教育方面有些障碍，但是也打算在中年时能获得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位。他们强调工作的价值，但是也比那些有着更加优越背景的人更可能把孩子看成是婚姻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更加喜欢家庭活动和孩子对家庭的依赖。

当把两个出生组的男性加以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家庭艰难对他们有着相似的影响，这包括：集中体现在青春期和正式教育中的发展障碍；对于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而言，他们的工作成就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受到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都感觉成年后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满意（Elder and Rockwell，1978）。这些差异也表现在伯克利出生组中。伯克利出生组中经济受损的男性在青春期碰上持续的发展障碍越大，经济困难对他们教育程度的负面影响也越大，而且这些人直到 1950 年在心理上还感觉到更为不安。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在经济受损的伯克利男性中，发现他们在童年和成年健康状况之间出现断裂，这既包

括他们受损的发展状况，又包括他们的心理能力。

出生组的差异在女性中倒了过来(Elder，1979)。我们有一个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发现：在家庭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男孩和女孩的处境面临最大风险的年龄是不同的。如果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女孩还处于青春期初期，那么她的处境就更为危险，这部分是因为家庭贫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而处于这种情况下的男孩如果处于孩童早期，那么他的处境最为危险。我们发现有经济受损历史的伯克利女孩和奥克兰女孩不同，与相对于经济未受损的同龄人相比，她们在情感的自我满足和情绪的稳定方面做得相当好。除了家庭经历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磨炼外，伯克利的这些女孩大多数因为大萧条的历史而变成能干而又机敏的年轻女性。即使家庭的艰难就像限制奥克兰的女性受教育程度那样限制了这些女性受教育的水平，但是这种心理健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她们成年后，持续到她们进入中年。而奥克兰女性直到成年后建立家庭和开始工作的时候，心理健康的状况才得到改善。

伯克利的男孩们更容易因家庭经济受损而受到伤害，这和表明这些条件对处于儿童早期的男性特别不利的发现是一致的(Rutter and Madge，1976)。但是为什么奥克兰的男孩们过得挺不错呢？部分解释集中于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家庭角色和地位上。他们更可能在家庭之外找到工作，更可能给他们经济上发生危机的家庭提供帮助。这种变化加强了他们的社会独立性，减少了他们面对家庭压力的可能性。而奥克兰的女孩们因为要做家务，所以不得不更多地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在伯克利出生组中，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由于母亲的保护，而免遭同龄男性所处的困境。进入青春期后，这些女孩变得和母亲更加亲密，而男孩们则变得和母亲更加疏远。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研究始于生命周期传统所包含的各种概念，比如生育、养育孩子的阶段和世代。为了寻找能把家庭、个人经历(尤其是出生组和生命阶段)与历史变迁联系起来的方法，为了确定整个生命历程中按照年龄等级划分的轨迹，我的研究很快转向了年龄的概念化意义(conceptual meanings of age)。关系和年龄这两个理论线索，提供了生命历程理论在时间、情境和进程方面的基本特征。生命历程在各种制度和社会结构中是按年龄等级划分的，它嵌入制约和支持主体行为的关系中。人们归属于一定的出生组，从而被置于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各个世代中的他们也通过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

通过把关系概念和以年龄为基础的区分(age-based distinction)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个人生命跨度的概念，生命历程在1970、1980年代变成了一种富有生命力并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发展轨迹与他人的生活和发展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对生命跨度的研究来考虑问题，后者把个人的发展当做一种公开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历史上与社会和文化进程是不同步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布朗分伯伦纳(Brofenbrenner)的生物生态理论(bioecological theory)(1989)有很多相似之处，与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情境的可变性(contextual variability)上的伦那(Lenner,1991,第27页)的理论也有相似之处，和发展科学中正在出现的视角也有相似之处(Cairns,Elder and Costello,1996)。

在1960年代以来这些进展的基础上，这种正在形成的理论在发展的进程、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之间建立了概念上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建立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年龄使每个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位置上和特定的出生组中。根据现有的这些研

究,安妮·科尔比(Anne Colby)提出:"在过去30年中,生命历程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总结道:"这种被国际社会和各学科所广泛使用的研究途径的形成,是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成果"(Giele and Elder,1998,第viii页,第x页)。

使生活好转

对1930年代的普遍看法使大家都认为,这些孩子的未来是黯淡无光的,因为他们的未来是由公共资助、失业的父亲和父母间激烈的争吵所塑造的。大萧条中这些人的工作没有保障,在经济上又损失惨重,这些都和二战所带来的压力融合在一起,对于参与战斗的男性来说尤其如此。在奥克兰研究中(1959),一位前水兵由于对自己在南太平洋登陆的一切记忆深刻,总是摆脱不了使他痛苦多年的噩梦——"午夜的呼喊和尖叫。"虽然二战已经结束了20年,但他只要闭上眼睛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胳膊浸泡在水中。""这种恐惧令人窒息……它使我的勇气丧失殆尽,使我控制不了自己,无法走下登陆艇。"

在70年代我们又找到了这位老兵,他已经是一位退休的成功的工程师,并负有管理责任。他有一个家庭,孩子已长大成人。我们问他服役对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否有影响。在他的记忆中,在前线服役的岁月培养了他在不利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能力——"每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生存下去——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还有变得可以让人信赖"。在这些能力中,有一些可能来自于1930年代其经济受损家庭的背景。其他研究对象也设法克服了童年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实际上,和那些生长在经济未受损家庭的人相比,我们没有发现那些生长于经济受损

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健康受损或事业受损。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伯克利出生组和奥克兰研究中的男性和女性。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萧条的孩子们直到中年遵循的都是一条具有恢复能力的轨迹。从他们的社会出身来看，他们做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好。根据米切尔·拉特(Michael Rutter,1985,第608页)的说法："这种恢复能力的性质，在于人们怎样应付生活的变迁，在于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境遇做了些什么。"这种恢复能力从何而来，为系统性的调查提出了许多问题。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伯克利出生组中，那些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生活也出现了好转。尽管这些年轻人缺乏自信和情感上的平静，在青春期也没有制定将来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他们在中年时所获得的成就，和那些没有经历过艰难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该怎样解释这种转折点呢？是什么样的经历和社会因素使这些人的生活好转，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成就？

在大萧条和二战后许多年，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的主持人麦克法兰(1963,第338页)同样被这些男性的成功弄得目瞪口呆。她提供了一些有关值得考虑的潜在影响的思索成果。和那些基于不同理论基础进行探索的研究小组的预期相比，伯克利的一些男性成年时更加稳重，做事也更加有效。在她所观察到的东西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青少年时期学习成绩比较差的男性，许多"都拥有他们现在所处位置需要的创造力，但是当时完全被掩盖了"。"在我们全部的研究对象中，最为杰出的成熟的成年人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曾面对极为不同境遇的人，来自于那些对我们来说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性格使其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的人"(Macfarlane,1971,第413页)。

这些反思决不是来自科学的观察，但是它们显然和我们发现的结果一致。麦克法兰试图寻找这种解释：为什么在早期经

历和成人后的生活历程之间，个体的精神和感觉世界之间会出现差异。首先，她提及人们都没能认识到艰难历程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的成熟价值观。正如她所说，"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经历痛苦、迷茫的过程就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1971，第341页)；其次，她公开批评我们对于这些孩子在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的经历(包括后期可能发生的改变生命轨迹的事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根据麦克法兰所说，伯克利男孩中大部分都没有获得一种自我认同的感觉和力量，直到后来的境遇"逼迫他们或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承担能够使他们获得成就感的角色"(第341页)。因此，每一步发展都可能与离开家和原来生活的社区有关，因为这种改变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他们能够"摆脱早期的迷惑和压抑"。

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伯克利和奥克兰的男性和女性正在变动的世界。社会变迁可以通过开创新的机会和新的职业生涯而使生活好转，它也可以结束特定的选择。有三种变迁和加州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适用于老兵的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又为这些重新回到祖国的老兵提供了前途远大的受教育机会。对于"大萧条的孩子们"来说，大学教育代表着摆脱了过去的不利影响。

比如在伯克利的男性中，只有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才能构建一条使他们具有恢复能力的轨迹；而且无论成就的大小，他们总能因此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成就。进入大学后，那些有着经济受损历史的男性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男性更专心于功课，而这又是决定他在今后的工作中是否能获得重要成就的因素(Elder and Rockwell，1979，第281页)。不过我们也必须提及，那些在30年代处境更不利的家庭比其他家庭更不可能送他们的儿子上大学，而那些上了大学的孩子无疑更想获得成功。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婚姻以及相应的上大学机会和工作地点。40年代的初婚年龄下降了，也许是战争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这种不确定性贯穿了从1950年到1953年的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婚姻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第三个因素是服兵役。在1940年早期全国范围的战争总动员，迫使男性和女性走出家庭和当地社区，扩展了他们面前的生活机会。那些由于战后对于人员的需求和朝鲜战争而参军的男性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甚至从二战开始，服兵役就被看成年轻人获得更多机会和摆脱家庭和社区带给他的不利条件的中介。

作为一个转折点，服兵役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常常为年轻人提供结婚和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新选择。这些男性通过总动员参军入伍后，有可能找到潜在的配偶，而且能够获得技术培训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奥克兰的男性中有9/10参与了二战，而伯克利的男性中将近70%服过兵役，他们主要是参加了朝鲜战争。

旧金山湾的动员

对于那些成长于30年代并参加过二战的经济受损的年轻人而言，服兵役有三个方面同他们明显的能力恢复有着直接关系：它使年轻人离开家庭获得社会独立性，它提供的暂时休整使年轻人摆脱了年龄等级的压力，到海外执行任务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和丰富了他们的经历。

最重要的是，进入部队服役意味着脱离家庭的影响，意味着在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获得了社会独立性。服兵役使好几万来自不同地区和极端孤立社区的年轻人汇聚到一起，并且对他们进行大规模训练，这都导致了有利于他们适应巨大生活变

迁的各种条件形成，同时使他们冲破大萧条导致的家庭艰难、意志消沉和消失的机会的束缚。不过，刚入伍就"切断"和过去经历的联系，也许是不利的，也许是有利的。对于这些新兵来说，基本的训练通过使他们和过去分离，使同龄人之间彼此平等，并且形成了同志般的友谊。它提供了（至少是暂时地）除种族以外的新身份，因为它要求统一的着装和外表，使隐私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以集体成败来看待个人的表现。有一个奥克兰老兵谈及那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环境"，在那里个人的失败会被当成整个集体的失败。

其次，服兵役可以使年轻人和那些根据年龄等级确定的职业生涯的一般期望一刀两断，这是一个不承担职业发展责任的暂时休整或延迟实现的时期。在一个结构性很强的环境中，服兵役的义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摆脱教育、工作和家庭压力的暂时休整的机会。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对一个服兵役的人有所质疑，不能说他的职业生涯毫无进展。只有服兵役这种行动，才能为那些和人们对于不同年龄的人职业发展期望的不一致行为做出适当辩护。事实上，斯托夫（Stouffer）和他的伙伴们都曾提到，对二战中的许多士兵来说，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事实。这些人的生活由于服兵役而中断，但这意味着他们"获得了一个机会，能够评价他们的生活已经走到何处，考虑他们将往何处去"（1949，第572页）。

动员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拓宽了人伍者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见识。动员通过丰富人伍者和他人互动的经历，包括能让他们碰上新的人和到过新的地方，增加了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这些人通过这种经历，可能会更为了解自己和他人，而且可以通过增加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支持的来源而使他们获得更加丰富的互动经历，而且可能还培养了他们对社会差异更具容

忍性。哈维格斯特(Havighurst)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访谈了一位老兵,这位老兵曾谈及他在部队中的许多熟人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差异,他们都影响了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这种经历"拓宽了我的眼界……我开始用比以前更加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Havighurst,1951,第188页)。

与这些成长经历的每方面都有关系的,是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所提供的受教育机会。因为政府害怕回国老兵中存在广泛的失业可能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危机,所以他们努力促进GI法案的实施,因为它能给这些老兵带来教育和居住方面的各种好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津贴是"1944年的产物;它象征着一个国家还沉浸于战争中的情绪,这种情绪令人回想起大萧条,令人为未来感到担忧"(Olson ,1974,第24页)。从加州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教育领域,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成了影响那些老兵生活机会的基本因素。比如,几乎有一半的加州老兵提到,他们因为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而完成了某种程度的教育(Elder,1987)。津贴的教育部分是为那些年轻的男性所设计的,因为这些男性最可能需要完成大学学业。因此,对于那些更为年轻的男性来说,因为他们缺乏能够替代高等教育的富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比如婚姻、家庭和全日制工作,生命历程的普遍结构会使这种津贴和它所带来的好处变得更有吸引力。

长期以来,参军入伍都被看成是年轻人摆脱不利背景而获得新机会的途径,但是这种过程仅仅对那些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人适用。不过幸运的是,这些出生组成员在战争中伤亡相对较轻,因此我们必须掂量这一事实的分量,根据动员对于这些人重塑自己生活的影响衡量战斗所留下的遗产。伯克利的老兵中有1/5参加过战斗,而奥克兰的老兵中参加战斗的几乎有一半。

但是激烈战斗让人们的精神健康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两个出生组某些人后来的生活中依旧能够观察到。当走到生命中的第六个十年的时候，曾经历过激烈战斗的老兵中还有1/5提及外伤的压力所带来精神紊乱的症状(Elder and Clipp,1988,1989)，其中包括睡眠不宁、沮丧和焦虑、眼前总是闪现战斗的场景。但是，这些老兵仍然倾向于认为，战时的经历使他们懂得了应对的技巧、自律和生命的价值。

总而言之，我们对作为转折点的服兵役的解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把大萧条的艰难和服兵役联系在一起，尤其对于那些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入伍的人来说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功绩和个人成就感的经济受损的男孩们，会为部队的自豪感和自尊、男子汉气概的表现和军服的作用所深深吸引；看来他们变成了仅仅因为入伍才值得一提的人。解释的第二部分假定服兵役扫除了这些孩子一直面对的不利条件。现在我们来看看条件最为不利的一组：伯克利的男性和他们的战时经历。

当1940年代开始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更为年幼的伯克利的孩子还在上中学，周围都是努力备战的景象(Elder,1986)。战争的迹象和意识的觉醒随处可见。当地的广播电台播放了一系列冠之以"我的战争"的节目，戏剧性地表现了"每位男性、每位女性和每个有孩子在前线的家庭对于这个战争时代的贡献。"孩子们在周末晚上看电影时，又通过纪录片看到了战争的实况。来自附近军事基地的一队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咔嚓咔嚓地通过奥克兰，军舰在圣弗兰西斯科湾进进出出。许多家庭都在空地建造胜利花园——据报道，1943年期间在东部海湾地区这种花园就超过了40,000个。在备战过程中，年轻人所承担的充满生机的角色和他们因此获得的重要感，明显地通过似乎永无止境的收集肥羊、废纸、废金属，甚至是乳草属植物种子的冲动

来实现。

在同龄人中，"战争"成了伯克利的男孩、越轨的女孩、学校、父母和"我想要的东西"这些话题中最为流行的一个。当战争开始变得对美国和盟国有利的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和朋友谈论的是什么？这些话题包括大众文化（比如电影）的各个方面、和女孩们的关系、家庭和学校事务以及和战时有关的各种事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人们能够选择的装备、新的防御者和他们的家庭以及战后的计划。有一半以上的男孩承认他们经常和其他孩子谈论战争，偏好谈论和服兵役有关的事情的比例稍微少一些（53%对41%）。对于许多男孩来说，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军事力量的不足。

这些偏好既反映了孩子未来的生命历程，又反映了能够追溯到大萧条的不利条件。有稍微低于70%的伯克利男孩最终到部队服役，而那些发现战争特殊之处的男性一有机会就参军了，这常常发生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较早入伍的孩子进入部队时年龄还不到21岁，较晚入伍者年龄最少有21岁。在1943—1944年的调查中有关于"您将要做什么"的题目，差不多有70%的早期入伍者最终选择了军职，而较晚入伍者这样做的只有一半。而在他们上中学的时候，不到40%的从没有服役过的人选择了军职。

诸如低贱的家庭地位、经济受损、成绩较差和对自己不满等这种或那种不利条件，使军旅生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利的背景和入伍时机之间的关系大于和入伍本身的关系。这些孩子所处的条件越不利，他们入伍的时间越早（Elder，1986，1987）。实际上，那些较为年轻的时候入伍的男孩们，成了自己所属出生组中拥有条件最为不利的群体。他们在1930年代最可能生活在处于困境的家庭中，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也显得更没有前途。

和其他成年人相比,他们更没有目标取向,更没有信心,也更缺乏自信。

服兵役对男性生活的影响

刚邓入伍的新兵如何摆脱这种不利的背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区分入伍相对早和相对晚的士兵。较早入伍者(年龄不到21岁)和相对较晚的人相比,他们的家庭和个人条件更为不利。这些新兵和那些根本没有参过军的男性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后来在教育方面更加成功——70%的人都完成了至少某种程度的大学课程,而没有参军的只有58%。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使上大学对许多较早参军的老兵来说成为可能。

把服兵役作为大萧条的孩子们的一个潜在转折点的概念,部分建立于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服兵役的经历明显减少了原来不利条件的持续性。能够实现这个假设的一种方法是使男性能够运用他们的个人才智,对自己的教育、工作和家庭产生良好的影响。动机可以部分解释这些情况,其次是个人的品质,因为老兵常常把它当做服役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在这些品质中,自律、应付差异的能力和管理别人的技巧等尤为突出。这些品质最可能在30年代曾历经困境的孩子身上发现。他们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获得生命中的成功。而品德教育和有报酬的工作都无法确保这一点。

考虑到这种视角,我们假定服兵役对于那些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职业成就的预期作用,大于对于那些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的作用,而且服兵役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的。为了验证这些观点,我们对于来自两种背景——经济受损的和经济未受损的——的男性设计了相同的预期公式,

也就是说把他们童年时的智商和服兵役作为他们中年时所获取职业地位的先决条件(Elder and Caspi,1990)。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服兵役只对经济受损的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智商对于两种人一般都有预期作用。其次,服兵役的影响一般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的。这些结果表明一些大萧条的孩子们通过服兵役打破了不利条件所带来的恶性循环。来自经济未受损家庭男性的成就,相对来说最可能依赖他们自己的能力。

生活的转变如何表现在孩子的人格和社会行为中?较早入伍者和根本没有参军的人组成的两个群体的对比,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Elder,1986)。和较晚入伍的人不一样,这两个群体有着相似的阶级背景和经济困窘的经历。可以在他们成人后和 40 岁的时候,通过测量这两个群体的四种明确的心理功能来比较它们:自信心不足、目标取向或成就动机、社会竞争能力、服从。成年的时候,这些没有参军的人在这些方面都强于那些较早入伍的老兵。到了中年的时候,这些差异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和那些没有参军的人相比较,那些较早参军的人在发展上获益更多。后者到了 40 岁的时候,对待自我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而且更加自负和更有社会能力。

两位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的生活经历,证明了 GI 法案高等教育津贴在这些人取得成就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一位年轻男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他对自己在二战时十几岁就参军这件事持相当积极的态度。他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军职,尽管"成为水兵"依旧是他最初的目标。就像他妈妈那时候说的那样:"无论我想让他干什么,他都想成为水兵。"他遵循着这个目标,在 17 岁的时候就中断了学业,劝他的父母同意他参加海军。他在中东服役 4 年后,重新开始过平民生活,并通过 GI 法案高等教育津贴开始在印刷业中当学徒,而且和他中学的恋人结成

连理。另外一个年轻人,也有着相似的成为军人的愿望。他在中学的时候就辍学了,最终参加了海军。服役后,他成了空军预备役中的一员,并获得了中学的文凭。最终,他飞行的梦想使他进入大学学习电气工程,这也是因为GI法案高等教育津贴才得以实现的。

30年或30多年过去了,这些人如何看待他们服兵役的这一段经历呢?在1985年的调查中,我们提到"生活经历常常有一些既有令人快乐的一面又有令人不开心的一面"。从频繁的访谈和大量的文献中,我们列出了一个包含13种正面影响和14种负面影响的表格(Elder and Clipp,1989)。我们要求所有的老兵在其中选择服役的经历最令他们开心的3个方面和最不开心的3个方面。在积极方面,这些男性中有60%到70%选择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独立"、"自律"和"学会应付差异"。有一半的男性选择了"学会合作",接下来有1/3或不到1/3的人选择了"教育的益处"、"更加珍视生命"、"对自我的感觉更加积极"、"一生的朋友","工作的技巧"排在最后面。

人们可能会认为参与激烈战斗的人很少会提及令人快乐的结果,但有三种经历明显和激战有关。记住战斗经历只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模式,而老兵们确定了三种来自于他们战时经历的能力:学会如何面对灾难、知道自律和更加珍视生命。那些感到自己能够很好地处理战时压力的人,认为他们也获得了在最为困难的环境中支撑下去的技巧。一位二战中和朝鲜战争中曾担任实习医生的伯克利孩子,在回忆起他在前线令人难受的经历时曾说道:"我们救护那些受重伤的和垂死的人,在一直存在被杀死的风险下持续工作数小时。我设法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良好的判断力。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也能处理极端的境遇。"他引用了上面提及的每一种结果:应对自如、当他人

"迷失"的时候还能控制自己,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心怀感激。

自律对于身处前线的男性来说尤其有用。一位奥克兰老兵提到:"当战斗进行得紧张激烈的时候,你惟一的希望就是整个排的人都吸收消化了以前所学的一切,因为很多生命的丧失不是因为敌人的射击,而是由于自己的'反常行为'。"另外一位曾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相信部队教会了他遵守相当多的良好纪律,"无论新补充的兵员如何一直在消耗,你都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思绪,这能尽量减少你所承受的压力。"一位曾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老兵记得,那时他就是靠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才活下来的。当时他正在敌人防线的后面用止血带捆扎自己的胳膊,强抑伤口所带来的疼痛。这种经历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深处,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奥克兰的研究中,一个退伍的水兵今天认为自己的问题就是"做噩梦,至少一个月一次——它们总是让人产生挫折感,还有就是沮丧的感觉……曾于1968年和70年代到医院治疗……他相信这一切都源自服兵役"。

最后,那些曾参与激战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宝贵价值:86%的人认为他们退役后都怀有对生命更高的崇敬。而没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只有18%有这种感觉。一个奥克兰老兵宣称他"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看到这么多人正在受苦受难,他逐渐养成了一种新的同情心。"伯克利的一位老兵认为他能够承认生命具有更深刻的价值,是"来自于他们所经历的深厚友情、损伤和死亡。"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受战争的创伤之后会形成这种社会价值观,而不是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人们很少选择令人不开心的结果,但是有三种负面影响非常突出:"混乱的生活经历"、"与爱人分离"的痛苦和"职业生涯被耽误"(选择的比例均在40%到50%之间)。那些入伍较晚

（中学毕业后5年或5年多以后）的男性最经常提到这些选项。这个结果并没有因他们是否拥有战斗经历而出现差异。不到20%的人提及"战斗的焦虑"和"失去朋友"。这种经历正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集中表现在有过战斗经历的老兵身上，尤其是那些提及激战的人。经过激战的老兵中一半以上回忆起自己在感情上所承受的痛苦、亲眼看见的死亡、各种破坏和朋友的失去。

关于通过部队走向成年后成功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这种途径的普遍性。是否较早入伍是服兵役对男性生活产生有益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看看有关大约1,000名美国人的重返研究，这些美国人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成长于波士顿低收入地区（Sampson and Laub，1996）。这些人中70%以上都曾服兵役。配对控制设计（matched control design），最初是谢尔登和埃利诺在对少年犯罪进行纵向研究时使用的（Sheldon and Eleanor，1968），这项研究是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开创性研究。两个样本中的男性一般都在18岁或19岁时参加二战，大部分人都至少服役了两年。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少年犯更可能卷入声名狼藉地被迫退伍和其他形式的渎职罪中；但是和对照组相比，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也更可能从服兵役中获益。而且那些入伍较早的人尤其可能这样。因为这些年轻人足够年轻，所以他们能够通过部队的教育、在海外承担的职责和GI法案高等教育津贴而利用这段经历。特别是，那些有着犯罪史的男性如果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就入伍，那么GI法案高等教育津贴所带来的益处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所有这些经历都巩固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工作的稳定性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且他们到了中年之后，都不会因为他们童年经历和社会经济出身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总的来说，这些发现一直都支持服兵役是一种"早期时机"

的假设。相对而言，这对于那些年龄很大(30多岁)才参加二战的老兵一直很不利。刘易斯·特尔曼在他关于非常能干的孩子的著名研究中，也在加州男性身上发现了这些影响(Elder and Chan，出版中)。年纪较大的出生组，在自己生活中"不合时宜的时候"遇上大萧条和战争年代。和更年轻的出生组相比，这种不利条件将伴随他们一生，并且一直伴随到他们晚年。他们的工作更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收入更少，离婚率更高，50多岁的时候身体健康急剧恶化的风险更大。因此，正合时宜(timeliness)是决定服役从1930年代到战后岁月持续影响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特定的合适时机中，服役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是获得更多机会的桥梁。

在40年代和50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伯克利老兵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和利用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据观察，这里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首先，服役并没有巩固或增加所有人求学的欲望。一些精通某种技术(比如电工)的人复员后就开始从事相应的工作。其次，战斗经历使某些男性的心理受到伤害，而这些人一般在青少年时期的自我恢复能力(ego resilience)就是最差的(Elder and Clipp，1989)。第三，某些人回家后要承担家庭责任，这阻碍了他们开始或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些人无法得到妻子、孩子和父母的支持，而只有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他们才可能利用GI法案的高等教育津贴：个人牺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配偶给予必要支持的情况更加普遍。动员常常使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的老兵和他们未来的妻子聚集在军事基地或者医院。在某些情况下，战时可能分离的前景导致了匆匆结婚或早婚。对于那些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的男性来说，一位乐观的妻子将会改变他们沮丧的外表，使他们变得更有生气和抱负。

那些试图逃脱1930年代艰难生活的女性，一般都是通过嫁给可能帮助她实现这个目标的年轻男性。实际上，大萧条的经历通过增加个人之间纽带的重要性和减少高等教育对于女性的价值，来引导女性通过婚姻达到生命中的成就。就像一位父亲指出的那样，她们"只能结婚"。一位中产阶级的母亲对女儿的愿望就是"上大学、获得社会知名度和早婚"。这位年轻女性是在大学碰上地位比她更高的配偶，然后很快就退学结婚了（Elder, Downey and Cross, 1986）。这一代女性常常为了丈夫的工作和假定的家庭需求而牺牲了自己的教育和职业生涯。在塑造奥克兰和伯克利妇女婚姻经历的过程中，战时的就业、大学的校园和因为战时的需要而混杂在一起的人群都起了重要作用。丈夫参与二战和1950—1953年朝鲜战争的婚姻不知道有多少。

尽管两个出生组的女性在生命的不同时点遇上了大萧条和战争，她们都在机会、婚姻美满幸福而且全部精力都放在家庭上的时候——也就是在战后的繁荣时期——追求成人的职业。然而她们成年后的生活还继续反映出过去所经历的经济受损。那些成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在战后大多拥有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成为母亲后就业的情况也最为普遍。在两个出生组中，和经济未受损的女性相比较，她们都更可能早婚（Bennet and Elder, 1979），都更可能为了婚姻和丈夫的职业而牺牲自己受教育的机会（比起男性来更可能这样做，她们常常在完成学位前就离开学校了），更可能为了家庭的需要而就业。从丈夫的职业地位来衡量，她们结婚的时间至少和经济未受损的人一样，而那些嫁入中产阶级上层的女性比其他女性生育的孩子更多，抚育孩子的模式和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战后提出的生育力相对收入理论（relative income theory of fertility, 1980）一致。在两个出生组中，尽管通过婚姻

所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女性能够克服经济受损家庭所带来的匮乏和限制，但这种背景导致的许多偏好依旧继续影响着她们的选择。

对于两个出生组中经济受损的男性而言，社会地位的提高大多要依赖于教育程度和他们通过工作所获得的个人成就。与那些经济未受损的男性相比，他们更可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可能在中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有着稳定的职业生涯。工作和家庭是他们成年生活中优先考虑的东西。在这两个出生组中，主要是那些生长于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在中年时的地位超过了根据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对他们的预期（Elder and Rockwell，1978）。这种成就的深远意义，表现在大萧条的艰难对于成人价值观和健康的长期影响上。大萧条时代的童年和麻烦琐碎的工作生活互相作用，巩固了收入、工作的保障性和家庭作为避难所的概念的重要性（Elder，1974；Elder and Rockwell，1978）。但那些通过攀登职业阶梯来克服家庭受损所带来局限性的男性，则更关注生活的质量。

奥克兰和伯克利两个出生组在大萧条的童年和他们后代的童年嵌入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在一个生命跨度中，美国人从匮乏走向充裕，从牺牲走向自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繁荣才成为可能的”（Elder，1974，第296页）。这些出生组成员的后代，大部分只是通过家里或朋友那里的印刷品、电影和故事才知道大萧条和二战的。和他们的父母不一样，这些孩子一般来说在整个青少年期都在享受着繁荣；而作为“婴儿潮”出生组的一员，他们现在都面临着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此时他们身边围绕的都是成年的儿孙。通过这种或那种联系（Elder，1984，第119页），“每一代人都受命运的摆布，都与他人生命历程中的

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2]

反 思

任何人都难以意识到，在1960年代早期伯克利个人发展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纵向研究能对原有概念和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研究一个急速变迁时代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是什么样的能够激发大家兴趣的问题诱导和激励我们去从事这项工作？那时这些问题几乎还没有怎么被提及。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小组成员大多是心理学家，有一些人曾经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从事儿童发展研究时进行过纵向研究项目。在1960年代，这些调查者和研究对象都已步入中年。普遍流行的以儿童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几乎无法解释这些人的成年生活。

这些问题使人们想起在1920年代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倡导的从上下情境中看个人发展（view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context）的观点，他是托马斯·西奥姆（Thomas Theorem）著名的合著人："如果人们把所处的境遇定义为真实的，那

[12]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谈及奥克兰和伯克利研究对象的父母。奥克兰的父母在1930年代之后就没有继续追踪了，但是伯克利引导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父母在1969年还接受了访谈。这种后续研究成了两本已经出版的评估大萧条对于孩子心理健康影响的书的基础（Elder and Liker, 1982；Elder, Liker and Jawerski, 1984）。中产阶级妇女在30年代被上经济受损的时候，比劳动阶级妇女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且这个阶层的经济困窘状况没有持续那么久。因此，经济困窘使中产阶级的母亲保持心理健康，而对于劳动阶级的母亲则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在伯克利父亲组成的规模更小的样本中，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大萧条和失业对于他们精神健康的影响都是负面的。30年代的经济受损对男性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而且个人才智或者教育程度都无法减少他们在心理上所付出的代价。

么这些结果也是真实的。"20世纪的头十年，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十年。为了研究作为"自然的试验"(用布朗芬伯伦纳1979年使用的术语)的移民和他们孩子生活的转变，托马斯做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个案。受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启发，研究者开始运用生活记录来调查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大部分开创性纵向研究实施之前，托马斯就强烈要求重视"对于生命史的纵向研究途径"(Volkart，1951，第593页)。他宣称那些研究应该调查"不同类型的个体经历，以及他们在不同境遇中不同时期的生活"，接下来是一直跟踪"个体组成的群体，当各种经历发生的时候要持续记录下来。"他还做了一个社会干预(social intervention)的个案：通过把问题儿童放在一个更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中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托马斯(和多萝西·托马斯一起)在192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美国的儿童》的书中，提及了一些开创性研究和有可能按照他所提倡的方法——一直追踪处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境遇中的儿童——去做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有一些是直接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儿童福利研究所的麦克法兰指导的。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这些人成年后的资料中发现，奥克兰成长研究中研究对象的贫困童年和他们中年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和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不一致的。这些贫困的孩子到中年时，有些是州长，有些是教师或工程师，有些人非常乐于在他生活的社区中扮演领导人的角色。麦克法兰在1960年也提到同样的不一致性。尽管两个出生组(奥克兰和伯克利)的成员都是"大萧条的孩子"，但他们的故事并不是1930年代艰难岁月的延伸。相反，他们的故事的特点是，许多男性和女性都成功地摆脱了他们生活中不利条件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些人通过服役克服了童

年经历的制约,有一些通过教育和一份体面的工作来达到这个目的,还有一些则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温暖的世界。

在灾难中获得这些成就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个人代价,奥克兰一位能言善道的中年妇女就表达了这一观点(Elder,1974,第113页)。大萧条的童年给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她母亲喜欢折磨人的情结。"妈妈总是使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而且现在依旧是这样。她这只手给你,另外一只手就抢回去了。随后你需要表现的是慈爱之情,而不是害怕。"另外一个有着经济受损背景的女性,宣称她总是担心母亲带来的阴影,以及这种阴影对她和孩子的影响。"你认为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影响下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代的生活都会影响下一代的生活。"在《美国人的生活》一书中,约翰·克劳森(1993)形象地描绘了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中男性和女性生活中的这种持续性。它们包括战争的压力通过参与战斗的老兵的生活持续冲击人们的生活,尽管许多人"学会了如何驾驭这种情况。"在后方的支前活动中,如果需要持续工作数小时,妇女们就把全家聚集在一起。其他妇女则从家庭虐待中幸存下来,而且有效地处理着几乎伴随一生的各种压力。生活的成功部分可以用这些条件来评估。麦克法兰(1963,1971)在多年以后谈及超越生命的痛苦和迷惑而变得逐渐成熟的工作经历时还谈及了这一切。

但是即使是极端聪明和勤奋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也不能超越灾难的影响而获得生活的成功。奥克兰和伯克利出生组在空前繁荣的时代进入战后的美国。相反,德国类似年龄的女性和男性所遭遇的世界则完全不同,这个世界充斥的是社会的混乱、倒塌的城市和已被摧毁的经济制度。从柏林生活史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发现1930年左右出生的德国孩子受到战争的打击尤其严重(Mayer and Huinink,1990,第220页)。战争毁了他们的家

庭和教育,他们进入的是被战争摧毁的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工作位置常常显得不足,同时还混杂着失业,职业地位的提高更是不可预测。甚至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不能完全弥补这个出生组在战时所蒙受职业发展方面的损失。日本的这个出生组也有着相似的经历(Elder and Meguro,1987),区别仅仅在于日本的这些人是因为受到动员而离开学校,到工厂和农村去劳动的。许多人描述了被炸毁的家庭和被强迫疏散到农村去的经历。

在美国衰败的城市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黑人获得更多机会的途径也十分有限(Wilson,1987;Furstenberg,出版中)。教堂、服务机构、可以选择的职业和商业都迁到其他地方去了。选择的匮乏也源自政府的政策和法案。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也碰上了这种制约因素,因为他们一生中的重要决定都是由工作单位替他们做出的。数百万年轻人被迫离开城市,被下放到农村。"下放的一代"在教育、工作生涯、配偶选择和家庭组成等方面都处于很不利的地位(Elder,Wu and Yuan,1993)。在刘易斯·特尔曼的研究中,有才华的女性都出生在1900年至1920年之间。她们也都是在自己选择领域中的职业生涯无法进展的时候,才了解到社会的制约因素(Holahan and Sears,1995,第5章)。在特尔曼的样本中,甚至有一些男性也发现,因为曾经走过大萧条的艰难岁月和曾经参加二战,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无处可去。社会系统对个人的制约是十分现实的。

40年过去了,对这个真实世界的研究,对于它对人们的制约、它所提供的选择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不断地修正着生命历程理论。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生活着,按照自己所能选择的最好途径去发展自己。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生活是如何在生理的、社会

的和历史的时间上在社会中被组织起来的，引导人们去解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模式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所有这一切对于说明我们对个体生命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个人的发展和衰老嵌入于生命历程之中，嵌入于它的社会结构、人口和文化所构成的历史情境之中。对它们特有的研究激励我们通过各个世代之间相互关联的生活把所有生命阶段考虑在内，从婴儿阶段到年老得足以做祖父母阶段。

结 语

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修订的结尾，我将用自传的方式探讨我对这个真实世界的研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常常来自于我们个人的经历。1934 年 2 月 28 日，我出生在克利夫兰。我的父母，诺尔玛(Norma)和格伦纳德·埃尔德(Glennard Elder)，都是中学教师，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既是教练也是给学生上课的老师：母亲是女子篮球队的教练，父亲是足球教练。我的弟弟(出生于 1937 年)和我都曾经历过这种生活："教练"成了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某种文化主题，"竭尽全力"成了这个家庭的座右铭。父亲在大萧条时参加了夜校，他试图通过 1936 年的医学委员会考试(Medical Board Examination)，进而能获得进行脊椎指压治疗的资格。几十年后，我发现那时他写给妈妈的小纸条："我们是一个幸运的家庭——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许多事情心怀感激。我们已经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即使我们做得对，即使我们有信心，它们也总是这样。"1937 年，我们搬到了克利夫兰的郊区，这样他就能把一切付诸实践，从而使我们的家庭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得以保持完整。在我的记忆中，战争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强制性力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通过收音机和新闻报

道了解到裂成碎片的发动机、定量配给、某项大规模的轰炸计划，以及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训练。

父亲一直想拥有一个家庭农场，这反映了他在俄亥俄州牧场和农场所度过的童年。无数个周日的下午，他都是策马从丰饶的农场驰骋到北部的俄亥俄。在1949年5月，他的希望突然变成了现实，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在宾夕法尼亚的西北部买了278英亩养奶牛的农场，大约离蒂土斯威尔（Titusville）12英里。在一个星期内，年长的男孩都要在农场努力学习陌生的务农方法。令克劳福德县（Crawford）森特威尔（Centerville）地区一些当地农民非常惊讶的是，格兰山（Glen Hill）农场已经有了30多头注册的荷兰奶牛和相同数量的幼畜，因此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

因为抱着可以想见的十几岁少年对于农场的幻想，我进入了宾大农学院。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对于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强烈兴趣，令人感到刺激的高级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病理学课程巩固了我的这种兴趣。这个较晚的发现使我开始选读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因为我被任命为俄亥俄的肯特州立大学男教员主任，我选择了社会学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课程。1958年秋天，在专家网络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得以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继续我的博士研究，我同时成为查尔斯·包尔曼（Charles Bowerman）教授的研究助手。这时，我刚刚和凯伦·比克斯勒（Karen Bixler）结婚，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前任肯特州立大学的男教员主任，曾经是包尔曼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授课时的一位博士生。包尔曼计划从事一个庞大的研究：研究父母和朋友在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他碰到的问题和我在宾州大学最后一年写论文时碰到的一样，它也和我关于"大学生变化着的参照群体"的硕士论文有某种相似之处。

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家庭对于父母角色和青少年对于同龄群体偏好的影响，论文的指导委员会是由欧内斯特·坎贝尔(Ernest Campbell)、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约翰·蒂博(John Thibaut)和丹尼尔·普赖斯(Daniel Price)组成，查理斯·包尔曼是主席。由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使我能够完成对样本的分析。当我在市场上寻找机会的时候，包尔曼为我安排了一个在北卡大学与社会学家约翰·克劳森交谈的机会。克劳森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个人发展研究所的新任所长。包尔曼和克劳森是老朋友了，二战后不久，他们一起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课程。事后来看，这次会面导致了社会学中的早期芝加哥学派对我工作的持久影响，该学派强调对生活中社会变迁采取在真实世界的研究方法(real-world study)。

在伯克利研究所中，许多关于研究对象的纵向研究数据还没有编码，因此克劳森非常有兴趣雇一个新的博士和他一起从事这个项目，一起研究成人职业生涯。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它使我既获得了研究所的聘用，又获得了新组建的明显包括许多杰出教员的社会学系的聘用。[43] 这样，我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研究生研究"，开始转到对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生活的研究上来。我意识到可以用北卡所做的青少年研究中的20,000多名青少年横剖面样本和伯克利纵向研究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这30年的数据，包含出生在20年代的大约500名研究对

———

[43] 伯克利的社会学系是50年代中期在哈尔伯特·布鲁默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很快就成了吸引出色的高级教员的磁石。当我在1962年受雇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这个系的系主任是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他是人口学学科中个人研究(study of human population)领域的泰斗。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在1962年秋季开学之前见到这些教员时的情景。

象。我从横剖面的研究转向纵向研究，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最终生命历程理论适应了这种需要。

在我的专业之旅中，许多同事起了重要作用。我尤其感激约翰·克劳森，我还很高兴能在1996年他去世前和他分享《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将再版的好消息，因为他为此书的成功付出了巨大努力。克劳森把我带到了伯克利个人发展研究所，并为此书写了前言。他和研究所的许多其他同事一起——保罗·马森(Paul Mussen)、麦克法兰、马乔里·霍尼克(Marjorie Honzik)、玛丽·琼斯(Mary Jones)、多萝西·艾科恩(Dorothy Eichorn)、珍妮(Jeanne)和杰克·布洛克(Jack Block)——为了帮助我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大家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些年来研究所代表了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尤里·布朗芬伯伦纳从各个方面指导了我的研究生涯。他坚持我应该在研究中更加充分地考虑发展科学。无数从事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人口研究的同事，也坚持认为我应该同时关注生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最后，我也受惠于卡罗莱纳人类发展研究会，以及它在北卡大学校园的发展科学中心。

附录A
表　　格

（包括表A－1至表A－33，不带前缀A的表格在正文中，在表格目录中能找到这些表格的页码）

表A－1　用经济变迁的指标比较所选择城市的萧条状况

已发建筑许可证的数目

城　市	1929年已发建筑许可证	相对于1929年，其他年份已发建筑许可证的百分比			
		1931	1933	1935	1937
奥克兰	4,624	64%	40%	90%	119%
旧金山	5,505	95	62	74	106
洛杉矶	31,722	80	50	68	104
底特律	26,554	38	15	38	62
克利夫兰	9,863	67	30	36	48
亚特兰大	2,946	110	60	79	73
费　城	10,388	53	34	42	113

注：表中的数据包括新建筑和准备修缮的旧建筑，但是不包括安装许可证（installaton permits），因为严格说来这不属于建筑行业。1929年和随后年份的所有数据表示的是已发建筑许可证的数目。

而不是建筑许可证的数目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31,第871—873页;1935,第789—791页;1939,第867—868页。

零售业中的净销售额

城市	1929年零售业中的净销售额	相对于1929年,其他年份净销售额的百分比	
		1933	1935
奥克兰	204,437	51%	69%
旧金山	499,060	51	60
洛杉矶	914,071	50	65
底特律	882,087	42	62
克利夫兰	534,241	52	67
亚特兰大	165,107	57	83
费城	1,122,168	46	59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31,第326—328页;1935,第781—82页;1939,第854—855页。

零售业中的就业人数

城市	1929年零售业雇佣的人数	相对于1929年,其他年份零售业雇佣人数的百分比	
		1933	1935
奥克兰	16,392	66%	98%

旧金山	44,562	68	88
洛杉矶	74,398	75	107
底特律	68,315	69	100
克利夫兰	46,347	73	103
亚特兰大	18,495	73	106
费　城	102,318	69	89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31,第326—328页;1935,第781—782页;1939,第854—855页。

表A-2　维持家庭生计的来源*

(按社会阶级、经济受损状况和父母就业来划分)

1929年的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	个案数	维持家庭生计的来源(百分比)	
		1934年母亲就业数	从亲属和寄宿者处获取金钱(1929—1933)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45	9	7
经济受损			
父亲就业	29	39	17
父亲失业	33	21	27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21	19	10
经济受损			

父亲就业	23	30	26
父亲失业	24	37	25

[a] 为了能够绘制这张有关每个社会阶级的三维表，我们把所有包括社会经济信息的奥克兰个案都囊括其中。其中有些个案我们在1935年之后不再研究了，因此在167名基本的青少年核心抽样中不包括它们。这一说明适用于表A-2，A-3，A-4。

表A-3 在两个时期内从公共机构所获得的援助

（按照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划分）

1929年的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	个案数	从公共机构获得的援助（百分比）	
		1929—1933	1934—1941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46	2	4
经济受损			
父亲就业	29	—	9
父亲失业	33	21	48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21	4	15
经济受损			
父亲就业	23	13	15
父亲失业	24	46	60

表 A－4 访谈者给母亲评分的平均分数

(按照社会阶级、经济受损状况和父母的失业划分)

评分与1929年的社会阶级[a]	经济受损	经济受损且失业	统计上的显著性
诸多不满			
中产阶级	3.3	4.5	$p<.01$
劳动阶级	3.9	4.2	
感觉不安全			
中产阶级	3.2	3.7	$p<.10$
劳动阶级	3.8	3.6	
疲乏、劳累			
中产阶级	3.4	4.0	$p<.01$
劳动阶级	3.8	3.8	
感觉有保障、自信			
中产阶级	4.0	3.7	$p<.01$
劳动阶级	4.0	3.7	
外表不整			
中产阶级	3.2	3.8	$p<.01$
劳动阶级	4.1	4.0	
总个案数			
中产阶级	46	33	
劳动阶级	21	24	

[a] 表中的评分是根据七级量表来确定的三次评分的平均值，这三次评分是访谈者在1932、1934和1936年三次访谈中所给出的。每

一量表的高分都可以从它的题目看出来。因此，7分是诸多不满一项可能获得的最高分。

表 A－5　在 1937 年对女孩可靠性和勤劳的评分

（按照 1936 年的工作地位和家务来划分）

所选择的境遇评分	平均分数			次群体比较的 p 值：T 检验
	既工作又做家务	做家务	什么也不做	
（1937 年秋）	N＝17(A)	N＝25(B)	N＝21(C)	
可靠性	55.5	50.2	49.1	$A>B^{**}$ $A>C^{**}$
反抗权威	43.8	49.0	52.7	$A<C^{**}$
勤　劳	56.5	47.8	48.0	$A>C^{**}$

** 　$p<.01$

注：A 组包括有一份职业而且有关家务指标的分数为 3—5 分的女孩，B 组包括没有职业而有关家务指标的分数为 4 和 5 分的女孩，C 组包括没有职业而家务指标的分数为 0—2 分的女孩。在 .05 的水平上，B 组和 C 组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表 A－6　母亲所报告的孩子们的社会独立性

（按照社会阶级、经济受损状况和性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地　位	周末晚上和朋友外出[a]		在上学的晚上和朋友外出[a]	
	男孩们	女孩们	男孩们	女孩们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28(28)	35(17)	32(28)	24(17)

经济受损	43(28)	57(21)	54(24)	29(21)
	−15%	−22%	22%	−5%
劳动阶级[b]				
经济未受损	33(9)	64(11)	22(9)	45(11)
经济受损	47(17)	46(24)	61(18)	32(25)
	−14%	18%	−39%	13%

[a] "朋友"包括男孩和女孩。

[b] 尽管两项的百分比差异是一致的，但是经济未受损的劳动阶级家庭的数目太少，无法提供可靠的取值。

表A−7　在经济受损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家庭中，作为母亲占支配地位决定因素的父母的能力、传统主义和角色表现

母亲权力的潜在来源[a]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和母亲占主导地位相关的诸因素	
	中产阶级(N=35)	劳动阶级(N=32)
父母的能力		
母亲受过更多教育	.09	.26
父亲的年龄	.23	.06
国外出生的父母(作为传统价值观指标)	(b)	−.08
角色表现		

家庭向下流动	.42 $p<.01$	.18
不稳定的工作生涯	.23	.39 $p<.05$
1934 年的母亲就业	.10	.06

[a] 依据霍林斯黑德(Hollingshead)指标把相对教育程度分成五类:父亲比母亲高两个等级,父亲比母亲高一个等级,两人相同,母亲比父亲高一个等级,母亲比父亲高两个等级。除了父亲的年龄外,其他项目都是二分变量。不稳定或混乱的工作状况指的是工作行业的变动,在地位结构中向上或向下的流动等。

[b] 中产阶级中出生于国外的父母的个案太少了,无法进行分析。

表 A-8 男孩和女孩的交往偏好(1933—1934)

(按照阶级和损失状况划分)

社会对象	男孩			女孩		
	平均等级($\bar{X}$)	较低地位的影响[a]	受损的影响[a]	平均等级($\bar{X}$)	较低地位的影响[a]	受损的影响[a]
父亲	1.84	-.17	-.26	2.17	-.21	-.07
母亲	2.29	+.06	+.10	2.21	+.18	+.13
朋友群体	2.71	+.05	+.34	2.13	-.03	+.25
最好的朋友	2.22	+.06	+.23	2.43	+.19	+.18

注: 每一个被访者都要回答:在去看马戏团的表演时,愿意父亲、母亲陪伴,还是一群朋友或最好的朋友陪伴。每一被访者都有三种选择:第一、第二或第三,最高等级是"1 分",最低等级是"3 分"。

[a] 社会等级影响取值为正数表明:和中产阶级的被访者相比,劳动阶级的应答者对社交对象更为偏好(趋向于"1")。也就是说,劳动阶

级的平均偏好程度大于中产阶级。类似地，可以用来比较的受损状况的影响表明，经济受损群体中孩子对社交对象的偏好大于经济未受损群体的孩子。对于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而言，每一组男孩的数目分别是41和22，而经济未受损和经济受损孩子的数目分别为29和34。女孩中用来对比的群体，社会阶级一栏的数目分别是33和34，而受损状况一栏分别是23和42。

表A－9　孩子们愿意选择的给其建议和帮助的人(1933—1934)

(按照家庭的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划分)

家庭的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	被访者的数目	可信赖的人[a]，百分比				
		父亲	母亲	兄弟姐妹	老师	同龄人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40	50	70	13	5	5
经济受损	47	43	83	23	23	19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18	33	67	11	11	6
经济受损	33	36	88	21	24	27

[a] 因为被访者可以选择1人以上，所以百分比相加超过100%。

表A－10　中学时期男孩女孩与父母的关系(1929)

(按照经济受损状况、母亲占支配地位和家庭阶级划分)

和父母的关系(九级量表)	关系系数(r)		
	经济受损状况：损失的百分比，1929—1933[a]	母亲占支配地位(1—5分)	1929年的家庭阶级(最高分数－最高地位)

男孩们(N=34)			
和母亲更为亲密	.22	.38 $p<.05$	.11
受母亲魅力影响	.11	.25	.41 $p<.01$
受父亲魅力影响	.10	.10	.49 $p<.01$
女孩们(N=33)			
和母亲更为亲密	.41 $p<.01$	.40 $p<.01$	−.24
受母亲魅力影响	.21	.30 $p<.05$	.13
受父亲魅力影响	.20	.08	.18

[a] 在收入损失的百分比上，我们运用了个案的全面分配(而不是常用的两分测量)有两个原因：个案的分配类似正态分布；收入的数字十分精确，能够以家庭的评分来判断其在少数个案中的运用。

表 A－11 成年后的女儿们对于大萧条时期父母的评价

(按照经济受损状况和家庭阶级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1958 年的评价	经济受损状况(1929)		家庭阶级(1929)	
	经济未受损 (N=16)[a]	经济受损 (N=26)[a]	中产阶级 (N=24)[a]	劳动阶级 (N=23)[a]
对女儿相当了解或十分了解				
母　亲	62	57	58	57
父　亲	73	44	54	50
认为父母为人父母相当够格				

母 亲	87	55	64	60
父 亲	87	52	64	67

a 在四个项目中，次群体都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

表 A-12 对于父亲和母亲作为家长的正面评价(1958)

(按照青少年时期和母亲的亲密程度划分)

成年人的性别	成年后对于父母的正面评价(相关系数为 r)	
	母 亲	父 亲
男性(N=45)	.01	.06
女性(N=42)	.19	-.28

注："与母亲的亲密程度高于父亲"是用九级量表来测量的，而对父母的正面评价是用四级量表来测量的。

表 A-13 男孩和女孩的情感状态

(按照初中时期经济受损状况和社会阶级划分，用平均分数表示[a])

测量情感状态的指标	男 孩		女 孩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社交表现				
经济未受损	8.7	9.0	9.4	8.7
经济受损	8.6	8.7	8.4	7.8
			ND>D**	MC>WC*
多愁善感				

经济未受损	2.5	2.5	3.1	3.9
经济受损	2.1	2.8	2.9	3.9

* $p<.05$(检验平均值的差异，比如经济受损群体和经济未受损群体间的平均值差异)

** $p<.01$

a 对于中产阶级的男孩而言，经济未受损群体和经济受损失群体的个案数最少的分别为25和24；对于劳动阶级的男孩而言，这两个值分别为7和24；对于中产阶级的女孩而言，这两个值为15和23；对于劳动阶级的女孩而言，这两个值分别为10和23。

表A-14　男孩和女孩所感受到的同学排序
（按照中学时期经济受损状况和社会阶级划分，用标准化平均分表示）

按社会阶级划分的经济受损状况	感受到的排序	
	男孩们	女孩们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48.9(26)	44.0(15)
经济受损	49.5(24)	52.7(23)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50.0(8)	47.3(10)
经济受损	52.3(14)	52.1(24)
经济未受损的对经济受损的		ND<D $p<.05$

表 A－15　成年观察者对外表整洁的孩子的平均评分

（按照初中时期的经济受损状况和社会阶级划分）

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	整洁的外表	
	男孩们	女孩们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57.1(28)	61.2(18)
经济受损	52.5(30)	53.3(29)
		ND>D*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51.8(10)	50.2(10)
经济受损	48.1(21)	47.2(30)

* $p<.05$（t检验）

注：这一量表选自自由玩耍评分量表(Free-Play Rating)，后者由儿童福利研究所的观察人员制定。

表 A－16　成年观察者对男孩和女孩社会交往的平均评分

（按照初中时期的经济受损状况和社会阶级划分）

按经济受损状况划分的社会地位[a]	男孩们		女孩们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社交领导才能				
经济未受损	50.2(28)	41.2(10)	51.3(18)	47.4(10)

经济受损	50.2(30)	52.3(21)	48.5(29)	47.3(30)
		ND<D*		
社交受欢迎程度				
经济未受损	50.2(28)	44.8(10)	52.4(18)	50.4(10)
经济受损	52.6(30)	52.3(21)	48.3(29)	50.0(30)
		ND<D*		

* p<.05 (t检验)

a 自由玩耍评分表。这些评分表会在附录B中介绍。

表 A－17　与社交幻想有关的情感因素和社会因素

(按照初中时期的性别和经济受损状况划分)

情感状况和社交地位[a]	和衡量社交幻想指标相关的关系系数(r)			
	男孩们		女孩们	
	经济未受损 (N=30)	经济受损 (N=36)	经济未受损 (N=24)	经济受损 (N=43)
社交满足	－.41	－.40	－.19	－.16
多愁善感	.60	.06	.42	.02
受欢迎	－.29	.19	.32	.08
受男孩们欢迎	－.33	.13	－.22	.15
受女孩们欢迎	－.31	.14	－.25	.08

a 除了最后受不同性别欢迎程度的两个指标外，所有指标都适用于初中时代。"受欢迎"的程度参考的是自由玩耍评分表，其他两个受欢迎程度的量表来自1937年的境遇量表(参阅附录B)。在男孩们中，

只有"多愁善感"一项的相关系数，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其取值达到.05的水平。

表A-18 男孩和女孩的智力和学术水平

（按照经济受损状况和社会阶级划分，用平均分数表示）

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	智力：IQ[a]		学术水平[b]	
	男孩们	女孩们	男孩们	女孩们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118.4(28)	116.2(16)	4.6(28)	5.0(14)
经济受损	115.9(28)	109.0(25)	4.5(28)	4.7(22)
		ND>D*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109.5(7)	105.3(10)	4.1(7)	4.6(9)
经济受损	113.1(16)	107.2(25)	4.0(14)	4.6(25)

* $p<.05$（双尾t检验）。在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男孩对比的各项中，只有智力一项具有显著差异。把男孩和女孩放在一起比较，差异是显著的，达到.01的水平。

a 在计算平均分数前，先计算1933年和1938年的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分数的平均值。

b 这种测量包括用七级量表对学术兴趣和学业表现进行衡量所得分数的平均值。这些分数是由在中学时代就非常了解青少年的三位老师给出的。

表 A－19　男孩们的动机取向

（按照经济受损状况和社会阶级划分，用平均分数表示）

社会阶级和经济受损状况	获得成就的需要[a]	获得权力和地位的需要[b]	职业兴趣的声望(1938)[c]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2.4(27)	47.2(25)	47.3(23)
经济受损	2.4(25)	54.7(24)	48.8(19)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1.5(7)	44.8(6)	42.0(7)
经济受损	2.2(15)	50.0(15)	43.1(10)
根据经济受损状况比较		ND<D*	
根据阶级比较			MC>WC*

* $p<.05$（t 检验）

[a] 我们用五级量表来测量获得成就的需要，"1 分"表示需要程度最低。为了使高分等同于一种强烈的成就需求，我们把分数首末倒置了。

[b] 获得权力和地位的需要是由两种动机评分累加的：社会认可的需要和社会控制。为了使高分和强烈的需求等同，我们也把这些分数首末倒置了。这些值是先相加，然后再标准化。

[c] 职业目标的水平是用强烈职业兴趣量表（the Strong Vocational Interest Blank）中的职业水平量表来测量的，这些测量是在 1938 年对男孩们进行的。

表 A-20 职业生涯开始的时机

（按照1929年的经济受损状况、阶级出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职业生涯开始的时机[a]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经济未受损	经济受损
1945年前	9	25	25	39
1945—1948年	39	55	38	31
1949年后	52	20	38	30
	100(23)	100(20)	101(8)	100(13)

[a] 这里的年份指的是被访者进入其中至少工作达6年的行业的时机。

表 A-21 职业和雇主的平均数目

（按1929年阶级出身、经济受损状况和时段划分，用平均值表示）

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状况	职业		雇主	
	1940—1946	1946—1955	1940—1946	1946—1955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2.00	2.92	1.96	2.38
经济受损	2.56	2.94	2.17	2.53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2.13	2.38	2.12	2.00
经济受损	4.00	2.75	3.85	2.67

注：在经济受损群体和经济未受损群体（同时考虑阶级出身）之间惟一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差异者是1946年前的平均职业数目，p<

.05。

表 A－22　成就动机和智力对于职业流动的影响

（按照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状况划分，用平均数表示[a]）

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状况	成就动机[b]			智力(IQ)		
	流动	不流动		流动	不流动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	2.6(11)	2.3(12)		123.1(11)	112.8(12)	M>N**
经济受损	2.8(11)	1.9(9)	M>N*	119.9(11)	113.7(9)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	2.6(14)	2.2(15)		119.4(14)	111.6(17)	M>N**
经济受损	2.7(19)	1.9(12)	M>N*	117.4(21)	113.2(13)	

* $p<.05$（双尾 t 检验）

** $p<.01$

[a] 只有在经济受损的群体中，流动者和不流动者的成就动机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而只有在经济未受损的群体中，流动者和不流动者的智力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两种差异适用于中产阶级和全部样本。

[b] 为了使高分等同于强烈的成就动机，我们把分数首末倒置了（5＝高成就动机，1＝低成就动机）。

表 A－23 1958 年的职业成就和选中的先置因素之间的关系

（按照经济受损状况和阶级出身划分：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中产阶级出身				全部样本			
	经济未受损（N＝23）		经济受损（N＝20）		经济未受损（N＝31）		经济受损（N＝34）	
	r	beta	*r*	beta	*r*	beta	*r*	beta
成就需求（5＝高，1＝低）	.13	.19	.32	.27	.07	.07	.33	.27
智力（IQ）	.60	.62	.28	.20	.50	.52	.19	.09
家庭地位（1929）（5＝高，1＝低）	—	—	—	—	.14	.04	.32	.27
	R^2＝.39		R^2＝.14		R^2＝.26		R^2＝.19	

表 A－24 决定奥克兰男性活动偏好的选中因素

（零度相关和标准模式的偏相关系数 *r*，N＝46）

决定因素	工作		家庭		休闲	
	r	beta	*r*	beta	*r*	beta
成人社会阶级（1958）（5＝高，1＝低）	.29	.27	－.15	－.17	－.39	－.39
IQ（1933—38）	.32	.25	－.16	－.08	－.24	－.16
经济受损状况[a]	.01	－.02	.30	.33	－.30	－.26

阶级出身(1929) (5=高,1=低)	-.10	.01	.01	.14	.14	.17
	$R^2=.14$		$R^2=.18$		$R^2=.29$	

a 经济受损状况被当做二分变量,经济未受损的为0分,经济受损的为1分。

表 A-25　偏重工作保障性,而不愿冒险获更大收益

(按照成人地位、智力和家庭背景划分:标准模式的偏回归系数)

保障性偏好的决定因素	工作保障性优于风险的偏好 (N=37)	
	r	beta
成人地位较低(1958)	.22	.20
智力较差(IQ,1933—38)	.46	.45
经济受损状况	.19	.27
劳动阶级出身(1929)	.05	-.07

注:在这项分析中,所有的项目都被二分了,并被赋予了0分和1分。高分对应于项目的具体描述。对于工作保障性的偏好是这样的:认为工作保障性和合理收入的价值高于工作不稳定但收入更高的价值则为1分,相反的答案为0分;较低的成人地位(1958)指的是阶级类别中的III、IV和V级,相反的是I和II级;较低的智力指的IQ值在平均分以下;经济受损状况是把经济未受损和经济受损群体相对比;而1929年的劳动阶级出身指的是霍林斯黑德指标的IV和V级。

表 A－26 已婚女儿及其父母、丈夫的教育程度的代际比较

教育程度	百分比分布			
	父亲	母亲	女儿	丈夫
大学毕业	15	10	11	36
一些大学教育	10	8	31	18
中学毕业	14	21	58	39
一些中学教育	22	19	—	7
9年或9年不到	39	32	—	—
不清楚	—	10	—	—
	100(72)	100(72)	100(72)	100(72)

表 A－27 已婚妇女成年后的生活状况

（按照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状况划分）

成年时的状况	中产阶级出身		劳动阶级出身	
	经济未受损（N=13）	经济受损（N=20）	经济未受损（N=11）	经济受损（N=23）
20岁时完成教育（百分比）	23	45	80	78
自己的教育程度（百分比）				

大学毕业	23	15		9
一些大学教育	54	35	9	17
不到大学程度	23	50	91	74
丈夫的教育程度(百分比)				
大学毕业	54	55	18	22
一些大学教育	—	30	9	17
不到大学程度	46	15	73	61
妻子接受的教育少于丈夫(百分比)	46	75	27	30
丈夫的职业地位(1958)($\bar{X}$)[a] (1=高,7=低)	2.8	2.2	4.1	3.2
社会阶级(1958)($\bar{X}$)[a] (1=高,5=低)	2.6	2.2	3.5	3.0

[a] 经济受损群体在平均职业地位和社会阶级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仅达到.05的水平。

表 A－28 妇女的活动偏好

（根据经济受损状况划分，用平均分表示）

经济受损状况	家庭	工作	休闲	社区
经济未受损(N＝20)	3.4	2.0	1.5	1.6
经济受损(N＝32)	4.8	1.6	1.5	1.0
	ND<D*			

* $p<.05$（双尾t检验）

表 A－29 妇女从事全日制工作的年限

（按照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状况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全日制就业年份	中产阶级		劳动阶级	
	全部	经济受损	全部	经济未受损
1946年以前				
没 有	27	25	14	12
1—4年	46	40	50	52
4年以上	27	35	36	36
	100(33)	100(20)	100(36)	100(25)
1946—1955				
没 有	54	45	56	50
1—4年	30	40	24	29

4年以上	15	15	21	21
	99(33)	100(41)	101(34)	100(24)

表 A－30　孩子们给父母带来最多快乐和最多麻烦的年龄(1964)

(按照父母性别划分,用百分比表示)

年龄段	最快乐的孩子		最麻烦的孩子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没有什么特定的年龄段	20	61	13	20
婴　儿	3	5	10	12
学龄前	19	7	16	2
小　学	23	12	3	7
初　中	16	10	10	24
高中⁺	19	5	48	34
	100(31)	100(41)	100(31)	99(41)

注:表格中的所有对象在 28 岁之前生了第一个孩子。在 1964 年调查时,最大的孩子至少 16 岁了。

表 A－31 奥克兰成年人的政党偏好(1958—1964)

(按照多元分类分析的选中因素划分[a]，用百分比表示)

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状况	共和党	民主党
中产阶级		
经济未受损(N＝33)	79	9
经济受损(N＝41)	54	32
劳动阶级		
经济未受损(N＝[illegible]3)	74	23
经济受损(N＝24)	48	41
总百分比[b]	61	27

[a] 表格中没有显示出来的三个变量是作为分析的控制量度：成人阶级、宗教和性别。

[b] 对于全部样本来说，经济受损状况和政党偏好(共和党 Vs. 民主党/无党派)之间关系的 $\chi 2$ 值为 7.17，1 个自由度，$p<.01$。

表 A－32 青少年家庭在三类样本中的百分比分布

(按照父母的种族、家庭结构和父亲的职业划分)

背景因素	在奥克兰长大(1934)	初中学生(1934)	高中学生(1934)
本地父母	72	68	—
家庭结构完整	74	84	75
父亲的职业			
专业、管理人员	27	19	25

白领、小商人等	36	33	33
蓝　领	31	36	28
样本总数	167	951	1,722

A－33　青少年和成年人样本中研究对象的智力和家庭特征

特　征	青少年样本	成人样本
IQ		
120	31	30
110－119	30	31
100　109	26	26
<100	13	12
	100	100
1929 年的社会阶级[a]		
较上层的中产阶级(I＋II)	19	19
较低层的中产阶级(III)	38	37
劳动阶级(IV＋V)	43	44
	100	100
家庭结构		
完整的百分比	74	74
父母的种族		
本地人的百分比	72	74

[a] 建立在霍林斯黑德的二因素指标(教育和职业)基础之上。

附录 B
样本特征、数据来源和方法论问题

本附录的目的在于为奥克兰样本、参与对象的选择及其与同学的相似性、教育环境等方面提供更加详尽的细节，同时也对1930年代和研究对象长大成人后的数据来源给予说明，并且回顾关于测量误差、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和分析程序的问题。在开始进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之前，那些与需要使用现有数据的研究策略有关的背景资料还是应该被提及。

为其他目的收集的现有数据，一般来说只能近似于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选择时所收集的数据。现在的研究除了使用数据库外别无选择。进行第二手研究，花费是一个考虑，尽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过去决策、资源分配和知识限制的约束下，投资是否能证明是值得的。由于研究技术的变化，资料的时间跨度越大，人们感到这些约束的可能性越大。就这一点而言，可以通过编码程序、不同时代的数据汇总等方式来改善档案材料对于现有研究的适宜性。在奥克兰研究中，这些材料在诸多领域中和我们的概念模式是不完全吻合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在不同地方都曾提及这些约束对样本设计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影响。

奥克兰样本及其教育环境

奥克兰成长研究开始于1931年1月，是在奥克兰东北部五

所学校的五年级孩子中挑选了一些孩子来参与研究的，我们对这一正常样本(normal sample)中的男孩和女孩进行了智力、社交和生理发育方面的纵向分析。样本的挑选基于两个标准：愿意参与研究和预计永久居住于该地区。经过这种挑选产生的样本由 84 个男孩和 83 个女孩组成，我们对其进行了从 1932 年到 1939 年(中学结束)的持续追踪研究。所有的孩子都是白人，80%以上是新教徒(只有 4 个孩子是犹太教徒，12 个是天主教徒)，大约有 3/5 的家庭是完整的，而且是由本地出生的父母居于支配地位。

尽管挑选样本的程序不能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奥克兰样本的家庭和在这些研究对象就学的初中和高中上学的其他学生的家庭极为相似。对于 1934 年所有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收集了有关父母国籍、家庭地位和父亲职业的数据。根据表 A－32 所显示的对比，奥克兰样本中的家庭只是在职业地位上稍高一些。在这些背景因素上，奥克兰孩子的青少年样本也可以和那些被跟踪研究到其成年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参阅表 A－33)。

在奥克兰孩子就读的中学中，学校氛围及其秉承的基本原则中突出的是关于教育的新进步概念(neo-progressive concepts of education)。初中和高中都宣扬这样的基本原则：学校将使学生间的阶级差异最小化，给所有的孩子提供相同的教育，重点在于使学生学会适应社会、调整自己、宽容他人以及成为好公民。这些学校和加州大学教育学院有联系，而且作为 1930 年代新进步运动的实验机构。就像人们估计的那样，在中学更为强调的是传统的学科和出色的智力。

在 30 年代早期，初中的运动场所就已人满为患，其服务的学生已经超过了 1,000 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人上课都是在临时

建筑中进行的。所有的教职工包括 34 名教师和 4 名学校顾问。临时建筑是用小煤炉取暖的，配备的是从小学搬来的不合尺寸的椅子和凳子。那些在家无法吃饱的学生，可以在位于临时建筑的食堂中享用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食物。伯克利的儿童福利研究所（现在是个人发展研究所）建造的一座充当俱乐部的房子，被教工用来观察那些自然状态下的研究对象，但是欢迎所有的孩子前去。因此，它很快就成了同龄人聚会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个知名场所。

被研究的孩子从初中进入高中的转变，给他们的社会经历带来了意味深远的影响。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朋友的保护，他们走进了更大的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上大学做准备，而且上的课程各有不同，有的上艺术，有的上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研究。这些学校在奥克兰所有的地区都招生。在这所有着 1,900 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学校（此时研究对象在上中学）中，社交训练和公民教育是主要的课外活动。教师队伍素质很高：2/3 的教师是研究生，将近 90% 在学校教书时至少从事过某些高等教育工作。在整个社区内，这所学校以其向州立大学输送过许多合格学生的优异记录而众所周知。

社交活动中的"非民主"模式，受到教职员工和学生干部的广泛批评。他们的注意力特别放在这上面：在涉及教师和学生的小组讨论中，尽量使社会差异最小化。作为这种交换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于女孩们形成了一系列着装的规范。她们从上学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必须穿裙子和水手衫，而且这种规范因为一名学生的"米迪牌水手衫"而得到巩固。为了避免穿着破衣烂衫带来的社会后果，经济受损状况更为严重家庭的男孩决定穿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制服。周一被定为"公民服装日"。在这一天，孩子们可以选择他们自己想穿的衣服。

30 年代的数据收集

在奥克兰研究中，有关孩子纵向数据的深度和丰富性为我们实施现在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虽然这些数据并不是直接为了这项研究而收集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这项数据收集工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获得了这项研究中所关注的家庭在两个重要的时间点（1927 年和 1933 年）上的经济信息。我们在分析中频繁使用了四类数据：在 1932 年、1934 年、1936 年和母亲的访谈；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进行的问卷调查；孩子上高中时有关家庭关系的量表评分；教职员工对于孩子行为的评分。前面两类数据没有按照现在研究中可以使用的模式编码，因此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包括训练编码者、计算机操作者和撰稿者，历时需两年。现在大量有关家庭关系和父母人格的信息，都来自这些数据。不幸的是，这些数据中没有同父亲的访谈，也很少问母亲有关她们丈夫的问题。对这些数据总的回顾如下所示。

和母亲的访谈

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每年都要拜访每一个家庭，而且用日志的形式记录下有关家庭生活的观察。这些定性资料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是提供深刻见解和例子的无价源泉，但是它们还是不够系统，无法进行编码。只有 1932 年、1934 年和 1936 年的访谈是系统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访谈，都获得了有关抚育孩子的实践、家庭关系和同龄人的活动等信息。1934 年的访谈补充了有关经济和职业的数据。

那些访谈了这些母亲的研究人员，还运用七级量表对她们

的个人特征进行了评分。现在分析中运用这些量表的例子包括诸多不满、感觉低人一等、疲倦和个人外貌。为了加强每一种量表的稳定性，我们把每一特征的三个分数加以平均。

有关孩子们的问卷

我们对孩子们实施了两类问卷调查：在 1932 年到 1938 年期间进行了有关社交和情感行为的 8 次问卷调查，在 1938 年进行了强烈职业兴趣量表测量。后者提供了有关职业目标的数据，而且因为它太出名了所以无法对这方面的描述进行公正的判断。在我们的分析中，第一类问卷是更为重要的数据来源，因为它们是卡罗琳·特赖恩(Caroline Tryon)专门为奥克兰研究设计的。[①] 被访者们被告知，这些问题是为了"帮助我们发现人们在想些什么，以及他们希望做些什么。这里无所谓'错误'或者'正确'的答案。每个人的回答都可以不同。只是尽量记下你真正的想法和愿望。"问题涵盖的主题包括家庭的情感氛围、亲子关系、和同龄人的关系和对待自我的态度。为了获得更加稳定的测量，我们把对七年级和八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进行调查的所有两分种类和定序种类所获得的分数加以平均。每一时期所使用的工具，在分析中都标出来了，就像在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进行调查的问卷上标明的那样。

有关家庭关系的评分

在孩子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用九级量表衡量他们对于父母的感觉和家庭关系。在这段时期内，由三个受过训练的评判者，

---

① C. 特赖恩:《U.C. 选择表 1:社交和情感测试》,修订版(伯克利:儿童福利研究所,加州大学,1939)。

用相同的数据形式对每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判断,内容包括父母的访谈、自述、同学的印象和研究人员的观察,并且独立地把每组人际关系的判断整理成为九级定序类型变量,从1分(没有这个特征)到9分(最明显的特征)。[2] 再把有关每一陈述的评判加以平均得到每一个主观分数(subject's score)。对每一个时段数据的Q分类(Q-set)的平均信度系数将近.70。在现有的分析中使用的评分例子包括:"感觉与母亲相比和父亲更加亲密","感觉父亲是个有魅力的男性","感觉按照社会标准父亲是一个受尊重的人"。

研究者的评分

现有的研究中用了三类研究者的评分: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自由玩耍的评分,在1937年进行的有关境遇的评分,[3] 高中时期需求的评分。

为了进行生理和智力测试,这些孩子每半年就到儿童福利研究所去一次。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者会对处于自由社会境遇(free social situation)中孩子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行为和个人特征进行评分(因此这是自由玩耍评分)。这些活动都以同性别的小群体为单位,一般是6个或8个孩子一起来。观察的环境是研究所的运动场。时间或者是安排在非正式的午餐时间,或者是

② 参阅J.布洛克:《人格判断和精神病学研究中Q类方式》(斯普林出版公司,1961)。我非常感谢布洛克博士允许我使用这些经过Q分类(Q-sort)整理过的数据。也可参阅布洛克:《随着时间流逝的生活》(1971)。

③ 对自由玩耍和境遇的评分,参阅F.B.纽曼:《社会群体中的青少年:对人格观察的研究》,载《应用心理学专论》,第9期(1946),第1—94页。有关需求或者动机的评分,参阅E.F.布伦斯威克:《动机和行为》,载《遗传心理学专论》,第26期(1942),第121—265页。

在孩子和至少两个研究人员一起进行的野营中。孩子们对研究人员都很熟悉，而且把他们当做有趣的和友好的成年人。然后再把对这段时间的系统观察记录下来，内容包括各种评论和评分的清单。对于至少两个观察者而言，每年的40个七级量表的信度系数一般都在.70以上。初中和高中时期的每年评分都要加以平均。

代表了三个研究人员平均评判的境遇评分，建立在对于研究对象在俱乐部会所中的行为的密切观察基础之上，这个会所是为其和同性、异性朋友们聚会而专门设计的。这个会所一直维持着，作为初级中学的一项财产，在孩子上高中后又维持了一年。当孩子上中学的时候，研究人员安排了一系列补充性活动——跳舞、旅行、晚会，以方便研究者的观察。我们用七级量表衡量了各种行为，包括责任感、勤俭和受欢迎程度。这三个量表的信度系数一般都超过了.75。

这些研究人员中有三个在布伦斯威克的监督下，运用来自于观察、问卷和访谈的直觉和资料，对于孩子们的一系列需要进行了评分。有三种评分和大萧条中地位下降对孩子动机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认同的需求——"渴望得到赞扬和忠告，渴望得到尊重、社会赞赏、声望、荣誉和名声"；控制的需求——"渴望通过建议规劝和命令方式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成就的需求——"渴望获得高标准的客观成就，通过成功地把自己的才智付诸实施来增强自信，选择艰巨的任务"。这些评判者都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假定动机之上，而不是社交技巧(social technique)的基础上。因此，在互相争斗、树立领导权和争取社交认可方面所获得的地位将不在其考虑之列。比如说，对于社交认同的需求强度，"不一定非要描述标志孩子在群体中位置的真正声望或者社会地位，而描述孩子受到社会声望目标激励的强度有多大会更

好。这种迫切的要求有时候是公开表现出来的，不过有时可能隐藏于外在的行为之下。"[1] 分数从 1 分(最为强烈)到 5 分(最不强烈)。这些判断的信度系数大约为.70。

194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数据收集

研究人员在 1940 年代的两个时期，有计划有步骤地努力收集各种数据，或者和奥克兰研究对象建立联系：在 1941 年运用简短问卷就职业兴趣和活动偏好等问题进行调查，在 1948 年通过电话或者信件和研究对象建立联系。两次重要的后续研究是在 1950 年代进行的，后来还在 1964 年进行了邮寄式的问卷调查。76 名女性和 69 名男性至少参与了这些重要后续研究中的一次。这些样本在智商、1929 年家庭所属的社会阶级、种族和家庭结构上和青少年样本没有什么区别(参阅表 A－33)。

在第一次后续研究中(1953—1954)，研究对象就各种问题接受了细致的访谈，参与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和精神病学评估，完成了一系列有关人格的调查。在这个时期除了收集有关生活史的信息外，还运用精神病学的评估作为衡量孩子成人后心理健康的方法(参阅第九章)。在第二次后续研究(1957—1958)中，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访谈。这次访谈包括五次或者以上的历时两三个小时的会面，每次都包括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对于父母的感觉、婚姻关系、职业和家庭信息以及对于大萧条的记忆。然后对到 1958 年为止生命周期每一年的回溯性资料进行评分，这些资料也是在这个时间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的。第三次后续研究(1964)主要依靠邮寄问卷。根据所有这些数据，构建了每

---

① E.F.布伦斯威克：《动机和行为》，第 144 页。

一个研究对象到1958年为止的家庭史和职业史。这些历史是根据年龄和年分排序的，因为研究对象的年龄大致相同。比如，一个人可能在初婚年龄的时候外出，或者在相似年龄时就获得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再次回来的时候，准确地说也没有做出太大的牺牲。这些职业史和家庭史，是我们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分析男性和女性生命历程时的主要数据来源。

测量误差、外在效度和分析的程序

前面有关数据档案的描述，对于输入数据的质量和数据分析结果之间的关系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分析结果，受到我们怎样准确测量核心变量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受到我们对相关变量和它们间相互关系假设的限制。比如，如果我们对于经济受损和生命历程的结果之间关系的假设不准确，也就是说这个假设所提供的画面和实际相差很远，那么无论多么完善的测量方法也不能挽救这个结果。对模式的错误估计，会产生误导或者没有意义的评估。另外，我们挽救数据的方法和来自奥克兰档案资料的适应性，由建立在适应性模式基础上的问题决定。但是在整理档案资料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测量的问题，在分析模式中衡量变量的指标的有效性，以及这些指标的充分性。我们寻找内在具有高度有效性的一致的测量方法，也就是说它们描述了我们认为它们描述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分析和解释中什么样的误差是适当的还不能确定。[⑤]

测量中的误差来自于境遇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在不同的

---

⑤ 有关信度和效度，参阅S.A.斯托弗：《对于检验观点的社会研究》(纽约，1962)，第265页。

时间、地点和来源(母亲、孩子等),出现了相对于“真实”值的不稳定的或者不一致的值。测量中的误差也来自于测量工具本身的限制。短暂因素(transitory factors)会产生和“真实”值不一致的不同分数。比如,这种无信度可能是因为被访者对自己提及的家庭关系持有某种情绪,也可能是访谈方式的差异,或者观察情境的不同。只要可能而且适当,我们就要采用下面的程序去处理这种测量问题。为了使1930年代数据中的观测值尽可能地保持稳定,我们把得到的分数加以平均,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初中和高中——运用相同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就像前面部分提到的那样,这种程序适合处理对孩子进行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也适合访谈者对于母亲的评分,还适合观察者对其普遍情况的评分,以及对于个案资料的客观判断(家庭关系和需求的评分)。数据档案中最具信度的测量,建立在对研究群体观察的基础之上。

只要存在选择的余地,我们就会运用多个指标共同测量一个因变量。这种测量通过比较对于同一行为的不同观点(参阅第六章),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的理论兴趣,但这也是处理单一指标不确定的信度的一种方法。比如,和经济受损有关的心理状态,可能会部分地反映一种测量工具的特性,比如某种包含指标的问题。如果这些结果和其他有关心理健康测量的答案一致,那么我们就对它们更有把握。我们在评估经济萧条对于孩子长大成人后健康的影响时,就运用了这个方法。

一般来说,在孩子处于童年时代时,特别是在他们长大成人后,我们都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各种变量,无论这个变量是因变量还是自变量。这种指标还被用在分析孩子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上(母亲提及的孩子对家庭经济上的帮助和有薪就业),用在孩子出生家庭的婚姻权力结构的分析上,用在对孩子一般态度

的分析上。一般来说，孩子成年后的职业生涯、态度和感觉，也都是用建立在自述题目数据基础上的指标来测量。许多测量方法甚至既有单一题目所带来的局限性，又因是回溯性报告而使所获数据的效度成了问题。从这些测量方法与其他指标的关系中，从它们和理论呼应的程度，以及和研究文献的经验研究获得的证据一致的程度中，我们获得了有关它们对变量测量充分性的深刻见解。比如说，有关性别差异的累积性资料，为我们评价奥克兰研究中有关30年代和孩子成年后性别差异的发现提供了基础。有关经济萧条对于孩子精神影响的阶级差异的文献，有关家庭对于经济艰难适应的阶级差异的文献，有关获致地位的阶级差异的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奥克兰研究中所获得结果的标准。尽管受到测量方法的阻碍，这些结果仍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项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也和相关文献中的发现一致。

由于纵向研究有其独特的性质，所以要把这种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推广是危险的。奥克兰样本并不是通过随机抽样获得的，因此不知道它的总体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样本最准确的是被描述为奥克兰东北部五年级学生这个特殊的总体(1931)，是根据永久居住在此和愿意参与而挑选的。作为研究中的客体，奥克兰的孩子有了他们的同学一般都不曾有的经历，包括频繁的生理测量和人格评估，与不承担权威角色的成年人的友好接触，还有特殊的休闲和教育。因为缺乏一个控制组，所以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可以确定对测量的反应和独特的项目经历对孩子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通过和其他研究的比较，粗略估计了这项研究的外在效度。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我们能够在众多领域中这么做，但是由于缺乏可以对比的研究，这种努力无法实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其他研究调查过大萧条经历对于生命

历程的影响。

除了对同一年龄组中美国人的一个样本进行不太可能复制的另一次奥克兰研究以外，把这个出生组和其他出生组进行对比，似乎是把奥克兰研究普遍化的最有希望的来源。按照这种设计开展的纵向研究现在正在实施当中，而且将在把从1929年到1970年这40年时间中的奥克兰样本，来和更年轻的出生组（出生年份在1928—1929年）相比较。而且对比也要在这些出生组成员和他们最近曾接受访谈的后代之间进行。如果要进行这项计划，就要调查大萧条经历和代际异同性在价值观和政治见解上的联系。如果一切进行顺利，这项分析将极大地增加我们现在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史中的大萧条经历的理解。

从传统上来看，测量的层次和样本的特征，作为有效运用分析技术和检验中的假设的基础，作为决定有关统计分析的假设的基础，还是相当重要的。与非参数统计相比，参数统计对分析来说更加有力，但是这需要满足在社会学研究中很少能够满足的测量层次（定距或者定比）。如果我们像在这项研究中那样喜欢使用参数统计，那么违反参数统计有关测量层次的假设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这种犯规的一种评估所获得的结论是："几乎在任何设想的研究环境中，参数统计检验本身的完善足以让研究者使用它们，而不用担心会出现大的误差，无论数据是否是定距或者定比的，只要它的定序测量与潜在的真实量表呈单相关。"[6] 在回归分析中，正态的假设主要适用于因变量，而测量误差通过自变量影响了估算。

尽管在奥克兰的档案资料中，大多数指标在测量层次上或

⑥ G.W.博恩斯塔特、T.M.卡特：《回归分析的完善之处》，见H.L.科斯特纳编：《社会学方法论》（旧金山，1971），第131页。

者是定性的，或者是定序的，如果我们断定运用参数统计对分析是有利的，而且似乎不可能出现严重的误差，我们就采用这种统计方式。为了使这种误差最小化，我们一般都会比较使用参数统计和使用非参数统计（也就是说交叉表分析）的结果，比较关联的定序测量和相关分析的结果。对于用来处理两分或者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的路径分析技术，我们用之测量模型间的关系，[7] 这是为了估计经济萧条（经济未受损的和经济受损的）的主要影响，以及它在大萧条中通过家庭适应产生的间接影响。

在我们的评价中，和独立的统计检验相比，关系的特有形式受到了特殊的关注。当我们在勾勒研究的分析结构并提出具体的假设时，我们对于发现的解释集中于一个更加广泛的框架，比如说劳动分工和家庭中权力的关系，家庭经济受损对于地位获得和孩子成人后健康的影响的对比等。显著性的检验被谨慎地用做确定可靠的没有机会出错的发现的最低标准。[8]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样本中获得统计上的显著发现，的确表明了相当大的影响或者差异，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评估标准对我们还是相当有帮助的。在分析中，另外一种能够发现可靠结果的非常有用的指标，也是彼此一致的指标，是比较基于衡量同一概念的不同指标所获得的结果，以及比较理论上相关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评价结果来说，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被看做是一种指导原则。

---

⑦ O.D.邓肯：《路径分析：社会学的例子》，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2期（1966），第1—16页；K.C.兰德：《路径分析的原则》，见E.F.博加塔编：《社会学方法论》（旧金山，1969），第3—37页。

⑧ 这种使用统计检验的方法，与戈尔德的解释相一致。参阅D.戈尔德：《统计检验和真实显著性》，载《美国社会学家》，第4期（1969），第43页。

附录 C
大萧条经历的比较

美国人在反省他们的大萧条经历时，不可避免地会做出比较性的判断："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说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糟糕"，或者"他们的情形更加糟糕"，或者"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还可能回忆起在大萧条经历方面美国不同群体或者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不同阶级间的差异，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差异，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其他种族间的差异，流水线上的工人和手艺人之间的差异。但是很少有人会把 30 年代美国的生活状况和同时期的德国、加拿大或者英国的情况进行对比。作为一种国际危机的大萧条，对于美国人来说不像二战那么熟悉，因为只有海外战争和战争威胁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这些美国人能记起的最小的或者最简单的大萧条生活，不会超越家庭的边界。

但是为了理解美国 30 年代的大萧条、它的先决因素以及它的发展过程和后果，我们必须有国际的视野，必须看到战争总动员和一战的影响，了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以及它和其他国家相互依赖的情形，了解革新模式的传播、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由二战促使的经济复苏。现在，人们对于不同程度的大萧条之间的比较知道的很少，一种遵循这些思路的全面的社会史研究正接近完成。[1]不过，我们并不缺乏有关大萧条不同方面

---

① W. E. 洛伊希滕贝格：《大萧条》，见 C. V. 伍德沃德编：《通过比较方法研究美国历史》（纽约，1968），第 312 页。对比较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人大量涌现，

的比较性论述，这些论述有的建立在适当的资料基础上，有的不是。有些比较只是把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大萧条影响的指标，似乎假定社会问题或者危机是一种客观的既成事实，或者假定不同社会历史情境中相同的失业率的意义也是相似的。许多国家在30年代的惊人发展，比如人们都能感觉到美国和德国作为新的力量已经出现在世界上，大大增加了这个假设的份量："社会问题的存在基本上是根据它在社会中如何被界定和感知，而不是一个有着绝对结构的客观条件"（Blumer，1971）。个人和客观艰难之间的联系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就这个方面来说，戈尔（Gorer）认为：从客观上来说，美国的经济受损更为严重，但是人们感觉英国更没有希望，"这种沉闷的绝望只有到二战已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才结束"（Gorer，1967，第16页）。甚至使用不同的经济标准，也会导致对大萧条的影响进行相反的解释。因此，美国受到大萧条伤害的程度比德国更加严重这个结论，一般都受到用经济指标测量获得的结果的支持，尽管可能得不到常常都提及的失业率的支持。

通过考察把大萧条的一般模式作为一种集体压力（collective stress）或者危机境遇的比较陈述，我们能够澄清某些东西。一个基本的例子，就是把老百姓的集体反应看做是对境遇解释的功能和境遇的客观特征。有四个客观的维度在解释大萧条时特别合适：范围、蔓延的速度、影响的持久性和社会准备的程度。[②]前面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境遇需求的指标）和社会准备，影

对此，J. 佩特森断定："很少有历史学家真正这么做，也很少有人成功地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危机中的联邦制度：对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研究》，见Hoar，1969，第1页（也可参阅第十章的注释①）。对于经济指标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比较，参见C. B. 谢德温：《澳大利亚和大萧条》（悉尼，1970），第43—46页。

② 这些维度摘自A. 巴顿对于灾难研究的卓越分析：《灾难中的社区》（1969）。

响了直接和间接通过对境遇共同定义实现的反应方式。对于大萧条的比较评估，一般都提供了一个或更多个境遇变量。"范围"指的是受到这一事件影响的人口的比例和分布。就大萧条而言，还涉及到失业、相对收入受损等方面的广泛程度和分布状况（社会的和地理的）。这种标准也表现在加尔布雷思（Galbraith）的判断中：他认为在美国生活所发生的危机中，大萧条的作用超过了二战（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曾经历了战争中极为艰难的时期，曾因战争而受到损失等）。[③]

在大萧条的蔓延速度和持续时间上，国家间的显著差异曾多次被提到。与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相比，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萧条发生较晚，经济下降的趋势和持续的时间更长，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更大。潜在的因果因素超过了我们对于大萧条相对影响的有限兴趣。不过，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第一是国家之间在社会对于危机持久性所做准备上的差异的潜在影响，这种持久性也是我们在考察决定适应能力的社会历史因素时应该考虑的东西。第二是美国经济的急剧滑坡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到20年代末，美国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2/5强，将近英国和德国之和的两倍。1929年经济崩溃所带来的震荡和国际贸易的严重下滑，诸如澳大利亚之类的国家都会敏锐地感觉到，因为这些国家容易受到海外因素波动的伤害。

就社会历史因素来看，社会准备对于解释大萧条的相对影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应该考虑的相关因素包括：一战后复苏

第41页。巴顿并没有把社会当做一个分析单位，但是他精致的概念框架为大萧条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多东西。这四个维度只是巴顿模式中的一小部分。除了提及的参考书目以外，有关德国经济状况的数据，来自J. C. W. 古尔博：《德国的经济复苏，1933—1938》（伦敦，1939），尤其是附录中的表6。

③ J. K. 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第二版（波士顿，1962）。

的步伐，对于出口和农产品的依赖，作为经济萧条对比的20年代的相对繁荣，还有能够满足萧条经济（公共保障物品）的急迫要求的适应性机制的有效性。巴顿对于“做好了准备”的社会系统的定义，与美国和加拿大萧条前共同的弱点有密切关系。巴顿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系统已经为个人界定了适当的角色，界定了他们如何才会受到适当的训练，而且这些角色在经营组织和计划中相互融合成一体”，那么它就为某种特定的集体困境做好了准备（Barton，1969，第41页）。在2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在应该增强凝聚力和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努力向前的时候”，却分散了政府的权力”。[④] 这两个国家都缺乏政府负责（state responsibility）的传统，没有适当的协调和控制机制。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两个国家的政府在公共事务和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上的权力都被削弱了。如果说就像洛伊希滕贝格所断言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美国这样根本没有为应付大萧条做好准备”，加拿大至少是紧随其后的。[⑤] 这两个国家在没做好准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佩特森（Patterson）的比较研究也提出：由于加拿大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s）、地方巨大的债务和严重依赖出口商品，它可能受灾更为严重。

从美国人对大萧条的描述来看，其相对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又是逐步的，因此尽管他们在最初没有怎么做准备，对困境的适应方式也可以通过实验和错误而逐步调整。所以，大萧条不同于原子弹攻击，因为后者是突然出现的，持续时间很短，人们也没怎么做准备。我们通过关注衡量“范围”和“准备”的指标，以及它们与集体解释和反应的关系，可以最为清楚地证明大萧

④ 佩特森前引书，第5页。

⑤ 洛伊希滕贝格前引书，第279页。

条影响比较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疑点。

衡量大萧条相对影响的最普遍方法，和有关其影响范围的诸方面或多或少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包含着一系列令人气馁的缺憾。失业率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各个国家对于失业的定义不一，因此无法对失业率进行国际比较。另外，失业这一结果有赖于这个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阶段，有赖于城市工业的进展和公共部门的重要性。正如谢德温(Schedvin)的分析那样，通过运用工业化程度最高社会的可以比较的资料(如图 13 所示)，可以使这些问题不再成为问题了。除了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官方)以外，所有国家的估计数字都是工会提供的。这些数字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能够表明各个国家大萧条范围的大致顺序。在谢德温对实际国民产出(real national product)下降的比较中，美国受到的影响比德国稍为严重些，比英国严重得多。

如果只是把失业率作为衡量大萧条影响的指标，那么就会产生一幅无失业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错误画面。特别是可能对自雇小商人的经济境遇做出错误的估计。在奥克兰研究中，那些失去了绝大部分收入的男性可能以某种方式维持他们的商业活动。那种夸大失业数据中阶级差异的趋势，可以在朗西曼(Runciman)对于英国萧条时(大约 1931 年)阶级关系的分析中看到。那些职业地位急剧下降的数据，现在被当成一个整体的体力劳动者受到大萧条影响比办公室人员大的基本证据(Runciman，1966，第 81 页)。无论如何，这些解释仅仅适用于失业的客观状况，因为朗西曼的分析导致了有关感觉到的幸福或者相对经济受损的阶级分布的相反结论。“在大萧条期间……体力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在经济上的相对受损，似乎无论在频率还是在幅度上都是较低的。”与战时和持续繁荣时期不同，大萧条的经济状况限制了他们和劳动阶级的社会比较(同上

书，第64页）。比较而言，在中产阶级中有一种范围更广也更加苛刻的社会对比框架（和经济受损之前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相比较），这使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下降变得特别真实，使他们受到的伤害也特别大。顺着这一思路，舍恩伯姆（Schoenbaum）对纳粹德国的观察也适合于其他工业社会："失业对白领和蓝领的冲击是相似的，但是在心理上它对于白领的伤害更深一些。"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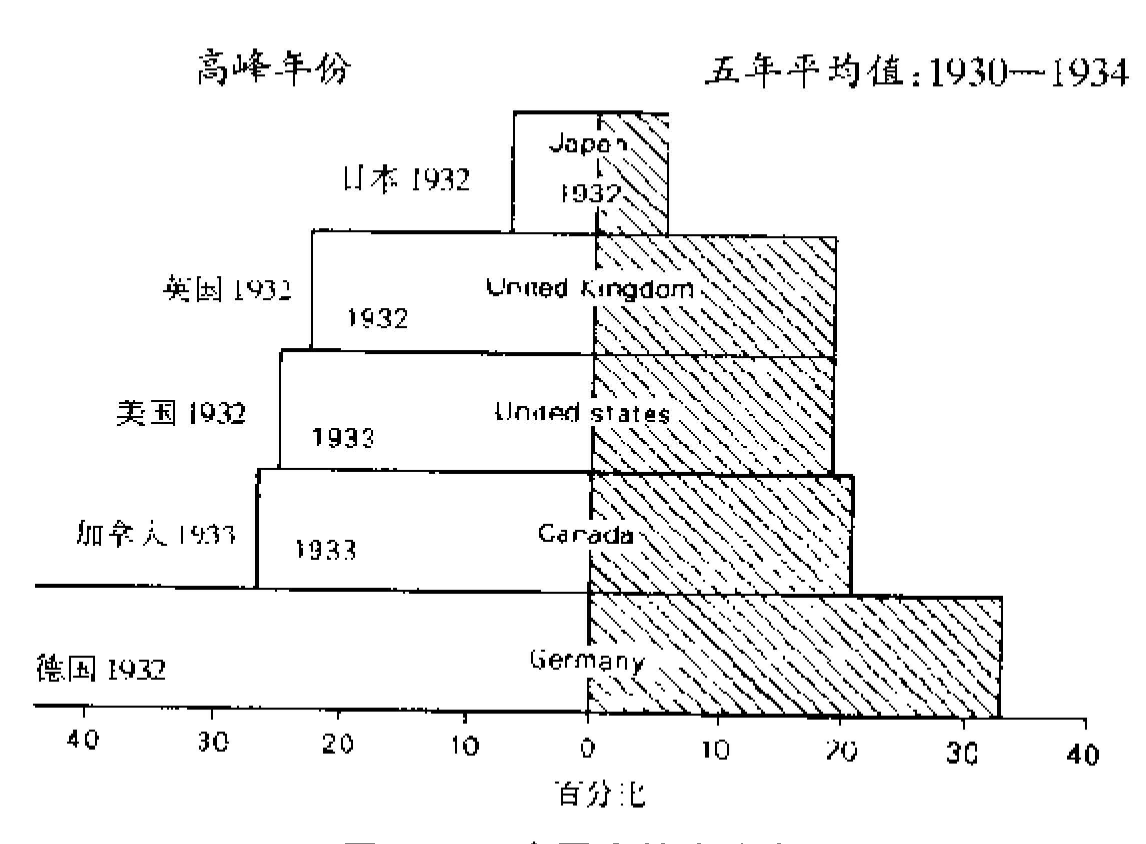


图13 五个国家的失业率

有人还进一步指出，人们越习惯于美好时光和较高期望，恶劣时光对其心理影响就越大。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可能在这方面

---

⑤ D.舍恩伯姆：《希特勒的社会革命：纳粹德国的地位和阶级，1933—1939》（纽约，1966），第9页。

特别突出，他们在1929年根据世界标准来看生活富裕，在充裕和自我依赖的文化中长大，承受了相对严重受损所带来的痛苦。根据这个思路，洛伊希滕贝格断言："美国人比那些在1920年代没有享受过繁荣的人受到大萧条的冲击更大。"[7] 不过，除极端的例子以外，由于还有许多未知因素和情境差异，现在能否对震撼或者影响做出有意义的比较论断还成问题。比如，人们认为不同的因素组合（长期政治的和道德的堕落等）形成了德国的心理氛围（1929—1932），形成纳粹极端主义出现的情境，这种氛围被格伦伯格（Grunberger）描述为"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这预示着或是一片混乱或是'无法避免的转型'。"[8] 很明显，我们对不同国家的大萧条危机及其心理影响和经济状况的差异都知之甚少，这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政治现实。

这些现实的一种明显表现，就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迅速膨胀。在危机时候，有效的紧急行动需要崇高的目标、控制和牺牲。在美国和其他受到重创的国家（尤其是德国），这种行动被战时总动员的意象和机制所塑造。对这种政治上反应的早期陈述表现在斯宾塞的著作《社会学原理》之中：在极权主义的控制下，战争导致了政府管理和政治变迁的增多。索罗金（Sorokin）后来把斯宾塞的论点延伸到所有全国性的重大灾难或者危机——饥荒、经济崩溃、战争、瘟疫——之中。在一大堆历史的和比较的资料基础上，索罗金把这种对危机的紧急反应界定为"历史上最强烈的诱导性普遍化"之一。"灾难对于社会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影响，是政府控制的增多，管辖权的增大，以及社会关系控

---

⑦ 洛伊希滕贝格前引书，第297页。

⑧ R.格伦伯格：《21年的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社会史，1933—1945》（纽约，1971），第10页。

制的增加。同时，个体或私人群体对社会关系的管理和控制也减少了"(Sorokin，1937，第122页)。这种发展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全依当时的情境而定，而且一般也受到民主原则这一传统的约束。然而美国个人的私人世界受到政府的控制，在大萧条中罗斯福第一次入主白宫的时候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

来自一战总动员的教训，有关战时总动员的心理和机制方面的教训，也很适用于新政中全国复苏所碰到的问题。"新政中很少有行动或者机构不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一战"(Leuchtenburg，1964，第109页)[9]。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大萧条危机的急迫性，维持了人们的这一信条："战时的国家首先为了生存"是惟一重要的观点，这种观点能够在牺牲性的努力和认同中形成必要的团结和协调。正如一位新政者提到的那样："事实是，至今只有战争被证明是这样一个超验的客体(transcending objective)，以至于为了它可以牺牲原则。"

"拯救国家"这个崇高的目标，通过一战中采用的总动员策略表现出来，它也很明显地包含在两个新政机构中：国家复兴总署(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仿效一战时期的战争工业部设立)，以及更为知名的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罗斯福招募老兵担任这两个机构的领导者或工作人员。在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将军的强有力领导下，国家复兴总署命令的实施，证明了战争对于国家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心理上的深刻影响。为了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和彼此合作协调是值得称道的，而对于不遵守规范的和"逃避职责"的人将进行社会惩罚，不合作者将声名扫地。现在，大众心理产

⑨ 洛伊希滕贝格：《新政和战争类似物》(1964)，第109页。本文后面的引文全都出自这篇论文。

生的顺从压力比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话陈述得更为清楚。巴鲁克是第一个提出设计国家复兴总署徽章的人,这个徽章后来采用了"蓝鹰"的形式,这是用来表彰在国家复兴总署的运动中合作的"荣誉徽章"。至于战时,巴鲁克认为:"如果人们普遍认识到那些正在合作的人是反对国内敌人的战士,而那些逃避责任的人则站到了对立的一方,那么人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犹豫了。门口、信笺抬头和发票上具备表示政府赞许的徽章,是必须开始实施的一件事。"在当时这种战争精神的号召下,家庭主妇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也被"买带有蓝鹰的东西"的口号而动员起来。更为普遍的是,在罗斯福第一次执政的早期,许多不符合新政时为了复兴而制定计划的行动,都被当做对国家不忠诚,甚至当做搞破坏。劳工者罢工也被新政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当危机消失的时候,这种限制和压力就会软化,而且可能矫枉过正。

就像一战的总动员提供了应对大萧条的模式一样,新政中的总动员也是美国为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威胁在技术上和资源上做好的准备。这种联系在民间资源保护队这个机构身上能清楚到看到,这个机构的目标是由军队实施的。"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成员是在军队士兵招募站征集的,他们穿越军营,并且穿着一战时的服装,坐着车列去到森林,于部队的帐篷中在'熄灯号'的压力下睡去,在'起床号'中惊醒。"尽管在这支和平时期的部队中,对军事控制和军国主义有着恐惧的心理,这项活动还是通过创造守护年轻的国家和各种资源这一意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然而,很少有议员不知道,民间资源保护队的老兵,是战争中的一个潜在军事核心。当整个国家进入二战的时候,类似国家复兴总署和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总动员机构,又带着它的团结、牺牲、对先验原因的认同等口号出现了。

参考文献

（本参考文献只包括正文和注释中引用的直接与本项研究及其含义相关的著作。与"奥克兰成长研究"和数据分析相关的方法论和统计学上的参考资料没有列出，不过读者可以在"附录B 样本特征、数据来源和方法论问题"的注释中比较方便地找出这些资料。）

Aiken, Michael; Ferman, Louis A.; and Sheppard, Harold L. *1968* — *Economic Failure, Alienation, and Extrem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llen, Vernon L., ed. *1970* —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Poverty*. Chicago: Markham.

Altbach, Philip G., and Peterson, Patti *1971* — "Before Berkele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Student Activ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5:1—14.

Angell, Robert Cooley *1936* — *The Family Encounters the Depress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tkinson, John W., ed. *1958* — *Motives in Fantasy, Action, and Societ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Bahr, Stephen J., and Rollins, Boyd C. *1971* — "Crisis and Conjugal Pow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3:360—367.

Baker, George, and Chapman, D. W., eds. *1962* — *Man and Society in Disas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Bakke, E. W. — *Citizens without Work*. New Haven: Yale

1940 University press.

Barker, Roger 1968 *Ecological Psych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ton, Allen 1969 *Communities in Disast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engtson, Vern L., and Lovejoy, Chris 1973 "Valu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Intergener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6:880—912.

Bensman, Joseph, and Vidich, Arthur J. 1971 *The New American Societ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Bernard, Jessie 1971 *Wome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Chicago: Aldine.

Bird, Caroline 1966 *The Invisible Scar*. New York: McKay and Co

Blau, peter M., and Duncan, Otis Dudley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Block, Jack (in collaboration with Norma Haan) 1971 *Lives through Time*. Berkeley: Bancroft Books.

Blood, Robert O., Jr., and Wolfe, Donald M. 1960 *Husbands and Wiv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Blumer, Herbert 1939 *An Appraisal of Thomas and Znaniecki'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 44.

1958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Pacific Socilolgical Review* 1:3—7.

1971 "Social Problems as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18:298—306.

Bowerman, Charles E., and Glen H. Elder, Jr. 1964 "Variations in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Family Power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551—67.

Bradburn, Norman M. 1969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Breer, Paul E., and Locke, Edwin A. *1965*	*Task Experience as a Soure of Attitude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Bronson, Wanda S.; Katten, Edith S.; and Livson, Norman *1959*	"Patterns of Authority and Affection in Two Gener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143—52.
Brunswik, Else Frenkel *1942*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26:121—265.
Burgess, Ernest W.; Locke, Harvey J.; and Thomes, Mary Margaret *1971*	*The Family: From Tradition to Companionship*. 4th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Butler, Robert N. *1963*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Psychiatry*: 26:65—76.
Cain, Leonard D., Jr. *1970*	"The 1916—1925 Cohort of Americans: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Generation Ga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 1970.
Cavan, Ruth S., and Ranck, Katharine H. *1938*	*The Family and the Depression: A study of 100 Chicago Famil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fe, William Henry *1972*	*The American Woman: Her Chang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s*, 1920–19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ristensen, Harold T., ed. *1964*	*The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Chicago: Rand McNally.
Clausen, John A., ed. *1968*	*Socialization and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See especially chap. 7, by M. Brewster Smith, "Competence and Socialization," and chap. 2, by Alex Inkeles, "Society, Social Structure, and Child Socialization.")
Coles, Robert	*Children of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1967 Co.

Cooley, Charles H. 192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Dizard, Jan 1968 *Social Change in the Family*. Chicago: Community and Family Study Center.

Dohrenwend, Bruce P., and Dohrenwend, Barbara S. 1969 *Soci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 A Causal Inquir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Easterlin, Richard A. 1961 "The American Baby Boo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869—911.

1968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lder, Glen H., Jr. 1968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Intelligence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Sociometry* 31:327—54.

1969a "Appearance and Education in Marriage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519—33.

1969b "Occupational Mobility, Life Patterns,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0:308—23.

1970 "Marriage Mobility, Adult Roles, and Personality." *Sociological Symposium* no. 4: 31—54.

1971 *Adolescent Socialization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2 "Role Orientations, Marital Age, and Life Patterns in Adulthood." *Merrill – Palmer Quarterly* 18:3—24.

1973 "On Link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6:785—800.

Erikson, Kai 1970 "Soci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st* 5:331—38.

Estvan, Frank *1952* —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tatus, Intelligence, and Sex of Ten- and Eleven-Year-Old Children to an Awareness of Poverty."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46:3—60.

Farber, Bernard *1972* — *Guardians of Virtue: Salem Families in 1800*. New York: Basic Books.

Festinger, Leon *1957* —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Flacks, Richard *1970* —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Student Revolt: Some Informal Comparative Observations." *Social Problems* 17:340—57.

Foote, Nelson N., ed. *1961* —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Freud, Anna, and Burlingham, Dorothy T. *1943* — *War and Childre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Fromm, Erich *1941* —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Gerth, Hans, and Mills, C. Wright *1953* —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Gewirtz, Jacob L., and Baer, Donald M. *1958* — "Deprivation and Satiation as Social Reinforcers on Drive Condi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165—72.

Ginsburg, S. W. *1942* — "What Unemployment Does to People: A Study in Adjustment to Cri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99:439—46.

Glaser, Barney G., and Strauss, Anselm L. *1964* — "Awareness Context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667—79.

Glaser, Daniel, and Rice, Kent *1959* — "Crime, Ag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679—89.

Goode, William J. *1968* —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Family Change."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edited by Eleanor Bernert Sheldon and Willbert E. Moor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Gorer, Geoffrey 1967 "What's the matter with Britai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1

Goslin, David A., ed. 1969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See especially chapters by Reuben Hill and Joan Aldous, "Socialization for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and by Leonard Cottrel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Gouldner, Alvin, and Peterson, William 1961 *Notes on Technology and the Moral Orde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Greven, Philip J., Jr., 1970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mblin, Robert L. 1958 "Leadership and Crisis." *Sociometry* 21:322—35.

Hansen, Donald A., and Hill, Reuben 1964 "Families under Stress." In *The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edited by Harold T. Christensen, chap. 19. Chicago: Rand Mcnauy.

Hareven, Tamara K. 1971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399—44.

Harrington, Michael 1962 *The Other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Hawthorn, Geoffrey 1970 *The Sociology of Fertilit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Heer, David M. 1963 "The Measurement and Bases of Family Power."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5:133—39.

Hill, Reuben 1949 *Families under Stres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70 *Family Development in Three Generations*.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Hinkle, L. E., Jr. and Wolff, H. A. 1957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 of This to Illness. "A. M. A.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22:449—60.

Hobbs, Daniel, Jr. "Parenthood as Crisis: A Third Study."

1965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7:367—72.

Hobsbawm, E. J. 1971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In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edited by Felix Gilbert and Stephen R. Graubard, pp. 1—26. New York: W. W. Norton.

Hoffman, Lois W. 1960 "Effects of Employment of Mothers on Parental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Tasks."*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2:27—35.

Huntington, Emily H. 1939 *Unemployment Telief and the Unemploye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yman, Herbert H. 1942 "The Psychology of Status." *Archives of Psychology* 38, no. 269.

1972 *Secondary Analysis of Sample Surveys: Principles, Procedures, and Potentialiti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gersoll, Hazel L. 1948 "A Stud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uthority Patterns in the Family."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38:225—302.

Inkeles, Alex 1955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Role of Parental Mediation."*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1, no. 2: 12—23.

Jackson, Elton F. 1962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Symptoms of St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469—80.

Jackson, Elton F., and Burke, Peter J. 1965 "Status and Symptoms of Stress: Additive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556—64

Jahoda, Marie; Lazarsfeld, Paul F.; and Zeisel, Hans 1970 *Marienthal* Chicago: Aldine.

Jones, Mary C. 1958 "A Study of Socialization Patterns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93:87—111.

Kagan, Jerome, and Moss, Howard *Birth to Maturit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Co.

1962

Kasl, Stanislav, and Cobb, Sidney *1967* — "Effects of Parental Status Incongruence and Discrepancy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Adult Offspr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Monograph* 7, no. 2, pt. 2.

Kirkendall, Richard S. *1964* — "The Great Depression: Another Watershed in American History?"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edited by John Braeman, Robert H. Bremner, and Everett Walter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Knudsen, Dean O. *1969* —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Women: Popular Myths and the Failure of Functionalist Thought." *Social Forces* 48: 183—93.

Kohn, Melvin L. *1969* — *Class and Conformity: A Study in Value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Komarovsky, Mirra *1940* — *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Blue—Collar Marri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koos, Earl L. *1946* — *Families in Trouble*.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LaFollette, Cecile T. *1934* —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652 Gainfully Employed Married Women Homemaker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Langner, Thomas S., and Michael, Stanley T. *1963* — *Lif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Free Press.

LeMasters, E. E. *1963* — "Parenthood as Crisis."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5: 196—201.

Lenski, Gerhard *1954* — "Status Crystallization: A Non—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1954): 405—13.

Leslie, Gerald R., and Johnsen, Katheryn P. *1963* — "Changed Perceptions of the Maternal Ro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919—28.

Leuchtenburg, William E. — "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1964 *America*, edited by John Braeman, Robert H. Bremner, and Everett Walter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evine, Sol, and Scotch, Norman A., eds. 1970 *Social Stress*. Chicago: Aldine (See especially chapter 10, by R. Scott and A. Howard, "Models of Stress.")

Levinger, George 1965 "Marital Cohesiveness and Dissolution: An Inter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7:19—28.

Linder, Steffan B. 1970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inton, Ralph 1942 "Age and Sex Categ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89—603.

Lipset, Seymour M., and Todd, Everett C. 1971 "College Generations—from the 1930s to the 1960s." *The Public Interest* 25:99—113.

Lopata, Helena Z. 1971 *Occupation: Housew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ynd, Robert S., and Lynd, Helen Merritt 1937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McClelland, David 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Macfarlane, Jean W. 1964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ity Consistency and Change from the Guidance Study." *Vita Humana* 7:115—26.

McGrath, Joseph E., ed. 1970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Str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McMulvey, Mary C. 1961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Factors in Prediction of Career Patterns of Women."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Malewski, Andrzej 1966 "The Degree to Status Incongruence and Its Effects." 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 edited by Reingard Bendix and Seymour M. Lipset, 2d ed., pp. 303—8. New York: Free Press.

Mannheim, Karl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c, pp. 276—32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slow, Abraham H.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Mauss, Armand L. *1971* "The Lost Promise of Reconciliation: New versus Old Lef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7:1—20. (The entire issue is devoted to Old and New Left.)

Mayhew, Henry *1968* *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 Vol. Ⅰ. New York: Dov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iffin, Bohn, and Co. in 1861—62.)

Mechanic, David *1968* *Med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Miller, Daniel R. *1970* "Personality as a System." In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aoul Naroll and Ronald Cohen, pp. 509—26. Garden City, N.Y.: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Miller, Daniel R., and Swanson, Guy E. *1958* *The Changing American Parent*.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Mills, C. Wright *1951*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nturn, Leigh, and Lambert, William *1964* *Mothers of Six Cultur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Mitchell, Broadus *1947* *Depression Decade: From New Era through the New Deal*, 1929—1941. New York: Rinehart and Co.

Miyamoto, Frank *1970* "Self, Motivation,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Theory." In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Papers in Honor of Herbert Blumer*, edited by Tamotsu Shibutani, pp. 271—85.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ogey, John M. *1957* "A Century of Declining Paternal Authority."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9:234—39.

Moss, J. Joel *1964*	"Teenage Marriage: Cross—National Trends and Sociological Factors in the Decision of When to Marry." *Acta Sociologica* 8:98—117.
Mussen, Paul H., ed. *1960*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See especially William Kessen, "Research Design in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Problems.")
1970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Nam, Charles *1964*	"Impact of the GI Bill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Male Population." *Social Forces* 43:26—32.
Nesbit, Robert A. *1969*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e Social Bond*. New York: Knopf.
Nye, F. Ivan, and Hoffman, Lois W., eds *1963*	*The Employed Mother in America*. Chicago: Rand McNally.
Ogburn, William F. *1964*	William F. *Ogburn 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Pape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Otis Dudley Dun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sons, Talcott, and Fox, Renee *1952*	"Illness, Therapy, and the Modern Urban American Famil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8:31—44
Perry, Stewart E.; Silber, Earle; and Bloch, Donald A. *1956*	*The Child and His Family in Disaster: A Study of the* 1953 *Vicksburg Tornado*.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Study no. 5.
Plant, James *1937*	*Personality and the Cultural Pattern*. New York: The Commonwealth Fund.
Potter, David M. *1954*	*People of Plen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uett, Lorine *1934*	*Women Workers through the Depression*. New York: Macmillan.
Rahe, Richard H. *1969*	"Life Crisis and Health Change." In *Psychotrophic Drug Response: Advances in Prediction*, edited by Philip R. A. May and J.

R. Wittenborn.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Reissman, Frank; Cohen, Jerome; and Pearl, Arthur, eds. 1964. *Mental Health of the Poor*. New York: Free Press.

Riesman, David 1950.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ley, Matilda White; Johnsen, Marilyn; and Foner, Anne 1972. *Aging and Society: A Sociology of Age Stratification*. Vol. 3.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Rosenberg, Morris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i, Alice S. 1964.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Daedalus* 93:607—52.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61.

1967. "The Emergence of a Modern Fertility Pattern: United States, 1917—66."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A World View,"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5—17 November 1967.

Sanford, Nevitt 1966. *Self and Society*.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Scanzoni, John H. 1970. *Opportunity and the Family: A Study of the Conjugal Family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ic Opport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Sennett, Richard 1970. *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nas, Ethel, and Streib, Gordon F., eds.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amily: Gener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Sherif, Muzafir 1958 "Superordinate Goals in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Ten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349—56.

Simons, Rita J., ed. 1967 *As We Saw the Thirt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ee especially Hal Draper's essay, "The Student Movement of the Thirties: A Political History.")

Slater, Philip 1970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Boston: Beacon Press.

Slote, Alfred 1969 *Termination: The Closing at Baker Pla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Smelser, Neil J. 1967 "Sociological Histor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Family."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by Smels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Sorokin, Pitirim A. 1942 *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Spiegel, John P. 1968 "The Resolution of Role Conflict within the Family." In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edited by Norman W. Bell and E. F. Vogel, PP 361—81. New York: Free Press.

Srole, Leo; Langner, T. S.; Michael, S. T.; Opler, M. K.; and Rennie, T. A. C. 1962 *Mental Health in the Metroplis*. New York: McGraw—Hill.

Sternsher, Bernard 1969 *The Negro in Depression and War: Prelude to Revolution*, 1930—45.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Hitting Home: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own and Country*. Edited by Bernard Sternsher.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Stotland, Ezra 1969 *The Psychology of Hop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Stouffer, Samuel A., and *Research Memorandum on the Family in the Depression*. New York: The Social Science

Lazarsfeld, Paul F. 1937 — *Research Council.*

Straus, Murray A. 1962 — "Work Roles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Farm, Fringe, and Town Boys." *Rural Sociology* 27:257—74.

1968 —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of Middle—and Working—Class Families in Three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417—30.

Sullivan, Harry Stack 1947 — *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Super, D. E.; Starishevsky, R.; Matlin, N.; and Jordan, J. P., eds. 1963 — *Career Development: Self—Concept Theory.* Princeton, N. J.: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Taft, Philip 1964 — 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erkel, Studs 1970 — *Hard Times.* New York: Pantheon.

Thernstrom, Stephan 1964 — *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The Other Bostonians: Class and Mobility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Dorothy S 1927 — *Social Aspects of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Knopf.

Thomas, William I., and Znaniecki, Florian 1918—20 —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Vols, 1 and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8 — *Perspectives on Human Deprivation.*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khart, Edmund H., ed. —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Contributions of W. I. Thomas to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1951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Warner, William F. and Abegglen, James *1963*	*Big Business Leaders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Weinstock, Allan R. *1967*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fense and Cop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7—75.
Wilensky, Harold L. *1961*	"Orderly Career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Work Histor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iddle Ma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521—39.
Wolff, Sula *1969*	*Children under Stress*. London: Penguin Press.
Zawadski, B., and Lazarsfeld, Paul F. *1935*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224—51.
Zollschan, George K., and Hirsch, Walter, eds. *1964*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ee especially David Kirk's essay, "The Impact of Drastic Change on Social Relations: A Model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fication of Stress.")